

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

戚本禹回憶錄 (下)

戚本禹 著

戚本禹

內容簡介

戚本禹，中共上海地下黨員，中央團校學員，1950年5月，19歲，被選調進入中南海政秘室，在毛澤東身邊工作18年。先後為毛澤東讀報、摘報；管理圖書；參與《毛澤東選集》的校對工作；處理群眾來信來訪；下鄉下廠勞動與調研；主編《群眾反映》。1963年發表《評李秀成自述》，引發風波，獲毛澤東批示支持：“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由此，介入中央高層政治分歧與鬥爭。1966年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與1966年、67年文革運動高潮中，中央核心的許多重大決策。作為其許多決策的主要執行者之一，這兩年戚本禹在北京講話最多、出面最多。

1968年1月，戚本禹被清退出政治舞臺，即被關進秦城監獄；文革運動後被鄧小平掌控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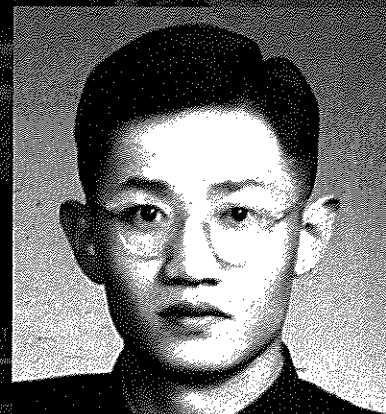
央審判，判刑18年。戚本禹為其18年的中南海政治生活，付出了18年牢獄生活的代價，而始終不改對毛澤東的忠誠。1986年刑滿出獄後，堅持繼續革命，公開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功過，捍衛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戚本禹更與聞鋒并肩戰鬥，在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批判繼承，著述豐厚。他們相信，歷史將證明，他們不但是中國舊文化糟粕的破壞者，亦是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的繼承者，新文化的建設者。中國學術界將有他們的一席之地。

不管你對戚本禹的回憶持支持還是反對的立場，不論研究中國文革運動歷史的學者，還是關注這段不可能抹去與回避的令人刻骨銘心歷史的人們，都應不能不看這本《戚本禹回憶錄》。有比較才能鑒別，史料的真實性是最重要的。

戚本禹回憶錄

(下)

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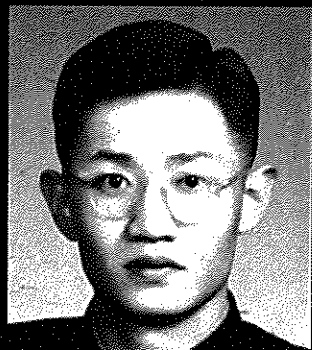
戚本禹

著

作者簡介

戚本禹，文革後應要求改名為戚文。1931年生，山東威海人。早年曾在上海浦東中學、中華理科、南洋模範中學就讀，并于1948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1949年5月上海解放，7月選調入北京中央團校學習。1950年5月4日被選調進中南海，任中共中央政秘室見習秘書。自此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十八年，先後任秘書、科長、處長、副局長，《紅旗》雜誌歷史組組長、副總編輯、《毛澤東選集》編委會成員等職。1966-1968年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及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等職。1968年1月被隔離審查，關進秦城監獄，文革後被判刑十八年。1986年至1991年，在上海圖書館從事歷史資料整理和研究工作。1991年以一年半工齡退休，至今二十多年，堅持批判繼承中國傳統文化，著述頗豐。

戚本禹幾十年撰寫和編輯的論著有四十餘種，其中個人著述有十幾種，重要的有《評李秀成自述》、《先秦人物》、《秦代人物》、《兩漢人物》、《三國人物》等。合編著述幾十種，重要的有《中華易學大辭典》、《孫子兵法大辭典》、《周易十講》、《十家論叢》、《大人物的變態心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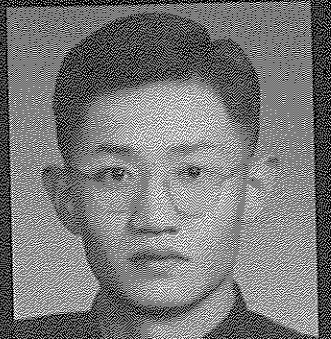


戚本禹

戚本禹

戚本禹與關鋒在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界，自成立場鮮明的一派。其主要著述如下：

- 《孫承宗》，中華書局出版。
- 《評李秀成》，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
- 《大人物的變態心理》，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
- 《孫子兵法大辭典》，上海科學出版社出版。
- 《墨子十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孫子兵法十講》，安徽文學出版社出版。
- 《論語譯說與孔子批判》，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出版。
- 《十家論叢》第一輯（共八冊）。
- 《十家論易》，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十家論管》，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十家論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十家論孫》，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十家論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十家論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十家論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今古奇觀正續編》，江西百花出版社出版。
- 《三國圖說》，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出版。
- 《屈原與〈離騷〉》，已完稿待出版。



戚本禹

著

戚本禹回憶錄 (下)

★

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

第三部分

中央文藝小組的

日日夜夜

第一章 從《評〈海瑞罷官〉》 到“二月提綱”

1、意識形態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

毛主席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無產階級革命的領袖，他一向十分重視意識形態領域裡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他始終認為，無產階級在奪取了國家政權，和完成了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並沒有結束。尤其是在國際資本主義還處於十分強大的情況下，這樣的鬥爭是不可能短時間內完成的。這不但因為在這方面資產階級還占據著很大的優勢，更是由於隨著共產黨地位改變，取得了國家政權，千百年來剝削階級的、舊的統治階級的舊思想和舊的傳統習慣，必然要反映到共產黨內部來。這種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在中國這樣有著漫長的封建專制統治歷史，和深厚的封建文化積澱的國家裡，情況就必然是更加複雜。而無產階級思想不通過鬥爭取得統治地位，已奪取的政權是不穩固的，倒退、復辟隨時都可能發生。可是，在我們黨內，能像毛主席這樣認識問題的人卻並不多。

從當時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來看，劉少奇在這方面沒有很大建樹。他1959年當了國家主席之後，在1962年再版了他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本小冊子，其中可爭議的地方很多。當初他1939年在延安出版這本小冊子，主要是靠了呂振羽和楊獻珍的幫助。楊獻珍是劉少奇在北方局的老部下，是劉少奇在思想理論上最主要的也

是最忠實的助手。呂振羽是一位歷史學家。他早在1927年的“大革命”時期就和劉少奇共過事。後來擔任過劉少奇的秘書。劉少奇的歷史知識很多都是從他那裡來的。

劉少奇平時對理論的研究下的功夫不夠。傳說的什麼毛主席說：三天不學習，就趕不上劉少奇。那祇是當年不知從哪裡傳出來的一個流言。王光美很認真地跟我們說過：那都是瞎說。少奇同志講了，他從來沒有聽毛主席這麼說過。

鄧小平是黨內有名的不讀書、不看報的人。他一有空，就是打橋牌，玩。但是這個人很聰明，別人看了幾遍還不懂的東西，他看一眼就懂了。他還特別善於揣摩毛主席和其他領導人的心理。鄧小平的許多歷史知識都是從吳晗那裡來的，吳晗和鄧小平並不僅僅是牌桌上的牌友。外界都以為吳晗和彭真的關係好，因為吳晗是北京市的副市長，是彭真的下屬。其實吳晗與鄧小平的關係遠遠超過了同彭真的關係。

周總理總是忙於各項事務，他對意識形態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比較“遲鈍”的。

其他幾位常委在這方面的作為也是很有限的。

黨內在意識形態領域裡，比較強勢的還是彭真和康生。他們兩個在與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鬥爭中，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我記得，彭真被打倒後，毛主席在一次跟我們的講話中還說，彭真在批（蘇）修的問題上是有貢獻的，這點不能否定他。

康生對馬列經典著作很熟悉，他的古文功底也很深，這方面他不僅在黨內，就是在社會科學界也是屈指可數的。胡喬木、田家英都是自視很高的人，他們對當時以理論家而聞名的陳伯達都看不上，但他倆對康生一直都是很尊敬的。其實，陳伯達也有他的長處，他在哲學、經濟學上的功底比康生強。

毛主席的“五大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江青和葉子龍，其中除了葉子龍，都對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鬥爭很關心，但具體的表現與作用是有差異的。

建國初期，主席就親自領導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此

前，他又對影片《清宮秘史》中的賣國主義錯誤，作了多次指示。可是除了江青，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在這方面卻一直持消極態度，他們一篇文章也沒有寫過。

陳伯達在延安的時候，曾寫出很多文筆犀利的學術文章，受到毛主席的重視。應該說，陳伯達還是有學問的。祇是他這個人私心重，在政治思想路線上比較善於見風使舵，容易動搖。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他先是站到彭德懷一邊。主席一說話，他馬上回頭，編寫了一本小冊子批判彭德懷。本來他在會上受批判的，因為毛主席說，秀才還是我們的人，才被解放。廬山會議之後，他又緊跟毛主席，在反修理論上做了不少工作。所以，他後來當上了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

胡喬木本來是毛主席最器重的筆杆子，在主席的幾個秘書中，他的理論思維能力是最強的。我聽田家英說，建國之初，毛主席在寫《評“白皮書”》等六篇文章的時候，規定胡喬木每天二十四小時內都要隨叫隨到，主席一有什麼新的想法馬上就把他叫過去商量。可是後來胡喬木在政治思想路線上卻一直傾向於劉少奇。在1959年廬山會議的時候，他也和彭德懷站到了一起。儘管後來毛主席保護了他，但他從廬山下來後，就一直在家裡養病了。

田家英在詩詞方面頗有造詣，但要論寫文章，他比陳伯達、胡喬木都要遜色。他後來在政治思想路線上倒向了劉少奇。這也不難理解，劉少奇擔任了國家主席之後，仍任命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副主任，經常找他。日積月累對他思想影響不小。

葉子龍主要是搞機要工作的，他的文化水平有限，不能在這方面過高要求他。

如上所述，在“五大秘書”中，唯有江青對毛主席在意識形態領域裡，要展開對資產階級鬥爭的思想理解得最深刻，這同主席對她在理論思想上的嚴格要求有關，主席看什麼書，要求她也跟著看，而且要寫筆記，主席看過的好文章，也經常批給她看。她是喝“蜂王漿”成長起來的。

2、江青領導的京劇革命

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主席提出批判電影《武訓傳》時，江青就帶著人下去調查武訓，為批判《武訓傳》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到了60年代初，她又開始從京劇這個傳統的戲劇入手，對舊思想、舊文化進行革命改造。

1964年夏天，江青幾次叫我去看京劇現代戲的觀摩演出。江青對我說：這也是黨的一項重要的工作，你也得關心。她還讓我寫評論。可這方面我並不懂行。所以沒能完成她給的任務。1966年初我去上海時，她又兩次讓我和她一起去看她指導創作的樣板戲的排練。以後她又叫張春橋領我去看樣板戲。

江青跟我說，她在北京抓京劇現代戲的時候，曾經跟彭真、鄧拓他們打過招呼的。但彭真他們祇是表面應付她，實際上並不歡迎，也沒有真正布置落實，所以一些京劇團的領導並不積極配合。因為市裡和文化部都沒有給他們這個任務。

但是江青搞京劇革命爭取到了周總理的大力支持。我聽浩亮（他和我是秦城時的難友）說，“樣板戲”這個名稱就是由總理親自定的，而不是江青定的。後來組建“樣板劇團”，也是由總理親自決定的。有一次，毛主席去看樣板戲的時候，演員們向毛主席提出要求參加解放軍。主席回答得很巧妙，說你們要求參加解放軍這是好的。但是群眾也不一定希望他們看到的節目都是由部隊來表演的呀。主席這麼一說，下面就難辦了，到底是給參軍好？還是不給參軍好？結果還是總理想出了辦法，所有的“樣板劇團”都由總政發給軍裝，但是不發領章和帽徽，也不算是現役軍人。

江青對樣板戲確實傾注了極大的心血。原來的《紅燈記》是杜近芳演鐵梅，她的梅派唱腔是絕對好的，別人都達不到她的水平。梅蘭芳甚至說她唱得比他好。浩亮跟我講，那些老京戲迷都祇聽你

的唱腔，不管你的長相怎麼樣的，也不管你的動作好不好，主要就是唱。而且杜近芳和江青關係一直都是很好的。但江青從劇情要求出發，認為鐵梅應該由擅長表演小旦的演員來擔任。而杜近芳是演正旦青衣的，江青跟杜近芳說，我將來一定弄一個適合你的劇本，讓你好好地表演。你演正派青衣是最好的。李鐵梅是個小姑娘，不適合你。杜近芳說，我演過杜麗娘，她也是很年輕的。江青說，你臉盤比較大，打扮出來不像小姑娘。浩亮跟我說，江青很懂戲，你唱的時候拖個半音，她馬上就聽出來，說，不對，你拖了。所以演員們都服她。她確實是個內行。程硯秋老先生和江青交往很久，他生前都說江青真懂京戲。還有譚元壽，馬長禮這些人他們始終都不否定江青。凡是江青指導過的演員，大多數都不否定江青，而且也不跟著別人後面罵她。

《智取威虎山》裡楊子榮出場的亮相也是江青設計的。江青說，英雄的首次出場就像一篇文章的開篇之筆，是這出戲成敗的重要一環。楊子榮的出場亮相，童祥苓試了很多次，連他自己也不滿意，最後還是江青親自跑到臺上去教他怎麼擺弄動作。手和腿該怎麼放。經過江青指導後的楊子榮的出場亮相就完全不一樣了。當時就獲得了觀看排演的觀眾和專家們的鼓掌喝彩。

江青有時看排演的時候，會把身體從側面低下去看。她說這是觀眾看戲的角度，你戲演得好不好，一定要從觀眾的視角來看才知道。

有些唱詞，江青其實是跟主席商量來改的。主席還親自改了幾個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員一唱就覺得不但上口，而且意境也大不一樣。像“迎來春色換人間”、“甘灑熱血寫春秋”這些詞句就是主席改的。可大家不知道，還以為是江青改的。說江青的水平比編導都高。江青說，我當時也不能告訴人家，那是主席改的。

趙燕俠原來與彭真他們關係很熟，她唱得確實好。我看到江青對她也很好，但是她好像是受到什麼人鼓動，就是不大聽江青的話。文革開始後，底下的群眾鬥她，說她是彭真黑綫的人，要她交待和彭真他們的關係。江青說，不要鬥了。還是要讓她來演阿慶嫂。可是她還是不肯按江青的意見改戲，甚至出工不出力。所以江

青祇好叫洪雪飛來代替她。江青跟我說，洪雪飛比起趙燕俠來，那不是差一點，而是差了一個檔次。但趙燕俠爭取不了，也沒辦法。

在看《白毛女》時，我提了個意見。我說劇中的喜兒出逃，好像是有點個人奮鬥。她一個人怎麼生存呢，這比在孤島漂流的魯濱遜還難啊！哪怕有個人同她一起逃出去也好一點。劇團的人覺得我講的有道理，還真的去改了。他們設計了一個丫頭同她一起出逃。江青知道了，就批評我說，你別去瞎提意見了。白毛女一個人逃出去，這是群眾已經熟知了的，你弄兩個人跑出去，那還叫不叫白毛女啊。你有什麼意見得先跟我商量。你下去這麼一講，人家不改也不好。不過她認為我的意見還是有合理的一面，後來就在劇中增加了一些群眾場面。

對芭蕾舞，江青其實並不很懂，但她努力去學。英國芭蕾舞《紅菱艷》那部電影她都看了十幾遍，還總叫我陪她一起看。開始我還覺得滿好看，看了幾遍我就覺得煩了。但她還是專心致志地在看，她要從中找到芭蕾舞的特點，它的藝術形式，它的表達方式。她說，芭蕾舞的藝術語言很大一部分就在腳尖上，它是用腳尖來說話的，肢體語言就是舞蹈藝術的靈魂。她還說，電影表演要看眼神，電影的特寫鏡頭很多是寫眼神的，它是用眼神來說話的。她還教我，看人也是要看他的眼神，眼睛是心靈的窗戶。她說，毛主席老引《紅樓夢》裡的那句話，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講的就是處事看人，她說，你祇知道看書，寫文章。再下去就成書呆子了。她那時把我看得像她弟弟一樣。她對我說，我没有弟弟，我就把你當弟弟。

江青所領導的京劇革命，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上都是非常成功的。這對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影響很大。

3、江青和《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1965年3月，江青在上海，通過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兼市委宣

傳部長張春橋找到姚文元，要他寫評《海瑞罷官》的文章，並交給他一本刊登吳晗《海瑞罷官》劇本的《北京文藝》雜誌。這件事得到了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的大力支持。當時上海市委的陳丕顯、曹荻秋也都是積極參與和支持寫作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的。文革結束後把這件事說成是江青他們瞞著上海市委“秘密”進行的。這是不對的。在1966年上海工人起來造反的時候，曹荻秋還叫人到北京找過我，說上海市委是積極支持批判《海瑞罷官》的，所以他們是“紅綫”上的人，不是“黑綫”上的人，希望中央文革出面對上海造反的工人做工作。

還有的人說，江青開始時是找李希凡批《海瑞罷官》的，但被李希凡拒絕了。這也是胡說。李希凡跟我很熟，上世紀90年代我當面問過他。他說，哪有的事！江青交給我任務，我當時是很高興的。他說，別說是江青叫我寫，就是總編來叫我寫，我也不能不寫啊。可是他當時手頭確實還有別的任務，一下子抽不出時間來。而且他那時對吳晗的《海瑞罷官》根本不了解，他怕完不成這個任務。而江青也不能等到他完成手裡的工作再去熟悉材料，再來寫這個文章。所以就另外找人了。我跟李希凡一直都很好，我相信他的話。我建議他把這個過程寫出來，他答應了。不知道現在他寫出來沒有？

江青後來跟我說過，本來曾想到讓你一起來參加寫的。但當時你正在參加批判李秀成的討論。李秀成討論結束後，你又去農村搞四清了。四清回來後你又生病住院了。江青是在1965年12月，我發表了《為革命而研究歷史》這篇文章之後，跟我說這番話的。她說，我没找你，你自己倒參加進來了，這也挺好。

還有人說《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預先的布置寫的，而後他還親自改了三遍。這種說法應不符合事實。江青跟我說過，她是和主席商量過組織人寫這篇文章的。但具體怎麼寫？主席並不很清楚。主席後來說，這篇文章“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如果主席看過文章後並親自改過三遍，怎麼會對文章未擊中要害這點不加以修改呢？據我所知，姚文元的文章寫好後，江青確實送請主席審閱，毛主席也說他看過三遍。但從

現有檔案看，並未看到主席對姚文元文章的文字作過修改，現存的文革回憶文章中也沒有任何人能引述主席對姚文元的文字修改。毛主席看過姚文元的文章但未動筆修改，應該是真實的。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文匯報》發表後，受到了彭真的堅決反對和抵制，他不許中央和北京的報紙轉載這篇文章。鄧小平也是反對這篇文章的，他曾對吳晗說過，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照樣打牌。

黨內也有很多人，像總理、葉劍英等是支持批判吳晗的。1965年的11月26日羅瑞卿在上海時見到江青。江青跟他說，姚文元在上海寫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匯報》發表了，但北京的《人民日報》、《北京日報》都不理睬。羅瑞卿當場表示，我們《解放軍報》支持。他馬上打電話給《解放軍報》社，說《海瑞罷官》是大毒草，叫《解放軍報》立即在第一版上全文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並加了一個態度很鮮明的編者按。後來還聽說，周總理11月26日在上海向毛主席匯報工作。周總理得知姚文寫作與發表是毛主席同意與支持的。27日回到北京，即向彭真講明，並與他一起審定《人民日報》轉載姚文的按語，在11月30日在《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上作了轉載。

姚文元的文章，我也是從那天的報紙上看到的。那時《文匯報》記者艾玲來北京，她分別找了我與關鋒等人，想聽聽北京學術界對發表這篇文章的反映。艾玲跟我說，她聽江青同志介紹過我的情況。我那時和關鋒還不在一起，我倆也沒有商量過，但卻都對姚文元的文章表示了支持。艾玲聽了我們的意見大為高興，因為她跑遍了整個北京，沒有在學術界找到什麼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現在居然有關鋒、戚本禹表示支持！她就把這個情況反映了上去。主席、江青對我們很滿意，我們就成了北京的左派。

我支持姚文元主要是從革命的立場出發的。但從心裡說，我覺得姚文元的文章有些地方寫得還不够理想，一個是沒把“清官”問題說清楚。沒有揭露出“清官”在本質上也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另外，我覺得把海瑞“退田”和1962年的“包產到戶”、“單

幹風”聯繫在一起，也有點牽強。海瑞要大官僚徐階把多占的土地退出來，退給其他的官紳地主。可當時主張“包產到戶”、單幹的人，是要人民公社向農民退田。兩者不是一碼事。

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一個是為海瑞鳴不平，一個是為彭德懷鳴不平的。這才把《海瑞罷官》這出戲的主題給點出來了。

我當時聽了主席關於《海瑞罷官》要害問題的傳達，真有一種醍醐灌頂的感覺。我難以相信，怎麼深居簡出的毛主席對社會動向的了解竟然會那般細緻入微。當時，60年初期，社會上確實存在一股很大的勢力，他們確實借著《海瑞罷官》這部戲劇在為1959年廬山會議翻案。他們認為彭德懷就是現代海瑞。他們不管海瑞和彭德懷所主張的退田內容有什麼不同，反正認為從公社退田單幹才是中國農村的出路。他們認為彭德懷是為民請命，所以才遭到了海瑞同樣的命運：“罷官”。

吳晗老覺得他的《論海瑞》是奉胡喬木之命而作，而且不是刮“翻案風”、“單幹風”。但在當時的社會思潮中，那股逆時代發展的暗流才不管這些，他們就是要借助《海瑞罷官》這個題目來阻止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為復興中國的資本主義道路鳴鑼開道。所以雙方都在上網上线，而且上得都很高，祇不過一方是明錢，一方是暗流。

為什麼一篇文藝評論文章會引起這麼大的歷史反響，關鍵是文章背後雙方所代表的社會力量的對抗和衝突。這才是要害，其他都是枝節。吳晗、鄧拓、彭真、姚文元、張春橋、江青等等的個人命運不過是這兩股強大社會力量總體對抗和衝突中不可避免的章節而已。

4、《為革命而研究歷史》

我寫《為革命而研究歷史》這篇文章，也和我寫《評李秀成的

自述》的文章一樣，並沒有誰給我下過什麼指令，完全是自發的。那時我從通縣搞“四清”回來，在家養病，因為不用上班，所以就經常到“紅旗”雜誌的圖書館去看報刊雜誌，了解當時學術界的動態。那時學術界還是很活躍的。我看到了翦伯贊不斷在倡導他的反對階級觀點看待歷史的所謂“歷史主義”。我就想，這種脫離階級觀點的歷史主義，其實也就是資產階級的歷史主義。毛主席強調階級鬥爭，並充分肯定和贊揚農民革命對歷史發展的進步作用。可他們這些教授卻認為農民革命，在歷史上祇起到了破壞和倒退的作用。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歷史觀。於是，我就在文章中寫道：

你看，從孔夫子以來，大家都說農民造反無理。衆多的歷史學家，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無數的明槍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業中死去的農民英雄，把他們描寫成為暴戾恣睢、罪大惡極的“犯上作亂”者。就是“五四”運動中的一些新文化戰士，在這樣一種千百年來習慣輿論的壓力下，也覺得沒法子否認那個加在叛逆者頭上的“亂”字。

轟然一聲，馬克思主義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聲宣告：“造反有理！”

我的這篇文章是由《紅旗》雜誌總編輯陳伯達，和副總編輯胡繩、范若愚、鄧力群四人審閱簽字，發表在1965年12月6日的《紅旗》雜誌第13期上的。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並不知道姚文元在上海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但我的文章在階級立場上和歷史觀上與姚文元的文章都是一致的。而這個時候在《紅旗》雜誌上發表出來，事實上就成了呼應姚文元的第一篇文章了。

1965年12月21號，離我的文章發表才半個月，離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也才一個多月，毛主席在杭州找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五個人，一起談哲學和歷史問題的時候對他們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

的官，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我没有參加那次談話。那次關鋒離開北京的時候，跟我說是他母親生病，他要回山東看母親。他回來後，我問他，你母親的病好了沒有？他說，你真以為是我母親生病？我母親沒有病，是主席要我去杭州。然後關鋒向我傳達了主席說的這些話。

1966年7月18日主席回北京後，有一次同我們見面的時候，主席又談到了我寫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主席說：你的文章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是馬克思總結階級鬥爭的歷史經驗得來的。也是我說過的老話了。你把我的老話又重新翻出來了。在主席對我說這話的時候，我實際上還是沒有真正明白主席的意思。到了1966年8月毛主席在支持紅衛兵運動時，再次引用了這句話，使“造反有理”成了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口號和行動綱領的時候，我才深刻地理解了它。

在主席指出《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一文的缺點後，我和林傑、閻長貴三人組成了一個小組，繼續以《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為主題寫了第二篇文章。這篇文章中點了翦伯贊的名。之後，寫第三篇文章又進一步上綱上綫。這第三篇文章雖然是閻長貴執筆的，但參加討論、修改是三個人。發表的時候也是署三個人的名。在這篇文章裡提出了翦伯贊在土改中有包庇地主家庭的問題。我也沒有認真地去核對地方上送來的材料，就說他包庇地主，並進而把他說成是“階級異己分子”了。文革後經他家鄉黨組織核實，翦伯贊在土改中雖然對家庭成分的劃分有看法，但並構不成是“階級異己分子”。所以我當時這樣說他，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而且應由我負主要責任。

1968年冬，毛主席提出要糾正對翦伯贊過分的批判，指示要保護翦伯贊，給出路，還讓總理派人去北京大學傳達了他的意見。那個時候我已經被關進秦城近一年了。當時聶元梓已失去權力，由軍人王連龍領導的軍宣隊掌握領導了北京大學的文革運動。軍宣隊、工宣隊違背毛主席的指示，配合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的人逼供翦伯贊。1968年12月16日下午，翦伯贊夫婦自殺身亡。儘管翦伯贊死

亡悲劇發生時，我和林傑、閻長貴都已進了秦城監獄，他們夫婦也不是為我們寫的那篇文章自殺的，但我們的文章也確曾給他造成了壓力。對此，我一直都感到內疚。

附錄：

為革命而研究歷史

戚本禹

無產階級是舊世界的掘墓者，又是新世界的建設者，它肩負著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責任。無產階級為了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必須通曉歷史發展的規律。不懂得歷史發展的規律，就不能成為自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正因為這樣，無產階級重視歷史，重視歷史研究。

無產階級在自己的革命實踐中，要從過去階級鬥爭的歷史經驗中去汲取教訓。歷史的經驗，可以啟發和幫助無產階級革命者正確地制定自己的戰略、策略。無產階級自己革命活動的歷史經驗，是無產階級革命者指導當前革命運動的最寶貴的借鑒。

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教科書。反映階級鬥爭的歷史，可以使人民群眾和革命的新一代受到深刻的階級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歷史上被壓迫階級反抗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反抗壓迫民族的光輝鬥爭事跡，一直是鼓舞人民群眾積極、勇敢地參加革命鬥爭的力量。

無產階級的偉大革命導師都是重視歷史和歷史研究的。

恩格斯這樣就過：“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我們比任何一個哲學學派，甚至比黑格爾，都更重視歷史”¹。

毛澤東同志對待歷史和歷史研究的態度，使我們特別感到親切。他曾經不止一次地告訴我們：“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

1 《英國狀況 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50頁。

2 《改造我們的學習》。《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1頁。

重要的幫助的³。”

這些話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歷史和歷史研究的重要性。

一切輕視歷史的觀點，一切不願意學習歷史的觀點，一切認為歷史研究可有可無，或者認為歷史教學可以取消的觀點，都是不對的，都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違背毛澤東思想的。

我們說要重視歷史，重視歷史研究，並不是叫人趴在陳舊的歷史故紙堆上，向古人焚香頂禮，跟著他們去翻查歷史的流年老賬。

沒有超階級的歷史研究。以往一切統治階級，都是根據他們自己階級的利益來解釋歷史的。他們的階級利益同人民群眾的利益是那樣地不調和，同社會發展的要求是那樣地不一致，因此，他們不可能認識歷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歷史真象。趴在歷史故紙堆上，踏著前代歷史學家的脚印，亦步亦趨地去進行歷史研究，勢必要變成前代歷史學家的俘虜，替他們去宣揚那些陳舊的、與時代精神相背離的觀點。

無產階級是人民群眾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它是根據社會發展的規律提出自己歷史任務的，所以它對待歷史的態度同歷史上一切統治階級根本不同。無產階級是爲了人民群眾的利益，爲了實現自己偉大的革命任務，而進行歷史研究的。

爲革命而研究歷史，就要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用無產階級的觀點和方法去研究歷史。有沒有這樣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我們的歷史研究來說，是最重要的問題。你看，從孔夫子以來，大家都說農民造反無理。衆多的歷史學家，爲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無數的明槍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業中死去的農民英雄，把他們描寫成爲暴戾恣睢、罪大惡極的“犯上作亂”者。就是“五四”運動中的一些新文化戰士，在這樣一種幹百年來習慣輿論的壓力下，也覺得沒法子否認那個加在叛逆者頭上的“亂”字。

轟然一聲，馬克思主義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聲宣告：“造反有理。”從秦朝以來的農民造反運動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

3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2頁。

是“農民的革命戰爭”。毛澤東同志指出：“在中國封建社會裡，祇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⁴

幾千年來，帝王將相被歷史學家們盡情地歌頌著，歷史變成了他們廟堂裡的贊歌。除了個別的思想家曾經悄悄地提出了一點懷疑以外，誰也不敢說半個“不”字。但是無產階級卻以其偉大的革命氣魄，對這些神聖不可侵犯的所謂社會“主宰”，投以蔑視的目光。“人民，祇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⁵。”這就從根本上打破了幾千年來人們對帝王將相的迷信。

多麼嚴重的分歧啊！相同的歷史事件，用不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竟然會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

有一種意見，認為歷史研究祇有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不行，還要有一種“歷史主義”，如果祇有階級觀點而沒有“歷史主義”，就要犯“否定一切”的“非歷史主義”的錯誤。

問題的提出使人感到驚異。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怎麼會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歷史主義”，因而必須要用一種“歷史主義”來補偏救弊呢？在馬克思主義的寶庫裡，怎麼會有一種脫離了階級觀點的“歷史主義”呢？

在歷史主義的問題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觀點是根本不同的。資產階級對於歷史主義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他們或者是把歷史看作脫離了階級對抗的自然發展過程，或者是把歷史看作觀念的發展過程，如此等等。無產階級則是按照歷史發展的本來面貌去了解歷史的。

毛澤東同志說過：“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⁶。”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要求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從歷史本身的發展過程，從歷史本身的矛盾鬥爭過程去觀察歷史事件。不言而喻，馬克思主義所說的歷史發展過程和矛盾鬥爭過程，是以階級和階級鬥

4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19頁。

5 《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31頁。

6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22頁。

爭為其實在內容的。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在階級社會裡，離開了階級和階級鬥爭，就沒有什麼歷史的發展。因此，那種脫離了無產階級階級觀點的“歷史主義”，即那種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內容的“歷史主義”，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沒有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就根本談不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

從歷史本身的發展、鬥爭過程去觀察歷史事件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要求把歷史事件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裡來作具體分析，一切依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這種要求正是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所具有的特色。因為作為人類文明史的階級鬥爭歷史，本來就是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聯繫在一起的。毛澤東同志說：“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⁷。”這段話，清楚地闡明了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本身就是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融為一體的。

可見，運用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研究歷史，絕不會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歷史主義”。企圖用一種離開了無產階級階級觀點的“歷史主義”來補無產階級階級觀點之“偏”，救無產階級階級觀點之“弊”，那祇能是用資產階級的歷史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如果因為有人沒有正確掌握或者沒有完全正確掌握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在歷史研究中出現了偏差和弊病，那就應該正確地去闡明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正確運用，而不能把所謂偏差和弊病歸罪於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

對於歷史主義和階級觀點的錯誤理解，不僅僅是一個概念不清楚的問題，這裡實質上反映了一些人對於用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歷史的一種懷疑和動搖，有的甚至是反對。

對於用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歷史，有些人因為受舊觀點的束縛，感到不習慣，有些人甚至報有反感。他們對於批判帝王將相不滿，對於稱贊農民起義不滿，並且提出了一整套錯誤的觀點。一方面，他們認為，封建地主祇有處在沒落、崩潰的階段

⁷ 《丟掉幻想，準備戰爭》。《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頁。

才是可以罵，可以反的；處在上陞、發展階段的封建地主，因為有進步作用，是不可以罵，不可以反的。因此，我們在研究歷史的時候，不能“見封建就反，見地主就罵”。另一方面，他們認為農民也是私有者，愚昧、落後，不足以革命稱之。在他們看來，農民的造反，其動機不過是為了陞官、發財，當新貴族、新皇帝，他們的鬥爭綱領，同樣是封建主義的。於是，他們就覺得在指導歷史研究的理論上，祇有階級觀點是不行了，必須要用一種東西來補偏救弊了，所謂“歷史主義”的問題，就是這樣登上歷史論壇的。其實，他們所要提倡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所要擯棄的。

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看來，封建社會裡最本質的關係，它的主要矛盾就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對立。農民是被剝削階級，地主是剝削階級。封建社會初期出現的地主同後期的地主，在歷史作用上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就其階級本性而言，則是一樣的。初期封建地主同樣是農民的剝削者和壓迫者。有剝削和壓迫就有罵和反。秦朝和漢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初期，但是就在那個時候，有多少農民罵過地主，反過封建！陳勝、吳廣、赤眉、銅馬，揭竿而起，前僕後繼，給了那個“美妙”的初期封建社會的統治者以沉重的打擊，從而推動了社會的繼續前進。既然當時的農民對封建地主的剝削和壓迫可以罵，可以反，為什麼現在的無產階級對他們就不可以罵，不可以反了呢？當然，我們所說的罵和反，不是空洞的辱罵和簡單的否定，而是對他們剝削本質的具體分析和深刻批判。對於初期的封建地主就不許加以分析和批判，這是什麼階級觀點，什麼歷史主義呢？罵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這並不妨礙無產階級去承認他們曾經有過的歷史進步作用。而且，也祇有無產階級才能科學地分析和估價一種剝削制度的歷史作用和它的階級本質。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歷史的時候，曾經用最尖銳的語言，抨擊了初期的資產階級，說他們是像“狼一樣”的血腥剝奪者。但是，也正是馬克思最充分地估價了他們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

罵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這也不妨礙我們去

恰當地肯定帝王將相中少數傑出人物對歷史發展所起的作用。列寧說：“無產階級敵視一切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制度的一切表現，但是這種敵視並沒有解除它應對資產階級人士在歷史上的進步和反動加以區別的責任⁸。”這是無產階級對待歷史上統治階級人物的根本態度。我們從來不否定統治階級中少數傑出人物的歷史作用。不僅是初期封建社會的帝王將相，就是後期封建社會的帝王將相，祇要他們之中哪一個人在自己一生的活動中，對歷史的發展起了促進的作用，甚至祇要他的活動在某一個方面對歷史的發展起了一些好的作用，我們都應該承認。我們承認清代末年光緒皇帝和其他維新變法人物的歷史作用就是一例。但是，我們的這種承認，指的是用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批判地去對帝王將相進行恰當的歷史評價，而不是一味給他們做歌功頌德的文章。我們承認帝王將相中少數傑出人物的歷史作用，但是我們知道他們之所以傑出，是因為他們的某些活動在客觀上符合了社會發展的要求，或者在客觀上符合了人民的某種願望。我們始終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帝王將相中少數傑出人物，歸根到底不過是統治階級中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歷史作用同人民群眾相比，同那些站在歷史火車頭前面的偉大革命領袖人物相比，不過是滄海之一粟。祇有人民群眾以及那些真正的革命領袖人物，才是最值得我們去熱烈歌頌的偉大英雄。我們承認帝王將相中少數傑出人物的歷史作用，但是我們知道，他們也同一切統治階級中的人物一樣，是人民群眾的壓迫者和剝削者，他們在為歷史提供新東西的同時，往往伴隨著殘酷的壓迫、剝削，而且是從統治者當前的利益出發的。因此，我們在評述他們歷史作用的時候，也應該對他們壓迫和剝削的暴行進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當然，有時為了集中闡述某一個方面的問題，可以著重評價他們的進步方面；對他們之中一些功大於過的歷史人物，應該根據他們全部的歷史活動去進行實事求是的歷史評價，而不應該祇就一點，隨意苛求。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不可以無原則地去誇大他們的歷史作用，牽強附會地去贊美他們的文治武功，甚至為他們的歷史罪過

⁸ 《旅順口的陷落》。《列寧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頁。

進行粉飾和辯解。

有些人看到對帝王將相的研究中出了一些問題，便認為帝王將相可以不去研究了。這是不對的。不僅帝王將相中少數傑出人物需要我們去認真研究，就是他們之中最反動的人物，也需要我們去認真研究。問題的關鍵是要用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進行研究。《竊國大盜袁世凱》一書，寫的是近代帝王將相中一個最反動的人物。由於作者用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進行了研究，不僅寫出了一個反動階級代表人物活動的特點，而且通過一個反動人物，從一個方面寫出了當時的歷史真象。階級社會的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要了解階級鬥爭的歷史，就要對階級矛盾的雙方都進行研究。帝王將相或者其他反面人物是矛盾一方的代表，不很好研究他們，也就不能很好了解矛盾的另一方。歷史學界在帝王將相問題上的爭論，反映了在這個問題的研究方向上還存在著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不是在研究的面前退卻，而是要用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做好這種研究。

正如背離了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就不能正確認識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和帝王將相一樣，背離了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也就不能正確認識封建社會的農民階級和農民戰爭。封建社會的農民是小私有者，他們存在著小私有者的缺點，例如狹隘、散漫、保守等等，這就是我們大家所常說的歷史局限性。因此，我們不贊成用無產階級的面貌來改鑄他們，那樣，不但不符合歷史的事實，而且也否認了無產階級對農民領導作用的重要意義。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一書裡所分析的，農民在封建社會裡是被壓在社會最底層的階級。在封建社會裡，農民對地主的反抗運動，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奇怪的是，這樣一個被壓在社會最底層的，窮得祇剩下一把鋤頭、兩個肩膀的小私有者，現在在一些歷史學家的筆下，怎麼竟然變成了同膏腴萬頃、屋宇千間的封建貴族一樣的私有者了呢？你看，農民造反是為了陞官發財，當新貴族、新皇帝，他們的鬥爭綱領又是封建主義的。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還存在著什麼不可調和的階級對立和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呢？我們怎麼可以設想，千千萬萬

饑寒交迫、輾轉溝壑、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農奴，當他們被迫起來同剝削、壓迫他們的封建地主作生死鬥爭的時候，他們每個人所想的卻是怎麼讓自己變成那些正被大伙所反對的老爺們？

存在決定意識。每個階級所處的經濟地位決定著他們自己的思想意識。農民，作為一個階級來說，它所處的被剝削地位，從根本上決定了他們必然產生反抗地主的思想，而處於剝削地位的地主階級，則祇能產生壓迫農民的思想。當然，封建社會的農民在某些方面會受到統治階級的思想影響，所以在他們的鬥爭綱領裡，常常有一些反映封建統治階級思想的東西；而在農民革命運動的發展過程中，也常常有革命領導成員向封建主義轉化，或者革命領導權被地主階級分子篡奪，以致使農民革命變成封建統治階級改朝換代的工具。這種歷史事實，正如毛澤東同志所分析的，是受到歷史條件限制的緣故。至於農民革命鬥爭綱領裡的一些反映封建思想的東西，同他們“均貧富”、“等貴賤”，“有田同耕”、“有飯同吃”的革命口號相比，畢竟不是主要的東西。所謂農民造反是為了陞官發財等等，完全是對農民革命運動的歪曲。

有一種意見，認為近幾年來，人們寫歷史祇寫農民起義的一面，不寫或者很少寫帝王將相。這樣，歷史上的光明面喪失了，變成了漆黑一團。這真是危言聳聽。

我們從來認為農民起義和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帝王將相的統治是封建社會矛盾的兩個方面，為了全面反映歷史的真象，哪一面都是需要寫的，所以問題不僅在於哪一面寫多了、哪一面寫少了，更重要的是，不管寫哪一面，都要看為什麼而寫，怎樣去寫。比如，在寫帝王將相歷史的時候，仍然照著封建皇朝《實錄》和《起居注》的樣子，恣意地去描寫皇帝的“龍顏”、後妃的“淑德”，以至於他們的祖墳風水，那麼，這種歷史即使寫得不多，也是不對的；或者，在寫農民起義歷史的時候，仍然抱著封建士大夫的感情，用一種封建史學家的筆調，無端地去給農民英雄的臉上抹黑，那麼，這種歷史就是寫多了，也是錯誤的。而且，如果一定要論寫多寫少的話，事實是：迄今為止，我們對封建社會的歷史主人——農

民的歷史倒確實是寫得太少了。直到現在連一部農民革命的通史還沒有人替他們寫出來，怎麼能說是祇寫農民起義了呢？至於帝王將相的歷史，寫得也不是少了，而是有許多寫得不正確。一些歷史學家那麼虔誠地把許多美麗的桂冠奉獻在舊日封建統治者的面前，什麼“英明的君主”，“聖賢的丞相”，“人們的救星”，“頂天立地的男子”，熙熙攘攘，熱鬧得很。這樣的一種現象，難道是正常的嗎？

根本的問題不是什麼寫多了、寫少了的問題。根本的問題是：為什麼農民起義的歷史寫多了，帝王將相的歷史寫少了，歷史就會喪失光明，變成漆黑一團了呢？難道歷史之光不是來自千百萬創造了人類文明的勞動人民，千百萬高舉著革命火把的革命群眾？難道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裡，歷史祇能從帝王將相那裡去乞求一線的光明？為什麼誰多寫了一些農民起義的歷史就有這樣大的罪過呢？對於我們歷史研究工作這樣的一種指責，不正是背離了無產階級階級觀點的結果嗎？

對於歷史研究所謂非歷史主義的批評，乍一看，是使人迷惑的。但是我們祇要探究一下事實，就可以明白，原來近幾年來，歷史研究中的非歷史主義不是別的，而正是那種歌頌帝王將相，否定農民運動的現象。這種非歷史主義的出現，不是如同一些人所指責的，是因為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多了，恰恰相反，倒是因為缺少了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據說，歷史喜歡作弄人，喜歡同人們開玩笑。本來要到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歷史研究又何嘗不如此。你看，有一些人本來企圖用一些問題來證明研究歷史祇有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不行，結果這些問題卻證明了研究歷史絕對不能離開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

用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歷史，會不會影響歷史研究的科學性？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從來就是拿階級性會妨礙科學性的論調來反對我們。胡適是其中最賣力氣的一個。

9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對工人的方法》。《列寧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59頁。

他認為，研究歷史要“超階級”、“純客觀”，如果用上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那就是被馬克思、列寧“牽著鼻子走”。他的這一套破爛貨色，早就被馬克思主義者批判得破產了；但是，這種錯誤理論的影響在一部分人思想裡依然沒有消除，就是在解放以後，仍然有人拿這種理論來反對歷史研究中的黨性原則。一九六三年就有人公開提出不可以用階級鬥爭理論解釋歷史的主張。關於歷史研究中祇有階級觀點不行，還要有一種“歷史主義”的說法，實際上是同這個歷史研究中科學性和階級性的老問題有關係的。

要談歷史研究的科學性，首先就要談歷史研究中的科學性是什麼，而歷史研究又是怎樣變成科學的。

歷史研究中的科學性，無非是說我們對歷史的認識要符合歷史發展的真實情況。歷史發展的真實情況是可以認識的，但是一切剝削階級，對歷史發展過程的認識，都要受它所處的階級地位的限制。剝削階級的利益，使他們不可能科學地、客觀地去觀察歷史事變。為了維護他們的階級利益，他們常常故意歪曲歷史發展的真相。恩格斯說過：“資產階級把一切都變成商品，對歷史學也是如此。資產階級的本性，它生存的條件，就是要偽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偽造歷史。偽造得最符合於資產階級利益的歷史著作，所獲得的報酬也最多¹⁰。”人們對歷史的認識，通常還要受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在科學不發達的情況下，人們也不可能做到科學地、客觀地去了解歷史。所以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雖然有很多歷史學家為歷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資料，但是仍然是一堆沒有規律的片斷事實。歷史研究在無產階級的手裡發生了偉大的變革，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把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應用於歷史的考察中，從錯綜複雜、迷亂混沌的歷史現象中發現了歷史運動的客觀規律，使歷史研究變成了科學。

為什麼無產階級能夠把歷史研究變成科學？這是由無產階級

10 《〈愛爾蘭史〉的片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73頁。

所處的時代條件和社會地位決定的。無產階級是現代社會最先進的階級，它親自參加現代大生產的實踐，人類文明和現代科學所積累起來的全部知識，賦於了無產階級以超越以往任何時代的認識客觀世界的 ability。無產階級又是現代社會最革命的階級，它最受壓迫、最受剝削，這種社會地位，決定了它的利益同人民群眾利益的一致性，決定了它的利益同社會發展利益的一致性。正像恩格斯所說的：“科學愈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愈加符合於工人的利益和願望¹¹。”世界上祇有代表了人民群眾利益和社會發展利益的無產階級，才能光明正大、無所畏懼地去揭示歷史發展的實在過程。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和科學性完全是一致的。

以“超階級”、“純客觀”的態度去研究歷史的主張，本身就是一種具有強烈的資產階級階級性的客觀主義理論，“超階級”、“純客觀”的口號，不過是他們用來掩飾自己歷史研究中資產階級階級性的一種幌子。他們之所以要打著這種幌子，不過是用虛偽的面孔，來欺騙勞動人民，企圖使勞動人民把他倆充滿了資產階級階級性的東西，當做全民的、全社會的東西來接受。我們可以看一看事實。被西方資產階級學術界公認為“現代客觀主義歷史學派之父”的德國蘭克，盡管一生理頭在塵埃撲面的史料庫裡，但是他研究歷史的最終目的，不過是企圖用最好的歷史教材來作為向德國資產階級和忠貞地主的獻禮。他本人就是普魯士霸權和俾斯麥鐵血政策的支持者。他最著名的著作《教皇史》，就是一部關於統治階級如何統治人民的經驗總結。還有那個一向標榜“尊重證據”、“尊重事實”的胡適，不就是那個所謂歷史是一堆隨人擺弄的“大錢”的謬論的鼓吹者嗎？為了替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張目，為了替一切投降派辯護，他可以隨意擺弄他歷史的“大錢”，為賣國賊秦檜喊冤：“秦檜有大功，而世人唾罵他至於今日，真是冤枉¹²。”他們哪裡是什麼“超階級”、“純客觀”！列寧說過，任何一個活著的人，不可能不站在這個或者那個階級的立場上，不可能不為這個或

11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53頁。

12 胡適：《南宋初年的軍費》。

者那個階級的成敗歡喜和悲傷。是這樣的，沒有階級性的歷史研究從來是沒有的。史學研究本身的經驗教訓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人民撫育了我們，我們不應該忘記人民。為人民寫歷史，為革命寫歷史，一定要在思想上同客觀主義劃清界限，一定要擺脫他們的思想影響。

歷史研究從來是思想鬥爭非常激烈的一個領域。封建統治階級和資產階級為了維護他們的階級利益，為了麻痹勞動人民的反抗意志，從來不放鬆對這個領域的控制。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被推翻的統治階級的歷史觀點是不會自動地從歷史研究的領域裡撤走的。無產階級的戰士，應該為了革命的利益，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高高舉起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旗幟，勇敢地去占領和鞏固歷史研究領域裡的一切陣地。我們的祖國是有著悠久歷史和優秀遺產的偉大國家，我們的人民是有著光榮反抗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傳統的偉大人民，我們的黨是有著光輝革命歷程和寶貴歷史經驗的偉大的黨。

在這樣極端豐富的歷史寶藏面前，我們還是小學生。讓我們虛心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澤東思想，很好地掌握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為革命而研究歷史。

（原載1965年12月6日《紅旗》雜誌第13期）

5、田家英擅自刪改毛主席的講話

毛主席在1965年12月21日召集陳伯達、田家英、胡繩、關鋒、艾思奇等五個人談話，是毛主席第一次公開表示自己對批判《海瑞罷官》的態度。他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這就指明了圍繞著《海瑞罷官》問題所發生的爭論和鬥爭，並不單純是一場學術討論，而是黨內外的一場嚴重的思想鬥爭和政治鬥爭。

在主席同他們談話的時候，關鋒和艾思奇在現場做了記錄。他們把記錄整理好後，就交給了田家英。田家英根據他們兩人作的記錄，整理出了一個毛主席講話的內部文件。田家英當時是中央辦公廳的副主任，權力挺大。他把這個文件印發給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大區書記的領導。可是在田家英印發的毛主席談話中，他竟擅自把主席上面有關《海瑞罷官》的要害這段話給刪除了。

陳伯達發現了這個情況後，就進行追查。由於艾思奇在參加這次談話後不久就得了重病去世了，就祇找了關鋒。關鋒說，在他和艾思奇交給田家英的記錄稿上都是有這段話的，是田家英在整理的時候給刪掉的。關鋒還說，他和艾思奇都跟田家英說過，把主席的這段話刪掉不好。可田家英說，沒關係。陳伯達讓關鋒把他說的情況經過寫個材料。然後陳伯達把這個材料交給了江青。江青說這可是個大問題，她建議陳伯達直接把情況報告主席。這時關於田家英的情況還有王任重和謝富治那裡的材料，後來主席就是根據陳伯達的報告和這些材料，批准對田家英進行審查的。

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掌控的中央為給田家英平反，說這是關鋒告密，是江青和陳伯達對田家英的政治迫害。但無論從黨的工作紀律，還是從馬列主義理論原則上來說，田家英擅自刪改主席重要講話都是不應該的。鄧小平等人以這件事作為平反的理由也是不充足的。

6、彭真提出了“二月提綱”

1966年1月，彭真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名義，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會議。參加會議的人有胡繩、田家英、許立群、鄧力群、林澗青、龔育之以及宣傳部、新聞界和學術界其他領導人，彭真特別點名要關鋒、戚本禹參加。總共約有三十多人。會上，由胡繩傳達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關於《海瑞罷官》的講話。胡繩講得很仔細，他先講了最近文化革命的形勢，以及這一時期毛主席的一

些重要指示。接著傳達毛主席12月21日講話，他倒是原原本本地傳達了毛主席的這個講話。胡繩還解釋了一下，毛主席說的沒點名，是說戚本禹寫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批評的是翦伯贊，但沒點翦伯贊的名。胡繩的傳達與關鋒給我講的基本相同。胡繩講了以後，彭真說：毛主席的這些話，是關於意識形態鬥爭的最新指示，大家要好好學習討論。

會議結束後，彭真叫我和關鋒留下來。因為前不久我們已經和他見過面，他跟我們就像是老朋友似的，說：我們又見面了。我開玩笑說：你又要請我們吃刀削面了？他說：不，今天太晚了，不打擾你們了，咱們不吃飯。咱們就說一件事，這次，我在上海見到江青同志了，江青同志叫我來看看你們。江青同志特別囑咐，要你們兩位積極參加這場學術爭論。彭真接著說，吳晗一直是我們的團結對象，我們跟他關係很好，有些問題我也是經常批評他的。他這次又受了批評，態度尚好。姚文元同志那篇文章，提了很多問題，也引起我很多思考。對主席講的吳晗文章和彭德懷罷官的指示，我的理解還不深透。猛一下聽了主席講話，很吃驚，我以前沒那樣想過。彭真沒說他不同意主席的意見，祇說聽了很吃驚，理解不深透。他接著說：你們好好研究研究，把它寫清楚。對彭真這段話，我當時還認為是他謙虛。可關鋒卻說，不對，他是不同意主席的意見。他其實是在暗示我們，讓我們在寫文章的時候要有分寸。我從來都很尊重關鋒的意見，但仍覺得他的這個看法可能有點過分了。可是以後的事實證明了關鋒對彭真和我們這次談話的看法是正確的。

到了2月中、下旬，即春節期間，關鋒又去了一次上海。江青向他交底說，批《海瑞罷官》不單是學術問題，還是反擊彭德懷的翻案問題，反擊62年的“翻案風”問題。過了春節以後，艾玲又向我和關鋒透露，批《海瑞罷官》的文章是江青支持的，是張春橋具體組織的。可是在上一次見面的時候她沒有向我們透露這些。她叫我們不要給別人說，而且建議我們也寫文章。並說，《文匯報》會給你們發表的。

這時，當時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穆欣從康生那兒聽到了一

些風聲，他表現得很積極，也跑來約我們寫文章。

我在參加了彭真主持的以“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名義召開的會議，以及彭真與我們進行談話之後，就開始為寫文章準備材料。很快我就寫出了一篇題為《〈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的文章。我的文章完全是遵照彭真的“好好研究，把它寫清楚”的要求來寫的。因為彭真是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領導，我自然認為彭真的講話是代表中央的意見的。那時候，我還根本不知道彭真和江青有那麼大的分歧。差不多同時，關鋒和林傑也寫好了《〈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這篇文章。

兩篇文章都交給了許立群，可是卻一直都不見發表。過了一陣，我就給彭真寫了封信，報告了以上情況。彭真的秘書答復我，首長工作很忙，你的信和文章我都放他桌上了，有時間他會看的，他看了以後有答復，我馬上告訴你。然後就這樣一直拖著。

長期的拖延引起了我的懷疑。許立群是中宣部的副部長，是彭真最得力的幹部。他不發表我們的文章，那一定是有彭真的指示。後來我聽說的情況也正是如此。彭真指示說，彭德懷的罷官涉及到政治問題，很敏感，先不要發。我就想，明明是你當面給我們布置的任務，讓我把《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寫清楚。我花了幾天時間，熬了好幾個夜晚，才把這個問題弄明白。完了你卻叫許立群不要發表。去找你，你又以工作忙為託詞不理。如果我寫得不對，你可以批評。為啥什麼都不說，卻又不讓發表呢？老實說，我以前對彭真印象一直很好。這以後，我就對彭真有看法了，覺得關鋒沒有看錯他。

後來想想，當時彭真在會後找我和關鋒說的話，確實是在給我們暗示，讓我們把批評《海瑞罷官》限制在學術討論範圍之內。但後來因為我們的文章都不符合他的意思，所以他就不讓發了。可這些話，他又不能跟我們明說。那時我還不太懂這種高層的政治語言，所以，我當時對彭真不準發表文章，很不高興。

我把文章送給了康生，康生的態度很明確，叫馬上發表。我

說：人家不讓發，怎麼辦？他說，你找穆欣發。但這時穆欣聽說彭真不讓發，他也不敢發了。這和他之前的態度成了鮮明的對照。他就是這麼個人。

到了1966年1月下旬，彭真就讓許立群他們準備材料，起草了一個文件。因為這個文件是在2月完成的，所以就叫做“二月提綱”。在準備起草“二月提綱”的時候，他們找了七份在他們看來有問題的材料，準備轉呈給毛主席。據說，這七份材料中有我寫的小冊子《孫承宗》，還有關鋒在1962年寫的幾篇雜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從陳賈說起》等，以及鄧拓的一篇雜文《偉大的空話》等等。

關鋒的雜文是用“何明”的筆名寫的，發表在《光明日報》等幾個報紙上。我的《孫承宗》小冊子是中華書局1964年出版的。孫承宗是明代的一個兵部尚書，曾率領明軍堅決抵抗滿清皇太極的侵略。明末抵抗滿清的侵略，有三個戰功較大的統帥，一個是熊庭弼，一個是孫承宗，一個是袁崇煥。其餘的（包括那個投降了清軍的明朝統帥洪承疇）多打敗仗。袁崇煥已經有很多人寫了，熊庭弼也有人寫了，就是孫承宗沒人寫。一次，我們秘書室的領導陳秉忱把他收藏的一幅孫承宗畫的畫送給康生。康生在畫上面題了跋。康生說，孫承宗不但是個有名的文人，而且是個有名的統帥，他打敗過努爾哈赤的接班人皇太極。康生讓陳秉忱給我傳話說，現在都沒有人知道孫承宗了，聽說你對明史有興趣，那你就寫一篇文章吧。我聽說康生要我寫文章，便馬上積極行動。那篇文章好寫，查查明史，看看他的傳記，沒幾天就寫完了，投給了《中國歷史小叢書》。當時吳晗是《中國歷史小叢書》的主編，吳晗說這篇文章寫得很好，又通俗又好讀，文筆也好。翦伯贊也說好，都同意出版，翦伯贊還給我提了一些意見，寫文章要剪裁浮辭，形容詞不宜太多，一般情況下，一個形容詞就夠了。他的意見很對，到現在我寫文章還遵從他的意見。翦伯贊確實是有水平的。

許立群在把我這本小冊子給彭真的時候，還加了附言，說，現在我們批判《海瑞罷官》，是因為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吳晗借海

瑞為彭德懷鳴不平。那末戚本禹寫的孫承宗原來也是兵部尚書，兵部尚書也就是現在的國防部長。而且孫承宗後來也是被罷官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既然吳晗寫《海瑞罷官》要批判，那戚本禹，還有關鋒等人也要整風。

他真是生拉硬扯。海瑞是因為罵皇帝而被罷官的，孫承宗不是，他是因為抗擊皇太極立了功，受人嫉妒，被排擠的。而且，也不是被罷官，而是年齡大了退休回家的。

二月初，彭真和許立群帶著他們寫的“二月提綱”，與陸定一、康生、吳冷西幾個一起到武漢向毛主席匯報。康生、吳冷西雖然也都是五人小組的，但“二月提綱”的最後修改沒有讓他們參加，是彭真、許立群、還有姚溱他們三個人搞的。彭真把那些材料都匯報到了毛主席那裡，說對吳晗要進行批判；可是對左派也要整風。毛主席跟他說，左派整風的問題，三年以後再說。這裡的左派主要就是指關鋒和我幾個人。可能祇是巧合，過了三年，我和關鋒都被隔離審查了。

王力在回憶這件事的時候說，他得知許立群報送給主席的七個材料中有我寫的《孫承宗》，很擔心這樣會出問題。因為他在康生那裡，看過康生為孫承宗繪畫的題跋，知道是康生叫我寫《孫承宗》的。尤其是他知道1958年的中南海“八司馬事件”。他就給彭真說，戚本禹是當年的“八司馬”之一，是主席給他平反的。你們現在又要告他？他那篇《孫承宗》的文章，是康生叫他寫的，與彭德懷無關。你把他又告到主席那裡，會不會再出個“八司馬事件”？彭真回去就叫許立群把我的《孫承宗》從上報的材料裡抽掉。但從後來的一些迹象看，毛主席是知道《孫承宗》這本小冊子的，似乎沒能抽掉。

第二章 批判“二月提綱” 和起草“五一六通知”

1、毛主席批評“二月提綱”

1966年3月，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受張春橋委託，到北京來辦事。他見到許立群的時候，許立群對他說，姚文元的文章，你們上海沒有經過中央討論就發表了，連個招呼也沒打。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裡去了？楊永直回上海後，就把北京的批評向張春橋匯報了，春橋又報告了主席。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把許立群他們不讓發表我們文章的事，都對《文匯報》的艾玲講了，我還把我的文章給了艾玲一份，請他帶給春橋。很快艾玲帶回了一封春橋寫給我的信。艾玲告訴我，她還向江青作了匯報。

本禹同志：

信和稿子都收到了。可惜，這幾天，我和其他同志都難以抽出時間閱讀。估計短期內也如此。恐怕誤了你的事情，特先復你：不必等待我的意見了。

熱烈地問候你的健康。

張春橋

一月二十八日

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北京不加理會，拒絕轉載。為打破封鎖，毛主席建議上海新華書店出版小冊子，向全國徵訂。北京祇訂

了幾本樣書，又不發行。這種情況已經是很不正常了。在毛主席作出了明確的批判《海瑞罷官》的指示之後，他們又不讓發表我們支持姚文元的文章。這些都表明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已經在公然抵制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指示了。矛盾激化了。

1966年3月28日、29日，毛主席在上海同康生談話。3月30日下午，毛主席同康生、趙毅敏、魏文伯、張春橋、江青等談話。在談話中，毛主席對“二月提綱”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並提出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閻王”指的就是中宣部以及背後主使的彭真等人，“小鬼”就是指關鋒和我一些人。

3月31日康生奉主席之命回到北京。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擴大會議，在會上由康生傳達毛主席在上海的談話精神。康生在會上說，主席說，北京寫了那麼多文章都不請示他。為什麼姚文元寫一篇文章就一定要請示他們呢？是我代表中央？還是你北京市委代表中央？

這次會議，中央的一些重要領導人都出席了，我也列席了。就在這個會上，根據毛主席的提議，決定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江青、劉志堅任副組長，康生任顧問。

會後，康生叫穆欣馬上發表我的文章。《人民日報》聽到了這個消息後，也要發表我的文章。

1966年4月1號，我把《〈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一文拿給了穆欣和吳冷西的部下陳浚生，當天晚上我就坐火車去上海了。4月2日清晨火車到了南京，在火車靠站的時候，郵局送上一大捆當天出版的《新華日報》。一會兒，列車服務員就去各個車廂賣報紙，我也買了一份，報上全文刊載了我的文章。這是我第一次在火車上看到我自己的文章被登在報紙上。隨後我到各個車廂去轉了一圈，看到許多乘客都在看我的文章。那時的群眾都是非常關心國家大事的。

在我原來寫的文章裡，我還是肯定吳晗曾經是民主鬥士的，祇是說他現在的觀點是錯誤的。希望他這位昔日的民主鬥士，重新思

考自己現在的立場，站到革命立場上來。在我交給他們的底稿上是有這段話的，可是在4月2號正式發表的時候這段話沒有了，這或許是康生他們給刪掉了。

2、我1966年4月的上海之行

我這次去上海有兩個任務，一個是參加《紅旗》雜誌歷史組和學部的哲學所聯合在上海召開的工農兵學哲學座談會。毛主席發出了工農兵學哲學的號召後，《紅旗》雜誌準備發表一組工農兵學哲學的文章，我們就在上海組織了由工人和解放軍“南京路上好八連”戰士的座談會。另一個是去見江青，這是艾玲通知我的，說江青要我到上海去與她見面。

和我一同去參加座談會的，有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哲學所所長潘梓年、《哲學研究》雜誌主任編輯吳傳啓以及兩個青年編輯，一行五人。到上海的時候，上海市委秘書長來車站迎接我們，安排我們下榻在錦江飯店。當晚，上海市市長曹荻秋、華東局書記魏文伯在錦江飯店請我吃飯，但是沒有請潘梓年、吳傳啓他們。在錦江飯店請我吃飯，是由上海市委交際處的負責人顧志剛安排的。顧志剛見了我，就跟我開玩笑說：“好同志來了”。我跟曹荻秋說，顧志剛是我在上海地下黨時候的入黨介紹人，曹荻秋說他們已經聽顧志剛說過了。那時候我祇是個局級幹部，上海市委對我的接待是破格的。席間談起了李秀成，談了《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他們都很支持我，給我說好話，我自然也謙虛了一番。那次，是我第一次見曹荻秋、魏文伯，我和他們很談得來。曹荻秋是一個很謙虛的人，很有學術修養；魏文伯對歷史很熟悉，對古詩詞也有自己的理解，對毛主席詩詞，他都能背誦。

飯後回來，我對潘梓年說，吃飯沒請你們，我真覺得不好意思。潘梓年說，我們祇是學部哲學所的和《哲學研究》雜誌的人，跟他們沒有工作關係。你是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的負責人

之一，請你是符合禮儀規定的。

晚上睡覺，他們給我安排了一個很大的帶廳的套間，給潘梓年安排了一個單獨的房間，給吳傳啓和另兩個小年輕則安排了標準房。我覺得，潘梓年的資格比我要老多了，所以我堅決要把大套間讓給他住。而且吳傳啓是研究員級，和那兩個小年輕住一起，也不太合適，我就對吳傳啓說，你和我住在一起，讓潘梓年一人住套間。潘梓年堅決不幹。我就說，我和吳傳啓晚上要探討點問題，你年紀大了，睡得早。這樣他才勉強同意了。潘梓年是大革命時期的幹部，在毛主席去參加“重慶談判”的時候，他是《新華日報》社的社長。而我祇是個在解放戰爭時期入黨的小黨員，人家比我高好幾個檔次呢。潘梓年是潘漢年的堂哥，因為潘漢年那時已經被抓起來了，所以他有一些思想包袱。

第二天，我就去錦江飯店的小禮堂見江青。江青在上海有她的住所。但開會、會見客人，一般都在錦江小禮堂。

我向江青匯報了北京的情況，講了我們寫文章的過程和許立群扣壓我們文章的一些情況，也跟她說了我們對“二月提綱”的看法，並且說了在康生傳達了主席指示後北京發生的變化。江青聽完我的話以後說，“本禹啊，幸虧我們還有毛主席，要是沒有毛主席，我們怎麼辦啊？”我對江青說，他們說我和關鋒是什麼學閥。可我們都是小人物，算得上什麼學閥啊。依我看，他們說的這個學閥指的是比我們更大的人物，也許包括你和春橋？江青說，他們恨我，要超過恨你們好幾倍呢。但在他們眼裡我和春橋也算不了什麼學閥的。他們所說的學閥，其實就是指毛主席。這個說法在我聽來真是大吃一驚啊。我說，他們不敢吧？毛主席是全國人民的領袖，是革命的導師呀，他們有這膽子！江青說，哼，你說不敢，可我看他們就是這樣，他們有什麼不敢？！她說，他彭真眼裡有誰啊？聽了這話，我驚愕不已。

江青又跟我談了她受林彪同志委託，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和發表座談會紀要的事。她說，批判“十七年的文藝黑綫”，就要批判周揚。她跟我說起周揚等人曾經怎樣迫害魯迅。我說，許廣平

同志對周揚的意見是很大的。那時我跟許廣平有一些來往，知道許廣平對周揚他們有看法。江青問我許廣平的態度和表現怎麼樣。我說，她的態度很堅決，表現也非常好。江青就讓我回北京以後安排許廣平來上海同她見面，具體商討批判周揚的事。

和江青見面後，我就和潘梓年，吳傳啓一道去召開工農兵學哲學的座談會了。我們召開了兩次座談會。來參加座談的人，發言還真是有點水平，他們把批判《海瑞罷官》，講得頭頭是道。會後我跟潘梓年說，真不能小看工農兵呀，他們一個個都快變成專家了。潘梓年說，你不知道，他們都做了很長時間準備了。那些文章都是經過秀才們改過的，都背熟啦。後來，我見到朱永嘉，我問他，我覺得上海工人的水平很高，我參加了他們的座談會，工人的發言講得很好。可潘梓年說，那些發言是經過其他人幫助修改過的，到底有沒有這回事啊？朱永嘉說，我倒是沒有去改過。但真有人改過。市委聽說你們要來座談了，就專門找人來輔導他們，找的是誰我就不知道了。他講的情況跟潘梓年分析的是一樣的。

座談會上的文章我們沒做多少改動，後來都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工農兵的文章發表後，一次關鋒跟我講，山西有個工人，是個女同志，叫解悅。本來我也認為她的文章是別人替她寫的。我就去跟她探討，她沒稿子，卻能把寫過的文章講得清清楚楚。我沒想到那麼漂亮的年輕姑娘，能有那麼高的水平。我說，是不是也像潘梓年說的那樣，是人家給她作了輔導，再讓她背下來的。關鋒說，不像，我提的問題都是臨時想到的，她都講得很好。解悅在文革中參加造反，後來成為山西省革委會的常委，再後來就跟我們一樣的受難了。

我又去了“南京路上好八連”。好八連戰士的優秀品格使我都感到汗顏，戰士做到的事，我做不到，他們簡直是半點個人主義都沒有。我覺得他們是不是把自己限制得太苦了，處處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的戰士為了上海市民過年期間的安全，兩三年都沒有回家過春節，給他假期他都不要。後來我專門寫了個報告，表揚好八連戰士的優秀品質。這個報告送給了江青和主席看

了。江青表示，她很受感動。主席看了那個報告後，說，“好八連是好啊。”

3、參加“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小組

到了4月中旬，我們召集工農兵學哲學座談會的任務完成了。準備離開上海返回北京，去編發工農兵學哲學和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這時，張春橋派他的秘書通知我，說毛主席指示讓秀才們一起開會討論，寫一個批判“二月提綱”的文件。並說陳伯達、康生、吳冷西、王力他們馬上都要來上海。以康生、陳伯達為首，要我和關鋒也一起參加。還說，部隊也要來人，有劉志堅、陳亞丁等人。於是，我就讓潘梓年、吳傳啓他們先回北京，去整理座談會的稿子。我繼續留在上海。

我這次在上海的時候，和張春橋見了面。他見了我，就一見如故。他非常熱情地歡迎我去他家，說他孩子看了我寫的《評李秀成的自述》，也想見見我。我就去了他家。他那時住在康平路，房子不錯，但他家裡擺設卻很簡樸，空空蕩蕩的，除了書，就是一個舊桌子。他那時已經是市委書記處書記了，沒有想到還是很樸素。我問，你們華東局這麼艱苦？其他領導的家裡也是這樣？他說，馬天水家裡更破舊，還不如我。不過，他告訴我，陳丕顯他們家裡就不一樣了。我雖然沒去看過陳丕顯的家，但我可以想象。在中南海，我知道主席那裡破舊，董老（必武）家也破舊，總理家裡不舊，但也不豪華。劉少奇的家裡就豪華了。陳伯達家裡也很講究；田家英家裡寶貝很多；胡喬木家裡也比較闊氣。說實話，當時，我心裡是比較反感那些家中擺設富麗堂皇的幹部的，覺得家裡樸素的幹部一般都是好幹部。我們在一起談了很多問題。談到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我比較能夠理解他的思想。他說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並不是從法律意義上講的，主要是講如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限制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主席也最怕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最怕黨內產生一個

新生的特權官僚階級。怎麼限制？祇能從經濟上加以限制，從權力上加以限制，從制度上加以限制。一些舊的東西，像工資差別，八級工資制，如果處理不當，不加適當限制，任其擴大的話，就會成爲一種資產階級法權。級別本身就是一種法權。我是上級，是領導；你是下級，是被領導，我就該比你多拿，這就是法權。當然，共產黨是承認有一定級差的，根據各人貢獻的大小，有一定的收入差別，有人多拿一點，有人少拿一點。但是不允許過度擴大這種差別，不允許產生一個特權階級。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有這麼一條，要從工資待遇上防止人民公僕變成人民的主人。我跟他講，我是這麼來理解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他說，你理解得對，我就是這個意思。我也找不到多少能理解我的人，祇有主席、柯老等能理解。

來參加起草文件會議的人不少，好些人我都記不得了，但姚文元沒來參加。在會議期間，姚文元到錦江飯店來找過我。他是一清早走路過來的，六點鐘就來了，他到了之後也不讓服務員來叫醒我，就在外面坐著等我起來。可那天我是凌晨二點鐘才睡的覺。後來一個服務員覺得這樣讓一個名人去外面等著實在不妥，就進來叫醒了我，說，首長，外面有個人等著，就是寫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的姚文元，他已經等了幾個小時了。我說，那你怎麼不早叫醒我。我趕緊把衣服穿起來把他引進房間。讓他等那麼長時間，我太過意不去，連忙說對不起。他說，沒關係，我坐在那裡也是在想問題，不耽誤時間的。他雖然已經是個名人了，卻還是像個中學生，很樸素，又很謙虛，一點架子也沒有，說話又說得很得體。我對他印象很好。我們一起談《海瑞罷官》，交換了對彼此寫的文章的看法和需要改進的地方。總之，我覺得他這個人很好。

等參加會議的人都到齊之後，陳伯達就召集開會了。他先交代說，主席指示，請大家來批判彭真、許立群他們寫的“二月提綱”，要寫個文件把它廢除。接著他說，解放以後，將一個中央發的文件廢除，並加以批判，這還是頭一回。他又進一步解釋說，這樣做對中央威信肯定有很大的損害，但也沒辦法，因爲這是原則問

題。

陳伯達做了動員以後，大家開始對“二月提綱”進行討論和批判，開始是逐句逐條地來討論、分析、批判的，哪一條錯在哪裡，哪一句話錯在哪裡。這樣進行了一天。說實話，有好些冠冕堂皇的東西，你光從字面上看是不容易看出錯誤來的。所以這樣一句、一條地分析、批判就有點繁瑣了。我就在會上提出，我們能不能抓幾個主要的問題來進行分析、批判，這樣可能工作效率會高點。譬如，把左派當學閥來反對，這條就挺重要。但究竟這是不是主要的問題，我沒想好，要請大家來研究。陳伯達覺得我的意見有點道理，就讓大家對我的建議說說自己的看法。王力說，“二月提綱”就是個綱要嘛。我們是要抓住要害，抓主要問題來批判。一般性的、似是而非、無關緊要的那些東西就放過去，不然這個批判文件就弄得太長了。吳冷西接著王力的話題說，評判誰是學閥，和所謂“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問題，確實是個要害問題，我們首先要將這些問題辯清楚。後來批判“二月提綱”的文件中，講到平等問題和學術權威的那一段，就是吳冷西起草寫的，後來又經主席補充修改，才形成了具有一定理論高度的文章。

這樣，就不再一句一條地批駁了，而是先找出主要問題，然後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討論。大家發言踴躍，而且是各有特點。吳冷西、關鋒善於理論概括，把道理講得很透徹。吳冷西講的最多，關鋒也講了不少。後來“五一六通知”文件中，有好幾個重要問題都是吳冷西、關鋒講的。王力的記錄、整理能力很強，他行文也快。他有個特點，能把別人的思想接過來變成他的。你給他一個提綱，他就能慷慨激昂地講半天。你講一分，他能講二分，講得比你的還好。可他自己卻不大能形成獨立思維。一次江青問我王力表現如何？我說，王力挺好，批判‘二月提綱’很積極，發言也很尖銳。穆欣沒怎麼講話，陳伯達也不問他。陳亞丁講得也不少。劉志堅人是來了，但他比較穩重，講話不多。當時我覺得這人挺和善，又是老資格，很尊敬他，可沒想到後來他在總政鎮壓起造反派來會那麼厲害。在這次會上，我除一開始講了一點意見，後面都是聽的

多、講的少。我總覺得他們都是老幹部，我是年輕人，我不能老是表現。

大家講完之後，就各自把發言的內容先整理成文字，再把一段段的文字連接起來，交給陳伯達匯總。陳伯達是很會寫東西的，而且他擅長做後期整理。他匯總出來以後，再請康生看。

康生在文件上改得很多。他的修改很規矩，用一條綫勾劃出來，然後在空白處用章草仔細地寫好，他工作得很認真。

都弄好了就送去印刷廠，由工廠排版印出來，然後陳伯達、康生又給主席寫了一個短信，再送給江青轉呈主席。

江青不大來參加會議，她祇是在錦江飯店的小禮堂找人碰頭，主要是找康生、陳伯達、春橋他們幾個。會議最後形成的文稿由江青派專人送去給主席，她負責和主席聯絡。

主席住在杭州。毛主席對我們送去的文稿又作了很多修改。然後就印送北京，給其他的中央領導人看。請他們再提出修改意見。

4、“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名單的產生經過

就在我們討論和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時候，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決定，要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的組成人員先是由康生、陳伯達、江青提名。康生提了吳冷西、王力、穆欣。江青提了張春橋、關鋒和我，此外她還提了陳亞丁。陳亞丁是總政文化部的副部長，他和江青一起搞過樣板戲，也參加過江青主持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及會後《紀要》的起草工作。江青說他在這幾次活動中的表現都很好，所以提議他參加。但是，劉志堅堅決反對他參加中央文革。因為他們是部隊系統的。所以，江青沒有辦法。陳伯達提了尹達。我記得王任重是由總理提名的。總理沒有參加起草小組的會議，但有一次他來看我們，正好說起。總理說，毛主席很信任王任重的。

提名之後，名單送給了主席。主席說，中央文革不能祇由筆杆子組成，各大區、各省、市都要有人參加。所以，這就又有第二次提名。

第二次提名的時候，我和王力、關鋒、穆欣等人都已經在釣魚臺辦公了。第一次的名單裡沒有姚文元。我就想，搞文化革命，姚文元是衝鋒在前的。怎麼他卻沒有進中央文革呢？我心裡是很想讓姚文元參加進來的，在第一次名單裡，年輕人祇有我一個，其他都是老幹部。我希望有個年輕人和我在一起。所以，第二次提名時，我就提出希望讓姚文元參加進來。江青同意我的意見。但是陳伯達反對，他的理由是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在歷史上有變節行爲。這個問題就提到了主席那裡，主席就說了，老子反動，兒子就不能革命啊？這是兩回事嘛。老子反動兒子革命的很多。陳獨秀後來叛黨，可他的兩個兒子是革命烈士！毛主席一錘定音，姚文元進了中央文革。

吳冷西沒有進中央文革，這可能與主席曾在一次會上說他是個“半馬克思主義者”有關。他過去在彭真領導下也犯過點錯誤。其實他的理論水平是很高的，他善於作理論概括，不但話講得透徹，文章也寫得好。我曾兩次參加釣魚臺“反修寫作班子”的會議，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他和姚溱兩個人。我那時還年輕，不太懂事。吳冷西有個眼睛不好，老是帶著有色眼鏡。有一次我問他，老吳，你怎麼老是帶著有色眼鏡，你的眼睛怎麼了？他就和聲細語地跟我解釋了一番。王力知道後就跟我說，你真是的，怎麼問人家這個問題。這是他最不願意人家問的問題。誰問他他都會跟誰發火的。因為這是他的一個先天的缺陷。當時我心裡覺得很對不起吳冷西，同時也感激他把我當成小孩，沒跟我發脾氣，還耐心給我作了解釋。

現在，在所有我看過的回憶錄中，我覺得寫得最好的就是吳冷西。有理論，講公道，對毛主席的評價很中肯。主席批評他是半馬克思主義。這其實是不簡單了。我們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毛主席也說他自己頂多是百分之七八十的馬克思主義。

江青提名的陳亞丁被劉志堅否定了，劉志堅說他政治上不堅定，

個人作風方面也有些問題，改為謝鐘忠。陳亞丁就此恨死了劉志堅，後來打倒劉志堅，很多材料都是陳亞丁和總政的造反派一起搞的。謝鐘忠是總政文化部部长，老紅軍，老革命，黨性很強。但是人太老實了，在文革中，他去處理部隊的事情，兩派都不聽他的。

5、江青告訴我回中南海上班

在我即將要回北京的時候，江青又叫我去和她見了面。在這次見面的時候，她告訴我，你回北京以後不要再去《紅旗》雜誌上班了。她要我直接去中南海找汪東興報到。她說，關於你的工作，中央另有安排。我當時已經聽說田家英出了問題，中央決定要對他進行審查。但我沒有想到的是，中央還決定由我來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擔任主席的秘書室主任。

這時中央已經開了會，決定審查羅瑞卿了。江青跟我說，上次碰到羅瑞卿的時候，和他說了彭真抵制姚文元文章的事，羅瑞卿支持了她。所以，她覺得羅挺好。但沒想到，原來他們是一伙的。從江青的話裡，我聽出來，她事先並不知道羅瑞卿有問題的。我就問她，羅瑞卿的事情，中央是怎麼知道的。她說，是林彪讓葉群來向毛主席告的狀。她說，葉群還神秘兮兮的，單獨找主席談話，都不讓我們知道。我想，毛主席決定處理羅瑞卿的問題，是在葉群匯報談話後作出的，不然，他會和江青先打招呼的。

6、惠安童生

我是和陳伯達，還有其他幾個參加起草文件小組的成員，一起乘專機返回北京的。在飛行途中，陳伯達和我有一段有趣的對話。

當我問起他年輕時候的經歷，他談興很濃。由於口音的障礙，他就一面說，一面寫。因為飛機上沒有書寫的紙張，他就寫在了專

機上的“飛行報告”的背面。這些紙後來我都夾在了一本書裡，我從秦城出獄後，在歸還給我的一部分私人用品裡面看到了這些紙。

陳伯達在上面寫道：“最近看過清朝一個官僚的信，其中說，有一天，暮宿惠安，城小如甕、縣清似水。可見我生活的環境，是很狹窄的，眼光太小。敝縣在前清時，童生最多，號三千，每三年到泉州考秀才，卷子大量不通，流傳的笑話很多。泉州所屬各縣，稱不通的人，為‘惠安童生’。我是惠安童生之一。”

這篇短文倒是陳伯達很少有的的一個幽默小品。他為什麼要跟我說這些話呢？就在此前不久，在討論“五一六通知”文件時，田家英擅自刪掉毛主席批判《海瑞罷官》要害的講話，是與會者的一個中心議題。在陳伯達的報告交給主席之後，江青為此與身在杭州的毛主席通了個電話，主席在電話裡對江青說，怪不著田家英要到我這裡來游說“包產單幹”呢！“譚言如水，漸以成之”。江青沒聽懂，主席就一個字一個字地又向她說了一遍，可她還是似懂非懂，祇是不好再問。但江青知道了主席引的這話，意思是說：壞話所以能影響人，就是它像水的浸潤力一樣，是慢慢形成的。江青的理解是正確的，但她把主席說的“譚言”念成譏（chan）言了。有一次開會，江青對大家談起了她與主席的通話，康生說，譚言應讀“zen”言，譚不讀為譏。陳伯達聽了說，這兩個字古代是通用的吧！康生沒再說話。過幾天大家又開會，康生拿出一張紙，上面寫著他從《說文解字》、《康熙字典》抄來的“譚”字和“譏”字的音韻古讀，還有從《正字通》抄來的一句話：“譚，俗作譏，非。”（大意）江青看了這張紙，說對呀，主席湖南話我聽不大清，但他好像是把“譚”字讀為“zen”的。這件事把陳伯達搞得不好意思。他心裡肯定是覺得沒面子。我心裡明白，他在我面前以“惠安童生”自喻，其實是怕我會受到康生的影響。所以，我就跟他說，你哪裡是什麼惠安童生，我在參加校對《毛選》工作的時候，看到你在整理編輯《實踐論》、《矛盾論》所作的貢獻，後來還看到你在整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所作的貢獻。我這樣一說，陳伯達挺高興。

第三章 “五一六通知”通過前後

1、批判“彭、羅、陸、楊”

1966年5月1日，我回到了北京。過了五一節，我就去中南海找汪東興報到。汪東興向我傳達了中央的決定，由我接替田家英的工作，這個時候田家英的事情還沒有公開。後來總理把我找去，他對我說，中央決定在中南海成立秘書局，讓童小鵬和我負責領導秘書局的工作。童小鵬主管機要處，讓我主管信訪處。中央辦公廳在原來劉少奇住過的甲字樓裡，給我們安排了辦公室。同時，為籌建中央文革小組，中央辦公廳又在釣魚臺為關鋒、王力、尹達和我安排了辦公室。我的辦公室先是在釣魚臺的15號樓，後來又搬到了16號樓。

5月3日，中央通知我列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是從5月4日開始的，我記得會議是由劉少奇、鄧小平輪流主持的。會場有時在人民大會堂，有時在懷仁堂。

會議的第一個內容就是討論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問題。

彭真的倒臺，看似很突然，但其實也不突然。這中間是有個變化發展過程的。

早在1963、1964年毛主席先後有兩個關於文藝的批示。這兩個批示應是毛主席對在中央主抓意識形態工作的彭真所發出的警告。但是彭真沒把它當回事，仍然對京劇改革等一些事情橫加阻撓。

在《評〈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以後，彭真又采取了抵制

的態度。所以主席說北京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在主席公開講話支持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後，彭真又搞出一個“二月提綱”，打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旗號，繼續壓制左派，要把批判限制在學術範圍內。“二月提綱”問題應該是導致主席決定罷免彭真的直接原因。

其實，我覺得彭真和劉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

彭真在“七千人大會”前，曾組織人在北京西郊的“暢觀樓”，收集整理從“大躍進”以來中央文件中的錯誤。據參與整理的人說，原來以為這次能從中央文件中找出毛主席的好多錯誤，可結果沒想到，毛主席的錯誤沒找到幾條，卻找出來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大量的錯誤，什麼“畝產幾萬斤”，“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等謬論，連普及“小高爐”都是劉少奇、鄧小平最先提出來的。

在1964年底討論二十三條時，劉少奇頂撞毛主席的事情發生以後，彭真批評劉少奇批得很厲害，說這是對毛主席不尊重，還說劉少奇在農村問題上老想單幹等等。在農村問題上彭真倒是有資格批評劉少奇的，因為彭真一直是不主張單幹的。劉少奇問毛主席，你老說走資派，那到底誰是“走資派”？毛主席說，張霖之就是。彭真說，你劉少奇這樣逼問毛主席，結果是害了這些幹部。

所以在這次的會議上，劉少奇對處理彭真是很積極的。劉少奇說過，彭真不僅反毛主席，而且也根本不把他和其他中央領導人放在眼裡。

關於羅瑞卿的問題。在這次會議期間，有一次葉群在陳伯達陪同下來找我和關鋒、王力。葉群對我們說，她是陳伯達的學生。可我們當時的感覺陳伯達和葉群並不是很熟的。陳伯達很熱情地向我們介紹了葉群。葉群向我們透露“羅長子”怎樣反對毛主席。葉群說，林彪當初怎樣對羅瑞卿好，可是羅瑞卿忘恩負義，去跟別的老師好。這“別的老師”指的是賀老總。陳伯達曾經叫我們歷史組去幫賀龍寫一部傳記。等葉群一走，他就過來跟我說，我們對軍隊內的鬥爭一向都不太清楚，給賀老總寫傳記的事你在歷史組布置過

嗎？我說，祇是簡單說了一下，還沒有作具體的布置呢。陳伯達馬上說，統統取消，不搞了！這事以後不要再跟別人說了。

羅瑞卿的事主要是因為他跟賀龍走得太近了。而賀龍當時又和劉少奇關係很好，中南海裡一度盛傳，他們要結成兒女親家了。

在文革中，一次主席、林彪、總理在一起開會時，我也在邊上。我親耳聽到主席說，如果關向應還在，“胡子”（指賀龍）就不會倒過去了。

江青跟我說過，關向應、任弼時和賀龍都是二方面軍的，他們的關係是非常好的。關向應是在延安病逝的。臨死前，他找任弼時、賀龍，叮囑他們在黨內一定要跟著毛主席走，千萬不能反毛。任弼時、賀龍都是尊重關向應的。賀龍這個人很講義氣，抗日戰爭勝利後，毛主席曾布置他和聶榮臻在華北與國民黨打幾個好仗，結果兩人都沒打好。但賀龍在毛主席轉戰陝北的時候，積極為陝北解放軍供應糧草、彈藥，還專門把一支部隊放在黃河邊上，隨時準備過河接應毛主席。

上世紀60年代初期林彪的身體不好，中央決定，在林彪休養期間由賀龍來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羅瑞卿這時和賀龍處得較好，不像他在林彪那裡那麼局促。羅瑞卿勸林彪休養這事也是有的，這很可能是因為他認為林彪的身體恐怕是好不了了。如果他知道林彪的病是能治好的話，那我估計他也不會這樣去跟林彪講了。據說羅瑞卿是讓劉亞樓出面來勸說林彪休養的，這是因為林彪很信任劉亞樓。我聽楊成武說，劉亞樓這個人很有能力，林彪指揮打仗，決策後都要靠他來具體組織落實。羅瑞卿跟劉亞樓說的話應該是很和緩的，是沒有什麼棱角的。後來批判他的時候，把他的話掐頭去尾突出一點，就好像真是反對林彪了。

我對羅瑞卿的印象挺好，建國後，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擔任中南海的警衛局領導，上世紀60年代，他在中南海碰到我的時候，總是跟我打個招呼。別人都叫我“老戚”，他叫我的全名。他的夫人郝洽平碰到我們也都是很客氣的。在他們面前，我總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五一六通知”傳達以後，中南海開羅瑞卿的批判會，

會議由童小鵬主持。下面有人遞條子，說要叫郝洽平上臺去接受批判。童小鵬把條子給我，問我的意見。我跟他說，批判羅瑞卿就是批判羅瑞卿，把郝洽平弄出來不好，中央又沒有這個精神。童小鵬覺得我說得有道理，就把條子壓著，沒去理會。那人又遞了一張條子上來，童小鵬還是沒理他。不知這人與羅家結過什麼梁子？

羅瑞卿對主席一直是很好的。我聽江青跟我說，主席跟林彪說，羅瑞卿反對你，還沒有反對我。這句話陳伯達也知道。主席本來對羅瑞卿一直都是很信任的。中央有個最保密的“防突小組”，由總理領導，但具體都是羅瑞卿負責的。

羅瑞卿被打倒後，葉劍英是第一個受益者，他接替了羅瑞卿的軍委秘書長的職務，還陞為中央書記處書記。羅瑞卿跳樓自殺，葉劍英還作了首喻諷詩。我聽了就不覺得不舒服。人家自殺，你有什麼可幸災樂禍的呢？當時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組”，其業務與原來的“防突小組”相仿。“首都工作組”是由葉劍英具體負責的。這是個很神秘的機構，它對外不公開。祇向主席、劉少奇、鄧小平、總理報告工作。

陸定一的問題是由他的夫人嚴慰冰寫匿名信引發的。葉群曾把嚴慰冰寫的一些匿名信拿來給我們看過。那些信寫得真是下流得不堪入目，有些詞匯是從《金瓶梅》的未刪本上抄來的。特別不應該的是，嚴慰冰造謠說葉群不是林豆豆的親生母親。這一對夫妻，都是道貌岸然的領導人，卻連一個天真無邪的女孩都不放過，真是殘忍。誰看了都會覺得他們做出這樣的事，太不像話了。所以，陸定一、嚴慰冰的問題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拿出來以後，沒有一個人同情他們的，都認為他們是不可原諒的。因為這對林彪一家來說，確實是非常嚴重的精神折磨。

葉群親口跟我們講了查處嚴慰冰的經過。那時有個友誼商店，裡面有專給副總理以上的中央首長供應特需商品的。有一天，她們兩個都去了友誼商店買特需商品。一個進去，一個出來，大概嚴慰冰買了很多東西，祇顧看東西，沒有看前面的人，葉群也是匆匆忙忙的，兩個人就碰撞了一下。葉群說是嚴慰冰先罵她，什麼賤

女人、臭女人之類的話，罵得挺難聽。她也來火了，就互相對罵起來。當時可能誰都沒有認出對方，被人勸開後，各自走了。

嚴慰冰不甘心，走的時候，把葉群的車牌號碼給記下了，然後就寫信去舉報。這封舉報信，按照車牌號碼，就轉到林彪那裡了。林彪的秘書收到信，就拿著去給葉群看，說有群眾來信對你提了意見。葉群一看那筆迹，竟然跟寄給她匿名信上的筆迹一模一樣。她馬上去找謝富治，說，你們公安部查了那麼多年都破不了案，現在好了，寫匿名信的就是這個告我狀的人，你們趕快找她去！謝富治馬上找來幾位筆迹鑒定專家，一比對，專家一致認定，兩個筆迹是出自同一個人之手。謝富治報告了總理。總理當即指示，立即逮捕嚴慰冰，專門立案審查。這一來，陸定一緊張了，他提出要去看看嚴慰冰。但沒有總理的同意，誰也不能去看。陸定一就找謝富治，說要給她送點衣服之類的。謝富治表示很為難。陸定一就說我可以寫封信給她嗎？得到允許後，他就寫了。信中说：我不知道你犯了什麼錯誤，你要聽黨和政府的話，好好配合，力求寬大處理。我前段時間去無錫，給你買了塊國產手表，是半鋼的。你就看著手表，按時休息，按時起床，維護身體健康。

謝富治向康生報告了這個情況。康生果然厲害，他對謝富治說，你不懂上海話，他們兩個都是南方人，都在上海住過，陸在信上所寫的“半鋼”就是上海話“半講”的意思。那意思就是，陸定一叫嚴慰冰祇講一半，不要全講。康生認為，因為事情已經敗露，所以陸定一要嚴慰冰祇講自己的一半，而別講他的。否則，他送表幹什麼？嚴慰冰手上也不是沒有表。

謝富治向總理匯報的時候，說到半鋼、“半講”。總理聽了也說，康生分析得對，可能就是這麼一回事。

陸定一過去是反對王明路線的。可在廬山會議上，陸定一是暗中支持彭德懷的。他給自己的兒子取名叫陸德德，據他自己說，一個德是朱德的德，一個德是彭德懷的德，但文革後他們否認自己的這一說法。但寫匿名信這件事，說明他們夫婦兩個人，連一個德都不講。

楊尚昆受審的主要原因，一個是在毛主席身邊秘密安放竊聽器的問題，一個是泄密的問題。

楊尚昆在主席的菊香書屋臥室和洗手間裡安放竊聽器，是通過機要室的吳振英（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康一民（總理的機要秘書）兩個人來做的。葉子龍調離機要室後，機要室就由吳振英、康一民負責。1964年的夏天，在一天中午休息的時候，好多人都在中南海丙樓的前院乘涼。我聽見康一民在跟人大聲地說，“他媽的，出了事就當縮頭烏龜，這麼大的事，讓我來頂罪。明明是你們叫幹的，現在你們沒事，就我有事”。康一民是紅小鬼出身，口無遮攔。回到秘書室後，我跟田家英說了這事。田家英給我說，你別去摻乎啊，這次他們機要室可要出大事了。但是具體什麼事他沒有跟我說。後來楊尚昆找康一民談了一次話，康一民就不再講了。

主席在1966年7月回北京之前，叫江青專門打了個電話給我，讓我和謝富治親自再去看一看，主席在中南海的住處是不是都清理幹淨了，還有沒有竊聽器？我馬上打電話給謝富治。謝富治說，他馬上派人用儀器去測試。過後，他來電話說檢查完畢，沒有竊聽器了。我同謝富治說我們再去現場看看，我現在就坐車過去接了你一起去。於是我坐車出中南海的南門到公安部去把他接來，一起去了主席住的豐澤園。我一邊看一邊跟謝富治說，這可是不能出差錯的呀，不然咱倆都要受處分啦。謝富治說，保證沒有問題。他已經叫人用專門的儀器來反復檢查了。我把和謝富治一起去查看的情況，給江青做了詳細的匯報。但是，主席1966年7月回到北京以後還是沒有去豐澤園住，而是先住釣魚臺。不久後又住到“游泳池”去了。1966年9月底，主席還到豐澤園裡的頤年堂開過一次會，可是開完會他還是住回了“游泳池”。主席對豐澤園這個地方似乎產生了一種心理障礙。

後來在中央文革小組開會的時候，我們向江青問了這個竊聽器的事。江青當場就叫汪東興去她那裡拿來了一個很大的信封，信封上是主席親筆寫的字：“江青留存”。裡面除了小錄音器，還放著幾顆米粒狀的竊聽器，那東西很小，連謝富治都說從來沒有看到

過。還有藏著竊聽器的肥皂盒。這很可能是楊尚昆通過中央調查部從海外進口來的，楊尚昆是中調部的領導人。在信封裡還存放著當事人康一民等親筆寫的檢查。

在1964年“竊聽器事件”被查出來以後，毛主席就下令把楊尚昆調離中央辦公廳。可到了1965年主席發現楊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他發了火，劉少奇、鄧小平這才把楊尚昆調去廣東省委當了書記處書記。

楊尚昆調去廣東後，還是不斷地在深夜打電話給田家英，田家英把中央和主席討論的一些事情都告訴了楊尚昆。直到後來田家英感到事情越來越嚴重了，他害怕了。他跟楊尚昆說，咱們別再通話了，萬一被人家聽到怎麼辦。可楊尚昆還是繼續打電話來，田家英也不能不接。這些情況都是田家英的秘書後來揭發的。在田家英死之前，他的秘書不肯過多揭發田家英。田家英死後，他向組織上說，他解放了，要把田家英的事情原原本本向組織上交代。按他的揭發，問題嚴重極了。他寫的揭發材料，按理現在應該存在中央檔案館，不知被銷毀否？當時中央決定審查田家英的時候，是把他作為楊尚昆案的附案來立案的。

在楊尚昆調離中央辦公廳以後，由誰來接任中辦主任的職位？當時劉少奇、鄧小平主張由田家英接任。總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傾向由龔子榮來擔任。龔子榮當過國務院副秘書長，是一個在紅軍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做過地下工作。他原來在北方局工作過，和劉少奇、彭真的關係很好，但毛主席沒有同意。江青跟我說，在這個時刻，是她投了汪東興關鍵的一票。江青說，主席身邊有些人，像葉子龍他們，並不把她當回事的。這些人參加革命都很早。唯有汪東興對江青始終是畢恭畢敬的。但是毛主席對汪東興是有看法的。江青說，主席跟她說，汪這個人表面上唯唯諾諾，其實是很有城府，不是那麼表裡一致的。但江青覺得，汪還是個比較直爽的人，是能夠掌握得住的人。後來毛主席就決定由汪東興來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所以江青說，她的這一票是關鍵的一票。當然後來江青也為了她這關鍵的一票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我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時，汪東興對我說，現在辦公廳就咱倆了，我水平不高，能管好警衛局就可以了。秘書局、機要局都歸你管吧。我知道他是擔心我分了他的權，就對他說，汪主任，我在中央文革辦公室已經分攤了你很多事情了。再說我還要忙著寫文章，我連秘書室都管不過來。我怕他還不放心，就又跟他說，我這個人有個弱點，就是好名。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寫的文章能讓主席看了滿意。辦公廳那麼多事務，我實在沒能力管，還是你來管。他看到我的態度很誠懇，也就表示接受了，沒跟我再捉迷藏。

楊尚昆在主席住所安放竊聽器的事件，在這次中央會議上揭露出來之後，大家都非常震驚和憤怒。總理沒讓楊尚昆出席會議，總理在會上宣布，楊尚昆已經被隔離起來了。因為他有一些問題屬於黨的重要機密，不便於在會上公開作交待。

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下達了中發（66）277號文件，公布了楊尚昆的問題。文件明確指出，“楊尚昆不顧中央多次關於禁止安裝竊聽器的決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講話，盜竊黨的機密。”可是到了1980年鄧小平上臺之後，那時的中央又發了文件，說關於楊尚昆“私錄毛主席談話”，“全屬不實之詞”。楊尚昆本人和一些當事人等，或發表談話，或撰寫文章，把“竊聽器事件”說成是正常錄音工作，連葉子龍也寫回憶錄，他把1964年被發現的“竊聽器事件”和50年代中央辦公廳的正常會議錄音混為一談。而毛主席則被他說成是一會兒主張和同意錄音，一會兒又堅決反對錄音，前後矛盾，喜怒無常。

2、中央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

彭、羅、陸、楊在中央會議上受到批判以後，會議對“五一六通知”的文本進行了討論。

“五一六通知”的文稿起草出來以後，主席親自對它作了多次修改，並增寫了大段大段的文字。經過多次討論和修改，然後又在

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討論通過之後，才提交到這次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來進行討論的。

會議先是分小組會議進行討論。在收集了各小組的意見和建議後，又作了修改。經過小組會議的充分討論，取得了一致的意見以後，才在大會上舉手通過的。

“五一六通知”的正式定名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因是在5月16日這一天的會議上通過的，所以後來一直被稱為“五一六通知”。

在中央下發的正式文件裡，主席在修改時所加進去的話，都用加粗的黑體字印刷。

3、林彪的“五一八講話”

“五一六通知”文件通過的第三天，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大會上作了講話，這個講話別具一格。主席那時候在杭州，看了林彪講話整理稿後說，從來沒有人這樣講政變，有些是舊的歷史觀，不符合馬列。主席本來是不想往下批的，但是中央很多領導人都希望批下來，主席才批准下發。

在林彪講話之後，總理指示，要中辦秘書局在第二天的上午就必須把講話稿整理出來。接到總理的指示後，我馬上和中辦的工作人員梁川一起連夜進行整理。林彪的講話沒有書面講稿，他祇是寫了一些條條杠杠。我們在整理的時候，主要是根據我自己在現場做的速記。我在中央團校學習和從事秘書工作時，為了記錄方便，自己琢磨出了一套速記方法，制定了一些別人看不懂的簡單符號，在自己學習和工作時一直沿用這個記錄法。我看著自己的記錄一句一句念，梁川就一句一句地寫。林彪這次講話講得非常流暢，不用添加什麼，實錄下來，就是一篇很通順的稿子。需要查對的祇是一些歷史典故、年代、姓名等。而這又正好是我之所長。所以我倆僅用了一個晚上的時間，就把這個講話給整理出來了。

梁川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受到我的牽連，被審查了很長時間。現在他對文革還仍然堅持著自己的觀點，但表現卻比較消極。他說，以我們個人的力量，你和我，搞不過鄧小平他們。連毛主席都沒鬥過鄧小平，我們有什麼辦法？他說，他的家也破了，愛人也死了，自己勞改了這麼多年。文化大革命還不是失敗了？看起來我們是決定不了祖國的社會主義命運的。算了吧，就當是一場夢吧！其實他去的祇是五七幹校，也不算勞改。他說，如果他當初搞科學技術，現在應該過得不錯。我讀了那麼多馬、列、毛的書，可還是說服不了他。

我把整理好的林彪講話送機要處印廠排印好以後，先送給林彪審閱。林彪看了覺得很滿意，說這是高水平的整理。林彪辦公室還專門打電話來詢問：是誰整理的？辦公室的同志告訴他，是威本禹親自整理的。後來聽葉群和林彪的秘書張雲生說，林彪當時就對他們說，往後寫什麼東西，可以送給威本禹看看。

也是在這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在小組會上有一個發言。我在發言中談到了我前幾年，聽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後的感受，我用了“疾風知勁草”這個比喻，形容林彪這個講話。這個發言被登在了會議的簡報上了。我自己還覺得自己講得挺好。不想卻挨了江青的批評。江青在電話裡跟我說，不是說你講的內容不對。現在你的身份不一樣了，你作這樣的發言，事先得跟我們打個招呼。關鋒在底下跟我說，江青的批評是對的。你這麼一個敏感的講話，是會引起各方猜測的。

4、劉少奇主持批鬥朱德

5月23日會議通過了對“彭、羅、陸、楊”的組織處理決定，停止他們在中央書記處的職務。同時增補了陶鑄、葉劍英進書記處以及任命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

在處理了“彭、羅、陸、楊”之後。由於在“通知”裡主席

加上了這麼一段話，“像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所以許世友等一些人就提出來問了，毛主席說的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究竟是誰，怎麼不把他揪出來？他們問總理，總理說，主席那祇是泛指，就是一般地說說，並不是專指。可還是有人不斷地提問，說這話主席都說過好幾遍了，現在又正式見了文件了。而且有一次主席還親自跟我們說，“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要造反，要像蔡鐸那樣。”從這些話看，主席一定是有所指的。於是他們就再去問了劉少奇。據說劉少奇說，主席說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可能是指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岡山的時候他就反對毛主席。就這樣劉少奇他們組織了一個小範圍的會議，批鬥了朱德。林彪、鄧小平、陳毅等人都參加了這個會議，陳毅的態度最嚴厲，他說朱德在井岡山的時候就是野心家，是個危險人物。陳毅這麼一說，這個會的氣氛就變得很嚴厲了，鬥得很凶。我後來聽朱德的軍事秘書曹全夫（他是主席母親文家的後代，跟主席是親戚）說，康克清跟他發牢騷，說他們鬥朱德比在廬山上鬥彭德懷還厲害。

我是在幾個月後才聽總理跟我說起這件事的。

5、“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成立

中央文革小組的名單，最後是由出席會議的中央常委們開會商量決定的，在1966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閉幕大會上通過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後，1966年5月28日由中共中央向全黨發了這個名單的通知：

《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

中央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領導下。

現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通知你們。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

組員：謝鐘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四大區參加的成員（四人）確定後，另行通知

不久中央又確定：華北：郭影秋（北京新市委文教書記）、東北：鄭季翹（吉林省委文教書記）、西北：楊植霖（青海省委第一書記）、西南：劉文珍（西南局宣傳部部長）為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

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中央又發出通知，陶鑄兼任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8月底又發中發[66]439號通知，在陳伯達因病休養期間，組長職務由江青代理。

第四章 毛主席作“五七指示”

1、緊急飛往上海

1966年5月12日下午，毛主席的機要秘書徐業夫打電話到釣魚臺找我。徐業夫在電話裡對我說，主席有重要的事情召見陳伯達、楊成武和我。讓我去通知他們，我們三個人必須在明天一早趕到上海。

接到徐業夫電話，我立刻告訴了陳伯達。然後又打電話給楊成武。楊成武說，他也接到徐業夫的電話了，並且已經安排好了飛機。他讓我和陳伯達明天凌晨去北京郊區的某軍用機場，然後一起乘專機去上海。那時我們都習慣在夜間工作，所以那天晚上我幹脆就不睡了。到了5月13日凌晨3時左右，楊成武就來電話催我們出發了。我和陳伯達坐車去了機場，與楊成武會合。我們剛登上飛機，飛機就起飛了。那是一架叫做子爵號的中型專機，飛起來很穩。飛機上還有可以辦公和休息的小房間。飛行途中，我心裡就一直在嘀咕，主席這麼緊急地召見我們，究竟是爲了什麼事？那時正在傳說北京有發生軍事政變的跡象，這次又有代總參謀長同行，是不是與軍事政變有關？

大約飛行了三小時，我們就抵達了上海的虹橋機場。徐業夫已在機場等候我們了。我們一起坐上了一輛有三排座位的轎車，在我們的車子前後還各有一輛開道車和護衛車。在車上，徐業夫把已經印好的文件分發給我們。打開一看，是林彪轉呈給毛主席的解放軍總後勤部的一個報告，和毛主席在上面作的批示，主席的批示是寫

給林彪的。我們在車上就看了起來。

毛主席是比我們早幾天從杭州抵達上海的，他給林彪的批示應該是在上海寫的。照例這樣的文件都得由經過審查的專門工廠印制。我不記得杭州有這樣的工廠，上海倒是有的。所以這個文件是在上海印的，要不就是用飛機送到北京去印的。

2、親聆毛主席講“五七指示”

大概清晨7點左右，我們就到了主席下榻的西郊賓館12號樓。我們到的時候，主席還沒有起床。但主席事先有交代，我們一到就馬上叫他起來。所以護士長吳旭君叫我們在客廳裡先坐下，然後她就去主席臥室敲門，告訴他，我們到了。

客廳不是很大，在客廳的一邊是兩張單人沙發，對面是一張三人沙發，在這張三人沙發旁邊有一把靠椅。楊成武硬要讓我坐在三人沙發上，他自己坐旁邊的椅子。我想他是老革命，我一個小青年，怎麼可以我坐沙發，讓他坐椅子呢？經一番退讓，最後還是我坐了椅子。我們坐下後，都繼續埋頭看文件。

一會兒我們看到主席穿著睡衣，從臥室裡走了出來。我們知道主席通常都是晚上工作的，很少有這麼早就起床的。

主席出來後，和我們一一握手打招呼。在和我握手時，主席說，好久不見了。主席這樣說，那是因爲1964年夏天，我被調去《紅旗》雜誌工作以後，就沒有再見到過主席。我在中南海工作時，住的地方離豐澤園很近，平日我常騎自行車經過豐澤園的後門出海辦事。有時遇上主席在那裡散步，我遠遠看見了都會立即下車，想從靠牆一邊悄悄推車過去，以免打擾到主席。可是主席祇要看到我，總會向我抬手打個招呼。主席又說，上次討論哲學問題，讓《紅旗》派人來參加，你沒有來。主席指的是1964年秋，他召集了一些人作過一次關於哲學問題的談話。我從主席的話中聽出來，主席或許以爲我會去參加那次哲學問題談話。但當時《紅旗》雜誌

陳伯達是叫吳江、邵鐵真去的，沒叫我去。

主席給大家打完招呼就在單人沙發上坐了下來，隨後就拍了拍他旁邊的另一張單人沙發，讓我坐到他的邊上去。因為是主席叫我坐的，我就不好推讓了，於是我就坐到了主席的身邊。原來我坐的那個椅子是斜對著主席臥室的門的。主席出來後，我總感覺臥室裡好像還有人。果然不一會兒，江青也從臥室裡走了出來。我馬上從沙發上起身要讓座給她，可主席用手示意，要我仍坐在他邊上。江青就坐到對面我原來坐的椅子上去了。

我從秦城出獄後，聽到了鄧小平一次講話的傳達，說什麼早在建國初，毛主席與江青就各住各的，實際上是已經離異了。可我親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時仍與江青同住在一起。那時主席73歲，江青51歲。建國時，主席56歲，江青34歲。江青都是和主席住在一起的，兩人感情是很好的。主席住在釣魚臺的時候，江青也經常和主席住在一起。直到1967年我因寫《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篇文章，常從釣魚臺到中南海找主席和江青，仍見到她是同主席住在一起的。雖然江青平時住在釣魚臺的11號樓裡，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但江青仍時常回去看主席的。

這時，護士長吳旭君給主席送來了早餐。我看到她拿著一杯乳製品，顏色淡黃。另有一個小碟，上面盛著幾片烤饅頭。後來吳旭君對我說，那乳製品是主席喜歡喝的馬奶，加了點麥片。唉，一杯麥片馬奶和一碟烤饅頭，就是這位叱咤風雲的偉大歷史人物的早餐了。我們剛才在飛機上用的早餐，都遠比它豐富。

主席喝了幾口麥片馬奶，開始講話了。他說，今天找你們來就是為了研究你們手裡在看的文件。接著又說，從遠古以來，人類一直沒有什麼社會發展的長遠計劃，人類社會發展應該有個遠景計劃，這才是人類文明。我們講的人類文明，是共產主義。它是馬克思根據現代生產力發展的情況設想的，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等書中講了一些關於共產主義的具體的設想。祇有共產主義社會，才是文明社會。我以前談過張魯，張魯是東漢末年的農民領袖，與黃巾一黨，他也有些共產主義想法，這些想法大概來源於古書上講

的大同世界，祇是古書上那個大同世界講得很模糊，因為那時沒有新的生產力，對將來的大同世界無法具體化。張魯所處的時代社會進步了點，所以張魯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體化了。在張魯那裡治病不要錢，吃飯也不要錢，但不能亂吃，吃飽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貴族豪富，吃那麼多，浪費那麼大，總不好！主席說，我們現在找到比張魯更好的辦法了，解放軍總後勤部總結的這個經驗，就是一個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萌芽，每個人分工不是那麼刻板，一業為主，全面發展。解放軍戰士除了軍事訓練，還可以做工，務農，還能學習文化知識，發展藝術才能。勞動者的勞動不要那麼緊張，不要一天到晚幹活，要勞動與學習相結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領導的也要勞動，定期勞動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在分配上允許有點差別，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爲一個特殊階層。我注意到，此前主席雖然說過官僚特權階級，但這次說的還是特殊階層。接著主席說，林彪同志有個報告過來，我給他寫了幾句話，請你們來一起修改一下。主席問我們看了文件後有什麼意見？

陳伯達首先發言。陳伯達在政治上確實是比較敏銳的。他說，剛拿到文件，雖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這個批示非常重要。他說，我們在大躍進時，曾探索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模式。這個又是一次新的探索，主席這次的指示非常明確，而且可行性很大。他說，前不久提倡的“半工半讀”也是一種探索，不過做起來像是勤工儉學，沒有提到共產主義理想的高度。還有河南嵯峨山人民公社的共產主義過渡，搞得太雜，不大可行。陳伯達的話，讓我想起1958年主席曾讓他和張春橋去看過嵯峨山公社的共產主義過渡，他們回來後對嵯峨山也沒有怎麼肯定，祇是說那個公社的書記挺能吹的，態度明顯有保留。要不是他們當時持有這個態度，恐怕早就宣傳推廣嵯峨山了。陳伯達接著說，嵯峨山的設想沒有主席這個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現在的生產條件下，怎樣做到人的全面發展，完全符合馬克思講的新制度下人的全面發展的理論。平心而論，陳伯達雖然早年思想龐雜，入黨後在嚴峻的鬥爭中，經不起考驗（如林彪事件），但他的理論水平，尤其是哲學水平要比一般人

高很多。

陳伯達講完以後，楊成武講。楊成武對理論的東西講得不多，祇是說了些具體的問題。他說，部隊搞生產意義很大，照這樣下去，我們都可以不領軍糧了，這對戰備是很有意義的。這時主席插話說，我歷來主張軍隊糧食自給。楊成武接著說，戰士學文化好，這樣軍隊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隊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糧食又能學文化。這個好。他還說，東北有個部隊搞得比總後報告中說的還要好。主席聽了就讓他把材料拿來看看。他回答說，已經送上去了，可能還沒有傳到主席這裡。

接下來就是我講了。我年輕時讀過一點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而且，主席在《張魯傳》上的批語我都抄寫過，並且讀了很多遍，一些詞句已能背誦。因而我就從主席對《張魯傳》的批語開始，說張魯搞了五鬥米教，設置“義舍”，窮苦老百姓到他那吃飯不要錢，而且都能吃飽；他用草藥和符咒治病，也不要錢。草藥能治病，符咒是迷信，但有時也能治病，因為它是一種心理療法，至少可使病人增強抗病的信心。當我說到張魯在他所統治的地區“不置常吏”，“皆以祭酒為治”時，主席插話說：就是不要當官的，由群眾公推出的人來管理地方的各種事務。接著，我說起我在長辛店二七機車廠勞動的時候，看到工廠邊上就有很多土地，如果也能用來搞農業，那工人生活就會大大改善。我聽楊成武講戰士學文化時，心裡就在想，主席的指示不光是說要戰士學文化，還說要批判資產階級。所以我又著重談了對批判資產階級的看法，我說前些天我剛到“南京路上好八連”去體驗生活過，我沒有想到，我們的戰士也能批判《海瑞罷官》。原來以為那些古代的事情，戰士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戰士都很清楚。主席很注意地聽了我復述的戰士的話，然後他問，會不會是知道你要去，他們指導員事先請人來跟他們講課，做了些準備？我說，這我倒不清楚，但戰士們有些問題說得很好，比我寫的文章還要好。比如戰士們說，那個“清官”也是壓迫人民的，而且有些“清官”壓迫人民更厲害。因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擁護，所以他們鎮壓農民起義往往更沒顧慮，也更

殘酷，來了就殺，比貪官更凶狠，曾國藩就是如此。主席聽了說，對！曾國藩殺人厲害，範老（文瀾）說老百姓叫他“曾剃頭”。主席還說，《老殘遊記》上也講“清官”殺人厲害。說“清官”的紅頂子是用血染的。

這時，陳伯達又說，太平天國洪秀全的《天朝田畝制》，康有為的《大同書》，都沒主席的批示提得好。主席就說，太平天國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後，它的上層很快就腐敗了，領導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統治者，他們還會認真去搞什麼《天朝田畝制》嗎？我們讓大家都來批判資產階級，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資產階級來。共產黨雖然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但要是脫離群眾，不繼續革命，甚至腐化變質，轉過來壓迫人民，那麼人民也還會起來反抗的，還會出陳勝、吳廣，瓦崗寨。

我接著主席和陳伯達的話說，主席的設想挺好，人不能一天天老是幹同樣的活，一邊幹活一邊學習，學工的可以學農，學農的可以學工，還要學文化，批判資產階級，那樣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發展。如果工廠、公社、機關、學校都能按照主席的這個設想去做，那這個社會就越來越理想了。我感到毛主席描繪的這一社會前景，比陶淵明的“桃花源”和康有為的《大同書》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碼它在我們解放軍的部隊裡已經實現了。

主席聽了笑著對我說，你是年輕人，你們祇要貫徹不斷革命的精神，把革命進行到底，也許能看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曙光。

那天的談話，主席的興致很高。主要都是主席講，江青沒說什麼話。凡主席在場的時候，江青一般都不多說話的，都是畢恭畢敬地在聽，那天也一樣。我曾對主席講話作了個簡單的記錄，這個記錄後來被汪東興他們抄走了。我要求幾次，但至今都沒有歸還給我。因為在秦城監獄時，我常回想主席這次講話，所以至今還能記得一些情況，但也就是這些了。其中對陳伯達、楊成武的談話可能有失記之處，因為我有個缺點，就是記自己的多，記別人的少。關於他們的談話，可以參考他們自己的回憶。

到吃午飯的時候了。主席讓我們下午修改文件，看看還有什麼

補充的，然後提交給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一下，通過後，再以中央文件發下去。

從主席那兒出來，我們就去了我們住的錦江飯店。吃過午飯，我們三人就一起坐下來討論主席講話和文件。對主席的批示我們沒做什麼改動，祇是對總後勤部報告中的個別字句、標點做了一點小的修改。接著，我們又討論起草了一個中央通知的文稿。

在這種時候，陳伯達往往都是最起勁的，他親自動筆起草。田家英曾跟我說過，凡寫給主席的東西，陳伯達是一定要自己親筆來寫的，好讓主席看到是他的筆迹，知道是他寫的。那天，我和楊成武也祇是在一旁參議，讓陳伯達寫。我記得，楊成武和我祇提了一個意見，即在原來文稿的最後加了一段話，說主席的這個指示對反帝、反修和加強國防戰備有重要戰略意義。陳伯達採納了，後來的中央文件上也是這麼寫的。

那天總理也到了上海，也住在錦江飯店。當晚，曹荻秋、魏文伯請總理和我們一起吃飯。總理說他晚飯後要去主席那裡，陳伯達就讓總理把我們寫好的東西帶去交給主席。這個時候，總理跟我說，約我第二天早晨一起到錦江飯店頂樓陽臺上去呼吸新鮮空氣。第二天早晨7點多，我就去了。沒想到，總理已經在那裡等著了。我說，我遲到了，變成貪睡的小張良啦。總理朝我笑了笑，他先和我聊了幾句閒話，接著就問起我的家庭狀況和工作經歷。然後總理就認真地對我說，在李秀成問題的討論中，他看到了主席所作的十六字的批示之後，端正了自己的認識。他很誠懇地對我說，在這件事情上我對不起你，周揚開會批判你是我批准的。其實我也覺得你的文章寫得好，有氣勢。可他們都要批，講了好多理由。我也沒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虧主席及時發現了，不然要犯大錯誤。我聽了很受感動，深深覺得總理的胸襟寬大，光明磊落。

第二天，即5月14日，主席的回批就下來了，說（我們寫的東西）可用，讓我們帶回北京。當天上午我們就坐飛機回到北京。一回北京，陳伯達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匯報，我向中央文革小組作傳達，楊成武則去向林彪匯報。

很快，1966年5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一致通過了這個文件，並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正式向全黨下發了這個文件。因為毛主席是在1966年5月7日作出這個批示的，後來就被稱為“五七指示”。

3、“五七指示”偉大而深遠的意義

主席那麼緊急地召我們去上海，就是因為當時北京正在召開討論“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主席是要把這個文件也拿到這個會議上去討論通過，然後馬上下發給全黨。

“五七指示”在當時也確實是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央文件下發的。可是隨著中央緊接著又發出“五一六通知”，北京發生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這樣大家的注意力就都轉到其他事情上面去了。

大概是在1967年5月，陳伯達提出要和我一起寫個關於“五七指示”的東西，發個社論什麼的。以引起全黨和廣大群眾的重視，我非常贊同。在起草社論綱要的時候，陳伯達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宏偉藍圖”這個概念，他認為以前的空想社會主義都沒有具體的規劃，主席的“五七指示”則是一個具體規劃，是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一個宏偉藍圖。我說，這個提法挺好，很有指導意義。陳伯達聽了說，嘿，你還能欣賞我噢。我說，那當然啦，你是老夫子嘛。於是按照陳伯達寫的綱要，我組織人寫了一篇文章，後來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了。至於文章發表前是否請其他中央領導人看過，我記不清楚了，但至少主管宣傳的關鋒、王力是看過的。

現在看來，我們當時對“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還是很不夠的。當時我們都沒有想到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文革的關係。後來才認識到，主席在文革一開始的時候，就設想了文革後要構建一個怎麼樣的社會，他給我們講“五七指示”，談共產主義，實際上是向我們展示文革的前景。

我在中南海工作那麼多年，參加過的會議無數，卻很少聽到有哪個領導能象主席那樣不斷地思考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劉少奇平時很少講共產主義。大躍進時，他倒是講共產主義了，可一講就是什麼男女分營、消滅家庭等等。但他後來卻阻礙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運動，鼓吹“三自一包”，所以毛主席說他是言不及義。總理雖然不怎麼多講共產主義，但我覺得他倒是一個堅信並且身體力行的共產主義者。陳伯達可能是受毛主席的影響，他倒時常講共產主義，但他身體力行的則是個人享受，不太關心人民群眾。陶鑄有時也講共產主義理想，而且能把具體問題提到理想的高度來講。在中央辦公廳歸陶鑄領導的時候，我和他接觸比較多，他經常跟我閑談，談讀書、談理想，態度也是真誠的。但他對文化大革命，卻是抽象的擁護，具體的反對，對一些貪污腐敗、鎮壓群眾的幹部極力保護。其他的中央領導，還有省委書記當中，講理想的就更少了，一講就是具體工作。地方上的大員，像李井泉、魏文伯，我和他們都有接觸，卻從來沒聽他們講什麼共產主義理想。也許是沒有碰到適當的機會。

主席自己對“五七指示”是很重視的。他一直都在考慮怎樣才能既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又不使差別擴大。在一次中央碰頭會議上，主席問我，現在工人的工資是多少？我告訴他，大概平均是三、四十塊錢。他說，哦，我是四百多塊了，相差十倍了，離巴黎公社的原則還很遠。他對我們說，工資差別這麼大，這個問題要研究怎麼解決？他特別叫我去找人研究一下，看如何解決。我趕緊找了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孟祥才等人，組織了一個小組去作調查研究。後來也提出了一個方案，主要內容是，降低上面的工資，增加工人的工資。孟祥才後來在山東大學工作，前些年我碰到他，他告訴我，當年我們作調查研究的材料現在都還在他那裡。我記得我們所提出的方案，大約是把主席這一級的工資降到三百多塊，這樣就和工人祇相差七、八倍。巴黎公社提出的差距是八倍。其實十倍應該還是比較合理的。這個方案一提出來，陳伯達看了就反對，他說按你這樣的方案搞，我們都不能生活了。陳伯達是四級還是五級，記

不清了，祇比主席少一點。按當時的物價水平和陳伯達的生活開支，他的確會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的。所以我們研究的方案有待進一步推敲。後來文革運動發生大變動，這個方案就拖下來了。

文革期間搞的“五七幹校”，就是根據“五七指示”來的。但大多數人都把它看作是臨時的，有些人甚至把它看做是“牛棚”，是“勞改”，是一種政治迫害。很少有人把它看成是防止幹部脫離群眾、脫離勞動，防止產生特權利益階級的有效方法。

在文革期間，農村搞工業，發展社隊企業（後來的鄉鎮企業的前身）也是根據“五七指示”來的。現在的河南南街村和江蘇的華西村，也就是這樣搞起來的，有農業，有工業，又有學校。

主席和我們的那次談話過去半個世紀了。我自己也已到了暮年了。當年主席曾滿懷信心地對我說，像我這樣年輕的人，祇要堅持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產主義曙光的。可惜，我至今看到的不是什麼共產主義的曙光，我看到的祇是資本主義在很多領域猖獗地復辟，還有美、日帝國主義包圍並企圖像瓦解蘇聯那樣，演變與分裂中國的不祥之兆。

第五章 田家英的自殺

1、田家英自殺的經過

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成立專案組，審查“彭、羅、陸、楊”問題的同時，中央決定成立由安子文、王力和我三人組成的專門小組，負責審查田家英的問題。總理要我去找公安部部長謝富治，請他配合我們三人小組工作。這是我第一次與謝富治打交道。我去了公安部與謝富治談完工作後，他熱情地邀請我到他家裏去吃午飯。

1966年5月21日上午，安子文打電話通知我，讓我在下午二時半，到中共中央組織部與他和王力會合，然後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談話。在接到安子文的電話後，我與汪東興通話，告知情況。汪東興說他會通知門衛給安部長放行，談話後如有什麼問題可以再找他。我到組織部的時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說，總理交代馬上要找田家英談話，要他停職反省，由你接管他的工作。特別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錯。那時安子文的威信很高，組織上的事情，他說一不二。

田家英住在中南海永福堂，那裡原來是彭德懷住過的元帥府。我們到那兒的時候，祇有田家英夫人董邊在，她告訴我們，家英同逢（先知）秘書出去了，一會兒就回來。董邊是安子文的老部下，兩人很熟，她招待我們茶水，我們就坐下等著。一會兒田家英和逢先知回來了，田家英看來我們三個人，臉上顯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反倒像是這家的主人，招呼田家英坐下，又叫董邊和逢先知也

坐下，然後很平和地說，家英啊，你犯錯誤了，中央現在決定，即日起你停止工作，進行檢查。你的工作由本禹同志接管，你手頭的文件，特別是《毛選》五卷的手稿，都交給本禹同志，等一會兒就辦交接手續。安子文又說，你的問題多大，怎樣處理，要根據你檢查的結果和你的態度決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這幾天就在家裡反省，不要出去了。等安子文講完，我問了一句，主席的手稿你這兒還有多少？田家英說，主席手稿都已退回檔案館了，他這裡現在祇有《毛選》第五卷的清樣稿。

田家英問安子文，他從哪些方面開始檢查？安子文說，你自己先想想，從廬山會議到現在，自己有那些錯誤。在整個談話中，安子文的態度都是平和的。他祇談田家英有錯誤，並未談到具體是什麼錯誤，更沒有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田家英當時表現的是無奈和委屈，但並不激動，更沒說過一句怨恨毛主席的話。按他在中央工作的經歷，他知道，沒有毛主席的同意，是誰也不能讓他停職檢查的。王力、我、董邊和逢先知都沒說什麼話。在這種場合，其他人也不會說什麼話。

安子文談話完畢，我就在田家英住處用紅機子與汪東興通了話，通報了安部長和田家英的談話情況，並請他派機要人員來協助清點文件。他馬上就派了機要室的機要員王妙瓊過來，又派了中央警衛團政治部辦公室主任張純一起過來協助我辦移交。汪東興本人沒有出面。大概在下午四點鐘左右，王妙瓊和張純到了，我交代他們和逢先知一起清點田家英那裡的文件，並一一作了登記。

接著，安子文與王力分別乘車回去了，我在交代完畢後也回到中南海甲樓，找汪東興通報了情況，並請他對永福堂的警衛、人員出入和田家英的安全等做相應布置。汪東興聽了我的話笑了，說這些都是他的工作，他早就安排了。汪東興還說，他要在晚上召集中南海各單位科級以上幹部開緊急會議，宣布中央對田家英實行停職反省的決定。他問我能否參加，我說我還要和王妙瓊等一起查對田家英處的文件，和《毛選》第五卷的各種資料，可能來不及到會。他就說，那麼我們先開著，以後再把開會情況告訴我。

大約五六點鐘的時候，王妙瓊來電話，說田家英處的文件已清點、登記完畢。還說文件早就整理過的，所以都很清楚，交接得也很快。我叫她與逢先知辦好交接手續後把文件帶回來。等星期一上班，把中央的文件交機要室，把群眾的來信來訪文件交給我，把《毛選》第五卷清樣存放到甲樓。

晚上七點多，汪東興召開了中南海各單位科級以上的幹部會議，宣布田家英停職檢查，他的工作由戚本禹接替。汪東興在會上講了田家英的各種錯誤和他同田家英的各種鬥爭，還講了毛主席對田家英的批評。汪東興講的內容有些我是知道的，許多是我不知道的，特別是在我離開中南海的期間（1964-1966）發生的事情，更是我聞所未聞的。我很後悔沒有去參加這個會議。逢先知的夫人馬芷蓀，亦屬科級幹部，所以她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5月22日深夜十一時許，田家英用紅機子給我打電話，說他又找到了一些忘了登記的遺留文件，要馬上交給我。我說，那我派人過來登記。他說，“不，你要來一下，我要親自給你交代一下。”我說，那好。於是，我通知了王妙瓊，叫她一起去田家英那裡。王妙瓊是個勤於職守的女孩，她已經休息了，但是接到我的電話，她即刻去了田家英那裡。

我的辦公室離永福堂祇有一百多米的路程，一會兒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來了，就向我交代了一些遺留的文件。因為文件交接是要經過他的秘書，我便起身出去，想到永福堂的東廂房找住在那裡的逢先知過來。田家英見此機會，馬上就跟著過來，在走到衛生間拐角處，他緊張地問我，究竟出了什麼事，是誰在害他？他這個舉動是違反紀律的。他之所以敢這樣做，是因為我們兩人畢竟有著多年的交往。這個時候，我也沒法告訴他什麼情況，祇能對他說，下午安部長跟你講得很清楚了嘛，你有耳朵沒有啊。我一邊說還一邊拉拉自己的耳朵。他懂了，知道我說的是陳伯達。事實上，中央這次決定審查田家英，也確實有陳伯達向毛主席寫報告的事。

文革後，田家英的夫人董邊寫文章說，在安子文談話後的深夜，戚本禹打電話來，叫田家英到他的辦公室簽署文件，態度很

凶。田家英摔了電話，不肯去簽字，還罵了戚本禹等等。這些無稽之談，類似推理小說，雖能哄哄人，但與事實全然不符。事實上，電話不是我打給田家英的，而是田家英打給我的，談的是移交文件，這是中央交給我的工作，我沒有理由態度很凶，而且文件移交簽字也不是田家英和我的事，是逢先知和王妙瓊辦的。這些簽字的檔案應該仍在。

第三天，即1966年5月23日上午約十時許，田家英的勤務員小陳，第一個發現田家英在永福堂的西廂房裡上吊自殺了。（田家英把主席不大看的書都放在永福堂的西廂房，而主席經常要看的書則都放在菊香書屋。）小陳看到田家英的頭懸在一根栓在兩個書櫃之間的繩子裡自盡了，門還反鎖著。小陳驚恐地跑到秘書室去報告，那天是星期一，在行政科值班的王象乾和路輝等飛快地跑到永福堂，他們從窗口跳進藏書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來，鬆開外衣，路輝用口對口人工呼吸進行搶救，但終因死亡時間過長，無法起死回生。於是，他們就打電話到人民大會堂，向正在那裡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汪東興和我報告。我們立即轉報會議主持人，然後趕了過去，安子文、王力等也聞訊坐車趕來觀察現場，處理後事。安子文當時還叫人通知了董邊。

看了現場以後，安子文、汪東興當場就決定由警衛局的人把田家英的遺體送殯儀館，後來在徵得家屬的同意後火化了。

安子文、汪東興和我分別向在京中央領導和在外地的毛主席和江青等匯報了情況。

2、逢先知對田家英的揭發

田家英自殺後，逢先知搬出了中南海，住入西門外的中南海幹部宿舍，一天晚上他在家裡燒文件，燒得滿屋子都是烟。然後他把燒過的東西，放到抽水馬桶裡衝掉。因為燒的東西太多，有些紙沒有燒盡，結果就把下水道給堵了。那個地方整個院子的下水道都是

連在一起的，這樣一來，別人家的馬桶也都堵住了。馬上有人向辦公廳報告了，一查，原來是逢先知在家裡銷毀材料造成的。汪東興和我馬上過去看了，汪東興叫人把下水道都挖開，把衝下去的東西取出來。取出來一看，在燒剩下的碎紙裡竟然有張毛主席索書條子的碎片。問他怎麼回事，他看了看，說是毛主席要書的時候寫的條子，他没看清楚就撕掉了。把主席的手迹毀了，這個問題挺大了。汪東興馬上要叫公安部派人把他抓起來。我有點於心不忍，畢竟也是多年的同事。我跟汪東興說，現在不宜叫公安部來抓他。汪問，為什麼。我說，他接觸過大量的中央機密，知道的事情太多。你把他抓到公安部去一審，他萬一亂講，不太好。汪東興覺得我說的有道理，說那就把他隔離起來，內部審查。

逢先知被隔離後，態度挺好。汪東興叫他寫啥他就寫啥，前前後後寫了不下一百多張紙。所有關於田家英的事情，特別是田家英在背後特別是酒後，用很無禮的話宣泄對毛主席的不滿。他說，田家英說了，主席死後，也會擺在水晶棺材裡，最後也會像斯大林那樣被後人焚尸揚灰的。還有什麼劉公（指劉少奇）怎麼還不起來造反等等。他還揭發了田家英許多生活上的違法問題。如果按照他的揭發來給田家英定罪，那田家英的問題就嚴重了。

逢先知1950年進秘書室不久，很快就做了田家英的秘書。當時深得田家英的信任。可田家英出事，他揭發和控訴田家英怎樣侮辱他的時候，聲淚俱下，令人同情。而到文革結束以後，他又把田家英抬上聖賢的寶座，大說田家英是怎樣培養他，他跟田家英的關係是怎麼怎麼好。還反過來說是我誣陷田家英。真是一個不實事求是的人。

3、我知道的田家英

我進中南海之前，就在中央團校聽過田家英的黨史報告，進中南海後很長的時間裡，他一直是我的直接領導。從為毛主席讀報、

處理信件，到給毛主席管理圖書，直至參加編輯《毛選》的校對，都是田家英叫我去做的。他教會了我很多東西。我對他一直都是心存感激的。那個時候我感到他對毛主席的感情很好。特別是在編輯《毛選》一、二、三卷的時候，他的工作非常勤懇，非常認真負責，連一點細小的地方都不肯放過。可以說，在編輯《毛選》這件事情上，他的貢獻是很大的。

毛主席對他也是喜歡的。1956年開“八大”的時候，他根據毛主席的口授大意給主席起草的閉幕詞受到了毛主席的讚賞，毛主席逢人就誇獎他，這是他春風得意的時候。

田家英有個大優點，即是在工作上出了問題，他從來不象陳伯達那樣把責任往別人頭上推，從不諉過於同級或下屬。這一點他是有君子風度的。即使批評人，也很有分寸，不象秘書室另一位領導人何載那樣官腔十足、隨便訓人。祇是他這個人過於敏感，氣量也不是很大。我們秘書室的同事們和他的關係一般都是很好的。他對我們也非常隨和。在“八司馬事件”的時候，他同情和支持我們這些被打成反黨集團的“八司馬”。可是，他明知中辦主任楊尚昆包庇秘書室的領導何載，支持何載狠鬥“八司馬”，但在主席替“八司馬”平反後，他卻不準我們給楊尚昆多提意見。到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因為他哥哥參加軍統的事和他自己生活作風上的事，有把柄落在了楊尚昆的手裡。所以，在主席親自支持“八司馬”，要開會批判中辦領導扶右反左錯誤時，田家英就來跟我們說，你們的揭發，就到中直黨委和中辦派來的代表王剛為止，絕不能牽扯到“老令公”（指楊尚昆）。就這樣，他還不放心，開大會的時候，他不讓說話激烈的李公綽和我兩個上去發言，生怕我們對楊尚昆批評過分，而是安排了說話比較平和的朱固上去發言。

楊尚昆曾多次提出秘書室的工作要先向他報告，然後由他去報告主席，而田家英知道，主席是非常重視秘書室工作的獨立性的，一直是要田家英直接向他匯報工作的。於是田家英就兩面敷衍，不敢得罪楊尚昆。

1950年秋，因為他沒有把石景山工人為要求解決生活困難給

主席的信送給主席，受到了主席的嚴厲批評。這件事對他的刺激很大。他回來就一邊喝酒一邊在我的面前發牢騷。田家英嗜酒如命。他對我最大的意見就是不能陪他喝酒，而我對喝酒真是沒有興趣。我估計，後來逢先知揭發的他說的許多話，很可能是在他喝了酒以後說的。還有很多錯事，他也是在喝了酒之後幹的。

田家英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是楊尚昆、鄧小平提拔他擔任的，他因此對楊尚昆、鄧小平一直懷有感激之情。他跟我說，還是楊公、鄧公想到我呀。可這樣一來，他就必須經常向楊尚昆去匯報工作了。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鄧小平去東北視察工作的時候，是帶著田家英一起去的。田家英在大興安嶺被一種毒蟲咬傷，整個手臂都腫了起來。鄧小平下令要省裡的醫院不惜一切代價給他治好。他對這件事情也是一直銘記在心的。

不過在大躍進的時候，他倒是沒有跟著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搞浮誇風。他在私底下還對我說，鄧小平雖說也是出生在農村的，但他根本就沒幹過農活，不懂農業。劉公（劉少奇）家在農村，可是也不幹活，也不懂農業，所以他們才會搞浮誇，才會相信什麼萬斤糧。毛公從小幹農活，所以他就不信什麼萬斤糧。

田家英對1958年的“浮誇風”是堅決反對的，在這個問題上，他是正確的。主席派他和陳伯達、胡喬木去各地農村作調查，他們了解了下面的真實情況，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並向主席匯報。為此，他們也受到了各地方大員的反感和冷遇。田家英對一些中央和地方大員比如譚震林、柯慶施、李井泉、陶鑄、王任重等人看法很大。1958年他帶領我和秘書室一些同事去四川種試驗田。在廬山會議上，他把我們寫的《關於四川新繁縣糧食生產真相的報告》呈給了主席，使得李井泉受到主席的批評。李井泉不服，自己派人去作復查。如果不是四川的勞動模範羅世發頂住壓力，堅持說了真話，那當時田家英和我都可能會被打成是“右傾機會主義”，甚至被指責為“欺騙毛主席”。

正因為此，他和陳伯達、胡喬木在廬山會議上支持彭德懷也是事出有因的。可是後來他受到了李銳的揭發，李銳把他們在私下裡

說的一些話加油添醋地向主席作了交代。因此在會議轉向批判彭德懷的時候，他們也差點被捲進去。由於主席對他們進行了保護，說“秀才是我們的人”，他才過了關。從廬山下來後，他和陳伯達、胡喬木都宣布從此與李銳絕交。田家英更是咬牙切齒地在我們面前，痛罵李銳是“卑鄙無耻的小人”，宣布與他“割袍絕義”。

廬山會議後，田家英曾跟我說，他事先不知道彭德懷是別有用心的，自己是上了彭德懷的當。他很感激毛主席保護了他。他在向秘書室傳達廬山會議指示精神，給我們作報告的時候，他批判彭德懷的態度是很激烈的，直指彭德懷反黨，那個報告的記錄我現在還保存著。

1962年刮“單幹風”的時候，當年6月田家英從湖南調查回來，他先到劉少奇那裡作了支持“包產到戶”的報告。劉少奇鼓勵和支持他的意見，並要他向主席建議在全國實行“包產到戶”的改革。接受了劉少奇的指示以後，田家英再去毛主席那裡，他按劉少奇的意見向毛主席提出了“包產到戶”的建議，受到了主席的批評。後來主席問他，這“包產到戶”是你自己來說的，還是誰叫你來說的。其實主席對這一切心如明鏡，祇是給了他一個臺階下。可是，田家英卻堅持說，是他自己的意見，不是別人叫他來的。主席從此就不再相信他了，也很少找他。從那之後，田家英的情緒就很低落。

田家英自殺後，他的夫人董邊跟她工作所在的全國婦聯的領導人講，田家英是冤枉的，他向主席去反映“包產到戶”的事，是劉少奇讓他去說的。這些人現在怎麼都不出來說話啦？還說，田家英把事情攬在自己身上，那是為了保護中央的團結。

全國婦聯領導把這個情況匯報給了安子文。安子文馬上把董邊找來，還叫了王力和我一起參加。安子文對董邊說，田家英出了問題，照理我們是可以把你也隔離起來，進行審查的。現在我們已經對你很寬大了。如果你還要胡說八道，攻擊中央領導，那後果你自己負責。董邊嚇壞了，從此就不敢再說什麼了。

安子文很老道，他叫王力和我一起到場，這是向董邊表示這不

是他的個人意見，是代表中央領導的。我和王力當時一句話都沒有說。

不過，董邊說田家英代劉少奇受過，是爲了黨中央的團結，這話我當時就覺得疑惑。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書，是主席叫他去湖南農村做調查的，回來了，理應首先去向主席匯報的。怎麼能先去劉少奇那裡作匯報，並接受劉少奇的指示去向主席提什麼建議呢？而且明明是劉少奇叫他向主席提建議，當主席問他的時候，他卻還在毛主席的面前不說真話呢？這怎麼能說是維護中央領導之間的團結呢？要維護中央的團結，不是應該去勸說劉少奇聽從毛主席，鞏固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嗎？那是中央決定的方針呀。

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後，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動。這些人都是很聰明的人，或許也包括田家英。他或許認爲毛主席畢竟老了，而劉少奇對他很器重。這跟後來汪東興投靠林彪是一個道理。區別祇是，汪東興在主席叫他“要改換門庭，現在就滾”的時候，（聽中南海的同事告訴我）他當場就跪倒在地，請求主席的寬恕。而主席這個人其實是心腸很軟的，也就讓他留了下來。可是田家英卻不願向主席說真話，承認錯誤，而是尋了短見。

田家英自殺後，在一次談到他的問題的時候，當時主席也在，我說，田家英的錯誤是嚴重的，但是據我平時對他的了解，他對主席還是有感情的。主席聽了沒有說話。會後，江青就批評我說，你這是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爲此，我在後來的中央秘書局秘書處的群眾大會上還公開作了檢討。

等到我被抓起來後，好多人，尤其是汪東興就說我在“八司馬事件”的時候，就已經是田家英的死黨了。到了文革結束，田家英又被鄧小平他們抬舉成了英雄。而我又變成迫害田家英的罪魁禍首了。其實，這兩者都離歷史的真實十萬八千里。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開始

1、從批判“三家村”到改組北京市委

1966年5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姚文元寫的《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的文章。同日出版的《紅旗》1966年第7期，發表了我寫的《評〈前綫〉〈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的資產階級立場》的文章。姚文元的文章是他在上海和江青、張春橋一起討論過的，主席也知道。我的文章則是與在京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陳伯達、康生、尹達、王力、關鋒等人一起討論的。因爲是登在《紅旗》雜誌上的重要文章，所以大家討論得非常認真。

在討論的時候，康生提出，要徹底批判鄧拓，就一定要聯繫他的歷史來批。他說，你們不知道吧，鄧拓是個叛徒。康生說，這是聽彭真說的，鄧拓在歷史上曾經被捕過，在受審的時候，他把共產黨的內部情況招供了。所以康生說，在我的文章裡要加上“鄧拓是叛徒”這句話，在場參加討論的所有人都表示同意。康生又對我說，關於鄧拓的變節問題，你要跟安部長（中央組織部的安子文）核對一下。於是，我就在康生那裡用紅機子給安子文打了電話，一位姓陸的秘書接的電話，她是個女同志，之前我們都認識。我說，我想請示一下安部長，現在《紅旗》雜誌編輯部在討論一篇批判鄧拓的文章，在文章裡要指明鄧拓是叛徒。這件事須要跟你們核對一下。我還說，這是伯達、康生提出來要核對的。隔了一天，陸秘書就打電話給我，她說，安部長已經看過檔案，據檔案材料，他在敵

人那裡是招供了，所以可以說是叛徒。但是在批判文章中提不提這個問題，這個要由中央來決定。我說，是要請示中央的，謝謝你的提醒。

這個稿子定稿出清樣以後，由陳伯達簽了名。然後就直接送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送上去以後，劉少奇、鄧小平和其他中央領導也都在清樣上畫了圈。我們特意在“鄧拓是叛徒”這句話下面加了橫杆，他們也沒有提出異議。清樣退回來以後，我問，還要不要請示主席？陳伯達、康生都說：不用了。安子文都說是了，劉少奇、鄧小平同志也看過了，都沒有意見，這就是通過了。

對鄧拓變節的事，當時我也沒有產生過什麼疑問。因為那次我和關鋒在彭真家裡的時候，談到了鄧拓的文章。我們都說鄧拓的文章寫得不好。彭真就悄悄地跟我們說，鄧拓以前叛變過，祇是沒有給黨造成什麼大的危害。本來八大要選他為中央委員的，是他自己給中央寫信，說他在歷史上有問題，不能當中央委員。

其實，我一開始對鄧拓的印象是不錯的。我在參加校對《毛選》的時候，知道在抗日戰爭時期，鄧拓在晉察冀邊區最早主持編輯過一部《毛選》。後來的東北版《毛選》主要是以晉察冀版毛選作為基礎擴編的。

對於鄧拓和吳晗、廖沫沙，在《北京日報》、《前綫》雜誌上發表的諷刺現實的文章，有的我贊成，有的我反對。而且早就寫過批評他們的文章（是發表在當時的《光明日報》上的）。他們不僅僅是在發牢騷，有些地方可以說是對黨和毛主席的攻擊，而且攻擊得很過分。鄧拓在大躍進期間擔任《人民日報》的總編輯，《人民日報》上大量登載了“放衛星”，“假高產”的消息和報道，他是有責任的。當然，當時在中央分管《人民日報》工作的鄧小平也有責任。毛主席早已批評鄧拓是“死人辦報”，就把他的總編輯撤了。這也可能引起了他對毛主席的不滿。

鄧拓在1966年5月18凌晨自殺。聽到這個消息，我馬上就想到，他是不是因為看到5月11日我的文章，受到了刺激，因而自殺的？可能有這個因素。但我後來知道，在這篇文章發表之前，他已

經寫過很長的東西，表示要自殺了。

文革被否定後，負責我專案的審判庭在準備審判我的時候，也把我這篇點鄧拓是叛徒的文章作為鄧拓自殺原因而定為我的一個罪名。我跟他們說，關於這件事的經過，你們可以問安子文去。他們去問了以後，安子文倒是說：有這事，戚本禹是來問過我們的，是我們跟他講鄧拓歷史上有過背叛行為的。當時他還請示過中央書記處，後來審判庭就把起訴書上的這一條拉掉了。

但是從我內心來講，對於鄧拓的死，我還是有責任的。我寫文章本來主要是批判他的錯誤，至於他個人的歷史問題應該歸組織上來管的。我這篇文章又不是批他個人歷史的。況且當年他招供時，地下黨的同志已疏散完畢，並未造成組織破壞。聯繫他的歷史問題批判他，是應請示毛主席老人家最後裁定。

有一次，張春橋跟我談起鄧拓。他說，對鄧拓的自殺，他是覺得很對不起他的。在晉察冀辦報的時候，鄧拓是張春橋的領導，一直對張春橋很好。春橋說，如果我先和他好好談一談，讓他思想上做點準備，先轉變轉變思想，也許他就不會自殺了。而且建國之後，江青和鄧拓合作過幾件事情，她對鄧拓的印象還好，給鄧拓打招呼，她也會同意。

姚文元和我的兩篇文章一發表，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就幾乎癱瘓了。劉少奇、鄧小平就此向主席提議改組北京市委，主席表示同意。至5月底北京市委完成改組，李雪峰成為市委第一書記，吳德第二書記、北京市代市長。彭真、劉仁都被撤職。鄧小平向主席推薦陶鑄來中央參加書記處工作並接管中宣部。同時，劉少奇他們還決定，亦經毛主席同意，派陳伯達帶人去接管《人民日報》，改組《人民日報》黨組。

大、中學校的學生對報刊批判“三家村”反應最快，他們在校園裡貼出了大字報，批“三家村”、揪“黑幫”。出現了文革運動的第一個熱潮。到6月2日，聶元梓的大字報廣播後，全國各大、中學校實際上都停了課，學生和老師都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中去了。

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剛起來的時候，必然會帶有某些盲

目性。學生們是一腔革命熱情，但是鬥爭的目的和目標究竟是什麼，他們大都不是很清楚。一些學校的領導，順勢把學校裡一些老師，在歷史上有問題的材料拋出去給了學生。於是，在校園到處都是學生貼老師的大字報，還到處效仿著抓本單位的“三家村”、“四家店”，並把一些老師當作了“黑幫”人物來進行批判、武鬥，甚至游街示眾，實行體罰。這應該是文革運動中最早出現的把鬥爭對象擴大化的情況。造成這種擴大化的倒不是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而主要是北京新市委和各地方的省市市委。

2、北京大學的第一張大字報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貼出了由該校哲學系教師楊克明起草、由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簽名的的大字報，題目是“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宋碩是北京市委大學部領導人，陸平是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彭珮雲是黨委副書記。大字報揭發北京大學黨委長期推行修正主義，壓制群眾運動，號召革命人民起來打破修正主義的控制，打倒修正主義分子。這張大字報不同凡響的地方在於它把鬥爭矛頭，直接指向了學校黨委書記和彭真為首的原北京市委，提出了“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思想！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這個指向與口號是符合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革命精神的，符合毛主席發動文革運動的鬥爭目標，重點要整黨內走資派。

這張大字報一出來，北京大學沸騰起來了，大字報像潮水一般汹涌澎湃，後浪推前浪。當天跟著貼出的大字報開始多為支持聶元梓等7人大字報的，後來反對的大字報逐漸占了多數。爭辯對立的雙方都情緒高漲，學校實際處於停課狀態。看到這種情況，劉少奇在一次書記處會議上說，北大現在根本沒辦法管了，再這樣下去，吃飯都成問題了，這都是聶元梓大字報惹的禍，整個學校要陷入無政府狀態了。可當時我到北大去看了以後，看到師生們都好好的在

那裡討論問題或寫大字報，食堂也好好的，根本不存在什麼“吃飯都成問題了”的情況。

那幾天，江青經常跟我通電話，詢問北大的情況。我把聶元梓等七個人寫的大字報在電話裡一字一句地讀給她聽。她問，小組（指中央文革小組）的人是什麼態度？我說，我們都支持。江青又問，怎樣支持？我說，因為還沒有同你商量，所以小組尚沒有人出面公開講話。但小組辦事組的曹軼歐帶人下去了，他們廣泛與學生聯繫，並公開表態支持廣大學生。可江青說，光曹軼歐去還不够，她又不知道多少情況。我說，她知道情況的，康生把北大的情況告訴了她。江青這才放心。這不久曹軼歐就來電話問我，對聶元梓的大字報應該採取什麼態度？我說，中央文革當然要堅決支持群眾大字報的，你是不是再去請示一下康生。曹軼歐說，就是他要我來問你的。因為康生知道，江青和我一直保持著電話聯繫。那時不用我打過去，江青會主動打過來問我情況，而且問得很詳細。

我從來沒有聽曹軼歐說過，是她去參與組織、策劃寫這張大字報的。楊克明在1966年7月曾給中央文革寫信，報告《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產生經過》，說了大字報寫作經過。一開始，是他和另一位哲學系的教師張恩慈，為寫大字報的事去找過曹軼歐，得到了曹軼歐的支持，回去以後就由楊克明執筆寫了大字報。楊克明在信上還說，他起草的這張大字報的底稿還在他那裡。我們派到北京大學的“快報組”記者回來也跟我說，這張大字報是哲學系楊克明等幾個青年教師一起寫的，寫好後，再請聶元梓等人一起簽名的。當時大家要聶元梓領頭簽名，這是因為當時的人組織觀念都很強，即使是起來貼黨委的大字報，也不能脫離黨組織的領導。這恐怕還是從1957年的整風反右鬥爭中得到的教訓。其實按照地位來說，聶元梓在當時應該屬於是當權派的。因為她自己認為受到了陸平等人的壓制，所以也起來提意見。結果大家就把她當作是領頭人了。其實，後來知道，聶元梓原本就是陸平幫忙把她提拔為總支書記的。但在北大四清運動中，聶元梓就成了批評陸平等

人的四清運動的積極分子。而彭真保護陸平，打壓北大四清運動的積極分子。文革運動前夕，聶元梓、楊克明等人都處於受壓受打擊的情形。所以，文革結束後又翻過來了，陸平對聶元梓恨得要命，對她報復得挺厲害。

等到這張大字報向全國廣播後，首先出名的就是聶元梓了。可是後來的事實證明，她是個思想雖糊塗但卻善於投機的人。在大字報上簽名的七人中其它任何一個人都要比她頭腦清楚。我認為最理想倒是支持楊克明寫大字報的原北大哲學系老師張恩慈，這個人懂哲學，有頭腦。在這張大字報之前，1966年5月5日，他就曾給毛主席寫過信，講了中宣部、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學四清運動中的問題。這封信是給關鋒看過的，張恩慈與關鋒在學術上有過合作，關鋒對他表示了堅決支持。關鋒把這封信交给了我，我看了這封信也覺得寫得很深刻，就把它呈送給了主席，毛主席從這封信中了解了北京大學很多情況。毛主席並在5月11日批示印發正在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將題目改為《張恩慈同志對北京大學“四清”運動的意見》。毛主席批示：“少奇同志閱後，印發有關同志。”

對北大運動的興起，劉少奇開始不怎麼很在意。他認為這是針對彭真和北京舊市委的。但他還是在5月29日主持召開了中央書記處的會議，來討論如何對待學生運動。鄧小平在會上講話，他認為學生運動出問題了，有一些人在攻擊黨，跟1957年的右派一樣。劉少奇當時倒沒說學生就是右派，他祇是說，一些學生的言論與右派沒什麼不一樣。會上的意見也基本上是跟著他們一邊倒的。連陳伯達都沒有怎麼講話，我們就更說不上話了。祇有總理說：我們當年搞學生運動也是有一點偏激的嘛，要讓學生講話，不要給學生戴大帽子。總理還具體地說，當年他在天津反對的校長其實是個不錯的人，但我們的大方向對，校長卻不對。實事求是地說，總理當時還是在袒護學生的，他在那個時候能說這話，是很不容易的。他講這話時那嚴肅的姿態我現在還記得。當然，總理也講了，陸平也是個好同志嘛！

當天晚上我就把這些情況向江青作了匯報。江青說，還是總理好。

劉少奇還決定派李雪峰到北大去講話。李雪峰講話內容，主要是要內外有別，不要亂搞。他的基本調子就是要控制住學生的活動。實際上，控制也難，你一控制，那就勢必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了，這樣矛盾非但不能解決，反而會更加激烈。李雪峰是來北京接替彭真的工作的。實際上毛主席對李雪峰是不大滿意的，他一直都是緊跟著劉少奇的。不過，李雪峰對我們文革小組的人倒很客氣，我對他沒有什麼壞印象。

5月27日，我們把登載著聶元梓他們大字報的《文化革命簡報》第十三期，用急件送去杭州給毛主席。其實在聶元梓這張大字報之前，好多地方已經貼出過很多大字報，其中也有馬列主義的。比如哲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吳傳啓等人，在5月23日貼出了批判哲學社會科學部政治部主任楊述的大字報，比聶元梓他們寫得還要早，但因為影響不大，所以沒有登上《文化革命簡報》。聶元梓他們批判的是中宣部、北京市委、北京大學黨委，大字報又是貼在北京大學校園內的大飯廳，這個影響就大了。

主席看了這張大字報以後，在6月1日中午就在我們報送的《文化革命簡報》上，以“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高度批示給康生、陳伯達：“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地報刊發表”，還說這樣做“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下午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將主席這個批示用電話傳回了北京。

在當晚向全國廣播聶元梓的大字報時還要配發評論。我跟陳伯達說，這個評論叫王力、關鋒一起來起草，他們出手快。陳伯達說，對，對！我馬上打電話通知王力、關鋒過來，我們很快就寫好了初稿，題目叫《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寫完之後又馬上用電話報告給主席。主席問過江青，《人民日報》的評論是誰寫的。江青問我，我說是關鋒執筆，陳伯達、王力和我一起討論的。聽江青說，主席說好，關鋒能寫得這麼快！1966年8月5日，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此文

時，毛主席又在文中加寫了一段批注：“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當無條件接受，而應該堅決抵制，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幹部對於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制。”

6月1日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就向全國廣播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和關鋒執筆的評論。6月2日北京和全國各報都全文刊載了大字報，和作為《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的《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經驗證明，要反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按照過往的辦法通過黨的正常的組織系統開會解決不行。所以，毛主席要尋找一種新的能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的方式來開展文化大革命，依靠革命群眾來打碎走資派掌控的官僚系統，破壞舊秩序，建立無產階級的新秩序。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向全國一廣播，就點燃了文革運動的熊熊大火，這種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的群眾鬥爭形式就開始形成了。

這張大字報的播發，使北京的各個大、中學校都轟動起來了，成千上萬的大字報象雨後春筍般地在校園中破土而出。幾天之後，不僅北京，而且是全中國的學校乃至工廠，各種反對修正主義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席捲中華大地。

1966年6月10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開的有各大區書記參加的會議上，向他們打招呼，主席說：“不要怕亂，右派搗亂也不可怕。大字報的打擊面寬了，可待日後區分、排除”。他還說，一定要在運動中“把左派核心建立起來，不要講資格、級別、名望，要依靠運動中涌現出的積極分子，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依靠這些人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這是毛主席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重要的講話。

3、關於《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發了一篇社論，

題目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所以要發表這篇社論，是因為按照劉少奇所主持的中央所作的決定（經過了主席的同意），從這一天開始，陳伯達帶領原解放軍報總編輯唐平鑄等人，組成了一個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接管了報社。

這篇社論是陳伯達主持起草的，並沒有給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人看過。也沒有給主席看過。按照當時中央的規定，凡是按照中央精神寫的《人民日報》的社論，祇要總編輯批准就行了，但《紅旗》雜誌的社論則必須經過中央書記處的審核。

這篇社論其實並不完全符合主席發動群眾進行文化革命，鬥爭重點是反對走資派的思想。在這個時候提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客觀上是把群眾運動的鬥爭矛頭，引向已經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壞、右”的身上去，這正迎合了黨內那些“走資派”的想法。所以這篇社論一出來，中央文革內部就有人提出，這次運動的大方向是反走資派，如果是橫掃一切，就是新、老反動派一起掃，戰綫太長，目標不明確，在實際操作上可能擴大打擊面，並從而保護了走資派。“四清”運動中，盡管毛主席衝破了劉少奇等人的阻力，在“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若干規定（即二十三條）”中明確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在劉少奇的主持下，還是把“四清”運動搞成了如“反右運動”一樣，把鬥爭的矛頭轉向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壞”和基層幹部。

陳伯達後來在他的回憶錄裡反思道，自己寫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犯了大罪。他的這種說法也是似是而非的。是的，毛主席在稍晚的7月8日給江青的信中也說到過要掃除“牛鬼蛇神”的話。可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句話本身並沒有錯。關鍵是毛主席發動文化革命的主要鬥爭方向，主要矛頭是指向黨內的走資派呢，還是指向已被打倒的階級敵人甚至是下面的群眾。文革運動把鬥爭主要矛頭指向誰，這正是毛主席與劉少奇、鄧小平之間帶有路線性的分歧。

4、許廣平受命批判三十年代文藝黑綫

1966年2月，與彭真他們搞“二月提綱”差不多同時，江青在上海組織了一個部隊文藝工作者座談會。會後出了一個《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個紀要3月先在黨內的上層作了傳達，4月10日下發全黨。在紀要中提出了一個“十七年文藝黑綫專政”的問題。4月初，江青在上海同我見面的時候，說起這個座談會並說周揚他們在三十年代是如何迫害魯迅的事。我平時跟許廣平關係不錯，我知道在解放以後周揚他們那些人還是不斷地壓制許廣平，而馮雪峰是一直在保護和照顧著許廣平的。許廣平對周揚很有意見，但是一直是敢怒不敢言。許廣平曾跟我說過，馮雪峰活著的時候對她說，周揚是黨在文化戰綫上的代表，以前的舊事就不要再提了。因此，我跟江青說，許廣平對周揚的意見最大，但不敢說。江青聽後說，那我們給許廣平打打氣吧！把魯迅批評他們的東西拿出來給大家看看。我說，這個事情我說不行，在許廣平面前，我是小輩，我的話影響不了她。我向江青建議，要不你去跟她談談？江青說，我和她不大見面，不熟。我說，這沒關係。我去跟她說，就說江青同志想見見你，有些問題想請教你，了解一些情況。江青說，那好，我也早想見見她了。江青還說起當年魯迅去世時為魯迅送葬的情形。她說，那時很多人抬著魯迅的棺材去下葬，我也去了，走在前面，一直走在抬棺人群的旁邊，可因為我是個女的，所以不能加入到抬棺的行列裡去。在追悼大會上，我見過許廣平。當時許廣平瘦得不得了，滿頭亂發，眼睛都哭腫了。我又說，許廣平年紀也大了，是否可以讓她兒子海嬰陪她來。這樣你也可以見見魯迅的後人，你還沒有見過她兒子吧，這個小伙子挺聰明的。海嬰跟我差不多大，他是搞無線電的，那時他在廣播事業局上班。他聽他爸爸的教導，沒做文學家。魯迅說文學不

能遺傳，不能靠血統。他擔心兒子搞文學會變成空頭文字家，覺得兒子還是去搞技術的好。

聽我這樣一說，江青很高興，就說，好。見一見，見一見，叫他們一起來，你來安排吧。

5月中旬，在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我到了許廣平家中，說江青想見她，徵求她的意見，她很高興。我說，因為您年紀大了，江青同志叫海嬰陪您一起去，路上好照顧你。她說，兒子要上班，怎麼辦？我說，沒事，我幫他請假。

就在他們出發的當天，我打電話給廣播事業局找負責人。秘書接的電話，他開始以為是群眾來電，就以領導工作很忙為由擋駕。我說，我叫戚本禹。他一聽就趕緊說，對不起，我不知道是您，我馬上去找。一會兒，負責人就來了，說，您是戚本禹同志？我說，是，我有事兒找您請假。他很驚訝地問，請假？請什麼假啊？我說，我給周海嬰同志請假。中央的同志有事情要找許廣平同志去上海，要海嬰陪他母親一起到上海去。我說，事情決定得比較倉促，昨天晚上怕打攪你休息，來不及跟你請假，所以現在我代他來請假。他說，沒問題的，中央有事情，我們應當配合。我說，那就謝謝您了。他說，歡迎你什麼時候到局裡來坐一坐，我說有時間一定去。

為了防止發生意外，我還特地安排了毛主席的衛士去送他們，一直把他們母子倆送上飛機。

許廣平見了江青，她們的談話經過，許廣平和周海嬰都寫有回憶。

許廣平回到北京後，就打電話來對我說：“我覺得很突然。以前他們都叫我不要反周揚。現在要我去批評他，我也是願意的。可文章怎麼樣寫？從什麼角度來寫？我不清楚。”我就跟她說，您可以談談“國防文學”的問題，那可是個大問題。她說，是。江青也跟我說“國防文學”是大問題。我說：周揚他們提出的“國防文學”跟魯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聽上去好像是兩個平常的口號，但是，“國防文學”是國家政權的思維，以蔣介石

為主，聽蔣介石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抗日的、是老百姓的思維，是共產黨領導的。這是有原則區別的。

三十年代，在國民黨統治區，我們黨內的大多數人都贊同周揚的“國防文學”，不贊同魯迅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共產國際也同意周揚的“國防文學”。而魯迅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國民黨就不接受，他們說一寫大眾的，就有紅的色彩了。共產國際也跟著認為這個口號不貼切。而毛主席卻支持了魯迅，說魯迅的這個口號提得好，‘國防文學’這個口號不好。

我還跟她講了一些具體想法。那時我已看過江青的《紀要》的文件了，我按照《紀要》精神跟她講的。許廣平把這些都記下來了。

許廣平沒花太長時間，就寫了一篇批評周揚的文章，題目是《不許周揚攻擊和污蔑魯迅》。在交稿的時候，許廣平還特地寫了封信給我，這封信倒還保存著，也是失而復得的。

戚本禹同志：

近日來看了許多報刊，不由得使人不激憤填胸，我身為文聯副主席之一，但不見文化界有何文件登出，職責所以，不甘緘默，曾託民主促進會代寫稿件，但秘書們祇會寫八股式不痛有癢文字，不合我口味，現特草書，請您務必分神看看能用與否？如能用的話，還請您大加斧削，至於究在何處發表，我亦一聽尊便，此致

敬禮！

許廣平

66.5.22

許廣平的文章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江青告訴我，毛主席看了，說寫得很好。而且毛主席還說：魯迅培養了一個好接班人。他教江青好好向許廣平學習。

我1968年1月被隔離審查後，因為我曾奉命去文化部調走魯迅手稿，移存於中央文革保密室加以保護，被江青誤以為是盜竊魯迅

手稿。後來事情都弄清楚了。

在2000年以後，具體的時間我記不清了。周海嬰，周令飛父子來上海，他們特意請我去吃飯，席上還有好多人。海嬰對我說，他母親許廣平當時聽人說，魯迅手稿不見了。非常焦急，心臟病都犯了。就寫信給中央。結果這件事弄得江青差點要槍斃你。後來知道了，你是根據中央文革的指示把魯迅手稿保護起來了。所以他們都覺得對不起你。席上，周令飛還鄭重地對我說，我代表我們全家向你表示道歉，為你平反。

我說，許廣平大姐為保護魯迅手稿而心情焦慮，是她忠誠於魯迅先生的表現，我至今仍然非常尊敬她。你們弄不清情況因而懷疑我，也很正常。更何況是江青聽了一些人的誤傳誤導，而作了錯誤的判斷的。一切都過去了，此事就不要再重提了。

第七章 中央文革小組及其辦事機構的組建

1、中央文革小組的建立

中央文革小組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後才正式開始工作的。我1966年5月初從上海回到北京，就已經在釣魚臺辦公了，但此時釣魚臺還是歸外交部禮賓司管理。因為那裡原先是用來接待外賓的，所以裡面的各種設施都是比較好的，餐廳的伙食也好，但價格要比中南海和人民大會堂都貴。

等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通過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和批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名單之後，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才正式在釣魚臺開始辦公。那時，中央文革在釣魚臺共占用了七個小樓。16號樓是中央文革小組主要辦公的地方。

我的辦公室在16號樓的樓上，王力和姚文元的辦公室也和我在同一個樓面。關鋒由於《紅旗》雜誌事情挺多，他和陳伯達一起在15號樓辦公。康生此前就住8號樓。江青住11號樓。總理也有一個小樓備用。張春橋住7號樓。王任重住在2號樓。劉志堅、謝鐘忠是部隊的，他們不住在釣魚臺。釣魚臺裡還有一個樓是最大的，那個樓曾經是赫魯曉夫訪華時住過的，所以誰也不願意去住，一直空著。那裡有一個大客廳，還有一個小的電影放映廳。總理、江青常使用。

中央文革小組一成立，首先要設立辦公室。開始陳伯達覺得穆欣很聽他的話，就提出讓他來當辦公室主任，後來又覺得穆欣辦事不力，他就打算改由曹軼歐來當主任。可康生說，她當主任不合

適。這個時候我就推舉王力來當主任，曹軼歐當副主任，曹軼歐一定要我也參加辦公室工作。陳伯達、江青同意了，由於我一直是在中辦做秘書工作的，所以實際上很多事情還是在那裡管著。

上任的第一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經小組組長陳伯達批准，向全國各省、市，中央各部委以及各有關部門發出通知，向他們公布了中央文革的辦公地點、電話、聯繫人。對軍隊方面，我們祇是通知了在北京的一些主要部門和領導，未通知下面。在所發出的通知中，要求他們每天把本地區、本部門有關運動的情況都報上來。光這件事就忙了我整整一天。那時不像現在，祇要在電腦上點擊一下就行了，而是要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地打電話、發函件，很繁瑣。但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這樣一來馬上就把中央文革小組和各地方，各部門之間的聯繫建立起來了。

通知發下去以後兩三天，各地的情況就都報上來了。來的基本上都是些告急的電話和報告。而且多是一邊倒，說學生怎麼把學校秩序搞亂了，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利用文革運動來反對黨的領導等等。

接到這些情況，我們就馬上派人下去了解情況。結果下去後了解到的情況，往往和各省、市、各學校、各單位領導報告上來的情况大不一樣，許多則是剛好相反。實際上許多地方是領導在壓制群眾，甚至整群眾。我經常和派下去的人直接通電話，以核實情況。在我們把情況收集起來並派記者作了初步核實以後，就把它上報給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

這些事情工作量都很大，最初的工作人員是我從中央辦公廳和馬列學院調過來的，王力也從中聯部調了幾個人過來。後來人手還是不夠，經主席、林彪、總理同意，又從軍隊調了些人過來，並且組建起了相應的機構。

2、中央文革小組的下屬組織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以後的一項重要任務，是要向毛主席和其他

中央領導人提供全面、及時，並且是準確的關於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情況。要做好這個工作，需要建立一個强有力的機構來工作，這樣才能把在全國的運動情況掌握起來。我們首先建立了“記者站”、“快報組”、“信訪組”、“保密室”等。這些工作都得到了陳伯達和江青等人的批准和支持。

隨著文化大革命在全國的迅猛展開，文革辦公室一個小小的機構，應付不了日益增大的工作任務。要了解 and 掌握全國運動的動態，就要從全國各地抽調更多的人過來才行。起先我們從《解放軍報》社調來了一批優秀記者，後來又從《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幾家大報紙調了一些優秀記者來參加工作。可就這樣人手還是不夠。後來又經過主席和中央同意，由楊成武從部隊選拔了一批人過來。這些人大部分是各個部隊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然後我再一個一個地挑選，最後確定下來了大約四五十個人參加了“記者站”、“快報組”。我又選拔了一位師級幹部徐學增來管理他們。從各部隊調上來的人都是模範標兵、戰鬥英雄，有好些人都是團一級幹部，所以得找一個有威信的人出來領導他們。徐學增雖然祇是個師級幹部，但他打過仗，還當過模範團的團長，他能壓得住。大家都聽他的指揮，有重大事情都會向他匯報。我不願意用級別太高的人，太高級別的，一般文化都不高，架子還大，幹不了什麼事情。用徐學增，我是和關鋒商量過的。關鋒也說，這個人寫東西不錯，組織能力强，要管這麼多人，不是隨便一個什麼人都行的，這個人正合適。

王力是辦公室的主任，所以由他來當“快報組”的領導人。

後來，“快報組”在工作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各地發生的一些大的事情，通過“快報組”，我們很快就能知道，而且可以很快了解和掌握各種突發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麼。可以說它是中央文革小組的耳目和神經系統。我們給“快報組”的所有記者分好工，哪個去四川，哪個去上海，哪個去雲南，哪個去貴州，哪個留在北京，都給他們明確下來。我還要求快報組所有成員，不論外勤內勤，都必須隨時準備加班。要24小時地應對突發事件。所以，“快

報組”人員一下去，全國各地的情況就上來了。而且跟過去不一樣，從“快報組”把情況匯總上來印出材料，往往祇要兩三個小時就完成了。所以一些地方發生重大事件的情況，祇要兩三個小時，就到了中央領導的面前了，這樣的工作效率和效果可以說是與戰時和地下黨時的情況差不多。一般來說，各地的領導和後來的群眾組織，祇要知道這是中央文革“快報組”來的人，都會對“快報組”的工作特別認真地對待，還會給“快報組”記者很多方便。

可是到1968年我被隔離審查以後，“快報組”的工作也受到質疑，江青他們又沒有時間去具體過問。這樣，那它實際上能起的作用我就知道了。

3、辦“快報”、“文革簡訊”，設立“中央文革接待站”

以最快的速度，抓最要緊的問題和抓準問題，然後把情況送給最關鍵的人，這可以說是我們工作的三大特點。“快報組”報上來的情况，怎樣才能及時地送到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那裡去呢？我原先在中南海搞過《群眾反映》和《情况反映》，後來這兩個刊物都沒有了。爲了讓主席和中央領導及時地了解情况。我們就搞了文革《快報》和《文革簡報》。

我先後找了靳耀南和程理嘉等同志來負責這件事。

靳耀南，當時已近50歲了，他是一個抗戰時期八路軍在山東開辟革命根據地時的老幹部；建國後當過地委書記，又搞過工業，後來被調到中南海“後樓研究室”的工業組。我在中央辦公廳“後樓”研究室時，和他一起臨時搞過關於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情况調查，所以彼此都很熟悉。靳耀南的政治水平很高，爲人又和藹，我和他相處得很融洽。這個時候我請他來幫助我工作，做我的秘書。我還和他打了招呼，雖然他資格比我老很多，但爲了革命工作，就祇好受點委屈了。他欣然接受，毫不介意，並在工作中給我出了很多好主意。我出去講話，哪些事情該注意的，他都會幫著我

把關。在社會上大搞“破四舊”的時候，一些地方興起了一股“燒書”熱。他馬上就跟我說，歷來的政治運動，毛主席黨中央都從來沒有提倡過“燒書”，此風不可長，你得去說話。於是，我就去作了公開的講話，制止了“燒書”風潮。紅衛兵運動起來後，有些情況很亂，一些較激進的“高幹子弟”、“革幹子弟”為主組成的老紅衛兵肆意打人、抓人、抄家，甚至還發生了一些打人致死的惡性的事件。這時候他就提醒我，你要去公開表態，說中央是有政策的，不能亂打人、亂抓人、亂抄家。不然以後這些事都會賴到你們頭上，因為大家都說紅衛兵是你們中央文革指揮的，人家都叫你“戚大帥”呢。我說我們中央文革的領導從來沒有哪一個說可以去亂打人的，甚至打人都沒說過，這些人怎麼這樣亂搞呢？他跟我說，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這些亂抄家、亂打人的人的後面，一定是有複雜的背景。所以我馬上出去作了明確的表態，不準亂抄家，不準打人、抓人。

可是有一次江青來我這裡的時候看到了靳耀南，她就找我去問這人是誰。我說是幫我工作的。她又問，是從哪裡來的。我說是“後樓”來的。江青聽了就說，“後樓”有不少人是劉少奇、楊尚昆的人，你能用嗎？我告訴她，這個人不錯，我很多工作上的毛病，他都會直言不諱給我指出。江青說，他年齡比你大那麼多，到底是誰領導他，還是他領導你啊。可能江青是覺得我年紀輕，還不太懂人，希望我調一個年輕人來，管得住。她擔心這些年紀大的幹部，政治鬥爭經驗豐富，我這麼個年輕人應付不了他們。我說，都是同志嘛。她一聽就說，路線不一樣，就不是同志，叫同志也不是同志。這樣，我祇好把靳耀南調到學習班學習去了。

1986年，我從秦城監獄出來後，靳耀南託人給我帶信，要見我。見面後他對我說，你是個好同志。我以前是怎麼看你的，現在還是怎麼看你。說起當年他被調走的事，他說，這不能怪你，我知道那是江青的主意。他還說，你也不能怪江青，那時候中南海到處都是楊尚昆安插的耳目。她能相信誰啊。

靳耀南被調走後，我就指定年輕人程理嘉來當我的助手。程

理嘉原來是《光明日報》的一個資深記者，這個人很有能力，幫我做了很多工作。我在出事之前早有預感，我想，我這裡的機要文件都交給程理嘉保管的，如果在我出事的時候，程理嘉還在我這裡的話，那他一定也會受到審查的。所以，我就安排程理嘉回報社去。我跟他說，你這裡的工作結束了，你還是回到原來的單位去參加運動吧。他很聰明，看到那時江青老是在找我的工作差錯。他說，你這是解放我。我說，來日方長，祇要我在，以後我們還是可以在一起工作的。後來我果然出事了，中央文革辦事組一共十幾個人，都受到了審查。祇有程理嘉，因為他已經離開了文革小組辦事組，就此躲過了一劫。文革結束以後他出任了《經濟日報》總編輯。

文革《快報》和《文革簡報》是分發給中央書記處書記以上的領導看的，一般都有編號。有些情況是直接向主席匯報的，這樣的簡報就不編號了，作為“臨時增刊”。有的甚至是用手寫的。後來，我又在辦事組的值班室辦了一個《要事匯報》，把一些剛發生的重要的事情在最短的時間裡匯報上去。這個刊物發送的範圍就更小了，有的祇送給主席一個人看，有時還加上林彪、總理和江青、陳伯達等人。

主席是一直看我們的《快報》和《文革簡報》的，並且還在上面作過很多的批示。主席要有什麼批示，我們也馬上把它登出來，讓其他的中央領導也很快可以看到。這樣一來，《快報》和《文革簡報》，就在很短的時間裡成了中央領導人手頭的一個重要刊物了。許多領導也漸漸地習慣了我們的“快”了，祇要我們稍有遲緩，他們就要嫌慢了。陳毅就很愛看我們的《快報》和《文革簡報》，每天起來就要看。記得有一次他一早起來沒有看到《快報》和《文革簡報》，就打電話來問是怎麼回事。一了解是已經在遞送途中了，他就放心了。

通過快報組和《快報》、《文革簡報》，使得中央文革小組不但可以及時地掌握全國的動態，而且也及時地了解了中央的情況。

隨著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展開，全國各地的群眾給中央文革寫來的信，也一下子就增加了許多，而且增加的速度非常快。各地有越

來越多的人上訪和告狀。為及時處理群眾的來信來訪，我就在中南海秘書室的基礎上又增加擴充了許多人進來，很多人也是從解放軍調來的，我讓一位解放軍的團級幹部楊鬆友來領導他們。我們還專門在中南海的西門設立了“中央文革接待站”，接待各地來上訪的群眾。毛主席還親自去了這個接待站接見過群眾。

4、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

1967年以後，中央文革小組的機構作了一次調整。分工負責的情況如下：

- 辦公室（王力、戚本禹負責）
- 文藝組（江青、戚本禹負責）
- 宣傳組（關鋒、王力負責）
- 理論組（關鋒、王力、戚本禹負責）
- 記者站（王力、關鋒、戚本禹負責）

1967年3月，又把中央文革辦公室改為辦事組，由從馬列學院調來的王廣宇擔任組長。辦事組是中央文革最關鍵的一個機構，它設有辦事組值班室：

- 長途電話組
 - 市內電話組
 - 《要事匯報》編輯小組
 - 會議組和打字室。
 - 辦事組還經常與記者站和信訪組（在花園村辦公）聯繫工作。
 - 信訪組下面設有：
 - 陳（伯達）辦信訪組
 - 江（青）辦信訪組
 - 文革辦信訪組
 - 《信訪簡報》編輯組
- 而“記者站”下面則設有各省市和中央機關的記者分站、北京

市記者組和快報編輯組。

辦事組雖然是由我和王力、關鋒分工負責的，所有的大事，都得請示陳伯達和江青，但實際上的領導是江青。江青規定，關鋒、我、王力一般情況下，每天都要到江青那裡去一次，王力特別重視此項制度，我和關鋒有時沒叫王力去，他還有意見，他很在意這件事。後來，事務愈來愈多，江青辦公時間又不穩定，無法每天去她那裡匯報工作。但江青有時間時仍然打電話要我們過去。總之，文革辦事組的工作她抓得最力。

由於我同時還兼任著毛主席的秘書，江青教我經常到主席那裡去。可我總想，主席若有事要找我，那我馬上就過去。主席不來找我，那我也不願意像汪東興那樣的，有事無事就往主席那裡跑。我自己的事情也忙得抽不出時間，無法經常到一組去。再說一些重要的事情我都向江青匯報了，她會去跟主席說的。這樣的安排我現在想來很後悔，如果我那時改變一下工作方式，多到主席那裡去匯報情況的話，那後來發生的許多錯誤也許就可以避免，春橋、文元在上海就主動地多往主席那裡去匯報情況，比我做得好。

第八章 劉少奇、鄧小平推行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劉少奇、鄧小平主持會議決定派工作組

從1966年6月1日晚，中央電臺廣播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後，全國上下都沸騰起來了。在各個大學裡，大字報鋪天蓋地，連中學都鬧起來了。每天中央文革小組電話不斷，哪裡出了什麼事情，發生什麼問題了，告急的電話接連地來。

爲了應對各種問題，中央也是接連不停地召開各種會議，研究對策，中央書記處差不多每天就要開一次會。由於我有責任協助童小鵬處理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的工作，所以中央開會，我都得去。會場布置、安排警衛等，雖有警衛局管，但秘書局也要關注。甚至連茶水供應也要過問，因爲來開會的都是重要領導，如果有人給你在茶水裡加點什麼藥，那就出事了。所以會議供應的茶水都是由中央辦公廳招待科的人員送去的，其他人是不允許進出茶水間的。別看茶水這個事兒小，世界上在茶水上出問題的大案就有好幾個。這些事本來都應該由汪東興管的，可是他經常不在北京。童小鵬，總理那裡也總有任務，就得我去過問了。

那段時間，白天我一般在中南海，晚上在釣魚臺。中央開會的時候就去懷仁堂。會議上最重要的事情是會議的記錄和簡報，中央指定王力和我負責。有緊要的事情，還要立即向主席報告。所以我要三個地方不停地來回跑。有一個司機整天都跟著我們轉。

由於運動中各種問題不斷，6月3日，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以及相關的領導，陳伯達、康生都參加了。

會議主要是討論劉少奇、鄧小平提出的，要不要向各大學派出工作組的問題。陳伯達在發言時提出，在當前這種形勢下派工作組下去，是不是好？但劉、鄧他們沒有理會陳伯達的意見，大多數參加會議的人對派工作組也都沒有表示出不同的意見。這樣會上就決定，要派工作組下去。在會上還特別提到了北京的北京大學、陝西的西安交通大學、上海的復旦大學、湖北的武漢大學、江蘇的南京大學、河南的鄭州大學等幾所大學，認爲這幾所大學的問題很多，被認爲是“右派”集中的地方。

至於工作組下去以後幹什麼？怎麼幹？會上同意李雪峰提出的關於開展文革運動的八條要求，讓工作組掌握。這八條要求是：

- (1) 大字報要貼在校內；
- (2) 開會不要妨礙工作、教學；
- (3) 不準學生上街游行示威；
- (4) 內外區別對待，不準外國人參觀，外國留學生不參加運動；
- (5) 不準到被揪鬥的人家裡鬧；
- (6) 注意保密；
- (7) 不準打人、謾罵人；
- (8) 積極領導，堅守崗位。

會議快結束時，劉少奇說，戚本禹，你過來。然後他就跟我講了這次會議的決定要向主席匯報，他明確地指明，文化大革命要“內外有別”，你要跟主席講清楚：“不準學生上街游行示威”，這一條你要跟主席反復講。並告訴主席，隨後我還有專門的報告給他。

那時主席和江青都不在北京。起先他們一個在杭州，一個在上海，不在一起。後來是有時候在一起，有時候又不在一起。但即使不在一起他們也是經常互通電話和信函的。江青曾對我說，我們在

外面，對北京的文革情況不是很了解。你是主席的秘書，你要經常跟他匯報情況。我說，我不敢經常給主席打電話，怕干擾他。江青說，那你就先跟我說，我看看哪一些應該講的，我給你轉達。江青是我的直接領導，同時她又是主席的五大秘書之一，因此我覺得要報告給主席的事跟她講比較方便，所以有事我更多地是先向江青報告的。有一次我向她報告說，我去北京大學等一些地方看了。那裡到處都是大字報、大標語、旗幟，有紅的、黃的、綠的，一派朝氣蓬勃的氣象，很壯觀。後來主席在他寫的“有所思”這首詩裡面，就有“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的詩句。我心裡就覺得偉大領袖與廣大群眾，真是息息相通啊。那個時候，我幾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電話，報告在中央文革和中央發生的事情。有時一天要通好幾次電話，有時是我打給她的，有時是她打給我的。

主席在那個時候對運動還沒有具體指示，對劉少奇、鄧小平決定要向學校派工作組，主席也沒有提出明確的意見。祇是通過江青在電話跟我說，叫陳伯達、康生、關鋒、王力和我都要經常去學校看看，了解一下運動的進展情況。把我們所看到的學校發生了什麼事情都告訴他。

2、工作組壓制積極參加運動的學生

被派到北大擔任工作組組長的張承先，原是河北省的省委書記。他帶的工作組，是在6月3日中央會議結束的當日就進駐北大的。隨後幾天，又有更多的工作組被派到了各個大、中學校去。

工作組下去以後，很快就開始約束和壓制學生自發參加與組織各種革命活動。對工作組的一些作法，一些學生認為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向工作組提出了不同意見，於是工作組就對這些學生進行打擊。

按照江青傳達的主席指示，我和關鋒、王力幾個人就經常抽時間到各個學校去跑，我還抽空去過工廠，去看那裡的大字報。我

去了北航、地質學院、清華、北大、輕工學院、礦院以及二七機車車輛工廠、首鋼等單位。開始時我是帶著秘書、警衛，穿著軍裝去的。後來帶著“快報組”的人一起去，也有的時候就是我一個人帶著司機去。因為那時認識我的人還不多，我可以隨便地到處去看。各學校大字報很多，看大字報的人也很多。我祇是看，不跟別人交談，所以也沒人來理我。我聽說聶元梓大字報廣播了以後，他們七個簽名的人這時也分裂了。我就專程去北大看了，可北大太大了，大字報到處都是，我來不及仔細查找，但我看到了不少給工作組提意見的大字報。

每次看完大字報回來，我都要向江青匯報。我向江青匯報，看到一些因為給工作組提意見、遭到工作組打擊，甚至工作組組織人開會鬥爭學生的情況。江青就說，這個工作組怎麼不聽毛主席的話，這不是在打擊學生嗎？派工作組下去是去打擊學生的，不起什麼好作用啊。你們為什麼不在開會的時候提出意見來呢？

可是說實話，在那個時候我們能提出什麼意見啊，連陳伯達發言都沒有人聽。那時的中央文革小組在中央裡能有多大發言權呢，就幾個寫東西的秀才。在中央的會議上，也祇是做做記錄。

江青跟我說，“五四運動”是學生自己發動的運動嘛，就沒有工作組嘛！“一二九運動”也沒有工作組嘛！要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這是毛主席說的。江青說，我就不贊成派工作組下去跟學生搞對立。我把江青的這個意見跟陳伯達說了。陳伯達就問，這是不是主席說的？我說，我祇是聽江青說，但我想江青說的這些話，一定是問過主席的。陳伯達也認為是這樣。

於是，陳伯達在接下來召開的中央會議上，講了這樣一些話：是不是不要再派工作組下去了，讓群眾自己選舉一個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來領導自己。我們可以在旁邊引導，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行不行？工作組去了以後，發生了一些和群眾對立的事，還不如讓群眾自己來領導自己好。可那時陳伯達還祇是一個政治局候補委員，是剛上任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在那些參加會議的大人物面前，根本不算一回事。加上他講話聲音小，又是福建土腔，囁囁嚅嚅的，許

多人也沒有聽懂。所以，陳伯達講完之後，沒有人響應他，也沒有人駁斥他。劉少奇雖然顯得不耐煩，但總算沒有打斷他；鄧小平在他講話的時候，則連頭都沒抬一下。所以後來陳伯達很委屈地說，我祇是個小小的老百姓，連講話都沒人理睬。總之是會議沒有理睬陳伯達的意見，繼續往各學校派工作組。

後來工作組壓制群眾的情況愈演愈烈了。我們中央文革的幾個人就向劉少奇提出，學校出現的壓制學生的情況是不正常的。但劉少奇認為那是正常的。劉少奇對我們說，群眾要給黨提意見，黨是歡迎的，要鼓勵他們。但有些情況不對啊，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是在乘機反黨啊，我們就是要利用這次文化大革命，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渾水摸魚的人都抓出來。有個材料，說有個人利用大字報攻擊領導，講的東西都很尖銳，也不署名，結果一查是個歷史反革命。這個就是劉少奇他們一貫的邏輯，以偏概全，抓住群眾運動中混入的個別壞分子，來作為鎮壓群眾運動的借口。在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中是這樣，在“四清”運動中也是這樣。在這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他們又故伎重演了。他們的目的主要並不是為了抓什麼壞分子，他們真實的目的是用這種方法壓制群眾，以免自己遭到群眾運動的衝擊。

3、劉少奇批轉《九號簡報》實行白色恐怖

工作組派下去以後，不去領導學生批判“二月提綱”、鬥爭走資派，卻反過來去鬥爭學生、鬥爭群眾，很快引起了學生們強烈的不滿。在一些學校裡出現了工作組與學生的衝突。陝西省委打電報過來反映，說西安交大有一些學生在底下秘密策劃，準備有組織、有計劃地向黨委和工作組發動進攻。聽到這個消息，劉少奇發火了。他立即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在全國範圍進行“反干擾，抓游魚”。

劉少奇、鄧小平很喜歡使用他們新提出的“反干擾”、“抓

游魚”這些新名詞。我親耳聽到劉少奇說過“反干擾”、“抓游魚”，印象很深刻。他說，毛主席在反右派時的講話裡講過，“一條游魚三個浪”。游魚本事很大，能在深水中翻騰，把水弄得混濁一片，波浪起伏。劉少奇又進一步作了發揮，他說，一條游魚能起三個浪，那是因為漁翁懶，漁翁的職責是抓魚，把游魚都抓了，水就清了，浪就沒了。各大學校都有游魚，抓了它們就行了。不去抓游魚，不去抓搗亂的人，他們就會搞得你翻天覆地。劉少奇說的游魚，指的就是造反的師生，他認為他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

劉少奇的講話很快就用紅頭文件發了下去。這個文件沒經過我，是童小鵬經辦的。陳伯達說他也不知道。於是各地的工作組馬上統一腔調，說什麼一條游魚三個浪，把游魚抓出來，不讓它跑掉，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鑽進革命隊伍內部的壞分子。這樣，一場剛剛轟轟烈烈地發動起來的革命群眾運動，立刻就變成一次全國性的反干擾、抓游魚、反右派的運動了。而且一下子就搞得聲勢很大。因為1957年有過一次反右派的經驗了，所以他們對於怎樣把學生打成右派，已經駕輕就熟，都很有經驗了。

全國第一個“抓游魚”的高潮大概是在1966年6月10日前後出現的。最早受到打擊的造成較大影響的，是西安交通大學的學生李世英。李世英被抓了“游魚”，並被戴高帽游鬥後，於6月9日中午跳樓自殺（獲救）。毛主席後來曾說，李世英是西安的學生領袖，當時他的影響超過了蒯大富。

“抓游魚”的第二個高潮出現在6月18日之後。6月18日上午，在6月16日《人民日報》南京大學批鬥匡亞明的消息，和社論《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的影響與鼓舞下，北京大學的學生和教職員工在校園內，自發地起來批鬥了一些在文革初期被揭發為修正主義的領導幹部和反動學術權威。有些會場發生了給挨批鬥者戴高帽、塗黑臉的現象；有的會場上還發生了扭打現象，但很快就被與會的群眾所制止。本來這些現象在群眾運動初起時是難以避免的，而且也是不難糾正的。但是北京大學工作組卻搞出了一個

《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在這個簡報裡，他們用片面、誇大的方法，歪曲地報導了事情的經過，說當天上午北大所發生的群眾批鬥會不僅存在嚴重的亂打亂鬥，而且“還很有可能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是“反革命黑幫和一些新生反革命分子相結合，對我們發動的一次突然襲擊”。工作組領導人張承先號召組織力量進行追查、反擊。張承先他們在學校開會追查了三天，但除了查出在參加運動的人中間，有一個歷史上當過國民黨軍隊連長的工人，和幾個有盜竊或流氓前科的工人、學生外，並沒有查出任何一個反革命分子。可就是這麼一個簡報，劉少奇卻把它作為“反干擾，抓游魚”的依據，迫不及待地將“簡報”上加上一個批語：“現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發給你們。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以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劉少奇的這個批示與《九號簡報》，不經主席批准就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轉發給了全國。這實際上就是要全國各地學習北大工作組，嚴厲打擊革命群眾的革命行動。

這個中央文件的批發的時間為1966年6月20日，這時距離6月18日北大事件的發生才兩天，距離北大工作組的“九號簡報”送到中央各同志的時間還不到一天。

在6月20日的中央文件發出以後，各學校工作組就有了尚方寶劍，全國各地都出現了批鬥學生和群眾的高潮。在這前後五十多天的時間裡，大批學生、群眾被工作組打成了“右派”、“反動學生”和“反革命分子”。北京、陝西、江蘇、湖北等地，數以千計的學生和教職員工被工作組揪鬥和關押，甚至遭到逮捕。在批鬥的時候還給他們戴上了高帽子。各地發生的跳樓、跳井、臥軌、上吊的事件接連不斷，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我們中央文革小組不斷在簡報中向中央反映，各地有多少學生被鬥，這個省抓了多少人，那個省又抓了多少人。還不斷有學生自殺的消息傳來，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西安交大、湖北大學都發生

了學生自殺的事件，也有工人自殺的。

派去北京地質學院了解情況的同志來匯報說，地質學院的工作組把一些學生和群眾關押在一個曾經存放過放射性物質同位素的地下室裡。我一聽，趕緊帶人跑去看，結果我們的車到了校門口，門衛不讓我們進去。說是為了防止學生串聯，工作組不讓任何人隨便進出學校。我拿著《光明日報》記者證給他們看，他們說如果你是黨報的記者，那還可以。《光明日報》不是黨報，不行。於是我就只好回去再換上《人民日報》的記者證，這才讓我進去。進去一看，裡面的學生被鬥得很慘。他們都不敢見記者了。你一見記者，工作組就要來追查你給記者講了什麼。但我們總算把工作組將一些學生關在原來存有放射性物質的地下室裡的這件事查清楚了，確有其事。

清華大學的情況更是劉少奇直接幹預指導、鎮壓不同意見學生的典型。1966年6月19日，劉少奇派夫人王光美去清華大學，出任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實際掌控了清華大學的文革運動。因蒯大富貼出懷疑批評工作組的大字報，蒯大富和他所在化902班被工作組關注。因工作組說王光美要來化902班聽取意見而後又未來這件不大事件，竟引發了一場長達25天的反蒯運動。工作組提出“反蔣（南翔）必反蒯”的口號，在王光美的指導下，有700多名師生受到批判打壓，多人被逼自殺。反蒯運動中，工作組將蒯大富隔離關押，剝奪其人身自由。蒯大富抗議無效，被逼絕食反抗。蒯大富多次向毛主席、黨中央寫信申訴反映清華文革運動的情況。

4、江青叫我們去支持學生

我看到了蒯大富的信，又看了記者關於清華文革運動情況反映的材料，感覺清華文革運動好像是一種白色恐怖。響應毛主席、黨中央號召，積極投入文化大革命的學生，因為懷疑批評了工作組的一些做法，就被關押批鬥，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甚至被

逼絕食，被逼自殺。清華的一個青年教師被逼服農藥自殺了。一個同學臥軌自殺失去了雙腳。

當我把這些情況匯報給江青的時候，江青就批評我們，說把你們選進中央文革，你們怎麼不起作用啊？我說，他們都是大人物，我們人微言輕啊。她說，人微言輕也要有言，你們應該起來反對。我說，我們反對有什麼用。陳伯達在會上說了，可人家理都不理他。她說，你這是“奴隸主義”。我接受了江青的批評，心想，那好，奴隸起來造反了！大不了再來一個“八司馬”。

我去和王力、關鋒兩個人商量，請他們去清華見蒯大富，了解清華文革運動情況。我對他們說：王光美跟我比較熟，我一去她就會打電話來找我刨根問底的。你們去了，她就不好給你們打電話了。王力開始還有點顧慮，但關鋒卻很積極。他說：他們放著走資派不鬥，倒把學生給關起來了，這不行。7月22日，王力、關鋒就去清華找蒯大富談了話。王力這個人，臨場發揮的能力很強。他卯上勁兒的時候，說起話來慷慨激昂，這一點他比我們都行。他們去了之後，見了蒯大富，聽了他的申訴。當時就表示了對蒯大富的同情與支持。當天陳伯達也到了北京大學看大字報，了解情況。而當時，王光美知道中央文革來人見了蒯大富，就發火了，她打電話追到中央辦公廳，問是誰去接見蒯大富的？她說，蒯大富干擾毛主席的路綫，你們去支持蒯大富，你們這是在干擾中央的“反干擾”。

聽了江青的話後，我也再去各大學了解情況。當我去輕工學院的時候，一到那裡，就看到貼在學院外面的滿是“抓游魚”的大字報。我就跟工作組的人說，你們怎麼這樣給學生貼大字報，文革的大方向該是鬥走資派，學生哪裡是什麼走資派啊？工作組的人說，他們是壞人。我說，哪有那麼多壞人啊，學生絕大多數都是擁護毛主席的，怎麼變成了壞人呢？。即使裡面確實有一兩個壞人，那也可以放在運動的後期進行處理的。怎麼能把那麼多學生都說成是壞人呢？

本來我到各個學校去看大字報的時候，學生們都不認識我。但在輕工學院的時候，被汪東興的女兒汪延群認出來了，她當時

在輕工學院讀書。她跟學生們說，戚本禹來了！好些學生就上來圍住我。有的說，中央文革來人了。甚至還有人說，是毛主席派人來了。他們問我對“抓游魚”大字報的看法。這個時候，我就跟學生們說，我是來看大字報的，不能說是毛主席派我來的。不過，我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人員，我可以說說我個人的意見。我說，毛主席說過“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你們學校現在卻到處在抓“游魚”，誰是“游魚”？學校的革命師生不是“游魚”。我就簡單說了這麼幾句話，學生們就都知道我的態度了，一下子就在學校裡傳開了。多數學生擁護我的講話，說戚本禹反對抓“游魚”。他們還把我的講話抄成了大字報到處去貼，讓更多的人能知道。

這樣一來，我的表態就和薄一波發生衝突了。薄一波當時在中央管工交口的運動，輕工學院恰好是他在運動中抓的一個點。我去輕工學院的前兩天，薄一波剛去那裡看過大字報，他看了以後表態支持工作組“反干擾，抓游魚”。稍後，薄一波就在一次中央開會的時候不點名的說，有的人在群眾面前輕易表態，和中央的精神不一致，造成了學生思想的混亂。

我把我去輕工學院的事報告給陳伯達，陳伯達跟我說，你以後少說話。我心想，不對呀，前天我在向江青匯報這件事情的時候，她還批評我奴隸主義呢。我權衡了組長、副組長的不同指示，覺得還是江青愛護青年學生。所以我想，應該按江青的意思辦。

就這樣，我和王力、關鋒等人都繼續分頭到各個學校去支持學生。王力、關鋒去清華接見蒯大富，我去地質學院支持朱成昭，我還叫林傑去北師大支持譚厚蘭。我也經常去北大看大字報，有時候是和曹軼歐一起去。曹軼歐把我向北大的學生作了介紹。聽曹軼歐這麼一介紹，那些受壓制的學生都知道了中央文革小組是支持他們的。所以他們有什麼事就都來找我們。

其實，我當時之所以會同情並支持學生，還因為這類事我自己也親身經受過。1958年中南海發生的“八司馬事件”，就是因為我們幾個人給領導提意見，結果差點被打成反黨集團反黨分子。是毛主席親自解救我們的。我思想深處，有根深蒂固的革命造反情結。

第九章 撤銷工作組

1、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

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以73歲的高齡，在武漢長江裡暢游一個多小時。7月18日毛主席從武漢回到北京。他一回來，就住進了釣魚臺的12號樓。當天，徐業夫通知我，讓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去12號樓開會。

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和我等人去了以後，主席和我們一一握了手，隨後就讓我們把前些日子所看到的，和了解到的情況跟他匯報一下，一些已經向他匯報過的情況他也還要我們都再講一遍。在我們匯報的時候，主席對北大發生的6·18事件特別關心，還特別關心劉少奇對“九號簡報”作的批示發下去以後，學校所發生的死人事情。他聽得很仔細，反復問，是真死人了嗎？我們說，是真死人了。他就問，怎麼死的？我們回答，清華有一個青年教師被逼服農藥自殺了，有的是跳樓、有的是臥軌等等。主席聽著聽著，表情顯得很凝重。看得出來他對學生的死非常難過。這時張春橋把北大的“九號簡報”和劉少奇批發的中央文件送給毛主席看。主席看後說，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現在才明白有一個司令部。

在我們匯報的過程中，我看到徐業夫進來，他到主席那裡不知說了什麼，又馬上出去了。後來聽說是劉少奇要來見主席，因為主席在同我們開會，要他先回去了。這件事是不同尋常的，恐怕對劉少奇的打擊很大。因為以前劉少奇要見主席，是隨時可以見的。後來謝富治也跟我說起，主席是劉少奇都不見，先見了你們。

2、鄧小平不同意撤銷工作組

江青是7月20號回到北京的，她一回來就跟陳伯達交換了意見。然後由陳伯達在釣魚臺16樓主持開了一個文革小組的會議。江青在會上提出，我們是不是向中央建議撤銷工作組？陳伯達雖然有點猶豫，但還是表示了同意。我們全都同意江青的意見。

在接下來7月21日劉少奇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陳伯達提出，許多工作組以黨中央的代表自居，但其實他們並不比學生高明多少。有些工作組因為整群眾，而遭到了群眾的強烈反對。所以我們現在不如先撤銷工作組，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陳伯達發言的語氣很軟，有的地方簡直都是在哀求。劉少奇他們還是沒有理睬他。後來江青批評陳伯達，你這是“跪著造反”。

在會上，很多人都不同意陳伯達的意見，認為高校運動剛剛開始穩定下來，怎麼就要把工作組給撤銷了，撤銷工作組就等於把前面的工作給否定了。這時，總理說，陳伯達所說的要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是否可以試行一下呢？工作組不了解情況，整了學生，很多提意見的學生受打擊，有自殺的，這種情況已經很嚴重了，是不是先緩和一下？總理又指出，工作組也是派得太匆忙了。工作組不了解情況，就會幹出不理想的事情來。讓他們先撤出來，讓群眾自己先搞一段時間，看看，然後再說。

總理說得比較委婉。陳毅也在會上說，不如讓學生自己搞搞看，讓他們自己搞，無非就是亂一點，亂了，我們再去，或許就好一點。陶鑄支持陳毅的想法。當時就祇有總理、陳毅、陶鑄講了這麼幾句話，其他人沒有講這樣的話。李雪峰堅決反對撤銷工作組，他說，派工作組去學校，問題不大，工作組解決了很多問題，使得局面穩定下來了，不能祇看到一點問題就撤！

這天的會議沒能做出決定，第二天7月22日接著開。陳伯達又在會上提出撤銷工作組的問題。這時，鄧小平發威了，我原來還不

知道鄧小平這麼厲害。他聲音很大地說，我看工作組問題不大！沒有工作組的話，下面還要亂，還會出現更加無政府的狀態。然後他很激動地批評了陳伯達，陳伯達一句話都不敢吭。在這次會上劉少奇倒沒有講多少話，講得最凶、音調最高的是鄧小平。最後他發脾氣了，忽地一下站起來，用手指點著桌子，大聲地駁斥陳伯達。這是我進中南海十幾年，第一次看到鄧小平脾氣那麼大，他雙手叉著腰，質問陳伯達，你們搞過群眾運動沒有？沒有政策搞什麼運動。你見了風就是雨？黨中央的決定，就這樣否定了？誰也沒這麼大的權力！他說話的口氣很重，所以大家都不再說話了。總理也沒有再講話。按一般程序，這就算大家都同意了鄧小平的意見，這也就意味著會議決定不撤銷工作組了。為什麼鄧小平後來被稱為第二號走資派呢？就這一幕，他也是够資格的。

3、毛主席下決心撤銷工作組

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後，對北京發生的事情沒有立即表態。在大約一周的時間裡，他看了很多材料，尤其是北大、清華、北師大的材料。聽江青說，主席看了那些材料以後心情很不愉快，說過大致這樣一番話，看到群眾運動一下子由熱氣騰騰變得冷冷清清，學校的大門都關了，心裡很難過。有些學校的工作組明目張膽地鎮壓學生運動。歷史上什麼人鎮壓學生運動？祇有北洋軍閥、國民黨。這是很大錯誤，方向性的錯誤。要趕緊扭轉，北京大學的工作組看到學生起來給黨委提意見，就出來立規矩、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什麼正軌？其實是邪軌。有的工作組給學生戴反黨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工作組現在變成了革命群眾運動的阻礙了，要改變這種作法，撤出工作組。你們要下去，到群眾中去看一看，去兩個鐘頭也好，不要老坐在屋子裡，下去頭腦就會清醒一些。把工作組撤了，讓黑幫停職反省。讓這些學生、老師中的革命派，加上中間派的人也參加一部分，組成文化

革命委員會，自己來搞文化革命鬥爭。鬥什麼？鬥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有鬥爭反動學術權威。對吳晗、翦伯贊這些人誰更了解他們一些？還是革命群眾。像工作組那樣搞是搞不出什麼名堂的。鎮壓學生運動是沒有好下場的，北洋軍閥、國民黨不是都失敗了嗎。江青向我們轉述了主席的話，我們感到心情沉重。從主席的話裡，我聽出來主席這時已經對江青、陳伯達、康生提出的撤銷工作組的意見進行了鄭重的考慮，並已經有了決定了。

1966年7月24日上午，在釣魚臺12號樓，主席接見了中央文革全體人員。陳伯達、康生、陶鑄、江青、張春橋、尹達、王力、關鋒、我、穆欣都參加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向主席匯報了情況，主席講了話。我當時有個記錄，後來被汪東興他們抄走了。

毛主席在講話中，主要講了要撤銷工作組，讓群眾自己來搞等內容，同時還說了許多鼓勵我們的話。他說，中央好多部，沒做多少好事，書記處也不行了。你們文革小組，是代表群眾的，做了不少好事，群眾最擁護你們，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現在群眾擁護戚本禹、關鋒他們，不聽自稱代表黨中央的工作組。主席還引用了一句古語“天下人不之丹朱而之舜”，意思是說現在群眾有問題找中央文革，不找劉少奇、鄧小平他們了。主席之所以表揚我們，是因為我們在學生受壓制時公開表態支持了學生。

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除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外，西北的劉瀾濤，西南的李井泉，華北的李雪峰，東北的宋任窮，中南的王任重，華東的陳丕顯等各大區書記都參加了。在這個會議上，主席講了話。主席在講話中繼續批評工作組壓制文化大革命運動。特別批評了西安交通大學的工作組，批評他們不許群眾向中央反映情況，不準他們打電報給中央文革。主席說，要允許群眾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寫信給中央。凡阻礙運動的，統統驅逐之，你阻我驅。我們提出撤銷工作組，是代表廣大群眾的意見的。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起來鬧革命。

主席還說他回到北京一個星期，前四天傾向於保張承先（北京大學工作組長），後來不贊成了。張承先的工作組、清華工作組都是起

阻撓革命作用的。主席還說，不準包圍報館，不準包圍省委，不準包圍國務院，不準到中央來，都是阻礙革命運動。天天忙於日常事務，不下去跑，沒有感性知識，怎麼指導運動！毛主席說全國90%以上的工作組都犯了方向性的路線錯誤，建議中央下令撤銷工作組。

主席這次講話非常重要，表明主席已經下了要和劉少奇、鄧小平的錯誤路線鬥爭到底的決心。而且主席的態度非常鮮明，在接見我們之前，他雖然反對壓制群眾，但還沒有正式提出撤銷工作組。主席決定重要事情的時候，特別是和劉少奇鬥爭這樣重大問題，他會找很多人來談話，看很多資料，考慮很多問題，然後才下決心的。他的這次講話，向我們明確表態反對派工作組，而且認為派工作組出了這麼大的問題，劉少奇、鄧小平應該負責。主席還說，召開派工作組的會議的時候，我不在。是他們主持的，我不知道。怎麼搞成這個樣子？他又對我們說，你們都應該到群眾裡面去，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

聽了主席的講話以後，我跟關鋒說，我們倆應該寫一篇文章了，把主席最新的精神表達出來。於是，我們寫了一篇《信任群眾，依靠群眾》的文章，作為《紅旗》雜誌社論發表了。這個文章發表後影響很大，學生們都把文章裡面重要的話做了摘錄，抄寫成大字報貼出來，後來人民出版社還出了單行本。

主席的表態，是一個重大的轉折。在這期間主席還有幾個重要講話，有些我記不準確了。好像是劉瀾濤還是誰，曾整理過一個材料，裡面有主席在這個時期的多次講話，其中包括接見大區書記時的講話，比較全面，可惜我找不到了。我記得這段時間，我們每天晚上不是跑各個大學，就是參加各種的會議。每天每人要工作差不多18個小時，很緊張。

4、陪劉少奇去建工學院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江青、陳伯達都到北大等學校去看了大字

報。聽說主席自己也在一個凌晨悄悄地去北京大學看了大字報。主席對劉少奇他們說：中央文革現在都下去了，你們是不是也應該下去，搞點調查研究，跟群眾在一起，聽一下他們的意見？

1966年7月25日以後，中央領導就分頭到各大、專院校和中學去。總理去清華和第二外國語學院，鄧小平去人大，江青到北大，我和關鋒到地質學院、北師大，王力到中學。

劉少奇選擇了建工學院，他讓中央文革派一個人跟他一起去。他先叫陳伯達去。陳伯達一看劉少奇挨主席批評了，他哪裡還敢和他一起去啊？但劉少奇當時還是國家主席、黨的副主席。他也不敢得罪他。於是他叫王力、關鋒去。可他們都說晚上有事，去不了。陳伯達就對我說，沒辦法了，祇好你去了。我也不願意去。我說，江青叫我今天晚上跟她一起到北京大學去，我答應了，不好改。陳伯達就說，江青那邊，我幫你去請假，你今晚就不要去北大了。劉少奇這邊，他要中央文革去一個人。他是中央的副主席，他說要人去，我們一個人都不去，我怎麼交待？你必須去，沒有商量。我沒辦法，祇好去。

第二天，中央文革開小組會，江青知道我跟著劉少奇去了建工學院，向我發了火。她說，你怎麼跟著劉少奇去建工學院？不是說好跟我一起去北京大學的嗎？我說，我是說好跟你去北大的，但是陳伯達一定要我去建工學院，他說他負責幫我向你請假。她說，他什麼時候替你跟我請假了？問陳伯達，他又是照例地裝糊塗，說他忘了有這事。還好關鋒在邊上給我作了證，說的確是陳伯達要老戚去建工學院的，老戚說，他已答應江青同志一起去北大。江青知道了事情經過，就反過來批評了陳伯達。陳伯達說，既然這樣，那就不要去了。後來主席聽江青說了這事，說，你們當初答應讓戚本禹陪著去是不對的，現在答應去了而又不去，那也是不對的。江青從主席那裡回來，向大家傳達了主席的意見。大家都認為，主席說的對，我應該繼續跟劉少奇去建工學院。

果然，在我陪著劉少奇他們再一次去建工學院時候，就受到了建工學院工作組有組織的圍攻。在開會的時候，工作組的人就說我

支持反動學生，支持反動言論，對我進行上綱上綫。還把他們聽來的我在輕工學院說過的話拿出來批駁。陪同劉少奇一起去的余秋裏也指責我，說，派工作組是我們黨的重要工作方法，在抗戰的時候就已經這樣做了，這有什麼錯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就不得不同他們進行辯論了。我說，派工作組是個形式問題，它本身是無所謂對和不對的。關鍵是看你派的工作組去做了什麼。學生們的行動都是響應黨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工作組一進去就在學生中間“反干擾”、“抓游魚”，要把響應中央號召、起來革命的學生打成“右派”、“反動分子”。現在這些大標語都還在，這些難道是對的嗎？

這時劉少奇出來講話了，他首先批評了工作組，說你們的工作是有不少缺點和錯誤的。在劉少奇講話時，下面鴉雀無聲，一個個都在作記錄。然後劉少奇又替我說話了，他說，我批評你們，你們都沒有什麼意見，為什麼戚本禹批評你們，你們要這樣對他呢？他雖然是一個年輕人，但他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嘛。你們這是什麼態度？有意見可以好好說嘛。

隨後，劉少奇又在私下裡對我說，有些情況你當時應該跟我們說嘛，你又不說。我說，伯達同志不是在會上都說了麼。我還具體地說了陳伯達在什麼時候，說了些啥。劉少奇聽了也不響了。但我知道他其實是在怪我没有把主席那裡的反應跟他事先通通氣。可是，主席沒有交代讓我跟他說的事，我怎麼能跟他說呢？我若主動去跟他說，那不就犯了和田家英一樣的錯誤了麼。當然，當時如果他來問我的意見，那我是可以跟他說的，但他又沒來問我。他那時一心“反干擾”、“抓游魚”，精神亢奮，偏聽王光美和那些大人物的。我即使跟他掏心窩子說實話，他也聽不進去呀，弄不好再打我個“八司馬”。

我在這個會上的講話後來不知怎麼被傳出去了，第二天學生就把大字報貼出來了，說他們擁護戚本禹，反對工作組。還有些很偏激的大字報說工作組狗膽包天，敢攻擊中央文革等等。我們在建工學院開會的時候並沒有學生參加，我也沒有跟學生接觸，開完會就

回釣魚臺了。劉少奇不會去傳，谷牧、余秋裏他們更不會傳，那學生怎麼就知道了呢？我估計是工作組裡的人告訴學生們的，工作組也不是鐵板一塊。第二天，劉少奇的臉色就不是很好看了，我想，他一定認為是我去給學生報的信。可是他來問我，我也不必要去作什麼解釋了。

我把在建工學院遇到的事情都向江青匯報了，江青告訴了主席。江青告訴我，主席就講了一句話，“東海龍王想退兵，蝦兵蟹將不肯聽。”

5、兩起風波

江青去了北京大學，她在北大發表的講話中，堅決支持了革命群眾。江青的講話很受北大師生的歡迎。

在江青講話的過程中，底下有人遞了張條子給江青，條子上寫著。我們系裡有一個人，自稱是毛主席的家人。可她老是支持工作組來整我們，她說工作組是代表黨中央、毛主席的。請問江青同志，她是不是主席的家人？她為什麼要支持工作組？

江青看了紙條很生氣，當場就把紙條上所說的那個人講了一頓。這件事當時在群眾中還很引起了波動。

在江青講話的時候，我正坐在她的邊上，周圍還有中央文革辦公室的人。

過了一天，李訥來找我。她跟我說：“爸爸讓我帶句話給你，請你不要幹預我們的家事”。我一聽這話，就知道是昨晚江青在北大的講話引起了主席的誤會。我就跟李訥說，這事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怎麼會去幹預你們的家事呢？可李訥說：“這我相信。但爸爸讓我帶話給你，我總是要帶到的”。聽了這話，我也無話可說了。我想，很可能主席懷疑這件事是我告訴給江青的。其實知道這事的人很多，江青並沒有瞎說，她說的都是事實。祇是在這樣的群眾場合下說這事，也確實是不很妥當的。主席是知道我經常給江青

反映情況的，江青在向主席匯報時候，也常常會說，本禹怎麼說怎麼說。主席就有一個印象，江青的許多事都是聽我匯報的。可是這件事卻真的不是我匯報的，其實在這之前，我連那人是在北大念書的都不知道。但是主席叫李訥帶話給我，我也不能再去向他作解釋的，甚至在江青那裡，我也不好去說的。我祇好把主席的話謹記在心了。後來主席見到我的時候，也沒有再提起過這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派到北京中學裡面的工作組，有許多人都是從中央團校調去的。一次，王力到了一個中學，非常激烈地批評了工作組。他當場指著學校工作組的組長說，你站起來，我現在代表中央文革宣布，撤銷你的工作組組長職務。那位組長在被王力宣布撤職後，就被學校裡的學生給打了，打得很慘，傷得很重。中央團校的人抬著被打傷的工作組組長到中央文革來告狀。他們一起到了中央文革的接待室，一口咬定是王力叫人打的。接待他們的人馬上把情況反映到了我這裡，我不相信王力會叫人打他的。祇是在王力講話以後，那位工作組長挨了學生的打，兩者有點關係，但不能說是王力叫打的。中央團校來的人還說，戚本禹是從我們中央團校畢業的，我們要找戚本禹。我那時離開團校已經十六年了，他們來找我，我怎麼說啊？我就讓靳耀南去聽他們的意見，同時，派了中南海的一位醫生陪同被打傷的工作組組長去醫院治療。還答應他們，等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回來以後，馬上就向他們匯報。這樣才平息了這件事。

6、1966年7月29日的撤銷工作組大會

主席在連續幾天所作的談話中，都嚴厲地批評了工作組，並且明確表示支持學生運動。1966年7月25日上午，在釣魚臺12號樓，毛主席召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各中央局負責人開會，主要討論修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黨的若干方針問題》。這個文件修改後就是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十六條”。在會上毛主席提出

撤銷工作組。7月26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擴大會議，做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各個學校都有學生代表去參加開會。不知道汪東興、童小鵬他們是怎麼組織的，我聽說來開會的，大部分都是支持工作組的那些學生，其中很多都是些高幹子弟，真正造反批評工作組的學生很少。我就叫人馬上去通知地質學院、北師大和北航等學校批評工作組的師生代表，叫他們組織造反的學生和受壓的群眾也來參加大會。我寫了條子，讓大會堂的警衛人員放他們進去。警衛問我，安全問題怎麼辦？我說，安全問題由我負責保證。這些人都是受打擊的，是毛主席解放了他們。難道他們還會帶什麼武器進來？再說那時候已經有安全檢查的儀器了，如果有槍的話，馬上可以檢查出來。可是警衛們還是不放心，就把他們全都安排去了三樓。這樣一來，三樓成了造反批評工作組的學生集中的區域了。

在會議開始之前，我照例要到到會場的四周去查看一下的。當我走過距離會場最近的北京廳（即118號）的時候，我一眼就看見了吳旭君和徐業夫，他們還跟我打了招呼。我知道，毛主席也來了。

可是主席並沒有在會議上露面。會議是由劉少奇、鄧小平他們主持的。劉少奇、鄧小平雖然在會上對工作組的問題作了點自我批評，可接著他們就提出了什麼“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來進行自我辯解。總理也在會上發了言。但總理沒有像劉少奇、鄧小平那樣為自己辯護，而是主動承擔了派遣工作組下去後整了學生，他也有責任。

這時候我就覺得有點奇怪了，照理說開這個會就是要批判劉少奇、鄧小平，以及他們推行的派工作組整學生的錯誤的。可現在卻是由劉少奇、鄧小平他們自己來掌握會議，這樣一來，大會就變成了一個他們作自我辯解的會議了。而且劉少奇、鄧小平都在大會上

講了話，給人看上去好像文化大革命運動還是要在他們的領導下進行的感覺。

正好這時候，中央文革小組的辦事人員來找我，他告訴我，很多學生都有意見，他們說劉少奇是鎮壓他們的，現在他們倒都來了，毛主席卻沒有來。連王光美都來了，江青為什麼沒有來。於是我就和辦事人員說，你去跟他們說，讓他們喊：“我們要見毛主席”！一直喊，毛主席不出來，就不要停。辦事人員馬上去和造反的學生代表們說，學生們就喊起來了“我們要見毛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先是從三樓，然後二樓、一樓的學生也跟著喊了起來。能見到毛主席，誰不願意啊。喊聲持續不斷，越喊越響，震耳欲聾。開始是坐著喊的，後來大家都站了起來，連坐在前面主席臺下面一排的中央領導也都站了起來。那麼多人在一起喊，那聲音震耳欲聾。那時我最擔心的事情就是，千萬別引起樓板的共振。學生們足足喊了有十多分鐘，這時候，毛主席從主席臺後邊走了出來。這一下，全場的氣氛頓時達到了高潮。“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徹了整個大會堂。很多人沒想到他們喊喊要見毛主席，毛主席就真的出來了。毛主席一句話也沒有說，他就從主席臺的這一頭慢慢地走到了另一頭，他一邊走，一邊不斷地向學生們揮手致意，然後又走到了主席臺的中間轉身回去了。

第十章 八屆十一中全會

1、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重大意義

1966年8月1日在北京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是具有重要歷史轉折意義的會議。盡管在5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了“五一六通知”，決定在全國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但是這個運動究竟怎麼搞，在黨內是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主張的。按照劉少奇、鄧小平他們的方針，那麼文化大革命在打倒“彭、羅、陸、楊”之後，就將是一場更大規模的“反右運動”了。這也是他們一貫的做法，到頭來，運動的矛頭就還是指向廣大的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而根本不可能去觸動與鬥垮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以後出現的黨內官僚主義特權階層。

會議是由毛主席親自主持的。除全體中央委員以外，中央文革小組的全體成員也都列席了會議。此外還根據毛主席指示吸收一些學生的代表也列席了會議。我記得列席的有聶元梓、楊克明、譚厚蘭，孔丹等人。這個列席會議的學生名單很可能是由總理那裡定的，周榮鑫特別重視孔丹。我們中央文革小組沒有參加名單的討論。實際上，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前，中央文革小組對文革運動並沒有多大的發言權。

整個會議的議程也是由總理安排的。在開幕會上劉少奇講了話，他說，在通過會議決議時，列席的人員可以舉手或者也可以不舉手，表示贊成和不贊成，但不計入正式的票數，祇作為參考。鄧小平也講了話。

在開幕會上，總的來說，是比較平靜的，沒有發生什麼大的爭

論。不像在五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跟陸定一在會上爭論得那麼激烈。

按照主席的意見，參加會議的代表先下去到各大學作調查研究。所以在開幕式以後，中央委員們都分頭到各個大學去看大字報。總理帶著一些人去清華，李先念、姚依林等到中央財政金融學院，余秋裏、谷牧等到石油學院，等等。看完大字報以後，他們還召集學校裡兩派的代表進行座談，在座談會上主要是辯論如何看待工作組的問題。我們知道，會議前毛主席就已委託周總理調查清華文革運動的問題。7月30日先後找了保工作組與反工作組的兩批同學談話。7月31日，兩次見蒯大富，談話時間長達6小時。8月1日、2日、3日，又多次約王光美和清華工作組長葉林談話。周總理向毛主席匯報後，8月4日晚還帶了100多名中委及候補中委，到清華大學召開文革現場大會。周總理在大會上親自宣布給蒯大富平反。

從去學校看了大字報回來以後，中央委員和列席代表們開始進行討論。討論主要是以小組會的形式進行的，沒有開大會。在討論中，有說工作組不好的，有說學生中也有不好的，兩種意見都有，但多數是說工作組不好的。不過還沒有一個人提出過劉少奇、鄧小平在工作組問題上有什麼問題的。列席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包括江青在內，在會上也是聽的多，說的少。

到了1966年8月4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了一次常委擴大會議。在開會之前，我看到在前面的主席臺上，毛主席和劉少奇他們幾個在說話，說什麼聽不清，但看上去說話態度都比較激動，像是在爭論什麼問題。後來是在總理的招呼下分別在主席臺上就坐的。在會議開始以後，毛主席就作了很嚴厲的講話。他說：“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他們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中央自己違背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問題，實際是方向問題，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是違反馬列主義的。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不解決這個問題，那麼所謂走群眾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列主義等等，

都是假的。多年來已經是如此了。凡是遇到這類情況，就會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運動，為什麼不能反對？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但有人越蹲點，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系與系、校與校之間一概不準來往。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人們對所謂中央6月20日的批語有意見，這是對的。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的巴黎公社——北京公社宣言。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貼在大門口外給外國人看見。其實除了機密的地方，例如國防部、公安部等不讓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麼要緊。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也容許群眾請願、示威游行和告狀。而且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是寫在憲法上的。從這次鎮壓學生群眾文化大革命的行動來看，我不相信他們有真正民主，真正馬列主義。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團中央，不僅不支持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要嚴格處理。”

在主席講話的時候，劉少奇插話說，我在北京，我有責任。毛主席當即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劉少奇也馬上頂著說，無非是下臺，下臺就是。不怕下臺。葉劍英在這時突然表態說，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麼牛鬼蛇神。毛主席就說，牛鬼蛇神，在坐的就有！毛主席說這些話的時候，整個會場鴉雀無聲，連紙張翻動的聲音都能聽見，會議氣氛高度緊張。這種情況在黨的會議上是不多見的。有關這次中央常委會的情況，在現在的很多出版物都提到了，但都被淡化了。而當時毛、劉分歧的情景是很嚴重的，我至今都記憶猶新。

2、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

第二天，也就是1966年8月5號，主席寫了《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是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處寫的，是寫在《北京日報》空白的地方上面的。寫了以後，他就叫徐業夫把它謄抄了下來。主席又在謄抄好的稿子上加上了標題，並做了一點修改。然後交機要印廠排出了清樣。清樣排出後由我作校對。我在校閱時，看到主席在謄抄件上面親筆作的一個修改，原來抄件上有句話是這樣寫的：“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領導人”，主席將這句話中的“大領導人”改爲了“領導同志”。現在公開發表的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張大字報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這一篇大字報和這篇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爲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這張大字報當時作爲會議的正式文件印發給了全體會議代表。我聽江青說，主席對她說過，他們好搞陰謀，文件不經我同意就轉發全國。他們搞‘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也都是悄悄地搞；北京大學的《九號簡報》，也是未經我的同意就轉發全國的。我的大字報是陽謀，是對付他們派工作組的陽謀，是對付‘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總後臺的陽謀。

這樣一來，雖然這張大字報還沒有正式向下面傳達，但很快就有學生知道了。在很短的時間裡，全國上下都傳遍了。

8月7日，當毛主席的大字報印發給了全體與會代表的時候，會場上頓時就沸騰起來了。由於大字報上沒有公開點名，下面就紛紛議論了，有的說主席的大字報指的是“少奇同志，小平同志”。1962年的“單幹風”，以及1964年在四清運動中，搞矛頭向下的“打擊一大片”的“形左實右”的錯誤，都是同劉少奇有關係的。也有人說，盡管主席寫了“何其毒也”這樣的詞，但這是思想從嚴，讓我們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而並不是要把劉少奇、鄧小平怎麼樣。不然怎麼還稱他們爲“同志”呢？雖然各種看法很多，但是總的來說，絕大多數的人都是擁護毛主席的大字報的。

於是會議的氣氛就變得嚴肅起來了。許多人已經明顯地感到了毛主席跟劉少奇之間發生了重大的原則性的路線鬥爭。毛主席的這張大字報實際上揭開了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蓋子。

1966年7月24日，關鋒給江青寫信說：“我認爲，目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存在兩條路線鬥爭”，已“出現了一個逆流”。又說：劉少奇、鄧小平等“撲滅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爲攻擊對象。”主席向大會批發了這封信，從而又一次引起了會議的震動。在大會的小組討論時，關鋒發言首次將劉、鄧的這條路線稱爲“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我們黨內歷來就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即凡是提到路線鬥爭，那就是最高級別的問題了。建黨那麼多年，加起來黨內也就是陳獨秀、李立三、王明那麼幾次鬥爭被稱爲是路線鬥爭。而每次發生路線鬥爭的時候，都意味著要更換領導人。

說實話，我當時對於劉少奇指導文革運動的路線，以及後來將這條路線稱之爲“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認識上還是很不足的。從我自己的體會來說，我祇是覺得，以往運動一來，黨內就總是有人把運動的矛頭指向群眾，通過運動來整群眾，尤其是整那些反對或者對自己有意見的群眾。從1957年的整風反右，一直到這次文化大革命主席回到北京之前，都是這樣的情景。但把這種做法叫做什麼路線，是否叫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那時並沒有仔細去想過。我真正理解它廣泛的歷史含義時，已經是文革結束好多年之後了。

3、起草並通過“十六條”

1966年8月8日，即主席的大字報印發給與會代表的第二天，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式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又稱“十六條”）。這個文件全面闡述了毛主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政策，實際上是批判了劉少奇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祇是在這個文件中還沒有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概念。

“十六條”的起草的過程比較短，不像起草“五一六通知”那樣專門成立一個起草班子。起草工作是由陳伯達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組的全體成員都參加了，進行了反復多次地修改。我記得，後來林彪和葉群也參加過討論和修改。最後，毛主席親自主持了討論和審定。

“十六條”的主要內容，是把毛主席關於文革的一系列的講話集中起來概括而成的。王力在回憶錄裡說這個文件是他與陳伯達起草的，這是不確實的。起最大作用的是張春橋和關鋒。王力祇是在文字記錄和整理上做了些工作。陳伯達、張春橋和關鋒起的作用要比他大得多。

“十六條”最主要的精神就是要放手發動群眾起來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提出要让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重視巴黎公社的經驗與原則，說“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的巴黎公社——北京公社宣言。”毛主席希望在文革運動中實踐巴黎公社的原則，發動群眾監督人民公僕，防止人民的公僕變成人民的主人。為此，“十六條”指出“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毛主席的這個思想是很明確的，這就是他後來講的要尋找一種方式，一種“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的方式，人民群眾監督公僕的方式，來克服我們黨內存在的“陰暗面”。

8月10日，毛主席親自來到了中南海西門的中央文革接待站接見群眾。毛主席這次行動，事先沒有和我們任何人打招呼。當時我還在釣魚臺辦公室裡處理文件。接待站的同志打電話給我。主席到了接待站，我想我就是立即趕過去，恐怕也來不及了。我就交代他們，一定要注意主席的安全，並讓他們把主席說的話都記錄下來。後來，接待站門口的人越來越多，過路的行人一看到是毛主席，都涌了過來。連門前路過的公交車也停下來不走了，車上的人都探出頭來要看毛主席，警衛戰士怕出事情，就趕緊簇擁著主席離開了。主席在離開前跟群眾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第二天的報紙和廣播就發布了這個消息。這次主席來中央文革群眾來訪接待站接見群眾，對發動廣大群眾參加文革運動起了非常重大的推動作用。我的記憶中，這是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第一次親身到中央的人民來訪接待站會見群眾（在紅軍和延安時期，黨和國家領導人會見來訪群眾是很普通的事）。相反，而現在倒經常發生把群眾從人民來訪接待站抓走的事情。毛主席說的，人民來信來訪工作是黨和國家聯繫群眾的重要渠道，現在已經被許多領導人遺忘了。

4、改選中央領導機構

1966年8月1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以選舉方式，通過了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有關決定，並重新選舉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經過選舉，新的中央常委的排名秩序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新的政治局常委的選舉產生，意味著毛主席重返黨的領導第一線，而林彪則成為在毛主席之後排名第一位的常委。會議選撤銷了“彭、羅、陸、楊”的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職務，選舉陶鑄為書記處常務書記，葉劍英為書記處書記；謝富治、劉寧一為書記處候補書記。

在8月12日的閉幕會上毛主席又發表了講話，強調了要正確對待在文化大革命以來犯了錯誤的同志，要給人家改正錯誤的機會，要團結—批評—團結，要治病救人。毛主席很著名的話：“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也是這次閉幕會上講的。閉幕會上林彪也發表了講話，說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有人幾乎扼殺了這個革命，但在危機關頭，毛主席出來扭轉了局面，革命重整旗鼓，繼續進攻。

中央常委重新排名之後，劉少奇從原來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陶鑄卻一下子被提到第四位，負責主持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對此很多人都感到驚訝。陳伯達、康生對陶鑄都有意見，陳伯達在廣東搞農村調查的時候，就跟陶鑄發生過矛盾。我們文革小組內部對此也是議論紛紛的。這時江青出來講話了，你們不要再議論了，這是主席決定的。

陶鑄在合作化和大躍進的時候都是很積極的。可後來到了刮“單幹風”的時候，他開始是有點跟劉少奇的。後來張平化對他進行了批評，張平化是從主席那裡得到了真經的。他對陶鑄說，你可不能搞“包產到戶”。你一搞“包產到戶”，那許多人就順坡下驢，社會主義很快就會垮掉，再要上就很難了。所以陶鑄就改變了態度，明確表示反對搞“包產到戶”。毛主席看他反對“包產到戶”，就認可他了。我覺得，毛主席在那個時期看幹部，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看他對維護公有制、集體所有制，以及對“包產到戶”的態度是怎樣的。後來主席說了，是鄧小平向他建議讓陶鑄到中央來主管宣傳工作的。可是陶鑄當了常委之後，並沒有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而是仍要大力地保護劉少奇等人，與毛主席的路綫、方針日漸背離。

儘管鄧小平是和劉少奇一起、堅決主張派工作組去壓制群眾的，有些事情還是他為劉少奇出謀劃策的。但是主席卻一直想要把他和劉少奇區分開。在這次中央常委的排名中，他從原來的第七位竟上陞到了第六位。這一來好多人都有意見了，怎麼他和劉少奇一樣是犯錯誤，結果卻不降反陞了呢？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員和謝富治

等中央委員對鄧小平都有議論。

5、專門批評鄧小平的政治局會議

我記得還是陶鑄把大家的意見去跟主席反映的。主席就讓林彪主持了一個由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會議，專門批評鄧小平。同時也是幫助挽救他，緩和一些中央領導同他的矛盾。我也參加了這個會議並擔任記錄。

不料，在這次會議上許多人對鄧小平批得很厲害。特別是張雲逸、謝富治，他們都和鄧小平共過事，對鄧小平是知根知底的。張雲逸說，你這個人從參加革命開始就不堅定，當革命遇上困難的時候你就逃跑。而且對他是怎麼逃跑的，張雲逸都說得清清楚楚。他說，左、右江起義受挫，你就跑到越南去了，然後再從那裡去了上海。這件事情一直是鄧小平的一塊心病。鄧小平說，他是去向中央作匯報的。張雲逸就說，匯報，你打個電報或者派個人去就好了。部隊都要垮了，你這黨代表再一跑，軍心不就亂啦。謝富治擔任政委的陳（賡）、謝（富治）大軍是二野的主力。所以謝富治知道鄧小平的事情更多，他揭發出來的事情簡直是挖鄧小平的老底。他說，哪一仗，你不聽劉帥的話，瞎指揮，結果打了敗仗；哪一仗，你擅自作主，結果弄得損兵折將，你就做你的政委，你為什麼老要去幹預劉帥的軍事指揮。你每次的幹預都搞得我們非常被動。

所以鄧小平對張雲逸和謝富治都是恨得要命的，他後來一定要把謝富治的骨灰從八寶山扔出去，睚眦必報啊！

6、燒毀毛主席給江青的信

林彪是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從大連回來參加

會議的。林彪來了以後，他的表現是很積極的，說話慷慨激昂而且聲音洪亮。應該說，林彪那時在黨內和軍內的威信都很高。他的到會，在當時起的作用很大。那個時候，葉群和江青的關係很好。她們倆在一起講話的時候，江青都是說，你們那位、我們那位。葉群祇說，我們那位，從不說“你們那位”，說到主席，祇稱主席。

主席在1966年7月8日給江青寫了一封信。那封信主席寫完後曾給總理、王任重看過。總理和王任重都抄了下來。後來我從陶鑄那裡看到抄件。總理的軍事秘書周家鼎告訴我，總理是親手用楷書工工整整的抄了一份。總理拿著主席親筆寫的那封信去大連給林彪看，林彪表示接受主席的意見。後來信就回到了江青那裡，江青曾拿著這封信的原件，在中央文革小組開會的時候給我們讀了一遍。

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葉群來找江青說，“我們那位”（指林彪）對主席給你的那封信總感到不放心，怕將來被人利用來攻擊他。於是，江青就請示主席。主席說，那就把信的原件交給葉群，就放在他們那裡好了。可葉群還是不放心。她說，放在他們那裡，他們也不好隨便處理的。江青再請示主席，主席說，那就燒了吧。於是江青就把葉群叫來，當著她的面，叫我和衛士大孫一起把主席寫的那封信的原件，拿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園裡燒掉。我拿著信和大孫一起跑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園裡，找了個空的花盆，把信放在裡面，由大孫點火把信燒了。在燒的時候，我心裡直覺得可惜，這是多麼珍貴的文物啊。江青和葉群就站在窗前看著我們燒。我記憶中，後來根據總理手抄件公布的信的內容，和原信內容是一致的。有人說公布時對手抄件作了修改，這個說法是不對的。

7、我在小組會上的發言受到毛主席批評

我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小組會議上曾作了個發言，我說，我們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否則，弄得不好，我們的文革也會出現像法國大革命“熱月政變”一樣的結果。我的這個發言被登在

了會議的簡報上面。我心裡還自以為講得很深刻。可是江青卻對我說，你得意什麼呀，把主席批評你的話告訴你，你都會哭。我問，主席怎麼批評我。她說，主席說，軍隊的事情你們不要亂說話，你們不懂軍隊的事。主席還說，你看人家春橋，就從來不亂說話。我聽了就對江青說，我懂了，你告訴主席，說我懂了。其實張春橋在私下裡與江青和我們也談起過，他對軍隊也是很不放心的。祇是他在公開場合，從來不說。從這以後，關於軍隊的事，我在公開的場合也不多說了。但是下面反映上來的有關軍隊的情況，我都還是會給主席經常報告的，主席每次必看，並作了好幾個批示。

第十一章 紅衛兵運動

1、毛主席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戰略思想

鑒於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的嚴重教訓，毛主席曾就“接班人”問題講過很多話，並親自寫下了這樣的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從群眾鬥爭中產生，是在革命鬥爭的大風大浪裡鍛煉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鬥爭中，考察和識別幹部。”“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在1964年前後，毛主席又發表了一系列的關於“教育革命”的講話。其中心的意思就是，舊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是培養不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而祇能培養出修正主義的苗子。

毛主席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場空前規模的群眾運動，其主要的目的，除了要防止黨內的一些“當權者”為了謀取其自身的利益而走向資本主義之外，再一個就是要讓廣大的人民群眾，尤其是廣大的青少年在這場運動中得到鍛煉，經受考驗，培養成具有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理想的新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一場“反修防修”的重大戰鬥和培養共產主義新人的大學校。

在中央通過了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五一六通知”後，7月24日，經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改革高考制度，全國所有的高校推遲半年招生。稍後又決定全國的大、中學校停課半年，讓大、中學生投入到文化

大革命的運動中鍛煉成長。所以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從“教育戰綫”開始的。

可是當學生運動起來以後，卻遭到了劉少奇、鄧小平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壓制和打擊。而劉、鄧所推行資反路綫依靠的是各級黨委組織。

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的“十六條”，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把歷來由各級黨委領導下、由上而下進行的群眾運動，改變為讓群眾由下而上來進行的一場“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群眾運動。而各級黨委都要在這場群眾運動中接受群眾的考驗和檢驗。

在“十六條”發表以後，首先起來響應的也正是大、中學校的師生。廣大的青少年學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和生力軍，他們高舉“造反有理”的旗幟，勇於批評學校黨委領導的錯誤，從而打破了自1957年反右運動以後所形成的思想禁錮。

2、毛主席接見紅衛兵

早在1966年5月29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就自發地成立了一個取名為“紅衛兵”的學生組織。在開始的時候，它的影響並不大，祇是眾多的學生自發組成的團體中的一個。後來他們受到了學校工作組的壓制，一度被視為“非法組織”。於是在6月24日和7月4日，他們在學校裡貼出了《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和《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在7月底的時候，他們把這兩張大字報的稿件交給了江青，江青馬上把它轉呈給了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之後，7月31日就寫了一封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表示支持的復信。這封信當時並沒有寄出去，而是作為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會議文件印發的。不過很快這封信就傳到了學生當中去了。這樣一來，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各個學校裡，很快都成立了紅衛兵組織。他們紛紛提出了要見毛主席。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檢閱和接見了百萬革命師生。毛主席特意提出讓中央警衛局給他準備一套軍裝。總理知道之後馬上說，那我們這些陪同毛主席參加接見的領導人都都要穿上軍裝，我們是毛主席的“老紅衛兵”嘛。林彪馬上給解放軍總後勤部下達了命令，給所有登上天安門的中央領導都發了一套軍裝。

在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接受了紅衛兵小將宋彬彬給他帶上的紅衛兵袖章。此舉大大地鼓舞了廣大的紅衛兵小將，他們把毛主席稱為是他們的“紅司令”。從此，紅衛兵運動就在全國上下開展起來了。

那天接見，從清晨一直進行到了晚上。毛主席長時間地站立在城樓上，還要不時地向下面的人群揮手、喊話，非常勞累。不要說主席那時已經是73歲的高齡了，就是像我這樣當時才三十多歲的年輕人都覺得很累了。主席站得時間久了，感到腳痛了，我們就都勸他去城樓裡面去坐下來稍微休息一下。可是沒休息多久，傅崇碧就跑過來，說前面見到毛主席的紅衛兵隊伍過去了，可後面沒有見到毛主席的就不肯走了，隊伍中間空出了一大段。而每當這種時候，總理總是向下面大聲地喊話，要停在那裡的隊伍趕快朝前走。但是不管他怎麼喊，下面的紅衛兵就是不走，他們不停地喊著：我們要見毛主席！直到主席出來向他們招手，隊伍才向前走。這些情景在當年的電影紀錄片裡都能看到的。

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青少年學生紛紛從各地趕來北京，都想見到毛主席。於是全國就出現了一個空前規模的大串聯高潮。從全國各地來的紅衛兵人數不斷增加，接見的規模也越來越大。那麼多紅衛兵來北京，住什麼地方呢？主席說，他們都是我的客人，實在沒有地方給他們住，可以在各個機關、學校和企業的宿舍擠住一下。中南海也可以讓出點地方給他們住。可就是中南海讓出地方也容不下那麼多人的。於是就動員各個機關、學校騰出地方來。還不行，就只好安排他們分散住到市民家裡了。北京的氣候，過了10月就逐漸變冷了，很多南

方來的紅衛兵沒有棉衣、棉被。我們就去動員各單位和市民們拿出自家的衣被來幫助他們。光這些事情，就讓那些負責接待和安置紅衛兵生活的人感到疲憊不堪。

實際上，主席也非常勞累的，即使後來安排他坐著敞篷車去接見，可一天坐下來也是非常辛苦的。但主席毫無怨言，仍然堅持要不斷地接見。很多人都對毛主席那麼多次大規模地接見紅衛兵表示不能理解。起先，我也是這樣的。一次，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坐下來休息的時候，他看見我，就跟我開起了玩笑，說戚本禹也來了啊，你是山東人，你祖上和戚夫人是一個家族吧。他說，戚夫人多才多藝，後來死得很慘。我說，我聽族中的老人說，我們是戚繼光的後代。不過戚夫人倒也是我們山東人。呂後用那麼殘忍的手段戕害戚夫人，這個仇恨一直傳到戚氏的後代。在我們山東老家，戚、呂兩姓是不通婚的。主席說，哦，還有這事？我說，是的，不過交朋友是可以的，我就有一個姓呂的好朋友，我還是他的人黨介紹人呢。主席聽了說，那當然，你們是現代人，是共產黨。說得大家都哈哈大笑。這時，我就對主席說，你已經那麼多次接見紅衛兵了。現在天氣也轉冷了，是不是可以暫停下來了。主席聽後說，他年輕時候，在廣州見過孫中山，那情景使他終生難忘。他覺得孫中山是個很謙虛的人。後來孫中山對他很重視，很信任，安排他當了國民黨的候補中央執委和代理宣傳部長。他對孫中山也很尊重，說他這一輩子做事情都要對得起孫中山。他又說，列寧去世得過早，在蘇聯的青年人中見到過列寧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能讓更多的年輕人見到他，將來好繼承老一輩的事業，革命到底。他說，接見那麼多的紅衛兵，不能休息，一天下來，確實很累，回去後躺在床上腳還痛。但是我還是要接見。我們將來的希望就在這些年輕人的身上。他們中間能出人才，我們的事業靠他們繼承了。我說，他們都還是些小孩子。他說，對了，我們今天的事業不都是靠當年的那些小孩子幹的嗎？我現在接見幾百萬青年人，將來在這裡面是會出人才的，會繼承我們的事業。他還說，我見到了孫中山，記了一輩子，至今不忘。他們見到了我，也不會忘記我的，會去研究我的。

主席說得很誠懇，我們聽了都很感動。主席還問，怎麼孫中山的語錄至今沒有人去編？

3、中央文革小組和紅衛兵

從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主席先後8次，共計接見了1000多萬人次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群眾。這在歷史上是空前的。

毛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群眾的壯舉，使得文化大革命運動成了一股波濤洶湧、不可抗拒的滾滾洪流。上千萬的青少年學生從全國各地到北京來，他們見到了毛主席之後，又到許多地方去串聯和參觀革命聖地。然後把他們看到的和學到的革命精神帶回到各個地方。北京的學生也到全國各地去串聯，把北京的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帶到了各地去。這一來，一場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的局面就真正地形成了。毛主席不愧是發動革命群眾運動超一流的高手，他就是通過支持紅衛兵運動，而動員和推動全國廣大群眾起來投入文化大革命運動，燃起全國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初始，在紅衛兵組織中，主要是由一些“高幹子女”在裡面起主導的作用。由於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和接見，很多學生組織也都加入到紅衛兵裡面來了。首都大專院校的學生先後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簡稱“一司”）和“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簡稱“二司”）。

“一司”是汪東興支持他女兒汪延群（輕工學院大學生），聯絡大專院校的一些紅衛兵組織成立的。汪東興求著江青和我去參加他們的成立大會。但我知道，汪東興在開始的時候其實是挺支持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後來他知道了主席的態度才轉過來的。所以我不願意去參加他們的成立大會，江青倒是去了。汪東興的女兒汪延群還當上了“一司”的司令。江青對此很反對，她對我說，這樣不好。他汪東興是在主席身邊工作的。這樣一來，人家會以為，他女兒做的事都是主席的意思了。汪東興知道了江青的意見

後，就叫他女兒辭去了司令的職務。“一司”改由其他人負責。

“二司”其實主要是各大學保工作組的保守一派紅衛兵組織成立的。但北京航空學院的造反派組織紅旗戰鬥隊等也參加了二司。江青對北航紅旗的韓愛晶比較看重，總把他當作一個有希望的好青年看待。而那時中央文革小組對北京高校各個紅衛兵組織的情況還不是很清楚。所以，江青也參加了二司的成立大會。但我沒有去。

毛主席決定撤銷劉少奇、鄧小平派到學校的工作組後，北京各大專院校的師生，即分裂為保工作組的保守派群眾組織，和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群眾組織。在如何評價工作組，批評工作組路線問題上，保守派與造反派發生激烈的爭辯與衝突。保守派組織得到過往工作組領導與一些上層人物的支持，而造反派組織則積極向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反映他們繼續受壓的情況，尋求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

在中央文革小組開會的時候，江青跟我們說，我們應當支持那些在工作組時期敢於起來造反、批評工作組路線並受到打擊的學生，支持他們成立造反的紅衛兵聯合組織。於是我和王力、關鋒等人都分頭去各個學校進行聯繫，支持他們聯合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首都三司”）。

我對地質學院的朱成昭說，一司是官辦的，二司偏向保守派。我讓他去和蒯大富一起聯合各校造反派組織成立個“三司”。“三司”的成立大會，我去參加了，可江青卻因為正好有事沒有去參加。其實如上所述，“三司”是江青叫我去支持成立的。“首都三司”在全國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發揮了重要的先鋒作用。

1967年2月，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紅代會）。北大的聶元梓、清華的蒯大富、北航的韓愛晶、北師大的譚厚蘭和地質學院的王大賓都參加了“紅代會”，被稱為是北京紅衛兵造反派的“五大領袖”。這些才是北京紅衛兵運動的主流和主要的力量。他們與那些依仗著自己“高幹”、“革幹”出身，到處亂打人、亂抄家的“老紅衛兵”、

8月25日先後成立的“西糾”、“東糾”、“海糾”等組織，以及1966年12月由這些組織演變而成的“聯動”完全不是一回事。“西糾”、“聯動”等，它們祇是紅衛兵運動中的一股支流和逆流，它們祇能代表那些自以為出身“高貴”，而後來卻千方百計維護特權官僚階層的既得利益，而攻擊和破壞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一小部分人，代表不了廣大的青少年學生。

不過，這“五大領袖”和我們中央文革的關係也是各不相同的。聶元梓那時已經45歲，比我還大十多歲，跟江青都差不多大了，還自稱紅衛兵，實在有點滑稽。聶元梓和王任重走得比較近，她經常去王任重那裡。王任重當時雖然祇是中央文革的副組長，但在文革小組裡面，他根本就不把陳伯達放在眼裡，對江青他也祇是表面上敷衍著，一切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王任重的背後有陶鑄在支持著他。我認為聶元梓靠著王任重對她支持，總是想方設法地企圖由她及新北大公社控制北京的紅衛兵運動，排斥其它造反派組織。她背地裡將中央文革分派，以自己利益需要為是非標準。她對我則采用又打又拉的方法，她曾當著我面，跟江青說我的好話，挑唆我和王力、關鋒的關係。我聽了也祇是一笑了之，心裡並不信她。

在地質學院，開始我們支持的是朱成昭。可是朱成昭到了1966年底就跟著葉劍英女兒葉向真不聽中央文革的了。於是經文革小組會議討論，1967年3月5日，由我召集地質學院東方紅內不同意見的代表在政協禮堂開會。在聽取他們意見後，宣布讓王大賓取代朱成昭擔任地院東方紅的主要負責人。朱成昭與葉向真交好以後，與我們的關係也就疏遠了。我出獄以後，朱成昭來找過我。他跟我說，那時候他跟著葉向真經常到葉劍英那裡去的，葉劍英經常給他們出主意，朱成昭說，那時在他的心裡面，那邊的份量比我們中央文革要重得多。所以他就聽他們了。

當時搞得較好的是北師大。譚厚蘭看上去人個子很小，但能力很強。她較會團結人，她對學校的教授，老師都很尊重。所以在北師大，對立面的力量很小。聶元梓、蒯大富等都看不起譚厚蘭，可

搞得好的還是譚厚蘭。祇有王大賓是支持譚厚蘭的。江青也看好譚厚蘭。什麼事情布置下去，她馬上能落實下去，沒有多少人反對。聶元梓，蒯大富就不行了，他們那裡的對立派很厲害。後來要選派紅衛兵代表訪問阿爾巴尼亞，五大領袖都想去，最後是主席指定了譚厚蘭去。地質學院的王大賓也搞得不錯，雖有不同意見，但整個學校還是團結的，沒有發生組織上的分裂。北航紅旗也不錯，始終保持團結，沒有分裂。搞得最差的倒是清華、北大。清華四一四的主要頭頭也是反工作組的造反派，對蒯大富有不同意見。蒯大富不能正確對待與處理，不能團結好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致使清華井岡山分裂、對抗，直至發展到武鬥。主席1968年7月28日，召見“五大領袖”時說，他也不贊成所謂“四一四思潮必勝”所宣示的主張。主席派工宣隊進駐清華，其實是對井岡山有利的。可蒯大富卻跟工人打起來了，還打死了人。這也是派性膨脹，講到底還是頭腦膨脹，私心膨脹，忘乎所以。文革運動失敗，這些造反派的領袖也是應該認真反思自己的。

當時我在各大學一般都不大直接出面的。有什麼事情，就把這幾個“領袖”找來一說，讓他們出面去做，這樣的效果反而好。這也是我以前搞地下黨工作的時候得到的經驗。我還經常給他們出一些點子，比如怎樣掌握高音喇叭（現在叫“掌握話語權”）、怎樣行使行政權、怎樣控制交通工具（汽車）以及怎樣組織會議、維護秩序等等。當時我們面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錢。那時的財務制度很嚴。而學校黨委把財務權都交給了保守派。我就跟造反紅衛兵說，你們得想辦法把會計爭取過來，如果爭取不過來，就查賬，調動他們的工作。那時中央機關的錢都在總理和李先念的手裡，我們中央文革手裡一分錢都沒有的。這時，我就叫他們去找總理和李先念批錢。總理心裡恐怕也清楚是我在後面給他們出的主意，所以總理對我說，國家財政困難，要叫紅衛兵節約鬧革命。當然在我給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出主意的時候，那保守派組織後面也是有人出主意的。

在中學紅衛兵當中，我直接聯繫李冬民、劉剛這些中學紅衛兵的領袖。中學裡的事，通過他們就基本能掌握起來。

由於我和大、中學校造反紅衛兵聯繫最多。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就被叫成是“戚大帥”。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幾次找江青，要調我兼北京衛戍區的政委。江青沒有同意。

到了王力、關鋒被審查後，我就很少像以前那樣活動了。那時，我已經被一些人攻擊，將造反派做的一切錯事、壞事都說成是我幕後指使的，說我是他們的“黑後臺”。等到我也被審查了，我心裡明白，紅衛兵和他們的“五大領袖”的厄運也快要來到了。

4、紅衛兵與“破四舊”

否定文革的人們，總是把紅衛兵與1966年8月的“破四舊”，所謂的“紅八月”的“紅色恐怖”聯繫在一起，與其中的隨意抄家、亂打人、打死人和破壞文物等不文明、非人道的行為聯繫在一起。其實這裡的情況很複雜。

在1966年的8月，當紅衛兵運動起來之後，由北京一些中學的“老紅衛兵”帶頭，很快就在社會上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破四舊”的行動。

本來“破四舊”是“十六條”中提出一個號召。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當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紅衛兵小將上街進行“破四舊”的活動時，我們都講了話，給以支持。《人民日報》還發了社論，贊揚紅衛兵小將的革命行動。但是，後來在某些權勢人物的唆使下，把“破四舊”行動演變成了一場亂抄家、亂打人、打死人、亂沒收私人財產、隨意驅逐“地、富、反、壞、右、資”所謂“黑六類”家庭，和出身成分不好的人離開北京等等的非法行動。這些行動絕不是中央文革小組叫人去做的。在中央文革小組召開的所有會議上，沒有一個人在會上提出過這樣的建議。如謂不信，可以翻查所有的文革會議記錄。據文革小組當時的調查了解，在背後支持這個“亂打人”、“亂抄家”和驅離“黑六類”人員等行動的是葉劍英領導的“首都工作組”控制的。王任重也在裡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們

並沒有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會上提出過，更不要說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同意了。毛主席更是不知道。

就在紅衛兵上街進行“破四舊”的1966年8月，“首都工作組”以加強首都安全的名義，實施了一項把一些居住在北京城裡的“地、富、反、壞”以及歷史上有重大問題的人驅趕出北京的計劃。而他們用來出面執行這項計劃的主要是一些“高幹子弟”的中學生帶頭。他們不久即組織成立了所謂的“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即“西糾”）等組織。我記得在一次毛主席參加的中央會議上，葉劍英還向主席匯報了把一批人驅趕出北京的事。當時主席對這種做法是有疑問的，主席認為祇要這些人沒有現行的破壞活動，那就應該就地發動群眾對他們進行監督，而不是把他們簡單地趕走。主席說，你把他們都趕到農村去，那叫農村怎麼辦啊？由於主席的表態，總理就中止了這個計劃的實施。

後來，葉劍英曾經在一次群眾大會上說了這件事，他說，解放那麼多年，一些人整天躲在“深宅大院”裡，罵共產黨，罵毛主席。誰都不敢動他們。現在“紅衛兵”小將一來，就把這些社會的垃圾都掃除了。他把這事稱為是“不朽的功績”。

在1966年第四季度召開的中央會議上，有人曾印了一本小冊子，題目好像叫“紅衛兵小將‘破四舊’的戰鬥成果”，作為會議的參考資料在會上分發。內容是怎樣鬥爭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把他們的家也給抄了，還抄出了很多金銀珠寶。小冊子裡面還有很多抄家物資的照片。我看了這本小冊子以後就問總理，說這些抄來的東西如果流落到社會上去怎麼辦。總理說，你放心，有人管的。後來知道，這些抄家的物資都是由“首都工作組”統一收繳的。

但實際上，好些“抄家物資”還是流落到社會上去了。我記得，一次在主席接見紅衛兵後，衛戍區的戰士在打掃清理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收集了很多擠丟的東西，其中除了被擠掉的鞋子、提包等物品之外，還有大量的黃金和珠寶，足足裝了滿滿一大籬筐。這些黃金珠寶都是那些去抄家的人私藏在自己的口袋裡的。江青看

了這筐東西之後，就說了句，看來小將也有私心啊。當然，這些黃金珠寶大部分都交給了銀行等部門。我說，最好要搞個手續。總理說，那當然。後來傅崇碧把銀行等部門的收條拿來給我們看過。

關於“首都工作組”，還有一件事我記得很清楚的。毛主席曾書寫了一幅白居易的《琵琶行》送給曾擔任河北省委書記的林鐵，這副字可以稱得上是主席書法中的精品。文革一開始，林鐵被打倒了。“首都工作組”派人去抄了林鐵的家，他們搜出了毛主席寫的這副書法作品。不知爲了什麼，他們把這副字給了林彪。後來，林彪叫葉群來跟江青、主席講，林彪看了主席這幅字，愛不釋手，白天晚上都捧在手裡看。葉群問主席能不能把它轉送給林彪。當時，主席也沒說什麼，祇是揮了揮手，算作同意。後來，林彪就找了一個文物專家把這幅字上面寫的“林鐵”中的“鐵”字去掉，補上了“林彪”的“彪”字。林彪出事以後，這幅字應該是被中央辦公廳拿走了。

與“首都工作組”不同，當時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怎樣支持受資反路綫迫害的學生起來造走資派的反。對群眾提出的“破四舊”的要求我們當然也表示支持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鬥爭的大方向應該是對著黨內走資派，而並不是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這一點，對我們來說，始終是非常明確的。

在“破四舊”行動中搞“亂打人”、“亂抄家”，甚至打死人的，主要是那些背後受到了指示和支持的，主要由“高幹子弟”、“革幹子弟”、“軍幹子弟”組織的所謂的“老紅衛兵”，當然也有一些跟他們跑的學生，他們並不是高幹子弟，甚至出身並不怎麼好的，爲了要表現積極，加入了打人行列裡去的也有。但他們畢竟是少數。

5、紅衛兵運動的偉大歷史作用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之所以能突破以前歷次政治運動，

從上到下進行的模式，變成了一場由下而上的群眾運動，這和紅衛兵運動的作用是分不開的。沒有這樣的一支力量，光有毛主席的崇高威望，那也是不行的。在以前的運動中，毛主席也作出過許多指示，可到了下面也就被各取所需地給化解了。後來毛主席在九屆一中全會上講到過這個問題。從這一點來講，正是毛主席的威望加上了紅衛兵運動，才發揮出了一種歷史上罕見的首創精神，使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迅速地在全國的範圍內深入地展開了。

紅衛兵運動席捲全國，使得各地的黨委領導受到了巨大的衝擊並且面臨著考驗。這正是毛主席所希望看到的事情。因爲在毛主席看來，共產黨所以能夠掌握國家政權，那完全是依靠著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那時，毛主席經常跟我們說這樣一句話是：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人民群眾給的！我們代表了人民，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才擁護我們。所以，共產黨最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的人民群眾。共產黨進了城，執掌了國家政權。一些人就漸漸地脫離了群眾，重新成了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老爺。以前毛主席發動了許多次運動，號召群眾起來幫助共產黨整風，克服官僚主義。但是這些運動都是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進行的。爲了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搞到後來都成了整群眾的運動了。像1957年的整風、反右和1964年的四清運動都是這樣。這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如果不是毛主席及時地回到北京，而讓劉少奇、鄧小平按照他們在文革初期那套做法搞下去，那一定會重蹈歷史列車的覆轍。

紅衛兵運動發動起來以後，不僅有力地衝擊了各級執行劉、鄧錯誤路綫的黨委的領導，而且北京的紅衛兵首先去了工礦企業，與那裡的工人進行了串聯，發動工人群眾參加到文化革命中來。

北京的紅衛兵組織了幾次“南下串聯”，去武漢、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廣州、成都、昆明等地，把北京搞文革運動的經驗帶到了這些大城市裡去了，極大地推動了那些城市的文革運動的發展。尤其是去了上海，上海有二百萬產業工人，是全國工人最集中的城市。

最先去上海的北京紅衛兵並不是我們中央文革組織去的。是王

任重他們幾個人搞的，都是一司、二司的紅衛兵。他們去了上海並不是去批判上海市委執行的資反路線，而是去社會上鬥“地、富、反、壞、右”；搞打人，抄家，剪小褲腿的褲子那種事情，受到了上海市民的反對。後來總理也組織了一次北京紅衛兵的南下，那一次是去保上海市委的。因為上海是全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的工業生產是要影響到全國的。

這個時候，我們中央文革小組也接到了大量的來自上海的群眾來信和來訪，反映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制群眾給黨委提意見，對提意見的群眾進行關押、迫害等等的事情。於是，我們就動員了“首都三司”等一些造反紅衛兵去上海。江青親自找聶元梓談了話，要她去上海揭開文革運動的蓋子。江青這樣做也是爲了要把聶元梓從王任重那裡爭取過來。

後來知道，正是這次去上海的“首都三司”等造反派紅衛兵，聯合上海學校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與上海的一些造反的工人取得了聯繫，並且在他們的策劃和幫助下，上海的工人成立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從此，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現在反思，毛主席一直在思考、探索如何實踐巴黎公社的原則，如何實現人民真正當家作主，勞動者如何參與國家管理，人民群眾用何種民主形式監督人民的公僕，防止其變爲人民的主人。我想文革運動中的“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體現的言論自由；紅衛兵組織、群眾組織的成立體現的結社自由；這種大民主的形式不應簡單否定，而應認真總結，以法律形式完善、規範。而鄧小平主政後，即在《憲法》修正中，將其過往《憲法》對“四大”合法性的規定廢除是不妥的。沒有人民群眾監督公權力的具體形式和有組織的力量，一切監督都會流於形式。

第十二章 文革運動中的“老紅衛兵”、 “西糾”和“聯動”

1、活躍在文革初期的“高幹子弟”

現在被稱爲“紅二代”的“高幹子弟”群體，今天仍然是中國政治、經濟舞臺上一支活躍的力量。而在文革運動的初期，這個“高幹子弟”群體裡的大多數人，出身在解放戰爭的炮火中和建國初期，正在大中學校讀書，有著青春的激情、活力與衝動，適逢毛主席發動文革運動這個大舞臺，是最先積極登臺表演的群體。而他們身後父輩們的利益、分歧、恩怨、衝突，也被文革引發與公開，並深刻地影響到他們子女們的立場、取向與行動；尤其在文革初期，對文革運動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這些“高幹子弟”群體中，許多人都有濃厚的“自來紅”思想，因父輩的革命資歷和功績而產生很强的優越感。低調的人，努力向平民百姓子弟看齊；但更多的人喜歡顯示自己出身高貴，喜歡攀比自己父輩官位的高低，住的什麼房子，坐的什麼汽車等等。他們消息靈通，見多識廣，朋友圈也大多是父輩地位相同或戰友、同僚家庭的子女。他們中一些人還看不起那些成績拔尖、超過他們的平民子弟，特別是那些出身不好、成績卻很好的同學。文革運動開始，他們自然地按自己理解的階級觀念，實際是封建的“血統論”，高調宣傳他們的口號：“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他們以天然的革命接班人自居，以家庭出身敵我，完全偏

離毛主席發動文革運動、重點整走資派的鬥爭大方向，而將鬥爭的矛頭指向“地、富、反、壞、右、資”“黑六類”以及他們的子女，製造了1966年8月的“紅色恐怖”及其許多駭人聽聞的暴行。

文革運動中的“高幹子弟”群體，特別是北京中學生中那部分十幾歲的年青人，在文革初期的活動，從最先發起成立紅衛兵組織的“老紅衛兵”；到自認為是紅衛兵中的優秀分子、中堅力量，組成“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隨後又有“東糾”、“海糾”的成立；再到1966年12月成立的“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在文革運動中發生過重大影響，也形成了當時對毛主席文革思想干擾的各種思潮，這裡著重講講中央文革是如何處理應對的。

2、文革初期的“老紅衛兵”

上面說過，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從“教育戰綫”開始的。1964年，1965年，毛主席先後與毛遠新、王海蓉談話，批評教育戰綫的問題，提倡教育革命。這兩個談話的內容，首先就在“高幹子弟”群體、隨後在人數更多的“革幹子弟”群體中傳開了，他們受到鼓舞。一些思想敏感的激進分子已據此在自己就讀的學校裡展開活動，以階級鬥爭應成爲一門主課爲依據，批評學校領導的資產階級辦學方向。1966年5月29日清華附中自發成立的第一個紅衛兵組織不是偶然的。清華附中紅衛兵隨後得到北京一些“高幹子弟”較集中的學校，如四中、六中等學校“高幹子弟”和“革幹子弟”群體的支持，也紛紛以“紅衛兵”的名字貼出大字報。但不久這些自發成立的紅衛兵組織，受到了團中央派到北京中學的工作組的打壓。清華附中紅衛兵6月24日、7月4日先後寫出了《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兩張大字報。大字報引述毛主席1939年的一段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

就幹社會主義。”“造反有理”思想，自此成了紅衛兵的理論武器，亦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導思想，動員武裝了億萬革命造反派，積極勇敢投入文革運動。這時，我才理解了毛主席所以肯定我寫的《爲革命而研究歷史》一文的真正意義。

1966年7月底，毛主席在看到清華附中紅衛兵寫的這兩張大字報後，7月31日寫了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並在8月1日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印發。8月3日，王任重約見了清華附中的紅衛兵，給他們看了毛主席寫給他們的信。毛主席支持紅衛兵的信息迅速傳播，紅衛兵就成了光榮的名號。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百萬革命師生和紅衛兵，並穿上綠軍裝，戴上宋彬彬獻上的紅衛兵袖章。得風氣之先的許多“高幹子弟”，自然領頭，以“革幹子弟”爲主體，以紅五類出身爲條件，在各學校率先組織成立了各種名號的紅衛兵組織。這批以“革幹子弟”爲主體的、率先成立的紅衛兵組織的骨幹成員，後來就被他們自稱爲“老紅衛兵”。

文革開始，“老紅衛兵”對宣傳傳播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思想，衝破革命群眾的思想禁區，動員群眾投入文革運動，先後成立造反派群眾組織，在文革運動的歷史中，無疑起了第一推力的先鋒作用。

在毛主席發動的文革運動得到了億萬革命群眾熱烈響應支持的局面下，這個潮流勢不可擋。黨內的文化大革命反對者，亦在審時度勢，大都並不是公開抗拒，而是順勢爭奪文革運動的領導權，通過爭奪掌控與影響文革運動涌現出來的領袖人物，引導他們將文革運動的鬥爭目標，偏離毛主席文革運動重點是鬥爭走資派的大方向。一些幹部與他們的子弟經常用這樣的辦法參與和扭曲文革。1966年7月底，毛主席決定撤銷工作組後，工作組大多依靠支持各大中學校的“高幹子弟”或“革幹子弟”爲頭，以“革幹子弟”爲骨幹，先後成立各種名號的紅衛兵組織，以繼續掌控文革運動的領導權，繼續工作組的路綫。而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見支持紅衛兵後，大批狂熱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封建血統論

的“老紅衛兵”即被引向社會，對著“地、富、反、壞、右、資”等所謂的“黑六類”，亂抄家，亂打濫殺。對毛主席在給清華附中紅衛兵信中，要求他們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的道理，完全不予注意；“十六條”中關於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的政策亦置之不顧，而是以暴力在北京制造他們的“紅色恐怖”。

這些“老紅衛兵”的種種暴行，很快就被中央文革派出的記者反映到文革小組來。同時我們也收到大量群眾來信，指控一些紅衛兵的暴行。我拿了這些群眾來信與記者的反映材料，去給江青匯報。江青告訴我，她也從其他途徑知道了這方面的嚴重情況。

為此，中央文革小組專門開會作了討論，周總理也參加了。大家對這些以高幹子弟為主體的“老紅衛兵”亂打人、亂抄家的暴力行爲，對他們的種種暴行都是持堅決反對的態度。總理對他們這些胡亂打人的行爲同樣是堅決反對的。在會上，總理和江青讓我立即去了解情況，並去制止“老紅衛兵”這種亂打亂殺的暴力行爲。總理還派了衛戍區的解放軍戰士和我一起去。

我帶著解放軍戰士首先去了王府井的東風市場（原東安市場改名爲“東風市場”）。那裡整個商場當時都被東城一些中學的“老紅衛兵”占用來作非法關押、審訊和用刑的據點了。我一到那裡，在那裡的頭頭們都已經知道我要過去了，他們確實是消息靈通，早就聚在門口等著我們了。起先有幾個人還想上來阻止我進去，但馬上就被跟我去的解放軍戰士制止了。戰士們說，這是中央首長，你們誰不服從指令，我們奉命可以對他採取措施。這一下，他們就不做聲了，他們到處亂抓人，可自己也怕被別人抓起來。我叫他們把所有關著門的小房間都打開，我進去一看，真是慘無人道，裡面被非法關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開肉綻，滿身鮮血，在牆面上還有用活人身上的鮮血寫著“紅色恐怖萬歲”等口號。在一間屋子裡，我看見一個女“紅衛兵”手裡拿著一根鋼鞭，正向一個二十幾歲的女人身上抽去，我趕忙讓戰士過去奪下了她手上的鋼鞭。我上前問她，你爲什麼要打她？她說，她是壞分子，搞了很多男人。我說，胡鬧，哪怕她是個妓女，你也没有權力這樣打她。我要解放軍戰士馬

上把這個被打的女人和其他被打傷的人都送去醫院，把其他所有被關押的人都放了，把所有的刑具全部没收，結果裝了滿滿的好幾筐。

當時我還看到有好幾個公安民警也和這些“老紅衛兵”的人在一起，我估計那些被抓的人就是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提供名單的。所以我又去了那裡的派出所。派出所的領導看到我，緊張得不得了。我問他，是不是你們派出所向他們提供的名單？他說，是的。他們是按照市裡的指示才這樣做的。我問他，是市裡的什麼人給你們指示的？他說，聽說是市裡的萬里副市長專門打電話來關照的。派出所的一個同志還悄悄地告訴我，他們也看不慣這些所謂的“老紅衛兵”的暴行。他們每天都打死很多人，然後他們打個電話叫火葬場來車把屍體運走，當天就燒掉了。查都没法查。

回來後我就向謝富治說了這事。謝富治說，這絕不是公安部的指示，是北京市自己布置下去的。萬里當時是北京市負責公安工作的副市長，也是首都工作組的成員。他們根本没有向公安部報告過此事，估計是“首都工作組”給他們下的命令。謝富治也是“首都工作組”的領導成員之一。我問他，如果是“首都工作組”下的命令，那你也應該知道啊。謝富治說，那裡全是軍隊的人說了算，他在那裡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謝富治不同意他們亂抓人、亂抄家、亂打、亂殺，認爲他們這種做法與歷來的做法都不一樣，都在瞎搞。可那些人都根本不聽他的。所以，他也不願意去多管他們的事，連開會都很少去參加。

我把没收的刑具直接帶回到釣魚臺中央文革的會議室，當場就向總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作了匯報，所有看到這些東西的人都非常震驚和憤怒。起先江青看到我帶去的這些血迹斑斑的刑具，就喊了起來，你帶這些東西來幹什麼，拿下去。她這個人是見不得血的。不過她很快就說：他們這麼做，不是想給文革抹黑嗎？她的政治敏感性確實很強。葉群也明確表示林彪從來是反對打人的。可陳伯達這時卻在一邊說，革命嘛，總是會伴隨著血腥味的。還引證說，這是高爾基說的。他還學著江青以前批評我的話，說我不是

是有點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沒經過革命風浪，書呆子。所以9月以後我們繼續去取締這時已由這些“老紅衛兵”為主體組成的“西糾”、“東糾”那些關人打人據點的時候，有時會叫上陳伯達一起去。他到現場去一看，那些殘酷的場面使他也看不下去了，所以以後他反對“西糾”的“老紅衛兵”暴行的時候比我還起勁。

1966年的8月下旬，在北京郊區大興縣發生滅門慘案也是“老紅衛兵”支持搞的。他們在大興縣的好幾個公社裡，把一些地富反壞右都抓起來拷打、審問。還以防止“階級報復”為由進行斬草除根，把他們的妻室、子女，有些還是小孩子也集中起來。許多人當場被他們活活地打死了，沒死的，都被驅趕到一個大坑裡，把人家一家老小都活埋了。手段之殘酷令人發指，這是建國以來聞所未聞的法西斯暴行。

在得到大興縣發生大屠殺案的報告後，我和王力連夜驅車趕去大興。可等我們到了那裡的時候，那些主持大屠殺的人卻早已經得到了風聲跑了。我們問當地的幹部是怎麼回事？他們說，都是些紅衛兵模樣的人來指揮當地的一些基幹民兵搞的。其中有些所謂“紅衛兵”的年齡都偏大了，看著不像是學生。而且他們說，在他們來之前，市裡還有人打電話來作了關照，所以大興縣公安部門的人給提供了戶籍材料，有的還有當地的警察帶路。

那時候，康生的孫女張力在大興縣當團委幹部，她是在北京大學畢業後分配到那裡的。王力認識她，我們就打電話叫她過來。張力告訴我們，事先確實是接到了上面的指示的。但具體是那個上級，她也不太清楚，因為別人對她進行了封鎖，不跟她講，開會也不讓她參加。她說，她當時也沒法出來說話，不然別人就會指責她階級立場有問題。她還告訴我們，這件事，不止是一個公社，有好幾個公社都這麼幹的。

我和王力當夜趕回釣魚臺，已經凌晨四點多了。回來後我馬上給我熟識的北京新市委的書記馬力打了電話，讓他去處理這件事情。第二天，馬力就親自帶著人去了大興縣。馬力代表北京市新市委當場宣布，如果再發生亂打人，亂殺人的事，就以現行反革命論

處。

我們也向陳伯達作了匯報。陳伯達開始還不把它當回事，祇說你們處理得對。我們對陳伯達說，你是中央文革的組長，我們祇是個組員。出了這種事，如果主席追究起來，你的責任就大了。我說，這事你要出來講話的，否則你將來是要負歷史的責任的。他一聽也嚇壞了，第二天，他就出面講了話，強烈地譴責了這種法西斯暴行。

在親自到現場調查、綜合各方面反映的情況後，我跟陳伯達說，我們得趕緊給毛主席、給中央寫一個報告，制止這種事情。不然的話，還會出大事的。陳伯達讓我來寫。於是我去找了關鋒和王力一起商量。關鋒看問題比較尖銳，他說，這事恐怕是有人在背後搞破壞，故意用打人、殺人來制造混亂。我說，可現在我們還找不到是誰在背後故意搞破壞的直接證據。關鋒比我沉著，他說，我們不能光寫打人的事情，我們得先寫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的成績，說一下紅衛兵怎樣意氣風發，怎樣破四舊立四新，做了很多工作。先寫這一些，然後再說這裡面也發生了一些很嚴重的問題，其中一個就是一些所謂的“老紅衛兵”等隨意打人，甚至殺人的問題。而且他們是盲目地打人、殺人。同時在我們報告中也提到了抄家的問題。隨便什麼人，戴個紅衛兵的袖章就可以去抄家，這怎麼行呢？

在這個報告裡，我們還特別提到了萬里。因為從我們自己下去所了解到的，還有文革“快報組”反映上來的情況來看，所有這些打人、殺人的事情的後面都有萬里等人從市裡給各地派出所下的指示。萬里本來是彭真領導的北京舊市委的人，可他並沒有隨彭真的倒臺而倒臺，因為他是鄧小平牌桌上的常客。他也是“首都工作組”的重要成員。我們把萬里如何指示北京市的公安派出所向“老紅衛兵”組織提供抓人和抄家的名單。在大興縣發生的滅門慘案中，也是當地公安部門根據萬里等人的指示提供名單的情況在報告中寫上了。

在這個報告的最後，關鋒還提出，有些人是故意在破壞文革運動，他們是在實行沒有工作組的工作組路線，他們用打、砸、搶、

抓、殺、抄的方式來干擾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大方向。

我們的報告是1966年8月26日寫好，先送給陳伯達、江青，第二天江青和陳伯達就在上面簽了名，上報給主席。第三天8月28日上午，主席一起床就批了，主席把它批給了林彪、總理、康生以及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此外不知道是為什麼，主席還特意把它批給了薄一波。為什麼主席批給薄一波？這個問題我問過陳伯達。他說，主席有很多渠道了解運動情況，不僅萬裏捲進了這些事情，薄一波也捲進去了。我又問，萬裏是彭真信任的人，應該是靠邊了，為什麼還在工作？陳伯達說，劉少奇、鄧小平都信任萬裏，新市委恐怕仍在用他。

接著，8月29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主席親自找了總理、葉劍英和中央文革的人都去他那裡開會。在會上，我們把“老紅衛兵”的組織亂抓人、亂打人、亂抄家、亂殺人的事都具體地作了匯報。特別談了在大興縣所發生的滅門慘案。主席聽了就問，這又是誰的發明啊？總理說，中央肯定沒有這樣布置過。謝富治也說，公安部事先並不知道這事。葉劍英則一聲不吭。毛主席鄭重地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祇能用文鬥，不能用武鬥。在不久前中央發布的“十六條”裡就有這話（這話也是主席加的，但在文件裡沒有說這是毛主席說的）。會上決定由陳伯達起草一篇《人民日報》社論，社論的題目就引用主席的話“要文鬥，不要武鬥”。後來發表在了1966年9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在這以後，“要文鬥，不要武鬥”就成了毛主席語錄了。

接著中央文革小組馬上開會研究討論，關鋒把這些“老紅衛兵”等組織的活動總結為是劉、鄧路線在新形勢下的繼續，它實質上是劉、鄧路線走向社會的一個“變種”。關鋒在理論上的確是有高度的。王力也很慷慨激昂，他拍著桌子罵它們是“掛羊頭賣狗肉”（意思是掛著文化革命的羊頭，賣的是劉、鄧路線的狗肉）。我則說他們實際上是破壞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一股異己的力量。

在我和王力趕去大興縣的路上，我們看到在那裡房屋的牆上，到處都塗上了紅色的油漆，還有許多用紅布拉出來的橫幅標語，還

到處樹立著密密麻麻的紅旗。我們問當地的幹部，這是怎麼回事。他們說，這是在搞“紅海洋”。這也是上面有人布置下來的。我跟王力說，這樣搞法，如果再在全國一推廣，那得浪費多少油漆和布料啊，而且這都是要讓老百姓自己掏錢的，這不是又要增加群眾的負擔了嗎？這種做法完全是形式主義，一點意思都沒有。後來看到更多報告材料，“紅海洋”在全國有愈演愈烈之勢，所以，我們就此事專門又給主席寫了一個報告，提到了下面有人大搞“紅海洋”的事。主席對這類事非常重視，專門對此作出了批示，還讓中央正式發了文件，制止搞“紅海洋”。

3、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

文革運動中，中央文革小組的活動與動向，周總理都是隨時了解與掌握的。我去調查處理“老紅衛兵”的暴行，是周總理也參加的中央文革小組會議上決定的。對紅衛兵運動中出現的亂打人、打死人、亂抄家等等違反“十六條”規定的要用文鬥、不用武鬥政策的現象，中央文革、毛主席都堅決反對，要求立即制止的態度，周總理也是完全支持和擁護的。

北京四中是“高幹子弟”集中的中學。四中的高中學生孔丹，父母長期在周總理身邊工作。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周榮鑫對孔丹的情況也很了解與熟悉。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孔丹作為中學生的唯一代表，被安排列席會議。陳毅的兒子陳小魯是北京八中的學生。由孔丹、陳小魯等人適時牽頭發起，在8月25日成立了“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隨後又有“東糾”、“海糾”成立。孔丹他們自認是紅衛兵中的優秀分子、中堅力量，他們要站出來執行政策，制止武鬥，維護秩序，要來糾察其它的紅衛兵組織。“西糾”成立的時機與活動是與當時中央文革正在調查處理“老紅衛兵”的暴行，毛主席發出“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批示相呼應的。

“西糾”發出的“通令”和他們的實際行動，表明他們的立場是以保護他們的“父輩老幹部”的安全與秩序為出發點的，因而很快發展為對抗造反派紅衛兵反對劉、鄧路線對其迫害的造反行動。孔丹組織領導了“西糾”隊伍，阻撓、驅趕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上千師生到地質部上訪請願，和北航紅旗造反派師生到國防科委上訪請願，並為此與他們發生肢體衝突。

“西糾”造反鬥爭的矛頭是指向“地、富、反、壞、右、資”“黑六類”的。他們常以暴力手段來執行他們的任務，維護“秩序”，軍用皮帶、鋼鞭等是他們的慣用的打人工具。對他們所認定的鬥爭對象，製造了無數駭人聽聞的暴行，並將八萬多所謂“黑六類”家庭趕出了北京。為此禍及這類家庭的子女以及反對他們這種行為一切幹部、群眾和紅衛兵。他們的口號是：“祇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紅色恐怖萬歲！”以“西糾”為代表的、“高幹子弟”、“革幹子弟”為主體的所謂“老紅衛兵”，當時就已在北京市民中引起了民憤，到了“鬧糾”色變的程度。

在“要文鬥，不要武鬥”的社論發表後，我們繼續檢查與執行制止暴力行為。這時的“老紅衛兵”大多成為“西糾”、“東糾”、“海糾”成員了。他們以“西糾”等名義，更狂熱地私設“監牢”、“勞改營”，關押拷打他們隨意認定的“敵人”、“壞人”。我和陳伯達、王力、關鋒就到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八一中學等“西糾”、“東糾”等組織活動猖獗的地方，一個一個地去進行取締、關閉他們私設的“監牢”與“勞改營”，收繳凶器。我們去的時候，都有警衛車開道，帶著衛戍區的解放軍一起去的。在我們浩浩蕩蕩的隊伍面前，那些“西糾”、“東糾”等組織的成員不敢作任何反抗。經過我們的堅決行動，北京的亂打人、打死人、亂抄家的歪風，基本被制止下來。

時至今天，“西糾”的許多成員竟為他們當年的行為高唱贊歌，認為他們保護“老幹部”有功，而對“西糾”與“老紅衛兵”的暴力行為，卻認為“西糾總部是難以承擔責任的，祇能由那些實施暴力的個人負責。”但他們同時又把文革運動中發生的一切暴力

與破壞行為歸咎於毛主席的發動文革，歸咎於中央文革小組。

4、批判反動的“血統論”

在1966年8月初的時候，北京的中學流傳一幅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鬼見愁”。這是一個充滿封建統治階級“血統論”色彩的東西。它一出來就在學生中引起了一場範圍很廣的大辯論。

江青和陳伯達都去講了話，否定了這個對聯。當時他們還是想從思想工作入手，提出把對聯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橫批是“理應如此”。這裡所說的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是個含糊命題，可是連這個說法，那些人也都不接受。其實，這些人真正的目的是要掌權，他們首先就是要掌握領導文革運動的權力。在工作組的時候，他們大都是支持工作組的，工作組也把他們中的大多數作為主要依靠力量；工作組被撤走了，他們就要由自己來掌權了。然而這和文革的宗旨是完全背道而馳的，文革的目的就是要反對官僚特權，你現在反而想要得到更大的特權。如果由他們來領導文革的話，那麼他們仍然會變著法地鎮壓造反派群眾。因為在這些人的眼裡，那些出身不好的學生，都是所謂的“狗崽子”。即使是出身普通工農家庭的學生，也不在他們的眼裡的。

這些人當時大都還祇是15、6歲的小孩子。有些話，都是他們的老子不敢講，而由他們出來講的。對這一點，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

在圍繞這個對聯的辯論中，出了一個人物，叫譚力夫。他是北京工業大學的學生，能說會道。他又是貼大字報，又是到處發表演說，大肆鼓吹那套“血統論”。譚力夫的講話得到了一些人的大力支持，他的講話被迅速印發到了全國各地，農村印發到了公社的生產隊一級，其傳播的速度要比“中央文件”都要快。一些不知情的

人還以為譚力夫是中央委員。這說明當時在他背後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在支撐著他。

譚力夫的父親過去在最高檢察院當領導，原來是康生的部下。所以康生就來跟我和關鋒講，看能不能把譚力夫給爭取過來。我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但因為康生來打了招呼，我們也不打算怎麼為難他，1966年11月，我們決定把譚力夫找來談話，想給他講一些道理。

我和關鋒把他叫了來，就在中南海西門的接待室裡跟他談話。他開始還以為我們挺重視他，所以上來就跟我們說了一大堆“血統論”的“真理性”。我打斷他說，你這是在干擾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你知道嗎？他一看情況不對，就爭辯說我這是在給他扣大帽子，他說毛主席也沒說他不對。我說江青同志傳達的那就是毛主席的思想。父母英雄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這個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他聽了說：“江青改的對聯也是對的，兩個對聯可以並存。”我們就叫他回家去，好好地“閉門思過”。我們沒有對他采取任何措施。至於他後來怎麼被抓起來的，我真的不清楚。

5、批判“出身論”

就在批判譚力夫的反動的“血統論”的過程中，北京有個年青工人叫遇羅克，他提出了一個“出身論”與“血統論”相對抗。這在當時的影響也很大。中央文革開會的時候討論分析過遇羅克的觀點，認為他完全否定了階級存在的客觀性和階級分析的必要性，這就走向另一個錯誤極端了。毛主席說過：“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所以，當時就決定由我根據毛主席的這一思想做了一個公開的講話，批評遇羅克的觀點。1967年4月，我的講話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遇羅克因此受到了廣泛的批評，並可能因之而受到了很大的壓力。但我當時祇是對他的思想認識進行了批判，並沒有對他採取

任何的人身限制。他後來被公安部門逮捕又被處以死刑，這些我都是不知道的。因為在他被捕之前，我自己也早已被關在秦城監獄裡了。遇羅克的妹妹和國內外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人，叫我交代遇羅克被迫害致死的經過，我實在無法交代。

當時是發動群眾進行大民主的時期，所以類似像遇羅克這樣發表各種各樣的思想觀點的人很多。在我們收到的大量的群眾來信中，反映各種觀點的都有，但對一些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觀點，儘管是很錯誤的甚至是反動的，我一般都採取存而不報的方針，不作處理。那時有個叫陳衷寧的，他確實是很早就反對劉少奇《論共產黨員修養》和八大報告中的一些觀點，後來受到了迫害，被關進精神病院，所以當時有人根據病例和陳的筆記整理了新“狂人日記”。我當時是支持他的。但後來有人說，這個陳衷寧對毛主席也有錯誤的言論。並借此事來攻擊中央文革小組。為了弄清問題，我祇好叫小組辦事組把他的事情交給公安部調查處理。

那時有群眾在討論“一分為二”觀點時。有人提出：對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也可以一分為二。一些人認為毛澤東思想是普遍真理，怎麼可以一分為二呢？但也有人認為可以。結果後者被說成是“攻擊”毛澤東思想。有些人還因受到群眾檢舉而被公安部門抓了起來。不少人寫信把這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來了。我看了信之後，就去問陳伯達，他不表態；我又去問張春橋，他說這是個理論問題，一下子很難說清楚。我說，可不可以問問主席？他說，這個事也不好去問主席，你讓主席怎麼說。可我還是覺得，這個問題畢竟已經牽涉到很多人的政治生命問題了，你說人家這是反毛澤東思想，把人家給抓了起來，這不解決能行嗎。我還是要去問問主席，關鋒也說應該去問主席。於是，在一次主席召開的會議上，我就問主席，現在有人說毛澤東思想是普遍性真理的東西，是不能一分為二的。一些說可以一分為二的人，挨了批鬥，有人還被公安局抓了起來。主席聽了就說：我的思想怎麼就不能一分為二？我昨天講的話和今天講的就有不一樣的地方。我的思想也是在不斷變化和發展著的，當然是可以一分為二的。所有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謝富治

知道了毛主席的態度後，立刻下令把所有因為這個問題而被抓的人全都放了。

6、“聯動”的覆亡

1966年9月6日，在我們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北京大專院校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聯合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首都三司”）。在10月開始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首都三司”為代表的造反派組織迅速發展壯大，成為多數派。

“西糾”、“東糾”和“海糾”的隊伍瓦解後，少數的老紅衛兵因其父輩許多受到造反派組織的批判、衝擊，從切身利益出發不滿中央文革對造反派組織的支持，因而進一步走向與中央文革對立，與造反派組織對抗。1966年12月5日這部分“老紅衛兵”又聯合起來成立了“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就叫“聯動”，發表宣言，要“徹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為反對中央文革執行的毛主席的文革路線，同時繼續亂打亂衝。

“首都三司”、中學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對付“聯動”是有辦法的。他們的人比“聯動”的人要多得多。“聯動”在哪裡鬧事，他們就許多人圍上去。“聯動”的人講又講不過他們，打也打不過他們，祇好“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以後再遇上了，也祇好採取迴避政策，“聯動”不能與“首都三司”等造反派紅衛兵組織爭鬥。可是，他們並不甘心。一次，北航附中的幾個“聯動”分子在偷摩托車的時候，被人抓了，並把他們扭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把這幾個人拘留了起來。於是“聯動”的人就聚集起來衝公安部。他們把公安部辦公室玻璃窗砸了，還把公安部的副部長都打了。

謝富治在開始的時候是不願意抓“聯動”的，這些小家伙許多都是大幹部的子弟，抓起來怎麼弄呢？謝富治是何等聰明的人物，

陳、謝大軍說是一個兵團，實際上抵得上一個野戰軍。謝是這支大軍的政委，是陳賡須臾不可少的好兄弟。謝富治辦事是非常有經驗的，頭腦又這樣清楚。可最後他還是被“聯動”逼上了“梁山”。

“聯動”實在太囂張了，謝富治祇能把他們中幾個帶頭的抓起來關著，但在生活上是還給予了優待。可這樣一來，“聯動”就更不肯罷休了，他們接連幾次發動自己的成員去衝擊公安部。公安部越讓步，他們越鬧得厲害。謝富治就來找我商量，怎麼弄呢？我說，這事恐怕總理也難辦，真要辦，那得請示主席和副統帥。但你撇開總理去找主席和林總，又不妥當。我想了半天，給他出了個主意，去找人民群眾。我說，斯大林不是有句名言嘛，“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就要去依靠‘安泰’（意思就是從群眾那裡汲取力量）”。你去發動群眾啊。他說去哪裡發動呢。我說，你先與北京新市委的書記馬力聯繫，北京的街道幹部是一個很大的力量。現在他們正在批判彭真的北京舊市委，他們充滿了革命的熱情。

馬力和我是朋友，四清時我們在一個工作隊，文革開始時我還出面保過他。所以，我打電話和他一說，他馬上就把公安部附近街道的隊伍組織起來了，他們一下子就動員了好多街道的裏弄幹部和積極分子來保衛公安部。因為“聯動”分子身上都帶著匕首等武器，所以那些街道來的老大爺、老大媽也拿著菜刀，擰面杖過來。一來就是幾十人甚至上百人。那些“聯動”分子也都是欺軟怕硬的。他不怕警察，知道你警察不能抓他，又不能打他，所以他不怕。可是看到那麼多老百姓過來那他們就祇有逃了。後來他們也聰明了，知道群眾過來要有一段時間，所以就到公安部去衝一下，看看“街道大軍”差不多要來了就跑了。那公安部的人也有經驗了，看到他們來鬧，有的幹警就換上了便衣，大叫“老百姓（街道的人）來了，來了”，把他們嚇跑了。謝富治挺感謝我，說你這一招果然有效。

“聯動”的倒行逆施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民憤。12月16日在北京的工人體育館舉行了一次控訴聯動的群眾大會，有一萬多人參加。大會是由“首都三司”組織的，我們中央文革小組能參加

的人，都出席了這個大會。會上群眾揭發和控訴了“聯動”的血腥的罪行，群情激奮。江青聽了群眾的揭發和控訴也非常氣憤。她在會上發言的時候就問，究竟是誰在後面支持“聯動”無法無天，亂打、亂殺、亂抄家的？這時下面就有人遞條子上來，說是國務院的周榮鑫、雍文濤、許明。江青就當場點了周榮鑫和雍文濤、許明這些人的名，叫周、雍站起來，一直到會議結束都沒叫周榮鑫、雍文濤坐下去。會議一結束，江青就走了，也沒說把他們倆怎樣。這時，會議主持人就來問我對他們倆怎麼處理，他們倆也都看著我。我說，讓他們回家吧。

會後，許明給我打了個電話。我和許明平時很熟，她是國務院的副秘書長，總理辦公室的副主任，也是孔丹的母親。國務院的群眾來信、來訪是由她負責的。而我是管黨中央機關的群眾來信、來訪的，所以我們平時在工作上經常有聯繫，彼此都很信任的。她在電話裡跟我說，總理批評她了，而且批評得很厲害，讓她停止工作，好好反省。她覺得壓力很大，要我幫助她去跟江青去說明一下。在電話裡她都哭了。她說，她兒子孔丹搞“西糾”的事，具體情況連他父親孔原都不知道，總理更不知道。她說，因為毛主席支持紅衛兵，所以周榮鑫和她就都給予了他們一些支持，主要是為他們弄了些辦公的房子、車子和一些經費。但對他們所幹的那些無法無天的事，她並不清楚，也絕沒有在背後指使。希望我能為她說說話。我相信她說的話，所以我對她說，有合適的機會，我一定會為她說話的。她向我表示了感謝。

和許明通話的當天，我碰到江青就跟她說，許明給我來電話了，她說她也不知道“西糾”、“聯動”所幹的那些事。我說，也許她說得是真的。她是總理身邊不可缺少的人，讓她檢討一下算了。江青表示同意。還說，等她見了總理，再跟總理講講。

可是，在許明與我通話的第二天，總理告訴我們，許明自殺了。當時我的心為之驚動，也很哀傷。因為她工作實在、為人不錯。這以後，對於許明的死，總理就再沒有提起過。我知道他也是很哀傷的。對許明為何自殺，我想不應祇是來自江青那天點名的壓

力。

文革運動初期，許明一直負責國務院接待站的工作，受資反路綫打壓的師生，如地院李貴、清華的蒯大富都去那裡上訪投訴過工作組。許明當時的態度應是支持維護工作組的。在蒯大富投訴後，傳到清華的許明講話說：“葉林是中央派的，是完全可以依賴的。蒯大富在6月21日劉才堂《大家想一想》的大字報上關於奪權的批語是反革命的。”8月又有支持血統論對聯的老紅衛兵在接待站批評陳伯達改對聯，許明亦未態度鮮明地制止老紅衛兵攻擊陳伯達的行為。而在9月，孔丹為頭的“西糾”，公開對抗反對地院東方紅因批判工作組到地質部上訪請願，和北航紅旗上國防科委上訪請願的事，是否背後得到許明的支持？這些情況中央文革的簡報都報給了毛主席。毛主席有過態度鮮明的批示：“許明，支右壓左，如不能改正，應調動其工作。”江青點名會使許明聯想到毛主席對他的批評。其壓力之大確實是她難以承受的。

7、江青“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

從1966年的年底開始，一些“聯動”分子先後被公安部抓了。其中大多數都是被群眾扭送到公安部去的。有個已故將軍的兒子，他父親原來和謝富治是老戰友，可是因為他兒子抄寫了矛頭直指毛主席的反動標語，被群眾扭送到了公安部，謝富治也把他關起來了。著名將軍陳士渠的兒子也參加了“聯動”，也被群眾扭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沒有關他，把他交給了軍隊，讓他們去處理。軍隊把他放回了家。可陳士渠知道以後，親自把他兒子送到公安部來。陳士渠是在井岡山時期參加了革命的。毛主席知道了這件事，還表揚他“大義滅親”。後來董老（董必武）也為他的小兒子董良翹參加“聯動”的事，向毛主席寫了檢討。主席看了董老的信之後，就讓公安部把所有被抓的“聯動”統統放了。

在放他們的時候，主席叫總理、江青和我們中央文革的人一

起去接見了他們。江青對他們講了話，說，你們吃苦了，然後對他們諄諄教誨。當時被關的“聯動”分子中的許多人都向江青表示認錯。有的還當場喊口號，“感謝江青阿姨！”但其中也有一些人不服氣，他們又怕自己的隊伍被分化，就在那裡唱起了毛主席寫的詩，“我失驕楊君失柳”。江青也拿他們也沒辦法。隨後，謝富治宣布了毛主席釋放他們的指示，他們就喊毛主席萬歲！然後就走了。

主席後來就跟江青說了戰國時“觸奮說趙太后”的典故。毛主席當時還說，如果弄得不好，這些幹部子弟將來很可能成為黨和國家的災難。

毛主席隨後又讓江青去軍委擴大會議上向將軍們作了《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江青在講話中就說了“觸奮說趙太后”中的“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道理，鼓勵老幹部要繼續革命，也要教育子女繼續革命，為人民立新功，不要吃老本。毛主席對歷史典故的運用，真是爐火純青，寓意深長。

第十三章 知識分子在文革運動中 受到的衝擊

1、文革初期校園內的鬥“牛鬼蛇神”

文化大革命從批判《海瑞罷官》開始，又是先在學校裡面發動起來的。這使得當時一些學術界的“權威人士”，和學校裡的一些教師與學校的領導，同時首當其衝地受到了群眾運動的衝擊。毛主席在建國初期就曾經說過，無產階級在奪取國家政權之後，祇有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的革命是不夠的，還必須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展開對資產階級的批判。否則，無產階級的勝利是不牢固的。在文革前夕，根據蘇聯出現修正主義分子上臺的歷史教訓和中國當時的情況，毛主席又提出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無論從當時的情況或者從毛主席逝世以後的情況來看，都證明了毛主席要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正確性。

開始的時候，這種對知識分子的衝擊，主要是通過學術討論和學術批判來進行的。從《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發表，和在同日把“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向全國廣播以後，許多大、中學校就掀起了鬥爭“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及一些歷史上有這樣那樣問題的教師的熱潮。但當時被受到衝擊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由所在單位的領導指定或授意的。後來劉少奇他們派出的工作組進駐學校以後，工作組祇是千方百計地去制止學生向領導提意見，貼大字報，但沒有去制止這種

鬥爭知識分子的情況。相反，由工作組所組織的以“高幹子弟”、“革幹子弟”為主的各學校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把在校園裡揪鬥被他們定為“反動學術權威”的知識分子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在揪鬥中，出現了挂牌子、戴高帽子、游街等侮辱人格尊嚴的情況。後來這種情況就很快地蔓延了開來，而且越來越擴大，特別在一些“高幹子弟”、“革幹子弟”的帶頭下，進一步出現了非法關押、剃陰陽頭、甚至是嚴刑拷打的情況。這樣武鬥的批判、鬥爭方式不是毛主席的主張，而是毛主席明確表態反對的。

我自己在當時就曾親自見過這種情況。一次我坐車出去辦事，車順著小胡同向大馬路開去，就在出胡同的時候看見一位婦女，估計也就三四十歲左右，她一邊哭一邊用手捂著腦袋，一路小跑。我一看她腦袋半邊沒有頭發了。我趕緊叫司機停車，走下去問她發生了什麼事。她看看我們穿著軍裝，就說，是被學校裡的學生鬥了，他們把我的頭發都給剪了，我沒臉見人了，我要趕緊回家。我問，他們為什麼要鬥你？她說，學生們說我搞資產階級教育，可我就是按教科書教的，怎麼是資產階級教育。原來她是一位語文老師。看見她走路很難堪的樣子，我說要不我們送你回去吧？她說不用，她家就在前面。

我回到釣魚臺的辦公室，跟文革小組的人一說，大家也都知道這種情況，說不僅剪陰陽頭，現在“紅衛兵”在街上剪人家長頭發和小褲腿的也很多。

我在家裡經歷的一件事也讓我感觸很深。我的女兒是1955年生的，那時就十一歲，還是個小學生。一次我回家去看看，見她正對著一張凳子，用皮帶叭叭地抽打。我說，你這是幹啥呢？她說，學校裡的同學都批評我沒有鬥爭性，說我不敢打老師，叫我回家練一練怎樣打人。我說，你們在學校都打老師呀？她說，現在都在打老師，誰不打老師就說誰沒有鬥爭性、不革命。我一聽，覺得問題真是嚴重了。我說，你有没有打老師啊？她說，老師平時對我挺好的，我不願意打老師。我說，中央文件裡都明確說不準打人的，打人就是有鬥爭性啊？她給我背了毛主席的語錄：“革命不是請客

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綉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溫良恭儉讓……”我說，不對，這是在解放前鬥地主時說的，你們的老師又不是地主，你們有意見，可以批評他，但不能打他們。

後來，我們把這些發生在校園裡的暴力事件的情況，向江青、陳伯達和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就此作了明確的批示，打人、挂牌子、噴氣式、剃陰陽頭都屬於武鬥，統統禁止。

在文革結束以後，把這些打人的事情都說成是中央文革小組支持下進行的，這完全是謊言。中央文革小組從來都是堅決反對並制止打人的，而且1966年6、7月時，許多有關大、中學樣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決定，都是由劉少奇、鄧小平在一綫領導的常委會和書記處決定的，中央文革小組當時的發言權還很小。

還有人把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去學校，說成就是去制止打人的。真實情況不完全是這樣。多數的工作組在學校裡並沒有去制止打人，他們祇是不許學生起來反對領導。他們對起來反對領導的學生，和他們所拋出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一般都是實施殘酷鬥爭的。在毛主席批示之前，祇有少部分的工作組遵循毛主席的一貫教導，在不同的範圍內制止了武鬥。

2、文革中一些“名人”遭到迫害的真相

王任重雖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組長，但他在湖北，武漢卻是堅決執行劉、鄧的資反路線的，他不鬥當權派，專門被他指定的李達等學術權威和一些老師、教授。王任重在“大躍進”的時候，搞“浮誇風”是出了名的。李達反對王任重的那些做法。當時王任重還提出，要“學習馬克思、超越馬克思”的口號，也受到了李達的批評。所以王任重和李達結怨很深。文革開始後，王任重就把李達說成是武漢的吳晗，發動學生起來鬥他。李達那時已經76歲了，身體也不好。1966年7月19日，他給主席寫信，請求解救他。我見到李達這封求救信後即呈送給主席，李達在信上求主席救他一命。毛

主席見信即作了批示：“陶鑄同志閱後，轉任重同志酌處。”我記得一次中央會議上，毛主席就當著王任重的面說對李達可以批評，但他是黨內最早宣傳馬列主義的理論家，要保護。而王任重接到主席批示後，並未對李達採取任何保護措施，致李達被鬥病重，不及時救治，而被迫害死亡。李達死後，主席在一次會上說，李達是中共一大的宣傳部長，他解說的《實踐論》、《矛盾論》是最好的。在資反路線期間，王任重在武漢把鬥爭矛頭指向了知識分子、學術權威和教師、學生。要在他們中間抓漏網右派。而且他抓人抓得厲害。工作組撤銷後，這些受打擊的人就起來造反。形成了武漢地區的首批造反派。王任重還背著中央文革小組，在後面支持“西糾”等組織和後來的“聯動”，而在王任重的後面，又有葉劍英等人在支持著他。

老舍的死在當時震動很大。毛主席很喜歡老舍，主席去看《龍須溝》時候，我也在場。演出剛結束，主席就站了起來，遠遠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經常和老舍談話。老舍有學問，二十四史他都熟悉。主席看到老舍總是很高興。我看他對老舍的喜歡如同喜歡郭沫若一樣。有一次主席跟老舍說，康熙是對中華民族有功之人。我們現在的國家版圖還是康熙那時定下來的。老舍聽了非常高興，因為他是滿族人。他說，這下好了，原先總覺得，滿族人殺了那麼多的漢人，感到抬不起頭來。現在我們可以抬起頭了，毛主席說康熙對中華民族也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歡老舍的戲。可是大家都喜歡的老舍，怎麼就在文革中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盡。對老舍的死，江青問過我們好幾次，究竟是誰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還懷疑是不是周揚餘黨指使人幹的。我們都說不可能，我們認為周揚餘黨沒有這樣大的力量，也沒有這種必要。江青說，你們不懂，他們這是要打著紅衛兵的旗幟來反文革，別有用心。她讓我去查。我曾經懷疑是葉向真這些人搞的，但查無實據。江青又叫謝富治去查，也沒有查出實據來。查了半天，有人把責任都推到他夫人胡潔青和他兒女的身上，說她們要和他劃清界綫。老舍在外面挨鬥，回家又挨罵。他找不到溫暖，這才自殺了。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他們來

人審問我的時候，根本就不向我提老舍這件事，他們祇提鬥爭王光美、劉少奇的事。我反過來質問他們，老舍是誰弄死的。他們卻不回答。看來他們很清楚這件事是誰幹的，但不好說。

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對上官雲珠，現在許多人說是江青迫害致死，胡說八道。我從未聽江青說要批判或鬥爭上官，更談不上迫害了，相反，江青不止一次說過上官是舊演員中最優秀的，思想又進步。批判《清宮秘史》時，江青還叮囑我，別牽涉上官。她說上官雖然曾與《清宮秘史》編導姚克做過夫妻，但她與《清宮秘史》沒有關係。《清宮秘史》受批判時，上官也受到單位群眾的批判，她回答不好，《文匯報》把情況反映到中央，江青專門問我，上海為什麼要鬥她？江青說，上官是個老實人。江青認識上官的丈夫姚克。姚克是影片《清宮秘史》的編劇。江青說，關於《清宮秘史》的爭論主要是針對著劉少奇對它的評價來的，主要也不是批判姚克。雖然上官的挨批判與我無關，但我當時還是馬上把江青的意見告訴了張春橋，要他去處理。春橋答應立即向上海方面通氣打招呼。令人惋惜的是，後來還是發生了上官跳樓的悲劇。江青還跟我說，憑什麼要鬥爭蓋叫天啊？江華是怎麼搞的。我說，這恐怕挨不到江華，他也管不了。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幹的。

馬思聰、傅聰等人的逃亡和死亡，也都是這樣的情況。但在文革後，他們卻把這些事情統統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頭上。可是他們又不拿出一件像樣的證據出來，而是放任一些無良作家去編造情節，散布謊言，以欺騙中國和世界的人民。

要說跟江青在歷史上有過過節的也就是周揚這些人了。周揚的弟弟跟她有過不禮貌行為。而周揚卻聽信他弟弟的話，不給她接組織關係。江青對此事一直不滿。但在文革時，江青並沒有讓我去整周揚和他的弟弟。那時我是江青很信任的下屬，她如果要整什麼人，她會先跟我說的。

後來審判她的法庭，說她讓葉群叫人去迫害鄭君里和一個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圖掩蓋她當叛徒的歷史，這是栽贓陷害。那時她連組織關係都沒接上，叫她叛變什麼？老實說，江青在文革中真

要抓上海什麼人，她不叫張春橋、姚文元就近去，卻要叫葉群派人去？這不是授人以柄嘛！這些事情的來龍去脈，都是很可疑的。據我的觀察，江青和葉群之間的關係多是政治性的來往，江青在文革前與鄭君里夫婦的關係很好，她能叫葉群去加害鄭君里？！不可思議。

江青倒是幾次跟我講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說她當年在上海時候，有一段時間生活非常困難，有時甚至餓肚子。多虧一位姓秦的保姆對她好。那保姆白天是在一個有錢人家幹活，晚上常常帶點飯菜回來給她吃。而且還很照顧她的面子，說是讓她嘗嘗她做的飯菜味道怎麼樣。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後，還請她來北京，安排她在一個幼兒園工作，可這保姆說在北京住不慣，還是要回上海去。在文革中，江青曾要我有機會去上海時，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麼樣，能不能照顧她些什麼。可後來不知是誰把這個保姆給關了起來。我估計這很可能是葉群叫人幹的事。她可能是爲了討好江青而辦了錯事。但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後來審判江青，鄧小平那些人叫那個保姆出庭作證，控訴江青。江青見了保姆一愣，她誠懇地對保姆說，她不知道這事。我相信江青說的是真話。

事實上，江青在黨內並沒什麼大仇人。她1933年入黨，不久就與組織失去了聯繫，之後直到30年代後期才恢復黨的關係。到1938年她和主席結婚了，她在黨內能有什麼大仇人。可爲什麼有那麼多人都嫉恨她呢。江青跟我說，有些人如項英他們其實是對主席不滿，他們不敢對主席怎麼樣，所以就都衝著她來了，甚至不惜制造她的謠言，通過她來埋汰主席。但江青有時脾氣不好，不善與人相處，恐怕也是重要原因。

3、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在文革中對知識分子的保護

1966年8月29日章士釗的家被抄了，章士釗給毛主席寫信，請求主席幫助。8月30日主席立即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

護。”而且主席同時還告訴總理，看看還有哪些人需要採取保護措施的，趕緊保護起來。總理馬上按主席指示去辦了這件事。

我聽總理講，章士釗家是聶元梓下面的人去抄的。聶元梓聽了總理的指示，趕緊叫人把抄走的東西一件不少地還了回去。後來，根據主席的指示，列了一份需要保護的人的名單，並派部隊去切實保護。名單中第一位是宋慶齡，接著是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蔡廷鍇、邵力子、蔣光鼐、沙千里、張奚若以及李宗仁等。在李宗仁之後就是國務院幾位副總理，還有好多部長、副部長。江青一看有意見了，說，總理，名單裡名人沒幾個，怎麼都是你國務院的人？國務院副總理就不用說了，還那麼多部長、副部長？

不管怎麼樣，通過這件事情，主席不僅僅保護了章士釗，而且把其他應急須保護的人也都保護了。衝擊名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布置，都是一些偏激分子甚至是一些對文革別有用心的人胡搞的。

江青是個愛才的人，而且她有眼光。她在文革中保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有才能的人。

在《紅色娘子軍》演吳清華的白淑湘，她的父親是國民黨的高級人員，有血債，解放後被人民政府鎮壓了。江青還是保她。我在會上就聽江青講了好幾次了。那時文革小組的文藝組組長是金敬邁，他那時威信很高，所有的樣板戲劇團都歸他管。江青說，我讓你們把白淑湘爭取過來，你們怎麼老不把她爭取過來。於是金敬邁趕緊找中央芭蕾舞團的劉慶棠去做工作。後來讓她在紅色娘子軍中擔任了B角。這在當時的樣板戲劇團裡是一件大事。後來毛主席逝世，江青被抓，白淑湘站出來控訴說江青迫害她。白淑湘如果真是這樣說的，那要麼她是受人利用，要麼就是她把劉慶棠錯誤對待她當成江青對她的迫害。劉慶棠藝術上有成就，但爲人不是很完善，不象錢浩亮、于會泳那樣嚴於律己。像白淑湘那樣的情況，當時如果没有江青保護，她的命運是很難預料的。

有一次，我向江青反映，廣東把紅綫女鬥得很厲害。給她剃

陰陽頭，讓她去了農場養鵝。江青說，那怎麼行。她還想叫紅綫女把樣板戲移植到粵劇裡去呢。她讓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吳法憲說，江青要保紅綫女，還要她去移植樣板戲。吳法憲馬上去跟黃永勝說了，把紅綫女保護了起來。

江青還保了作曲家李劫夫。文革一開始，東北音樂學院就把李劫夫定為黑綫人物，學生要批鬥他。江青跟我說，你把他弄到北京保護起來，讓他住北京飯店，由國家出錢。我馬上寫了個報告，江青在上面作了批示。江青所作的這個批示的原件，被夾在一本我出獄時歸還給我的書裡。我根據江青的批示，專門去和沈陽音樂學院的造反派講了話，做了他們的工作。後來李劫夫給我寫來了幾封信，表示感謝。“9.13”事件之後，有人揭發李劫夫寫過歌頌林彪四野的歌曲，江青反過來又批判了李劫夫，但林彪那時是四野的司令員，從歷史發展的觀點看，這不能算是什麼問題。所以江青也沒再深究。

體委的莊則棟、張燮林、李富榮、徐寅生在文革中也受到了衝擊。江青也讓我去保護他們。她說，他們都是為國爭光的小英雄，去鬥人家幹什麼。有人說他們是跟劉少奇黑綫的。江青駁斥道，他們都是孩子，懂什麼路綫？又有人說他們是跟著賀龍的，是賀龍的人。江青說，他們跟賀龍能有什麼關係？他們又沒打過仗，沒有捲入軍隊的內部鬥爭，怎麼能是賀龍的人呢？總理知道我要去保護他們，非常高興。他就叫榮高棠來釣魚臺找我，榮高棠原來是我在中央團校學習時的老領導，他就到釣魚臺來找我，見了面大家都很高興。

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很多。

4、中央文革在文革中保護國家文物

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的幾個人實際上人人都是積極保護文物、書畫、典籍的。因為我們都懂點文化，知道那些東西的珍貴，不

能隨便就毀了。我那時一聽到哪裡有人在破壞文物，就心疼得不得了。一次我拉上關鋒，一起去向江青專門匯報了關於文物被破壞的情況，江青又去報告主席。當時康生、陳伯達也都是很支持我這樣做的。毛主席對一些人不認真搞“鬥、批、改”，卻喜歡去破壞文物，感到很不滿。

1967年1月27日，主席叫我去與一些保管圖書、文物以及考古和博物館等單位的革命造反派開座談會。我在會上講了話，要堅決保護文物，並要求制定出具體的措施來。我的講話公開發表後，日本通訊社馬上就進行了報道，其他國家也有報道的。毛主席從《參考消息》上看了這些報道後，很高興。他肯定了我的講話和提出的辦法，說這些做法都是對的。我那個講話後來選出了個紀要，詳細規定和引導有關人員，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書畫、典籍。王力在他的“反思錄”裡也說到了這件事。

在1966年8月文革中的“破四舊”期間，確實還是有一些古舊的東西遭受破壞。這一直是國內外的一些人對文革不滿的原因。可是有些人明明是知道內情的，知道破壞文物主要是運動初期各地那批所謂的“老紅衛兵”帶有盲目性的偏激行爲，而且不久即被中央文革所制止。但他們爲了否定文革，就對當時的一些真實的情況閉口不談。事實上，中央文革小組當時沒有發出過任何一個破壞文物的指示或者講話。

就拿批孔、清理孔廟、挖孔子墳的事情來說，最初是由曲阜當地的造反派提出來的，他們給中央文革寫信反映當地文革運動的情況。毛主席闡明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造反有理”，是文革運動的指導思想；而孔子的道理，歸根到底，也是一句話：“造反無理”。因此，我們覺得，批孔是文革應有之義。但這是件大事，讓群眾自發去搞，不如由中央文革主動加以引導，防止造成不應有的破壞。當時北師大的學生造反派譚厚蘭他們聽說此事，反應很積極。陳伯達表示支持譚厚蘭她們的革命精神。這個事當時就放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會上來討論了，這個會總理和康生都參加了。總理在會上講了話，康生、江青也關心這個事。關鋒是批判孔子的專家，

他對批判孔子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議，但他對清理孔廟，挖孔子墳是持謹慎態度的。不過他也說了，孔廟、孔子墳是幾千年封建統治階級壓迫人民的象徵，乘文革的東風，清理一下也好。但要有專家參加，不可亂挖、亂毀。康生在會上分析說，孔子墳裡可能是沒有什麼東西的。孔子是窮教授，沒有錢財，頂多有幾捆竹簡。陳伯達說，有竹簡挖出來也好，可以彌補學術研究。他估計尸體早腐爛了，孔子的後人又不能像秦始皇那樣保存墓葬。所以挖不挖祇是個形式問題。我當然是積極擁護清理的，我提議，不妨由國家派出考古人員和他們一起去，這樣既可以滿足群眾挖墳的願望，又可以進行考古發掘。最後，總理綜合各方面看法，拿出了意見：與考古所相結合，作科學的清理。

在得到中央同意後，由陳伯達、關鋒和我向《紅旗》雜誌的林傑作了傳達，要林傑去北師大作動員報告。隨後譚厚蘭組織了一個隊伍，在1966年11月浩浩蕩蕩地開到曲阜，結合當地院校的師生，成立一個“全國紅衛兵徹底砸爛孔家店革命造反聯絡站”，在曲阜市大造了孔夫子的反。

紅衛兵在曲阜造反，山東省委馬上給中央文革打來電話請示。我即根據總理在中央文革會上的指示精神，代表中央文革電話回復山東省委，要求他們告訴紅衛兵，孔廟裡的牌匾，明代以前的都不能砸、不能損壞，要保護好。清代的可以砸，但康熙、乾隆的不能砸。孔廟可以改造，象收租院那樣改造。孔墳可以挖掉，但要有懂文物的考古人員在場參與，對墓中文物要保護。陳伯達亦將上述精神直接告訴了譚厚蘭他們。後來聽譚厚蘭匯報，根據陳伯達傳達的總理指示精神，對孔廟的碑匾、文物要保護的都寫上了紅字保護，並留有照片。

考古隊和學生們一起去了之後，主要是當地貧下中農的造反隊伍動手挖開了孔子的墓，發現裡面全是黃土，什麼東西也沒有，連竹簡也沒一片，更談不上什麼珍貴文物了。實際上，那是不是孔子的墓也不一定，說不定就是後人隨意堆起的一個土包包。孔子當時沒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他最高的官職祇是個司寇，而魯國又是個彈

丸之地，能有多少東西留給他。孔子死的時候，他弟子還沒有整理出《論語》呢，所以也不可能把《論語》放在裡面。他一生是述而不作的，沒有自己的專著。而《詩》、《書》、《禮》、《樂》各種典籍也不可能放在裡面。

所以，所謂的孔子墓，祇是在他被捧為“萬人師表”以後，才由後人重新給他重修的一個墓。而孔子死時為他造墓的人都不是官僚、富親，墓裡沒放什麼殉葬品也是合乎情理的。實際上，幾千年來，孔子的思想對幫助封建統治鞏固自己統治階級地位有利，他的墓實際上祇是個糊弄人的象徵。關於對孔廟裡碑、匾等文物的清理，譚厚蘭他們是根據陳伯達傳達的總理指示精神，清朝康、雍、乾之前的碑、匾等東西，都是文物，不能破壞；以後的可以清理處理。譚厚蘭她們當時就是按這個原則清理孔廟的文物碑、匾等東西的。

在我和關鋒被打倒後，曲阜市裡的一些人自己又起來造孔子的反了，叫做徹底反孔。他們批判我們包庇孔子，還不準砸康熙、雍正和乾隆的東西。他們要重新砸，於是有一塊很大的康熙時修的碑被砸出了一條裂紋。文革結束後，有人說這些事情都是譚厚蘭他們幹的，其實不是，是曲阜市第二次大造孔子反的人幹的。

在中南海裡也有文物保護的問題。中南海的警衛戰士說中南海裡有很多都是皇帝的御碑什麼的，要搬走。總理說，中南海裡的文物要保存，清三代（即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東西要保存，1840年以後的東西，有許多也是文物，也要保存。我向戰士們傳達了總理的意見，戰士們都執行了，他們知道，康熙、雍正、乾隆的東西不能搬，也不能砸。所以，歷代皇帝們在中南海立的那些石碑都保留了下來。

第十四章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關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出

在1966年10月1日林彪所作的國慶講話中，提出了“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這個概念。這個講話稿是張春橋起草、陳伯達參與修改的。在事先中央開會討論的時候，王力曾經提出過“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主席說，反對革命不等於就是反革命。總理說，主席說得對，要把反對革命和反革命加以區別。所以10月1日上午在林彪的講話中用了“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路線”。但是，當天對外發稿時，反映“反對革命”和“反革命”這兩個詞，用外文翻譯出來是沒有區別的。所以當天晚上江青就讓我們開會討論研究一下。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期，關鋒就在小組討論時首次提出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講法，在當時就引起人們很大的關注。不過在會議發表的公報上面沒有采用關鋒的提法。關鋒的這個講法顯然是從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裡所說的“……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這個說法裡引申過來的。毛主席在這段時間裡，曾經反復多次跟我們講，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毛主席的這些話就是針對黨內那些老是想著動用軍隊，來鎮壓造反派群眾的當權派講的。不過，毛主席在當時還沒有把它提到路線鬥爭的高度來講。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許多群眾就在大字報中提到了路線問題。

在中央文革小組開會討論的時候，陳伯達說，還是關鋒的提法

好，“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家對陳伯達的說法都表示贊成。中央文革小組討論這個問題時，總理有事沒有參加。會上江青讓關鋒就此提法給主席寫了封信。主席看了此信，同意“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並把這信批給其他中央同志。這個提法就這樣確定下來了。江青後來講，我們中央文革小組還真不缺哲學家，在那時就提到了路線問題。後來在關鋒被審查的時候，江青還說，關鋒對文革是有功勞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他提出的。

在1966年10月2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十三期上，發表了《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的社論。這篇社論是關鋒、王力起草，陳伯達簽批的。在這篇社論中，根據文革小組討論確定，報主席同意，第一次公開提出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概念。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來簡稱“資反路線”）的提出是具有根本的意義的。在當時看來，它是指從1966年6月1日聶元梓的大字報向全國廣播後，到7月26日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這個時期，劉少奇、鄧小平派出的工作組鎮壓學生起來參加文革運動，對群眾搞白色恐怖，企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方向，改變為對廣大人民群眾的鎮壓。然而實際上這種情況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65年的“四清”運動中就早已反復出現過。二十多年後，發生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不過是這個路線徹底、完整的暴露罷了。

毛主席決定撤銷工作組後的1966年8月、9月這個階段，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新的表現形式出現。在原來一些工作組領導和黨內一些高層人物支持下，原來支持工作組路線的保守派的群眾組織站到前臺，繼續堅持與維護工作組實行的打壓造反派群眾的路線。這期間，尤以“西糾”為代表的老紅衛兵組織，更是打出“保護老幹部”的旗號，實行保爹保媽、保護“走資派”免受造反派群眾批判、衝擊，而有意將文革運動鬥爭矛頭引向社會亂打亂殺，隨意抄家，制造所謂“紅色恐怖”。在中央文革小組討論，當時文革運動形勢時，關鋒就說，它是“劉、鄧資反路線”走向社會的一個變種。

1966年9月18日至20日，由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大專院校部分師

生座談會。這個座談會開了3天，我都參加了。座談會上，就有人發言提出，八屆十一中全會雖然改選了中央的常委會，結束了劉、鄧對運動的領導。但是並沒有著手系統批判他們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問題。從文化大革命運動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黨內長期來確實存在一條與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相對抗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文化大革命運動，應發動群眾公開批判這條右傾路線，讓廣大群眾都知道。

1966年10月2日發表的《紅旗》第十三期的社論，實際上是確認了這條路線的存在，從而將黨內的路線鬥爭公開化了。毛主席在群眾發動起來後，為了扭轉文革運動過往偏離重點整走資派的鬥爭方向，而明確地提出批判“資反路線”，把文革運動正確的鬥爭方向更加清楚鮮明地告訴全黨與廣大群眾。這也是毛主席、黨中央對反對工作組路線的造反派群眾組織的鮮明的、堅定的支持。各地起來參加造反的群眾就此有了新的思想武器，從而對中央各部門和各省、市的領導形成了更大的壓力。

2、毛主席主持召開10月中央工作會議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一次工作會議，毛主席親自主持了這次會議。參加會議的除了有中央及各部門的領導之外，全國各大區、各省市的主要領導也都參加了。這次會議的主題就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共產黨是靠著人民群眾的支持才推翻了國民黨反動統治，從而奪取了國家政權。而且，共產黨掌握國家政權，與以往剝削階級所建立的統治是有著本質區別的，它是為廣大的人民群眾謀利益的，是為人民服務的，而絕不是利用手中的權力來為個人或某個集團謀取利益的。但是實際上在掌握了國家政權之後，在共產黨的一些幹部中就發生了變化。一開始的時候，是官做得大了，做得久了，就聽不得下面群眾提意見了。對向他們提出意見的群眾往往就採取壓

制態度，甚至是進行打擊報復。1957年，從共產黨給自己進行整風的運動，發展變成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右運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當然，這其中確實是有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向新當政的共產黨所發動的進攻。但是在反擊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時候，許多部門和單位的領導，把一些向他們善意提出意見的人都打成了“右派”。反右擴大化就是這麼來的。他們把自己看作是黨的化身，反對他們就是反黨。我在中南海親身經歷了“八司馬事件”，對此的感受尤為深刻。

到了三年困難時期，一些幹部更進一步的嘗到手中掌握權力的滋味了，他們非但可以享受到普通人所不能得到的“特供”，更有人利用權力來為自己謀取經濟上的利益。當時提出的“三自一包”，表面上看是為了擺脫經濟建設上所出現的困難，可是如果真的搞起來了，真正得利的還不是那些手中掌握權力的人？正是針對當時已在上層領導及一些幹部中出現的這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傾向；針對一些上層領導與幹部從人民的公僕變成人民的主人，腐化變質，演變成特權官僚階級的傾向，毛主席發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毛主席發動這場運動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重點就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然而劉少奇在具體指導這場運動的時候，又把它改變成了整肅下面廣大基層幹部和普通群眾，所謂解決“四清與四不清”矛盾的運動了。由此，劉少奇與毛主席在政治上產生了重大的分歧。

到文化大革命起來後，劉少奇仍然是故伎重演，要把毛主席發動起來的，從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造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反的學生和群眾，又一次打成是向黨發動進攻的“右派”。而且，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這絕不僅僅是劉少奇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思想，它在黨內已經形成了一股頗大的勢力了。

劉少奇在大會上作了檢討，他的檢討雖然很長，可是通篇都只是在重複毛主席歷次對他所作的批評，看不出有他自己的誠意。所以被認為是“假檢討”。

鄧小平也在大會上作了長篇的檢討，他的態度要比劉少奇要

好，可是還是有很多人對他的檢討不滿意。

3、我所知道的劉少奇

我進中南海後，也是在中南海舉辦的舞會上第一次見到劉少奇。那時在我的眼裡，他也是黨和國家的領袖，所以對他也是非常尊敬的。不過在工作中，我和他接觸機會很少。

大概是在1952年“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時候，我們處理了一封湖南來的信件。信裡的內容是，湖南長沙有個楊劍雄，是湖南軍閥趙恒惕的親戚兼秘書，他是劉少奇的同學。1925年劉少奇任全國總工會領導人時，在長沙被趙恒惕逮捕。那時趙恒惕對共產黨大幹部是抓了就殺的。後來是楊劍雄向趙恒惕求情，趙恒惕才把劉少奇給放了。在放的時候，趙恒惕還送劉少奇一套“四書”，叫他去好好閱讀，改變思想。解放後，楊劍雄在“鎮反”運動中被人民政府逮捕。在審問他的時候，他說他曾經救過劉少奇。當地政府看他把事情說得有頭有尾、很具體，不像是假的。就把他寫的材料和一封他寫給劉少奇要求寬大處理的信一起送到北京。信是先寄給公安部然後再轉到中南海來的，因為當時我負責處理北京地區信件，所以先送到我這裡。我一看信的內容，說的是湖南的事。所以就把信轉給了我們秘書室負責處理中南地區信件的科長朱固。朱固把信送給了劉少奇。過了一段時候，我向朱固問起那封信後來處理了沒有。朱固告訴我，少奇同志直接在信上寫了個批示，說沒有這個事，要當地政府立即把那個人處決了。當時我的心裡就想，信裡提到的是你個人的歷史情況，按道理你應該上報給主席的，或者至少也應該給其他的中央領導同志看一下，怎麼就這樣直接下令把那個人給槍斃了。不過，劉少奇是中央的副主席，所以我也不能說什麼。後來在文革的時候，這件事被湖南省的造反派重新提了出來，劉少奇當年批的那封信也被找出來了。

1958年，我在“八司馬事件”中挨整，當時我們祇知道是楊尚

昆在整我們，後來才知道是劉少奇指示楊尚昆這麼做的。我們“八司馬”所反對的何載和劉少奇的關係很好，劉少奇當時就有讓何載來取代田家英的意圖。

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我聽了劉少奇在會上的講話，心裡是很有看法的。他講到大躍進以來的錯誤時，就說這由中央來負責，而不說他自己該負什麼責任。其實，在刮“共產風”、提“高指標”的時候，他是最起勁的一個。毛主席在會上說了，中央的責任首先應該由他來負，因為他是黨的主席。而劉少奇在講話中順竿而下，明顯把錯誤責任上推毛主席，下推各省市。所以，後來林彪在大會發言，上來就說，不是毛主席犯錯誤，是我們這些人犯了錯誤，是我們沒有按照毛主席說的去做。林彪的講話很明顯的是有所指的。林彪的講話，受到了全場熱烈的鼓掌。

劉少奇在一綫主持中央工作後，對中央組織部和中央辦公廳控制得很緊。安子文、楊尚昆是他的得力助手。

其實，劉少奇這人挺厲害。歷史學家呂振羽在1927年的時候，在武漢就和劉少奇一起工作過。後來給劉少奇當過政治秘書。建國初傳出了劉少奇1927年在汪精衛反共的前夕，下令解散工人糾察隊，並且向汪精衛上交了工人手裡的武器，自己跑到廬山上去休養的事。有人向主席反映了這些事情。據說劉少奇懷疑是呂振羽講出去的，就把呂振羽關進了監獄。到文革時，是關鋒建議中央下令把呂振羽放出來的。呂振羽在獄中以及出獄後揭發了劉少奇的許多錯誤。

在我的印象中，劉少奇應該是一個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並不是共產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其實他的治國理念，也就是現在有些人所非常熱衷的“把革命黨變為執政黨”，把執政黨變為代表新生利益集團的新統治者。毛主席曾諷刺他是“劉皇帝”。

“五一六通知”以後的歷次中央會議我大都參加了。我親眼目睹了劉少奇他們是怎樣對待群眾運動的，他們對領頭起來提意見的學生、工人和幹部那是毫不留情的。而且他們總是借口在群眾中有壞人，而把群眾當作“壞人”來鎮壓。那時我們中央文革小組在他

們主持的中央的會議上，是沒有什麼發言權的。我祇能把會議的情況通過江青報告給毛主席。江青向我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讓我們到各個學校去了解情況，我們去看了之後，幾乎每一個學校的造反學生和群眾都受到了“工作組”打擊，不但被批鬥，不少人還被帶上了“反動學生”的帽子而被關押。“反干擾、抓游魚”沒幾天，僅北京就抓了一萬多人。後來還造成了一些群眾自殺。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及時制止，那受到處分和打擊的群眾，一定會遠遠超出1957年的“反右”運動。

4、我所知道的鄧小平

在我的感覺上，開始鄧小平在中央領導中的威信並不高，好多人都不怎麼把他當回事。可是毛主席不但很器重他，甚至可以說是喜歡他。董老說，“五馬進京”，高崗一馬當先。其實，在五馬中提拔得最快的是鄧小平。因為高崗在建國的時候，就已經是國家副主席了。到後來，我才知道，毛主席之所以器重鄧小平，倒不完全是因為他以前曾經是“毛派”，而是他的政治組織能力確實很強。

那時，中央書記處開會都是有專門的速記員作記錄的。可有一次，因為速記員有事，就臨時叫我去幫助記錄。那是一個討論工業問題的會議，會上亂哄哄的，你一言，我一語，根本無法記錄。可到鄧小平講話的時候，他高屋建瓴提綱挈領地歸納出了幾條，就把大家的意見都概括進去了。這樣，我的記錄也就很順利了。大家聽了也都表示贊同。我也一下子就對他刮目相看了。

他平時也不怎麼看書，也不怎麼講理論。但是有些事情，特別是毛主席提出的一些理論問題，別人要琢磨幾遍才懂，他卻聽一次就能夠抓住要害。當時經常和他在一起打橋牌的，像吳晗呀、萬里呀，呂正操呀，其實都是他的高參。

他最厲害的一點，就是能抓住毛主席的心思。毛主席雄才大略，神機妙算，高深莫測。他的想法，有些連總理、陳伯達、江

青都揣摩不透。而鄧小平卻可以把握得很準。可以說，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他後來寫給毛主席的那封“永不翻案”的信，無論在選擇的時機上和對主席心理的把握上，都有“古文觀止”名文的水平。盡管這在政治上是欺騙，但是對於如君子之方的領導人卻能有醍醐灌頂、發人猛省的作用。

不過，你很難說他這個人在政治上是有什麼信仰的。他向往的大都是歐美資本主義的那一套，信奉的就是“不管白貓黑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與功利主義哲學。而且他做起事情來，往往是没有底線的，別人不敢做的事情，他都敢。連馬列主義的經典論述，毛澤東思想的根本原理，甚至社會的道德、為人的準則他都敢於徹底拋開。

第十五章 批鬥“彭、羅、陸、楊”、 彭德懷等問題

1、批鬥“彭、羅、陸、楊”

1966年12月12日，在首都工人體育場，召開了有十萬人參加的“誓死保衛毛主席，鬥爭‘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誓師大會”。這是文革中第一次有廣大群眾參加的公開批鬥原中央上層高級領導幹部的大會。但是，這個會議，並不是中央文革小組發起和組織的。這麼大的會，批判這麼大的人物，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第一副組長江青都未到會。

這一事件還要從葉劍英講起。1966年9月，葉劍英參加了一個部隊文藝工作者的會議，並接見了文藝院校的代表。在會上和會後接見代表的時候，葉劍英發表了支持江青搞的文藝革命和樣板戲的講話。我也受邀去參加了這次會議。回來後，我就把這事報告了江青。江青聽了以後，很高興。她親自給葉劍英打電話說：葉帥啊，我聽說你在文藝院校代表會上講了話，支持文藝革命，支持樣板戲，我很感動啊！葉劍英在電話裡跟江青說：我的女兒葉向真是中央戲劇學院的學生，她經常給我反映文藝界的情況。她和她的丈夫劉詩昆都支持你。你在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她們都學習過，我也看過。我們都覺得非常好，非常重要。江青和他通完電話就對我說：聽說葉向真他們也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文藝革命的，經常向葉帥反映文藝界情況。你去找葉向真談一談，叫她積極

參加文化大革命。江青還說，不久以後，北京要開一個文藝界造反派的大會，各藝術院校和樣板戲劇團都來。你去安排讓葉向真在會上發個言。

我那時雖然還不認識葉向真，但我與她的生母曾是黨校輪訓時的同學，知道她家中的一些事情，也從她母親那裡知道一些葉劍英和葉向真的情況。江青說了以後，我就去找了葉向真，並安排她在1966年11月28日召開的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發言。葉向真在發言中，支持江青關於文藝革命的講話，支持樣板戲，講得挺好。

本來，在文革初期，中央戲劇學院的工作組是由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派出的，而葉劍英從1958年起直到1972年，一直就是軍事科學院的院長。所以這個工作組是支持葉向真的，葉向真還擔任了中央戲劇學院文革籌委會的主任。到了當年7月底，毛主席決定撤銷工作組後，葉向真馬上轉過來了，開始反工作組了。人家說，你根本没受壓，反什麼工作組！

葉向真從支持工作組變為反對工作組的造反派後，名聲已經不小了。現在又在這樣的場合發言，就一下子轟動起來了，更成了中央戲劇學院造反派學生的代表，而且在整個文藝界也有了影響力。戲劇院校的，芭蕾舞團的，歌舞團的，好多文藝團體的造反派都聽她的，她一時成了文藝界造反派的學生領袖了。

這以後，葉向真來找過我。那時李訥也來文革辦公室，葉向真也同她見過面，兩人談過很多關於文藝革命的事。

從文革一開始，葉劍英的態度就很積極。在毛主席面前，他都是以一個堅定的革命左派面貌出現的。當時我也認為他反對彭真、反對劉少奇和鄧小平都是真實的。他尤其反對羅瑞卿，說羅瑞卿很不尊重他，也不尊重陳毅、聶榮臻、徐向前這些老師，目中無人。

11月28日文藝界大會後一天，在一個會議的中間，葉向真過來找我，說要向我匯報工作。當時在我兩旁的座位上都已坐滿了人，她就半蹲在我前面跟我說話。她說他們把李伯釗（楊尚昆的夫人，

當時是中央戲劇學院的院長)給鬥了,還抄了她的家,把她的許多封資修的戲劇照片和衣服,就放在她的身邊給燒了。然後她又跟我說,我們不光要鬥李伯釗,還要鬥楊尚昆。我說,楊尚昆的問題當然比李伯釗大,但他不是搞文藝的,跟他夫人不是一碼事。她說,那不管,也要鬥。“彭、羅、陸、楊”都要批鬥。她希望我支持他們。我說,鬥“彭、羅、陸、楊”,這可是件大事,得有中央的批准。我說了不算,你要去找總理。她說,哎,總理那麼忙,我怎麼找得到他呢。我說,你父親經常與總理在一起,你應該去聽聽你父親的意見,他是老革命了,有經驗,千萬不要自己亂來。她聽我這麼說,也就走了。

到了12月初的一天中午,周總理打電話來問我,誰把彭真、羅瑞卿、陸定一給抓走了?總理說話的口氣很嚴厲。我忙說,總理,我不知道這事,我哪有那麼大的膽子啊?說完這話,我馬上想起葉向真向我說過要組織人批判“彭、羅、陸、楊”的事。我就把這件事跟總理說了一下。我這麼一說,總理就明白了。

後來葉向真跟我說,總理找到她了,要她把人交出來。她說,總理真是個談判高手,她根本就不是他的對手。總理兩句話就讓她答應了他全部的條件。總理說,你現在把人交出來,你要開會批判,經過我們研究批准以後,就交給你們去批鬥。你們不是還少一個楊尚昆嗎?楊尚昆你們是找不到的。你現在把人交給我,到時候我把楊尚昆一起交給你們去鬥。

那時,羅瑞卿住在醫院裡,陸定一剛搬出中南海,他們兩個比較好找。可彭真家裡的圍牆非常高,不開大門你是很難進去的。葉向真後來對人說他們先巧用計謀,混進大門,然後用聲東擊西的辦法押著彭真從小門走出去的。但我又聽說他們是找人先翻圍牆進去後把門打開的。彭真家那麼高的圍牆,可不是一般人容易翻牆過去的。總之,那時葉向真也是個時代的弄潮兒,怪不得後來她復出後,在新潮流中她又轉身做回電影導演,執導《原野》,也引起不小的影響呢!

第二天,我在總理那裡遇到了葉劍英。我就說,葉帥呀,你

女兒真行啊,竟然把彭真他們都抓起來了。我是故意當著總理的面說這句話的,意思是告訴總理,抓“彭、羅、陸”是得到葉劍英支持的,與中央文革小組無關。葉劍英多聰明啊!他聽出我的話音來了,馬上就說,哎呀,我女兒一個小孩能有多大本事,她都是在江青和你們的指導下,才能做出這麼點事情。靈敏透頂的周總理早就從我們的對話中明白了一切,我也就不必再解釋了。

後來他們召開鬥爭“彭、羅、陸、楊”的大會,江青叫所有中央文革小組的人都不要去參加。她說,這是他們搞的事,咱們別去攪和。可總理不同意,總理說,這麼大的事,中央文革一個也不去,不太好。所以,後來總理就要我和王力、關鋒幾個人應卯式地去參加了大會。江青叫葉群也不要。但葉群後來還是去了,她是換了便裝,戴上帽子和大口罩,悄悄地去看的。她主要是想去看陸定一下場的。

那個批判會開得很沒有水平,鬥彭真的時候就是喊喊口號,念念稿子;羅瑞卿腿摔斷了,就把他放在一個籬筐裡抬上去鬥,弄得群眾都看不下去;鬥陸定一的時候,陸定一很緊張,一直在大喊大叫;而鬥楊尚昆,就根本沒有拿出什麼材料,連竊聽器事件都沒說。

從那以後,我跟葉向真的聯繫就很少了,她有時來找我,我也有戒心了,跟她說話就比較少了。但當時她早已經認識了好些造反派組織的頭頭了。這女孩真厲害,沒幾天,她就在地質學院的朱成昭攏絡住了。朱成昭和她交好後,慢慢地最後就轉而聽她的,不聽我們的了。

後來1967年7月,葉向真帶著朱成昭一些人坐火車去南方。一路上,她肆無忌憚地謾罵江青和中央文革,而且打算偷渡香港。同去的人把情況緊急反映給了我們。江青看了這些材料,就把它拿到了總理那裡去,跟總理說,你看這些人都是怎麼罵我們的,他們還想偷渡去香港呢。總理看了以後對江青說,這件事,由我來處理,你們別管了。今後不會再“節外生枝”了。結果,總理與葉劍英商量後,把葉向真、朱成昭連同劉詩昆都一起隔離審查了。

2、關於張霖之等人被鬥致死的事件

張霖之是一位很早就參加革命的老幹部。自1957年以來，他就一直是煤炭部長。在五十年代，煤炭部對煤礦的安全生產一直不夠重視，大、小煤礦經常發生礦難。一個礦難，就幾十，上百個地死人。當時對發生的礦難事故，報紙上是有選擇報道的，但在內部有大量的通報。從每天的群眾來信中也常有礦難家屬寫來的血淚控訴。我和同事們看了都心酸落淚。所以哪個地方出什麼事，哪兒的煤礦又發生瓦斯爆炸了，是我們最害怕的事情。

為了強調煤礦安全生產的重要性，中央還在中南海瀛臺舉辦了一個煤礦安全生產的展覽。毛主席也去看了。在展會上，他千叮萬囑一定要保證煤礦的安全生產。後來祇要是去參觀展覽的，解說的同志就會給你講，毛主席也來參觀了，並且一再叮囑我們要搞好煤礦的安全生產。

毛主席多次批示文件，要求煤炭部認真解決安全生產問題。他還找來管經濟的領導同志一起談話，多次講到要注意工人的安全，特別要注意煤礦生產的安全。要安全第一，寧可少生產點，也要保證安全。毛主席早年在安源煤礦工作過，也下過礦井。他親眼看到煤礦爆炸以後，煤礦工人家屬帶著小孩都站在礦井上面等消息，他們的親人就在井下，不知是死是活。哭聲、叫聲連成一片，場面非常淒慘。

毛主席也多次找張霖之，要他解決這個安全生產的問題。說你們寧可把危險大的煤礦停產，也不能死人。還說，你們是為人民服務的。老百姓死了，你怎麼為他服務？一個工人死了，他的家就完了。

可是張霖之回去後，礦難依然是接二連三地發生，似乎什麼問題都沒有解決。而在三年困難時期，反映煤炭部領導和煤礦領導特

殊化、多吃多占國家對煤礦工人特別照顧的糧物的信件也很多。這些信件反映的問題也大都報送給了毛主席。

對煤炭部的這些種種問題，特別是安全問題，毛主席震怒了，說張霖之是不顧人民死活的“死官僚”。為了礦難的事情，毛主席還批評過總理。文革中，江青在文革小組會上提出批判張霖之的時候，總理也說，這個張霖之是怎麼搞的？儘管國家的外匯那麼緊張，但中央還是批了許多外匯給他，讓他去進口安全設備，可怎麼還是出那麼多事？

1965年，劉少奇和毛主席在討論“四清”運動“二十三條”的時候發生了爭論。劉少奇當面質問毛主席，什麼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誰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能舉個人出來嗎？毛主席認為，走資派就是老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不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這些人祇知道維護自己的特權利益，不管老百姓死活。所以他接著劉少奇的質問說道，誰是走資派？煤炭部長張霖之就是。

儘管毛主席那時就已經點了張霖之的名，可他卻還是穩穩地坐在煤炭部長的位子上。文革開始以後，他又跟著劉少奇搞資反路線。各地煤礦、礦業學院的學生和煤炭部的群眾給他貼了大字報，他就整學生，狠整給他提意見的工人、幹部。祇要是給他貼大字報的，他就認為是右派，把人家給抓起來。劉少奇要“抓游魚，反干擾”，他在礦業學院搞的也叫“抓游魚、反干擾”，但到了煤炭部搞的就是“抓反黨分子、野心家”了，說這些人想利用群眾的不滿，利用群眾運動，篡奪黨的權力。

文革運動中，我們還收到不少煤炭部群眾的來信，講張霖之怎麼大吃大喝，從大躍進時候開始，就一直是這樣。而且喝酒很厲害，喝的都是最名貴的酒。更嚴重的是，一個煤炭部黨組的成員來信揭發，張霖之在酒後竟謾罵毛主席是秦始皇，專制獨裁。他罵毛主席，可能與毛、劉爭執時，主席點了他的名有關係。這些事，當時在煤炭部底下傳得很廣。所以康生說張霖之是彭真的“死黨”。中央文革小組的人也普遍對張霖之的印象不好。

1966年12月14日，中央文革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一個北京市學

生造反派組織代表的會議，江青在會上說，張霖之是彭真死黨，號召學生對他開展批判。到12月下旬，在總理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上，江青又說，有個走資派，毛主席都點了他的名了，可是還沒受到批判，是不是有人包庇？江青講話後，總理也講話，說張霖之官僚主義，漠視煤礦生產安全，要組織批鬥張霖之。但是，光說要鬥，這沒有用，得有人去具體執行。江青在會上就要我去發動群眾批判張霖之。總理也同意要我去，他要我把為什麼要批鬥張霖之的道理向群眾說清楚。我當時對執行總理、江青的指示很積極，會後就到礦業學院去發動群眾。總理還叫我帶上幾個解放軍戰士一起去。

我去了礦業學院，找到了造反派學生，開了群眾大會，動員他們組織召開批判張霖之的大會。我在會上講了話，號召同學們、工人們要同張霖之作堅決鬥爭。但同時我在講話時也強調了，要聽毛主席的話，堅持用文鬥，不用武鬥，不要打人。礦業學院和煤炭部的人也向我保證，不用武鬥。我的講話，後來都按原始記錄，印發全校師生，各種小報紛紛轉載。記錄上面也記有我告誡他們要文鬥，不要武鬥，不要打人的話。

可是沒想到，鬥爭張霖之的大會一開，情況就起了變化。起先在煤炭部和礦業學院鬥爭的時候，還是比較文明的。可是上海一月革命發生後，全國各地的工人造反派都起來了。所以不少煤礦的工人，還有死難者的家屬，都來北京找張霖之討說法，許多人專門從外地趕來北京參加批鬥張霖之的大會。當這些煤礦工人，特別是那些在運動中挨過鬥和在礦難中死去親人的家屬參加進來以後，就不得了了。有些死難者的家屬控訴，說他們向領導提意見卻還挨了鬥，有的人還被打成反革命，被關了起來。這一下就激起了巨大的民憤。那些工人的手上都有勁，他們想到自己的委屈，那鬥爭時打起來是毫不留情的。礦院的學生們根本就攔不住。這一下張霖之就慘了，他確實是被打得很厲害的。他忍受不住了，在1967年1月22日上吊自殺了。我看過他的尸檢報告，上面說身上有很多的皮肉傷，有青淤血斑。這當然都是被打出來的。

張霖之死了，總理自然是很不高興的，他說，他也不好向毛主席交代了。總理在1967年2月17號（老師們大鬧懷仁堂的第二天）的講話中，也講到了這件事情，說他很傷心，他連自己的部長都沒有能夠保護好。對待幹部不能這樣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後來我還聽參加過“江青專案組”的人跟我說，張霖之死了以後，總理很氣憤，在我被捕之後，總理說，戚本禹打死了張霖之，把他槍斃都可以。可我還在臺上的時候，總理得知張霖之的死訊後，倒也沒有聽到他說過要槍斃我，那時，他仍然經常向我布置工作。

對於張霖之的死，我當然負有重大責任，我也一直感到很內疚。我當時知道張霖之在底下民憤很大，所以應該考慮到可能產生的後果。但在組織批鬥的時候我沒有具體布置人去控制批鬥現場，我沒有這樣做是我嚴重的失職。我不推卸這個責任。尤其是後來我聽說，張霖之在戰爭年代的表現很勇敢，是個能打仗的將軍，為革命作過很大貢獻。而且從個人品德來說，他也是比較正派的，除了吃吃喝喝，沒有其他問題。

就我所知，在文革中，倒還真有一個老幹部是在批鬥中被人打死的。雖然隨意打死人是完全錯誤的，但這件事卻是事出有因。他是北京一所大學的黨委書記，也是個資格很老的幹部。總理知道這人被打死後發了火，說這個人過去是有功的，怎麼把人家弄死了呢。他叫我去查，看是誰搞的。我帶著人去一查，情況就都清楚了。原來這是個連禽獸都不如的人。還是在文革前，他把他們學校的一個長得很漂亮的女學生給強奸了。那個學生被他強奸後神情恍惚，飯也不吃了，樣子很可怕。學校老師也不知道她是什麼原因變成這樣的，怕她出事，就把她的母親找來了。母親來了一問，那學生也沒具體說，祇說是被領導欺負了，不想活了。她母親還以為是下面的老師或者幹部幹的，就堅持要找學校的最高領導告狀。結果就找到了那個黨委書記。那黨委書記一看她母親，長得比女兒還漂亮。竟把她母親也強奸了。強奸以後還跟她說，不準到外面去說，你女兒要什麼照顧都可以，否則就怎麼怎麼的威脅人家。她母親在被強奸的時候，反抗不了，就在那人的身上抓了一把皮肉下來，緊

緊地拽在手裡。還把留著穢物的內褲也保存了下來。然後，那母親就對她女兒說，你的事我都知道，你要堅強，不要怕。我們總有一天要報這個仇的。兩年不到，文革開始了，那位母親就去了學校。她很聰明，為保護女兒，她不講女兒的事，就講自己的事。她這麼一揭發，其他那些也被那個黨委書記污辱過的女孩子也都站出來了。那個老幹部平時在學校是說一不二的，非常霸道，被他欺負的女孩子不是一個兩個的。他還整知識分子，整下面幹部，而且都整得很厲害的。這一次群眾起來了，就不得了啦！那位母親把她保留下來的證據拿出來給大家看，然後就拿去公安局作檢驗，檢驗的結果，血型跟那個黨委書記是一致的。群眾憤怒了，自發地鬧起來開批鬥大會，把那人打慘了。儘管當時中央有規定，在文革中不搞男女生活作風上的問題。可他這已經不是生活作風的問題了，而是新走資派黃世仁和新喜兒的故事了。我把調查到的材料全部整理好，就拿去向總理匯報。總理一邊看一邊就用手拍打桌子，連聲罵道，這還叫共產黨！這是土匪、惡霸呀！我就問總理，怎麼處理？總理氣憤地說，不要處理了，把屍體燒了算了，不要再提了。我跟總理講，那我去跟群眾也說一下，叫他們也不要再提了，這對黨的影響太不好了。總理說，對，誰也不要再提了。

我寫到這裡，一直有思想鬥爭。因為當年總理說，不再提這事了。可我現在又提了。因為我考慮，當年就是因為沒有充分揭露黨內走資派，沒讓群眾充分認識走資派的真實面目，才造成了今天在全國範圍內的資本主義大量復辟的現狀。

3、江青與宋慶齡、康克清的糾葛

文革初，上海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打著紅衛兵的旗號把宋慶齡父母的墓碑砸了。宋慶齡誤以為是江青叫人去幹的，就罵江青下流。江青知道後氣得不得了。

這事在當時鬧得挺大。一次我去主席那兒開會，宋慶齡在場，

她問，誰是戚本禹啊？我站起來說，是我。她看了我一眼說，噢，是你啊。接著她什麼也沒說，就說，你坐下吧。我心裡知道，她可能是聽到傳言說，是江青讓我派人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實她這是冤枉我了，我保護她還來不及，怎麼會派人砸她父母的墓碑呢？解放上海的時候，上海地下黨就指令我們組織人民保安隊去保護她的住宅，我們忠實地執行了上級的指示。

可是江青因為宋慶齡罵她也發了脾氣，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組的會上對我說，她宋慶齡有什麼了不起的，你叫紅衛兵去“燒一燒”她（所謂的“燒”，是當時流行語，意思是“衝擊一下”，並不是真燒）。當時總理也在場，可總理在會上一句話也沒說。回過頭，總理馬上就叫傅崇碧派部隊把宋慶齡的住宅給保護起來了。可他們等了三天，卻什麼動靜也沒有。一天，總理在開會時碰到我，就把我叫到會議室邊上的小房間裡去。他問我，那件事你布置了誰去啊，是怎麼布置的？我知道他問的是宋慶齡的事，我說，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是在氣頭上說的話，事後她也沒有再和我說起過。總理聽了說，哎喲，你可真是個好同志啊！

在此之前，總理已經命令上海馬上把墓碑修好。總理拿著修復後的照片給宋慶齡看，宋慶齡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得比以前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錯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後來毛主席知道了這事，他對江青說，你應該大度點，主動去看看她。那年的國慶節，我看到江青和宋慶齡在天安門上談笑風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在中南海裡面貼朱德、康克清的大字報，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前面第二部分第三章已提到，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來已久，她和黨內那些老大姐都反對江青和毛主席結婚。在中央領導的夫人中祇有陶鑄的夫人曾志和江青的關係尚好，曾志也是賀子珍的好朋友。還有就是鄧穎超，她也常來看江青，這可能是總理的意思，她自己心裡怎麼樣就不清楚了。

我組織了人在中南海裡給朱德和康克清貼了大字報。大字報的內容是要求總司令應該堅決支持毛主席，跟劉少奇劃清界限之類的，還說他過去反對過毛主席，應該檢討。之後又貼出了“勒令朱

德、康克清出來看大字報”的大字報。朱老總倒是真的拄著拐杖出來看大字報。在中南海裡碰到他們夫婦的時候，又有人上去圍著他們，問他們有沒有去看大字報，指責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康克清也承認自己錯了，承認不尊重江青。

後來我知道，毛主席對貼朱德、康克清大字報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心裡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在這件事上面主席一次也沒有批評過我。但是這件事我直到今天想起來都很不安。

後來，人民大學準備召開萬人大會鬥爭朱德。起因是人民大學的學生要批鬥他們的黨委副書記孫泱，而孫泱原來是朱德的秘書。

孫泱的父親孫炳文是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那時是總理的助手。後來被國民黨殺害了。孫泱開始不知道，他在上海浦東中學讀書時，和蔣經國是同學，所以整天和他們混在一起，還參加了復興社。後來黨組織和他聯繫上了，告訴他，他爸爸是烈士，他馬上跑到延安去了，人大的學生說孫泱是個特務，就鬥他。連孫泱的妹妹孫維世也一起被鬥了。孫維世是總理的養女，可不知什麼緣故，總理沒有很好保護孫維世，後來孫維世被批鬥而自殺了。現在人們都傳說是江青迫害了孫維世，這是莫須有的事。我沒聽江青迫害孫維世，倒是我知道葉群要迫害孫維世。葉群恨孫維世，因為孫維世在莫斯科曾經和林彪談過戀愛，葉群總怕她再來搶奪林彪。所以就抓住她在蘇聯加入過克格勃的事來整她。其實當時中國的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支部，經常互通情報，人員也可以互相調度。當時加入克格勃是個光榮的事，不可靠的人還加入不了。

我過去對朱德反對主席的事，不很了解。江青向我講過朱德在井岡山反對主席的往事，所以我就支持了人大學生開鬥爭大會的決定。總理知道後馬上把我找去，他跟我說，朱德並不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這樣做不是在轉移大方向嗎？總理還說，上次中央開會的時候，就有人鬥了朱德。我問總理，中央開會，我常來做記錄，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這個會呢？總理說，那是個絕密會議，你不能參加的。總理還說，總司令在那個會上交代說，他以前在井岡山的

時候是有野心的，但也祇是在心裡想想的，並沒有說出來。到抗日戰爭的時候也還有。可到了解放戰爭就沒有了。解放戰爭時，那些大戰役，戰場死傷慘重，驚心動魄，都是主席親自指揮的，他祇能做個參謀。那個時候他已經知道了，自己是有資格來當黨的領袖的。到現在年紀都這麼大了，就更沒有這種想法嘍。總理說，後來主席聽說劉少奇開會批鬥朱德非常反感。主席說，有人說朱德是黑司令，如果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

總理叫我馬上去取消人民大學的群眾大會。我馬上遵從總理指示，打了電話給人民大學，又叫秘書去人民大學說服他們取消了這個群眾大會。

1986年我出獄的時候，那時總司令早已經去世，康克清還健在。我給康克清寫了一封信，做了自我檢討。我說在這件事情上，我犯了錯誤。雖然我們撤銷了批判總司令的大會，但我們還是有錯。我一直沒有給你作檢查，是因為當時給你檢查的話，好像我在尋求什麼“寬大”，不是真心。現在我坐完了十八年監獄，他們加在我身上的罪名，我都不承認。但在反對朱總司令這件事情上，這確實是我的錯誤，我現在向你作檢討。康克清的女兒後來在她寫的《我的父親朱德》這本書中寫了：戚本禹後來給我媽媽寫過檢討，認為他錯了，態度很誠懇，等等。

我的辦公室曾經與總司令的家在一個大院。總司令常到辦公室來看我們。他還送給我一本他手寫的《幽蘭賦》，上面寫了“本禹同志”，並蓋上了他的“朱德”大印。盡管那本《幽蘭賦》後來也被抄沒了。但每當想起它，就更增加了我對總司令的愧疚。

4、批鬥彭德懷

文革的時候，彭德懷是在四川搞大三線的建設。李井泉在廬山會議上和彭德懷鬥得挺厲害，彭德懷支持田家英批判李井泉，李井泉恨透了彭德懷。所以彭德懷到了四川之後，他對彭德懷看得

很緊，把他的一舉一動不斷向中央匯報。我接到了一個西南局寫來的報告，就兩張紙，很簡單。上面說彭德懷現在在四川很自在，到處去看大字報，並對自己的問題進行翻案。當他看到批判劉少奇反對毛主席的大字報的時候，他就笑。說，你們現在才知道反劉少奇啊，我早在1959年就反對他了，你們還鬥我呢。於是，我就和關鋒一起寫了一個報告，說彭德懷的翻案活動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

我記得，1966年12月13日，在由總理主持的中央文革的會議上討論彭德懷這個問題。江青在會上說：我們忙得不可開交，彭德懷卻在那裡幸災樂禍，優哉游哉的。她提出要把彭德懷帶回北京來進行批判。在討論中，包括總理在內，大家都同意江青的意見，認為應該把彭德懷調回北京來。但是怎麼把他帶來北京？開始想用解放軍去把他帶回來。總理說，讓部隊去帶不妥，還是由群眾去帶比較好。王力、關鋒說，那就讓紅衛兵去帶。就這樣形成了一致的意見，讓紅衛兵代表群眾把彭德懷帶回北京。總理還說，不能坐飛機，要坐火車，因為飛機不安全容易出事，出了事說不清楚了。有人說，現在火車很緊張，又很亂。總理說，搞個專列車廂，他去跟衛戍區傅崇碧說。然後總理就叫我去與紅衛兵聯繫。我問總理，帶回來以後怎麼辦？總理說，帶回來就跟我說，下面的事我來安排。

在中央文革開會作出了決定以後，14日上午，我就叫閻長貴通知朱成昭去辦這件事。朱成昭提出叫當時正在四川串聯的師生和王大賓主辦這件事。我知道王大賓這個人做事比較穩重，不會瞎來，就同意了。王大賓到成都後不久，有人向我匯報說，彭德懷把地質學院去的人給說服了，說得變成同情他了。我一聽不對，批評了地質學院的人，同時又趕緊找人通知韓愛晶，說地質學院對彭德懷的事不積極，拖拖拉拉，讓他去接著辦這事。韓愛晶對這個事很積極，二話沒說就堅決去辦了。我對韓愛晶說，如果他們不肯把彭德懷帶回來，那你們去把他帶回來。但最後還是王大賓他們把彭德懷帶回來的。彭德懷對王大賓說，你們現在才反劉少奇，我在廬山會議上就反劉少奇了。你們說我反毛主席，我不是。我是反劉少奇。

王大賓很相信彭德懷的話，認為彭德懷案搞錯了，彭德懷是擁毛反劉的。這些都是王大賓跟我說的。王大賓這個人是比較誠實的，我相信他不會說瞎話。

王大賓把彭德懷帶到北京以後，就給我打電話說，“海瑞”帶到了。我問在路上安全嗎？他說我們連一根頭髮都沒碰他。我說，好，你們完成了一項重要任務，謝謝你們。與此同時，中央文革“快報組”的記者也跟我打電話告知彭德懷帶到了。當時，剛好中央文革在開會，總理、陳伯達、江青都在，我報告說紅衛兵已經把彭德懷帶回來了，等候指示，看送哪兒去？總理馬上說：好，行了，這個事情由我來安排，你別管了。他就到中央文革小組的辦公室打電話給衛戍區找傅崇碧。我在他後面，聽到總理在電話囑咐說，吃住都要有保證，被子要多送幾床，別凍著了。總理又在電話裡說，彭德懷住哪兒，要保密，不準說。不準隨便拿去鬥，凡是要鬥，都得經過我批准。也不準到他的住處去圍攻。彭德懷的身體情況、思想情況都要隨時向我報告。總理把一切都安排妥當了，才放下電話。

在1967年的7月，北京航空學院和地質學院聯合開大會鬥爭了彭德懷。在鬥爭大會前，北航紅旗在韓愛晶的主持下，先開了一個小型批鬥會，要彭德懷交代他反對毛主席的罪行。彭德懷不承認。韓愛晶衝動之下，首先動手打了彭德懷一個耳光。文革結束後韓愛晶爲了這一個耳光也付出了很慘痛的代價。

彭德懷一直是被總理安排在衛戍區保護著。當時凡是要鬥爭彭德懷，都得直接向總理報告。連軍委、總政的人要鬥彭德懷，也得找周家鼎請示總理，中央文革小組沒有批准批鬥彭德懷的權力。沒有總理的同意，誰都調不動彭德懷，大家也都不知道彭德懷究竟關在哪裡。

文革結束後，來監獄審問我的人問我，爲什麼要從成都揪回彭德懷。我就回答說，西南局有報告，總理主持會議作出的決定，我具體執行了。這些具體事實你們去查檔案就清楚了。他們就不再追問下去了。因為那時他們正好要解放李井泉，也要維護周總理。

5、關於李立三的問題

對於李立三的問題，我在文革中曾公開表過態，說他愛人李莎是蘇聯的克格勃。我當時是根據一些小報的揭發來說的。那時認為克格勃是給蘇聯搞特務的，所以就認為是有問題的。到文革後我看到了相關的調查，李莎與克格勃沒有關係。我感到我犯了陷人於罪的錯誤。雖然後來沒人來追究我這個錯誤，但我心中一直都是不安的。

李立三曾是由共產國際決定的中共黨中央的領導人，主持過中央工作。當年我之所以那樣表態，支持群眾批判李立三，是因為我對他印象不好。歷史上李立三對毛主席很不公正，他批評毛主席是右傾機會主義，還開除了毛主席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的職務，雖然並沒有開除黨籍。可是消息傳下去卻說是開除了黨籍，因此主席不能在紅四軍擔任黨代表了，祇能當師長。

本來，李立三是毛主席早年的朋友，主席有個回憶，早年，他曾在長沙的報紙上發了個徵友啓示，交了幾個朋友，李立三因為祇見了一面，沒說多少話，算半個。後來毛主席把自己開辟的安源煤礦的共產黨組織和工會組織，都交給了李立三，李立三因此在工人運動中出了名。這樣他才進入了中央，當上全國總工會的領導人。以後他到蘇聯取得了共產國際的信任，派他回來當了黨中央的實際負責人，但他回來以後，卻大整毛主席。我覺得這人太不地道了，有點中國人所說的小人得志、忘恩負義的味道。正好有華北局造反派提出要批判李立三，找到我，我就說了幾句話支持他們。後來，我向江青、總理匯報了這個情況，當時總理說，讓群眾批判他一下也好。李立三在蘇聯，捲入了共產國際的內部鬥爭，被送至西伯利亞。在延安開七大的時候，毛主席不計前嫌，仍說服大家選他為中央委員。那時他在西伯利亞，消息閉塞，根本不知道此事。是毛主席叫人與蘇共交涉接他回國，回國後又委以重要任務，讓他在哈爾濱參與東北局的領導。總理說，這些就是他，也是黨內同志最佩服

毛主席的地方。

6、中央文革在運動中保護的一些老幹部

事實上，江青在文革中保過很多老幹部。中聯部門爭王稼祥。江青知道了，就跟王力和我說，叫他們別鬥了。王稼祥在歷史上對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王力和我分別向中聯部和外交部的造反派做了工作，他們就停止了批鬥王稼祥。

江青和李富春的關係特別好。她去了延安後，她的組織關係就是李富春給查清楚後恢復的。李富春那時是中央的組織部長，他又做過中央辦公廳主任。在延安有些人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語。李富春馬上找那些人來，訓斥了一頓。說，不許瞎說，再小廣播，自由主義，要處分。沒有的事，別造謠，再造謠，要負黨紀責任（李富春的原話）。李富春這麼一講，下面就不敢亂說了。所以江青跟李富春挺好的。文革時，誰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馬上叫我去，說，跟他們說，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時國家計委和學部都有人貼李富春的大字報。我就去跟他們說了，不許反李富春。他們問為什麼？我說，沒什麼為什麼的，就是不許反。

文革運動中，農口的造反派要打倒譚震林。但主席說，還是要保他。江青就讓我給群眾去做工作。我就在一次大會上說了，譚震林是跟毛主席走合作化道路的，他反對包產到戶。我說，譚雖然有錯誤，但我們要看到，他和劉少奇、鄧小平不一樣。他在黨內是擁護毛主席，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據說譚震林聽了以後還挺滿意，說，“這小子總算講了幾句人話”。

江青還讓我去保王震，事後王震還親筆給我寫來一封信，表示感謝。

江青還幫很多老幹部說過話，像謝覺哉、江華（江華曾給主席做過秘書）。連犯了嚴重錯誤的葉子龍，江青都為他說過話，說他雖然犯了嚴重錯誤，但他給主席做過很多事，在轉戰陝北時一直跟著主席的。

第十六章 張春橋處理上海“安亭事件” 和中央召開工交座談會

1、文革運動從學校向工廠和農村的發展

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布“十六條”以後，一些工廠的工人也都紛紛投入到文革運動中。按照當時原有的規定，除學校以外，工礦企業等系統和農村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都以原來城鄉“四清”運動的部署來進行。並且規定，學校的學生不要到工廠、農村去串聯。但是在許多工廠裡面，一些工人因為在運動中給黨委和領導提出了意見，而被單位的領導或者是派到那裡的“四清”工作隊，打成了“反革命”和“壞分子”，還有些人甚至遭到了非法關押和拷打。從中央十月工作會議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這些受到單位領導和“四清”工作隊錯誤鎮壓的工人們，就向中央文革小組寫來了申訴信，有些外地的群眾還來到北京上訪申訴。那時，我們接待了很多這樣的人。

1960-1961年我曾在北京的長辛店二七機車車輛工廠和天津的機床廠呆過。1966年9月至10月就有二七廠的工人不斷寫信給我，有的還跑到釣魚臺來找我，向我反映廠裡文革運動的情況。我聽到當時國務院的一些主管工業的領導說，現在工廠也亂了，工人們都不幹活了。他們說，工廠不能亂，工廠的生產一停，國家怎麼辦啊。於是，我就去長辛店二七廠裡看了一下。我在那裡看到的情況跟他們說的並不一樣。工人們照常在工作，各車間的機器也沒有

停。因為大家知道，工業生產是社會化的生產，一環扣一環的，你一個環節停下來，其餘的也都得受影響或者一起停下來。所以，工廠的運動多是在下班後的時間裡搞的。一些工人去外面參加社會上的運動，也都是在業餘的時間裡去的。不然的話，他的工資也會受到影響。

經過了解，二七廠有些工人確實因為給領導提意見，被定為“壞分子”、“反革命”或者是“反黨小集團”。他們中間有些人還跟我挺熟的，我知道他們都是好人。所以，我就表了態，認為這樣整工人是錯誤的。工人向領導提意見是合法的。廠領導應當聽取工人提出的意見，而不可以整工人。

我在長辛店工廠的表態，馬上就在工廠和工人中間傳開了。好多工廠，像首鋼的工人都來找我，向我控訴工廠領導，要我支持他們。

這些情況我也都向總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作了匯報。

2、處理“安亭事件”與張春橋的政治膽略

1966年11月10日上海爆發了“安亭事件”。上海造反派的工人在北京南下的“三司”紅衛兵和上海的紅衛兵的幫助下，聯合起來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組織“工總司”。上海市委的曹荻秋在請示陶鑄以後，對“工總司”的成立決定採取“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的“三不”方針。曹的這一決定得到了當時正在養病的陳丕顯的支持。上海市委根據“三不”方針處理“工總司”成立大會，結果激怒了工人，於是上千名工人在潘國平、王洪文等造反派領導人的帶領下，擠上火車進京告狀，結果火車被上海市委下令扣停在離市中心30來公里的安亭車站上。工人們非常憤怒，攔車抗議，要求中央、中央文革表態，承認和支持他們的造反行動是革命行動。這就是震動全國的“安亭事件”。

“安亭事件”發生後，周恩來主持開會討論。陶鑄主張堅決要把工人的這種“不聽話”的勢頭打下去。國務院負責工業的幾個領導把難題交給中央文革，有人還有點看中央文革笑話的味道，這從他們打來的電話中就感覺得到。京滬鐵路當時是南北經濟大動脈。其實當時上海工人並沒有全綫阻斷鐵路，但是他們攔車抗議影響了好些北上列車的班次，其中還有幾趟國際列車。所以國務院管工業的同志的意思是，你們中央文革不是支持造反派麼，出了那麼大的事，你們去處理吧。如果我們處理不了，那麼他們就可以到主席那裡告中央文革的狀了。

這件事我也立即匯集了情況向陳伯達匯報，會議決定請他出面來處理。他先以中央的名義給華東局的韓哲一發了一份電報；後又起草發了一個給工人的電報。陳伯達在電報中雖然表示同情工人，但並沒有承認他們是革命行動，也沒有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組織。祇是希望工人從大局出發，回去搞生產。陳伯達起草完電報就拉著我和他一起簽字。我說，你是組長，你簽字就行了，幹嗎要我也簽呢，我算啥？他說，不行，有人說你是支持上海市委的，所以你也得簽字，免得人家再說你什麼。所以他硬是替我把名字也寫在了電報上面。現在如能查到當時電報的原件，上面應該還有陳伯達代我簽的名。但我堅持我不能與組長共簽，最後，電報還是以陳伯達一個人的名義發出。

陳伯達為什麼說我是支持上海市委的呢？那是因為1966年4月初，我到上海組織工農兵學哲學的文章的時候，曹荻秋專門宴請了我，他還問我在上海地下黨時熟識的同志的情況。我有很多地下黨時的戰友在上海工作，他們跟我的關係都很好。我就向他提到顧志剛和張效浚，並說過這兩個人很有能力。顧志剛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張效浚是我在地下黨時的領導人。顧志剛當時已是市委機關的領導人，與曹荻秋關係很好。10月中央工作會議時，曹荻秋還請我幫他修改過他寫的檢討。所以陳伯達就說我是支持上海市委的。

發完電報，陳伯達還打算派人到上海去。他就找了我，說，我

們要把工人勸回去。你在鐵路的二七機車車輛工廠工作過，有點經驗，你去跑一趟吧。我說，我去不行。北京的工人，二七廠有問題我還可以去，首鋼我都不見得行，他們與北京老市委關係好，他們不見得會聽我的。上海工人我更不了解了，我恐怕處理不好。我建議說，張春橋原來當過上海市委的宣傳部長，又是上海市委書記處的領導，對上海情況他最了解，為什麼捨近求遠呢。

最後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決定由張春橋去處理“安亭事件”。張春橋一到上海就直接趕到了安亭車站現場，而沒有先去上海市委。他先跟工人談判，勸工人讓開鐵路，保證交通暢通。工人通情達理地讓開了鐵路。到11月12日，不到兩天的時間，鐵路交通就完全恢復正常。然後他又勸工人們回去，但工人們卻堅持要張春橋答應，為他們在資反路線期間受到的冤屈平反，恢復他們的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工人們還當著張春橋的面控訴了上海市委執行資反路線，鎮壓和迫害工人的事實。工人們的控訴使張春橋受到了很大的震動。但是，他並沒有在安亭答應工人提出的條件，祇是堅持要工人們回上海去解決問題。但他向工人們承諾，不處理好這件事情，他決不回北京。

這時，張春橋受到的壓力是很大的。中央文革給他的任務，祇是勸工人回廠，恢復鐵路交通。此外並沒有給他任何的授權。況且，上海市委在批判《海瑞罷官》中態度是積極的，與江青的關係很融洽。怎樣處理這件事，關係到中央文革與上海市委的關係，頗費躊躇。

張春橋從安亭回到上海就跟我通了電話。他問我對這件事情的態度。我知道他一方面可能是顧忌我跟上海市委的關係；另一方面，他更想知道江青對這件事情的態度。我就在電話裡對他說，咱們也沒有什麼別的武器，不就是一分為二，辯證法麼？上海市委支持批《海瑞罷官》，那是正確的，我們不否認它；但是它執行資反路線，鎮壓群眾，那是錯誤的，就得檢查。他聽我這麼說，也放心了。我又跟他建議，這事你不要去和陳伯達多說，跟他說半天也說不清楚的。你應該直接找江青去說。後來張春橋給江青打了電話，

江青在電話裡叫他不要有顧慮，怎麼有利於工人，怎麼有利於工人造反派的成長，你就怎麼做。

最後張春橋簽字同意了上海“工總司”提出的“五點要求”，承認他們是革命行動，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的群眾組織。這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第一次與一個大省市的工人階級簽訂的第一個支持工人群眾革命造反的革命協議書。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

張春橋回到北京以後，總理還表揚了他。總理當著我們的面對國務院負責生產的那些領導說，這事你們就處理不了。張春橋去，就把問題給解決了。不過，等總理轉身走開時，我聽到那幾個人就在嘀咕，我們算什麼呀，現在我們說話誰聽呀。人家可是中央文革的副組長啊。

可是上海市委對張春橋的意見就很大了，陳丕顯從上海打來電話，質問陳伯達：張春橋作為一個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有沒有這麼大的權力，繞過華東局，繞過上海市委就和工總司簽字承認“五條”？陶鑄等一些中央的領導，甚至陳伯達也都認為張春橋這樣做，是違反了中央關於在工礦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有關規定。所以說，張春橋的簽字是冒著很大的政治風險的。但這件事不祇是表現了他的魄力和膽識，也說明他對主席思想，對主席要把文革運動發展到工廠、農村，是有認識、有思想準備的。11月8日，他在和我一起見北航紅旗的戰士時，就支持他們去工廠串聯，與工人相結合。張春橋還說：搞工廠是方向問題，我們打算下一步應該這樣走。

後來官司一直打到了毛主席那裡。毛主席親自主持了中央常委會議，主席說，總是先有事實，然後才有概念的。沒有事實，怎麼能形成概念？沒有實際，哪能有理論？有時理論與實際是並行的。有時理論先行，但是實際總歸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鬧起來，哪兒來的幾條規定？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政策的，這件事張春橋是對的，是應該根據現實改變過去的政策。過去限制工人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規定脫離了群眾。

3、在全國工交企業政治工作座談會上發生的爭論

1966年11月16日開始，中央召開全國工交座談會。會議平時都是由陶鑄主持的，總理參加時則由總理主持。余秋里、谷牧這些當時管國家經濟的人、國務院各部部长、各省市管工業的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了會議。

會上首先討論了由陳伯達起草的《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指示》（草案）。這個文件是經過中央文革小組討論的。文件的主要內容是，指出工人階級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力量和最積極的因素，他們對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負有重大的責任，工礦企業的工人群眾起來進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勢所趨，好得很，是不可阻擋的。同時指出，當前的問題，是有些單位的負責人，錯誤地把文化革命運動跟生產對立起來，有的以抓生產為借口，來壓制革命派，保護自己；有的則以不管生產，來為文化大革命運動制造困難。這兩種錯誤都是不顧大局，違背黨的方針，嚴重違反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文件提出，工廠的工人群眾可以建立文革組織，可以串聯，可以與學生交流文革經驗。但必須堅持“八小時工作制”，文化革命必須利用業餘時間進行，每天三至四小時，不得占用生產時間，同時又要讓工人同志得到必要的休息。

可是在陶鑄的主持下，會議對中央文革小組提出的“十二條”採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把它說得一無是處。參加會議的許多人對文化大革命的抵觸情緒很大。劉瀾波、呂正操、呂東這些部長們為了發泄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竟大聲喧嘩，離席哄鬧，說到最後許多人都站了起來。

這樣就在陶鑄的主持下，由余秋裏、谷牧具體組織有關部門的人，草擬了一個與“十二條”相對立的文件：《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簡稱“十五條”）。規定要求：工礦企業的

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結合進行，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連，堅持八小時生產。

我那時因為事情很多，所以沒怎麼去參加這個會議，可是總理好幾次都叫我去參加會議，他說，你對工業的情況比較了解，你應該去參加。我在私底下聽到陳伯達抱怨說，我們這些寫文章的人，祇是小小老百姓，無權無勢誰也瞧不起。過去鄧小平看不起我們，現在這些部長們也同樣瞧不起我們。把我的稿子改得體無完膚，全部推翻，他們自己另起爐竈。

事情匯報到了毛主席那裡，毛主席否定了“十五條”。他叫谷牧等帶人先去幾個大城市，去聽取各派工人的意見，然後再回來討論。

接下來的會議就由總理來主持了。總理讓國務院和中央文革小組一起坐下來進行討論，以陳伯達提出的“十二條”為基礎，起草了《抓革命、促生產的八條意見》。經討論後補充為十條。

然後主席又讓林彪主持中央常委會來討論這個“十條”。林彪在會上講了話，他講得挺厲害，他說，這次工交會開得不好，一些人的思想很不對頭，需要來個180度的大轉變。他說，我們不應該是被動地、而應該是主動地讓這場革命進入到工廠、農村，進入到社會。文化大革命是“勢不可擋”的，我們不應該去擋，而應該上前迎接。革命不是要剎車，而是要擴大。要讓這場革命席捲每一個領域。林彪對工業是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的，他認為，工礦企業要加強政治領導。林彪對薄一波的意見特別大，他專門批判了薄一波以前在工業戰綫上的一些做法。而這個時候，薄一波已經因為“六十一人叛徒案”而被審查了，沒有參加這次座談會。

總理也在會上講了話。總理說，總的來說，多數同志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發生抵觸情緒、埋怨情緒。他說，犯了錯誤不要緊，改了就是嘛！要負起責任來，不要誠惶誠恐。當年打仗的時候都可以上刀山，入火海；搞地下工作時可以坐大牢、下煉獄，現在還有什麼捨不得的？他還針對一些幹部害怕群眾的思想狀態說，要有思想準備，要經受得住考驗。過去因為工作錯誤所造成的惡果

要接受教訓，受到教育，要準備接受考驗。把毛主席思想樹起來，準備吃苦，掉磅。這些懲罰是我們過去的工作錯誤造成的，我們不承受誰承受？我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沒有一種精神準備不行。這個仗一定要打，做好思想準備，領導好了，也不至於那麼嚴重。

總理的這段話，後來經常被引證來說明總理對文革是抱著反對和抵制的態度的，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忍辱負重。這不符合事實。事實上，以我的了解，當時總理對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認識，與毛主席基本上是一致的，絕不是曲意奉承。在一些具體的做法上，由於所面對的問題不同，或者看問題的角度不同，他和主席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會有一些不同意見。但是，一般在他知道了主席的意圖之後，他會馬上調整自己的看法。

總理當時在說完“我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這句話之後，還對著一個領導幹部說，你當年是怎樣鬧革命的？當年打仗，坐牢，入虎穴，下地獄，死都不怕，現今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搞文化大革命有什麼可怕？最多是掉點磅，生點病，罷個官嘛！大家要從整體來考慮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覺得總理對文革的態度是積極的。

4、工交座談會的重要意義

在工交座談會上出現的這場爭論，對當時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工交戰綫是決定文革成敗的生死戰場。文革運動光靠紅衛兵是不行的，國民經濟、國家大局還在工礦企業。文革能不能搞好，就看工人階級能不能行動起來，行動起來後是站在毛主席這一邊，還是站在劉少奇那一邊？所以，這並不是制定個“十條”或“十五條”的問題，而是我們要不要團結起工人階級，組織起工人階級，來同走資派以及他們推行的資反路綫作鬥爭。

其實，拋開對文革的態度，我認為谷牧、余秋里這些人也都是

好人。王力和谷牧的私人關係挺好的，在後來王力被審查後，康生提出，說王力以前參加過國民黨。這時，谷牧就出來說，王力參加國民黨是我們地下黨派他去的。谷牧那時是北方地下黨的負責人之一。谷牧在王力失勢時候還出來替他說公道話，我對他印象就非常好。我和余秋里關係也很好。我崇拜英雄，余秋里是獨臂將軍，我覺得他很了不起。所以，我到外面去講話總喜歡拉著他一起去。這些總理都看到了，總理對我說，你崇拜英雄，尊重老幹部，這點很好。

其實，大家都知道，像我們這樣一個大的國家，生產是一刻都不能停頓的。工廠、鐵路、煤礦、電廠，隨時都有大量的問題要處理。我記得恩格斯在哪裡講過，生產停頓兩天，一個社會就會混亂，就會維持不下去了。這是個常識性問題。

我們中央文革小組也知道，中央文革這幾個人並不能掌管好生產的。所以毛主席總是讓總理管生產，要中央文革和總理配合好，提出的口號是“抓革命，促生產”，革命、生產兩不誤。我們一直都是努力配合總理工作的。

當時的根本問題，並不是像一些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所指責的，是中央文革小組以抓革命來破壞生產。恰恰相反，是一些反對和抵制文革的人總是在千方百計地以抓生產來壓革命。而當文革運動直接影響到了這些人的切身利益的時候，他們就不惜以破壞生產來壓制革命了。

工交座談會是文革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從這以後，工人階級作為主力軍的地位，參加到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來了。文革運動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第十七章 參加毛主席的生日家宴

1、我對毛主席在生日宴會上講話的回憶

1966年12月的時候，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就多次向主席說，希望在毛主席生日的那天與主席一起吃個飯，以為慶賀。主席一直未作答復。12月26日下午4時許，主席機要秘書徐業夫打電話給我，並要我立即通知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姚文元，一共六個人，於下午5時到中南海主席家裡同主席一起吃飯。我特地問，要不要通知康生？徐業夫回答，不要。我隨即用紅機子分別通知了各人，大家接了電話都非常高興。

5時前，我們就來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主席的住處。主席和江青在家裡接待了我們。那天一起在場的還有李訥、毛遠新、汪東興、徐業夫、吳旭君和服務人員。飯前，主席與大家閒話聊天。

主席說，今天過個生日，我七十三了。你們要辦慶祝宴會，這不好，因為黨中央有不祝壽的文件呢。我們自己在家裡簡單辦個家宴，請請小組的人，組長、副組長、組員。顧問就免了。這一年你們辛苦了，“五一六通知”、“馬列主義大字報”、“炮打司令部”、“紅衛兵大串連”，一波接一波，現在還沒完。

主席又說，斯大林是七十三歲死的。他死了，資本主義就在蘇聯復辟了。社會主義堡壘被赫魯曉夫們從內部攻破了。我現在還不會死，但將來，資本主義會不會在中國復辟呢？這就要看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了。這個文化大革命是我們黨同黨內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也就是走資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鬥爭。鬥

爭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就有了。但這一次是全面的鬥爭，從上到下，從紅衛兵到工廠、農村、機關，全國都鬧開了。

主席又對春橋和姚文元說，春橋、文元來了。你們想不想回老家啊！上海可鬧得厲害呀！形勢很好呢！紅衛兵起來了、機關幹部也起來了，工人們也起來了，到處是火燒、批判、揪鬥、打倒，還有砸爛。他們還很注意鬥爭方式，誰是要火燒的，誰是要打倒的，都有區別呢。他們懂得掌握黨的政策。機關的文化大革命也很重要呢，過去講內外有別，是講牽涉國家機密的事情內外要有區別，不是講革命運動不能搞。文化大革命，內外都要搞，最重要的是工人們起來了！你們兩個人可以回去看看呢。他說，上海重要呀！京、津、滬還有工業大省遼寧，是我們這一階段的重點。

主席對關鋒說，關鋒也來了。你太瘦了，要多吃點肉呢！你的老子研究怎樣了？你送來的書，我還沒來得及看呢。關鋒主張老子是唯心主義的，陳伯達主張老子是唯物主義的。主張唯心主義的還有楊柳橋等人，主張唯物主義的還有任繼愈等人。兩派還在爭，統一不起來。主席說，在我看來，老子是客觀唯心主義。老子是周朝王室的官員，屬於貴族階層，但他同情農民，經常替農民說話，批評統治者壓迫農民，稅太重。所以出身貴族也可以革命進步呢！對人不能光看出身，我不贊成那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形而上學。哲學家也不能都打倒，高亨要保呢，楊榮國也要保。

差不多5時半的時候，人都來齊了，家宴開始。服務人員端上了八盤菜、一大盆湯水。菜有紅燒肉、燒魚塊、木須肉、臘肉青蒜，還有豆腐、青菜、馬扎菜（一種野菜）等。主食是廚師自做的壽面和烤紅薯、玉米棒等。大家入座以後，服務員為大家斟上了黃酒。我們都舉起了酒杯，說，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主席說，你們萬壽無疆！你們年輕！

正式就餐之後，大家的話語就比較少了。等到壽面上來時，大家又要站起來祝酒，主席示意大家坐下，自己卻站了起來，他舉杯說：

“為明年全國全面內戰勝利乾杯！”

“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主席說“全面內戰”這四個字的時候，一頓、一挫的，說得很清楚，但是“勝利”兩個字的聲音就比較小。很多人可能都沒有聽清楚。大家跟主席幹了杯之後。都在思考主席祝酒辭的意思。“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是當時流行的口號，意思好懂。不好懂的是前一句。那時文革運動中已形成革、保兩派，已經有了武鬥，這叫打內戰。可是反對武鬥、反對打內戰是毛主席的一貫主張啊，怎麼為它乾杯呢？而且還是“全面內戰”！大家都在思索，卻沒有人提出來問，江青也沒說話。主席似乎看出了大家對他話的不理解，在吃了幾口面之後，他又陸陸續續地講了，不僅是學生被鎮壓，機關裡的造反派、工廠裡的造反派，也遭圍剿。沒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沒有，給領導提意見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熱氣騰騰的群眾運動一下子被搞得冷冷清清。那些被造反派反對的領導人，過去經常要群眾無條件服從黨的領導，做黨的馴服工具。這次他們又挑動群眾鬥群眾，組織黨團員、積極分子跟造反派鬥。於是，許多地方在群眾中形成兩大派，一派要革命造反，一派要保護舊秩序，兩派打起內戰，有些地方甚至發生武鬥。我們要支持革命造反派，給群眾宣講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團結大多數，爭取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前一陣子，我們怕文化大革命一下子鋪開了影響生產，便想把工廠、農村的文化革命放後一步，哪知客觀事實的發展常常會打破我們的預想。學校、機關的革命造反派同工廠、農村的革命造反派結合起來了，一下子打開了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上海就是這樣。中國的革命，知識分子一定要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才能勝利，五四運動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明年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都會走這條路。兩派的鬥爭會更激烈，但革命最後總會取得勝利。

吃完飯以後，主席又和我們談了一會話。主席談的主要內容，就是要我們從思想和理論上全面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叫我們要抓大批判，並叫我們每個人都要寫文章。

在談到寫大批判文章時，毛主席特地對我說，你也要寫。我就

對主席說，我一直想寫一篇關於影片“清宮秘史”，到底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文章，因為從主席提出這個問題，到現在一直都沒有有人做專門研究。毛主席說，好。我又說，可我對義和團那段歷史還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說，不要緊，你去寫。寫了給我，我給你看。

隨後，我們向主席道了別，然後各自回去了。

2、貫徹落實毛主席的生日講話精神

主席這次談話給了我們極大的震撼，我們都認為主席的這次談話非常重要。主席不僅概述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過程，而且為即將來臨的1967年指明了工作方針。

第二天江青、王力就分別向總理和康生做了匯報，總理又把主席談話的精神告訴了陶鑄。總理和康生都認為主席談話內容深刻。總理說，主席講的內戰，意思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革命派同黨內走資派的鬥爭，是文鬥，而不是槍炮武鬥，打派仗。毛主席一貫反對兩派武鬥，打內戰。江青把總理的意見告訴了陳伯達，當時陳伯達正在與王力、關鋒和我一起商議為《紅旗》雜誌起草元旦社論。我們大家都認為，似乎可以把“內戰”改成“階級鬥爭”。

27日晚，陳伯達召集王力、關鋒和我四個人，根據毛主席的講話精神起草元旦社論。商定主題後，陳伯達、關鋒編句子、口述，王力記錄，我補充意見。凌晨草成未定稿，準備過一天再改。這篇社論的題目就叫《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是毛主席祝酒辭裡的一句話。而社論主題就是“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下團結起來，展開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

關鋒提出，我們把主席的話，作這樣的改動，是不是好。我說，在意思上並沒有多大的出入。再說，我們寫的稿子還要送給主席審閱的。這和田家英的做法完全是兩碼事。不用擔心。後來，主席在審批這篇文章的時候，並沒有再作修改。說明主席也是同意我

們所做的改動的。

稍後，我們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上，又討論了如何落實主席叫我們寫大批判文章的事。

關鋒說，他準備從倫理道德觀上面，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可是後來關鋒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遇到了一些困難，因為劉少奇的《論修養》再版時是陳伯達參加修改的。所以關鋒的文章在陳伯達那裡來回了好幾次。我聽關鋒講，陳伯達每次都拿去和他自己保留著的《論修養》修改的底稿核對，不是他改的部分就通過，是他改的，他就找各種理由出來阻攔，說什麼這個不是主要的啦等等。當初陳伯達修改《論修養》的時候是很積極的，比參加編《毛選》還積極。

姚文元本來是準備從批判電影《武訓傳》以來，文化戰線上的鬥爭歷史，來批判劉少奇的錯誤路線。可後來不知怎麼變成了批陶鑄了。本來姚文元批陶鑄的文章裡沒有寫批“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和批“五一六”陰謀活動的內容，是毛主席給他加上去的。批“五一六”到後來發展與演變成一場清查“五一六”分子的全國性運動。

王力當時提出，他來批“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但後來他祇寫出了一篇批“三自一包”的文章。批“三和一少”則被武漢“七二〇事件”衝了。那個時候王力正在外交部鼓動造反，所以他一批“三和一少”，矛頭就成了對著陳毅了，甚至還牽涉到總理。王力自己說他主要是批判王稼祥的，可實際上外交的事情都是總理定的，王稼祥並不是主角。我每次看到王力在會上講批“三和一少”的時候，總理的臉色總是很難看的。而且王力當時“左”厲害，他把“三和一少”又拔高到了“三降一滅”。但這個文章後來沒有寫出來。

張春橋原來打算從社會基礎上，從走資派產生的社會根源上來批判劉少奇。不過不知為了什麼，後來這個文章一直沒出來。張春橋想問題比較深思熟慮，但寫文章比較慢。

我的文章，已經在主席那裡確定了主題。所以，從那天開始，

我就向陳伯達請了假，經常一個人關在釣魚臺的辦公室裡或者家裡寫文章，好多事情我都没有參加。

3、我對王力整理的毛主席生日談話的看法

主席的生日談話一直没有向外面作過正式的傳達。所以許多人都是後來從《王力反思錄》裡面，看到由王力整理的“主席生日談話”的。

關於主席的這次生日談話，現在有張春橋、關鋒、王力、姚文元和我的五個版本。所有版本都祇是事後的追憶，因為主席是在家宴上即興講的，我們都没有做現場記錄。五個版本中王力寫的最長、最多，關鋒寫的最短、最少。關鋒的版本是閻長貴轉述的。據我所知，關鋒本人還有個整理稿，應該比閻長貴轉述的更詳細，現存於其後人處。我認為，在五個版本中與原貌差距最大的是王力的版本。家宴時間大約有一個半小時，除了吃飯，講話時間也就是幾十分鐘。主席談話是以聊天的方式進行的，中間春橋、文元、關鋒和我還插過話，所以不可能是長篇大論。王力整理的那篇生日談話有八千多字，除去他本人的評論，也有三四千字，很多話是他的發揮，並不是主席說的。例如他說毛主席說“一切企圖阻擋工農參加文化大革命的論調都應駁斥。”“他同陶鑄分歧的實質就是這個。”我不記得主席這樣說過，到1966年12月底，主席還沒有公開批評陶鑄。再如不能亂抓人的一大段話，我記得那是主席在另一次會議上講的，生日家宴上没有談這個問題。

王力在回憶中，對主席那天並沒講過的話，說了一大堆；而有些主席當時講過的話，他卻略而不詳，甚或說没有。他說“有人說，毛主席說‘要開展全國全面的內戰’”，“我没記得聽他說過”。這不對，除他之外，關鋒、張春橋、姚文元和我都聽到主席講過“全面內戰”的話。而且我還記得在起草1967年元旦社論時，王力也議論過這句話，並表示他也不很理解主席這話的含義，可這

時候他卻說他不記得了。

4、張春橋、王力、關鋒、姚文元對毛主席“生日講話”的回憶

附件①：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生日家宴情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張春橋 回憶

1966年12月25日，當我走進他的住所時，他正在同李訥、李實姐弟說話，空氣很活躍。見我進來，就說，“你想回老窩啊！”我一時腦子轉不過來，不知道他指的是什麼，直到他說：“上海形勢很好，紅衛兵起來了，工人起來了，機關也起來了，打倒、火燒、批判，政策也好，可以回去看看。”我才明白他的意思。往下來，我驚奇地發現，上海的情況他比我熟悉得多。他善於把零碎的材料概括起來。又說到最近工作重點就是京、津、滬、遼寧——我們本來是為他祝壽的，竟自變成工作會議了。中間還詢問關鋒：老子研究怎麼樣？他看我不懂，就解釋說他（關鋒）認為老子是唯心主義，陳伯達認為老子是唯物主義的，統一不起來。我認為老子是客觀唯心主義者。主席在那樣繁忙的時候，還念念不忘哲學研究，這在我們黨內好像難找第二個人了。在吃飯的時候，話倒不多了，空氣好像也不活躍了。陳伯達舉杯“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他祇回了一句“你們萬壽無疆！”就把杯子放下了。大家似乎也沒有什麼輕鬆的話好說。過了一會，吃面了，他忽然站起來，舉杯說：“為全面內戰乾杯！”大家雖然舉杯，但是我始終沒明白這杯酒的含義。事實上，後來的許多事都包括在這句話了。

（摘自1989年1月張春橋給女兒維維的信）

附件②：

關鋒對毛主席一九六六年生日談話的回憶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閻長貴記述

關鋒生前，有一次跟我說：“毛主席當時講的是：‘為開展全國全面的內戰乾杯！’我聽到後都怔住了，覺得不好理解，在起草《紅旗》雜誌元旦社論時把‘全面內戰’改成了‘全面階級鬥爭’。”關鋒這個記憶可能是對的。當時在場的戚本禹1967年1月10日在總政話劇團接見部分革命造反者時說：“現在形勢一句話，概括地講，全民的全國的階級鬥爭，各個戰線，各個地區，用火藥味的話來說，就是全面展開內戰。”（參見1967年3月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首長講話》，第1本，第84頁）我認為，這可以看作是關鋒記憶的一個佐證。顯然，如果毛主席沒有這樣說過，戚本禹是不能也不敢這樣講的。

附件③：

毛澤東七十三歲生日的談話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王力整理

我看到了不少國內的和國際的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著作，都不知道或者忽略了毛澤東七十三歲生日的一次重要談話。這樣，對於“一月風暴”及其以後一系列重大事物的背景，對於文化大革命，對於毛澤東，就難以作出科學的評價。所以我先把它客觀地加以介紹，然後再提出我個人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過生日，晚上【注：是下午，不是晚上。】臨時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請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飯。沒有林彪、總理、陶鑄、康生、李富春。我們到時毛主席早就在等著了。那天屋裡很熱。吃飯是按他的慣例，他招待外國人也是這樣，四菜一湯。今天每人加一小碗面條，還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飯前毛主席說了很多話。他從

來不過生日，這次過個生日。這實際上是個重要的會。

這次毛主席的講話我印象很深的是，毛主席說“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新的階段，蘇聯復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蘇聯的教訓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能不能保持住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階級鬥爭沒有完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全面較量，這種較量從奪取政權開始就存在。”毛主席說：“我這次搞了個文件——‘五·一六通知’，廣播了一張大字報，搞了個紅衛兵大串連，大串連使全國連成一片。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都是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較量，現在還在繼續。資產階級在黨內還有一定的市場，還有大批幹部世界觀沒有改造或沒有改造好，這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市場。”

“他們為什麼能蒙蔽群眾？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農民得了土地，都擁護共產黨。這些人貪天之功為己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他們說什麼，就叫黨的領導，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倡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地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我同他們的分歧，這是一個重大分歧。我不贊成他們保護自己，反對群眾，提倡盲目服從。我一直堅持，祇服從堅持革命路線的正確領導，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這是政治原則也是組織原則。要按照這個原則來做，並且要讓群眾也懂得，為群眾所掌握。這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以及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就繳械了。一個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一個要保存資本主義的秩序，老框框、老組織、老規矩。一個要革，一個要保，就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注：以上兩段，多系王力自己的演繹，毛主席有這意思，但祇提了兩、三句，沒有長篇大論。）

毛主席說，最近時期出現新的局面，廣大工農兵起來了，衝破了各種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組織，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學生起了變化，發展壯大了，提高了。革命學生到工人、農民

中去，同工農相結合。還有一個特點，黨和國家機關的革命幹部起來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沒有學生和工人結合也不行，沒有機關幹部也不行。中國現代史上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五四運動就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

毛主席講話的概念是：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吃飯時毛澤東舉杯祝酒，說：“祝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這話在吃飯前也說過。除上述的話外，他吃飯前還說了很多話。這些話在後來的文章中找到。雖然沒用黑體字，但思想是毛澤東的。“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這話是準確地概括他對當前形勢和今後做法的想法。有人說毛主席說：

“要開展全國全面的內戰”，這次我沒記得聽他說過。他說的“全國全面”，是指的工礦企業和農村。他說一定要搞工礦企業和農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會半途而廢。（注：這兩段王力回憶均不對。毛主席是提出了為明年全國全面內戰勝利乾杯。）

“抓革命促生產”這一口號，毛主席說是抓革命才能促進生產，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決生產的方向道路問題，才能把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舊的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規章制度，才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毛主席說，有人藉口抓生產來壓革命，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烏紗帽，他們關心的是保存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那些舊框框。他們害怕群眾革命到他自己頭上。他們過去靠舊框框吃飯，離開舊的一套就不會走路，就不會說話。挑動群眾停止生產，挑動群眾鬥群眾，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自己就要成為走資派。任何阻擋這場大革命發展到工人農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農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論調都應該駁斥，都是錯誤的。工人農民參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一切企圖阻擋的人都要被歷史潮流衝掉。毛主席說，他同陶鑄分歧的實質就是這個。（注：我不記得毛主席在此次談話時提到過陶鑄。）

那時相當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對此都不理解。原來說地委以下都不搞文化大革命。後來工礦企業和農村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了。這兩個指示都是根據毛主席指示起草的，可是我這起草人之一，開始也

沒有認識到毛主席為什麼要做出這樣重大的改變。毛主席過生日的談話後我才知道。

毛主席還說：“鬥、批、改，改什麼？光在文化部門、機關學校改，改些什麼？整個國家文化大革命改什麼？作為社會經濟基礎的工礦農村還是老一套，那還改什麼呢？那就沒有目標了。”至今人們大概也還不知道這個問題的背景。文化大革命是個悲劇，毛主席沒有達到他原來設想的目的。有的人真的以為毛主席就是為了天下大亂，可是，自己打下的江山，為什麼要叫它亂？這次毛主席過生日才說得比較透徹。

毛主席認為舊機器要改成新機器，舊方法要改成新方法，舊秩序要改成新秩序，舊制度（不是說社會主義制度，是說舊的規章制度）要改成新制度，舊紀律（對直接上級絕對服從）要搞掉。毛主席關於大民主的思想，就是這樣來的。他認為我們舊的一套同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同蘇聯差不多。他認為大民主好，便於攻擊敵人，也能對各級領導機關、領導人直接監督，造成新的社會風氣。

毛主席還講了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大民主的保障，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不但沒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沒有。專政機關，必須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專政機關要保障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串連的正常進行，專政機關不能幹涉甚至壓制，不能亂抓人。祇能對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放毒不是指說怪話反對領導，而是真正去放毒藥）、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間諜活動這些現行反革命要專政，依法制裁。革命群眾要發動起來，幫助監督專政機關，保障實現無產階級大民主。毛主席反復講，放毒不是指的思想上的問題，思想反動的，堅持資產階級思想的，祇要沒有違法，就不能抓。要擺事實講道理，同他辯論。他說，專政限於很小範圍。黨內問題，不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好，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也好，在黨內、政府內、民主黨派內部，即使確有證據的特務，也要一個不殺。這一知，文化大革命中我聽毛主席講過多次。這一點他是堅持的。但他沒有堅持大部不抓。可是後來擴大到對打倒了的大部都要抓了。他沒有堅持過去提的大部不抓。（注：這一

段以及下面所謂主席講話多系演繹。)

毛主席說，看起來黨內兩條路綫鬥爭還不能說已經解決了。他說，這個鬥爭不是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從一搞社會主義就開始了。究竟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反映到黨內，就是兩條路綫的鬥爭。他說，這一鬥爭現在也沒有了結。劉少奇之後這鬥爭還是在鬥。各級、各個領域都存在這問題。他們在黨內占據領導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影響。清除這些影響，使各方面、各領域從思想上解決問題，還要作深入細致的工作，還要有很長時間的鬥爭。

毛主席說，一定要有革命領導幹部參加文化大革命，要打破清規戒律，打破束縛群眾的框框，到群眾中去，同工人農民學生在一起，參加鬥批改，實現機關革命化。要堅持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領導幹部的批判要治病救人，團結大多數，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毛主席看來，越來越多的領導人會站到革命群眾方面來，支持他發動的群眾的革命運動。他說極少數不肯回頭、堅持錯誤、陽奉陰違、耍兩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眾打倒，這極少數人是“咎由自取”（這四個字毛主席用的是陶鑄的話）。

毛主席在吃飯前說了上面一些話。這是他提出的“全國全面階級鬥爭”的基本內容，也是他一月份號召全面奪權的根據。這也是他反復強調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根據。這一番話，也比較完整地表述了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飯桌上沒有什麼話，祇是祝酒說了一句。吃完飯閑談幾句各人就回去了。

摘自王力《現場歷史》（牛津大學出版社，第100-104頁，1993年）

附件④：

姚文元傳達毛主席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徐景賢 記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那天下午，我們上海市委寫作班

的成員們昨天剛剛吃過為毛澤東七十三歲生日祝壽的長壽面，大家聚集在武康路二號的草坪上，商量著怎麼進一步揭發批判市委的問題。忽然，文學組的一個青年從樓裡奔出來叫我：“老徐，北京有長途電話！”我趕緊跑到辦公室，拿起電話聽筒，裡面響起了一個十分熟悉的聲音——夾雜著上海口音和浙江口音的普通話：

“徐景賢嗎？我是姚文元啊！今天要向你傳達一下主席的指示……”

哦，原來是文元。自從他調到北京去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員以後，幾個月來，總是我有事打電話找他，他從來沒有主動給我電話，特別是在市委寫作班宣布造反的前後，我頻頻向北京打電話，尋求他和張春橋的支持，很想傾聽他的意見。但是，電話相當難打，連通過紅色保密機也難以找到他，真是“衆裡尋他千百度”。當時，我心裡曾經多次嘀咕：“老朋友也搭起架子來了！”今天，他忽然主動打電話給我，而且要傳達毛主席的指示，真使我喜出望外。我趕緊掏出小本子準備記錄。

姚文元在電話裡一反平常冷靜的語調，用一種按捺不住的興奮語氣說道：

“昨天晚上我們中央文革的幾個人都到毛主席那裡去了，祝賀主席生日，給主席敬酒。主席很高興，他平時很少喝酒的，昨天和我們乾杯了。主席對上海的形勢很關心，他從中央文革的《快報》上看到了你們造反的消息。主席說：上海的形勢很好，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現在機關幹部也起來了。我問主席：上海市委強調‘內外有別’怎麼辦？主席說：‘內外有別’可以打破，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機關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我一邊聽，一邊嗯嗯，把姚文元電話傳達的內容一字不漏地記了下來，心裡激動得熱血沸騰。

姚文元接著說：“主席很欣賞你們的口號：‘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他說‘火燒’、‘揪出’、‘打倒’、‘砸爛’，這幾個口號的提法有區別，好！”

姚文元最後說道：“主席在和我們碰杯的時候說：祝全國全

面內戰開始！這一期《紅旗》雜誌將要根據主席的指示發表元旦社論，你們要很好地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我問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們可不可以在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範圍內開會傳達？”

姚文元沉吟了一下，說：“不要開大會，你們先在小範圍裡吹吹風吧！”

我放下電話，興奮萬狀，奔到寫作班的草坪上，逢人便說：“剛才文元同志來電話了！文元同志向我們傳達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了！”我想：我宣布造反的時候，雖然有張春橋和姚文元做後盾，但心裡還是不很踏實的，現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親自為我們撐腰了，我還怕什麼？！

晚上，在武康路二號寫作班二樓的玻璃棚陽臺上，由我主持開了一個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骨幹會議。會上先由我傳達毛主席的指示，緊接著哲學組、歷史組、文學組以及市委辦公廳《支部生活》編輯部的人員紛紛爭著發言，有的噙著眼淚，有的莊嚴宣誓，大家的神情異常忠誠、肅穆。

在討論中，我提醒與會者思考：“毛主席說的全國全面內戰開始了，中間有什麼樣的深刻含義？我們該怎麼做？”

胖墩墩的朱永嘉說：“我們市委聯絡站比其他造反組織條件優越得多，我們要利用這些條件繼續開大會批市委。”

從復旦大學哲學系調到市委寫作班哲學組來的郭仁傑，操著山東口音說：“毛主席不是說‘內外有別’可以打破嗎？我們把市委檔案室裡的檔案翻出來，把有關內容摘錄焉，作為批判市委執行反動路線的炮彈。”

我覺得這些主意不錯，表態說：“可以，由我寫條子給市委書記馬天水批，過幾天組織幾個黨員進市委檔案室查檔案。這次批判市委的大會要以《紅旗》雜誌的元旦社論為口徑，由我們負責寫出發言稿，大會要和‘工總司’、‘農司（籌）’、‘紅革會’（‘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的簡稱）等組織聯合召開，聲勢要大一點。大會由黨校來的程綺華負責籌備，籌備處就設在淮

海中路市委黨校……”

一切商量定當以後，夜已深了，我們對著毛主席的畫像，輕聲唱起了《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支歌。我邊唱歌，邊感到自己的身心激動得顫抖起來：這場全國全面內戰的結果是什麼，我還不能預計，但是，我預感到自己將成為一場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參與者，在即將到來的全國全面內戰當中，我要堅定地站在毛主席的一邊……

唱著、唱著，我驀然想起了復旦大學的紅衛兵在我造反以後送給我的一副對聯：

革命方覺北京近，
造反才知主席親。

今天，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這個“親”字，我把這個“親”字真正地融入到這首歌曲裡去了。

我們唱得很輕、很輕，歌聲只在室內回落，因為就在市委寫作班隔壁的一幢樓裡，還住著一個市委書記和一個部長。時過中夜，他們家裡黑洞洞的，人們早已進入了夢鄉。我們不想驚動他們。當然，在沉睡中的他們，也萬萬不會想到：就從近在咫尺的市委寫作班裡，一場席卷全國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奪權風暴，即將猛烈地刮起來了！

摘自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5年11月版第6-11頁）

第十八章 打倒陶鑄及中央文革小組的變化

1、我所知道的陶鑄

文革開始前，中央辦公廳是在劉少奇曾經住過的“甲樓”辦公，中辦主任汪東興、秘書局局長童小鵬和我的辦公室都在那裡。1966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後，陶鑄調來中央當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長，中央辦公廳的工作就由他來領導了。他剛調來北京，還沒有辦公的地方，於是我們就把我們辦公的地方騰給了他。我和汪東興搬到丙樓，童小鵬搬去了丁樓。從那個時候開始，我與陶鑄接觸多起來了。他管辦公廳，是汪東興的領導，也是我的領導，秘書局有什麼問題，或主席有交待的事情，我都要向他匯報或者商量。我那時除了要向江青匯報工作之外，還要把中央書記處每次開會討論的內容，和會議所作的決議寫一份正式的報告，經陶鑄簽字後，發給主席和各位中央常委。陶鑄文字功夫很好，我寫得不妥的地方，他都會作修改。

在他剛來不久的時候，他跟我講過不少他對毛主席的思想的體會，講他遇到困難，都是努力用毛主席的思想來分析現狀，尋找解決方法。這給我特別深的印象，我覺得他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他還曾詢問過我個人的經歷，我說我是個中學生，在上海參加地下黨，幾句話就介紹完了。他待人比較平等，也向我講他自己的歷史。他說，我是犯過錯誤的啊？我一愣，我那時沒有聽說陶鑄犯過什麼錯誤，就問，你怎麼會犯錯誤的呢？他說，人人都會犯錯誤的，我在高崗的事情上就差點陷進去。是毛主席批評教育了我。他說，他跟

高崗的關係不錯，在“高饒事件”之前，高崗到他那裡去過，講了一些看法，他也發表了些看法，其中有贊成高崗意見的。陶鑄說，後來中央沒有追究我，不過我自己知道是犯了錯誤的，我向主席作過檢討。我與陶鑄認識沒多久，他就把他自己犯的錯誤都跟我說了，我就覺得這個人挺坦蕩，所以對他很尊敬。當時我們的關係挺好。

陶鑄有時會和我談起共產主義理想，這在我接觸到的中央領導中是比較少見的。從他和我的談話中，我感覺他是一個有理想的人，他對共產主義是有興趣、有研究的。不過他自己的生活卻是很講究的，他很會享受。他家裡用的東西在當時都是比較高級的，有些東西都不是用錢能買來的。江青到他廣州的家去過，說他那家跟貴族豪門的家一樣。我看到過紅衛兵送來的他家中擺設的照片，那些東西確實是好。陶鑄到中南海以後，選擇居住之處，左挑右挑，就挑了以前楊尚昆住過的“萬字廊”，那是中南海裡最華麗的院落。在審美觀點上，他們兩個倒是同氣相求的。

那時，中央開會的時候，陶鑄指定由我、王力、穆欣做會議記錄，然後由我們給他起草報告。他的要求很嚴格，記錄哪幾個主要問題，有什麼意見，哪個記錄寫得不對了，他都親自看過、改過，然後才給主席送。他還私底下要我把我和主席聯繫的情況經常和他通通氣。有一次他甚至還批評我，說主席那裡有什麼意見，你應該及時地告訴我們嘛。我嘴上答應，卻並沒有照辦。因為主席沒有讓我去說的事情，我是不可以隨便去跟其他中央領導說的，這是鐵的紀律，是最大的組織原則。主席的機要秘書知道的比我還多，但他們都是不該說的話一句也不說的。

2、陶鑄與陳伯達、江青的分歧

陶鑄剛來中央，就在好幾次會議上對陳伯達的講話有看法，他在會上就批評了陳伯達。這兩個人從一開始就有點“針尖對麥

芒”。陳伯達喜歡挑陶鑄的毛病，陶鑄也喜歡找陳伯達的問題。其實也都不是什麼大問題，至少我没有聽到過有什麼原則性的分歧。兩個人關係就漸漸地不太好了，後來就發展到經常互相拆臺。在這兩個人當中，說心裡話，當時我還是喜歡陶鑄，不喜歡陳伯達。這除了前面說的陶鑄待我平等之外，再就是我喜歡陶鑄的文章，喜歡他寫的《松樹的風格》。他寫得不錯，文筆簡潔生動，有古文功底，我對有古文底蘊的人是特別尊重的。陳伯達雖然古文也非常好，但他說話總是嘟嘟囔囔的，而且牢騷又太多。總是對這個不滿意，對那個不滿意，甚至有時對毛主席也會流露出一不滿意，埋怨毛主席對他不重視。

但隨著文革運動的發展，情況就不對了。陶鑄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傾向於劉少奇、鄧小平。對他們搞得那一套，從來都是輕描淡寫，不向毛主席如實匯報。陶鑄一到中央，就跟劉、鄧跟得很緊。他公開說，鄧小平是他的老師。他就是要拜鄧小平為師。對這個，林彪很忌諱。我有一次聽江青對葉群說，他陶鑄說什麼也是林總的部下（陶鑄原來在“四野”擔任政治部主任，是“四野”的“104”），怎麼去拜鄧小平為師？再說鄧小平的文化比他低呀，他拜他什麼師啊？所以陶鑄不但跟陳伯達的矛盾繼續加深，而且又跟江青鬧起了矛盾。陶鑄對江青意見很多，江青也對他很有意見。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成為黨內排名第四位的中央常委，又是書記處常務書記，還兼任著中央文革的第一顧問。他等於是取代鄧小平當了總書記（鄧小平那時不大管事了）。在陶鑄的眼裡，江青是比他小一輩的。這些人都是很講究輩分的，在他的眼裡，毛主席，周總理、朱德，是一輩的，陶鑄把總理看成大哥，他見到總理總是很恭敬的；而他們這些人包括林彪、陳雲、鄧小平是一輩；下面的“紅軍”是一輩；“抗戰”的又是一輩；完了就是“解放戰爭”的一輩。你要讓“解放戰爭”的去領導“抗戰”的，是很難的。那江青比陶鑄小一輩都不止了。所以他和江青發生矛盾就不好解決了。而且陶鑄是有理論的，什麼事情他都能講出個道道來的。就是錯的東西，他也能講出一個似是而非的道理來。陳伯達、江青

都拿他沒辦法。江青和總理有時也有矛盾，但他們兩人的矛盾好解決。

事實上，陶鑄對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擁護，但到具體的，他都反對。談到那個幹部搞特殊化、壓迫群眾了，陶鑄就馬上給人家辯護，說要保。其實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幹部的情况，好多人其實都是兩面派，他那些搞特殊化甚至貪污腐化的不好的一面怎麼能讓你知曉啊。更不用說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護的。陶鑄對兩廣、兩湖的幹部尤其要保。所以他的態度和中央文革的大都不一樣。如果都按陶鑄那樣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按中央文革的想法，幹部如有嚴重的問題，應該到群眾裡面去接受群眾對你的批判，也就是所謂“燒一燒”。作為共產黨的幹部，你是為人民的，你怎麼害怕群眾呢。毛主席也說，可以“燒一燒”，但不能“燒焦”了。底下的群眾，造反派看到你幹部有大問題，當然是很憤怒的。當然其中也確實是有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傾向。那時陶鑄也說要“懷疑一切”。一次他跟鄧小平一起去人民大學接見學生的時候就說，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不能懷疑之外，其他的都可以懷疑。後來這就被批評為“懷疑一切”。但這祇是表面的，他實質上的意思是除了鐵板釘釘的大案、要案，是不能懷疑一切，不能打倒一切的。誰都不可以懷疑，那你還能搞文革嗎？陶鑄其實是打著“懷疑一切”的旗號來反對“懷疑一切”。他是什麼都保的，有什麼懷疑一切呢？江青說陶鑄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沒說錯的，他確實是到處保。

陶鑄在貫徹劉少奇的資反路綫的時候是很堅決的。王任重從文革一開始就是堅決搞資反路綫的一個人，陶鑄則死保王任重等人。王任重任在湖北鬥學生、整工人，把人家搞得很慘。還把李達都迫害致死了。到了批判“資反路綫”的時候，受王任重壓迫的群眾就起來造王任重的反。還有劉志堅，他也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又是全軍文革小組的組長，總政治部的副主任，可他在總政系統搞“資反路綫”非常厲害，整了很多人。王任重跟劉志堅在抗戰時一起打過游擊，生死之交。兩個人相互死保，而陶鑄又對他們兩個百般維護。所以他們三個，一個是中央文革第一顧問，另兩個都是是

中央文革副組長。三個人互相呼應，給別人的一種印象，他們像是一個小集團，而且常常和中央文革其他人唱反調。

陶鑄對鄧小平很有好感。1966年國慶節，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接見革命群眾和紅衛兵的時候，身邊並沒有鄧小平。可在報紙上登出來的新聞照片上，陶鑄卻把在主席身邊的陳毅的頭去掉，換上鄧小平的腦袋，造成鄧小平出現在毛主席身邊的假象，被人稱為“換頭術”。這件事被新華社揭發出來了，拿到了中央的會議上。在懷仁堂開會開會的時候，我看到陳毅大發脾氣，罵道，他媽的，龜兒子，×你祖宗，把我的腦袋都給割了！這時，陳伯達也不出來勸，在那裡吃吃地笑。總理說，這事就不要再鬧了，糾正過來就是了。可照片已經印在報上了，怎麼糾正？

3、關於我寫給人民教育出版社幾個同志的一封信

1966年12月中旬，閻長貴送來了一封他在人大讀書時的幾個同學寫來的申訴信。他的這幾個同學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因為對陶鑄有一些意見，貼了陶鑄的大字報，都被打成了反革命。閻長貴一再央求我想法救救他的同學。於是，12月20日，我就給那幾位同志寫了封信，對他們提出的申訴做了一個答復。我在信中說：

“我對你們部裡的事情，沒有調查研究，不能講什麼意見，希望你們根據十六條和紅旗雜誌社論的精神進行討論，將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徹底。教育陣綫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陣地，希望你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用毛澤東思想占領這個陣地。關於×××等五位同志給陶鑄同志寫大字報的問題，我個人認為是可以寫的。對這張大字報有不同意見，可以辯論。但是說這張大字報是‘反革命’的大字報，針對這張大字報說：‘誰反對陶鑄同志就砸爛他的狗頭’，這是錯誤的。有人把貼大字報的人說成‘反革命’，進行圍攻、鬥爭，甚至扣押他們，更是錯誤的；任何人都沒有權利這樣做。”

這封信沒有經過主席，也沒有經過江青、陳伯達他們看過就發出去了。不過我知道，我寫這個信他們是不會反對的。因為對一個中央領導人提點批評意見，就說人家是反革命，那還有什麼大民主啊。

我寫了信以後，見到陶鑄我還跟他說過，教育出版社有幾個人因為給你提了些意見，被打成了反革命。我跟他們說不能因為給你意見，就把人家打成反革命。陶鑄說，對。是這樣的，不能說反對我就是反革命嘛，這我早已經說過的。從他的話聽來，他對我這封信，也並不介意。

後來我的這封信在紅衛兵小報上登出來了。就在這事發生不久，陳伯達、江青與陶鑄的衝突表面化了，到1967年1月4日，陳伯達就公開提出要打倒陶鑄了，江青也跟著說要打倒陶鑄。因為這兩件事相隔很近，所以直到現在還有人把我給人民教育出版社那幾位同志的信，說成是要打倒陶鑄的信號。其實不是這樣的。雖然我當時對陶鑄也已經有了些看法，但直到1966年12月我沒有反對過陶鑄。那時我經常要向他請示工作，每次開會他都在，總理在是總理主持會議；總理不在，就由他主持會議的。我寫那封信祇是因為聽了閻長貴的反映，為給陶鑄貼大字報的人作開脫，並沒有要打倒陶鑄的意思。可是後來閻長貴寫文章揭發我，說我的信貌似溫和，實含殺機。他似乎忘了這封信實際是他來求我寫的，而且信裡的許多話，當時他還嫌我說得太平和呢。

4、陶鑄是怎麼被打倒的

到1966年11月16日召開的工交座談會上，陶鑄和中央文革小組的矛盾就公開化了。稍後，在一次接見揪鬥王任重的學生造反派的會上，陶鑄又和陳伯達、江青當面發生了衝突。於是陳伯達在12月27日、28日周總理主持的會上說陶鑄與劉少奇、鄧小平是一伙的，是陶“二世”（劉少奇是“一世”），把陶鑄也列為走資派。

江青也跟著在會上說要打倒陶鑄。葉劍英等人到主席那裡去告了陳伯達和江青的狀。12月29日上午，在主席主持的會議上，主席批評了陳伯達、江青，還為陶鑄說了話。而到了1967年1月4日下午，陳伯達、康生、江青在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兵團”時，陳伯達、江青在講話中公開批評陶鑄。1月5日，陳伯達、江青的講話就已印成傳單公開，大街上貼滿了“打倒陶鑄”的大標語。到2月6日，2月10日，毛主席兩次在會上就陳伯達、江青公開發表批評陶鑄的講話，嚴厲地批評陳伯達、江青。毛主席說：陳伯達你這是“一個政治局常委要打倒另一個政治局常委”，是“突然襲擊”。你過去老在我和劉少奇之間投機。陶鑄在廬山表現比你好，你還動搖呢！江青你自以為是，目中無人。打倒陶鑄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你們要好好檢討！批得很厲害。陳伯達回釣魚臺後為這事大哭，喊著要自殺。主席說：“一個禮拜之內，中央文革小組自己開會對陳伯達、江青進行批評”。還說，“要是你們中央文革沒有人敢批評他們，那我就自己找人來批評”。我聽總理說，當時陶鑄對主席很感激，他反過來還為陳伯達和江青說情，希望主席不要生氣，也不要叫陳伯達和江青再檢討了。主席當時的意思是，陶鑄是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選舉的新領導，有不同的意見可以提，但不能動不動就打倒。

按照主席的指示，文革小組專門開了一個會，陳伯達、江青都在會上做了檢討。會上大家對陳伯達、江青也進行了批評。我出獄後，從歸還我的部分書籍裡，意外發現了一張康生寫給我的便條，使我回想起來當年開會時的一些情景。康生在會上運用了一句典故來批評陳伯達，說你到處自稱是“小小老百姓”，其實是嘩眾取寵。由於我在會上沒有聽清楚康生用的典故，散會後，我問了康生。康生就在一張紙上面寫下了這樣兩句話：“謙，美德也，過謙則近於詐；默，懿行也，過默則進於奸”。並注明了（見“一夕話”）。從這張紙條上所留下的內容來看，也可以看到當時開會對陳伯達他們的批評是很嚴肅的。

但是，在1967年1月8日，在一次中央會議上，主席講話對陶鑄

是不滿的。說陶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不老實。他的問題是紅衛兵起來後才解決的。曾志對此講話有疑問，寫信問主席，主席未作答復。雖2月10日後就此事開會批評了陳伯達、江青，而不久當江青、陳伯達再次提出要打倒陶鑄時，主席不講話了，陶鑄最終還是被打倒了。由上可知，毛主席對陶鑄問題的認識與處理是有反復的。這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回事？為什麼主席最後還是同意打倒陶鑄？據我現在的分析，這個轉折可能與這期間發生的以下幾件事有關。

第一件事，江青對陳伯達在挨了主席批評後哭著要自殺很反感，她批評陳伯達“沒出息。”但她也怕陳伯達真的自殺。因為那時陳伯達翻出了馬克思女婿拉法格的一句話，說“共產主義者在某些情況下的自殺也是英雄行爲”（我未查對，大意是如此）。所以江青就專門跑去安慰了他。江青跟他說，對主席的批評，我們聽著就是了，不要同主席硬抗。主席的脾氣你還不知道？不要同他頂。主席常說“春雨潤物細無聲”，主席相信的是材料。我們應該把材料收集了給主席看，讓主席認識陶鑄這個最大的“保皇派”的真面目。而且光我們說不行，要讓群眾來說，主席最相信群眾了。

於是，陳伯達、江青就真這樣做了。她叫我們在紅衛兵的小報中（特別是廣東、湖北的小報），把所有批評陶鑄、王任重的信息都集中起來，送給主席去看。同時又叫我去查陶鑄和王任重在那段時間裡所批發的文件。這一查就不得了啦，原來我們誰都不知道，在劉少奇1966年6月20號批轉了北京大學《九號簡報》的中央文件之後，中南局接連發出了五個正式文件，要各級黨委堅決貫徹落實。在所有中央局裡面，中南局所發的堅決執行“資反路綫”的文件是最多的。

早在6月份陶鑄就根據劉少奇的指示，支持在北京各大學開展反右派、反干擾運動，號召打殲滅戰，要追根，要在群眾中進行排隊摸底。

1966年7月初陶鑄有一次在北京大學的大會上講話說，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的領導，反對黨的領導就是反革命。要絕對服從黨

的領導，沒有商量餘地，要群眾抓住反黨這一條掀起一陣打倒反革命的風暴。

劉少奇、鄧小平在主席回京前，還批發了中南局寫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報告》，說學生中有很多右派，要等他們充分暴露後，及時反擊。廣東省公安廳選用對付現行反革命的特種技術手段，來偵察大專院校的學生動態，被偵察的對象有好幾百人。有一個學院竟有四五個班級被列為嚴密偵察的對象。在陶鑄等人策動下，有許多工人、學生被捕、被打、被審訊。僅武漢市，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就逮捕了四五百人，而且都給他們戴上了手銬腳鐐。甚至還有被判處死刑的。王任重說這次運動，湖北要抓三四十萬個右派。

直到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京前，陶鑄和王任重還在向中南局發指示說，這次運動要打擊的右派，可能比1957年反右運動時還要多。如此等等。這樣的材料至少送上去有幾十件之多，即使毛主席祇看了這些材料的一部分，也會對陶鑄的看法發生改變的。

第二件事，在1967年初的時候，具體時間記不準了，中南海西門來了一個紅衛兵模樣的人，但他的年紀看上去已經不小了。他給毛主席送來了一份材料，說要告陶鑄。材料上寫著，他的生母是陶鑄現在的夫人曾志，他的父親姓蔡，叫蔡協民，是一個老革命。當年是毛主席辦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第一屆學員，是主席的學生，後來還給毛主席做過秘書。主席曾說他是一位好同志，對革命很忠誠。蔡協民在30年代為黨做地下工作的時候被捕了。那時陶鑄和曾志都是地下黨的領導。曾志很漂亮，已經與蔡協民結婚了，可陶鑄卻在暗地裡追求她。蔡協民被捕後，陶鑄就把曾志追到手了。那時候也沒什麼離婚、結婚之類的手續，陶鑄就跟曾志同居了。不久曾志生下來一個孩子，但那是蔡協民和曾志的孩子。曾志把這個孩子送到孩子奶奶那裡去了。那個紅衛兵模樣的人說他就是那個孩子（他拿著他爸爸和曾志一起的照片。他說這張照片是在曾志把他放在奶奶家撫養的時候留下的）。也不知道這人怎麼調查得那麼詳細，他說敵人在他爸爸身上沒有發現什麼，就把他放了。他爸爸出

來後就找組織，找到了陶鑄，要求恢復組織關係。但陶鑄說，因為他被捕過，到底是怎麼放出來的情況還弄不清楚，現在不好接組織關係，就沒給他接組織關係。於是蔡協民就祇好到處去流浪。在流浪期間又被國民黨抓住了，並把他處死了。這個“紅衛兵”認為，他爸爸蔡協民的死就是因為陶鑄不給接組織關係的結果，是陶鑄造成他爸爸的死亡，他要來跟陶鑄算這筆老賬，為父親伸冤。

我們把信送給了主席。毛主席因為是他以前秘書的兒子的信，就仔細看了這封信。後來我問過主席機要秘書徐業夫，主席是怎麼批的。徐業夫說，主席叫這個孩子回去了，還給了他一筆錢。還說，主席引了一句老話，意思是說陶鑄道德上有欠缺。徐業夫也記不清楚主席說的那句老話了，我查了成語詞典也對不上主席說的老話。我認為主席是相信這個孩子的話的。但主席當時也沒辦法處理此事，一則蔡協民剛從敵人監獄放出來，情況不明，確實不好接關係；二則陶鑄是領導幹部，曾志也是一個比較好的女幹部，你說人都死那麼多年了，事情也無法查實了，怎麼辦呢？這個孩子當時都三十多歲了，祇能照顧他一下，給他一些安慰了。

但從這個事情以後，我發現主席就再沒說過陶鑄的好話。主席對陶鑄態度的轉變除了這些原因，是否還有什麼其他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就在主席保陶鑄，批評了陳伯達、江青以後，中央文革又繼續跟陶鑄發生了糾紛。而這前後還有吳傳啓的事。吳傳啓是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造反派。而陶鑄支持的是學部的保守派，這保守的一派堅決反對吳傳啓，他們向陶鑄送材料說吳傳啓解放前參加過國民黨。在一次會議上陶鑄就說，這個問題要審查一下。關鋒和吳傳啓關係不錯，他們經常一起寫文章。在開會時，關鋒說，吳傳啓解放前是參加過國民黨，但他那時已經參加了共產黨，與地下組織有關係。他參加國民黨是地下黨叫他參加的，目的是取得資格參加國民黨的國民大會代表競選，爭取當選代表，以便於開展統戰工作。

我也認識吳傳啓，是關鋒介紹給我的。我跟吳傳啓一起參加過上海工農兵學哲學座談會。我對陶鑄說，這個事也應該聽他本人講

講。陶鑄大概不想讓我牽涉其中，就說有沒有問題，調查了再說。他還跟我說：“這個事跟你沒關係，我知道，你跟他祇是一般性的工作關係。”陶鑄又解釋說：“國民黨也不一定都不好，國民黨也有一般性的和骨幹分子的區別。我祇是要查查清楚。”就在這時。江青講話了，她說，“參加國民黨也要看他爲什麼參加，聽說陶鑄同志當年也參加過國民黨呢！”可沒等江青說完，陶鑄就發火了。他指著江青說，“你怎麼能這樣說，我們那時是國共合作，那時的國民黨是孫中山領導的革命的國民黨，怎麼能與蔣介石的國民黨相比。”他接著又說，“那時毛主席還參加過國民黨哩。”江青一聽也火了，說：“你誣蔑毛主席！”這樣兩個人就鬧起來了。總理一看不對，說：“哎呀，你們說的是一回事，那時毛主席參加的國民黨就是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國民黨，我也參加過。”與陶鑄向來不合的陳伯達這時就火上澆油地插上來說：“你們看，陶鑄對毛主席是什麼態度？”陳伯達這麼一說，就變成陶鑄對毛主席的態度有問題了。陶鑄急忙辯護說：“我没有，毛主席是我的老師，我是他的學生……”等等，結果一場會議，鬧得不歡而散。這個事，我估計江青會給毛主席說的。

不久以後，中央就批准對陶鑄進行審查了。一次，總理要一個負責審查陶鑄的解放軍軍官來釣魚臺匯報。那軍官說，在北方草嵐子監獄有“六十一人的叛變案”，在蘇州反省院也有個幾十人的叛變案。陶鑄就是從蘇州反省院出來的，是怎樣出來的也有嫌疑。他還說陶鑄有個哥哥，被抓起來了。他哥哥揭發說，陶鑄不僅參加了國民黨，而且是國民黨的秘密黨員，是國民黨在共產黨內的卧底。來人把陶鑄哥哥寫的信拿出來給我們看。他哥哥在信上寫著，是他去勸陶鑄背叛的。此外還寫了陶鑄給他哥哥回信的內容。但是這個回信的內容祇是他哥哥的回憶，並不是陶鑄自己寫的。內容是說陶鑄當時有與他哥哥妥協的意思。當時一起聽匯報的有好幾個人，總理、江青、陳伯達、關鋒和我。

我看了陶鑄哥哥寫的材料，就問來匯報的人：“你們強迫他了沒有？”他說：“不是我們搞的，是紅衛兵他們搞的。”我

問：“紅衛兵怎麼搞的？是不是強迫他哥哥交代的？打了他哥哥沒有？”他說他不知道。我說：“這個材料，我看不是真的。陶鑄是有文化的人，而這個信上寫的口氣和寫法，都不像是陶鑄的，他寫信不會這麼蹩腳。”我又說：“背叛不背叛是個大問題，不能夠僅根據幾個紅衛兵搞的材料就給陶鑄定案，咱們得自己調查。”當時我說的意思有兩重性，既懷疑這個材料不實，但也未否定陶鑄有背叛嫌疑。但總理聽了很高興，馬上說：“本禹同志這個分析很好，我也有懷疑。陶鑄是地下黨的一個領導人，聽他哥哥一句話就背叛了？他那麼長時間都不背叛，哥哥寫封信就變了？那麼容易？”總理也說叫他們要繼續調查。總理又說：“陶鑄這個專案組還沒有組長，我看本禹就去當個組長吧。”我說：“這不行，我事兒太多了，恐怕耽誤事。”總理說：“你掌握一個大的方向就行了。”接著他馬上就起草了一個文件，陶鑄專案組由戚本禹任組長，送主席、林彪批。總理還說：“你有什麼弄不清楚的，就來問我。”看起來，周恩來也是不相信陶鑄是叛徒。

這以後，陶鑄專案組就來跟我匯報工作了。我說：“你們一定要好好跟他哥哥談，看他哥哥寫的材料對不對。”專案組把他哥哥寫的材料給陶鑄看，叫陶鑄交待，陶鑄拍了桌子，把他哥哥罵得狗血淋頭，說他哥哥是國民黨，他兄弟倆從來就有矛盾的，他没有背叛。後來我把專案組重新調查的情況告訴了總理，總理也挺高興。

1967年9月初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這篇文章把陶鑄批判得很厲害，說陶鑄早就“懷疑一切”了，他的動機是可疑的。雖然我不認爲陶鑄是國民黨，也不認爲他是叛徒，但是我認爲他忠實地執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包庇走資派，這很不對。但我對陶鑄的認識跟姚文元有些不同，可是姚文元的文章是主席看過的，我也不好說什麼。在此事發生以後的四個多月，我自己也被隔離審查了。

我出獄後，聽一個參加過陶鑄專案的同事說，在我入獄後，陶鑄專案組的人曾舉報，說我包庇陶鑄。但實際上，因爲材料的缺乏，當時對陶鑄還沒形成定論，談不上包庇不包庇。鄧小平他們上

臺後審查我的時候，就沒有說我包庇陶鑄了。那時陶鑄已經是正面人物了，而我則被他們視為反革命，他們也不好說我包庇陶鑄了。

5、中央文革小組的變化

隨著陶鑄、王任重、劉志堅相繼被打倒。中央文革小組自然也發生了變化。1967年初穆欣和尹達實際上就已經離開了中央文革。因為他們分別在《光明日報》和歷史研究所裡執行了劉少奇的資反路線，對那裡的群眾鎮壓得很厲害。儘管他們都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但底下群眾對他們反對得很厲害。陳伯達和我都去做過工作想保他們，但群眾意見還是很大，保不下來。這樣他們就不能繼續在中央文革工作了。但中央文革告訴群眾，對他們可以批判，但不準揪鬥。

這樣就僅餘下八個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了，當時被稱作，三老、三中、兩青。

“三老”是康生、陳伯達、江青。

江青對康生很尊重，她一直都叫他“康老”，我們也叫他“康老”。主席一般就叫他康生，但有時也開玩笑叫他“康老”。江青對陳伯達不大看得上眼。

“三中”是張春橋、關鋒、王力。

關鋒的資格比王力老。而張春橋是副組長。

兩個青年人，戚本禹、姚文元。主席說我們是“南姚北戚”。

以前陶鑄他們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時候，雖然在小組的內部經常會有意見和爭論，但陶鑄對外還是維護著文革小組的。所以，他的存在，實際上緩和了中央文革小組和其他中央部門的不少矛盾。陶鑄倒臺以後，中央文革小組和一些老幹部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劇，而首當其衝的就是王、關、戚。

第十九章 上海“一月革命”

掀起的奪權風暴

1、上海的“一月革命”

參加毛主席的簡樸家宴兩天後，上海發生了“康平路事件”。上海市委對張春橋處理“安亭事件”的做法很不滿意，可是毛主席已經明確表態支持張春橋，他們又不好公開地去反對。當時在“工總司”成立先後，支持上海市委的工人成立了上海工人赤衛隊。曹荻秋等人心裡也是支持赤衛隊的，可以此來與已經得到承認的上海“工總司”相抗衡。但這時毛主席、中央已表態要支持工人中的造反派，曹荻秋被迫聲明要收回他12月23日已簽字同意的赤衛隊的八項要求。赤衛隊有被上海市委拋棄的感受，反過來，有過萬的赤衛隊員擁進了康平路的上海市委，要打倒曹荻秋。在這個關鍵時刻，張春橋顯示了他對政治形勢走向把握的能力，他及時、果斷地告訴“工總司”，應調集隊伍，把赤衛隊從康平路市委機關驅趕出去。這一事件期間也發生了一些肢體衝突，但並沒有發生嚴重的武鬥。

1967年1月2日，毛主席決定派張春橋和姚文元以中央調查員的身份回上海。1月4日，上海《文匯報》的造反派奪了《文匯報》的權，緊接著《解放日報》的造反派也於5日奪了《解放日報》的權。這兩次奪權行動都是群眾自發搞起來的。張春橋事先並不知情。5日晚上，我看到了主席支持兩報奪權的批示後，馬上通過紅

機子找到了1月4日已到上海的張春橋，把主席批示的內容告訴了他。從電話中聽得出來，張春橋感到有些驚訝。

毛主席支持並完全肯定了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奪權行動，並且認為“這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一場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這件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然而，張春橋在上海所面臨的局面是嚴峻的。一方面，感到被上海市委拋棄的大批“赤衛隊”工人離開生產崗位，去北京告狀，使得許多單位的生產陷於癱瘓並造成京滬鐵路的中斷；另一方面，此時又現出了一股“經濟主義”的浪潮。面對汹涌的經濟要求，抵擋不住的上海市各級領導向群眾批條子，發鈔票。他們中有些人所以這樣做，其在政治上的意圖是很明顯的，就是借此向毛主席和黨中央施加壓力。

毛主席在那段時間裡對上海的情況非常關心，他讓徐業夫來跟我說，上海方面有什麼報告，要馬上給他送去。張春橋那時也常和我聯繫，不過他和我聯繫大多是通過電話，沒有書面的報告，他當時尚未接管上海市委的機要部門，要發電報也不太容易。我從他那裡知道了情況就馬上報告給江青，然後江青就去報告給主席。主席在那段時間經常和江青一起住在釣魚臺，經常叫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到他住的小樓去開會。毛主席對上海市委的那些做法非常反感，他在會上說了：“我就不信，死了張屠夫，就得吃混毛豬”。

張春橋意氣風發，他一方面緊緊地依靠了“工總司”王洪文這些工人造反派，讓他們到“赤衛隊”工人群眾中去作路線交底，勸說他們支持革命造反派，回到生產崗位去。另一方面他已在1966年底支持了原來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一些機關幹部起來造反，成立了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使得上海市委的“後院”著了火。這時，他又支持由“工總司”聯合各個造反派，成立“抓革命，促生產火綫指揮部”。這個由上海工人和學生群眾組織自發組織起來、後來又有機關幹部參加的“火綫指揮部”，擔負起了領導全市的生產、生活正常運行的職責。原上海市委的有些人弄巧成拙，反而把自己弄得“靠邊站”了。

2、毛主席提出向走資派奪權

1967年1月8日，以“工總司”為首的上海幾十個群眾造反組織，向全市人民發布了一個“緊急通告”，號召全市人民抵制“經濟主義”妖風，堅守抓革命、促生產的戰鬥崗位，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進攻。

毛主席是在報紙上看到這個“緊急通告”的，他立即給這個“通告”以高度的評價。認為它寫得比中央文件都要好。他下令《人民日報》全文轉載這個“緊急通告”，並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聯名，於1967年1月11日向上海的各革命造反派組織發出了“賀電”。而且這個“賀電”在1月12日的《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正是這個“賀電”，開啓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嶄新的階段，即向黨內走資派奪權，建立革命新秩序，建立新的權力系統的新階段。

關於奪權這件事，中央文革小組的所有成員，包括去上海的張春橋、姚文元都是缺乏思想準備的。盡管在“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裡面都講到了要奪回被走資派所篡奪的那部分的權力。但是，這在當時都是被理解為主要是個別的組織人事調整。陳伯達那時總跟我們說，那些老幹部，毛主席還是要用的啦。他說，解放後，連國民黨的大員，毛主席都還是用他們，更何況這些都是共產黨的幹部呢。他說，主席老講，對犯了錯誤的老幹部“火燒”一下可以，但不要把他們給“燒焦”了。這說明主席還是要用他們的。咱們看不清楚，就別瞎摻乎。他說，造反派最多祇能起個監督的作用，他們不是專家，沒有管理經驗。管理國家還是要靠專家的。所以他對奪權的問題一直是持觀望態度。那時陳伯達的這個思想對我們的影響很大。江青也從來沒有和我們講起過“奪權”的想法。所以說，這個奪權的決定完全是毛主席經過他獨立的觀察和思考以

後，作出的重大的戰略決策。

3、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成立

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最集中的城市，當時就有二百多萬產業工人。上海工人的覺悟高，聽毛主席的話。由於毛主席支持“工總司”造反派，那些原來參加了“赤衛隊”的工人很快就轉變立場，反過來支持並加入了“工總司”。而王洪文他們也採取了正確的政策方針，敲鑼打鼓地歡迎“赤衛隊”的工人回單位“抓革命、促生產”，並規定對他們不得採取歧視的態度。所以，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很快就控制了局面。

上海的“奪權”過程進行得很順利。從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到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才一個多月就把原來的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權力都奪了過來。可以說，整個上海的“奪權”過程，都是在毛主席的親自過問和指導下進行的。

鬥爭是複雜的。1967年1月下旬，上海發生造反派紅衛兵組織“炮打張春橋”的事件。當時毛主席是明確支持張春橋主持掌控上海正在進行的奪權鬥爭。根據主席的指示，中央文革以陳伯達的名義及時表態，發去了“緊急電報”，很快就把這件事平息下來了。

上海“一月革命”的勝利，很快就在全國興起一個從下而上的革命奪權運動，山東、山西、黑龍江、貴州等地方最先起來響應，緊接著是全國各省市都開展了以成立“革命委員會”為目的的奪權運動，工人造反派在全國迅速崛起。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與此同時，隨著“奪權”運動的展開，黨內的矛盾更加也尖銳起來了。一些原來勉強支持打倒劉少奇的人，看到文革損害到了他們原有的權力、地位、名譽和經濟利益，從這個時候就開始站到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對立面去了。黨內的鬥爭也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第二十章 陳毅、譚震林等人大鬧懷仁堂 和批“二月逆流”

1、京西賓館事件

在上海發動“一月革命”期間，江青在一次會議上，談到對陳丕顯的評價問題時，她以開玩笑的方式對主席說，“這次要造主席一個反”。譚震林就在一邊指責江青說，你還要造主席的反？！主席是全黨的主席，你這是膽大妄為。當時主席聽了也祇是笑笑，並沒有去理會譚震林。

可是當看到主席真的為陶鑄的事情批評了陳伯達、江青，一些人就起勁了，認為毛主席是要“糾正”中央文革的“錯誤”了。

1967年1月，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召開常委擴大會議，中央文革小組也參加了這個會議。我那段時間大都請假在家裡寫《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文章，沒有去參加會議。江青也祇是偶爾去參加一下。後來聽關鋒回來跟我說，當陳伯達在會上批評肖華對軍隊文革運動領導不力的時候，葉劍英、聶榮臻就跳起來了，他們指責陳伯達是不是想把軍隊也搞亂。這時，徐向前出來講話了，他說肖華有些事情是做得不對。但葉劍英不買賬，對著徐向前拍桌子，反駁陳伯達。拍的時候不小心，拍在了桌上放著的一個茶杯蓋上，又用力過猛，據說他的手掌骨折了。

這件事情發生後，葉劍英又到林彪那兒去告狀。他列舉了軍隊院校造反派的學員，批判軍隊幹部的種種“罪狀”，特別講到肖華被鬥的事情。肖華是林彪的舊部，林彪要保肖華。其實肖華在軍隊

中是支持造反派的，所以中央文革也是主張保肖華的。葉劍英告狀以後，林彪就把江青叫到毛家灣去大發了一頓脾氣，把一個小茶幾都推翻了。江青再三辯白，林彪就是不聽。鬧到後來林彪要和江青一起到毛主席那裡去評理，後來據說是葉群跪下來哭求，才勸住林彪。江青回來之後跟我說，他一個病夫，我又不怕他。我是照顧大局才讓他的。其實，在當時一些中央領導人之間，這種磕磕碰碰的事情是常有的，但是鬧得這麼大的並不多見。這件事情不久就被傳了出去，並很快被一些人故意給渲染和誇大了。其中最惡意的是說林彪當場要人把江青拉下去槍斃！這種謠傳，其實也是有歷史根源的。事後葉群多次來找江青，有時我也在場，葉群說，林總對葉劍英一直是很警惕的。她說，儘管葉劍英積極地反賀龍，反羅瑞卿，林總還是不看好他，說他這個人不會打仗，就會無事生非。林彪還關照葉群，叫她以後在葉劍英面前說話要小心點。江青也跟我說，在肖華的問題上，她上了葉劍英的一個當。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林彪並不是像後來一些人所說那種兩面三刀的人，他有什麼不同的意見，是會當面跟你幹的。祇是他對他自己的部下保護的很厲害。

後來在這次中央軍委的會議上，就搞了一個“中央軍委八條命令”，於1967年1月28日發出。毛主席批准了這個命令。這個八條命令強調了擁軍，也嚴格限制了軍隊造反派的行動。但總的來看，它對穩定軍隊，防止軍隊出現混亂局面起了一定作用。

2、陳毅、譚震林等人大鬧懷仁堂和批“二月逆流”

毛主席對陳伯達和江青的批評，林彪和江青之間發生的爭吵，在有些人中間產生了錯覺。他們以為攻擊中央文革的時機到了。

而此時在上海發生的“一月革命”，則成了陳毅、譚震林、葉劍英等人大鬧懷仁堂的一根導火索。這中間陳丕顯是個很關鍵的人物。陳丕顯是紅小鬼出身，原來一直是在新四軍工作的，陳毅、譚震林都是他的老上級。華東的許多將領，包括許世友、葉飛，都是

陳丕顯的老戰友。新四軍的這些人，和八路軍還不一樣，由於他們的力量不如八路軍大，又經常受到國民黨的圍攻，為了集中兵力對敵，經常相互支持，所以各部之間抱團抱得很緊。

建國以後，陳丕顯是柯老（柯慶施）重視的人物。原先陳毅、譚震林都在華東局工作過，他們跟柯老的關係也挺好，他們都是聽柯老的。柯老當時在黨內的威信很高，毛主席也喜歡他。柯老就是與劉少奇的關係不好。

陳丕顯在批《海瑞罷官》這件事情上是支持江青的。文革初，江青和總理都親自找他談話，做過他的工作，希望他能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站出來，支持群眾的革命造反行動。但是，實際上，由於他所處地位的關係，他還是頑固地站在資產階級反路線一邊。對待文化大革命，他的態度和陳毅、譚震林他們是一致的。張春橋跟我說過，柯老在去世前跟他說，讓他以後有事多向陳丕顯請示匯報，所以他對陳丕顯一直都是很尊重的。可是由於張春橋在處理“安亭事件”的時候，未向陳丕顯請示就簽字承認了工人造反派組織，這就跟陳丕顯他們對立了。加上那時上海的造反派收到一個材料，說陳丕顯在十年內戰時有次曾被國民黨俘虜，當時他才十幾歲，長得又小，就被國民黨的長官收為養子，據說還叫他指認共產黨的領導幹部，這些材料未經核實，但張春橋由此對陳丕顯在思想上有了距離。

上海的“一月革命”矛頭，實際上是對著原上海市委主要領導人陳丕顯、曹荻秋。在毛主席的支持與號召下，接著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造反派也紛起效仿展開奪權鬥爭。奪權鬥爭更擴大了對領導幹部的衝擊，擴大了打擊面。而且這些被衝擊的領導幹部在政治上的能量又是非常大的。我覺得，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他考慮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如何讓人民的政權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裡，如何防止人民的公僕變成了人民的主人，不能讓一些人因為當官時間長了，就把權力看成是他自己的，變成為特權階層牟取私利的工具。然而在這一點上，可以說反對他的人那簡直是太多了。因為這畢竟牽涉到了黨政軍內許多領導幹部個人和小集團的切身利

益，他們當然要拼命抗爭。他們對中央文革支持群眾造反奪權，簡直是恨之入骨。而首當其衝的自然就是江青、張春橋了。這就是發生在2月16日的陳毅、譚震林等人大鬧懷仁堂事件的背景。

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周總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上，出面大鬧、強烈表達不滿情緒的是陳毅、譚震林、李先念、葉劍英等人。王力參加了這次會議，我則因為加緊撰寫《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文章，請假在家。王力後來告訴我，這次會議是總理主持的，原本是討論“抓革命、促生產”的，但會議還未進入主題，譚震林突然向張春橋發難，他質問春橋，上海為什麼還在批鬥陳丕顯，不讓他進北京（那時各省的第一書記，多被中央保護在北京，以免他們遭受群眾批鬥），春橋答，這個問題要與群眾溝通一下，很快可以解決。譚震林沒等春橋說完，就拍了桌子，氣勢汹汹地說，什麼群眾呀群眾，別拿這個來搪塞我們，除了群眾，還要不要黨的領導？你們就會利用群眾來把老幹部一個一個都打倒，老幹部革命幾十年，現在被弄得妻離子散。幾個中學生，喊個老子英雄兒好漢，就變成了反動血統論，你們才反動呢！蒯大富什麼東西！搞了個“百醜圖”醜化我們黨，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你們怎麼不管了！這個文革是黨史上最殘酷的整革命幹部的運動，就一個出海捕魚問題，你們就鬥了我四次。江青硬是要把我整成反革命，這是她當面跟我說的。譚震林說到這裡，參加會議的謝富治出來講話了，他面對著譚震林說，譚老板你也要實事求是呀！我在會上幾次聽江青說譚老板是擁護毛主席路線的，譚老板要保！從來沒聽她說你是反革命。譚震林一聽更火了，說我不要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稀罕她來保我！他越說越激動。突然間，拎起皮包，抱起皮毛大衣，霍地從座位上站起來，大聲呼喊：“我不幹了，讓他們幹吧！但我要與他們鬥到底！開除黨籍，坐監獄，砍腦殼，也要與他們鬥！”這時總理發話了，他用手中一本厚厚的文件拍了桌子喝住了譚震林，譚震林嚇了一跳，撲通一聲，坐下了。這時，坐在他旁邊的陳毅說，“不能走，要在這裡跟他們鬥！”陳毅又說，這些家伙（指康生、陳伯達、江青等人）上臺，就是修正主義上臺，與他們

鬥！陳毅繼續說：“延安整風時，我們這些人，有總理、我，都是挨整的。那時整我們最凶的就是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薄一波等，他們擁護毛主席最起勁，最吃得開，挨整的是我們，經常挨鬥。結果怎麼樣？今天的歷史證明，到底是誰反對毛主席？不就是當初最擁護毛主席的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這些人嗎？今後的歷史還會證明，究竟誰是反毛主席的。斯大林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結果是修正主義上臺。”陳毅講話後，李先念插話，從1966年《紅旗》十三期社論，號召群眾進行兩條路線鬥爭，老幹部統統被打倒！李先念講後，總理當場問康生、陳伯達，十三期社論這麼大的事，怎麼沒給我們看看，康、陳沒回答。

會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整理出一份會議記錄，先向江青匯報了會議的情況。江青覺得問題挺大，當晚即找主席匯報。主席聽他們匯報，開始沒怎麼重視，聽到譚震林發脾氣，抱起大衣要走，他祇是笑笑。但講到陳毅對延安整風的不滿時，主席嚴肅起來，特別是陳毅講到總理和他在延安整風挨整時，主席很不高興，但當晚，主席未表態而在張、王、姚整理的懷仁堂會議記錄上批示：“退陳伯達同志。”

懷仁堂會議的第二天，譚震林又給林彪寫信，大罵江青是武則天，挑唆林彪同他們一起反對中央文革，這封信我們當時和後來都未見到，文革以後，才在中央文獻出版編輯的《毛澤東傳》中看到，全文如下：

昨天碰頭會上我是第三次反擊，第一次是前天在電話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寫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無可忍的地步。

他們不僅不聽主席的指示，當著主席的面說“我要造你的反”。他們把主席放在什麼地位，真比武則天還凶。

他們根本不作階級分析，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一句話，把一個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衝口而出”，陶鑄、劉志堅、唐平鑄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斷送的。對於這些錯誤批評過嗎，祇批評陶鑄，其他人都未批評，

而且，批評陶鑄為時很短，根本不給人改過的機會。老幹部，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除了在軍隊的，住在中南海的，幾乎都挨了鬥，戴了高帽，坐了飛機，身體搞垮了，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的人不少，譚啓龍、江華同志就是如此。我們被醜化到無以復加了。北京百醜圖出籠後，上海、西安照辦。真正的修正主義、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護。這些無人過問，他們有興趣的是打倒老幹部，祇要你有一點過錯，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

我想了很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絕不自殺，也不叛國，也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蠻幹。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胸襟寬，想得開，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難道等到所有老幹部都倒下去了再說嗎？不行，不行，一萬個不行。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拼下去。

林彪當然看懂了這封信，他把信轉送主席並附信批評譚震林糊塗和墮落。主席看了後批示：“已閱，恩來同志閱，退林彪同志。”

懷仁堂碰頭會後，17日凌晨，周總理、李先念即在中南海小禮堂接見財貿系統造反派組織的代表。周總理當場下令逮捕了支持財政部造反派組織、支持財政部奪權的財政部副部長杜向光；發表了批評造反派對老幹部不講政策，殘酷鬥爭的講話，並以煤炭部長張霖之之死為例。

18日，周總理、李先念又接見了財貿系統各部局的司局級以上全體幹部，並發表講話。

周總理這兩次接見，更有當場逮捕一個副部長，周總理這樣的處置與態度，直接的後果是財政部的造反派組織迅速垮掉，財政部的奪權及造反派組織頭頭和杜向光等人被指控與批判。這些情況都被迅速反映到了中央文革。江青看到匯報材料，對我們說：這事牽涉到周總理，你們不要亂說話，我去向主席匯報。

毛主席應是聽了江青的匯報，看到了譚震林寫給林彪的信。

1967年2月19日凌晨，毛主席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葉群（代表林彪）、陳伯達、康生、李富春、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譚震林、謝富治、李先念等。

這次會上，毛主席嚴厲批評了陳毅、譚震林，大發雷霆之怒。據康生說，他很少看到毛主席這樣憤慨。主席說：

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持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葉群同志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當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哩，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游擊。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譚震林當副組長。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臺，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嘛！把張國燾也請回來，力量還嫌不夠的話，幹脆請美國、蘇聯一起來吧。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你譚震林也算是老黨員，為什麼站在資產階級路線上說話呢？

周恩來安慰主席，要他不要生氣，主席又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懷仁堂事件，以辯明是非。解決不了，就召開代代表大會，發動全黨來討論。

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主席的提議，從1967年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了七次會議批評陳毅、譚震林，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列席了此次會議。在批判會議上，大鬧懷仁堂事件被稱為“二月逆流”。

1967年2月28日陳伯達給主席送了天津小站反對文革運動的《快報》，主席批示：“從上到下都有這種反革命復辟現象，值得注意。”

1971年“九一三”林彪逃亡事件之後，“二月逆流”事件被重新評價。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毛澤東年譜》記載了毛主席在1971年11月14日的一段講話：“談話開始後，葉劍英到會，毛澤東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

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那個“王、關、戚”，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師。老師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但這段話，在《毛澤東文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都沒有，是葉劍英傳達的。他的傳達是否準確，尚待核對。即使屬實，我認爲，主席這話也是在出了“林彪事件”之後，爲了緩和黨內的矛盾，才這麼說的。陳毅、譚震林和葉劍英當時根本就没有反對林彪，從譚震林給林彪寫的信來看，他還是想把林彪和他們拉在一起來反對江青的，怎麼說他們是對付林彪的呢？而且“王、關、戚”什麼時候，跟誰說過要“打倒一切”，甚至要打倒總理和老師呢？發生“二月逆流”的直接原因，就是毛主席親自支持和領導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毛主席自己也知道呀！

其實毛主席一直是要保護譚震林他們的。江青讓我給群眾去做工作。我那時也排除了種種阻礙，到農林口對造反派講話，去爲譚震林說項。講話中我特別強調了譚震林1962年反對“包產到戶”的事。對我的講話，連譚震林自己都表示認可的。

1967年初財貿口也提出要打倒李先念。總理跟我說，李先念不能打倒。主席明確說了，要保李先念。1月15日，我接見中央財金學院的造反派頭頭，告訴了他們，李先念是毛主席要團結的人，不能打倒。總理說，告訴紅衛兵可以批判陳雲，陳雲這個人一貫右傾。在困難時期鼓吹“包產到戶”，他是最積極的。他其實就是鄧子恢的後臺。他就是個小農，“包產到戶”實際上就是他提出的，比劉少奇還早呢。1967年初，國務院財貿口的吳波、姚依林等人都首先寫了批判陳雲的大字報和材料。陳雲的秘書周太和還有一些副部長，把當時的工作筆記都拿出來交給了財貿口的造反派，去整理陳雲的材料，組織批判。所以說，文革運動中，黨內最早提出批判陳雲的是總理，從決策到具體布置的都是總理。

批“二月逆流”後，總理還要保李先念。我跟總理說，那讓李先念先高姿態做個檢討，我們到學生裡面給他去做工作。財金學院的造反派，根據中組部提供的鄭位三、陳少敏寫的材料，說李先

念在中原突圍的時候，也支持一個“46”決定，說如果被敵人打散了，抓住了，戰士可以投降做俘虜，黨員也可以投降，以保存革命力量。學生們認爲這一決定，與劉少奇指示薄一波等人可登“反共啓事”自首出獄一樣，也是叛徒行爲。毛主席是不同意學生們對李先念的這個看法的，還是保李先念的。總理當然也是保李先念的。爲了取得學生們的諒解，李先念寫了份檢討，對資反路線與“二月逆流”的事認錯，叫他的蔣秘書送來給我，讓我幫他修改。他秘書送來的時候連信封上的糨糊都還沒幹呢。可文革以後，李先念卻說，戚本禹那小子，狂妄得不得了，竟然逼我做檢討，我一句話就把他頂回去了。李先念秘書的夫人叫陳慧君，她和我的夫人是好朋友。她後來向人講了這些事。我覺得李先念在這方面很不實事求是。

第二十一章 青海軍區開槍鎮壓 革命群眾慘案

1、中央軍委“八條命令”的詭異傳達方式

事實上，“二月逆流”決不是“大鬧懷仁堂”這樣一件孤立的事件。它與許多地方發生的動用軍隊鎮壓造反派的事件是有著緊密聯繫的。

毛主席批准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是爲了穩定軍隊的。但是有些人卻把它用來當作鎮壓造反派的“尚方寶劍”了。本來毛主席把“軍委八條”中的第五條改寫爲：“今後右派衝擊，要抵制，左派衝擊，要歡迎”。在發布的時候，毛主席又把它改爲：“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的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可以不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

我當時就聽到反映，說有人在傳達這“八條命令”的時候，故意把它搞得很神秘，祇準看，不準記錄。而且在看的時候，也是藏頭去尾的。但是我一直沒有查到證據，所以也無法向主席報告。直到前幾年，我才看到江西有個人寫的回憶錄，談到了當時江西省軍區的領導，被葉劍英叫到京西賓館去聽傳達“八條命令”的情況，和我當年聽到的是完全一樣的。

接下來就是好多地方由軍隊出面，抓了大批的造反派的頭頭。在一些地方還發生了軍隊向群眾開槍的事件。在有的地方，如四

川，成都軍區於2月17日開始，在全省範圍內“鎮壓反革命”，還公開稱之爲“二月鎮反”。就是在“一月革命”的發源地上海，也發生了由軍隊出面抓捕各個區縣的造反派頭頭。在湖南省，由陳伯達搞了個錯誤的“二、四”批示後，則發生了湖南省軍區鎮壓造反派組織“湘江風雷”事件。

不過，最駭人聽聞的還是發生在青海西寧的省軍區趙永夫一派，派部隊到《青海日報》社包圍並開槍鎮壓革命群眾的“223慘案”。

2、青海“223”大屠殺

1967年2月23日，在青海省的省會西寧市，發生了軍隊向造反派群眾開槍的事件。在這個事件中，有347名群眾被軍隊當場開槍打死，其中年齡最小的僅14歲，還是個中學生。慘案發生以後，青海省軍區馬上宣布青海省的造反組織“八·一八”是反革命組織。接著，該組織共有13,414人遭到逮捕；5,968人被抄了家；還有4,279人被強制集中勞動。另據不完全統計，有17,293人遭到了毒打。

我們文革小組開始祇是看到了此次事件的主謀、青海省軍區的副司令趙永夫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他在報告裡稱，青海的造反派組織“八一八”衝擊軍事部門，部隊被迫實行了還擊。

但是很快，來自群眾的告狀信件就像雪片一樣飛到我們這裡來了。一些從青海逃回來的北京的紅衛兵，還有在事件中被打死的北京的學生家長，都到中央文革來控訴上訪。有的控訴信還是死者的血書，一些家長們則哭訴自己的孩子去青海串聯以後就生死不明瞭。

我覺著問題很嚴重，就去找關鋒商量。關鋒也從紅衛兵的來信中了解了這個慘案。我倆分析，這次慘案的指揮者是青海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可趙永夫怎麼有那麼大的膽子，敢向群眾開槍呢，他是否請示並得到過中央軍委的同意呢？關鋒說：趙永夫自己宣稱，

他們向造反派開槍得到了林副主席的表揚。如果真是林總表的態，那毛主席一定會知道，因為這麼大的事，林總一定是要向主席報告的；但如果是葉帥表的態，那林總就不一定知道了，主席也不會知道。也許他會去給總理報告的。這事大了，我們文革小組解決不了，得請尚方寶劍。於是我們決定寫個報告給主席。報告是我起草的，關鋒補充了幾句，內容很簡單，大意是：“青海西寧死了很多人，據了解，是解放軍向赤手空拳的學生開槍，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連鎖反應。我們想調查一下，是否可以，請主席批示”。報告原是由我和關鋒署名，我覺得僅我們兩個人力量還不夠，於是就找了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向他們通報了情況，並請他們也一起在報告上署了名。報告打印後，就交給了江青，由她轉報給主席。

3月11日，毛主席在我們的報告上批示：“可以調查一下。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值得研究了。”

主席的這個批示關鍵的是要查學生有沒有槍，要是學生有槍，而且是他們先開槍打軍隊的，那就是另一種說法了。

根據毛主席的批示，我們先後開了四次調查會。第一次是3月13日晚上，由我和關鋒向逃回北京的紅衛兵了解情況。接受調查的都是在《青海日報》社現場的紅衛兵，他們把經過敘述得很具體。第二次是3月21日晚，參加的有陳伯達、康生、王力、關鋒、我、蕭華等，調查對象仍是從青海逃回來的紅衛兵。這次調查會重點主要是圍繞著學生有沒有槍，有沒有開槍的問題進行的。兩次調查的結果是學生根本沒有槍，更談不上向部隊開槍了。調查的情況由我和關鋒向總理、江青作了詳細匯報。他們聽得非常仔細。

第三次調查是3月23日晚，總理親自主持，江青也參加了。調查對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駐青聯絡站、地院“東方紅”、北航“紅旗赴青戰鬥隊”、外地赴寧紅衛兵“紅旗造反團”等組織的代表。這次調查會還沒開完，總理在會上就把他寫給主席的報告推過來給我看了，上面說：“看來開槍是有問題的，詳細情況容後再報。”下面署名：周恩來。調查會結束之後，總理留下康生、江青、葉群和文革小組成員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匯報。實際

上，總理已經反復核對了由趙永夫組織人去搜查“八一八”組織的槍支情況。令人吃驚的是，連一支槍也沒搜查出來。總理嘆了一口氣說：“義和團還有幾支鳥槍，可憐這些娃娃連義和團都不如，幹嘛還要向他們開槍呢！”

經過這三次調查，可以確定，工人、學生手無寸鐵，根本沒有槍，誰先開槍的問題一目了然。工人、學生連槍都沒有，怎麼開槍！總理說，工人、學生根本沒有槍，趙永夫搜查了幾天幾夜也沒搜出一支槍來。工人、學生也沒殺過人，開槍殺人的是趙永夫。他事後又謊報軍情，還假造了林總回電，欺騙大家。康生插話說，趙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員劉賢權，又擅自調動野戰部隊開槍殺人，簡直無法無天。這才是篡黨、篡軍，他是個野心家！接著康生談了趙永夫參加過國民黨軍隊的問題。大家聽了都感到匪夷所思。這時葉群就說：“林總和我們林辦從來沒接到過趙永夫的電話，也根本没回過電話。總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講清楚。”總理答應了，說他將在下午向主席作匯報。

第四次調查是3月24日夜裡從11點半一直到25日凌晨，江青、葉群都來參加了，葉劍英、楊成武也來了，主持人仍是總理。而調查對象除了前三次參加的人員之外，還有從青海過來的劉賢權、張江霖、楊植霖、高克亭、趙永夫、王昭、張曉川、張洪。這一次，總理當著大家的面向趙永夫提出了一個一個的問題。趙永夫開始是左右搪塞，閃爍其詞，企圖為自己和他人遮掩。但在總理追問之下，很快就結結巴巴，滿頭大汗，最後是前言不搭後語，矛盾重重，漏洞百出。

當問到趙永夫，他說過這件事他是請示了林副主席的，林副主席說“你們打得對！打得好！”的時候。葉群站起來了，她說，那話絕不是林副主席說的。林彪打電話給葉帥，質問過葉帥，葉帥自己也承認，趙永夫是給他打過電話的。可當總理質問趙永夫的時候，葉劍英也在場，他坐在那裡一聲不響。這時，總理當場宣布：把趙永夫抓起來。解放軍就上去撕掉趙永夫的領章、帽徽，把他押了下去。葉劍英本來一直是參加中央碰頭會的，從這件事情以後，

總理就不讓他再參加中央碰頭會了。

可是，主席、總理去世之後，葉劍英支持華國鋒抓了江青，緊接著他就把“青海223慘案”給翻案了，他親自下令釋放趙永夫。有人提出，這可是毛主席、周總理親自定的鐵案啊，怎麼能翻？但是這個時候，已經沒有人可以管得住他了。在執行中，蘭州軍區司令員冼恒漢要求出具中央軍委的書面文件，才肯執行。葉劍英大怒，後來搞了個“冼（冼恒漢）、劉（劉賢權）反黨集團”，把冼恒漢和劉賢權都撤了。但我現在還認為，對青海“223”大屠殺事件，即使在今天，無論你對文革持什麼態度，也無論找出什麼理由，軍隊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打死這麼多人，都是嚴重的罪行，歷史是永遠不會寬恕其主犯趙永夫的。一些人文革後高唱保護人權，其實祇是要保護他們自己的人權，對平民百姓的生命與人權是不在他們保護之列的。

第二十二章 軍隊與文化大革命

1、軍隊的造反派

劉少奇、鄧小平雖然分別做過新四軍和“二野”的政委，但很少指揮戰鬥，在軍隊中根基不深。所以八屆十一中全會批判劉、鄧，軍隊是擁護的。那時部隊的主要領導，包括一些老師和將軍們都表現得非常積極，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也很好。中央文革要成立《快報》組，吳法憲從空軍調了一些優秀的幹部來給我們。那時，中央文革的汽車不多，有時我們外出辦事還得騎自行車。邱會作知道了，從總後勤部調了幾臺車給我們。還派了幾個部隊的優秀司機過來，其中有一個司機跟我說，我們首長指定我專門來為你開車的。這個司機的技術真好，有一次他送我去機場，途中他用嫻熟的技術避開了一場看來是根本無法避免的車禍。

可是從軍隊機關院校開展批判資反路綫開始，軍隊與中央文革的矛盾就開始尖銳起來了。軍隊內部的矛盾本來就是很複雜的。當時軍隊裡面有的領導搞特殊化的情況，比起地方來有過之無不及。由於部隊在管理上都是講服從命令聽指揮的，所以一些幹部的作風也十分霸道。這些情況從文革運動一開始就反映到中央文革來了。來反映情況的並不是底下的戰士和群眾，大多是來自部隊裡的同級的對立面。幾乎每一級領導都有自己的對立面，甚至幾個老師也有這樣的情況。這種情況又往往與軍隊裡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山頭主義”聯繫在一起，所以情況就更加錯綜複雜了。

按照“十六條”規定，部隊的文革運動在全軍文革小組統一

領導下進行，在軍以下單位不搞“四大”，以正面的學習和教育為主。連隊的戰士都是掌握著武器的，如果他們也起來“造反”，那就很容易變成“兵變”。但是軍事院校的學生提出來，他們也是在校的學生，所以也要參加到文革運動中來，要到北京見毛主席，要進行大串聯，要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後來得到了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批准。但是毛主席不同意他們成立紅衛兵組織，因為你本身就已經是兵了嘛。

部隊是有軍紀的，有些一開始就起來造反的軍校學生，因為違反了軍以下單位不搞“四大”的規定，而受到了“軍紀制裁”。他們認為這也是在執行“資反路線”。所以在1966年的10月，就發生了軍校學生包圍國防部的事件。本來這事是由全軍文革小組去處理的。可是劉志堅那時已被陳亞丁他們搞了很多材料，說他在總政執行了資反路線，所以受到了造反學生的反對。而謝鐘忠又過於老實，他去說話人家都不聽。這時葉群就來找江青，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講話，勸那些學生回去。於是江青就叫張春橋和我到國防部門前去見學生，我們一去講話，學生們倒是馬上就撤除了包圍，退走了。

實際上，部隊的造反派和地方的造反派是有很大區別的。地方的造反派反對的是劉少奇、鄧小平和執行劉、鄧資反路線的各級黨委的領導人；而部隊造反派反對的是他們的司令、政委，而這些人卻大都是反對劉、鄧，擁護毛主席的。像吳法憲、邱會作這些人都是毛主席和林彪非常信任的人。後來，出來保護這些首長的人就成立了“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被稱作“老三軍”，而部隊機關與院校批評與反對他們領導的造反派則被稱爲“新三軍”。按當時的認識，一般認爲“老三軍”是保守派組織，“新三軍”是造反派組織。按理說，毛主席支持群眾起來造反，我們中央文革應該是支持造反派組織的，但是實際的情況卻要複雜得多，對軍隊的事我一般都是不介入的。

空軍文工團有個女孩子叫劉素媛，因爲支持吳法憲，成了保守派。她挨了造反派的鬥，造反派還要把她排擠出文工團。她人長

得雖小，但很機靈，她以前來參加過中南海舉行的舞會，與毛主席也跳過舞。可能是主席跟她說過，如果了解到下面什麼情況，可以直接來跟他說的。大約在1967年4月，她通過主席的秘書徐業夫求見主席。說有很要緊的事向主席報告，主席叫徐業夫通知她來。劉素媛見了主席就哭哭啼啼的，把“造反派”怎麼整她，怎麼要打倒吳法憲等等情況，都和主席講了。還說，吳法憲現在的行動都得向“造反派”請示報告。我到主席這來，也要向他們請示才行。主席聽了說，吳法憲怎麼成了走資派了呢？他有錯誤、缺點，可以批判，甚至炮轟，但不能打倒。主席找來葉群，問她怎麼回事，怎麼現在三軍首長都受管制了？“造反派”怎麼就有這麼大權力？主席還讓葉群去了解，看看到底誰對誰錯，但主席說，不管誰對誰錯，都要讓部隊正常工作。吳法憲是司令，他有自己的權力，進出不需向“造反派”請示，有事祇能向我和林總請示。

吳法憲這個人，後來人家說他是“草包司令”，那是大錯了，這個人聰明透頂，大家都挺喜歡他。他是南方人，口齒清楚，他常會說一些笑話給江青聽，江青見了他就很高興。吳法憲在他的回憶錄上寫了他和江青鬧矛盾，那都是誇大其詞的，而討好江青的另一面他就没有寫。且有的地方則純是編造，那個時候他怎麼可能與江青公開鬧矛盾，討好江青都來不及呢。

毛主席這麼說了，老三軍這派就高興了。當然新三軍當時也還是有力量的，它的後面也有很多司令、政委在支持著的。1967年5月25日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發表25周年，部隊文藝單位在此之前要搞紀念演出。這就發生了兩派爭奪演出場地的問題，實際上還是爭奪軍隊文革運動的主導權問題。按照總理和中央文革的意思，“新三軍”，“老三軍”在這一天一同演出。但“新三軍”演出卻不要“老三軍”參加。於是“老三軍”就要單獨在北京展覽館演出。可當“老三軍”要演出的時候，“新三軍”就組織了人去衝擊他們。總理對他們說了，你們要團結起來，一起聯合演出，不一起演出，我就不去看。但“新三軍”還是不肯。這時葉群又來向江青求救了，江青讓我和關鋒去。臨走時，她還特別關

照我們，你們去了以後說話別一面倒，要強調團結、聯合，不能武鬥。告訴他們，再武鬥，全軍文革就要抓人了。於是我和關鋒先去看了“老三軍”的排演。“老三軍”的演出挺好，他們演唱的是肖華作詞的長征組歌。我一進入那個環境，就被感染了，覺得“老三軍”的演出很好，“新三軍”他們不讓他們演出是不對的。演出結束後，“老三軍”鼓掌要我們上去講話，關鋒不願意去講，他對我說，我一點都不了解情況，我陪你上去，你講吧，你還知道一點兒。其實關鋒以前就跟我說過，軍隊事情很複雜，你別去講話，咱們弄不懂，不要陷進去，陷進去就出不來了。現在他這麼一推，那就只好我講了。我的講話，完全是按照總理和江青的意思，要他們（新、老三軍）團結起來，都是革命同志，要團結起來，聯合演出。可是後來他們在小報上登出來了的，就光說戚本禹支持“老三軍”的演出，我後面那些要團結，要聯合演出的話都沒有了。

“新三軍”很倔，就是不同意聯合演出，而且放出話來，如果“老三軍”要單獨演出，那就去衝擊他們，讓他們演不成。肖華其實是支持軍隊造反派、支持“新三軍”的。他是總政主任，他對演出的事有發言權。可這樣一個局面出來以後，他就被夾在兩派中間不好辦了。他是希望“老三軍”取消演出的。可林彪知道以後，就叫葉群去給“老三軍”說，演出繼續，不要取消。肖華和林彪的關係很好，而且林彪又是副統帥。有林彪的支持，這樣“老三軍”就在5月13日按計劃演出了。結果“新三軍”就去衝擊演出。在演出的現場，雙方發生了武鬥，雙方都有人被打傷。而“老三軍”是早已做好被“新三軍”衝擊的準備的。這個事情一出來，軍隊內部兩派的矛盾就公開了、激化了。

總理在1967年5月14日表態批評了雙方，但“老三軍”對總理各打五十大板不滿。而這時林彪卻又公開支持“老三軍”。在5月23日正式演出的那天，林彪和葉群都去參加看了，還派了部隊去保衛。林彪這樣堅決地支持“老三軍”，江青也沒有辦法了，也不得不改變態度，和林彪保持一致，她要中央文革也跟著支持“老三軍”。6月9日“老三軍”又作了一次演出，中央很多領導人包括總

理都參加了，中央文革也去了不少人，我也去參加了，但江青有事沒有參加。這就是表示中央支持“老三軍”了。此後，“老三軍”不僅自己經常演出了，反過來排斥“新三軍”參加演出。從這以後“新三軍”的許多人就開始挨整了，其造反派組織也都被整垮了。自此，林彪穩定了北京的各總部機關，“老三軍”成了文革運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解放軍總後勤部下屬的部隊院校最多，所以那裡造反的學生也最集中。最早起來造反的是上海的第二軍醫大學的“紅色造反縱隊”，陶鑄的女兒也在裡面。記得有一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有人當面向陶鑄告狀，說你女兒如何如何。陶鑄祇是笑笑，說他沒有辦法。說，你們找曾志去，她聽曾志的。二軍大的“紅縱”率先衝擊並占領了總後的大院，要揪鬥邱會作。其實，毛主席和總理對邱會作的印象都是很好的。文革之初，主席寫的“五七指示”就是根據總後的報告寫的。邱會作確實很能幹，總理說他是最好的總後勤部部長，這話是不錯的。同時他又是林彪的一員幹將。可是他平時對待下級很嚴厲，作風比較粗暴。所以很多人都對他有意見。加上他和肖華兩個人在當時就是有名的“花將”，所以，文革運動一來，底下的群眾就起來揪鬥他了。造反派整了他很多材料。開始他躲到了西山的軍委駐地，徐向前擔任了全軍文革小組組長以後，就叫他下來見群眾。徐帥說，哪有解放軍的將軍怕群眾的道理啊。其實，徐帥這樣做是沒有錯的。問題是造反群眾一聽到邱會作平時如何霸道，怎樣搞女兵這些事情就憤怒起來了，把他打得很厲害。邱會作寫了個字條給林彪，要林彪救他。林彪讓葉群拿了邱會作寫的字條來找江青。葉群來的時候，我也在邊上。葉群說，邱會作是個很好的同志，可就一點不好，是個“花花太歲”。江青馬上讓陳伯達寫了個手令給葉群，葉群拿著陳伯達寫的手令去把邱會作救出來了。可後來邱會作卻把所有的仇恨都放在了中央文革和江青的身上了。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央文革就是造反派的總司令部，那些打他的人都是受了江青的指使的。其實哪有這事。老實說，那時對於軍隊文革的事，我們都是躲都躲不及的。我在八屆十一中全

會上的發言受到主席批評之後，對於軍隊的事情，一直都是很謹慎的，從來也不願意多說話。文革以後，葉劍英、鄧小平他們又誣陷說，那是江青同林彪的勾結，要搞亂和搞垮軍隊。要我說，江青如果真有這份心和這個本事，那文革的發展和結局也就不會是後來那樣的了。

其實，當時部隊的情況很複雜，絕不是一個支持造反派還是支持保守派就可以說清楚的。實際上，這兩派的背後都是有一些大人物在那裡較勁的。肖華原來是支持造反派的，後來看了林彪的態度，又去支持保守派了。所以弄得兩派對他的意見都很大。到了後來，就連葉群也大罵起肖華來了。主席只好出來說，他要親自保肖華過關。聶榮臻爲了讓肖華躲避群眾對他的批鬥，把肖華接到自己的家裡。可是肖華卻把聶帥家裡的女服務員給奸污了，氣得聶帥把他的行李扔出了門外。這件事是聶帥自己在一次會議上說出來的。所以，主席說，肖華實在是扶不起的天子——劉阿斗。不過，當有一次葉群來說，在批鬥肖華的時候，群眾讓肖華在地上爬。而肖華怕挨打，就真的在地上爬了。毛主席知道這事以後，異常震怒。主席說，你有錯，改正就是了。怎麼能在地上爬呢？打死也不能爬呀！你以後還怎麼指揮軍隊啊？爲此，主席親自下令，今後不準任何人讓將軍在地上爬。誰這樣做，就是武鬥，要處置。

2、我在文革運動中與老師們的接觸

那個時候，林彪在我的心目中是個了不起的英雄。不但過去仗打得好，而且在建國以後，我聽過他的幾次講話，都是在歷史發展關鍵時刻至關重要的話。你看他平時好像不管事，可是他要出手來管事時，往往都是驚天動地的。

1966年5月18日，他在政治局會議上所做的報告，是我幫助整理的。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在他的回憶錄裡寫道，林彪看了以後感到很滿意。他跟張雲生說，以後他們那裡寫的重要的東西，要拿去給

戚本禹看看。葉群也多次跟我說，林總很賞識你的才能，讓你有時間去家裡坐坐。可是我接受了田家英犯錯誤的教訓，不能去。有一次，我問主席，葉群好幾次邀請我去他家裡做客，我不想去，但又怕他誤會。這時主席正在看東西，他一邊看，一邊對我說，我們不去，我們不去。所以，我就一次也沒有去過毛家灣。爲此，葉群還對我很有意見。

林彪在報紙上發表過兩幅題詞，上報之後，我就把原件還給葉群。可葉群說，林總特別交代，原件就留給戚本禹。因爲我專門研究過中央各首長的書法、筆迹（工作需要），所以能夠分辨首長的批件。有一次，葉群拿了一份林彪批過的文件讓我組織傳閱，我一看就說，這字不是林總寫的。葉群說，你真厲害。那字確實是林總的秘書代寫的，但是經過林總同意的。“九一三事件”後，我看到在中央文件裡，影印出來的他給林立果的那個手令，那上面的字既不是林彪寫的，也不是林彪的那個秘書寫的。可能是林立果他們模仿著林彪的筆迹寫的。

1967年的夏天，北京的天氣特別熱。在主席還沒有去武漢之前，住在人民大會堂裡。有一天，葉群來找我和王力、關鋒，說林總想見見你們。隨後她就帶著我們一起去了林彪在大會堂的辦公室。林彪見了我們很高興，他說，要把文革搞好，要盡量減少負面的東西，不能武鬥，尤其是不能動用槍枝來武鬥。他說，你們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黨內、軍內反對文革的人很多，很多。你們將來可能會遇到的困難很大、很大。你們一定要充分地估計到這一點。現在主席健在，我們是靠著大樹好乘涼。主席不在了，我們的困難就來了，那時祇能靠我們自己了，誰也幫不了我們。我們要有備，才能無患。他向我們問了一些情況，叫我們經常到他那裡去。對這次談話，關鋒還專門有個追記。林彪這次談話，我向江青匯報過，江青說，林總說得對呀！江青後來又向主席匯報，據說主席回答，還是林彪能想問題。所以“九一三事件”後，人們說林彪參與了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我總是不敢相信。那個“五七一工程”紀要，分明是小孩子玩家家的拙劣產品，而林彪是個能想問

題，懂得戰略戰術，而且曾指揮過千軍萬馬的軍事統帥，這樣拙劣的軍事計劃，能是一位傑出軍事統帥的作品？

葉群還告訴過我們，林彪對怎樣把中國的事情搞好，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她說，林彪不主張很快地走向共產主義。他認為，這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他主張首先把小農經濟搞成大農經濟。他說，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定會實現的，但那是一種全新的東西，它的真實面貌究竟怎樣，我們現在是想象不到的。葉群說，林彪想得很深。

不過，我那時也發現，林彪的“山頭主義”其實挺厲害。部隊裡其他的人受到衝擊，他很少管。但是，誰要搞到他“四野”的人，他就不答應。

我覺得，在所有的老師中，徐向前是最理解和最支持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本來在我們的眼裡，覺得他是跟著張國燾犯錯誤的人。可是在討論“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會議上，徐向前有個發言。他說，毛主席決定搞文化大革命，意義很重大。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就怕在中央出修正主義，像蘇聯那樣就麻煩了。他還說，他看了小將們寫的文章，覺得寫得非常好。現在是我們這些人向小將們學習的時候了。他又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依靠這些小將，不能光靠老人。老同志關係複雜，歷史包袱很重。所以要多依靠年輕人。我聽了他的發言，覺得很驚奇。沒想到一個平時與外界很少接觸的老師，對文革認識得那麼深。我向江青作了匯報。江青也覺得很意外。

後來，在劉志堅被打倒之後，是毛主席親自提名，讓徐向前擔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我後來總覺得主席的這個決定其實是很有深意的。但可惜我們在當時並沒有很好的認識到這一點，也沒很好支持徐帥。徐向前在“二月逆流”的時候，對中央文革小組也有意見。但是他的意見主要是埋怨中央文革對全軍文革的工作支持不夠。與陳毅、葉劍英他們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態度是不同的。“二月逆流”以後，徐向前向主席要求辭去了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職務。主席沒批准。但這之前主席卻又把他列入陳毅、譚震林、葉劍

英一伙，讓他們一起挨批判，徐向前也不申辯，欣然接受。唉！陰陽之道，玄妙之極。

我和聶榮臻的接觸不多，但我總感覺到主席對他有些看法。是什麼原因我不知道。祇聽葉子龍說，1946年主席叫聶帥集中兵力，依險布局，狠狠打擊傅作義，但他沒執行主席意圖，竟然打了敗仗。又聽說1948年5月國民黨的飛機轟炸阜平城南莊主席駐地，後來查明，那個在地面上給國民黨飛機指引目標的廚師，是聶榮臻夫人的親戚。江青跟我談起這事的時候，還是非常憤怒，說那個女人（指聶榮臻夫人）差點害了主席。

我和賀龍的接觸也不多，但他兩把菜刀起義、開辟革命根據地的事，使我很崇拜他。我記得一次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看到我跟我說，有人想用制造車禍的方法來暗害我和關鋒。他叫我們要小心，我和關鋒都很感激他。後來有一次主席要接見他，葉群過來說，賀龍身上一直是帶著手槍的，要主席注意安全。所以賀龍來的時候，警衛戰士很有禮貌的跟賀龍說，現在有規定，請他把隨身攜帶的手槍拿出來交給他們代為保管，等離開的時候再還給他。賀龍就笑嘻嘻地把手槍交給了警衛戰士，我覺得他很尊重主席。以後又聽林彪說他是大土匪、江洋大盜出身，對他印象不好起來。再以後又聽說他曾與國民黨談判投降的事，但這件事總理都向主席否定了。但那時我已把他看成是劉、鄧司令部的人。

對葉劍英，在青海“三二二事件”之前，我在中央的碰頭會上經常遇到葉劍英的。他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我一直覺得奇怪。開始的時候，他是很起勁的。羅瑞卿下去後，他接替擔任了中央軍委秘書長，還擔任了“首都工作組”的負責人。在批“彭、羅、陸、楊”和打倒“劉、鄧”的時候，他都表現得很積極。但是他對中央文革小組卻一直都是很對立的。後來我聽到朱成昭跟別人說，葉劍英曾對他說，我們不怕亂，也不怕群眾運動，就怕沒有對運動的領導權。林彪事件以後，葉劍英一直把自己說成是反對林彪的。其實，他那個時候是想盡辦法去靠攏林彪的。祇是林彪對他很戒備。

3、我在文革運動中與粟裕、謝富治、許世友、 韓先楚、楊成武、吳法憲的交往

在對軍隊的元帥、大將中，除了林彪，我最崇拜的是粟裕。文革前，我曾冶制一枚“粟帥帳下馬前卒”的印章，以表示我對他的崇敬。上海解放前，我曾幫助方伯康、戴覺民同志投軍粟裕的部隊，又在地下黨領導下，參加軍情調查，調查材料由地下黨轉送三野粟裕的司令部。後來主席叫粟裕出席中央碰頭會，他每次來我都親自為他安排座位、倒茶，但是總理老叫他去處理軍校各種糾紛，不大通知他出席中央碰頭會。

謝富治和我在工作上經常有聯繫。我第一次在工作上和他的接觸，是為了解理田家英的事情，總理讓我去找他的。我去公安部和他談完工作以後，他就邀請我去他家裡吃飯。我到了他的家裡一看，不由得感慨起來了，這麼一個有著赫赫戰功的老將軍，家裡的擺設卻比我還簡陋，簡直可以說是家徒四壁。他嘴裡說我是貴客，要好好招待我，可端上來飯菜都是和平常老百姓家裡的沒什麼兩樣的，祇不過多加了幾個菜，比起彭真等人的家宴，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我從心底裡就對他產生了深深的敬意。

謝富治長期擔任公安部長，是掌握刀把子的。但他是最不願意搞冤案的，經常把一些疑難問題擺出來，讓我幫助分析。有一次他和我談起清朝的名臣于化龍，于化龍漏夜批文，覺得手中之筆有千鈞之重。紅筆一點，身首分離，人命關天啊！謝富治說，他的筆點下去，那要比于化龍更重得多了，不知要關係到多少人的命運了。所以，他總是戰戰兢兢的，不敢有絲毫馬虎。謝富治是個少有的好官，他自己主觀上沒有去搞過一個冤案。相比來說，羅瑞卿要比他主觀一些，羅瑞卿和公安部的許多副部長的關係都比較僵。當然即

使是謝富治，也不能百分之百地避免冤案，因為有些事情是中央決定要做的，那他沒有辦法，祇有執行。康生也曾經向我們坦言，說他也辦過冤案的，把一些忠誠的黨員給處決了，後來發現搞錯了。祇好給家屬優厚的撫恤來彌補。那都是處在戰爭惡劣條件下發生的事情。

有一次，我在天安門城樓上遇到了許世友，他見到我就叫我“戚大帥”。我聽了忙跟他說，不能這樣叫。我跟他聊起了解放戰爭的時候“三野”的東兵團和西兵團的事。他說，喔，這你也知道啊。我說，我那時是上海的地下黨的一個小黨員，我們天天都在關心前線發生的事情。你還是我家鄉的解放者呢！他問我是哪裡人，我說，是威海。他聽了非常高興，說他去過威海，那裡出了很多英雄。

後來他被造反派衝擊的時候，他叫他的夫人田普到北京要來找我。田普說，許世友叫他來找江青，說如果見不到江青就找我，別人誰也不找。我知道以後，就去請示主席。我說，田普來了，說要見我。主席說，你先叫人給她打個電話，問問她什麼事再說。於是，我叫讓秘書給她打了電話，我的秘書跟她說，本禹同志現在在開會，很忙，有什麼事情就請她在電話裡說，他負責轉告。於是，田普就在電話裡說，現在有許多人要搞許世友，搞他的並不是底下的群眾造反派。而是某副政委、某副司令要搞他的。我把秘書給我講的都匯報給了主席。主席後來去上海的時候，就要召見許世友。可那時許世友躲在大別山。主席特意派張春橋去請他來上海。可開始的時候，許世友還不相信，生怕張春橋是騙他下山。後來張春橋告訴我，他是用了自己留下來給他當人質作保證，才使他相信的。我說，你是中央文革的副組長，你這樣說多掉架呢。張春橋說，“我當然說的很婉轉的。他說他這裡的事情很多，跑不開。我就說，那這樣，我留在這裡給你處理事情。重要的事情隨時打電話與你商量，你單獨去見主席。我這麼一說，他才相信了。於是就跟我一起下了山。後來他見了主席，主席保了他。他很高興，還說要打個豹子送給我。”主席讓張春橋兼任南京軍區第一政委。許世友是

非常高興的。主席派自己身邊最相信的人給他當政委，這樣還有誰能反對他呢。

福建軍區司令韓先楚來北京解決福建問題。江青叫我去京西賓館看看他，聽他說些什麼。我到京西賓館的時候，他們已經知道我要去了，好幾個人，都是將軍，在那裡歡迎我。那些人都是聰明得不得了的。你說一句話，他能聽懂你十句。我向他們說，領導叫我看大家，問問大家有什麼要解決的問題。他們馬上說，“感謝江青同志關照。”既不提陳伯達，也不提總理，你說怪不怪！可你要是光聽他們說，那可都是造反派的錯，他們都是受委屈的。其實我也了解很多情況，知道他們是怎麼對待被他們視為異己的造反派的。

楊成武在文革中是與文革小組聯繫很密切的軍隊幹部，所以他和我的交往也特別多。那時我對他的印象一直都很好，他是老革命，但碰到我總是特別客氣。他是代總長，權力非常大，軍隊的調動都是通過他下達的。一次他跟我說到葉劍英，他說，葉沒打過仗，一直都是做參謀和情報工作，所以他在部隊中沒有幾個人聽他的。部隊的人平時見面都客客氣氣的，可節骨眼上還是聽自己老首長的。

楊成武的那篇《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的文章，是他讓部隊的幾個秀才寫的，陳伯達幫他修改過。楊成武對發表這篇文章表現得非常急切，他來找過我好幾次。後來這篇文章發表之後，他很高興。

“二月逆流”以後，吳法憲常來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開始他和楊成武的關係還挺好。可後來不知是什麼原因，他和楊成武有些不和。我看到軍隊有個材料反映他作風驕傲，曾告訴過他注意。他說是空軍的人串連的結果。我不願深入下去，點到為止。記得在1967年10月以後有一段時間，楊成武因為生病，好長時間沒來參加文革碰頭會。有一次，吳法憲到中央文革辦公室找我，要我和他一起到楊成武家裡去探望他。我是想去看看他，因為上次王、關問題時，他在主席面前替我說過好話。可我的職務又限制了我不會隨便

去軍隊看望任何人。吳法憲卻一定要拖住我去，硬把我拉上他的汽車，讓我的車跟在後面，我也就去了。到了楊府通報了秘書，楊成武聽說我去看他，就很熱情地叫人出來迎接我。可能他以為是江青讓我去看他的了。其實江青根本没說要我去看他。可他一聽說吳法憲同我一起去的，就有點不高興。他教他的夫人陪我到他家樓上臥室去看望他，而讓吳法憲和會客室的一堆看望他的人坐在一起。這些人太多，是原華北軍區的高級將領。這一下，我明白了吳法憲為什麼一定要拖我去的用意了。如果他一個人去的話，楊成武有可能給他吃閉門羹。

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軍隊高層之間，盡管表面上顯得很親熱，但實際上有些人互相間的分歧很大。甚至一個山頭之間也是如此。楊成武原來亦屬一方面軍，是林彪很信任的幹將，但後來竟與林彪的另一幹將吳法憲弄得不可開交，吳法憲說，楊成武要奪他的空軍司令的大權，其實代總長的地位遠比空司要大，說楊成武要奪空司的權應沒有事實根據。而後來楊、餘、傅事件暴露的事實表明，吳法憲這一邊，包括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人倒是在想奪取楊成武的代總長的大權。

第二十三章 《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

一文的發表前後

1、關於電影《清宮秘史》的一段舊事

電影《清宮秘史》是1948年由香港的一家電影公司攝制的，主要講述了清朝末年光緒皇帝、珍妃與西太后在戊戌變法期間宮廷內的爭鬥。電影對支持維新變法的光緒皇帝給予了肯定，對慈禧則採取了揭露否定的態度。在影片中通過珍妃之口，說出了要光緒依靠洋人、奪取慈禧的權力。同時影片又對義和團運動充滿了仇視，有許多誣蔑與不實的描述。影片完成後，先在香港上演。1950年3月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

這個電影在北京一上映，我就看了，那時我很年輕，看不出影片的賣國主義錯誤，祇是覺得它把光緒皇帝演成人民救星，極力美化。而其實光緒在歷史上沒有做出很大的貢獻，不值得那麼美化。而且有一點我也看不大慣，就是影片醜化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義和團。我老家山東是義和團的發源地之一，我自小就在姥姥家的圪嶗村聽老人們講，義和拳都是反抗洋鬼子欺侮中國人的好人，可是在影片中他們都被描繪成迷信、無知、醜陋、可笑的群氓。這些都是在我不知道主席講話之前的感覺。聽到主席評論，開始也是不懂，後來還是胡喬木的秘書商愷給我解釋了一番，我才明白珍妃叫光緒依靠帝國主義勢力，通過與洋人的內應外合，把權力從慈禧手中奪取過來。這是一種賣國主義行爲。

然而，在開始的時候，我並不知道主席和劉少奇在對影片《清宮秘史》的評價上發生分歧的經過。最初主席說《清宮秘史》是賣國主義，不是公開講的，是聽了胡喬木說“少奇同志說《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話以後給胡喬木說的，主席也跟江青說過。那時主席的幾個秘書，包括陳伯達和田家英，都知道主席不贊成這個電影。我首先是從田家英那裡知道這些情況的。

那時候，我在幫田家英做《毛澤東選集》的校對工作。一次，學部有一個人打電話給田家英。過後田家英對我說，這個人叫黎澍，是學部近代歷史所的負責人。有一篇批判影片《清宮秘史》的文章，是密斯（田家英私底下對江青的稱呼）叫黎澍他們找人寫的。黎澍布置了歷史所一個叫榮孟源的專家去寫了，可黎澍說文章寫的不行。江青說那你們就給改好吧。黎澍又看了文章感到難改，所以打電話來問田家英怎麼辦？田家英對他說，那你就先印出來給江青看看再說吧！我看田家英對這事也不大積極，因為這不是他份內的工作，他自己手上的事就很多了。

黎澍後來也向我說過，當時批判《清宮秘史》是江青布置的。我分析，這事不大可能是江青直接向他布置的。江青當時是電影局的處長，她若去布置，是要經過中宣部的。所以她或者是通過胡喬木去布置的，胡喬木是中宣部的常務副部長；或者就是經過中宣部，由電影局布置下去的。

我再一次聽說這個事，那是在批判影片《武訓傳》之後了。1951年，《武訓傳》剛開始放映的時候，黨史專家繆楚黃剛拿到了一筆稿費，請我和逢先知去看了《武訓傳》。那還是在《武訓傳》被批判之前。看完以後，在回機關路上三個人議論了一下，我說把一個乞丐搞成個英雄，叫人看了很不舒服！我不大喜歡這個影片。繆楚黃說，你這個人有點吹毛求疵呀。三個人在路上爭論了一番，逢先知是支持繆楚黃的。不久，主席說要批《武訓傳》，繆楚黃對我說，哎呦，還是你有先見之明，讓你說對了。就是這次，繆楚黃把他從歷史所聽說的，主席除了要批《武訓傳》，還要批《清宮秘史》的指示告訴了我。他說這事比批《武訓傳》還大呢！可是，

《清宮秘史》一直沒批判起來。

那時候，繆楚黃在做《毛澤東選集》的注釋工作。《毛澤東選集》中的注釋相當一部分是繆楚黃起草的，有些經陳伯達修改過，有些是胡喬木、田家英修改過。還有些是各方面專家寫的，如歷史部分，大多是范文瀾寫的。有人說都是田家英起草的，田家英當時就糾正了這種誤傳，他說那不是事實，他祇寫了一小部分。

1954年，主席在支持“小人物”李希凡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胡適唯心主義思想時，又一次提出了批判《清宮秘史》的問題。主席寫道：“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

這以後，主席又一次說過：“《清宮秘史》五年來沒有批評，如果再不批評，欠債越來越多了。”但這部影片仍然遲遲沒有受到批評。

1965年11月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同年12月21日主席在杭州同陳伯達、田家英、胡繩、關鋒、艾思奇他們談歷史和哲學問題時，再一次提出批判《清宮秘史》，說：

“《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

從這時候，我才弄清楚了關於批判影片《清宮秘史》是毛主席和劉少奇之間的一個重要分歧，主席要批的就是黨內有一些人，總是存在著要依靠外國勢力，依靠帝國主義的支持，實現他們的政治目標的思想傾向。

上面說過，胡喬木的秘書商愷，一位老新聞記者，他一直跟我很好。因為事情牽扯到胡喬木，我就去問商愷。他告訴了我事情的原委：當年主席看過《清宮秘史》後，曾問胡喬木，你看了沒有？胡喬木說看了，那時他也不知道主席是什麼意思，就跟主席說，少奇同志也看了，說是愛國主義的。主席當時就說，什麼愛國主義，是賣國主義！後來，主席叫批判這部電影。胡喬木就覺得不好辦了。兩個都是黨的高層領導，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批判當然可以不點名，但是，要批副主席的觀點，這怎麼向別人交待？別人會

說我在破壞黨中央的團結！

胡喬木當時是中央宣傳部的常務副部長，負責審讀《人民日報》。他顧慮主席和副主席的團結關係，就悄悄把這事拖了下去，沒有批判，他也有他的道理。但是另一方面，胡喬木跟劉少奇的關係的確比較好，在“一二·九運動”的時候，他就和劉少奇認識，劉少奇是他的領導。後來他在延安參加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時候，就把劉少奇列為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當然這也是主席同意的）。所以胡喬木不願意批判《清宮秘史》，也與他和劉少奇有這麼一段特別的感情有關係。

主席說《清宮秘史》是賣國主義，他特別對影片中珍妃說的幾句話感到反感。珍妃對光緒說：“現在外國人都支持你這個皇帝，反對她（慈禧太后），你不要跟著她走，外國人打進北京來，會讓你來收拾這個攤子，外國人支持你，他們可以幫你吧權力奪回來。”毛主席認為這個不行，不管我們中國人內部有什麼糾紛，都不能依靠外國人。毛主席的愛國主義思想是非常強烈的。

1966年9月18至20日（那時還沒有公開批劉、鄧的資反路線），中央文革在北沙灘紅樓開了個準備批判劉、鄧路線的調查座談會。會後我們討論時，就把批判賣國主義也提到了日程上。

2、文章的寫作經過

1966年12月26日，主席在他的生日家宴上，要我們搞大批判，叫我們文革小組的人都要寫文章。主席對我說，你也要寫。那時我就已經在考慮對影片《清宮秘史》的批判，而且從電影資料館調來《清宮秘史》的拷貝，看了兩遍。我就向主席說，我已在準備批判影片《清宮秘史》，想把這部影片究竟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問題講清楚。我說，主席講了那麼多年，講了那麼多次，可至今仍沒有一篇文章，把主席的思想系統地講清楚。毛主席聽了說好，很支持。我又說我對義和團這一段歷史不是很熟悉。主席說，你先

寫，寫了之後就拿來給我，我給你看。

姚文元在1967年1月寫了《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他那個文章有一段提到《清宮秘史》的問題，但我覺得他仍然沒把“究竟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個問題講明白。要批判《清宮秘史》，得講出個道理。要把問題的實質講明白，這就要研究這個東西。

那時候，我跟穆欣打電話，說我想寫《清宮秘史》的文章，但記不住電影中的對白，要他幫我找《清宮秘史》的電影劇本。穆欣說，這好辦，我馬上給你搞來。不到兩天的功夫，他就從電影館資料室弄來了電影劇本，叫司機給我送了過來。電影劇本弄來以後，我說，這是人家檔案，別丟了，還得還給人家的。那時候還沒有復印機，我就叫他找人先把劇本排版，並讓他們多印幾份，不要光我一個人看，送給中央文革的成員都看看。穆欣很願意承擔這項任務，後來他在《光明日報》上獨家全文發表了那個劇本。

拿到劇本以後，我翻來覆去地看，越看越清楚，主席說的沒錯呀，這影片確實是賣國主義，電影借珍妃之口，要光緒依靠外國人來推翻慈禧太后，把政權奪過來。主席說過，盡管慈禧是個很反動的人，但是在民族立場上，她比光緒要好。這麼多年，主席說了多次《清宮秘史》是賣國主義的，我和許多人一樣，都不清楚究竟是怎麼回事，看了劇本，我明白了。

劇本所寫的依靠外國人推翻慈禧太后的思想，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一個思潮。主席很敏銳，說這樣做就會變成徹底的賣國主義。另外，劇本把義和團那麼一個大規模反對帝國主義的群眾鬥爭，醜化成一批流氓土匪、江湖術士的迷信活動，這也是非常錯誤的。義和團的戰士大部分是勇敢反抗帝國主義的先鋒。

我又翻看了大量的有關戊戌變法和義和團的歷史資料，在這個基礎上，並在我的秘書程理嘉等人的幫助下，用了兩、三個月的功夫，寫成了《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

3、毛主席對文章的修改和批示

1967年3月20號那天，我把寫好的稿子送給了主席。因為是主席讓我寫了以後就交給他看的，主席看了、改過之後，又直接退給了我。爲了這事陳伯達還批評過我，說我怎麼沒有經過文革小組討論就直接交給主席了。總理和王力、關鋒也都對我有意見。

主席對我寫的內容是比較滿意的，說我寫得很好，但裡邊有錯，有一個大臣的名字寫錯了。我查了一下，《清宮秘史》的劇本上沒寫錯，是我寫錯了。主席還在好幾個地方補寫了大段的話，例如，駁斥說義和團是暴民的胡作非爲；表揚愛國女青年“紅燈照”等，都是主席加上去的。主席還針對影片所說義和團是迷信，是暴民，暴亂，駁道：“究竟是中國人民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污吏？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主席的這段話寫得太好了，打中要害了。主席真是大手筆，幾句話就把義和團反帝這個複雜的事情講清楚了，把文章的氣勢提起來了。

文革結束後，有人寫文章來批判我的這篇文章，可寫了那麼多文章也寫不出什麼名堂來。你既然說我是大毒草，那你好好批呀。可是主席的那些觀點，你能批得倒嗎？

然後主席就叫我把改過的稿子拿到文革小組去討論。小組的人看了主席的批改件，提了一些意見。然後我抓緊時間重新修改，印出來後，我又拿去交給主席看。主席又看了一遍，然後交代說，戚本禹這篇文章可用，請總理主持文革小組討論修改後正式發表。

在主席指示後的第二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組就開會討論修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篇文章，小組全體成員都參加了，會

議由總理主持。在會上先把文章一段一段地讀出來，讀一段討論一段。開始我讀，讀累了，王力接著讀，王力口齒清楚，讀得鏗鏘有力。以前討論文章，一般都是由王力把大家的意見記錄下來然後作修改的，但這篇文章是總理邊主持會議，邊親自在稿紙上記錄下，一個字，乃至一個標點用得合適不合適，都要斟酌討論。第三天上午才把討論後修改過的稿子再拿去改版印刷。當天下午再拿回來進行討論和修改。前後討論了幾次，有一次下午從兩點多鐘，陳伯達、江青就來了，一直改到吃晚飯。

最後定稿以後，先呈送主席。主席交代，先交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進行廣播，然後一式幾份，交給《紅旗》雜誌、《人民日報》、新華社。這時王力問總理，這篇文章如何署名，是用《紅旗》雜誌，還是《人民日報》或《解放軍報》評論員，還是同時用幾家名義。總理說，這篇文章是第一篇不點名地批判劉少奇的文章，還是以個人署名為好，就用戚本禹的名義。

我覺得這個事太大了！這是第一次公開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且文章形成的過程又不同尋常，我覺得以我個人的名義發稿不大合適。所以我說，這個文章涉及的問題很大，而且經主席和大家集體討論修改的，是不是還是用社論或評論員的名義。可總理講，正因為這篇文章會引起全國以及全世界的注意，按照國際上通常的做法，社論或評論員文章是代表官方的，而個人署名文章，再怎麼說，也是個人文章，這是有區別的。把劉少奇的問題突然一下子作為官方文件提出來不好。還是作為個人的文章為好。總理說出這麼一番道理以後，陳伯達、江青都沒說話，康生點頭稱是。這樣就決定了文章以戚本禹個人署名發表。到關鋒起草的批劉少奇“黑修養”那篇文章發表的時候，就用“《紅旗》雜誌評論員”的名義了。

總理又親自安排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著名的播音員夏青、葛蘭來朗讀。在制作廣播的過程中，新華社的負責人曾向我提出，有些句子太長，朗讀的時候讀不出氣勢來，要我改短一點。

3月31號，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廣播了《愛國主義還是賣國

主義？》。第二天，在《人民日報》的頭版上全文發表了這篇文章，新華社也發了通稿，全國各大報紙也都刊登了。

5月間，毛主席在與外賓的談話中，把這篇文章的發表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發展到了一個重要階段的標志。他說：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政策策略上講，大致可分四個階段：從姚文元文章發表到八屆十一中全會，這可以算第一個階段，主要是發動階段。八屆十一中全會到一月風暴，這可以算第二階段，主要是扭轉方向階段。自一月風暴奪權到大聯合、三結合，這可以算第三階段。自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及《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發表後，這可以算第四階段。第三、第四階段，都是奪權問題。第四階段是在思想上奪修正主義的權，奪資產階級的權，所以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是決戰的關鍵階段，是主題，是正題。”

4、文章發表之後所引起的反響

從4月2號開始，各地群眾就開始上街游行示威，表示他們對走資派的憤慨，一連游行了好幾天，而且規模越來越大，這些都是群眾自發組織的，中央文革小組沒有進行任何布署。到1968年初要隔離審查我的時候，據陳伯達等人的回憶，康生還提出，是不是再考慮一下，戚本禹那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文章影響是很大的。

多年後，我碰到朱永嘉的時候，他對我說，你的文章出來了，我們有點被動。我問，被動什麼？他說，張春橋拿了你的文章放在我們面前，說，你們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嗎？所以那以後，朱永嘉他們就拼命寫批判文章，一下子寫了三篇東西。主席看了之後說，你們不要光搞數量，質量要搞好。數量多了，人家消化不了，你一篇東西寫好了，人家消化了，那比幾篇都好。

主席曾與江青說，他提出批《清宮秘史》那麼多年來，沒有一個人寫出文章來，現在戚本禹寫出來了，所以要鼓勵他一下。江青本來提出要送我一架她用過的蔡斯照相機。我說我不會用。江青說，那你要什麼？我說我很喜歡主席寫的字，哪怕就幾個字都好。江青和主席一說，主席就把他過去寫的一幅《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送給了我，而且江青叫汪東興當著中央文革小組所有的人的面送給我的。主席的詞寫在信箋上，一張紙寫不了幾個字，所以形成了厚厚的一大摞。那天晚上，我回來以後，沒喝酒，卻覺得像喝了酒似的，捧著毛主席的手書，翻來覆去地看，一個字一個字看。從1967年4月，到1968年1月，我看了不知道幾次了。每次看完，都是再把它鎖在小保險櫃裡。我曾請郭老（郭沫若）把他的詞也寫了一幅字給我。我把它們放在了一起。等我一被抓起來，我那個小保險櫃就被他們抄了。那個小保險櫃裡東西很多。有毛主席給我的信件，例如主席對貴州省李再含的來信的批示、主席對青海事件的批示、主席在我的檢討上的批示等等。那些批示，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裡面收入了幾篇，但有的沒有登。

在“審判”江青的時候，鄧小平他們派人到秦城監獄來審問我，來的人跟我說，你那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文章，是在全國掀起了反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浪潮的。這件事是你的責任，你不能講毛主席，也不能講周總理。我說這行，反正講不講都一樣。他們又說我那篇文章引用的劉少奇的天津講話是假的，是誣陷劉少奇，說劉少奇是中央的領導人，怎麼可能說那種話呢？在這一點上我給了他們堅決的反駁，我說，我在文章中所引用的材料，都是從天津檔案館保存的檔案裡抄來的材料，這能造假嗎？如果你們能證明這些檔案是假的，你們再來找我吧！他們又與我談了要照顧大局的話，我說，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才是中國的大局。後來資本主義已經在中國大地很多領域裡復辟了，他們的御用理論家又說，劉少奇的天津講話是真的了，而且是“發展”了馬列主義。

5、胡喬木和譚震林等人的揭發證明

《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發表後，劉少奇也看了。聽說劉少奇看了文章之後氣壞了，血壓升高，睡不著覺，極力喊冤，說戚本禹的文章“有很多假話，我什麼時候說過那個電影是愛國主義的，什麼時候說過紅色買辦？”為此胡喬木專門給中央寫了個材料，他說他記得清清楚楚的，劉少奇當時確實說過《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祇是當時他對批判劉少奇有顧慮，所以沒有貫徹主席指示，對此他向毛主席作出了檢討。胡喬木寫的這個材料，我親眼看過。

至於劉少奇在抗日戰爭勝利後說過“我們也可以給美國人做紅色買辦”的話，劉少奇也不承認，王光美也說沒有。他們不僅不承認，而且說他們都很反感這個話。這時，譚震林站出來了。譚震林剛因為“二月逆流”事件挨了主席批評，在靠邊檢查。這時他就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說這個事他可以證明，當時劉少奇和他都是新四軍的領導人，劉少奇是政委。劉少奇給他們說的就是，我們將來也可以做美國人的紅色買辦嘛。譚震林寫的這個材料，字寫得很大，我也看過。毛主席看了譚震林的揭發材料以後說，譚老板還是革命的！你們老批他幹什麼！他是愛國主義的。他可以參加文革小組了。

這事我們當時也問過陳毅，陳毅說，他也聽到劉少奇這樣說過，好像是主席重慶談判回來以後，討論與美國的關係的時候，劉少奇這樣說過。陳毅說這話時，總理在場。

1994年，我見到復旦大學一些教授，談起這段往事。幾個青年教授聽了哈哈大笑，說你們當年還為紅色買辦爭論過呀？現在滿大街有多少紅色買辦啊，好多大人物都在替美國人當紅色買辦賺錢呢！

附錄：

《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

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

——毛主席：《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一封信》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朝霞照亮了東方的大地，災難深重的祖國像巨人一樣地站起來了。

中國人民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經過無數次的艱苦鬥爭，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獲得了全國的解放。

人民大革命的暴風驟雨洗滌著中國大地上的污垢，但是，反動統治階級並不甘心死亡，他們在各個領域裡繼續進行著瘋狂的大反撲，階級鬥爭非常尖銳。文化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尤其複雜，充斥於文化陣地上的反動影片、戲劇、歌曲、書刊，是配合反動統治階級向革命人民進行大反撲的重要宣傳工具。一九五〇年還在北京、上海和全國其他城市大量放映的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便是最突出的一例。

勝利了的中國人民在這種反動文化的大反撲面前，究竟採取什麼態度？是進行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還是同大肆泛濫的反動文化妥協投降？每一個革命同志都面臨著新的抉擇和考驗。

圍繞著《清宮秘史》這部反動影片，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派，展開了一場嚴重的鬥爭。這是解放了的中國，在文化思想戰線上的第一次重大的鬥爭。

毛主席嚴正指出：《清宮秘史》是一部賣國主義的影片，應該進行批判。他還說過：《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但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陸定一、周揚和當時的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胡××等，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卻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公然對抗毛主席的指示，說這部反動影片是“愛國主

義”的，拒絕對這部影片進行批判。

當時，擔任文化部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的江青同志，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幾次在會議上提出要堅決批判《清宮秘史》。但是，陸定一、周揚、胡××等人卻大唱對臺戲，他們極力宣揚這部反動影片的什麼“愛國進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他們卻抬出了他們的後臺老板、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黑話，說：“某某同志認為這部影片是愛國主義的。”江青同志堅持真理、力排眾議，義正詞嚴地駁斥了他們這種反動的、荒謬的主張，堅持要批判這部影片。他們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事地指定一個思想反動的歷史工作者，寫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這樣的文章，他們還嫌“太激烈了”，扣住不發。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在文化思想戰線上一場重大的鬥爭，就這樣被他們活生生地扼殺了。

一九五一年，毛主席親自領導了文化思想戰線上批判反動電影《武訓傳》的鬥爭。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又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另一次重大的鬥爭，即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胡適反動思想的批判。同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曾經給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關同志寫了一封信，嚴肅地批判了黨內的一些“大人物”壓制新生力量向資產階級開火，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並且再一次地提出了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的問題。毛主席就兩個青年寫的關於《紅樓夢研究》批判的文章指出：

“這是三十多年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作者是兩個青年團員。他們起初寫信給《文藝報》，請問可不可以批評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們不得已寫信給他們的母校——山東大學的老師，獲得了支持，並在該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們的文章駁《紅樓夢簡論》。問題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又被某些人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給以反對，不能實現；結果成立妥協，被允許在《文藝報》轉載此文。嗣後，《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欄

又發表了這兩個青年的駁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一書的文章。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綫，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但是，階級鬥爭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毛主席這樣尖銳地提出問題之後，以陸定一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仍然繼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頑固地對抗毛主席的指示。從一九五四年到現在，十二年過去了，反動的、徹底的賣國主義影片《清宮秘史》，還是一直沒有得到批判。

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把這個問題重新提了出來。

欠帳總是要還的。解放以後一直沒有被批判的反動的、徹底的賣國主義影片《清宮秘史》，一定要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受到革命群眾的徹底批判。對抗毛主席指示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一定要在運動中受到革命群眾的徹底批判。他們明目張膽地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猖狂地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必須受到徹底的清算。革命群眾一定要把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打倒，一定要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拉下馬，讓他靠邊站。

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是一部所謂歷史題材的影片，寫的是清代末年戊戌變法運動和義和團鬥爭。它公開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反動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任意歪曲歷史事實，美化帝國主

義，美化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歌頌保皇黨，污蔑革命的群眾運動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鬥爭，宣揚民族投降主義和階級投降主義。

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是永華影業公司攝制的。這是一家反動的電影公司，它成立以後拍攝的第一部影片《國魂》，就是借文天祥的幽靈，來為垂死的蔣家王朝招魂。它的第二部影片就是《清宮秘史》。作者姚克，是一個堅持反革命立場的反動文人。他曾經編輯過反動的《天下》月刊，反對中國革命，積極為英、美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效勞。後來，又投靠國民黨反動派，並不斷寫點反動的、黃色的劇本。他是反動統治階級的一條小走狗。全國解放前夕，逃亡香港。這樣一個反共、反人民的反動文人寫出一部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是絲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那些披著“共產黨員”、“無產階級革命家”外衣的黨中央宣傳部的部長和某幾個副部長，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卻對這樣一部極其反動的、徹底的賣國主義影片如此垂青，把它譽之為“愛國主義”的影片，積極充當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反動資產階級的代言人，這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在對待這部反動的、徹底的賣國主義影片問題上，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究竟存在著哪些重大的原則分歧呢？概括地說，有三個方面的分歧，即：怎樣對待帝國主義的侵略？怎樣對待義和團的革命群眾運動？怎樣對待資產階級改良主義？

怎樣對待帝國主義的侵略？

帝國主義同中國人民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第一個和最凶惡的敵人。怎樣對待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在對待帝國主義侵略問題上，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歌頌為“愛國主義”的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完全是一副極端可恥的惡

帝、崇帝、親帝的奴才面孔。

影片對所謂英、美、德、俄、日、法、意、奧“八國聯軍”的帝國主義侵略害怕得要死，在影片中大肆宣揚恐帝思想。叫嚷什麼“中國從甲午之戰以後，財力虧損，兵力單薄，……衆寡不敵，強弱懸殊”，“外釁必不可開”。大臣許景澄被帝國主義嚇得放聲大哭。

毛主席教導我們，在帝國主義野獸面前，革命的人民不可以有絲毫的怯懦。但是在電影的作者及其歌頌者們看來，在帝國主義侵略面前，除了舉手投降之外，沒有別的出路。——這是赤裸裸的民族投降主義，十足的亡國奴論調！

與此同時，影片又大肆宣揚崇帝、親帝思想，極力散布對帝國主義的幻想，公開販賣賣國主義理論。作者公然通過影片裡所安排的帝國主義代理人珍妃之口，歡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說什麼“各國一定會原諒皇上”，“我相信各國非但不會傷害皇上，還會幫助皇上恢復皇位，重振朝綱。”大臣孫家鼐也聲稱：“東西各國的使臣，也都向著皇上。”如果對照一下當時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分子的反革命宣傳，就可以看出，影片所宣揚的論調同帝國主義所宣揚的論調簡直是同出一轍。例如沙皇俄國就欺騙國內人民說：它“不是在同中國打仗”，“祇是在平定暴亂，鎮壓叛亂者，幫助合法的中國政府恢復正常的秩序。”列寧早在一九〇〇年寫的第一篇有關中國的論文《中國的戰爭》中，就無情地駁斥了侵略者的這種反革命論調。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極力宣揚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的“愛國主義”，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貨色呢？原來他們所宣揚的“愛國主義”，就是影片裡所描寫的光緒皇帝等人那種不惜依靠帝國主義的力量來恢復和鞏固他們對人民的統治的所謂“愛國主義”。他們在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之後，還提倡人們去學習那種爲了恢復和鞏固剝削階級對人民的統治，而不惜當賣國賊的所謂“愛國主義”，其用心何其毒也！

毛主席教導我們：“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看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之下來決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愛國主義’，有我們的愛國主義。對於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謂‘愛國主義’，共產黨員是必須堅決地反對的。”¹³同樣，對於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倡的所謂“愛國主義”（即徹底的賣國主義），也是我們所必須堅決反對的。

影片宣揚的歡迎帝國主義幫助中國“重振朝綱”的賣國主義理論，同美帝國主義的強盜邏輯也是一路貨色。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之流在一九四九年曾經操著當年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的同一個腔調，在《白皮書》裡大談什麼美國如何“關心”中國，把侵略說成“友誼”。毛主席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友誼”，還是侵略？》等文章中，早已對這種反革命的強盜邏輯，給予了嚴厲的駁斥。毛主席指出：將侵略說成“友誼”，是“美國老爺的邏輯”。但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對帝國主義害怕得要命。他們幻想同帝國主義妥協，希望得到帝國主義的“諒解”和“幫助”，他們對毛主席的“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的偉大號召，極端不滿，他們大肆吹捧反動的、徹底的賣國主義影片《清宮秘史》，實際上是公開抗拒毛主席對艾奇遜《白皮書》的批判，這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猖狂進攻。

十分明顯，在全國解放前夕，反動的電影公司和反動文人所以要制作這種宣揚帝國主義可以幫助中國“重振朝綱”的影片，就是要通過電影制造反動輿論，公開鼓吹依靠美帝國主義來鎮壓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爲處於崩潰中的國民黨反動派出謀劃策。影片完全站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立場上，迎合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需要，爲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效勞，企圖維持其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口頭掛著“反帝”招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這樣反動的、徹底的賣國主義影片吹捧爲“愛國主義”影片，不正是暴露了

13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08頁。

他們假反帝、真投降的真面目嗎？他們愛的是什麼國？愛的是帝國主義的國，愛的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國，而不是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祖國。他們所歌頌的“愛國主義”，正是全國革命人民所要打倒的賣國主義。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一部反動的、徹底的賣國主義影片吹捧為“愛國主義”影片，這決不是偶然的。他早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就在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侵略面前嚇倒了，他對中國革命的前途悲觀絕望，在黨內積極推行所謂“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民族投降主義和階級投降主義路線。毛主席號召我們丟掉幻想，同敵人進行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鬥爭，他卻大肆散布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和平幻想，公然在報上發表文章，感謝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所謂“幫助”，向美帝國主義乞求“和平”，麻痹人民的鬥志。他還欺騙人民，說什麼“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已變為和平的、議會的，鬥爭是合法的群眾鬥爭和議會鬥爭”，“黨的全部工作要實行轉變”，“一切政治問題要和平解決”。毛主席說：敵人在磨刀了，我們也要磨刀。他卻要人民交出自己手裡的武裝。他大肆宣揚賣國主義理論，認賊作父，心甘情願地要去當美帝國主義的奴才，說什麼：“美國非要在中國找買辦不可，我們也可以給他當買辦，紅色買辦麼！”買辦就是買辦，就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什麼“紅色買辦”！全是騙人的鬼話。在這種早就想當帝國主義買辦的卑鄙無恥的奴才思想的支配下，反動的、徹底的賣國主義影片《清宮秘史》，成了最適合他們口味的影片。因為影片裡所安排的帝國主義代理人珍妃所宣揚的帝國主義可以幫助中國“重振朝綱”的理論，恰恰反映了他們熱衷於充當帝國主義買辦的賣國心理！

“心有靈犀一點通”。影片裡光緒皇帝望湖興嘆的一句詩，正好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光緒、珍妃之流心心相印的寫照。在充當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問題上，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六十多年以前的地主、資產階級

發生了共鳴，這就是他們要把一部反動的、徹底的賣國主義影片吹捧為“愛國主義”影片的思想根源和階級根源。

怎樣對待義和團的革命群眾運動？

毛主席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¹⁴對於義和團的革命群眾大造帝國主義的反、大造封建主義的反的革命運動，究竟採取什麼態度？是支持還是反對，是歌頌還是仇視？這是檢驗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塊試金石。

震撼祖國大地的義和團運動，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眾運動。這是一次表現了中國人民歷史首創精神的偉大運動。當時，幾乎整個中國的北方，無論是城市或者鄉村，到處都有義和團在進行革命活動。在敵人統治最嚴密的政治中心北京城內，義和團就設壇八百餘所，景山後面的宮牆下，每天都有參加義和團的青少年在操練。

義和團的英雄們，在祖國處於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嚴重時刻，挺身而出，高舉反帝愛國鬥爭的革命大旗，同帝國主義強盜及其走狗進行了英勇鬥爭。他們一開始就在大街小巷，貼出各種標語，表達了中國人民的反帝決心：

“還我江山還我權，刀山火海爺敢鑽，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殺洋人誓不完。”

義和團嚴厲禁止洋貨，蔑視帝國主義分子。他們把駐有外國使館的東交民巷改名為“切洋街”，御河橋改為“斷洋橋”。義和團在游行時，經常同市民齊聲高呼“殺洋鬼子”的口號，使帝國主義分子聽了發抖。有的嚇得躲進棺材，雇人吹打著，企圖逃出城外。

一九〇〇年的六月，義和團的革命活動達到高潮，京郊各縣的義和團三五十人一隊，不分晝夜，一天數十起地涌進北京城內，守衛城門口的士兵，向他們致敬禮，為他們喝道讓路。浩浩蕩蕩的革命群眾，頭裹紅布，腰纏紅帶，鞋鑲紅邊，手持大刀長矛，在大街上威風凜凜地游行。前門外打磨廠等處的鐵鋪裡，爐火熊熊，日夜

¹⁴ 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

不停地為義和團趕制各種刀槍。

當帝國主義侵略軍瘋狂鎮壓義和團的時候，義和團的革命群眾用大刀、長矛等原始武器同以洋槍、洋炮武裝的侵略者進行英勇的搏鬥，顯示了中國人民大無畏的革命戰鬥精神。在著名的“廊坊阻擊戰”中，英國海軍大將西摩爾率領的一千五百多人的聯軍，被義和團“直逼火車，持矛猛觸”，死傷將近一半，最後狼狽地逃回天津。後來西摩爾膽戰心驚地說：“義和團所用設為西式槍炮，則所率聯軍必全體覆沒。”在保衛天津的戰鬥中，義和團同侵略軍進行肉搏戰，在火車站一仗，就把一支二千人的俄國侵略軍，打死打傷了五百多名。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承認：“此次天津華軍與西兵苦戰月餘，西人咸謂如此死戰，實為從來所未見”。在楊村的戰鬥中，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軍，被義和團戰士打得落花流水。帝國主義侵略軍一聽到義和團的軍號聲，就惶恐萬狀，驚呼：“聞此聲，可以使人之血凝而不流。”

在義和團運動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動、最活躍的力量，他們在這次偉大的革命運動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震駭中外的“紅燈照”，就是當時北方許多地方女青年們的組織。她們很有紀律地自己組織起來，練習武藝，保衛祖國。她們著紅衣，戴紅帽，提紅燈，拿紅槍，前方作戰，後方除奸，積極參加義和團的起義行列，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表現了中國青年婦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氣概！

“紅燈照，義和團，親兄妹，鬧的歡，一個心，殺洋官。”

這首歌謠生動地反映了“紅燈照”反帝的堅強決心。“紅燈照”英勇鬥爭的事跡，一直在人民群眾中廣泛地流傳著。他們說，“紅燈女兒，一入兵陣，視死如歸，於槍林彈雨中，惟恐落後。”“中國自道咸以來，沿海防夷水陸各戰，望風奔潰”，“得此番小兒女一振疲瘵，不特寒衆國之心，且壯中原之氣。”

義和團的英勇鬥爭，是中國人民的光榮和驕傲，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基石之一。它使侵略者親自嘗到了中國人民鐵拳的滋味，粉碎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迷夢。帝國主義侵略軍

的頭子瓦德西為此向德皇威廉報告說：“皇上誠然常有瓜分中國的思想”，可是，“不應忘去者，……彼等在實際上，尚含有無限蓬勃生氣”。“中國所有好戰精神，尚未完全喪失，可於此次‘拳民運動’中見之”。“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

對於這樣大規模的革命群眾運動，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是熱情歌頌的。毛主席在他的偉大著作中，曾經一再高度評價和贊揚義和團運動的英雄業績，他把義和團運動看作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重要的發展階段之一。毛主席指出：義和團戰爭是反抗壓迫者的義戰，它同一百年來中國人民歷次的革命戰爭一樣，“都表現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頑強的反抗精神”¹⁵；表現了“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¹⁶“中國人民，百年以來，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英勇鬥爭，使得帝國主義至今不能滅亡中國，也永遠不能滅亡中國。”¹⁷

但是，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歌頌的反動的、徹底的賣國主義影片《清宮秘史》，對義和團反帝的革命群眾運動卻抱著刻骨的階級仇恨，竭盡誹謗污蔑之能事。影片把義和團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行動，描寫為一種野蠻的騷亂。並且盡量地醜化義和團，惡毒地攻擊義和團是什麼“殺人放火”、“狀如瘋魔”的“烏合之衆”，是什麼專搞“邪術妖法”的“無知愚民”。

影片及其歌頌者對義和團的這種惡毒污蔑同帝國主義者完全是一個鼻孔出氣。當時美帝國主義頭目艾奇遜就在《白皮書》中咒罵義和團是“中國的排外騷亂”，是“拳亂”。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御用學者也大肆攻擊義和團是“無知迷信與暴民歇斯底裡的產物”，是“沒有理性的行動”，是殺人放火的“拳匪”。

究竟是中國人民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

15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26頁。

16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56頁。

17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26頁。

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污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

真正的殺人放火的匪徒，不是別人，正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據帝國主義侵略軍頭子瓦德西自供：帝國主義侵略軍佔北京以後，燒殺搶劫，奸淫婦女，破壞文明，無惡不作。帝國主義軍隊在佔領北京之後，“曾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其後更繼以私人搶劫。”上自宮廷王府，下至民間百姓的財物均被洗劫一空。“曲檻臨湖面面開，內官驚看駱駝來。”封建皇帝的寶庫頤和園所貯藏的歷朝文物，被侵略者用駱駝運至天津，累月不盡。中國幾千年保留下來的許多文物，其中包括《永樂大典》，都被帝國主義燒搶殆盡。瓦德西還供稱：“因搶劫時所發生之強姦婦女，殘忍行爲，隨意殺人，無故放火等事，爲數極屬不少”。至於帝國主義的走狗對義和團的屠殺和鎮壓，更是慘無人道。

列寧曾經懷著滿腔的憤怒，譴責了帝國主義侵略者殺人放火的罪行。他說：“歐洲各國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國政府）已經開始瓜分中國了。……它們盜竊中國，就像盜竊死人的財物一樣，一旦這個假死人試圖反抗，它們就像野獸一樣猛撲到他身上。它們殺人放火，把村莊燒光，把老百姓驅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就在這些基督教徒立功的時候，他們卻大叫大嚷反對野蠻的中國人，說他們膽敢觸犯文明的歐洲人。”¹⁸而影片及其歌頌者卻顛倒黑白，爲虎作倀，把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的帝國主義侵略者美化爲文明的使者，把堅決抗擊帝國主義侵略、英勇不屈的義和團污蔑爲“野蠻的騷亂”。這是地地道道的漢奸、賣國賊的哲學。

義和團的反帝愛國鬥爭是同反封建鬥爭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義和團的戰鬥口號是：“殺洋人，滅賊官。”當時流傳的歌謠說：“砍洋頭，殺官獸，殺盡洋和官，百姓有盼頭”。“先奪洋鬼頭，

18 《列寧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35-336頁。

後把貪官揍”。這些都是他們提出的樸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號。他們對封建統治階級恨之入骨。一九〇〇年義和團控制北京期間，清朝的在京衙門、親貴王公的住宅，大多數都被義和團成員把守監視。義和團時常抓住一些罪惡昭著的官吏，特別是對帝國主義奴顏婢膝的官吏，強迫他們到拳壇去叩頭焚表，罪大惡極的官吏就被殺掉。

但是，影片卻把義和團誹謗爲封建統治者的工具。它借清朝大臣趙舒翹之口說：“請老佛爺旨，把義和團編爲義軍”。慈禧太后聽了，欣然採納。就這樣把義和團污蔑爲慈禧太后的一黨，可謂惡毒之極。

在一個短時間內，清朝統治者對義和團採取了欺騙、軟化的政策，這個政策一度發生了作用，義和團的一部分成員受了蒙蔽，對清朝統治者產生了一些錯誤的認識，有些組織提出過“扶清滅洋”的口號。這種情形，一方面反映了當時階級矛盾的復雜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的人民大眾對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認識還處於感性階段。

毛主席教導我們，人的認識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由感性認識向理性認識發展的。“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也是這樣。第一階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認識階段，表現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等籠統的排外主義的鬥爭上。第二階段才進到理性的認識階段，看出了帝國主義內部和外部的各種矛盾，並看出了帝國主義聯合中國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壓榨中國人民大眾的實質，這種認識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後才開始的。”¹⁹所以，絕不可以因爲當時義和團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本質認識不清楚，就把義和團污蔑爲封建統治者的工具。如前所述，義和團在反帝的同時，“抗清”活動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就在“扶清滅洋”的口號出現之後，義和團的首領朱紅燈還制定“攻打北京”的計劃，始終堅持了反封建的鬥爭。

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大肆污蔑和攻擊義和團的反帝、反封建

19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78頁。

鬥爭，完全是出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的需要。他們對義和團革命群眾的污蔑和攻擊，反映了階級敵人對中國革命主力軍農民的刻骨仇恨，反映了階級敵人對我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刻骨仇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唱著同一個調子，為一部反對中國革命，侮辱革命群眾的反動的、徹底的賣國主義影片拍手叫好。他們這樣做，不折不扣地充當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反革命宣傳的應聲蟲，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們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立場。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仇恨歷史上的革命群眾運動，這使我們更加懂得了：在今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他為什麼要勾結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拋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妄圖撲滅毛主席親自點燃起來的革命烈火；他為什麼要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鎮壓群眾，實行白色恐怖；他為什麼要千方百計地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

怎樣對待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

對待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抱什麼態度，實際上是對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抱什麼態度的問題。

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這個關係中國革命前途的根本問題上，早已存在著原則的分歧。全國解放以後，這種原則分歧更加尖銳化。怎樣對待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是這個分歧的一個爆發點，這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在文化思想戰線上的第一次短兵相接的交鋒。在這次交鋒中，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一個電影的評價問題上，各自對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極力贊美這部反對革命、歌頌改良的反動影片，其目的是為了請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亡靈來給他們以幫

助，企圖借用它們的名字、口號和服裝，在中國宣揚資本主義。

影片歌頌的戊戌變法運動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運動。這個運動是一部分封建統治階級人物和從封建統治階級中開始分化出來的一些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在革命風暴和亡國大禍的威脅下，從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出發，企圖通過自上而下的維新變法的改良主義辦法，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

戊戌變法運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封建統治階級思想統治的網羅，在解放思想上起了一些啓蒙的作用，這一點我們從來是承認的。但是，我們的這種承認，指的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批判地認識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決不是無原則地對戊戌變法運動及其代表人物進行歌功頌德。戊戌變法運動的代表人物，他們本身就是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統治者，他們改良主義的目的，從來不是也絕不可能是為了人民革命的利益，而是為了更好地剝削人民和鞏固他們的統治。他們所要改變的祇是舊事物的某些枝節方面，而不是舊事物的質。他們所幻想的祇是以漸變的形式，使地主經濟迂迴曲折地改變為半地主、半資本主義經濟（實際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並企圖以此來阻擋人民革命運動，把革命消滅於無形之中。所以，改良主義即使在當時也絕不是中國人民的出路。

十九世紀的末葉，中國的社會改革已經出現了兩條道路：一條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道路，即企圖用自上而下的變法維新的辦法通向資本主義。在中國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祇能是一條虛偽的、行不通的反動的道路。因為中國沒有西歐和日本那樣維新改良的歷史條件。當時，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下，中國正在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而中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領導人康有為、梁啓超，卻恰好把維新變法的希望寄託在帝國主義身上，他們幻想投靠帝國主義，依賴帝國主義的力量，實現他們維新變法的主張。這樣做的結果，祇能是引狼入室，加速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過程，而根本談不到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另一條道路是廣大群眾起來，用武裝鬥爭的辦法進行革命。太平天國革命和義和團運動走的

都是這條道路。由於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這樣的革命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但是，卻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推動了中國歷史的發展。

“我自橫刀向天笑”。戊戌變法運動最悲壯的一幕是一個勇敢的啓蒙思想家譚嗣同之死，他的死宣告了戊戌變法運動的天折，宣告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道路的破產。而在半個世紀以後，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卻還在鼓吹早已破產了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影片極力宣揚“如果要中國富強，必須要維新變法！”還通過光緒皇帝之口，大肆贊揚維新變法，把改良主義吹得天花亂墜，什麼“明治維新”，什麼“變法上諭”，什麼“中國這樣改革起來，不到三十年，就可成為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啦！”等等。這是瘋狂地為資產階級共和國呼喊，為西方資產階級文明呼喊，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道路呼喊，革命人民是決不允許的！

影片把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尤其光緒皇帝，捧到了九天之上。說他“為了國家，為了百姓”，“用盡了心機，受盡了閑氣”，“祇要國事有辦法”“身體倒不在乎”。

特別惡毒的是，影片在大肆吹捧帝王將相和美化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同時，又千方百計地醜化勞動人民，把群眾污蔑為“群氓”。在電影的末場，作者通過被歪曲、被醜化了的村民、村婦的形象，大肆美化光緒皇帝，稱頌光緒皇帝是個“好皇帝”，“他是幫我們老百姓的”，“我們都惦著皇上呢！”村民、村婦把雞蛋、餛飩“獻給”光緒皇帝吃。臨別時，“民衆夾道跪送”。影片還污蔑說什麼“老百姓是最聽話的，也是最容易滿足的”。難道人民群眾就是這樣恭順服從、卑賤醜陋的群氓嗎？絕對不許污蔑勞動人民！毛主席教導說：“人民，祇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²⁰。”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如此歌頌這部美化帝王將相，醜化勞動人民，宣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反動影片，恰恰暴露了他們徹頭徹尾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真面目。

20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31頁。

特別令人氣憤的是，當中國人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經過了長期的武裝鬥爭獲得革命勝利之後，當毛主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前夕，親自為近百年來的革命鬥爭作了總結，批判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道路，宣告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之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竟然還把這部大肆歌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鼓吹資本主義道路的反動的、徹底的賣國主義影片作為“愛國主義”影片，不加批判地在各地大量放映，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認為，“要救國，祇有維新，要維新，祇有學外國。”“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但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在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之後，進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基本的勝利。”“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²¹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無視歷史事實，無視毛主席的警告，仍然借著反動的、徹底的賣國主義影片《清宮秘史》，美化西方資產階級文明，美化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美化資產階級共和國，宣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資

21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4-1476頁。

本主義道路，這是明目張膽地反對毛澤東思想，妄圖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的復辟。他們所以全力歌頌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就是因為這部反對革命、歌頌改良的影片是他們進行資本主義復辟鳴鑼開道的工具。他們實際上是為了通過古人來贊美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道路，並利用這部影片來迷惑群眾，來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塗脂抹粉。他們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推翻人民的江山，破壞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使革命勝利的果實落在資產階級的手裡。

圍繞反動影片《清宮秘史》而展開的這一場嚴重的鬥爭，絕不僅僅是一部電影的問題，而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修正主義思想的鬥爭，是資本主義復辟同無產階級反復辟的鬥爭。歸根結底，是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誰戰勝誰的鬥爭。

中國人民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前赴後繼，浴血苦戰，終於取得了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勝利。全國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中國究竟往哪裡去？勝利的果實究竟歸於誰？千千萬萬革命烈士用他們的生命和熱血所澆灌、生長起來的桃子究竟由哪個階級來摘？這樣重大的問題，不僅在當時，就是在現在都是中國社會各個階級鬥爭的焦點。

資產階級要從人民的手中爭奪勝利的果實，他們要摘桃子。他們要剛剛獲得解放的中國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代表資產階級來摘桃子的人物。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解放以後仍舊日夜夢想著資本主義的復辟，死抱著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不放，無限向往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極力想使中國革命半途而廢，大力發展資本主義。

毛主席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卻大唱反調，極力宣揚“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為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而奔走呼號。

就在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的前後，他到處游說，

大做黑報告，濫發黑指示，極力頌揚資本主義制度的所謂“進步”和“光榮”，鼓吹“剝削無罪”，“造反無理”的謬論。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就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²²他卻胡說什麼“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太多了，而是資本主義太少了。”“要發展資本主義剝削，這種剝削是進步的。”“今天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大叫什麼：“勞動人民不是反對剝削，而是歡迎剝削。”“如果資本家多了，剝削多了，那麼，我們就越感到舒服。”他還恬不知耻地向資本家說：“工人的痛苦就是失業，就是怕沒有人剝削，所以有人剝削比沒有人剝削好。”“工人要你剝削，不剝削人家就苦得很。”“資本家也是為人民服務。”“你們有本事多剝削，對國家對人民都有利。”“剝削得越多，功勞越大，就越光榮。”“資本家的剝削是有歷史功績的，這個功績是永垂不朽的”。他大肆宣揚“剝削合法論”，說什麼“賺多少錢都是合法的，多到什麼程度，花花綠綠，胭脂水粉、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他甚至學著小醜的腔調向資本家說：“資本家先生！我請求你剝削一下吧！剝削我就有飯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剝削，就不得了。”

工人不接受他的這一套反動的臭理論，他便污蔑工人：“不懂政治，覺悟不高。”並以資本家的幫凶的口吻，惡狠狠地威脅工人說：“工人不聽話，（資本家）要鬥爭（工人），這是合法的”。

與此同時，他還積極鼓吹發展農村的資本主義經濟，大肆叫嚷“長期保護富農經濟”，提倡“四大自由”（即放高利貸自由、雇工自由、土地買賣自由、經營自由）。主張大力發展“三馬一犁一車式的農民”，發展富農經濟。胡說什麼“現在剝削是救人，不準剝削是教條主義，現在必須剝削，要歡迎剝削。關內難民到東北去，東北的富農剝削他，他就謝天謝地。”“雇人勞動，不叫剝削，它增加了社會財富。”還提出雇人耕種土地“沒有限制”，“雇工種地是合法的，對群眾也有好處”。聲稱“有剝削還可以做社會主義者。”“東北有一萬富農黨員也不怕。”企圖使資本主義

²²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第839頁。

經濟在農村中迅速泛濫開來。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人吃人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所唱的頌歌，就連資產階級的御用學者、形形色色的新老修正主義的辯護士們，也都望塵莫及。

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階級說什麼話。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想的是資本主義，愛的是資本主義，講的還是資本主義。他所販賣的那一套人吃人的哲學，完全是為發展資本主義，維護血腥的剝削制度服務的。他的這種聲音是吸血鬼和寄生蟲們的聲音，也是他自己那種骯臟的、醜惡的資產階級靈魂的大暴露。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自我辯解說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什麼“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難道竟有這樣瘋狂進行資本主義復辟活動的“老革命”？

難道竟有這樣猖狂反對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猖狂反對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老革命”？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麼，請問：

為什麼你要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大肆宣揚活命哲學、投降哲學、叛徒哲學，指使別人自首變節，要他們投降國民黨，叛變共產黨，公開發表“反共啓事”、宣誓“堅決反共”？

為什麼你要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投降主義路線？

為什麼你要在解放以後極力反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反對農業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為什麼你要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竭力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積極主張階級合作，取消階級鬥爭？

為什麼你要在三年困難時期，與國內外牛鬼蛇神遙相呼應，惡毒攻擊三面紅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路線？

為什麼你要在一九六二年還重新出版過去那種不要革命，不要階級鬥爭，不要奪取政權，不要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馬克思列寧主

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宣揚腐朽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宣揚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的、欺人之談的大毒草《論修養》？

為什麼你要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破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為什麼你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勾結另一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答案祇有一個：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十七年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支持下，向無產階級發動了一個全面性的猖狂進攻，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領域裡放了大量的毒。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組織起浩浩蕩蕩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文化大軍，徹底粉碎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猖狂進攻，挖出我國修正主義的總根子，打倒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黨、篡國，防止資本主義的復辟，保證我國永不變色！

“宜將剩勇追窮寇”。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億萬人民動員起來，窮追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窮追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取一切被他們篡奪了去的堡壘，讓毛澤東思想占據一切陣地。正像林彪同志所說的，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戰役，是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思想的總攻擊”。我們一定要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高舉革命的批判旗幟，勇敢地投入戰鬥，徹底批判和肅清以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各方面的流毒；大破剝削階級的舊思想，大立毛澤東思想。

鬥爭的道路是曲折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在前進的道路上是有阻力的，我們一定要克服種種困難，衝破一切阻力，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絕不能半途而廢。

把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紅旗插遍全中國，讓她永遠永遠地放射出燦爛的光芒！

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親自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勝利萬歲！

（原載1967年4月1日《人民日報》）

6、關於批鬥王光美

1967年1月的時候，清華大學蒯大富一些人，用王光美的女兒出“車禍”的謊言，搞了一個“智擒王光美”事件。這件事情是他們自己搞的。總理知道以後，馬上派他的秘書去把王光美接回了中南海。主席後來知道了說，共產黨講究光明正大，不準再搞這種騙人的事情。對這件事情，我們中央文革事先也是一點都不知道的。他們很可能是受到葉向真智擒彭真的啓發，也想幹出點驚人的壯舉來。那個時候確實有這樣的風氣，好像誰批鬥的人級別高，就越能證明自己革命性。

到了《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篇文章見報以後，清華大學又提出要召開30萬人的大會來鬥爭王光美。蒯大富來跟我說。我說，這事我決定不了，你得請示總理。後來經過中央開會討論決定，同意了他們的要求。整個批鬥王光美都是在總理的指導下進行，由我協助總理掌握全局。我和批鬥現場一直保持著電話聯繫，他們每隔十幾分鐘都要給總理和我一個電話，匯報現場的情況，基本都是說，一切正常。在批鬥大會上，他們給王光美披上旗袍，挂上一串乒乓球項鏈，這些都是蒯大富底下人搞的，並不是上面要搞的。蒯大富下面有個女孩子，來向總理要王光美出國時穿過的衣服、項鏈什麼的，說要把她打扮起來，跟她出國時候一樣。總理不贊成，江青支持總理意見，也不贊成。江青還特別跟我說，不能讓學生們亂來，否則，出了事情，没法向主席交代。

王光美在批鬥會上回答了紅衛兵學生提出的問題。她的回答都

很得體、很巧妙。我都没有想到，一個大小姐出身的人，能有這樣的才能。祇是可惜她這個才能用錯了地方。

我和王光美認識很早。我進中南海政治秘書室工作以後，王光美就和我是一個黨小組的。她經常來一起參加組織生活。那時過組織生活是很嚴格的，有時她不來，開會的時候就會有人提出意見，她也得在會上作檢討的。因為我是秘書室黨支部委員和黨小組長，所以有時她還會來主動向我談一些問題。

王光美是輔仁大學物理系畢業的高材生。她給我們講過什麼叫核裂變，什麼叫核聚變。講得頭頭是道。我總覺得，她看人的目光很敏銳，她也很會團結人。王力是首先執行毛主席的指示，支持了她的對立面蒯大富的人，她心裡對王力的怨恨不會小。但是，文革後，王力見了她，向她致歉時，她對王力說，你也是受害者，過去的事就不要說了。一句話就把王力給拉過去了。

王光美歷史上有過一段和美國海軍陸戰隊情報人員關係比較密切的記錄。建國初審幹的時候，我、王文、張維誠、沈棟年是中南海秘書室審幹小組的，負責審查她。那時她說，抗戰結束後，自己一邊同共產黨的同志們好，一邊卻又和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兩個情報官員很好，但祇是私人來往，從來沒談過情報工作。我們討論後，認為她與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情報官員祇是一般的朋友交往。她本人當時受共產黨影響，在國共和談時給共產黨當翻譯，當時表現很好，所以她是個思想進步的青年。她們家是個大家族，她的兄弟姐妹一部分加入共產黨，一部分加入國民黨。她是家族中的左派。可是，在文革中，她又因為這些事情被中央立案審查。

但她的胸懷不是很寬厚。我從秦城出獄以後，聽說就是因為她向當時的中央提出，蒯大富不能留在北京居住和生活，以致蒯大富才被逼得離開北京，南下謀生。不過，也有人告訴我，她晚年曾對採訪她的記者說，看看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現實，毛主席當年發動文革也許是必要的。如果她真是這麼說的話，那她要比當年左得很、而現在又在不遺餘力地全面否定文革的王力、穆欣等人像個人。

7、圍困中南海與批鬥“劉、鄧、陶”

1966年10月，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時候，建工學院的八一戰鬥隊等造反派組織，要求劉少奇到他們學校去作檢查。劉少奇寫信向毛主席請示，毛主席不同意劉少奇去檢查，並在1967年1月6日將劉少奇的信批轉總理，讓總理給學生做工作。

不久，又有學生組織提供材料，說劉少奇歷史上被捕叛變過。中央文革小組向中央建議，成立審查劉少奇的專案組。但毛主席認為材料不足，不同意成立專案組。後來總理說，不管有沒有問題，總要調查一下吧！於是把對劉少奇歷史問題的調查，放在王光美專案組裡做。在查出一些問題後再請示主席，主席才同意設立劉少奇專案組。

1967年4月以後，天津南開大學、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等組織，成立了“揪劉聯絡站”，後來又聯合其他組織成立了“揪劉火綫指揮部”，要到中南海來揪劉少奇。

當時學生的情況也是很復雜的，到中南海門口來揪劉少奇的有反工作組的造反派，也有一批學生本來都是劉少奇（和工作組）的擁護者，現在他們卻要表現得比誰都激進，最早到中南海來揪劉少奇的，主要就是這兩批學生。

剛開始的時候，人並不多。後來其他學校的學生聽說後，都紛紛跑來支持。學生說，毛主席說了，要到群眾中去，你劉少奇為什麼不到群眾中來？可是劉少奇不出來是有理由的，因為毛主席有指示說，對他不搞面對面鬥爭，要搞背靠背鬥爭。我們中央文革和中央辦公廳也是這個意見，真要讓劉少奇到群眾中去，弄不好會出事。

周總理讓汪東興派人勸說學生們回去，並向他們保證，可以按他們提出的問題要劉少奇寫書面檢討。可是學生們仍然不走，於是

總理就讓我出面處理。

1967年7月4日凌晨，我按照總理的交代，到“揪劉火綫”勸說造反派撤離中南海，同時又支持他們批判劉少奇，保證讓劉少奇寫檢查，學生們同意了。7月8日劉少奇寫出一份檢查，汪東興把它交給了建工學院“新八一”造反派。可這一下“老八一”造反派不幹了，“老八一”是老造反，“新八一”是從“老八一”分裂出來的，你劉少奇祇向“新八一”檢查、不向“老八一”檢查，那不行。另一方面，劉少奇的檢查被他們指責是“假認罪、真反撲”，這樣就引發了更大的批劉高潮。“老八一”發出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緊急動員令”，並到中南海的西門外安裝了高音喇叭，一定要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這樣一來，除了學生組織，廠礦企業、事業單位的人也紛紛前來中南海西門揪劉少奇，到後來連郊區的農民都來了。在中南海西門兩邊人行道上安營扎寨，其狀態如同我多年後去美國看到的美國工人在白宮外扎個紙板房包圍白宮有點類似。這就是當年的包圍中南海。

中央文革是支持批判劉少奇的，但對圍困中南海這個事，中央文革是沒有一個人支持的。一開始我們對這事並不太重視。沒想到這個事就這麼鬧大了，真把中南海給包圍了，最多的時候起碼有幾萬人。而且，不分白天晚上，那高音喇叭晝夜對著中南海放著。給我們中南海辦公區造成了極大的干擾。連總理也被吵得沒法工作了。我多次去講話，陳伯達也去，都勸他們回去。但他們都不聽。接著又鬧絕食了。這就不好弄了，真要死了人，我們都沒法交代了。

這時，總理主持中央文革開會。總理說，包圍中南海這個事影響到中央工作了，我不能工作倒不要緊，主席回來了，要是睡不好覺，怎麼行？主席睡覺很敏感，連烏鴉叫，他都會醒。總理叫我和謝富治去說服群眾撤離。那時，北京市革委會已經成立了，謝富治是革委會主任。

於是，我就和謝富治一起去接見他們的代表。我見了他們就說，你們那些宣布絕食的學生先去吃飯，不然我們就不接待了。他

7、圍困中南海與批鬥“劉、鄧、陶”

1966年10月，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時候，建工學院的八一戰鬥隊等造反派組織，要求劉少奇到他們學校去作檢查。劉少奇寫信向毛主席請示，毛主席不同意劉少奇去檢查，並在1967年1月6日將劉少奇的信批轉總理，讓總理給學生做工作。

不久，又有學生組織提供材料，說劉少奇歷史上被捕叛變過。中央文革小組向中央建議，成立審查劉少奇的專案組。但毛主席認為材料不足，不同意成立專案組。後來總理說，不管有沒有問題，總要調查一下吧！於是把對劉少奇歷史問題的調查，放在王光美專案組裡做。在查出一些問題後再請示主席，主席才同意設立劉少奇專案組。

1967年4月以後，天津南開大學、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等組織，成立了“揪劉聯絡站”，後來又聯合其他組織成立了“揪劉火綫指揮部”，要到中南海來揪劉少奇。

當時學生的情況也是很復雜的，到中南海門口來揪劉少奇的有反工作組的造反派，也有一批學生本來都是劉少奇（和工作組）的擁護者，現在他們卻要表現得比誰都激進，最早到中南海來揪劉少奇的，主要就是這兩批學生。

剛開始的時候，人並不多。後來其他學校的學生聽說後，都紛紛跑來支持。學生說，毛主席說了，要到群眾中去，你劉少奇為什麼不到群眾中來？可是劉少奇不出來是有理由的，因為毛主席有指示說，對他不搞面對面鬥爭，要搞背靠背鬥爭。我們中央文革和中央辦公廳也是這個意見，真要讓劉少奇到群眾中去，弄不好會出事。

周總理讓汪東興派人勸說學生們回去，並向他們保證，可以按他們提出的問題要劉少奇寫書面檢討。可是學生們仍然不走，於是

總理就讓我出面處理。

1967年7月4日凌晨，我按照總理的交代，到“揪劉火綫”勸說造反派撤離中南海，同時又支持他們批判劉少奇，保證讓劉少奇寫檢查，學生們同意了。7月8日劉少奇寫出一份檢查，汪東興把它交給了建工學院“新八一”造反派。可這一下“老八一”造反派不幹了，“老八一”是老造反，“新八一”是從“老八一”分裂出來的，你劉少奇祇向“新八一”檢查、不向“老八一”檢查，那不行。另一方面，劉少奇的檢查被他們指責是“假認罪、真反撲”，這樣就引發了更大的批劉高潮。“老八一”發出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緊急動員令”，並到中南海的西門外安裝了高音喇叭，一定要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這樣一來，除了學生組織，廠礦企業、事業單位的人也紛紛前來中南海西門揪劉少奇，到後來連郊區的農民都來了。在中南海西門兩邊人行道上安營扎寨，其狀態如同我多年後去美國看到的美國工人在白宮外扎個紙板房包圍白宮有點類似。這就是當年的包圍中南海。

中央文革是支持批判劉少奇的，但對圍困中南海這個事，中央文革是沒有一個人支持的。一開始我們對這事並不太重視。沒想到這個事就這麼鬧大了，真把中南海給包圍了，最多的時候起碼有幾萬人。而且，不分白天晚上，那高音喇叭晝夜對著中南海放著。給我們中南海辦公區造成了極大的干擾。連總理也被吵得沒法工作了。我多次去講話，陳伯達也去，都勸他們回去。但他們都不聽。接著又鬧絕食了。這就不好弄了，真要死了人，我們都沒法交代了。

這時，總理主持中央文革開會。總理說，包圍中南海這個事影響到中央工作了，我不能工作倒不要緊，主席回來了，要是睡不好覺，怎麼行？主席睡覺很敏感，連烏鴉叫，他都會醒。總理叫我和謝富治去說服群眾撤離。那時，北京市革委會已經成立了，謝富治是革委會主任。

於是，我就和謝富治一起去接見他們的代表。我見了他們就說，你們那些宣布絕食的學生先去吃飯，不然我們就不接待了。他

們就去吃了碗面什麼的。然後我就對他們說，毛主席不同意把劉少奇交給群眾鬥爭。你們開會批判可以，祇要把道理講透，從理論上認識走資派對中國的危害，不一定非要同他進行面對面的鬥爭。但不管我們怎樣費盡口舌地講，他們就是不同意，堅持一定要見到劉少奇本人，一定要批鬥他。

後來在判我“罪”的時候，那些審判我的人說，包圍中南海是我策動的，這是我的一大罪狀。我問你們有什麼事實根據？在文革中清查“五一六”的時候。就已經把那些學生找來問過，沒有一個學生說是我在背地裡發動他們包圍中南海，他們查了我接待學生的談話記錄，我所有的講話都是勸說他們回去的。他們拿不出證據來駁我，就說這不用證據，這是“衆所周知”的。我說我反對劉少奇確實是衆所周知的，可說是我策動群眾包圍中南海，這是無根據的推測，怎麼說是衆所周知呢？他們回答不了我，祇好用沉默來做回答。

1967年8月3日至4日中央文革小組又開會商量辦法。總理提出一個方案，他說，8月5號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一周年，是否那天在天安門廣場開個大會，聲討劉少奇、鄧小平，還有新近被打倒的陶鑄。同時也在中南海開個批鬥會，由警衛局、秘書局的群眾參加。總理說，中南海裡的人守紀律、好掌握，讓他們開會鬥爭“劉、鄧、陶”。外面的人不許進來。與此同時，把中南海裡開的批鬥會在天安門廣場上拉綫轉播，來滿足群眾的願望。大家都表示贊成，就這樣作出了決定，並由康生、總理報告了主席。

總理叫謝富治和我去向群眾傳達這個決定，並說服群眾開完大會撤離對中南海的包圍。我們從部隊調來兩部大卡車，在車上架上大喇叭，我和謝富治站到了卡車上，用喇叭向包圍中南海的群眾講話。我們說，8月5日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一周年，中央文革決定在中南海召開一個批鬥會，同時在天安門舉行一個紀念大會。中南海裡鬥爭會的實況將在天安門廣場上進行轉播。聽完廣播後，由紅衛兵和工人代表在天安門城樓上批判發言，作進一步的聲討。這樣內外結合，才能顯示人民的力量。紀念大會結束後所

有的群眾都撤回原單位，把帳篷小屋都拆除幹淨，以後都集中精力繼續在原單位深入進行大批判，我們問這個辦法好不好？學生、工人都高喊擁護中央的決定，歡呼毛主席萬歲。

於是我和謝富治就分頭落實，謝富治去布置天安門大會，我去布置中南海內部的批鬥會。當時叫來廣播局的技術人員研究怎樣把中南海的會和天安門的會連起來。他們說中南海和長安街原來就有綫，不用拉綫，接上就行。

對中南海裡面的批鬥會，我絲毫不敢怠慢。別以為中南海幹部水平高，其中也有人挺激烈的，一旦展開面對面的批鬥，就有可能發生非理性的情況。張霖之的死就是前車之鑒。不要說打壞了劉少奇，就是打了一下，他病兩天，我就擔當不起責任。所以，我和王良恩（中央辦公廳的副主任）特別布置了專人來控制會場秩序。我叫文革辦公室負責人王道明、矯玉山這些人都到會場。王道明是中央文革辦事組的支部書記，挺得力的一個小伙子，是學習毛選的積極分子。我交代他，要他組織幾個身強力壯的人就站在劉少奇他們的旁邊，看到有人要靠近，馬上把他隔開。我又與王良恩商量布置好警衛人員，萬一發生武鬥，隨時出動，加以制止，並且馬上就提前結束會議，由警衛局的負責人把他們送回家。我當時是這麼說的，如果在會議上出現對立、衝突情況，或者“劉、鄧、陶”他們講個什麼話來刺激我們一下，那就有可能會發生群眾性的武鬥，這樣就會給運動抹黑了。這時候，你們就必須出動警衛馬上上去制止。群眾推你們也好，打你們也好，你們都不要反抗。他們如果喊“保衛毛主席”。那你們就喊“毛主席指示‘要文鬥，不要武鬥’”。這就是你們的任務。而且規定，不準任何一個解放軍戰士帶武器，也不準任何一個群眾帶棍棒。我們的這些個布置，當時的警衛團都有紀錄可查。我布置好以後，立刻向總理、陳伯達、江青都作了報告。他們都同意，總理尤其滿意由王良恩掌握警衛，防止武鬥。王良恩為此還專門打長途電話，去向身在主席身邊的汪東興作了匯報。

開批鬥會的時候，我在中央文革的辦公室裡掌握全局，王良

恩、王道明等每十幾分鐘要給我一個電話，報告現場的情況。而在整個批鬥會的進行過程中，總理也派人從頭到尾地在現場觀察。我們也是十幾分鐘向他和陳伯達、康生、江青匯報一次。

中南海批鬥會，事實上是很平和的，整個會場上，沒有出現武鬥場面。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都在現場拍攝了新聞片。在批鬥劉少奇的會上，有個青年女幹部用語錄本要往劉少奇的腦袋上拍，因為距離遠，沒拍準。馬上就有警衛上前制止了。在整個批鬥會上也就是聲色俱厲的口水仗，劉少奇也沒有講什麼話，他知道這種時候他講話也沒有用。而發言的人也都是按照事先準備的提綱發言。劉少奇平時對下面人比較冷漠，所以包括他的秘書、服務員也都很起勁地參加了批鬥。

批鬥鄧小平時候，我布置了讓他坐著參加。因為主席講過，劉、鄧要分開，應該把鄧與劉區別對待。所以鄧小平是一直坐著聽大家對他的批判的。

在批鬥陶鑄的時候，控制就差一點了，陶鑄和群眾發生了頂撞。當時我把防範的重點都放在劉少奇那邊了。但在陶鑄那裡雖然有頂撞，也沒有進一步的武鬥情況。

8、陳伯達在批鬥“劉、鄧、陶”文件上增加了讓他們家屬陪鬥的內容

在中南海開劉、鄧、陶的批鬥會，是經過總理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組會議討論決定的。在這個決定上，中央的領導都在上面簽了字，劃了圈的。但陳伯達卻在文件的批示上加寫了讓他們的家屬也一起陪鬥的字樣。

我看了陳伯達在批示上增加的內容，心裡覺得不大好辦，可我也不好反對。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劉少奇的秘書，而且她在清華大學推行資反路線，鎮壓群眾，逼死了好幾個學生，她一起挨

批鬥是可以的。可鄧小平的夫人卻不管鄧小平的事。再說陶鑄夫人曾志，她和主席是老戰友了，井岡山的時候就和主席共過事。她在資格上和陶鑄是一樣的老革命，他們之間不是誰聽誰的。陶鑄曾經為了表現自己的黨性和無私的原則，把曾志的行政級別壓得很低。主席知道了，就說“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批評了陶鑄，陶鑄這才把曾志的級別提了上來。再說曾志也沒有參與陶鑄的那些錯誤，她一直是希望陶鑄緊跟主席的。所以我對王道明他們作了特別的交代，我說，陶鑄的事和曾志沒有關係，不能批判她，叫她坐著聽就可以，你們要保護好她。還要跟她講清楚，今天開這個會，是要陶鑄出來答復群眾提出的問題的，她的任務是保護陶鑄。萬一陶鑄太激動了，可以去安慰他，或者突發什麼病的話，就去護理他。可是這件事後來在審判我們的時候，說三個夫人陪鬥的事，是我瞎搞的。我告訴他們，那是陳伯達加上去的，不是我。他們問陳伯達，陳伯達不承認。但有文件可查，文件上家屬陪鬥的字樣是陳伯達的筆迹，可他死也不承認是他寫的字。後來公安部請了筆迹鑒定專家，專家的一致結論，這字是陳伯達寫的。法庭出示了文件的復印件和專家鑒定書，陳伯達才承認是他寫的。

第二十四章 中央文革小組和文革造反派

1、文革造反派的形成

“五一六通知”發布，北大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全國大、中學校的學生首先響應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積極投入文革運動，起來造反。但那時候學生對“造反”的理解是比較模糊的，他們祇是響應黨中央的號召，批“三家村”，揪黑幫。好多學生把鬥爭的矛頭對著自己學校裡的教師和個別領導，有好些學生甚至把平時管他們的班主任當作了“造反”對象。學生們的這些鬥爭造反行動，多少是和當時的一些中央與地方領導有關係的。後來他們還有意把學生們的鬥爭矛頭引向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資”，甚至是一些出身不好的人。而他們這麼做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避免群眾運動搞到自己的頭上來。所以，那個時候儘管各個學校的大字報很多，但還不能說是毛主席發動文革運動，重點是要整黨內走資派這一鬥爭方向的造反。

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它的矛頭就不僅是指向學校的領導，而且是對準舊北京市委、中宣部和教育部的，揭開了這些長期以來被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統治的單位和部門的階級鬥爭蓋子。所以毛主席稱它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但當時在一綫指導運動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卻反其道而行。

劉少奇、鄧小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向各個學校派出工作組的。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由於是受到毛主席的肯定，工作組一時還不能對他們怎麼樣。但其他學校的類似聶元梓那樣給領導提意見、貼大字報的學生，像西安交大的李世英、清華大學的蒯大富等很大

一批人，則被工作組以及學校領導打成了“反動學生”和“反黨分子”。工作組和一些地方的領導，根據劉、鄧批發的《關於轉發北京大學第九號簡報》等中央文件和“指示”，對這些學生進行了批鬥，審查，甚至拘押。而且他們還在學生和教師中層層進行排隊摸底，準備沿用1957年反右的做法，按照人數比例劃出“右派”，搞得人人自危。劉少奇還派王光美掌控清華工作組，要抓一個“反干擾、抓游魚”的典型，抓出一個文革運動中的“桃園經驗”。

就是在這個時候，江青通過電話向我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要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的人都到各個學校去了解情況，並向主席報告。江青還多次在電話裡指示我，要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去公開表態，反對工作組把鬥爭矛頭對著學生的做法，支持那些受到工作組錯誤打擊的學生。我和王力、關鋒等人分頭去了各個學校，支持那些受工作組錯誤打擊的學生。當這些學生知道有中央文革在支持他們的時候，深受感動。他們貼出了“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覺毛主席親”的大標語，唱起了“抬頭望見北門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並由此同我們建立起了彼此信任的關係。

與此同時，各地的學生和群眾也紛紛通過來信或來訪，向我們反映他們所受到的壓制和打擊的情況。我們一方面向各地派出了中央文革快報組的記者去了解情況，一面通過中央文革接待站和信訪辦，接待和接受了群眾的訪問和信件，並很快作了相應的處理。所以，各地的受壓制群眾，也對中央文革小組產生了信任，把它看作是自己的依靠。

但是，在當時許多中央和地方的領導人的眼裡，卻並不把中央文革小組當作一回事。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和顧問康生，八屆十一中全會前也都不過祇是政治局候補委員，而其他的人則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不要說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不把中央文革當回事，恐怕連譚震林、葉劍英他們也是如此。葉劍英領導著“首都工作組”，他多次講要爭取運動的“指導權”，就是針對著中央文革小組而言的。後來主要由高幹子弟與革幹子弟等組成的“西糾”、“聯動”等組織，之所以敢公開與中央文革小組對抗，就是因為在他們的背後是受

到了“首都工作組”和國務院一些人强有力的支持。

說實在的，與“首都工作組”相比，中央文革小組雖說是直接隸屬中央常委會的，但在當時它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大權力，它既沒有行政權，更沒有軍權，甚至連一點財務權都沒有。

到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後，撤銷了工作組，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發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制定並通過了“十六條”後，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江青指示我們支持過去受到工作組鎮壓的北京各大專院校的學生組織聯合起來，成立首都紅衛兵“三司”。同時，我們也支持了反對劉、鄧路綫的“北航紅旗”、“北師大井岡山”等當時真正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組織。這才真正在北京形成了一個有力量的文革造反派。然後，這些造反的紅衛兵到全國各地進行大串聯，動員和組織起了各地的造反派組織。可以說，中央文革小組除了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還得到了各地造反派群眾的擁護，這才有了權威和力量。

然而在當時幾乎所有的群眾組織，包括那些由各級黨委組織成立起來的群眾組織，都聲稱自己是“造反派”。直到1966年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之後，才有了一條區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界限。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上，我們也就是根據各個群眾組織對劉、鄧的資反路綫的態度，來決定是否承認其為造反派組織的。

1966年11月發生的上海“安亭事件”，和同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交座談會，對全國造反派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安亭事件中，毛主席支持了張春橋，承認上海工人的造反組織為革命的合法的群眾組織。而在工交座談會上經過激烈的鬥爭，最後通過了工人群眾有權建立自己的革命的組織，工人群眾和工人組織之間以及與學生組織可以進行串聯的《工業十條》。各地工人造反派這才迅速地發展和壯大起來，逐漸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

最早組織起工人造反組織的也都是一些在文革運動開始時受到劉、鄧資反路綫迫害的普通工人。張春橋在處理“安亭事件”回來後跟我說過，他到安亭去的時候，開始也祇是極力想勸說工人群眾

回到本單位去參加文化大革命，以保證京滬鐵路的安全暢通。可是他在聽了工人群眾向他控訴了他們如何在文革運動中受到本單位和上海市委當權派的壓制和迫害之後，思想受到了很大的震動。而且他跟我說，工人為什麼堅持要得到中央文革承認他們的行動是革命行動，他們的組織是革命的組織以後才肯回去，就是擔心回去之後會受到進一步的更嚴重的迫害。在這種情況下，他下了決心，支持工人。

所以，文革造反派的產生還是像毛主席經常說的那樣，是被“逼上梁山”的。

後來這些文革造反派，都被鄧小平他們污蔑成是社會上的“流氓阿飛”、“打砸搶分子”。這跟當年國民黨污蔑工農紅軍是“強盜”、“赤匪”差不多是一個道理。其實，當年這些起來造反的群眾大多數都是很有頭腦，也很正直的人。毛主席對這一點是有親身體會的，當年他領導紅軍“打土豪”的時候，就有這方面的經驗。他好幾次跟我們說，一場運動剛開始的時候，首先起來的總是一些有缺點的勇敢分子，這些人如果能得到正確的引導，接受黨的教育，那也可以成為革命的中堅力量。當然，毛主席也很清楚地知道，在這些“勇敢分子”中間，不僅有有缺點的人而且有作風惡劣的不良分子。他說，有些人起來造反，總像阿Q一樣，眼睛老是盯著人家家裡的女人，以至小姐的牙床。對這些人要隨著運動的發展，逐漸清理出去。

2、中央文革小組對文革造反派的支持

在文革中，認定一個地區或者一個單位，哪些群眾組織是造反派組織是件很嚴肅的事情。要經過中央文革小組會議的研究討論之後，然後由總理、江青、陳伯達和康生他們幾個拍板，才能確定下來。

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上，通常先是把文革辦公室匯集後報上來的，和通過其他各種途徑得到的材料分發給大家研究討論。然後

由大家發言談自己的觀點。其實在中央文革小組裡面，起先並沒有明確的分工，由誰來負責哪一個地區的運動。而是誰對某個地區的事務關心的比較多，那以後有關這個地區的事情就由他先來說。陳伯達比較關心河北、天津，內蒙古的事情是康生負責，關鋒對山東的運動關心得多，他支持王效禹。王力對山東也關心，所以山東的事就由關鋒和王力來管；關鋒對東北也很關心，關鋒的女兒在東北工作，她是支持宋任窮那一派的。東北的事後來是毛遠新參與了，毛遠新是支持陳錫聯、潘復生的。有一次，關鋒要去東北，毛主席讓他緩一緩再去，主席說，還要再看一看。雲南和湖北等地是由王力負責的。上海、浙江、江蘇由張春橋、姚文元負責。主席對上海特別關心，他對上海的事情知道得比我們都多。我主要是負責北京。後來湖南出了“湘江風雷”的事情以後，湖南的事情我管得多了，其他的像湖北、貴州、四川、河南、青海、甘肅我參與得也比較多。

對全局的情況掌握得多的還是總理。相對來說，江青、陳伯達、康生都比較缺乏全局觀念，缺乏對全國運動的戰略思考，他們整天都忙於事務，沒有整體的規劃和布局。這樣就逐漸形成了由總理來主持全局的局面了。

早先國務院這一攤和中央文革小組這一攤，是分頭開會討論各自負責運行的，當牽涉到相互有關聯的事情的時候，就召開聯席會議。後來這種聯席會議就變成了“中央常委碰頭會”，通常都是在懷仁堂舉行，由總理主持。“二月逆流”後，國務院的好多人都靠邊了，總理就把會議搬到釣魚臺來開了，會議的名稱也改作“中央文革碰頭會”了，但還是由總理主持。

但是由於總理和造反派在如何對待各地領導的問題上，總有認識上的差異，所以，一些地方的造反派對總理也有時不大買賬。有些事情光是總理去講話，中央文革不講話，造反派往往就不聽。因此總理對造反派提出批評時，中央文革一般也要跟著批評他們。但我們的批評有時不像總理批得那麼厲害。造反派就認為中央文革與總理有分歧，因而就對總理不尊重，弄得中央文革很難辦。有一

次，我和總理一起接見湖南的造反派，那個造反派的頭頭人稱“雷司令”。他見到總理，也不站起來，而是把身體塌在椅子上，裝作沒看見。我坐下後，見他對總理不禮貌，就把腳伸過去踢了他一下，他懂得肢體語言，得瑟了一下，趕緊坐好了。

總理去接見造反派的時候，總要叫上我們文革小組的人一起去。誰對那個地區關心的比較多，總理就叫上誰一起去，這樣無形地好像就形成了文革小組的分工。

我那時的工作非常繁忙。中央文革的日常工作，江青都交給了我來處理，並由我直接向她報告。加上1967年開始的幾個月我一直集中在精力寫文章。所以除了北京的造反派，我與其他地方的造反派聯繫不多。在文革中，我除了去過一次山東、一次天津，基本沒有離開過北京。

各地的造反派當然都是聽中央文革的，他們有什麼事情都來找中央文革反映，匯報。因為他們很清楚，中央文革是支持他們的。

北京的造反派學生一直都和我保持著經常的聯繫，江青和文革小組有什麼指示，常常是由我去向他們說的。他們遇到了什麼問題，也經常會來找我商量。由於我1960年到二七機車車輛工廠勞動過，那裡的工人都跟我熟，文革的時候他們來找我，我也去了廠裡支持工人造廠裡的走資派的反。文革前我還去過幾次首鋼，所以首鋼的造反派遇到什麼事情，也願意來找我。

北京的造反派與其他地方有個區別，由於彭真領導的舊北京市委，在文革一開始的時候就被打倒了。李雪峰領導的新北京市委主要是向學校派工作組，對學生搞資反路線，所以學生們對他反得比較厲害。而北京工人的造反派主要是針對本單位的當權派的。

隨著工作組被撤銷，李雪峰實際上也靠邊了，中央調了劉建勛來主持北京市委的工作。劉建勛是個很好的同志，我曾和謝富治商量，讓劉建勛擔任北京市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可是後來河南發生了問題，河南人民要他回去領導全省工作，中央就又把劉調回河南去了。北京的事情主要是吳德和馬力、丁國鈺在管。他們幫中央文革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一些學生和工人的造反派，有時還是抓住吳德

和馬力他們的一些錯誤不放，中央文革常讓我出面做工作。

毛主席對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事很關心。他說，先要召開紅衛兵的代表大會（大學紅代會和中學紅代會），工人的代表大會（工代會），和農民代表大會（農代會），在這個基礎上再成立北京市的革命委員會。

北京市革委會成立的籌備工作主要是謝富治和我兩個負責。但是我們兩個都非常忙，當時有個叫周景芳的，他是關鋒的老戰友，原來是在學部哲學研究所工作的。這個人的能力很強，很多事情我們都叫他出面去辦。後來北京市革會成立後，周景芳擔任了市革會的秘書長、核心組副組長，很多事情都是他在處理。

聶元梓擔任了北京市革委會的副主任，但是這個人一心就想要當主任，她處處作梗，拼命排擠謝富治和周景芳。我對她很看不慣，我與謝富治商量對她怎麼辦？謝富治說，不要緊，讓她去鬧，我對付得了她。其實，毛主席對聶元梓的情況很清楚，因為李訥是北大畢業的，她把聶元梓為人處事不足之處都告訴主席。主席後來對聶元梓也不信任，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召見“五大領袖”後，也派了軍宣隊、工宣隊去管北大。

3、在支持文革造反派中出現的問題

在湖南的“湘江風雷”事情上，我們中央文革犯了個很大錯誤。“湘江風雷”是一個很大的造反派組織，成員衆多，幾乎覆蓋了湖南全省，高峰時據說達百萬之衆。1967年1月，“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傳達後，湖南省軍區在2月3日來了報告，說“湘江風雷”衝擊省軍區，根據“軍委八條”文件，應當按反革命處理。當時葉群也來了，她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上說，湖南省軍區司令龍書金是林彪的一員戰將，說這個人會打仗，如何如何好，要我們支持他。於是，2月4號中央文革就發了一個關於“湘江風雷”的批示。這個批示是王力和關鋒起草的，我也看過，陳伯達、江青也看過。

在這個批示上說了，“對‘湘江風雷’的反動頭目，應採取專政措施”。湖南省軍區一拿到這個批示，就馬上把“湘江風雷”打成了反革命組織，並迅速將它取締了。他們出動部隊把這個組織的大小頭頭都抓了起來，在全省抓了上萬名的造反派。

湖南省委有個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叫章伯森，他是支持造反派的。他向毛主席反映，說“湘江風雷”是省裡最早起來造反的造反派，怎麼說它是“反動組織”呢。主席在湖南的其他一些朋友也向主席作了反映。主席讓我們再去查一查。一查，果然是我們弄錯了。“湘江風雷”的的確確是一個革命造反的群眾組織。到五月後，中央文革給它平了反。爲了這件事，陳伯達、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受到了毛主席嚴厲的批評。

這件事發生以後，我和湖南的工人造反派就接觸多了。我非常重視章伯森，可是下面反對他的人也很多，盡管我們去做了工作，但效果不大。這樣我就把舊省委中雖犯有資反路線錯誤，但與群眾關係尚好的華國鋒提了上來。在人民大會堂開會的時候，我講話保護了華國鋒，要他站出來工作。會後，他留了下來，對我表示感謝，並表示一定改正錯誤，緊跟毛主席。華國鋒一轉變，就減少了與造反派對抗的對立面。再加上龍書金被調走，把47軍的黎原調去湖南，湖南的局面就穩定了。

我一直覺得，毛主席在文革中有一個信念，他很想讓建國十七年在工作中形成的左派，像陶鑄、譚震林、王任重、李井泉、陳丕顯、劉瀾濤、陶魯筋、宋任窮、林乎加、李雪峰等等，能夠讓他們和造反派站到一起來。可是他的願望卻沒能實現。一方面是這些人不知怎麼，對造反派總是很對立；另一方面，造反派也堅決反對他們。

毛主席還特別重視那些雖然在文革中受到了造反派的衝擊，但仍能正確對待造反派的老幹部。像華國鋒、紀登奎都是因爲這樣而被重用的。河南的“二七公社”把紀登奎鬥得很厲害，可後來紀登奎上去之後，不但沒有報復他們，還主動和他們搞好了關係，因而受到了主席的表揚。可惜，在毛主席去世以後，他們中一些人又倒

向了反對文革的對立面去了。毛主席對上海的馬天水也讚賞有加，多次要調他來中央工作，祇是上海的工作太重要了，所以馬天水還是一直留在上海。主席去世以後，馬天水仍然堅持擁護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立場，這在老幹部中是很可貴的。

處理四川的問題後來我參加了，李井泉搞資反路線很厲害，四川的造反派都反對他。但四川省省長李大章這個人很不錯，不少群眾擁護他。江青也跟我說，李大章還是她的人黨介紹人。我是很想支持李大章站出來工作的。可是另一些群眾不同意。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的，盡管造反派是造劉、鄧資反路線反的，但是劉、鄧是在中央的，他們的資反路線是通過地方的領導去執行的，所以各地造反派都把這些與他們直接對抗的地方的領導，看作是自己的對立面。李大章也是因為執行過劉、鄧的資反路線，沒有少挨鬥。但他能正確對待群眾，後來結合做了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

毛主席是非常重視工人造反派的。可以說沒有工人造反派，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文革。學生祇是先鋒隊，光靠他們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有些知識分子當年也起來造反，而且他們總要處處顯示，唯有他們才是最革命的。可在文革後，不少人又都一個個成了反對甚至是堅決反對文革的人了。當年毛主席跟我們說，在知識分子中，左派最多不超過10%，我心裡還覺得主席是不是估計得太悲觀了。但歷史證明，還是毛主席正確。

我們中央文革小組有個很大的弱點，大多數人都不了解工人，所以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學生的身上。如果我們都能像張春橋那樣，與工人們建立更多的聯繫，那當時的局面就會大不一樣了。毛主席一貫的思想是要依靠工人階級，但是中央文革小組在這方面卻做得不夠。

從1967年年初，毛主席就批示，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群眾。於是，大量的解放軍參加了地方的支左工作。可是由於解放軍各軍區的領導與地方的當權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解放軍到了地方以後，所支持的是往往都是保守派，真正支持文革造反派的不多。

第二十五章 武漢“七二〇事件”

1、主席、總理對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和武漢軍區的阻抗

1967年的7月13日下午，主席召集林彪、周總理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等人開會的時候，主席提出，他要去武漢游泳。當時武漢應是天下最亂的地區，所以林彪和總理等中央領導都反對主席去武漢。大家建議主席去北戴河游泳，那裡比較安全。但主席說，天下之好水，莫若長江；長江之好水，莫若武漢。大家都知道，主席下決心要做的事，是勸不住的。主席說，這次去武漢讓楊成武跟著他去就行了。這時，汪東興提出，他也要一起去，說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保證主席的安全。主席問，你辦公廳那麼多事情怎麼辦呢？汪東興說，辦公廳的事，他會安排好的。可主席沒有同意由他自己安排，說那就交給本禹吧，由本禹任中辦代主任，並向林彪、總理徵詢意見。林彪和總理都表示同意，大家就都同意了，遂後中央發了通知，任命我為中央辦公廳代主任。

7月14日凌晨，主席就坐火車出發了。為了保證主席的安全，總理在當天一早，就乘飛機趕在主席的前面先到了武漢。由於謝富治和陳再道以前都是四方面軍的，所以總理又特地把正在西南的謝富治叫去武漢。王力是和謝富治一起到西南去的，由於王力對學生運動有些經驗，因此總理就叫王力也和謝富治一起來武漢。跟著謝富治、王力去西南的幾個“北航紅旗”的造反派戰士也同機到了武漢。

上海“一月革命”成功後，各地的造反派群眾組織，響應毛主

席、黨中央的號召，積極參與全國各省、市、區的奪權行動。但也激發了“走資派”、以及許多對毛主席發動文革運動不理解、不支持的“老幹部”，和支持他們的群眾的對立與反抗。當時一月“京西賓館事件”、“二月逆流”和地方的“二月鎮反”，都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主席此行之前，比較支持上海一月革命模式，推動了包括山東在內的華東等地區問題的解決。而中南地區，最大的問題是武漢“百萬雄師”，不但有以工人為主的幾十萬人的群眾組織，還有武漢軍區在背後支持；而造反派組織仍被打壓。主席此行到武漢，主要不是去暢游長江，而是想繼續推廣上海模式，解決武漢“百萬雄師”的問題。不過他在思路上有所調整，不是打算讓造反派一統天下，而是希望在避免武鬥的情況下實行兩派大聯合。

主席在去武漢之前，就已經看了武漢各派關於文革運動許多材料，做過一番調查研究，對解決武漢問題，主席是有一個方案的。他是希望先做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的工作，讓武漢軍區從原來支持保守派的立場上轉變過來，然後通過他們再去做“百萬雄師”等群眾組織的工作。主席認為兩派應該聯合起來，而不是簡單地把“百萬雄師”扶上來或打下去。武漢地區的“三鋼”、“三新”雖然是最早批判湖北省委資反路線的造反派組織，但他們的力量比較小。所以主席是想以軍隊為主來搞兩派的大聯合，這個方案與年初解決上海一月革命的方案有所不同。

1966年7月14日晚9時，主席到達武昌，住東湖賓館梅嶺一號。謝富治和王力到武漢後，主席找他們兩個一起談過話，一面聽取他們匯報西南的情況，一面告訴他們到武漢後，要好好進行調查研究，先聽取部隊意見，做好部隊的工作，然後再找兩派頭頭和群眾去做工作。但王力與謝富治沒有仔細去體會主席的指示，對武漢問題的複雜性，顯然缺乏認識，對先做好武漢軍區的工作，做好陳再道等人的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也沒有認識。因而對主席解決武漢對立兩派群眾組織問題的方法與思路的變化沒有理解。他從主席那裡出來就和謝富治先去大學造反派學生中發表講話，對造反派表示支持。他們很可能是看到張春橋在上海簽字承認工人造反派以後，

中央文革祇發了幾個電報，就把那裡的“赤衛隊”搞垮了。所以他以為他在武漢也可以這樣把問題解決。

1967年7月15日上午，主席召集陳再道、謝富治、王力、鄭維山等匯報情況。下午，總理在東湖賓館百花一號召集武漢軍區師以上幹部開會，武漢軍區向總理匯報了造反派十大罪狀，“百萬雄師”十大好處。這個會一直開到18日，總理根據他對武漢文革運動的了解，批評了武漢軍區，並總結了三條原則性的意見：

- 一、武漢軍區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公開檢討；
- 二、“三鋼”、“三新”等群眾組織是革命派，要以他們為核心，來團結其他群眾組織；
- 三、“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他們自己會起變化。

（以上是根據王力與一些與會者的回憶整理的。關於總理講話，現在的記錄是總理共講了八點意見。）

7月18日，總理講了三點意見以後，陪同陳再道等見了主席，隨後回京。當晚，謝富治、王力受到總理講話的鼓舞，又一起去武漢水院（時稱“紅水院”）“二司”總部與在場學生見面。19日凌晨到水院體育館，對數千學生、工人發表講話，公開表示支持造反派。武漢當年空軍領導人劉豐亦代表部隊表態。打倒“武老譚”的口號響徹全場。謝、王等人講話隨後在武漢全市反復播放。這引起武漢軍區獨立師師長牛懷龍等人的憤慨與不滿，他們回到師部，向師部各級領導和“百萬雄師”的頭頭們傳達了總理和謝、王的講話，開始策劃和布置人，準備到東湖賓館衝擊和抓鬥王力、謝富治，“給中央文革來個下馬威”。

就在獨立師和“百萬雄師”的頭頭們策劃驚天動地的抓鬥王力行動時，王力卻在造反派打倒“武老譚”的口號聲中失去了冷靜。在7月19日下午3時，王力在同謝富治一起去參加軍區黨委師級以上的幹部擴大會時，在擴大會上發表了當時絕不應該去講的許多話。

例如王力竟在擴大會上指責軍區這些養尊處優的高級領導，“對文化大革命一點不理解，像小學生一樣，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的第一課，從ABC講起。”正像一位哲人所說的，就是幾何學原理觸

犯了人們的利益，也會遭到人們的反抗。出席會議的師級幹部普遍對王力的講話反感。可能是同去的謝富治對王力的講話也覺得過分了，便在王力講話的中間，退席回賓館休息了。王力不知情理，仍然滔滔不絕地在批判不已。可以想象，王力這次講話以後，武漢軍區大部分幹部，都會支持牛懷龍司令等人策劃的去東湖賓館抓鬥王力的錯誤行動。所以毛主席在“七二〇事件”以後，批評王力說，“不好好作調查研究，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亂發表意見，是沒有不犯錯誤的。”主席還批評王力對“七二〇事件”中犯錯誤的幹部批評的態度“很凶”。但無論是主席或中央文革都不認為王力是“七二〇事件”的主導因素，“七二〇事件”的主導因素仍然是武漢軍區對中央處理武漢文革運動方針的反抗。王力的講話不過是個導火綫，沒這個講話，武漢的文革運動照樣會爆發大衝突。而且當時，獨立師的領導與“百萬雄師”的主要頭頭是知道毛主席已到武漢，坐鎮處理武漢問題。他們將矛頭對準王力，祇不過是他們的一種鬥爭策略。當時，他們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公開叫板與反對毛主席。

但當時王力的公開表態和講話確是把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激怒了。他們抓住王力為目標，說王力這是在支一派、打一派。說他是欺騙中央，偽造中央指示。當時軍區獨立師和“百萬雄師”仗著自己人數眾多，而且已經通過武鬥控制了武漢局面，用卡車運來大批人馬到東湖賓館王力的住處來抓鬥王力，後來又把他綁架到武漢軍區大院進行武鬥。在武鬥中，王力人被打傷，腳踝被踩得骨折，連胡志明主席送給他的手表和他隨身的錢包等均被搶走。接著，他們又在全市組織武裝遊行，向中央文革示威。應該說，他們中除了獨立師的領導和“百萬雄師”的一些頭頭，絕大多數人並不知道毛主席也住在東湖賓館。後來跟著王力去武漢的有些人說，當時“百萬雄師”他們是故意沖著毛主席去的。這種說法對廣大群眾來說是有沒有根據的。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後來武漢事件的的解決就絕不會那麼容易了。這一點，毛主席在離開武漢到達上海的時候就已經作出了正確的判斷。

2、中央處理武漢“七二〇事件”的經過

“北航紅旗”有個女紅衛兵叫尹聚平，她是隨王力一起從西南到武漢去的。王力被抓時，她也被抓上車。尹聚平後來說，她當時也穿著軍裝，又是個女的，年紀比較小，現場的情況又非常亂，沒人注意她。所以當車子不知爲了什麼事在一個轉彎的地方停下來的時候，她就悄悄地下車走了。然後她就跑到水利學院，趕緊找到一個電話，向“北航紅旗”負責人韓愛晶等報告說，王力被抓了。

“北航紅旗”接到尹聚平打來電話，馬上報告中央文革，這時已經是7月20日上午了。那時我們都剛開完會，回去休息了。中央文革辦事組是王廣宇在值班，他接到北航的電話以後，立即就去找了陳伯達。陳伯達那時也已經吃了安眠藥睡了。陳伯達的秘書聽說，王力在武漢給保守派的人抓了，趕緊就把陳伯達叫了起來。關鋒就住在陳伯達的樓下，於是又把關鋒拉起來。他們兩個就到十六號樓的文革會議室來商量解決辦法。我就住在十六號樓的樓上。王廣宇問陳伯達，是不是把戚本禹也叫起來。陳伯達說，不用了，我們來處理。可是王廣宇在外面等了半個多小時，還不見他們有什麼行動，於是他就上樓來找我了。我是從來不吃安眠藥的，他一叫我就起來了，問什麼事？王廣宇說，王力在武漢被人抓起來了。我一聽就急了，這不是王力的事情，毛主席也在武漢啊！我趕緊起床跑到辦公室。我看到陳伯達和關鋒正在起草一封給武漢地區造反派的信。他們準備在信中宣布武漢事件為“叛逆”。這時我就覺得有點不對頭，得趕緊去請示江青和總理。

我先直撥西花廳的紅機子。總理的值班秘書說，總理已經勞累了兩天兩夜了，剛服了安眠藥睡下。我祇好說，事情非常緊急，你一定得叫總理起來，我有特別重要的事要向他報告。你去找護士，讓她給總理準備一些可以恢復神志的藥物。

在秘書去叫醒總理的時候，我又給在武漢的汪東興打了電話。汪東興就跟我說，情況十分嚴重，好像還有部隊在向這邊運動。我說，主席那裡的情況怎樣？他說，還沒有去請示主席，不過我們警衛的力量是很強的。我們能夠應付。

這時總理來接電話了。我就說，總理，不得了啦！他們衝擊了東湖賓館，王力、謝富治已經被他們抓了（後來才知道，謝富治並沒被抓），現在就怕他們衝擊主席那裡。我剛跟東興通了電話，他們警衛都在做準備了。總理一聽說，啊？！這怎麼得了！我馬上過來。

緊接著，我又趕緊去報告江青。江青就住在11號樓，距離16號樓就兩百多米，可我還是坐了車過去。到了那裡，我先把護士許春明叫起來，讓她去叫醒江青，小許說，首長剛吃了藥入睡了，我不敢去。我說，你就說，是我讓你叫的。有特別重要事情報告，一切由我負責。

江青一聽是主席住的東湖賓館被圍，就緊張了。我看得出她心中的焦急。但是她在面上卻還是很鎮定的樣子，她讓我把情況簡單地講了一下。然後她想了一下，便當機立斷地說，這事得去找林彪！他冷靜、果斷，能處大事。於是我就立刻通知了葉群和總理，讓總理直接去林彪在人民大會堂的住處會合。又通知了康生，康生總是失眠，比較好叫。接著我就叫了文革小組的成員都上了車，跟著江青的車一起朝人民大會堂直奔而去。

到了林彪那裡，林彪已經整整齊齊地穿著軍裝坐在那裡看地圖。我一看，林彪果然是大將風度。我們把情況一講，他很平靜地說，不要緊，主席那麼高的威望，他們翻不了天的。但我們還是要做好各種的準備。現在最主要的是要摸清楚那裡的情況。

於是，總理就馬上打電話找到了汪東興。汪東興說，警衛已經布置好了幾道防線。但毛主席說，即使人衝到這邊來了，你們也絕不能開槍，無論如何不能開槍！你們要相信群眾大多數，有人衝上來了也不要緊，我自自有辦法。總理說，主席是有他的辦法的，但是我們絕不能讓主席承受任何風險。江青在電話裡和毛主席說了話，祇有在那種時候才能真正感受到江青和主席的感情有多深。江青叫

主席離開武漢。主席說，我不離開，我就不相信他們會是真的反對我。這時，林彪接過電話，用很堅決的語氣說，不行，主席必須馬上離開武漢。這是中央的集體決定！

之後，又商量的馬上派邱會作，帶著林彪和江青寫給毛主席的親筆信，去武漢勸主席馬上離開。林彪在把信交給邱會作的時候，說，你人在，這信就要在。接下來又決定了總理立即飛武漢，親自去安排毛主席離開武漢，直飛上海。

隨後，林彪向他的參謀們發出了一個一個的指令，進行軍事部署。我聽到林彪的參謀不斷在向他報告，距離東湖賓館最近的部隊的位置，以及他們到達東湖賓館需要的時間，等等。

等我們從林彪那裡出來的時候，這時，我看到長安街上已經貼滿了聲討陳再道的標語了。前後才半天的功夫，大字報和大標語就貼滿了整個北京城。有的標語上把“陳再道”，寫成“陳賊盜”，“打倒大軍閥陳賊盜！”沒過多少時間，很多學校的紅衛兵就上街游行了，他們高喊著口號，“陳再道反對中央文革，罪該萬死”。沒過多久，部隊的大標語也貼出來了，“打倒三反分子陳再道！”、“陳再道反對毛主席，反對中央文革，罪該萬死！”等等。很快，在全國的所有大、中城市也都行動起來了。大字報、大標語、大游行。

當初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發動紅衛兵造反的時候，我其實還是不很理解的。碰到了這個事情，我才明白了主席的高明。群眾力量是偉大的，有全國廣大群眾的支持，你想要搞政變，沒有那麼容易。你那裡還沒有把東湖賓館包圍住，全國就行動起來了。陳再道這些人總得有所顧忌的吧。

在回來的路上，江青說，我說去找林彪，沒錯吧。

3、北京舉行聲討武漢“七二〇事件”的大會

1967年7月22日上午，江青跟我說：王力在武漢到底講了些什

麼話，是不是他把事情弄壞的，咱們還不知道。但不管怎樣，武漢“百萬雄師”公然反對中央文革，那我們就要明確地表明我們的態度。在接到王力已被空軍部隊救出的消息後，江青要我布置工人、學生和機關幹部準備去機場迎接謝富治、王力回北京。

我在布置的時候，心裡一直在懷疑是王力亂講話，捅出了大漏子。我對關鋒說，王力闖了這麼大的禍，還要我們去歡迎他，不知道他心裡會怎麼想。關鋒說，不用分析就知道，他一定知道自己闖了禍，現在心神不安，七上八下，還不知中央會怎麼樣處理他呢。

總理和謝富治、王力是分乘兩架飛機從武漢回北京的。總理在飛機上聽說下面有很多人在歡迎王力、謝富治回京，就叫謝富治、王力的飛機在空中轉圈，他自己先下了飛機，隨後他也一起加入到歡迎的隊伍中去。等王力下了飛機，就坐在了輪椅上，總理和江青站在兩邊迎接他，一副歡迎英雄歸來的樣子。我跟關鋒說，他還一付挺得意的樣子，這個人沒救了。關鋒勸我說，你別這樣，他挨了打，還堅持革命，也算不容易了。要是叫你去，碰上那些蠻不講理的“熊師”，你怎麼辦？我說，是，“熊師”也不是僅僅對著王力的。但他去外面也應該謙虛謹慎，講話也應該請示一下呀，他走了這麼長時間，沒聽到他向文革小組做過一個像樣的匯報。

王力回到北京以後，看到中央文革組織那麼多人歡迎他，就丟棄了不安情緒，人也活躍起來了。新華社的人要他去講講事件的經過，他就給新華社作了一個報告。說那些人怎樣打他，他又是怎樣臨危不懼，大義凜然。他還說了這樣一個情節，說他聽到部隊裡那些打他的人在說，“老頭子”也在這裡，我們馬上找“老頭子”去。他說他懷疑他們所說的“老頭子”是指毛主席。

我問關鋒，王力說的是否確實？關鋒說，不管確實不確實，他這樣說法都不好。按他這個說法，那武漢的部隊和群眾反對的就不是王力、謝富治，而是毛主席了。這問題可就大了。我說，我認為廣大的部隊指戰員和群眾對毛主席都是擁護的，不可能有那麼多人反對毛主席。如果他們真的是反對毛主席，也不敢當著王力的面這麼說出來的，那不是自我暴露嗎？所以，我後來就對王力說，你

不要再講什麼他們是反對毛主席了，講反對你就夠了。就是確實講了，也不能對群眾這樣說。這不是損害毛主席的威信嗎？我還對王力講，你也別再到處去作報告了。總理、江青去接你，那不是為了樹立你當英雄，而是為了維護中央文革的威信。你這樣到處去說，把自己說成是英雄了。英雄哪有自己說的，英雄要讓別人去講的。王力倒是很虛心聽了我的意見。

中央文革碰頭會開會討論決定，7月25日在天安門召開群眾大會，聲討制造武漢“七二〇事件”的“百萬雄師”。總理請示了主席，主席表示同意。在開會討論的時候，葉群也參加了，會議並沒有安排林彪參加大會。可是，臨要開會時，葉群打電話給我，說，林總經過反復考慮，認為他還是來參加大會，表個態為好。我說，那當然最好嘍。我連忙把林彪要參加大會的事向在上海的毛主席作了匯報。過了一會兒，汪東興給我打來電話，說主席要他也上天安門參加大會。我說，你別開玩笑，你人都不在北京，怎麼上天安門？他說，不是我要上，是主席讓我上的。連楊成武也要上。他說，不是人要上天安門，而是在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領導名單上，要有他們的名字。汪東興、楊成武都是跟在主席身邊的人，他們的名字出現在登上天安門的領導名單裡，就表明了毛主席身邊的人也參加了聲討大會。這意義不一般。

在7月25日那天，參加大會的有幾十萬人。那天林彪還來得特別的早。平時中央開大會，林彪一般都不參加。有時請他來，他也不多表態，祇是跟著主席的表態而表態的。但不知什麼原因，他在那天表現得非常積極。我還沒見到他在別的事情上這麼積極過。他那天在天安門上跟我們說了很多話。他說，這件事一定會使右派更快地分化。武漢問題不祇是武漢問題，武漢問題是全國的問題。以前我正愁沒題目做文章，現在他們給我們出了題目，我們要做大文章，把壞事變成好事。還說，陳再道的這個部隊過去是四方面軍的，是徐向前領導的。謝富治也是四方面軍的，謝富治還是他們的首長。現在他們連謝富治的話都不聽了，那一定是有比謝富治還高的人在背後支持。

在這次大會上，就有人提出了“打倒軍內走資派”的口號。本來在“五一六通知”裡，就已經有毛主席親自增加進去的“混進黨裡、政府裡和軍隊裡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提法了。所以，我對這個口號也不是太在意。可沒想到，正是這個錯誤口號首先導致了王力、關鋒的倒臺，當然他們的倒臺還有原因。

大會的當天晚上，就有人去徐向前和徐海東的家附近去游行、示威喊口號。後來，在秦城審判我的時候，他們說，這件事是我指揮人幹的。其實我確實沒有主動指揮去幹這件事，江青也沒有給過我這個任務。這件事我又確實知道並支持過，雖然它確實不是我指揮的。那天開完大會後，是葉群拉著我到文革辦事組，指揮著讓“北航紅旗”等造反派組織叫人去的。當時是葉群具體告訴我們叫紅衛兵去那裡那裡的。葉群當時在文革辦事組裡這麼指揮人做這件事，我在旁邊當時也祇能配合著她，而江青當時也在場。現在葉群已經死了，他們要把這件事的責任全推在我的身上，我也祇能認了。反正事情都過去許多年了，我覺得更多地辯白也沒有什麼意義了。

4、批鬥陳再道

總理回到北京後，經常同在上海的主席商量，怎麼處理陳再道？總理說，是否宣布他們是叛逆。主席不同意，說，不要這樣說。我看他們並沒有下決心來反對我。他們要是真的下決心反對我，調幾個師把東湖賓館圍起來，我們就出不來了。

7月23號中央打電報通知陳再道、鐘漢華等人來北京開會，討論他們的問題。24號凌晨陳再道和政委鐘漢華一行數人抵達北京，總理把他們安排在京西賓館。

陳再道他們一住進京西賓館，首都的工人、學生、機關幹部，起碼有兩、三萬人，把京西賓館包圍得水泄不通。這件事倒跟我有關係，是我讓中央文革的文藝組動員了不少人去參與了包圍。當時

大家都很關心這個事，都對陳再道感到非常憤怒，所以我跟他們一說，陳再道就住在京西賓館。文藝組的金敬邁就說，我們去造他反去！他把文藝組、各個藝術學校和樣板劇團統統帶上。金敬邁動員的人至少在萬人以上。還有上萬人都是穿著軍裝的，那是葉群動員去的。另外還有一些工廠、學校的，那是群眾自發去的。

這幾萬人先是喊喊口號，後來就衝進大樓了，他們要去抓陳再道。按照總理的意思，陳再道是中央把他請到北京來開會的，不能抓他們。而且既然請他來了，就不應該再去包圍人家。你把他包圍起來，這就好像是事先設了個圈套讓人家來鑽，那是中央失信了，這個不好。況且，這麼多人衝進去，陳再道真要被抓走了，搞不好就會把他打死。所以，總理命令傅崇碧去想辦法保護陳再道。傅崇碧讓警衛戰士把陳再道等人放到一部電梯裡，然後把電梯停在兩個層樓的中間，這樣上下都够不著了。

傅崇碧很聰明，他一看群眾中有好幾個他認識的樣板劇團的演員，“老三軍”的代表，就報告總理說這事跟戚本禹和葉群有關。總理就把我找去了，問，是不是你動員人去揪陳再道的？看到總理很不高興的樣子。我就老老實實地說，是我給文藝組的人透露了一點消息。總理就說，你馬上讓他們走！這怎麼行啊？我們中央讓人家來開會，你弄了那麼多的群眾來包圍，萬一群眾激動起來，把他打傷了、打死了，我們怎麼跟毛主席交待？！我一聽，也覺得緊張了，就趕緊通知金敬邁，讓他趕緊把人撤走。接著，總理又叫葉群撤人。

在開會時，總理又拿這事批評我和葉群，說，怎麼不經過中央同意，你們就找人去包圍京西賓館？我知道錯了，就當眾給總理再次認錯。可葉群不高興了，她頂總理說，他們在武漢把毛主席都包圍了，我們去包圍他一下有什麼不可以啊。我們也是為了保衛毛主席，表示我們的忠心嘛！總理說，你表示忠心當然可以，但也不能不經過中央同意，就衝進去抓人，要真出了事，我怎麼跟主席交待？葉群說，我們也沒真抓他，我們祇游行示威，嚇唬嚇唬他也不可以嗎？總理說，示威可以，但你們能控制得了局面嗎？葉群說，

我們不進去抓人，就叫人在門口走走，喊喊口號，這總可以吧？他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毛主席，我們喊幾句口號還不行嗎？

老實說，也祇有葉群敢頂總理，我是不敢頂總理的，我要是頂總理，那江青就會找我了。由於葉群的堅持，總理就說，那你們就去喊喊口號吧，但不準衝進賓館，不準抓人。總理還說，到時候，他們去示威，你們中央文革的人也一起去看看，免得出事，萬一有什麼事，你們要負責的。那天晚上，葉群就又組織人在京西賓館門前舉行了游行示威。江青、陳伯達陪著葉群坐在車裡到京西賓館的邊上去看了。晚上的游行，隊伍就很有秩序了，不像上午那樣把京西賓館包圍得水泄不通，而是沿著賓館門前的路走走，喊喊口號。不料，江青、葉群他們坐在車裡，被游行的群眾認出來了，車被群眾圍了起來。這時我急忙下車去找傅崇碧，讓他派人來指揮疏散群眾，為她們解了圍。她們回到釣魚臺以後都埋怨總理，說是上了總理的當，他叫我們去看看，結果差點就出不來啦！

接著是在京西賓館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批判陳再道。八大軍區的司令，除了許世友，其他的都來了。當時許世友還在華東，他要負責主席的安全。陳再道在京西賓館的房間門口有戰士看守，但也算不上是軟禁，他有自由，可以和來參加開會的韓先楚等人聊天。

在批判會上，陳再道極力否認是他指揮軍區獨立師、“百萬雄師”去包圍東湖賓館的。他說他祇是對王力有意見，但絕對不會去反對毛主席。他說，我們保衛毛主席還來不及呢，哪敢去反對毛主席？給我一百個膽，我也不敢反毛主席。我要是反對毛主席，那老百姓還不一人一口把我咬死啊！我看陳再道講這些話的時候，態度挺誠懇的。我相信他還沒有下決心反對毛主席，更不敢去加害毛主席。但是，他真的沒有通過包圍王力給毛主席施壓的意圖？我就不相信了。還是主席講的，他祇是還沒“下決心”。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軍隊的批鬥大會，這個會不是很文明，甚至比地方還不文明。在會上的發言，也是一個嗓門提得比一個高的，罵人的聲音很大，而且粗話不斷。我看江青坐在那裡都聽不下去了。吳法憲還上去揪住陳再道的耳朵，打了他兩個耳光。在休會的

時候，我還看見吳法憲叫服務員讓陳再道在邊上罰站，又去摘掉了他軍帽和衣服上的帽徽和領章。但並沒有後來所謂的紀實文學中所描寫的拳打腳踢的場面，那全是瞎編的。

不過，陳再道在他的檢討中卻是說出了他的心裡話。他說，他心底裡是非常痛恨造反派的。本來過得好好的日子，平平安安的。可造反派一起來就全亂了。所以，他真是想把他們都抓起來槍斃。

聽了陳再道說的話，我當時就想，怎麼共產黨的幹部當了權以後，就變成這樣了呢。

主席在一開始的時候，對“七二〇事件”的性質也沒有弄清楚。到了上海以後才弄清了一些情況。後來主席在寫給武漢軍區的信裡，還是稱陳再道為同志。總理看到主席的電報以後，立刻就下令撤除了看守陳再道的士兵。陳再道就住進有大客廳的套間，待遇和其他中央首長一樣了。

“七二〇事件”以後，主席很關心部隊對這件事情的反映，他讓我們去了解。我布置了文革快報組的記者到各地的部隊去收集情況。下去了解情況的記者很快就有報告上來，說部隊裡有一些人對這件事情抱著幸災樂禍的態度。他們聽到福州軍區有人在食堂吃飯的時候就公開說，這下好了，中央文革有熱鬧好看了。這些情況，我都及時地報告給了毛主席。

第二十六章 關鋒和王力

1、《紅旗》雜誌1967年的“八一”社論和評論員文章

主席在“七二〇事件”發生後不久，給武漢軍區的指戰員寫了封信，主席在信上說，“對於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包括你們和廣大革命群眾所要打倒的陳再道同志在內，祇要他們不再堅持錯誤，認真改正，並為廣大革命群眾所諒解之後，仍然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同時，主席跟總理說，“武漢的問題，應當作為內部錯誤來處理，因為陳再道並沒有下決心反對中央，否則我們就出不來了。”

但主席的這些指示沒有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會上進行認真討論。所以陳伯達、王力、關鋒，還有林傑參加，在為這一年的八一建軍節所寫的《紅旗》雜誌社論中，非但沒有很好地宣傳毛主席對“七二〇事件”所作的上述指示，反而在文章中號召全國人民掀“軍內一小撮走資派”。在同一期的《紅旗》雜誌上刊登的一篇評論員的文章則更厲害，它的題目就是“向人民的主要敵人開火”。這就意味著，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鬥爭方向，要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派”轉向“軍內一小撮走資派”了。

當時的《紅旗》雜誌社論和評論員文章，對全國運動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是指導運動方向的。所以按照規定，重要的社論都是必須經過中央的討論，有的還要經過主席的批准。因此像這樣不經過毛主席、黨中央的批准，就擅自在一篇社論中，提出改變鬥爭的大方向和主要敵人的指向，確實是干擾主席的戰略部署的嚴重錯

誤。社論發表之後，已經有一些地方的群眾是這麼理解的了，許多地方都已經開始動起來了，提出要搞第二次大串聯，要第二次大亂了。如果真這麼搞起來，那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士兵們都是拿著槍的，你發動他們起來造反，他們的對立面也會拿起槍來，那不等於號召武裝鬥爭嗎？如果再有幾個軍區出現類似“七二〇事件”這樣的事件，那全國局面就亂了。

2、王力的“八七講話”

從文革開始後，外交部有許多幹部，還有外交口院校的許多學生，起來造外交部長陳毅的反。但總理是極力保護陳毅的，主席其實也是保他的。而陳毅的個性很強，有些不把造反派放在眼裡，種種原因使他同下面造反的群眾的對立情緒亦愈益激烈。

“二月逆流”以後，陳毅在黨內受到了批評，外交部造反派就提出要鬥爭陳毅，打倒陳毅。總理曾叫我和陳伯達到外交部接見一下造反派，告訴他們外交無小事，不能因為造反而影響部裡的正常業務。告訴造反派，可以給陳毅提意見，但要支持陳毅的工作。

4月底，姚登山從印度尼西亞回來。一次會議上姚登山問我，陳毅要不要保？我說：保不保，是要由中央決定。群眾批判陳毅是可以的，大方向是對的。現在陳毅是應該給學生做個檢討，以緩和雙方的對立情緒。

在8月初，姚文元從上海打電話給我，傳達了毛主席在上海接見外賓時說的話，毛主席說，“對陳毅鬥鬥也可以嘛，打倒一下也沒什麼，打倒了還可以再保的嘛。”當時我把毛主席的這些話寫成了文件，給總理及中央文革的成員都看過。總理指示，要我和關鋒根據主席的指示精神去外交部給他們講了次話。在我們的講話中都是按照主席的意思來講的。但是外交部的造反派聽了我們的講話以後，並不滿意。因為到底陳毅可不可以打倒，並沒有明確的說法。

第二十六章 關鋒和王力

1、《紅旗》雜誌1967年的“八一”社論和評論員文章

主席在“七二〇事件”發生後不久，給武漢軍區的指戰員寫了封信，主席在信上說，“對於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包括你們和廣大革命群眾所要打倒的陳再道同志在內，祇要他們不再堅持錯誤，認真改正，並為廣大革命群眾所諒解之後，仍然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同時，主席跟總理說，“武漢的問題，應當作為內部錯誤來處理，因為陳再道並沒有下決心反對中央，否則我們就出不來了。”

但主席的這些指示沒有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會上進行認真討論。所以陳伯達、王力、關鋒，還有林傑參加，在為這一年的八一建軍節所寫的《紅旗》雜誌社論中，非但沒有很好地宣傳毛主席對“七二〇事件”所作的上述指示，反而在文章中號召全國人民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在同一期的《紅旗》雜誌上刊登的一篇評論員的文章則更厲害，它的題目就是“向人民的主要敵人開火”。這就意味著，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鬥爭方向，要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派”轉向“軍內一小撮走資派”了。

當時的《紅旗》雜誌社論和評論員文章，對全國運動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是指導運動方向的。所以按照規定，重要的社論都是必須經過中央的討論，有的還要經過主席的批准。因此像這樣不經過毛主席、黨中央的批准，就擅自在一篇社論中，提出改變鬥爭的大方向和主要敵人的指向，確實是干擾主席的戰略部署的嚴重錯

誤。社論發表之後，已經有一些地方的群眾是這麼理解的了，許多地方都已經開始動起來了，提出要搞第二次大串聯，要第二次大亂了。如果真這麼搞起來，那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士兵們都是拿著槍的，你發動他們起來造反，他們的對立面也會拿起槍來，那不等於號召武裝鬥爭嗎？如果再有幾個軍區出現類似“七二〇事件”這樣的事件，那全國局面就亂了。

2、王力的“八七講話”

從文革開始後，外交部有許多幹部，還有外交口院校的許多學生，起來造外交部長陳毅的反。但總理是極力保護陳毅的，主席其實也是保他的。而陳毅的個性很強，有些不把造反派放在眼裡，種種原因使他同下面造反的群眾的對立情緒亦愈益激烈。

“二月逆流”以後，陳毅在黨內受到了批評，外交部造反派就提出要鬥爭陳毅，打倒陳毅。總理曾叫我和陳伯達到外交部接見一下造反派，告訴他們外交無小事，不能因為造反而影響部裡的正常業務。告訴造反派，可以給陳毅提意見，但要支持陳毅的工作。

4月底，姚登山從印度尼西亞回來。一次會議上姚登山問我，陳毅要不要保？我說：保不保，是要由中央決定。群眾批判陳毅是可以的，大方向是對的。現在陳毅是應該給學生做個檢討，以緩和雙方的對立情緒。

在8月初，姚文元從上海打電話給我，傳達了毛主席在上海接見外賓時說的話，毛主席說，“對陳毅鬥鬥也可以嘛，打倒一下也沒什麼，打倒了還可以再保的嘛。”當時我把毛主席的這些話寫成了文件，給總理及中央文革的成員都看過。總理指示，要我和關鋒根據主席的指示精神去外交部給他們講了次話。在我們的講話中都是按照主席的意思來講的。但是外交部的造反派聽了我們的講話以後，並不滿意。因為到底陳毅可不可以打倒，並沒有明確的說法。

王力從武漢回來以後，是被當作英雄看待的，可他自己卻不知道其實他在武漢是有錯的，主席已經對他不滿意了。他聽說外交部的兩派對我和關鋒的講話不滿意，就自告奮勇地在8月7日那天，把外交部的兩派的代表人物都找到釣魚臺來和他們談話，這就是後來被稱作爲“王八七講話”。他的講話被姚登山他們記錄了下來，回去就把它在紅衛兵的小報上登了出來。其中最主要的一句有問題的話就是：外交工作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紅衛兵也可以當外交部長嘛。

本來總理已經代表中央作了宣布，中央各部委的權力是屬於中央的，紅衛兵可以參與監督，但業務權不能奪。所以，王力的講話就出格了。但是後來在申辯中，王力說他並沒有講過紅衛兵也可以當外交部長這些話。

1967年8月22日，離王力“八七講話”才兩周時間，外交部造反派和首都紅衛兵一萬餘人，爲抗議港英當局壓制香港愛國新聞人士，聚集在北京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召開“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當時周總理在群眾強烈要求下簽批發了一個“對英國政府的48小時最後通牒”。8月22日是最後通牒到期日，可是英方沒有答復。於是，造反派衝進了英國代辦處，還放火燒辦公樓（被救）。這件嚴重的外交事件有清華“414”這一派紅衛兵的參與。清華“414”是清華大學蒯大富井岡山兵團分裂出來的對立面。但中央從總理到江青，當時未加區分地認爲是造反派紅衛兵幹的，背後又很可能是王力等人指揮的。其實，這事並不是王力叫做的。周總理把這件事看得很重。其實這件事的發生與他簽發“最後通牒”考慮不周有很大關係。

這件事情發生後，總理就寫了封信，通過楊成武帶給了在上海的毛主席，向他報告了北京所發生的事情，包括了《紅旗》雜誌的八一社論和評論員文章；王力的“八七講話”；“火燒英國代辦處”以及群眾“包圍中南海”的情況。毛主席看了總理送去的材料，很快就作出了認真糾正運動中錯誤傾向的指示。

3、王力、關鋒受審查

8月26日楊成武從上海回到北京，他一回來就馬上向總理、江青傳達了主席的指示。

當晚，在釣魚臺16號樓，由總理主持召開了中央文革碰頭會。參加的人有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戚本禹、姚文元。沒有叫王力、關鋒參加。會上，總理傳達了主席的指示，批評了王力、關鋒。說他們的主要錯誤，一是鼓動在外交部的奪權，外交部是國家的權力機關，這事關係到國家的聲譽和形象，王力說紅衛兵可以奪外交部的權，是非常錯誤的；二是《紅旗》雜誌兩篇文章，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錯誤口號。接著總理當場宣布了主席的決定，對王力、關鋒進行隔離審查，對外則稱“請假檢討”。

隨後江青對我說，你去叫王力、關鋒來開會。我讓秘書去15樓通知關鋒過來開會。我自己跑到16號樓的樓上去接王力下來。王力的腿傷還沒有好，不能走路，我用輪椅推著他到了樓梯口，然後攙著他一步一步走進會議室。

在向他們傳達了主席的指示和會議的決定以後，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對他們的錯誤作了批評。陳伯達見到問題嚴重了，爲了撇清自己的責任，便說這兩篇文章他都沒有看過，是王力、關鋒擅自決定發表的。關鋒在會上說，那兩篇文章是他叫《紅旗》雜誌編輯林傑，根據他和王力的意見起草的，然後他和王力作了修改審定。他們應該爲這個錯誤承擔責任。但他說，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錯誤，有一點是要講清楚的，這篇文章最後是經過陳伯達批准才發表的，而並不像伯達同志說的是他們擅自決定發表的。可是陳伯達不承認，他說：“毛主席說我是劉盆子，人家早就把我當劉盆子啦。我根本就沒看過這篇社論，他們就發了。”關鋒就說，這篇文章明明就是你簽發的，而且你還在上面還作了一些文字改動，在稿子

上還有你親筆加的一句話，“舉起你的雙手，迎接階級鬥爭新的大風暴吧！”你怎麼都不記得了呢？

於是總理就當場叫人去把原稿調來，可原稿被陳伯達拿走，找不見了。總理又叫他的秘書去陳伯達辦公室找，結果找來了，上面清清楚楚是陳伯達在審稿時寫的字，而且陳伯達還寫了“照發”的批語。這下子陳伯達沒辦法了，就又推說當時自己吃了安眠藥，糊裡糊塗的，忘了。

盡管大家都清楚是怎麼回事了，但是大家也明白，這件事在當時是不能讓陳伯達來承擔責任的。陳伯達是中央文革的組長，把他拿下來，震動就太大了。所以，總理就在會上說了，看來這篇文章是經過伯達同志同意的。但陳伯達說他當時是吃了安眠藥，頭腦不清楚，也情有可原。關鋒、王力同志當時應該把文章交給其他中央領導去審查的，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所以關鋒、王力同志仍負有主要責任。

接著又討論了王力的“八七講話”。

王力在會上否認他說過“紅衛兵也可以當外交部長”這些話。總理就把那天外交部作的傳達紀錄和紅衛兵的小報都調來，有的材料上面有這話。雖然也可能是記錄的誇大記憶，但畢竟是已經在外面造成很大的影響了。

隨後，江青就叫我把他們兩個帶離會議室，送到總理、江青叫我預先為他們準備好的釣魚臺2號樓進行隔離審查。當時釣魚臺2號樓是空著的，我就把他們兩個安排在了那裡。去前，我特意問了總理，給他們兩個什麼待遇？總理說，還是首長待遇。我把王力和關鋒安排好之後，又回到了會議室，向總理、康生、陳伯達、江青等匯報了安排的情況，和他們兩人表示願意認真檢討錯誤的態度。總理對我說，你有空經常去看看他們，關心一下。隨後總理就離開了會議室。康生和陳伯達也跟著走了。等他們都離開之後，江青突然嚎啕大哭起來了，哭得很傷心，在場的張春橋、姚文元和我都感到十分驚訝。姚文元也跟著流了淚。

4、毛主席在我的檢討書上寫的批示

楊成武回到北京的那天，在他向江青傳達主席指示的時候，我也在邊上。會後楊成武跟我一起到了我的辦公室。這是他第一次來我這裡。楊成武對我說，主席向我問起你了，說，戚本禹近來表現如何？我當時給你說了好話，我說戚本禹是忠於主席的，是跟著主席幹革命的，我講了你寫的文章，戰鬥性很強，作用很大。主席說，你在年輕人中是比較有思想的人，說你跟王力他們是不一樣的。楊成武來我辦公室的時候，我的秘書都在場，而且這次會面也記入了我的工作日志。但我從秦城出來後，看到楊成武對採訪他的人說，主席那時就說，戚本禹是壞人。我想如果主席真說了這話，那楊成武當時就不敢到我辦公室來說那番話的。實際上主席對王力、關鋒究竟是怎麼說的，也有不同的說法。徐業夫告訴我的是，他聽主席說，王力、關鋒二人犯了錯誤，要反省。為此我出獄後還給楊成武寫過封信，問他主席當時究竟是怎麼說的？為什麼他當時說的與後來同記者說的不一致？他一直没有回復我。

那時，江青也對我說，這次你高興了，沒有你的事了。但你也注意哩。這次你得感謝馬克思的在天之靈，讓你躲過了一劫。我看到當時江青很為我躲過一劫而高興。

在王、關被隔離後不久，總理跟我說，你應該給主席寫個檢討了。江青也讓我寫，於是我就寫了封信給主席。我在信裡面說到，這次關鋒、王力犯了很嚴重的錯誤，他們所犯錯誤的表現形式是“左”傾盲動……我對他們的有些問題沒有察覺出來。王力在外交部問題上犯的錯誤，就同我有關。我從心裡願意努力改造自己，永遠做一個忠於毛澤東思想的小兵。”

沒過幾天，徐業夫就從上海給我帶回了毛主席在我信上作的批示：

“已閱，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便時，請你告知關、王二同志。九月七日”

我把主席的批示，拿去給總理、康生、陳伯達和江青都看了。他們也都在上面畫了圈，但都沒寫什麼。祇有總理寫了個“閱”字。但是，讓我感到奇怪的是，以往祇要主席作出了批示的文件，總理都會馬上把它作為中央文件印發的。可這次總理沒有。

我問江青，是不是可以把主席的批示給王力和關鋒看。江青說，你拿去給他們看好了。我說，我一個人去恐怕不合適，是否叫個人陪我一起去？江青說，讓春橋陪你一起去吧。於是我就和張春橋一起去了。王力、關鋒看了主席的批示，都感到非常高興。

自從王、關被隔離，我就有一種無所事事的感覺了。我很少出去，有些會議我也不去參加，省得別人有想法。這時張春橋對我說，你錯了，越是這種時候，你越是要出來亮相，這樣那些見風使舵的人才不好落井下石。王、關被隔離後的第一次中央召開的群眾大會，我沒去參加，外面馬上就貼出標語：打倒“王、關、戚”。以後的會議我去參加了，外面的標語就沒有“戚”了。所以，從那以後所有的會議我都去參加，一直到我被打倒。

1967年的國慶前，毛主席回到了北京。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作了分工：張春橋起草林彪的國慶講話；姚文元起草國慶社論；我負責整理主席視察大江南北時的講話。

我因為參加過《毛選》的校對工作，對主席的語言風格比較熟悉，所以我把各地整理出來的和報上登載的主席講話拿來作了匯總。我發現主席講話的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提出要實行革命“大聯合”，也就是各派都要參加掌權，而不是支持一派去壓倒另一派了。這實際上是個戰略思想上的大轉變。我想，毛主席下那麼大決心打倒王力、關鋒，就是為了要實現這個新的戰略思想。主席看了我整理的東西是滿意的，在我送上去的整理稿上劃了道道，圈了圈。基本沒作多少改動，就拿去發表了。

在春橋起草的林彪國慶講話中，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引述了毛主席的“要鬥私批修”這句話。可是在最初的稿子上寫的是，

“要批修鬥私”。我提了個建議，革命總是先內而後外的，而且從邏輯上講，總要先把自己的私心去掉了，才好去批修。所以改為“鬥私批修”比較好。春橋覺得有道理，主席和林彪也說好。於是就把“批修鬥私”改為“鬥私批修”。

5、關於王力的《反思錄》

康生在王力受審查的時候，曾提出過王力有一個參加國民黨的歷史問題。王力解釋說，那是他在東北軍工作的時候，受地下黨組織的指派而參加的。王力還說，當時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是谷牧。後來谷牧專門寫了個證明材料，說有這事，當初是組織上為了工作需要，叫他加入國民黨的。這件事使我對谷牧的印象很好，盡管在對待文革的態度上，大家的意見不同，但他沒有在王力倒臺的時候踹上一腳。

江青原來對王力並不熟悉。他是在參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時候，康生把他從北京帶到上海時才與江青認識的。王力為人爽朗，處事靈活，口才特好，但是說話常有水份，所以江青不太適應他，說他像三國的馬謖，“言過其實”。一次，江青還悄悄對我說，你別看王力那麼慷慨激昂，將來文化大革命運動要是出現挫折，他也許不如關鋒呢！關鋒有點倔勁，不容易屈服。唉，江青看人有時也挺有眼光的。

我在1986年從秦城出獄後，在王力的《反思錄》出版後不久看到了這本書。本來，一個人對自己以往的事情作出回顧，對一些問題作出重新思考，不管他的觀點如何，都是無可厚非的。但必須符合客觀事實，這是最起碼的。

可是我在王力的《反思錄》中，卻看到他不少罔顧歷史事實，刻意去迎合鄧小平之需要的地方。

比如，王力在《反思錄》中有一章，專門是說毛主席1967年7月在武漢曾單獨找他談話，說什麼如果林彪身體不好，他還是想用

鄧小平的。接下來又說了些主席贊揚鄧小平的話。

毛主席那時確實說過，要把鄧小平與劉少奇分別開來的。但是關係到接班人這樣的敏感話題，主席怎麼可能在那種時候，去隨便給一個他並不太熟的人說呢？如果當時這話傳到林彪的耳朵裡去了，那會怎麼樣呢？那個時候，主席還是信任和倚重林彪的。再者，就我所知，那時，除了江青、康生之外，主席很少單獨召見過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我有時單獨去見主席，那是因為中央秘書局的工作需要。祇是後來在上海的時候，主席曾單獨召見過張春橋、姚文元。但主席從未單獨召見過王力。

從另一方面來講，中央有嚴格的規定，如果主席真的跟王力說了什麼重要話，那王力應當馬上把主席的講話向中央常委匯報，而且不允許私底下去跟別人說。王力在中央工作時間不短，他應該很懂得這些紀律的。

但是，王力為什麼要無中生有地編造出這些東西，一開始我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後來聽人說，鄧小平在1978年重新上臺後，曾派鄧力群去秦城跟王力談了兩次話。鄧力群告訴王力，鄧小平說了，現在就是要重用像王力這樣的人。現在需要他這樣的知情人出來說話。我想，王力的這些東西應該就是這麼出來的。

可是後來鄧小平並沒有重用王力。我所知道的原因是，就在這個時候，有人出來揭發王力，這人把一些情況告訴了鄧小平，說當年揭發、批判鄧小平，王力是最起勁的一個。而且王力在中央開會批判鄧小平的時候，有時不叫鄧小平的名字，而是以“矮子”為代稱。

此外，陳雲是堅持要開除王力黨籍的。所以，盡管王力大講鄧、陳的好話，可結果還是被人家“雙開”了，落得個“裡外不是人”。他在《反思錄》裡自詡“留得清白在人間”，其實是越留越不清白。

王力對陳雲對他的落井下石很不滿意。他在反思錄中上說道，“陳雲是很有馬克思主義的，但在這個問題上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

王力在反思錄裡還說，中央的大部分的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又說文革時的社論大部分也是他起草的，這些都是誇張之辭。事實上，在中央文革小組各路英雄好漢中，王力是比較缺乏思想的。王力的長處是記錄速度快，當時都稱他“王快筆”。大家在一起討論文章時，一般都是王力記錄，這樣一來，留存下來的文稿很多都是王力的筆迹。王力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口才好，別人提出的觀點，叫他去講，他能轉述得比你講的都好。但你要他自己提出一些新思想來，那就很難。

王力說，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六個要點也是他總結出來的，這誇張得太離譜了。在這件事情上，關鋒、張春橋、姚文元的貢獻比他大得多。

6、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完整表述

大約是在1967年5月，毛主席在討論修改《偉大的歷史文獻》——紀念“五一六通知”發表一周年的文章時說，今年是蘇聯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乘這個機會，把蘇聯變修的問題在理論上說清楚，有些事情還可以結合我國的文革來講。要寫一篇用馬列主義論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文章。

這篇文章就交給了陳伯達和我們幾個人來起草。我們公推關鋒為主要起草人。關鋒說，這文章很難寫，而且時間又很倉促。所以，在那段時間裡，關鋒經常把自己關在釣魚臺的房間裡冥思苦想。他的秘書說，關鋒怕別人打擾他的思考，一般不接電話。

在起草的過程中，我和王、關三人經常在一起進行討論。一般都是關鋒為主，即由關鋒談他的構思、王力作記錄，我也不時提出一些我的想法。

記得當時有一本書，是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寫的，叫《新階級》。它裡面寫到，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共產黨掌握了國家

政權以後，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個新的特權階級。他們掌控了國家的一切資源，結果，“與以前的革命相反，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但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

我看了以後，覺得吉拉斯所說的情況與我們國家出現的情況是很相似的，說得也是對的。可是為什麼要批判吉拉斯是修正主義呢？關鋒說，這不矛盾。吉拉斯是說在社會主義裡面出現特權階級是必然的。並以此來整個地否定社會主義。我們則認為這並不是必然的，可以通過“文化大革命”來阻止特權階級的發生和發展。

到8月下旬，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的時候，這篇文章的草稿已經完成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第一次對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想做出了比較完整的表述。

後來，王力、關鋒受審查後，陳伯達、姚文元、張春橋繼續對這篇文章進行了修改。我看到陳伯達、姚文元把毛主席關於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六個理論要點排印了出來給主席。主席看了並批示：“內件已閱，修改得好，可用。”

1967年11月6日，這篇文章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兩報一刊”），紀念蘇聯十月革命50周年的社論：《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公開發表，在國際、國內影響巨大。這篇文章同5月份紀念“五一六通知”的《偉大的歷史文件》以及國慶社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是文化大革命中論述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思想的三篇非常重要的文件，三篇文章均經毛主席批閱、修改。毛主席指示，在論述繼續革命思想時，不僅要引用他的話，還要多引列寧的話，要緊緊聯繫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原理。關鋒等積極執行主席指示，一再地引述了列寧關於小資產階級“每日每時地、經常不斷的、普遍地和大量地產生著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論述。

在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之後，江青說，王力、關鋒對文化大革命是有功的，尤其是關鋒在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總

結“毛主席繼續革命理論”上所作的貢獻，不應該否定。

我從秦城出獄後，去看關鋒。我和關鋒講了江青在他被隔離後曾號啕大哭的事，和說他對文革有功的肯定。關鋒思考了一下說，他相信江青的哭和對他的肯定是真實的，大家畢竟在一起戰鬥過這麼長時間，還是有感情的。關鋒說，江青是有缺點和錯誤的，而且有的錯誤還挺大。但同時他對江青的評價卻非常高。他說，你看所有參加革命的女同志，有幾個能和江青比？連蔡暢、鄧穎超都不能和江青比；帥孟奇在敵人的面前表現得很堅定，很勇敢，寧死不屈，但是她在路線鬥爭中卻表現得不理想，還跟著劉少奇跑呢。再說國際上的，馬克思的夫人，恩格斯的夫人，還有列寧的夫人，哪一個能比得上江青？所以關鋒說，他不反江青，他以前沒有反過，現在、將來也不反。關鋒認為江青要本事大點就好了。不過也難，江青沒有軍事鬥爭的經驗，沒有生產鬥爭的經驗，政治上也經驗不足。另外，在性格上她不大善於與人求同存異，這就不容易團結同志。

可是關鋒的學生閻長貴重新出來工作後卻把江青罵得很厲害。關鋒叫他別罵江青，閻長貴不接受，關鋒批評了他，兩人從此不來往了。近來閻長貴又寫了些關於江青的文章，較前要客觀真實些了。

談到王力的《反思錄》對文革的全面否定，尤其是他對鄧小平的阿諛奉承，關鋒氣憤填膺，大罵他是叛徒，無恥、造謠。他在《王力反思錄》上寫滿了痛斥王力的批語。

7、關鋒對王力的批判

關鋒和王力在文革中的關係非常好，很多事情他們都是一起商量配合著去做的。我因為忙於處理小組的日常事務和中央秘書局的工作，所以我和他們在一起的時間不像他們在一起的時間多。我對關鋒一直都很尊重，但對王力是有看法的。但關鋒總是勸我不要對

他太存偏見。

1986年我從秦城出獄後，就想方設法去找了關鋒。而關鋒和他的夫人周英也到處在打聽我的消息，想跟我見面。我和關鋒見面後，他就告訴我，王力投靠鄧小平了，跟著鄧小平一起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關鋒說，王力還想把他也拉過去，被他拒絕了。我那時知道王力也在到處打聽我，要和我見面。聽了關鋒的話，我沒與他見面。後來王力來到上海，又託人來跟我說，想跟我見面，我也婉謝了。

1995年的4月24日，關鋒從北京寫信告訴我，據說王力賣了收藏的文物，在京郊買了兩座住宅、高級轎車，自費僱傭司機、廚師、打字員、保姆服務人員等多名。我無法查實也無興趣證實這事，一笑了之。

2002年6月23日，關鋒寫信給我說：“王力的兩本厚厚的《王力反思錄》，香港友人給我寄來了一套。粗看一下，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造謠，歪曲事實，美化自己，簡直是無恥之尤。……大出我的意料，大概也出乎您的意料。怎麼對付？您什麼時候來京，看過細商。”

關鋒在《王力反思錄》上劃出了很多地方，準備予以批駁。可惜他因身染重病，寫下的文字不多，終於没能如願。

關於關鋒寫給我的上述信中的內容，我在《回憶錄》後面部分照錄我們來往的部分信件中，還可更加完整地看到。

第二十七章 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

1、中央碰頭會和中央文革碰頭會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中央重大的決定都是通過開“中央碰頭會”來決定的。每次開會的名單，除了主席有特別交代的，一般都由總理來決定。總理寫了名單交給秘書通知下去。

如果主席參加會議，那會議就叫“中央常委碰頭會”，通常就是在人民大會堂118室北京廳進行；偶爾也會在“游泳池”開會，但冬天在那裡就比較冷。主席好像特別耐寒，我們穿著厚厚的衣服還覺得冷，他卻一直不讓開暖氣。

如果主席不參加會議，那會議一般就在懷仁堂舉行，通常由總理來主持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國務院的主要負責人和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林彪那裡基本上都是葉群來的，軍隊由楊成武參加，謝富治基本每次開會都來參加。

這在當時就是最高的中央決策會議了。像批鬥張霖之、從四川帶回彭德懷這些事，都要由這個會議來討論決定與通過。有些事還得經過主席的批准才好去執行。

就我所知，那時除了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以外，祇有總理可以不用通報就去主席那裡。其他人，包括陳伯達在內，要見主席，都需事先通報主席，並得到同意。以前劉少奇是可以不經通報就去主席那裡的，但是現在不可以了。包括中央開會，如果沒有得到通知，他也不能參加。中央的日常工作實際是由總理來主持，陶鑄協助總理。

“二月逆流”以後，國務院的幾個副總理等人，除了工作需要就不參加中央碰頭會了。後來總理就把這個會議從懷仁堂搬到釣魚

臺的16號樓來開。參加會議人員的名單還是由總理決定，總理把名單給我，由我交文革辦事組去通知，這個會議後來被叫做“中央文革碰頭會”，其實，這兩個叫法都是一樣的，祇是參加的人有了變化，原來國務院的幾個領導，總理不讓他們來參加了。這個時候毛主席親自指定粟裕來參加中央碰頭會。在“青海二二三事件”後，葉劍英一般也不來參加會議了。

凡是有總理來參加的會，會議都是由總理主持的，總理都會事先把要討論的問題寫在一張紙條上，然後一條一條地進行討論。從1967年2月以後，連國務院的很多事情，都拿到中央文革碰頭會上來討論解決。說實話，那個時候，我們的感覺，總理就好像是中央文革的政委，江青是司令員。

除了參加總理主持召開的會議之外，中央文革小組自己也經常開會，除了有重大事情需要專門開會討論之外，一般日常的事情並不規定開會的時間，平時大家都各忙各的，但經常到會議室來碰頭，先到的就一起坐下來討論了。有重大事情則必須請陳伯達、康生、江青到會。

在開始的時候，大多由陳伯達主持會議，但他的口音很難聽懂，講話又常常不得要領，所以他主持會議的時候，我們都常常在下面開小會。而當江青主持會議的時候，那大家都會認真地聽，認真地討論，下面沒有開小會的。那時，小組的人（包括我）都有點欺負“老夫子”。

2、總理與江青

周總理和江青，他們兩個之間有很深的友誼。在一起開會的時候，他們兩人在大問題上意見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意見都是一致的。有時也有意見分歧，比如那時有“臨時工”、“外包工”起來造反，這些人的生活處境困難，而且也確實因為政策上的原因，造成了對他們的待遇不公平。江青聽了他們的

訴說，看了他們的材料，難過得哭了。江青有個優點，她對普通的工農群眾都很愛護，對他們很有感情。她就跟總理說，他們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為什麼不能公平對待他們？總理說，國家財政實在有困難，他一一列舉國家財政用度上的缺口，說暫時實在是拿不出錢來解決這些問題。江青聽了也沒有辦法。總理和江青的關係有點像是兄妹一樣。江青經常會給總理說好話，要總理幫她出主意解決些生活上的小事，總理也很願意給她出些主意。絕不是像有些人講的，什麼總理經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都是別有用心胡說。

江青經常跟我說，你跟他們（指王、關等人）講啊，不準反總理，這是大局。總理也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呀！我就把江青的話去跟王力、關鋒說了。

關鋒對總理確實很有意見。他說，總理和那些走資派之間有著割不斷的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他常常會表現得忽左忽右。當群眾批判某個人的時候，他通常會保他，這就右了；可是當他知道主席也對這個人有看法的時候，總理就會很快轉過來，批判起來比別人更起勁，上綱上得很高，這就左了。王力對總理的態度則是多面的。當著總理的面，他一般都是恭恭敬敬的；可在背後，他又同意關鋒對總理的看法。王力說，外交部的那些主要領導像陳毅、姬鵬飛等，都是總理在保護他們。可是那些人接受西方的東西太多了，根本就轉變不過來。他認為，除了喬冠華還可以爭取，像姬鵬飛這些人都不堪重用。文革失敗後外交戰綫種種錯誤，包括姬鵬飛兒子的背叛祖國，證明他的看法是對的。

有時，江青也會當著面說總理，說總理啊，人家都說你是“老保”，原來你真是個老保啊。總理聽了，也就是笑笑，什麼也不說。事實上，在當時中央高層的領導中，也祇有總理是大力支持江青的，江青怎麼可能去反對總理呢？至於我被審查以後的情況，我就知道了。但是我出獄後曾託人去問了毛遠新，那個江青批“周公”是怎麼回事？毛遠新說，他可以負責任地說，江青從來沒有反對過總理，也沒有說過批“周公”是批總理。

總理也是不反對江青的，還處處維護她。可總理底下卻有不少

人是反對江青的。雖然並不是總理叫他們反的，但這也常使得總理感到為難，因為這些人跟總理的關係都是非常深的。

鄧穎超是很關心總理的，她那時給我寫的條子很多。每次開會晚了，她都叫她的秘書給我送條子過來，上面或者說總理今天有點感冒了，或者說總理昨天沒睡好，叫我讓總理早點回去休息。我向江青匯報此事，江青說，總理是太累了，鄧大姐說得對，你們要盡量照顧總理，開會太晚不好，應該叫總理早退。我說，中央召開的會，讓總理早退，我們來主持，這好嗎？江青說，不是主持繼續開會，而是做好會議收尾工作，這是可以的。

每次總理開會，鄧穎超雖然不參加會議，但她有時也要到人民大會堂等著，等總理開完會一起回家。我收到她寫給我的條子，就會盡量按江青指示想法把會議結束。有時還有人要提問題，我就說，總理太累了，現在讓總理先走，剩下的問題我們聽了再向總理匯報。而每次總理離開以後，鄧穎超又會讓秘書遞條子給我，上面寫著“非常感謝”。

有一次我跟總理說，你那麼忙，應該讓鄧穎超同志也出來工作。總理很認真地給我說，“本禹啊，這話我就跟你說，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應該是一致的，但實際上有許多地方是不一致的。雖然她在生活上很關心我，但是她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卻跟陳毅、譚震林這些人差不了多少。我們經常有討論（我記得很清楚，總理是說討論，而沒有說爭論），但很多地方她的認識還是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讓她出來工作，不然說錯話，影響黨的工作。”從這個話，我才明白總理對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有著深刻的認識的，並不像有些人說的，他祇是在應付主席和江青。

3、“伍豪事件”的來龍去脈

1967年春的一天，周榮鑫的女兒來釣魚臺找中央文革，說她有件非常大的事，祇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說，別的人一概不說。我

去請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聽聽，我說也不知道是什麼事？看來挺大，我一個人去不好，總要有個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說，那就叫關鋒和你一起去吧。我和關鋒一起與她見面後，周榮鑫女兒把天津紅衛兵查到的一張舊報紙拿出給我們看，上面登載了伍豪叛黨啓事，她說伍豪就是周恩來的化名。我們雖然對此事不甚了解，但當我們看了啓事全文，無根無據，文筆粗劣，哪像是總理寫的啓事。我們水平再低，畢竟也參加過一些對敵鬥爭，所以當場就跟她說，這是國民黨造謠。關鋒講得比我還具體，說總理是什麼時候去的蘇區；還說，如果總理叛變，那他還會領導紅軍長征嗎？周榮鑫女兒聽了很高興，說她也不相信總理會叛變。但她爸爸說，這事不能去和總理講，這是組織原則。所以一定要來找江青。我們向江青作了匯報。江青說，她知道這事，那是敵人造謠。主席也知道。後來匯報給主席。主席說，那個時候總理已經在蘇區了，當時蘇區的報紙就辟過謠。

鄧小平他們要審判江青的時候，他們派人到秦城監獄來向我問過這事，要我回答江青怎麼利用這事來反總理。我對他們說，胡說八道，江青當時就說這是敵人造謠。後來她匯報給主席，主席也在會上講了，那是敵人造謠。那些人還要我詳細的寫了一個材料說明經過，我都如實地寫了，可是我寫的材料他們卻不敢在“法庭”上公示。

在1967年“五一六通知”公開發表後，北京出現了一個反總理的所謂的“五一六兵團”。爲了這件事，江青和總理特地把我從中南海叫去釣魚臺商量辦法。“五一六兵團”的頭頭一個叫張建旗，北京鋼鐵學院的學生；一個叫劉令凱，是北京外語學院的學生；還有一個北京商學院的學生程鎮華。“五一六兵團”的主要頭頭就是他們三個人。他們這些人認爲總理是“二月逆流”的總後臺，是最大的走資派。於是他們就晚上悄悄出來貼反總理的標語和大字報。被群眾發現後扭送到公安部，謝富治批准關押了三個人。我到釣魚臺時，總理正和江青在談這事。江青說，謝富治批准抓了，好。總理說，不好吧，反對我，就要抓人家！這不行。祇有反對毛主席，

才能抓。江青說，那就這樣吧，叫本禹去公安部匯合謝富治，把這幾個人嚴厲地訓斥一下，然後以執行總理指示的名義把他們放了。我當即做了個會議記錄，讓他們兩個都簽了字，然後就驅車去公安部。我見了謝富治，向他傳達了總理、江青講話並轉交了我作的會議記錄。謝富治說，這樣處理比較好。於是他就陪我去審訊室。我對這幾個學生訓了話，態度很嚴厲地說，你們反對總理就是反對革命，把個“對”字去掉，也可以說你們就是反革命，這是很嚴重的罪行。革命群眾把你們送來，謝部長批准關押，都是非常正確的，非常必要的。祇是總理以無產階級政治家的風度，他覺得你們年紀還小，不懂得政治鬥爭的複雜性，讓我們對你們進行教育後釋放。我們現在就是奉總理的命令釋放你們的。按我們的意見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主張放你們的。這幾個人表示了對總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謝，並說回去以後再也不反總理了。可他們言而無信，回去以後還是照樣反總理。後來又被扭送進了公安部，這次我就不去放他們了。

4、周總理和我

我1950年進中南海工作後就認識了總理。但祇是在文革的時候，才和總理有工作上的直接接觸。總理對我一直都很好。總理也很喜歡看書，可是他沒時間看書。中央開會時，有時總理早到，他經常會對我說，“本禹，你過來，給我講講你最近看什麼書？”我告訴他我看的書，如柏拉圖的《理想國》、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傳記叢書《潘恩傳》等。他說，那你給我說說。這樣我有幸做過幾次他的讀書秘書。我特別記得，1967年我看了南斯拉夫吉拉斯寫的《論新階級》。作者當時是挨批判的，他認為在社會主義裡面出現了新階級——特權階級。我對總理說，這個特權階級思想跟毛主席的看法差不多啊。總理說，你別瞎說，這那能跟毛主席思想比啊！有時我看了一些古書也給總理講，總理很願意聽。比如，江

青有一次跟我講，“眼睛是心靈的窗戶”，她要我善於觀察人的眼睛。我聯繫古文上的“其心正，則眸子瞭焉，其心不正，則眸子眊焉”。這是孟子說的，意思是，看人看他的眼睛就能知道他心裡想什麼。總理說：“你把那個話幫我記下來。”總理隨身帶著小紙條，我就給他在小紙條上記了下來。總理把我寫的放在他隨身的文件夾裡，保存起來了。

在“二月逆流”發生之後，總理手下的人手少了，總理常叫我去幫他處理一些事情。煤礦的問題是我去幫助解決的。那時工人起來造反以後，煤礦減產。我就去了京西煤礦跟工人們一起下到了礦井底下，我給工人講道理，我們不能祇搞革命不抓生產。我說，北京市民冬天都要靠這個煤生活，如果再不把生產搞上去，北京的鍋爐都要停了。工人們都熱愛毛主席，我就說，毛主席屋子裡都是冷的。於是工人就喊起了口號，要大家都去上班，誰不上班，就鬥爭他。很快，生產就上去了。當時著名軍旅作家魏巍也在這個煤礦體驗生活，我們是老朋友了，他也幫我動員工人。我把這個經驗帶到煤炭部去，他們作了推廣。其實工人們都很懂道理，要他們上班，甚至加班並不是很難的。祇要把道理跟他們講清楚。否則，光講白貓、黑貓的，甚至是嚇唬他們，不上班不給工資，他們也不會接受。鐵路出現緊張，我建議總理，從空軍調來一個三級部長王素去管鐵路。吳法憲說，王素級別低，他說要調一個最好的一級部長過來。我說不要，就要這個三級的。因為官太大了，架子也大，做不了什麼具體事情。那個王素就很厲害，他很快就把鐵路的問題解決了。直到我被打倒後，總理還一直在用這個人。王素是文革初期，從空軍調來做我的助手的。他既忠於革命又有頭腦。後來，王素的兒子告訴我，他父親從來不相信我是反革命，多年來一直懷念我。

有一次，總理問我，外交部你認識的人中有哪些人可以重用？我向他介紹了我所知道的幾個人。錢其琛，他是我在上海地下黨時的小領導，很聰明，又能幹；李道豫，他是我上海南洋模範中學地下黨的戰友，等等。總理都把他們的名字一一記在了他的本子上。哪知道我介紹的人中有人後來官做大了，聽說也變成了特權階級。

據有的人說他的兒子靠他發了大財；又據說還出了一本書說這個人是中國外交之父，受到了外交部老同志們的批判。我無法核實，但如果真是這樣，又說明一個共產黨人保持晚節太重要了。我希望他不是傳說中那樣的人。

可是在我被關進秦城之後，總理在一次講話中卻把我說得很壞。按他的說法，把我槍斃幾次都不夠。可是他說的事情卻沒有一件是有根據的，連後來審查我的專案組都沒採納。也不知道他那個講話是誰幫他整理的。特別可笑的是，總理在大會上說，我的兩個兒子也很壞，等等。我當時尚沒有兩個兒子，祇有一男一女，都在讀小學，一個剛入學，才一年級。中辦秘書局的人聽到這個傳達都偷偷笑了，但不敢出聲。

關鋒一直認為，抓“王、關、戚”的事情主要是總理搞的。我說不是，總理在江青認為我在整她“黑材料”的時候，還為我說過話呢。關鋒說，你這個人，不要被人家賣了，還幫人家數錢。關鋒還認為，在1970年後，全國大抓“五一六分子”，許多造反派受到迫害、鎮壓。總理應負很大責任。唯這一點，我同意關鋒的看法。

第二十八章 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 和文革小組的其他成員

1、陳伯達和康生

陳伯達與康生的關係一直不大好，他們兩人之間的成見很深，而且總是互相猜忌。那次我和陳伯達、楊成武一起去上海聽毛主席講“五七指示”的時候，從主席那裡出來住進錦江飯店。陳伯達說，這次我還是住上次住的那個樓層，上次來時，康生就住在我樓上。我說，這次康生沒來啊。陳伯達說，上次康生就住在我的上面，整天在我的頭上拉屎拉尿。這是陳伯達向我們公開表達他對康生的不滿。這也不能全怪陳伯達，因為康生經常當著我們大家的面給陳伯達難堪，陳伯達的口才遠不及康生，經常吃虧。

文革中，中央黨校有人貼康生的大字報，康生就懷疑是陳伯達在背後指使的。北大有有人貼了陳伯達的大字報，陳伯達也懷疑是康生和聶元梓搞的。其實我去查了都不是，是群眾自發搞的。那個在中央黨校寫康生大字報的，是關鋒的一個好朋友，姓李，他那時就反對康生。但這個事情絕對不是陳伯達搞的，也不是關鋒叫他寫的。那個時候已經是要打倒關鋒的時候了，而康生是保關鋒的，關鋒不可能叫人去貼康生的大字報。

打倒王力、關鋒時，陳伯達表現得最積極。因為平時我們三個人常常一起揶揄他，我們為什麼要揶揄陳伯達呢？因為他老是搖搖擺擺，一天到晚說些喪氣話。他老給我們說，文革不行了，再這樣

搞下去，得罪的人越來越多，怎麼得了，將來很多責任都是要由我們來承擔的。他害怕了。他比我們聰明，更有政治經驗，他知道文化大革命搞到最後就會搞到自己頭上來。我們跟他說，你幹啥這麼前怕狼，後怕虎的。跟著毛主席革命，怕啥呢。毛主席勝利我們就勝利，毛主席失敗我們就失敗。可陳伯達不這麼看，他說，毛主席不會失敗，我們得失敗。他畢竟黨內鬥爭的經驗比我們多。可當時我們對他很反感。

毛主席對陳伯達看得很透。九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說陳伯達是不是看到我的船要沉了，就往林彪那裡跑。康生從來不是這樣的，他沒有擔心跟著毛主席會得罪什麼人的這種事。康生比陳伯達堅定。後來有人說，康生在去世前，向毛主席揭發江青和張春橋在歷史上是叛徒，這很可能是誇大的誤傳。我以前在中南海工作的同事告訴我，康生在去世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根本就不省人事，中央送給他的文件都是原封不動地退回去的。是不是那時有人揭發江、張，康生在清醒時叫人向毛主席反映一下。

陳伯達原先對我還是挺好的，他把我從中南海後樓研究室調到《紅旗》雜誌社，一下子就叫我當歷史組的組長。這是越級提拔。鄧力群對我說，老夫子從來沒這樣提拔過人，你是個例外的例外呀！

但是後來我同陳伯達逐漸產生了一些矛盾。在劉少奇搞資反路線的時候，我去輕工學院看大字報，講了一些反對工作組“抓游魚，反干擾”的話。陳伯達知道了就跟我說，你少說話，輕工學院是薄一波管的。他不願意中央文革和薄一波他們發生矛盾和衝突。但當我向江青匯報的時候，江青卻說我說得還不夠。我說，可陳伯達叫我少說話。江青說，你別理他。江青回到北京，就批評陳伯達，說你這個組長就像是辛亥革命時候的黎元洪，是士兵把你從床底下拉出來革命的。當時陳伯達就朝我看看，懷疑是我在江青那裡說了他什麼。其實，我那時祇是如實地匯報，並沒有故意去說他的壞話。不過，從這以後，我總覺得陳伯達老是怕這怕那，患得患失的，互相間的疙瘩就多起來了。

儘管陳伯達是組長，又是公開發表過很多文章的理論權威，但

實際上他的威信並不很高。這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一出什麼事情，就往下推。好多人吃過他的虧，我自己也有多次的經驗。

有一次，陳伯達和他的夫人吵架。他夫人說，我把你在背後說毛主席的壞話全都寫信給中央。陳伯達一聽急了，他馬上來找我，因為我是管群眾來信的。我說，你最好叫她不要寫。夫婦共命運，你向她講明道理，說不通，我替你去說。否則，她的信祇要一到信訪辦公室，那都是要登記的，再拿出來就難了。那真是“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轉”。其實，我這也是故意嚇唬他的。後來他聽了我的話，和他夫人緩和了關係，他夫人也沒有寫信。

陳伯達在理論上的確是有一定水平的，但可惜不成體系。不像康生，康生系統地學過馬列主義，理論上是成體系的，講起來是一套套的。康生的口才也好，隨機反映也很快，但他的處事能力不如總理，思想方法片面，決定問題不夠謹慎，甚至對人命關天的大事，不好好研究就根據幾點未經核實的材料輕率作決定，所以他辦的案子常有水份，冤案也不少。

有一次我和陳伯達在主席那兒開會，說到現在有些人參加會議，大會小會都不講話。主席就說，那不是成了息夫人了嗎？息夫人是息國（春秋時期的一個小國）的絕代美人，嫁給了國君，後來息國被晉國所滅，息國國君被殺。息夫人沒自殺，也沒殉葬。因為她太美了，晉國的國君就把她收為妃子。息夫人也不反抗，你願意怎麼就怎麼，她溫順地伺候晉國國君，但就是不講話。晉國國君也允許她不講話。這個時候，陳伯達插話說，息夫人是嫁給晉獻公的，公子重耳就是她的兒子。這事有點新鮮了。主席說，哦，我還不知道這事呢，陳伯達真是個歷史學家。陳伯達聽了很得意。

回來以後，我覺得，公子重耳的母親是息夫人？這麼大的事，怎麼我從來就沒聽說呢？於是我就去查書，可不知翻了多少書，都沒查到有這事。這事整整耗了我一個晚上時間，但我基本上也肯定這是沒有的事。第二天，我和陳伯達見面時就說，老夫子，你說的那個息夫人是晉文公母親的事，我查了一晚上資料都沒查到。你是在哪兒看到的，我回去再查查。陳伯達看著我，半天沒說話，

然後他就叫他的秘書去找《史記》、《左傳》等書。書拿來以後，他就翻，翻了半天，也沒有查到。我說，不用翻了，我都翻到公羊傳了，都沒有。他相信了，說，哎喲，這怎麼辦呢？我說，你別著急，你馬上給主席寫個說明。他說，對。那你給我寫一個吧。我說，這不行，這個必須是你的親筆。他說，你寫，寫完我來抄。我就給他寫了：主席，昨天開會我曾說，息夫人是公子重耳的母親。回來我核對了許多書都沒有查到，這件事怕是我記憶失誤了。干擾了主席。陳伯達抄完就趕緊給主席送了過去。主席後來也沒有再提這個事。

陳伯達因為在大會上，公開提出打倒陶鑄的事受到主席的嚴厲批評，他想不通。他來跟我說，我都不想活了，主席罵我罵得那麼凶！我說，你可不能自殺，那是叛黨啊。他說，馬克思的女婿就是自殺的，也沒人說他叛黨。我看他認真了，就勸他，主席罵你，那是對你抱有希望，是為你好，他對你不好就不這麼罵了呢！你看他後來罵過田家英嗎？他琢磨了半天，說，是啊，主席倒沒罵過田家英呢。

我後來想，陳伯達有時在一些問題上確實是有點投機心理，但他祇是在共產黨內的這一派和那一派中間搞投機，是黨內投機。而並不是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搞投機。我們和陳伯達的關係沒有處理好，影響到了中央文革的團結。儘管這主要是康生和江青的事，但我的責任也很大。對此我也是應該反省的。

陳伯達平時的生活比較奢侈。他嘴上也講為人民，還專門寫了幅字送給我，但社會主義關不容易過。要過社會主義的關，那就不能高高在上，不能凌駕於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否則就不要侈談什麼“為人民”。

田家英到處收購清人字畫和其他古董。浙江省文物商店有一副清代大書法家鄧石如寫的“海為龍世界，天是鶴家鄉”對聯，他看了喜歡，就硬要人家賣給他。人家說，那是國家的東西，是我們的鎮店之寶，非賣品，不能賣。田家英不依，硬是要買。人家沒有辦法，就請示浙江省委，結果上面說，那你們就讓他寫個借條，允許

他先借去看看。這一借，哪還有還啊。田家英死後，這對聯都在他家屬的手裡。人家拿著田家英的借條去要，不知他的家屬還人家沒有？據說現在這副對聯的價值上億。當時陳伯達知道了這件事，也去向浙江文物商店借文物，說田家英能借，為什麼我不能借。人家祇好找了另一件鄧石如的作品“借”給他。所以說他們兩個都沒過好社會主義關。

然而這種事情康生就沒有。康生是個公認的文物鑒定大家。在文革的時候，也低價收購了很多文物，他的目的是要保護這些文物。在他去世前，他把這些文物全部捐贈給了國家，一件也沒有留給自己家裡人。

2、張春橋和姚文元

張春橋當過柯老（柯慶施）的政治秘書，他在1957年寫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受到主席的重視。可是，對他的文章，陳伯達和田家英都很反感。田家英他們就去查所謂狄克的事件來中傷他，說他是反魯迅的。那個時候，誰反魯迅，誰就不是好人。所以春橋在北京不怎麼受歡迎。對此，張春橋有點氣憤。

在中央文革小組裡，春橋和我算是比較交心的。在他去上海處理工人造反運動的時候，他和我的聯繫特別多。但是春橋和王力、關鋒的關係不是太好，我曾試圖調解過他們的關係，但他們之間總有點相互看不起。就我所知，春橋和姚文元開始也很生疏，但他們兩個之間投緣，後來的關係就很好了。

姚文元這個人非常穩重，不到十分把握的時候，該他講的話他都不講。

姚文元在其父親的影響下，下工夫研究過魯迅。他寫過一本《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的書。其中引述魯迅說，他自己的許多文字“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先驅者的命令”。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姚文元的許多文章，

包括正確的和有缺點的，大體也是“遵命文學”，他所遵的是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

姚文元比我晚出獄，出獄之後他仍然沒有自由。一次姚文元的女兒來看我。我請她代我去向她父親問一個問題：當初為什麼要抓我？不久，他女兒來跟我說，她父親很真誠地跟她說，在處理戚本禹的事情上，他和春橋兩個都一句話也沒有說。姚文元的女兒還跟我說，她父親告訴她，在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他們向中央文革的幾個人發起進攻，當時的形勢非常緊張。一次毛主席與姚文元談話時，對姚文元說，清朝末年，章太炎與那位“革命軍中的馬前卒”鄒容，因為“蘇報案”被關押、審判。章太炎在監獄裡給年方二十歲的鄒容寫了一首互相勉勵的詩：

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
快剪刀除辮，幹牛肉作餸。
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
臨命須摻手，乾坤祇兩頭。

念完之後，毛主席還拍著姚文元的手說，我們現在亦是“臨命須摻手”了。但我們要努力奮爭，扭轉乾坤。

聽了姚文元女兒的轉述，我感慨萬分。黨內鬥爭驚心動魄，連毛主席都做好了“臨命須摻手”的思想準備了啊！

2005年姚文元去世後，他女兒常來看我。她把他父親生前的親筆手迹拿給我看。我對她說，這是你父親留下的珍貴遺物，你們要好好保存，作為紀念。後來，我祇要了姚文元同志親筆書寫的一份讀書筆記的復印件，和他親筆寫給他女兒們的一封信的原件。

從他留下的讀書筆記來看，他的讀書學習是非常刻苦認真的。怪不得毛主席生前把他的讀書計劃批轉給大家去看。

3、尹達

尹達是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歷史研究所的所長，1964年寫了一

篇《必須把史學革命進行到底》。可是中宣部一直沒有讓他發表。1965年12月，尹達把這篇文章送到了《紅旗》雜誌歷史組，歷史組經請示領導後，組織范若愚、關鋒、戚本禹和杜敬四人與尹達一起討論修改，後在1966年《紅旗》雜誌第三期上發表了。我還保存著他在文章發表前寫給我的三封信。

主席看了這篇文章，感到滿意。1966年3月20日，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尹達這篇文章發表出來了，寫得好。尹達是歷史所所長，他是趙毅敏的兄弟。他的文章是1964年寫出來的，壓了一年半才發表。對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壞的都不要壓。不要怕觸及了羅爾綱、翦伯贊。反正不剝奪他們的吃飯權，有什麼關係。不要怕觸及權威。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尹達。誰能溶化誰？現在還沒有解決。”毛主席的這段話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和《毛澤東年譜》中均被刪掉了。

可是在文革初期，尹達在歷史所裡卻也執行了劉少奇搞的資反路線，整了不少人。所以歷史所裡的人對他反得很厲害。加上他又與陳伯達有矛盾。文革開始後不久，歷史學界批判侯外廬，陳伯達就乘機也發動了對尹達的批判。我和關鋒幾次去歷史所為他說好話，但也沒有用。他後來就不來釣魚臺上班了，自動退出了中央文革的工作，但中央並沒有發文撤銷他的文革成員。

4、文革小組的其他幾位成員

本來，毛主席對王任重一直很器重的，他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也是毛主席提名的。主席是希望他為文革出力，但結果他卻積極支持了劉少奇、鄧小平搞資反路線。陶鑄也是如此。那時陶鑄、王任重、劉志堅在中央文革小組裡面是三位一體，互相呼應。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和副組長，卻專門在路線上與毛主席對抗。這三人先後於1966年底至1967年初被打倒了。

穆欣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多年了，但他在《光明日報》很

不得人心。他總是把《光明日報》的同志當下人來使喚，他的夫人張卉中更是《光明日報》的一霸，欺壓群眾。報社的群眾說，有張卉中在，《光明日報》全社都不得安寧。文革開始後，她在報社的日子不好過，我們把她調到中央文革文藝組上班，但實際上文藝組也不用她。

在文革初期，穆欣在《光明日報》社裡積極執行劉少奇的資反路綫，鎮壓群眾很厲害，群眾對他強烈不滿。穆欣的水平也有限，《光明日報》的副總編輯，哪個都比他水平高。我看過他們的一個副總編輯改過的東西。我一看就說：“你這個副總編輯不錯嘛。”他說：“是。但整天給我搗亂就是這個人。”我心想：“你自己的水平沒有人家高，還說人家給你搗亂！”。1967年1月，中央財金學院八八戰鬥隊去《光明日報》社造反，把穆欣從中央文革揪回了《光明日報》社批判。1967年3月我和關鋒還是去《光明日報》講話，保過他。慢慢地我發現他這個人有問題，誰上臺，他就捧誰；誰落難，他給誰下藥。我當時就想，也許哪天我落難了，他也會同樣給我也下藥。後來果然如此，連當初我保他的講話在他那裡都變成毒草了。直到文革以後他還在魯迅手稿問題上對我中傷。

儘管穆欣在1967年1月就實際離開了中央文革，可是在我們被抓了以後，不知為什麼他也被關進了秦城。

當年有一個原國民黨的軍統老特務，解放後一直是受公安部門監控的。這個人在文革中給我和關鋒寫來了一封信，說你們保的穆欣就是我們當年派到延安去的。他原名叫啥啥，改名叫啥啥。文革後，鄧小平一上臺，穆欣給鄧小平寫信申訴，並揭發誰誰誰當年如何反對鄧小平，鄧小平就把穆欣從秦城放出來了。放出去後中紀委的人爲了給他做結論，就派人來問我關於他的一些問題，我就說當時有那麼一個材料。中紀委的人馬上說，那些材料都是派性鬥爭的產物，不足爲信，你們作過調查嗎？我說，那個寫信的人可是一個軍統的老特務，他跟派性有什麼關係？他們說，那個老特務已經死了。

後來穆欣和喬石結成了兒女親家，穆欣就更加神氣了。有時，我想，他在文革中受了那麼多氣，就讓他神氣幾天吧！

第二十九章 關於“整江青黑材料”案 和我的被隔離審查

1、江青向文革小組同志談她的歷史

江青雖然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但實際上她的作用超過了陳伯達。有段時間陳伯達生病住院，經主席同意，中央還專門發了文件，由江青代理組長。

中央文革小組決定一些重大事情，都是由江青與總理商量決定的，有時康生和陳伯達也參加意見。在他們作出決定之後，主要由張、王、關、戚、姚去貫徹執行。但後來張春橋和姚文元的主要精力放到了上海。當他們在北京的時候，有些事情也一起參與。

雖然中央決定由我接替田家英擔任毛主席的秘書，但是，除非主席有事找我，或者有緊急的文件和發生緊急的事件要即刻向主席匯報，一般我都是通過江青向主席報告工作的。所以，我實際上也兼任了江青的秘書，但無此名義。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威信是很高的。而且她考慮問題比較寬泛，我們去外面講話，她都會提醒我們，要注意些什麼。我們都會遵照她的意見去做的。但是，我們卻都不希望她到外面去多講話。因爲她講話太直，她提醒我們的話，她自己有時也做不到。她有時講錯一句話，那我們要花好大的力氣才能把它扭轉過來。

在1966年冬天一個下午，江青忽然向我們談了她的歷史。在釣魚臺十六號樓中央文革的會議室，足足談了約二個小時。參加的人

有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和穆欣。我和春橋、關鋒坐在江青的對面，王力、姚文元坐在江青的邊上，穆欣悄悄地坐在江青的背後的軟椅上，他當場作了詳細記錄。

江青說，你們大概都聽了許多關於我的歷史傳聞吧！你們不清楚事實真相，又不好來問我。那我今天就把我的歷史都跟你們講，免得你們聽了風就是雨的。

江青說，唐納這個人其實還不錯，是個進步人士（按：據歷史檔案揭秘，唐納是中共的秘密黨員）。但他的缺點是太軟弱，膽子小，不像個革命者。那時他在演藝界的影響是很大的，她指著我和姚文元說，就跟你們現在在外面的影響一樣。他要說那個戲好，那個戲就叫座；他說那個戲不好，大家就說那個戲不好。他要捧那個演員，那個演員就馬上走紅。那時追求他的女孩非常多。可唐納就是拼著命地追求我，而且在戀愛的時候對我真的很好，百依百順。她說，當然，唐納比起俞啓威（黃敬）來那簡直是天上地下了。當時我們就坦率地詢問她，你為什麼不嫁給俞啓威呢？她說，俞啓威那時年紀小，一切都要聽家裡的。他家是個封建大家族，他家堅決反對俞啓威娶她。他那個家族族規非常嚴格的，娶的都是大戶人家的小姐，你一個被他們看做戲子的人根本就進不了他家的門。她說，俞啓威那時才是個二十來歲的學生，根本沒辦法和他的家族抗衡的。所以她祇能考慮嫁給唐納。可是，唐納在與她結婚以後就不一樣了，總是限制她這個，限制她那個，不讓她和別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屬品。這個她就受不了。江青說，我那時受娜拉這部戲的影響很大，我在臺上演娜拉，心裡也喜歡娜拉。不過江青也說，唐納這個人還是很單純的，不複雜。可是他對待家庭，也是封建社會的那一套。所以我就提出和他離婚了。這件事當時在社會上鬧得沸沸揚揚。與唐納離婚，對她的打擊很大。她說那時她覺得前途茫茫，組織關係接不上，也不可能再去找俞啓威了。虧得那時有很多好朋友幫助她，她說她總忘不了蔡老——蔡楚生，在那種時候他給了她很大的鼓勵和幫助。而且他的幫助完全是無私的。還有崔巍，他是她青島時的同學，也對她幫助很大，他像大哥哥一樣地

保護著她。而且，崔巍為人正派，不像上海灘那些文痞，老想來占她便宜。

江青坦誠地說，她永遠難忘她和俞啓威的初戀。她說，俞啓威是她人生的第一個導師，是她的革命引路人。雖然因為他受到封建家族束縛的原因，她未能嫁給他，但正是由於他的引導，她才參加了革命，後來跑到了延安，這樣她才能認識毛澤東，找到她人生的歸宿。

我當時聽了江青的自述，感覺她態度誠摯，光明磊落，很受感動。我哪裡能想到，正是因為我聽了她這段過往的感情經歷，後來江青竟會想象北京、上海發生的所謂的整江青“黑材料”案，是我在搞她。真是禍起蕭牆，事物的發展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

2、所謂“整江青黑材料”的來龍去脉

1967年下半年，群眾提出要求開放北京圖書館，文藝組為此打了個報告給我。我說，文化大革命是搞文化革命的，連個圖書館都不開放不成了笑話了嗎。所以我就批准了這個報告。但其中規定，凡是內部材料必須憑革委會的介紹信才能查閱。

北京圖書館開放後，有人在裡面找舊報紙，看到了有關於江青（那時叫藍蘋）的報導。情況反映到我這裡來之後，我就叫文藝組的人去把這些東西收了封存起來。當時圖書館裡有個從空軍政治部轉業的女幹部，把這事報告給吳法憲，吳法憲就報告給了葉群。在一次會議結束時，其他人都走了，葉群叫我留下來，她當著我的面叫吳法憲把這件事跟江青報告了。總理也在。我說，有這事，是我叫文藝組的人去收起來封存的，以免擴散。江青很不高興地說，有什麼好擴散的，我有什麼事情可以擴散的。但是總理覺得我說的是比較合理的，就說，那這樣，我來寫個報告，把這批材料都燒了，並且通知北京圖書館注銷登記號。總理親自簽發了報告之後，這批材料就由謝富治的公安部負責拿去燒了。事後，張春橋跟我說，你

應該給江青說這是下面文藝組幹的，你並不知道。我說，不行，是我同意讓文藝組去封材料的。張春橋說，你先要保護好你自己，這樣你將來還有機會可以給他們說話。不然，那就可能會玉石俱焚，你和他們都要受到審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將來還有誰出來給他們說話呢。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說的。可我想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現在我把它都推給下面的人，那他們受到的處分就會更重。所以我還是堅持承認，這事他們是向我報告過的，是經過我同意的。

就在總理下令銷毀有關江青的報刊資料之後不久，上海市革委會派專人，把一些在上海搜集到的關於江青的舊報刊資料送到北京來交給我。因為我當時是中央辦公廳的代理主任，所以他們就送來讓我處理。可是上海那裡不知是誰，一面讓人把材料交給我，一面又去直接和江青報告，說他們查到的一批誣蔑她的材料，現在交到戚本禹那裡了。我打開那批材料一看，無非就是當時國民黨報刊造的一些謠言，說什麼“一丈青”（指江青）嫁給了宋江（指毛澤東），成了壓寨夫人。我當時覺得這事挺難辦。交給主席吧，你怎麼能拿那麼點小事去干擾他；交給總理吧，又給總理增加困難。可我想這也不能交給江青呀，因為這樣做不符合組織原則。所以就自己決定，把這些材料存檔不辦。其實我當時確實是有點教條。上海為什麼不把材料直接送給江青呢，因為它也要講組織原則，所以要交給我。可他們又去和江青說了這事，也不告訴我。江青等了幾天，看我沒跟她說這事，就自己找到我辦公室來問我，上海送來一批材料是怎麼回事。這次江青可能真的懷疑我是不是在收集她的材料了。後來這件事情還是由總理來處理的。我把過程跟總理一講，他一聽就懂了，知道是怎麼回事。他也讓謝富治把這批材料拿去燒了。這件事以後，張春橋在私底下跟我說，你不把這些材料交給江青，那是不對的。我們都已經是綁在一起的人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閻長貴是我推薦給江青給她當秘書的。也不知他腦袋裡那根筋錯位了？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把一個名叫江菁(音jīng)的人寫給江青的信送給了江青。江菁的菁，有的人念

字念一半，把它念作“青”。這個人是舊社會的一個演員，曾經參加過軍統。在文革時她挨了群眾批鬥，所以她寫信給江青，要江青救她一下。閻長貴拿了信，也沒怎麼好好看，就寫了個條，說現在有人冒稱江青，還說她曾經參加過軍統。然後就把信和條子一起送給了江青。江青看到信，就怒氣沖沖地跑到我辦公室來，她把信和閻長貴寫的條子往我桌上一摔。問我到底想要搞什麼名堂？說你前幾天弄我的黑材料，現在又和閻長貴合在一起來陷害我。我拿起信來一看，因為我經常處理群眾來信，所以很快就了解到信裡的内容。我說，人家根本不是說你江青參加過軍統。是說她自己(江菁)過去參加過軍統，她是來求您對她寬大。而且我說，江青這個名字是你去延安時才取的。當時還沒有江青這個名字。怎麼會說是江青參加過軍統呢。可是那個時候，江青已經聽不進我的任何解釋了，因為她對閻長貴寫的那個條子已經是先入為主了。認為我們是故意用這種方法來陷害她。其實，閻長貴在當天送這封信的時候，也沒有仔細看信。直到我從秦城出來，碰到他的時候，他還弄不清楚，說那人是誣蔑江青參加過軍統的。我說你真能胡說，人家明明是說自己參加過軍統，哪裡說過江青參加過軍統了？你把那麼重要的兩件事情混淆在一起了，你坐牢雖是懲罰過頭但倒是事出有因，可你害了我。

這事發生以後，江青就告訴我暫時不要離開釣魚臺的辦公室，聽候組織審查。而閻長貴則很快被抓起來了。在抓閻長貴之前，江青請他看了場電影，叫《一僕二主》。懷疑他一邊做她的秘書，一邊還受命於他人，她認同他是我有意安插在她身邊的臥底。又過了幾天，我估計是在等待主席的決定，江青又單獨請我去看了場電影《黑桃皇后》，是根據普希金的小說改編的，内容是說一個野心勃勃的青年，千方百計地想打探女主人的秘密，結果造成了悲劇。電影看完以後，江青就過來跟我握了下手，然後拉長著聲音說，那麼，再見了。我心裡明白，她是以這樣的方式在和我告別。

1968年1月12日夜晚，總理的秘書通知我去懷仁堂開會，會上宣布我“隔離審查”。汪東興隨即把我銬在釣魚臺的一個小樓裡，

由一個連的士兵看守著。那年的春節過後，王、關、戚都一起被關進了秦城監獄。

3、抓我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麼？

多少年來，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我和江青之間應該說沒有任何過節。那江青爲什麼要那麼恨我呢？我想也許她是想不明白，她對我那麼好，可我爲什麼還要一再地查勘她的歷史！

在當時中南海的政治生活中確實也時有這種情況發生。田家英自殺後，揭發他最多的人，就是他的秘書。如果按照他秘書所揭發的材料，那田家英早該判處死刑了。江青是不是怕我成爲第二個田秘呢？

還有人說我是因爲“盜竊”了魯迅手稿，所以被抓的。我被關進秦城後不久，傅崇碧和楊成武曾來提審我，問我魯迅手稿的事，從傅崇碧的眼神裡我看得出，他是同情我的，不像楊成武，才隔幾天，就擺出一付審問者的架子。我告訴他們，當時文化部向中央文革告急，文化部兩派群眾都要到文化部的檔案室去搶檔案，而當時魯迅手稿、郭沫若手稿還有很多作家的手稿都放在文化部檔案室。這個情況在中央文革的“文革要聞”上登了出來，陳伯達、江青都在上面作了批示，一定要保護好魯迅手稿。他們還指定我去處理這件事。於是我就帶了幾名解放軍戰士去文化部講話，說魯迅手稿是國家的重要檔案，誰也不準搶。並當場讓解放軍戰士連櫃子帶手稿一起搬去釣魚臺，貼上封條保存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裡。管保密室的幹部姓卜，你們去找他好了。傅崇碧臨走還說，謝謝你。其實，江青說我盜竊魯迅手稿。我估計一個是她忘了這事是她和陳伯達指定我去做的；再一個也許是因爲逮捕我的理由並不充分，所以還需要另外再找些理由出來。

還有些人，像吳法憲，說我是因爲送《紅樓夢》給李訥，想追求李訥，所以被抓的。那更是無稽之談了。李訥那時確實經常到我

這裡來的，她大學剛畢業，她是學歷史的，所以喜歡到我這裡來翻書、閒聊。我也挺樂意和她聊聊，從她那裡可以了解許多現在大學生的思想動態，了解他們的願望、追求，如此而已。現在李訥仍健在，對此有興趣的人盡可以去信、去電咨問。

其實，在那時就已經有“戚本禹是江青女婿”的謠傳了。毛主席喜歡了解民間流傳的政治謠言，他把政治謠言看作是階級鬥爭的一種特殊的反映。有一次，葉群把當時公安部從民間的街談巷議中搜集的這個謠言送給江青看。江青看了之後一笑置之，說，“這麼說，我還是丈母娘了”。當時我還是很愛惜自己羽毛的，所以在生活作風上也一直是很自律的，這在中南海裡是人所共知的。我早已是有婦之夫，怎麼可能有此妄想呢。

由於我當時所處的地位，我知道把我抓起來審查這件事，是必須得到毛主席批准的，江青是無法作出這個決定的。可主席在幾個月前剛在我的檢討上作了批示，稱我們爲同志。難道這真是像楊成武後來瞎說的那樣，是爲了安穩我的“緩兵之計”嗎？

我從秦城出獄後，看到一個叫董保存的人寫的《楊余傅事件真相》的書，書中引述了傅崇碧的回憶。傅崇碧回憶說，“七二〇事件”之後，總理命令他把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三十幾個老干部轉移到安全的地方保護起來。傅崇碧說的這個情況我清楚，在武漢“七二〇事件”以後，有學生要揪鬥各個大區和省、市的“陳再道”，他們到處找這些人，卻找不到他們。學生們就來問中央文革，可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們在哪裡。爲這件事當時我們還在中央文革的“簡報”上登了，說文革辦公室要送群眾寫的“批判材料”給這些人，但卻到處找不到他們。總理看了這個“簡報”以後，就說，你們把材料給我，我去轉交給他們。江青不高興了，她對此很有意見。所以，在開中央文革小組會議的時候，就把傅崇碧找來問。當時的情形我還記得很清楚。可能是康生先問傅崇碧，你把這些人弄到哪裡去了。傅崇碧支支吾吾不肯說。於是又有人追問他，是誰讓他這麼做的？傅崇碧也沒有說是誰，而是用手指指上面，說，上面。這下把江青、陳伯達、康生都激怒了，一定要他說出到

底是誰的命令。可傅崇碧就是不肯說。等到第二次開會，又要追問傅崇碧了，可就在這個時候，毛主席那裡來了電話，說主席要傅崇碧馬上過去。我估計這很可能是總理事先安排好的。那時主席已經回到北京了。這應該是1967年9月底到10月的事了。

據傅崇碧說，毛主席這次在自己住處的休息室見了他，和他談了兩個多小時。就是在這次與主席的談話中，傅崇碧把總理讓他把那些老幹部保護起來的事向主席匯報了。主席說，這樣做很好。然後，傅崇碧跟主席說，可是中央文革小組爲了這事開會批了他。主席問他，都是誰在批你啊？傅崇碧剛想說，是江青、康生他們。但話到了嘴邊他又收回去了。因爲他想，如果跟江青他們搞壞關係的話，以後就難辦了。所以他就改口跟主席說：“戚本禹他們都批過我”。主席接著跟他說：“不要怕他們”。

因爲這次主席與傅崇碧的談話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關係很大，下面我按傅崇碧的回憶原文，將一些重要情節引述如下：

老人家操著湖南腔問：“崇碧同志，吃飯沒得？”

“吃過了，主席。”

“坐下，坐下。今天找你來，是想問一問北京的情況。武鬥制止了沒有？”

毛澤東點燃一支烟，慢慢吸著、吐著。

“北京的情況有所好轉，但兩派還在打，制止不了。”

毛澤東又問：“朱德同志的大字報還有沒有？”

“有，還有人要打倒朱總司令。”

毛澤東說：“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澤東是分不開的嘛。”

毛澤東說完，又吐出一團烟霧，好似沉思，許久沒有說話。忽然，他發現傅崇碧手裡拿著一卷東西，問：“你手裡是什麼？”

傅崇碧說：“是剛出的漫畫，今天下午我才看到的。”

“給我看看行嗎？”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醜圖”遞給了毛澤東。那上面，畫了一頂轎子，劉少奇、鄧小平同志坐在上面，下面抬轎子的，都是老一

輩革命家。譚震林同志雙手沾滿了鮮血，羅瑞卿同志嘴裡叨著一把刀子……傅崇碧看著這幅圖，心裡好不難過，他知道這是“中央文革”讓紅衛兵搞出來的。

毛澤東認真地把“百醜圖”展平，看著看著神情嚴肅起來，他把烟按滅，憤怒地說：“胡來，這是醜化共產黨的！”

他側過身子，對秘書說：“你馬上打電話給陳伯達，告訴他，這個‘百醜圖’是罵我們的，不能搞，不能讓這種醜化我們的東西滿天飛！”

秘書轉身打電話去了，毛澤東這才坐正了，繼續提問題：

“紅衛兵還鬥幹部嗎？”

“鬥得很厲害。”

“怎麼個厲害法？”

傅崇碧貓起腰，兩祇胳膊向後舉著，學了個比較標準的“噴氣式”。

“就這樣，有的還在脖子上掛一個鐵牌子，寫著他們的姓名，還打了××”。

毛澤東皺了一下眉頭，又問：

“當年你們打土豪，開鬥爭會，也是這個樣子嗎？”

傅崇碧想了想說：“那時候，沒有搞‘噴氣式’，頂多戴一頂高帽子游街。”

“就是嘛！這樣搞，不好。好人搞壞了，病人搞死了。”

見毛澤東這樣講，傅崇碧才明白，這些情況，毛澤東並不知道。看來，他是不同意這種搞法的。他大膽地向毛澤東反映了許多情況：

陳毅的夫人張茜同志正在生病，被造反派抓來游街，團中央的“三胡”（胡耀邦、胡克實、胡啓立）也被造反派組織揪到大會上批鬥。胡耀邦發著高燒還被揪鬥……

毛澤東聽得很認真。他隨口問了幾個省委書記、部長的名字。

“他們怎麼樣？”

傅崇碧趁此機會，把周恩來布置的轉移老幹部的情况向毛澤東

做了匯報。

毛澤東毫不遲疑地表態說：“好！總理安排得好！你們做得好。”

聽到毛澤東這兩句話，他心中一塊石頭落了地。

“主席呀，要是不把他們保護起來，紅衛兵會把他們鬥死的！”

“你們做得對！”

毛澤東又重復了一句。轉身又對秘書說：“告訴‘文革’（小組），不能把人往死裡整！”

傅崇碧趕忙說：“主席，可不能說是我說的。”

“你怕什麼？”

他有些委屈地告訴毛澤東：“為轉移老同志的事，我挨批挨得够嗆。”

“誰批你？”

傅崇碧的嘴巴張了張，差點說出江青的名字，話到嘴邊還是咽下去了。江青和毛澤東是夫妻呀。他改口說：“戚本禹他們都批過我。”

“不要怕他們。”

毛澤東說完，準備去工作了。傅崇碧忙問：

“主席還有什麼指示嗎？”

“你今天反映的情況很好，很好。”

“我走了。”

摘自《楊余傳事件真相》58—61頁，董保存 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12月
但傅崇碧回憶中所說的許多事情，並非中央文革所為。比如“百醜圖”的事，鬥爭張茜的事，我們就一無所知。那時外交部的運動，江青叮囑過，一切聽總理的，我們不要去插手。總理要陳伯達或者其他人去講個話，也得徵詢江青的意見。

祇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傅崇碧竟能在主席面前張冠李戴地把我給端了出來。傅崇碧跟我的關係一直都很好。在文革中，我在工作上幫他辦了不少事，解決了很多難題。不然他也不會向江青提出，

要我去北京衛戍區當政委的。我想，他也不是故意要害我，他也是沒有辦法。自從王力、關鋒被審查後，我做事就一直很謹慎，很低調。所以我不可能像他所說，在追查各地走資派大員住處的會上去批評他的。批評他的是江青、康生，他卻把這些問題全栽到我的頭上。其實，在這個問題上，我沒講過一句話。後來傅崇碧在秦城監獄對我那麼客氣，恐怕也與他虧心地向主席反映情況時拿我來頂替江青、康生有關係。

這件事情我估計引起了主席對我的不滿。但這是不是就是毛主席批准審查我的主要原因呢，我不得而知。但至少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吧。

在王力、關鋒被審查後，原來去找他們兩個的造反派都轉過來找我了。他們所反映的情況和要求，都通過我來寫了文件或簡報送上去。所以當時陳毅說的也是有道理的：祇抓王、關不抓戚，等於沒抓。但陳毅說的“不抓戚本禹，黨心不服；軍心不服；人心不服”就有些不實事求是了，當時的黨心、人心、軍心是兩大陣營、戰綫分明，不能一概而論。等到我也被隔離審查之後，那造反派得到的支持就少了。本來在各地成立革命委員會的談判中，造反派的態度是比較強硬的，現在他們也祇好妥協了。這樣各地實現大聯合、實行三結合，進而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工作就比較順利了。

在被捕的同時，文革辦事組的主要成員亦被審查；快報組工作半停頓；連中央辦公廳秘書局許多原來與我有較多聯繫的人也都被審查。汪東興把秘書局的一些人（包括原“八司馬”有的成員）也說成是田家英的餘孽、死黨，進行“隔離審查”。

《紅旗》雜誌1968年第一期社論，還是姚文元和我一起修改後報給陳伯達，陳伯達送主席審批後出版的。這以後不久《紅旗》雜誌就停刊了。直到那年8月毛主席發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指示，兩個月後，姚文元為了宣傳毛主席“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思想，才接著出版《紅旗》雜誌。

第四部分

我的秦城歲月

第一章 從“請假檢討”到被捕入獄

1968年1月12日夜晚，我從釣魚臺的辦公室裡被叫到懷仁堂去開會。我心裡清楚，這是要宣布對我的處理決定了。所以，當我的秘書要隨我一起去的時候，我叫他不要去了。可他還是執意要同我一起過去。果然，後來有人告訴我，在我進了懷仁堂之後，他和司機都被關了起來。而關他們的主要原因是怕他們走漏了我被“逮捕”的消息。

我進入懷仁堂的會議室後，看見裡面已經坐著謝富治、楊成武、姚文元和汪東興四個人。我心裡明白，他們四個人是分別代表著總理、林彪、江青和主席的。這也就是向我表明，對我的處理是經過了這四個人的同意批准的。

汪東興向我宣布，對我實行“請假檢討”。隨後就叫人把我押回了釣魚臺，關在一個小樓裡，由一個連武裝的解放軍戰士看守著。我的雙手被用手銬整天整夜的反銬著。我心裡知道，這一定是汪東興使的壞，其他人是不會來管這個事的。而汪東興祇要以防止我像田家英那樣自殺為理由就行了。他這麼一來，就把我弄得痛苦不堪，都無法吃飯、睡覺。

那年的春節過後，“王、關、戚”三個人就都被從釣魚臺押走，關進了秦城監獄

到後來我才知道，與我被捕的同時，原來由我負責領導的中央文革的“快報組”和“文藝組”，都被改組或解散了，文藝組組長金敬邁等一些人也分別被“逮捕”或受審查。中央文革小組的辦公室也被改組，改由李訥負責。汪東興把中南海秘書局中原來支持我的哪一派人，打成了“田家英餘黨”，分別進行審查。

汪東興還派人抄了我的家，我的許多私人物品都被抄走了。

在我出獄時，祇歸還了很少一部分經他們檢查過的書籍給我，絕大部分物品至今都沒有歸還，其中就包括了毛主席贈送給我的“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的手迹。

同時，我那在中南海秘書室工作的妻子也被關進了秦城監獄。而被關進監獄的時候是已經懷有身孕了。我的小兒子就是出生在秦城監獄裡的，從他落地的那一刻起，他就同他的母親一起坐牢了，當時還被人叫做“秦城之嬰”。

第二章 “不批鬥、不審問、不立案” 的“三不”政策

在1967年8月底，周總理叫我送王力、關鋒二人到釣魚臺2號樓去“閉門思過”的時候，他曾交代我說，如果有人問起來，你就說他們在“請假檢討”（實際是隔離審查）。總理還跟我說，主席交代，對他倆，不準交給群眾批鬥，也不準任何人去審問他們。對他們祇是作內部審查，現在不設立專案。

不到五個月我也被隔離審查了。隨後又一起被關進秦城監獄。但對我們的政策依然還是“不批鬥、不審問、不立案”的“三不”政策。在很長的時間裡，除了有一次楊成武、傅崇碧，因追查魯迅手稿的下落來監獄提審我之外，我沒有再受到其他的審查和訊問。我出獄以後問過關鋒，他說，他也一樣，沒有受到任何審訊。直到主席去世前的一兩年，汪東興才成立了專案組對我們進行審查。

我出獄後，以前中南海的老同事告訴我，在我剛被審查的時候，中南海裡支持汪東興的那一派好幾次提出要批鬥我，都被汪東興阻止了。汪東興對他們說，鬧什麼！毛主席不讓批鬥。

即使是在1970年全國大搞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的時候，也沒有任何人來查問我與“五一六”到底是什麼關係，而那個時候我們“王、關、戚”是被說成是“五一六”總後臺的。不過後來我聽一些當年被作為“五一六分子”審查的人告訴我，在審查他們的時，倒是問到了他們與“王、關、戚”的關係。可是他們中間誰也說不出來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因為事實上我們跟他們之間，除了中央文革小組支持造反的群眾組織之外，沒有任何其他關係。

我出獄以後看到江青在我被審查後講我的一些壞話。我覺得她

的講話主要是羅織一些罪名加在我的頭上，借以撇清中央文革小組與我們的關係。

和江青不同，周總理針對我的講話就要嚴重得多了。總理在1968年3月18日的講話中，把我說成是一個到處插手的野心家。但是他不可能忘記，我做的所有事情，重要的沒有一件不是經過中央會議和中央文革小組會議討論決定，然後由我去執行的，而這些會議大部分都是由周總理主持的。在“二月逆流”之後，很多本來屬於國務院系統的工作，也是總理本人親自指定我去做的。沒有他的同意，江青也不會讓我去做。總理在講話中，他甚至還說我的兩個兒子都不是好東西。可那個時候，我的大兒子還祇有11歲，在唸小學，他人很內向，除了玩，沒有也不可能參加任何政治活動。而我的小兒子那時還沒有出生，他是1968年9月出生在秦城監獄裡的。

據我後來所看到的材料，當時毛主席講到“王、關、戚”的一共有兩次。一次是在1969年的九屆一中全會上，這次他講話的主要意思是說，打倒“王、關、戚”之後，就沒有人把中央開會的內容透露給紅衛兵和造反派了。另一次是1970年他和斯諾談話時，說到1967年8月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是一批“極左分子”。這一次，主席雖然沒有點“王、關、戚”的名，但從所講內容的時間上來看，至少是包括了我們的。他可能認為在這些過激的行動背後都是由我們在支持著的。

總的來看，我總覺得，當時毛主席並沒有把“王、關、戚”的問題“說絕”、“說死”。後來知道，主席在我們被抓起來之後，曾引誦了兩句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很多人都說，主席這是在暗喻“王、關、戚”。我出獄後，與關鋒談起過這件事。關鋒的看法不一樣，關鋒認為，主席引用這兩句詩亦是主席對自況的感嘆。

第三章 我在秦城的遭遇

我剛進秦城監獄的時候，秦城監獄的管理人員大部分是原來公安部的人，這些人對我還講政策。後來不知怎麼調來了一批從海軍轉業過來的管理員。其中有一個不知爲了什麼原因，對我好像懷有特別的仇恨，經常以各種借口毒打我。有一次他竟用他穿著海軍軍用皮鞋的腳猛踢我的腦袋，我當場就被他踢得昏死過去。之後我一連昏睡了好幾天，雖然有時還有點知覺，但腦子裡卻什麼意識都沒有了。那人看我幾天都沒吃東西，就說我裝死，是想用絕食來進行抗拒。然後他就拿了一把很大的鐵鉗硬把我的牙齒撬開，也不知他往我的嘴裡灌了點什麼東西進去。過了好幾天我才漸漸蘇醒過來。

可能是監獄的領導也怕我真死了，那他們是有責任的。所以就換了一個年紀大一點的老李頭和一個王姓的女同志來看管我，那女同志問我想吃點什麼東西，說祇要我說，他們可以給我做的。我就說，我想吃點面。她真的做了一碗熱騰騰的雞蛋面拿來給我吃。在他們的照顧下，我才慢慢恢復過來。但直到今天，祇要天氣不好，我的腦袋都還痛楚。

我就此事向監獄提出了嚴重的交涉，（我的頭腦受傷，在獄中病案中都是有記載的。）一定要把那個打我的人找出來，我要知道他這樣對我狠下毒手，原因究竟是什麼？可監獄的領導拖了很長時間才答復我，說那個打我的人已經不在監獄工作了，他們也查不到他究竟是誰，但他們向我保證，以後再也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了。

後來毛主席有一個關於嚴禁在監獄裡用法西斯手段對待犯人的批示，並要求把這個批示向所有在押的犯人傳達。但監獄就是沒向我傳達。他們說，要是我知道了主席的這個批示，能把監獄捅破天！

這以後，像這樣往死裡打的情況是沒有了。但是，虐待的情況還是經常發生的。在一些從秦城出去的人所寫的回憶錄裡說，戚本禹在秦城是經常不服管理，頂撞管理人員。其實他們那裡知道實際發生的事情。當時監獄有些管理人員和獄中的看守，時常會用很下流的話來辱罵我，甚至辱及父母。碰到這樣的人，我就會堅決地向他提出抗議，盡管我知道我的抗議不會給我帶來什麼好的結果，但我必須要維護我最起碼的人格尊嚴，不能任人侮辱。

我出獄後，我妻子告訴我，由於她是在監獄裡產下了孩子，因為缺乏營養，沒有奶水，導致了小孩頭腦發育不好，智力較差。直到小孩出生四個多月後，看到小孩體弱多病，在監獄實在無法撫養下去，才同意把小孩送去上海的外婆家。

不管我有什麼天大的問題，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掌管秦城監獄的汪東興之流，採取封建株連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手段，把無辜婦女和嬰兒關進監獄，這是黨和國家的耻辱，其責任人都應當受到歷史的追究和譴責。

“秦城之嬰”被送到上海時，全身潰爛，奄奄一息，虧得外婆與四姨媽夫婦把他視若己出，精心撫養，耐心為他治病，他才得以存活。我出獄後，竭盡全力幫他克服幼時所受到的腦力傷害，教他集中力量，攻克一門專業，現在才能成爲一個電腦方面的專家。

最近看到一個姓何的人寫的回憶秦城監獄的文章。這人曾經是秦城監獄的管理人員，他是在鄧小平上臺以後來秦城的。就是他，在1980年的時候，把我和關鋒兩個人都關進了秦城監獄的“死牢”裡。那是秦城監獄裡面條件最惡劣的單人牢房。這種牢房除了牢門，四周都是封閉的。很小的一個房間，吃喝拉撒睡都在地上，在地上挖個洞，供大小便之用。關鋒瘋了的時候，就用手往這洞裡摳屎吃。這個姓何的在文章裡說，因為我不服從管理，他就想出了個辦法來制服了我。他想出的辦法就是把蚊子放進牢房裡來咬我，這一下我就老實了。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會編出這樣故事的。在秦城監獄，絕大多數的牢房都沒有裝紗窗，蚊子、蒼蠅是到處自由飛翔的。何況那蚊子也不是他飼養著的，怎麼就聽他指揮呢？其實，祇

要坐過牢的人恐怕都會有這樣的經驗，你要是不習慣被蚊子咬，那你在監獄裡根本就別想睡覺了。坐牢的人都被蚊子咬習慣了。那時我每天醒來，身體下面被壓死的蚊子少說也有好幾個。我都覺得，我身上大概已經有了某種抗體，蚊子再怎麼咬也都已經不在乎了。

監獄的伙食也是沒法提的，按規定，我每月的伙食費是38元，這在當時來說算是很高的了。可是給我們吃的東西裡面經常有死老鼠、蒼蠅、蟑螂。我看過好幾次，管理員從鍋裡拎出死老鼠往外扔，看到它，我就一天吃不下飯。我想起了在大躍進時，毛主席號召全民除鼠害實在是太英明了。

第四章 秦城“心讀”

初進秦城監獄的時候，我感到度日如年。我一直被關在單人牢房，除了監獄管理人員和看守，我接觸不到任何其他的人。在這樣環境中，人的精神是很容易出問題的。我知道，如果我抵不住這開頭的殘酷打擊，那就是滅亡。我幾乎每天都可以聽到一些變成了精神病的人在外面亂喊亂叫。我一定得想出辦法來與監獄的惡劣環境進行對抗。

經過思考，我認定監獄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的機會，思考的機會。十八年來，我接觸了那麼多的大人物，特別是像毛主席這樣的人物；經歷了那麼多刻骨銘心的事情，就好比是喝了那麼多的奶，現在應該消化了。人的腦子是個倉庫，但如果你很久不去用它，它就會壞掉。如今，我的身體雖然被禁錮了，但我的思想是禁錮不了的。

我開始給自己制定了一個“讀書”的計劃。牢房裡沒有書，我就靠自己心中的記憶，把我以前看過的書一本一本的盡可能回想出來，然後在心裡再一次一次重復地讀。我把這樣的讀書方法叫作“心讀”。這樣一來，我覺得自己每天都有很多的事要幹了。

一當我沉浸在“心讀”之中以後，我的心境就豁然開朗起來了。當我重新回憶起那些文字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就好像是在進行一種超越時空的苦思冥想，天地萬物都成了你思考的對象。你的思想是完全自由的，它衝決著一切羅網，惟真理是從，唯有真、善、美在你的腦海裡翻騰。

通過“心讀”，你不但可以重溫過往讀過的書籍，而且你可以自我比擬你就是所讀書本當中的大人物。這是一種狂妄，但不是無知的狂妄，而是有知的狂妄，“心讀”必須狂妄。

我第一個“心讀”的是屈原的《離騷》。那還是在我上初中的時候，有位語文老師，他不管我們是不是懂得意思，就叫我們一定要把它全部都背下來，所以我幾乎可以一字不差地把它回憶出來。然後我就對它逐字逐句地反復咀嚼，在這個過程中，讓我感覺仿佛自己就是在與這位中國古代的偉人面對面地進行交談。到了後來，就覺得自己好像是已經與他融為了一體，我就成了他的替身，用他的觀念和方法來思考和理解著他的思想，再用他的思想去分析、看待他所遇到的人和事，以及我所遇到的各種各樣的人和各種各樣的事。這讓我深刻地理解了屈原那樣愛國愛民，他為什麼要自殺；理解了屈原的偉大人格；也使我深深的理解了為什麼毛主席會那麼喜愛屈原。

在出獄以後，我撰寫了一本《屈原和離騷》。可是直到今天還未能出版。我把書中的一些觀點和內容放在了我撰寫的《先秦人物》中。我認為，中國最理解屈原的不是郭沫若，而是聞一多。

之後，我又“心讀”了左傳的《曹劌論戰》、《鄭伯克段於鄆》、史記的《項羽本紀》、漢書的《過秦論》、唐宋八大家的名文、范仲淹的《岳陽樓記》等。

我還回想起了小時候跟著爺爺背誦的《易經》，諸如“潛龍勿用，亢龍有悔”，“見龍在田，飛龍在天”，等等。我把它們一條一條的都想起來，然後一天到晚地琢磨。我覺得《易經》實際上講的就是事物變化、發展的過程和規律，當我把《易經》上的東西和我自己所經歷到的人和事聯繫起來的時候，就越想越覺得有道理，就整天沉迷其中。據唐蘭先生的考證，《易經》已有七八千年的歷史了，最早的八卦是刻在陶器上的，它可以說是人類的第一部有文字的書。

直到1971年6月，我才被允許看報紙和讀書。我看到第一張報紙，上面登載著毛主席會見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的消息。

在秦城監獄裡也有個圖書室，可裡面的書很少，祇是一些馬列著作，因為看的人多，都已經被翻得很破爛了。可我祇要有可能，就借來看。久而久之，我和監獄裡的一些管理人員也漸漸熟了，他

們有事没事的也喜歡來跟我聊天。甚至有些女同志生了孩子，還來找我幫她取名字。我對她們說，我是坐監獄的人，取名不吉利的。他們看我喜歡看書，就幫我想辦法去找書；有的人出獄了，他們的書沒有帶回去，留在了牢房，他們就拿來給我看。

我一邊看書，一邊努力回憶起以前追隨著毛主席時所讀的書，毛主席生前很喜歡看《資治通鑒》、《二十四史》，他反反復復不知看了多少遍。還寫下了很多批注。我覺得毛主席寫下的批注中，他對歷史人物的點評非常獨特，於是我把看到過的主席所寫的關於歷史人物的批注，都盡量地回憶起來，做出筆記。我出獄後，就是根據在獄中所做的筆記，寫出了《先秦人物論》、《西漢人物論》等四本評價歷史人物的書。

第五章 我聽到了江青的歌聲

1976年9月9日，我在監獄裡得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當時我的心情是非常悲痛的。一代偉人，他一生戰勝了多少強敵，可他從來沒有居功自傲，仍然經常說，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他祇是人民的小學生。他享有無比崇高的威望並握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可他從未為自己和家人謀過特殊的利益。他一心祇想著如何鞏固讓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民主政權，和怎樣讓人民通過自己的艱苦奮鬥過上幸福的生活。他思想深邃，聰明睿智，目光遠大；他的理論造詣和文化功底極其深厚，這些不僅在他同時代的人中，無人可以與他相提並論，就是幾千年的世界歷史上也是罕見其匹。他在七十多歲高齡的時候，為了防止執政以後的共產黨，從為了人民利益而奮鬥的革命黨，重新變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統治者，毅然決然的發動並領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他發動和支持了最底層的人民群眾起來，要他們“關心國家大事”，敢造“走資派”的反。不用說，他此舉必然會受到黨內那些為了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一心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的反對。而另外一些看起來是擁護他的，並且當年都是跟隨他一起起來造反的人，由於自己地位的改變，如今他們對那些響應他的號召又起來造反的群眾是一萬個看不慣。正因為這樣，按照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支持造反派革命群眾的中央文革小組，在黨內所受到的反對就可想而知了。由於懾於毛主席的權威，他們還不敢把反對的矛頭直接指向他，於是就必然地衝著中央文革小組了，而中央文革小組裡資歷淺、地位低的“王、關、戚”也就自然成為了首當其衝的目標。

從1966年的5月16日起，毛主席就號召全國廣大的青少年學生、工農群眾和幹部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造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

的當權派的反。在這個過程中，中央文革小組是起了極大的作用的。沒有中央文革小組的實際支持，北京和全國各地的造反派早就被壓制下去了，不可能像後來那樣迅速的發展和壯大起來的。

1967年上海的一月革命，由群眾自下而上起來的奪權運動，文革運動發展到了新階段，使得黨內的各種矛盾空前地尖銳起來。毛主席及時地提出了要由軍隊、幹部和群眾實行“三結合”，建立革命委員會這樣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權。然而在執行的過程中，出現了各種錯綜複雜的矛盾和鬥爭。1967年武漢發生的“七二〇事件”正是這種矛盾和鬥爭的突出的反映。

在親歷了武漢“七二〇事件”之後，毛主席的戰略指導思想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在建立革命新秩序的過程中，從依靠造反派、團結大多數的方針，到提出實行革命的“大聯合”的方針。對於主席的這個戰略思想上的轉變，不僅“王、關、戚”的認識不足，就是江青、康生和陳伯達的認識也同樣沒有跟上主席的思想。所以我們仍然和以前一樣，實行依靠支持造反派的方針。甚至還在1967年8月1日的《紅旗》雜誌社論中，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這樣的錯誤口號，實際上是嚴重干擾了毛主席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戰略部署。

在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之後，我就處在矛盾的焦點上了。因為張春橋、姚文元他們當時的主要工作在上海，而上海的文革運動又是毛主席親自過問和領導的。於是我就無形中成了各地造反派向中央反映自己訴求的主要渠道。整天為他們所受到的打壓鳴不平。所以我想，毛主席同意對我進行隔離審查，不可能祇是出於一時一事的誤會和誤判，而是形勢所造成的。

我想起了斯大林說過的，當歷史車輪在轉彎的時候，總有人要被從車上甩出去的。我大概也是這樣的被歷史車輪甩出去的人吧！然而即使如此，也沒有動搖我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目標的追求和對忠誠毛主席繼續革命思想的信念。

1971年發生林彪事件後，我在監獄裡聽不到有關中央文件的傳達。從我當時的認識來說，我和關鋒一樣，根本不會相信林彪會謀

害毛主席。後來我看到中央文件上影印出來的林彪“手令”，看出它根本不是林彪的筆迹。我當時還認為，這一定是黨內有人在陷害林彪。當時並不知道他兒子林立果逆天行事，在暗中策劃謀殺毛主席的陰謀。不管林彪知不知道他兒子的這些陰謀，他教子不嚴，責無旁貸。

主席逝世後，監獄裡有個姓李的管理人員，即前面所提的“老李頭”，他來跟我聊天，他問起我對主席去世後國內的形勢怎麼看？我就隨口跟他說，你去把空著的牢房都收拾收拾吧，我估計很快就會有新的人進來的。老李對我的說法很不以為然。

可是沒過多少天，“老李頭”就來跟我說了，你是怎麼知道很快就有新的人要進來的呀？我朝他笑笑。

沒多久，我隱隱約約地聽到了江青的叫罵聲。我長嘆了一口氣。

過了一段時間，我聽到了浩亮在牢房裡唱起了《紅燈記》裡唱段。之後，我又聽到了江青的歌聲，她唱的是《紅梅贊》，她是個不屈的女英雄。

我在知道了鄧小平重新上臺以後，就根本沒有了活著離開秦城監獄的想法，更不幻想他會寬大革命派。他愛怎麼整就讓他整吧！

第六章 鄧小平上臺後對我的“審判”

鄧小平上臺以後，爲了清除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爲他的名詞“改革開放”而實質就是復辟資本主義掃清障礙，從1980年開始採用刑事訴訟的方式，來審判所謂的“江青”、“林彪”“反黨集團”的“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

由他們組成的“特別法庭”也派人來秦城找了我。來人對我說，你是被江青關進監獄的，都已經坐了十幾年的牢了。現在要審判江青，你應該出來揭發她的問題，出庭作證，以爭取對你的寬大處理。我說，我可以出庭作證，但我必須按照我自己的意願來作證。他們問，那你準備怎麼作證呢？我說，按照毛主席說的實事求是，是什麼就說什麼。我不會迎合別人作任何虛假的證詞。他們問了我有關從成都揪回彭德懷的事情。我說，那是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討論決定的，是關鋒、王力和我首先提出的，總理和江青也力主此議。他們問，你們爲什麼要提出這個建議呢？我就說，我們是根據西南局送來的報告提出的。後來他們在“法庭”上引述了我的這個證詞，可是在引述的時候，他們去掉了“總理”，成了“江青和我力主此議”。他們又追問我，江青是怎麼利用“伍豪事件”來迫害周總理的。我說，這是胡說八道。江青當時就指出，這是敵人的造謠。他們讓我把經過都寫出來，我就如實地寫了。可是這個證詞，他們沒有在“法庭”上引用。我這樣的態度當然不會讓他們滿意。所以他們就對我說，你如果不和我們合作，那你就必須考慮到自己的後果。我說，這你們就不用來嚇唬我了，我已經坐了十幾年牢了，再坐個十幾年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在審完江青等人之後，就輪到來審判我了。他們成立了專門

的小組來準備“起訴”的材料。專門小組的人來監獄問我的意見。他們說，你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我說，照我的意見，你們“審判”江青等人都是完全錯誤的。他們說，你不要對立，你要以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我說，我早被你們開除了，“還講什麼黨員標準”。他們說，不管怎樣，你也要服從中央的決定。他們問我是不是要請律師。我說，要請的話，我就請雷潔瓊女士做我的辯護律師。他們說，她年紀大了，出不了庭。我說，你們跟她說了沒有？他們說，上次就有人想請她，結果不行。後來我知道，他們說的“上次”有人想請雷潔瓊做辯護律師的是江青。結果，他們就給我指定了一位北京的傅志人律師爲我作辯護。這位傅律師倒是一位有職業操守的律師。

他們首先問起的就是張霖之的死，其實他們都知道張霖之是毛主席點名的走資派，動員群眾鬥爭張霖之的是總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決定的，也是他們指定我去講話的。但是因爲祇有這個問題是他們可以用來判我重罪的依據，所以以此爲突破口反復追問。他們問，張霖之是怎麼被人打死的？我說，當時法醫的驗尸報告都在，他的皮下傷並不致死，他確實是上吊自殺的。他們繼續追問我說，不管他是自殺的也好，不是自殺的也好，對他的死，我都是有責任的。可你們幹嘛一定說他是被打死的呢？你們是不是要從我這裡拿到這個結論，然後可以去整那些群眾呢？你可以說是我發動群眾把張霖之批鬥致死的，但不能說是我叫群眾把他打死的。如果說是我叫人把他打死的，那豈不成了故意謀殺了嗎？該我負責的事，我一點也不推卸，但一定要說是我叫人把他打死的，我不能認同。那爲首與我談話的人點了一下頭，聽取了我們的申辯。後來，他們就把“被打致死”改爲了“迫害致死”，含含糊糊地了事。

接下來就是說我“誣陷”、“迫害”萬里的事了。我對他們說，我和關鋒寫給主席的報告，是根據我在北京調查處理“老紅衛兵”“亂打人”“亂抄家”、“打死人”的情況和在大興縣瞭解的殺人慘案情況，以及中央文革“快報組”的匯報來寫的。如果你們現在可以拿出證據來，證明北京所謂“紅八月”的“紅色恐怖”和

大興縣的事與萬里無關，那我就承認我是“誣陷”。對此，他們照例是以沉默來作回答。

在他們的“起訴書”上說我和關鋒是在1966年6月16日寫的信，當時我没有太注意這一點。後來我想不對，我們指控萬里的信，我記得我和關鋒是在1966年的8月26日給毛主席寫的，然後毛主席是在8月28日作出批示，8月29日召開的會議，怎麼會搞到6月16日去呢？那年的6月，還是劉鄧在大搞資反路綫的時候，主席和江青也不在北京。也沒有給江青、康生，給陳伯達寫這個問題的信，當時還也未發生1966年8月那樣的“紅色恐怖”情況，我們不可能給主席寫那個報告。

審問完了之後，我在監獄裡就聽到當時公安部的人說，看來戚本禹的案子很難判，因為他做的事情都是上面作決定有指示的，像揪回與批鬥彭德懷、批鬥張霖之都是上面有指示的，他祇是個執行者。

我有個朋友叫曹音，他寫過一本《老子》的書，還讓我給他寫了序。他和江華的兒子很好，他有一次問江華的兒子：戚本禹不過是個執行者，怎麼把他判了十八年啊？江華的兒子去問了父親以後告訴他：他父親說，戚本禹的案子是鄧小平親自指示，要加重處理的。

附錄：戚本禹“反革命案”的起訴書、公訴人發言、辯護詞和判決書。

戚本禹反革命案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 起訴書

(83)京檢分審字第92號

被告人戚本禹，男，現年五十一歲，山東省威海市人。原任《紅旗》雜誌社歷史組組長，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等職。因反革命罪，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四日被依法逮捕，經北京市公安局偵查終結，特送本院審查起訴。

經本院審查確認，被告人戚本禹在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

員期間，積極參與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犯罪活動，犯有下列罪行：

一、誣陷並煽動迫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朱德，副委員長彭真，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陶鑄、賀龍、陸定一、羅瑞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德懷，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楊尚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

被告人戚本禹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十八日、十九日三次會議上，分別對參加會議的在京報社、電臺等宣傳部門負責人和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以及中南海機關的一些人，誣陷說：“什麼劉少奇，什麼彭德懷，什麼鄧小平，什麼賀龍，什麼彭真這些人，彭、羅、陸、楊都是賣國求榮的，殺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盜”。“彭德懷、賀龍都是吃人的老虎”，“殺人不眨眼的野心家”。“彭德懷、羅瑞卿血債累累”。並且，煽動說：“不僅劉少奇，什麼鄧小平、陶鑄、彭德懷、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統統都要批判”，“切不要對他們發善心”。“不把他們批倒”，“你們領袖之類的”，“都要抓起來，殺頭！”

被告人戚本禹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釣魚臺十六樓，召集中共中央辦公廳一些人開會說：“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轟轟烈烈”，“劉、鄧、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們為什麼不去鬥他們”。在戚本禹的煽動下，當晚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七、八十人闖進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住處，對他們進行圍鬥。同年七月十四日，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的一些人，寫信給汪東興、周恩來總理，要求開會當面批判劉少奇。戚本禹收到信後，卻把信送給江青、康生、陳伯達。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擅自決定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夫婦進行批鬥。七月十八日凌晨，戚本禹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中南海機關的一些人開會說：“前幾天中南海圍鬥了劉少奇，規模小，有人圍鬥他總是好，但是火力不強”。“對劉、鄧、陶面對面鬥爭”，“這是你們相當時期頭等重要任務”。“要使他們威風掃地，要殺氣騰騰”，“可以低頭彎腰”。並布置說：“搞幾個戰鬥組織，有的搞劉少奇，有的搞鄧小平，有的搞陶鑄。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組織、煽動下，當天中南海三百餘人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強迫低頭彎腰。嗣

後又多次批鬥了劉少奇和王光美，鄧小平和卓琳，陶鑄和曾志，進行人身迫害，並先後抄了他們的家。

被告人戚本禹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釣魚臺召集中央辦公廳的一些人開會，誣陷朱德是“大野心家”、“大軍閥”等，指使一些人逼迫曾任朱德秘書的曹全夫揭發朱德和康克清的所謂問題。戚本禹還煽動說：“你們可以貼大字報揭發，可以去婦聯點火。”當天晚上，中央辦公廳的一些人闖進朱德的住所，圍鬥了康克清，在中南海西門等處，張貼了誣陷朱德的大標語、大字報。一月底，戚本禹接見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些人，又煽動說：“孫泐（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給朱德當過秘書，你們通過孫映可以搞朱德的問題，不要有顧慮。”在戚本禹的煽動下，“打倒朱德”、“朱德是大軍閥”的大字報、大標語在北京市街頭廣為張貼。

被告人戚本禹伙同關鋒，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就聯名給江青、康生、陳伯達寫信誣陷：“彭德懷到三綫以後還在積極進行不正當的活動”，“直到現在還是一面黑旗”，“要徹底消除這個隱患”。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彭德懷被戚本禹指使的學生從四川省挾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寫信給江青說：“彭德懷現在已經被紅衛兵抓住，一、二日內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學生，已經做好了鬥爭的準備。”一九六七年七月，戚本禹指使韓愛晶和王大賓組織實施對彭德懷的批鬥迫害。七月十九日，韓愛晶糾集北京航空學院的幾十個人“審鬥”彭德懷。在“審鬥”中，韓愛晶首先動手毆打，隨後一些人又拳打腳踢，致使彭德懷被打斷肋骨，傷及肺部，造成重傷。七月二十六日，北京航空學院和北京地質學院聯合召開萬人批鬥大會，彭德懷被批鬥後又被押上卡車上街游鬥，再次慘遭迫害。

二、誣陷和煽動迫害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萬里、陳克寒、趙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江青誣陷“張霖之是彭真死黨”。十九日，張霖之被北京礦業學院一些人非法扣押。二十四日，戚本禹在北京礦業學院群眾大會上說：“煤炭部領導，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幹好事，煤炭部部長張霖之是彭真死黨。”“我

們的炮火還不够，還要集中炮轟，狠狠地打擊。”在戚本禹的煽動下，北京礦業學院和煤炭部的一些人，連續多次對張霖之進行批鬥、刑訊、毒打。張霖之被迫害致死。

被告人戚本禹於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伙同關鋒寫信給江青、康生、陳伯達，誣陷“萬里、陳克寒、趙凡是壞人”，“讓他們還坐在北京市委書記處，他們會搞陰謀、搞破壞”。

三、策動打、砸、搶，使國家文物遭到嚴重毀壞。

被告人戚本禹在一九六六年十月指使《紅旗》雜誌社林傑派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帶人到山東曲阜縣“造孔家店的反”。十一月九日，譚厚蘭帶一百餘人到曲阜，串連當地一些人，成立了“徹底搗毀孔家店革命造反聯絡站”，召開“徹底搗毀孔家店誓師大會”，煽動砸毀孔廟、孔府、孔林，致使國家重點保護的文物遭到嚴重毀壞。

被告人戚本禹的上述罪行，有證人證言、物證、書證佐證，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條關於適用法律的規定，本院認為被告人戚本禹積極參與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犯罪活動，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條、第一百零二條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第一百三十七條聚眾“打砸搶”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特依法提起公诉。

此致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

檢察員 趙雲閣

孫成霞

書記員 閻 枚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對被告人戚本禹所犯罪行的發言

公訴人 趙雲閣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日）

審判長、人民陪審員：

現在，我就被告人戚本禹犯罪的性質和主要情節以及他應負的刑事責任，作如下發言：

首先，被告人戚本禹是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積極煽動者。

就此，我發表以下四點意見：

第一，庭審調查證明，戚本禹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十八、十九日的三次會議上，肆意誣陷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陶鑄、賀龍、陸定一、羅瑞卿，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德懷，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楊尚昆。給這些黨和國家領導人強加上種種莫須有的罪名，誣陷的性質和情節，都是十分嚴重的。特別是他在十六日的誣陷活動，主要是對在京報社、電臺等宣傳部門負責人和當時所謂“五大領袖”的聶元梓、蒯大富、王大賓、韓愛晶、譚厚蘭等人進行的。因而，在全國範圍內製造了混亂，為江青反革命集團搞亂中奪權，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第二，戚本禹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釣魚臺召集中南海機關一些人開會，積極煽動了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人身迫害。他在煽動時說：“有些事中央不好說，你們群眾幹了，框框就打破了。”有人提出：“劉少奇那裡有警衛，進不去。”戚本禹說：“如果警衛不讓進，你們可以質問他，是當革命派，還是當保皇派？”在戚本禹的煽動下，當天晚上，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的七、八十人先後衝進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住處，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進行了圍攻批鬥。一九六七年七月初，江青、康生、陳伯達策劃：“要把劉少奇批得比托洛茨基還要臭。”於是戚本禹又煽動中南海機關一些人，在七月十四日，強迫劉少奇主席出來看大字報，並進行圍鬥，對劉少奇主席又一次實施了人身迫害。當日晚，圍鬥劉少奇主席的人把這次圍鬥的情況專題報給了戚本禹。就在這一天，中南海機關的一些人，寫信給汪東興並周恩來總理，提出要開大會，“批鬥劉少奇”。戚本禹不把這封信送給周總理，竟然在信上批道：“請康生、陳伯達、江青決定”。陳伯達將信中要求“批鬥劉少奇”，改為“批鬥劉、鄧、陶夫婦”，江青、康生又提

出要“批鬥並抄家”。七月十七日晚，趁毛主席去南方視察的機會，江青、康生、陳伯達、戚本禹等一伙，在人民大會堂擅自決定了對劉、鄧、陶夫婦進行批鬥。

接著，戚本禹不僅煽動並且具體組織指揮了對劉少奇主席、鄧小平副總理、陶鑄副總理的人身迫害。他同江青等人在十七日連夜策劃以後，十八日凌晨一點多鐘，親自召集中南海機關一些人開會，煽動說：“前幾天中南海圍鬥了劉少奇，但規模小，火力不強”，“要緊急動員起來”，對“劉、鄧、陶開展面對面的鬥爭，這是你們相當時期頭等重要任務”，批鬥時“要有殺勁”，“要殺氣騰騰的，可以低頭彎腰”，“要使他們威風掃地”，“對他們切不可憐惜，”“要發揚痛打落水狗精神，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祇脚。”並指使馬上成立“批鬥劉、鄧、陶戰鬥指揮部”，“組織隊伍，投入激戰”。從如何成立“批鬥指揮部”，如何搜集所謂“材料”，如何制定“戰鬥方案”如何分組編隊，如何寫簡報，直到批鬥的方式、規模、參加人數、批鬥的日期，都是戚本禹親自安排、親自決定的。在戚本禹的煽動、策劃下，十八日晚上，中南海三百多人批鬥了劉少奇和王光美，並進行人身污辱，低頭彎腰，罰站兩個多小時。十九日，戚本禹又對“批鬥劉、鄧、陶指揮部”的人說：“昨天鬥了劉少奇，會開得很好”，“下一步轉入小會”，“王光美的會可以繼續開。鬥鄧、陶爭取二、三日內準備好”。二十日，戚本禹向“指揮部”的人說：“劉的小會可開，對王光美可開大會。”二十一日，戚本禹又打電話向“指揮部”的人說：“陶鑄的會可以開，會議規模一、二百人。”二十三日，戚本禹又指使一些人鬥爭鄧小平。又在戚本禹的具體指揮下，中南海機關的一些人，十九日、二十一日，先後兩次批鬥了陶鑄和曾志，二十九日，批鬥了鄧小平和卓琳，二十四日、二十六日和八月二日批鬥了王光美。並在批鬥時先後抄了他們的家。

第三，戚本禹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釣魚臺召集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一些人開會，誣陷朱德委員長“是反毛主席的”，是“大軍閥”，“大野心家”，指使他們去反朱德和康克清。有人提

出：“我們不了解朱德和康克清的情況。”戚本禹說：“曹全夫原是朱德的秘書，你們可以讓他揭發。”會後，秘書局的一些人圍鬥了曹全夫，當晚，又衝進朱德委員長的住所，圍鬥了康克清，由於朱德未在家，才免遭迫害。第二天，中南海一些人又到全國婦聯去“點火”，貼大字報，誣陷康克清，並在中南海西門、府右街、天安門等處貼出了誣陷朱德委員長的大字報和大標語。

不僅如此，同月底，戚本禹又親自到中國人民大學煽動說：“孫泱給朱德當過秘書，你們通過孫泱可以搞朱德的問題，不要有顧慮。”於是，人民大學的一些人，連夜在北京的大街上貼出了“打倒朱德”，“朱德是大野心家、大陰謀家”等大標語、大字報。用後，又發動成立了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濟華大學、北京地質學院、解放軍後勤學院等十幾個單位參加的所謂“揪朱聯絡站”。這個“聯絡站”又派人四出搜集所謂“材料”，並且編造了誣陷朱德委員長的傳單、小報，廣為散發。僅《新北大報》就印發五十萬份，發往全國。

現在，已經徹底查清，在“文化大革命”中，社會上出現的誣陷朱德委員長的活動，主要是戚本禹秉承江青的旨意煽動起來的。

第四，戚本禹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伙同關鋒聯名給江青、康生、陳伯達寫信誣陷彭德懷“到三綫後還在積極進行不正當活動”，“直到現在還是修正主義的一面黑旗”，提出“要徹底清除這個隱患”。到同年十二月，戚本禹先後指使北京地質學院的朱成昭，和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派人去四川挾持彭德懷。十二月二十六日，戚本禹寫信向江青報告：“彭德懷現在已經被紅衛兵抓住，一、二日內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學生，已經作了鬥爭的準備。”後來康生、陳伯達、戚本禹等在人民大會堂召集北京高等學校的一些人開會，指使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等組織鬥爭彭德懷的大會。這次會後，戚本禹又指使中央文革辦事組人員，通知韓愛晶和王大賓，由北京航空學院和北京地質學院聯合起來批鬥彭德懷。正是由於戚本禹的煽動和唆使，韓愛晶等人才有恃無恐地對彭德懷實施了嚴重的人身迫害。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

日，韓愛晶在北航首次召開的所謂“審鬥”會上第一個動手打了彭德懷，隨之，一群打手蜂擁而上，拳打腳踢，連續將彭德懷打倒了七次，前額被打出血，肺部受了傷，兩根肋骨被打斷。彭德懷被送回住所後，胸部疼痛難忍，呼吸困難。就是在彭德懷這樣重傷的情況下，七月二十六日，北京航空學院和北京地質學院又聯合召開“批鬥彭德懷的萬人大會”。會上又搞“噴氣式”。會後，又把彭德懷押上卡車進行游鬥，由兩個人揪著耳朵，一個人托著頭，扳著腰，拳打腳踢，從北京航空學院經新街口一直游鬥到天安門。這時，彭德懷的手和胳膊全被擰壞，渾身傷痕累累，已經不能行走了，是被人從汽車上抬下來的。

彭德懷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創造者之一，是一位功勳卓著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受到如此嚴重的迫害，戚本禹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

從以上事實，可以清楚地指出，戚本禹誣陷並煽動迫害劉少奇主席、朱德委員長、鄧小平副總理、陶鑄副總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德懷，包括他對彭真、賀龍、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誣陷、迫害，完全是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惡陰謀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這些罪行，都是為江青反革命集團實現他們篡黨奪權的反革命目的而服務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條規定：“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的、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爲，都是反革命罪。”事實足以證明，戚本禹積極實施了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嚴重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爲，已經構成了反革命罪。

《刑法》第一百零二條還規定：以反革命為目的，以反革命標語、傳單或者其他方法，宣傳煽動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在江青反革命集團對黨和國家領導人實施誣陷、迫害的犯罪活動中，戚本禹直接實施的犯罪行為主要是進行宣傳煽動。因此，本院依法確認被告人戚本禹犯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必須依法予以追究。

其次，被告人戚本禹是誣陷、迫害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造成嚴重後果的主要責任者。

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江青在人民大會堂一次會議上，誣陷“張霖之是彭真死黨”以後，戚本禹立即到北京礦業學院，在全校大會上煽動說：“張霖之是彭真死黨”，“是煤炭工業部的頭號敵人”，“要集中炮轟，狠狠地打擊”。隨後，張霖之就慘遭迫害，批鬥會一場接一場，打得一次比一次凶狠。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批鬥大會上，張霖之被踢倒在地，脖子後插一個大木牌子，扎得鮮血順著脖子往下流。鬥後，又扒下棉衣，逼迫張霖之在攝氏零下十幾度的院子裡挨凍。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的鬥爭會上，不僅打罵，搞“噴氣式”，而且把一個特制的六十多斤的大鐵帽子戴在張霖之頭上，頭部被壓出條條血印。在一次刑訊中，又揪住張霖之的頭髮前拉後搦，甚至卡住脖子，逼迫張霖之九十度大彎腰站著，當場又把張霖之打倒在地，喊著“一、二、三”，逼迫張霖之在三秒鐘之內站起來，三秒內站不起來，就拳打腳踢。在一次游鬥張霖之之後，又強迫他站在鐵椅子上彎腰“悔罪”，在脖子上掛一個鋪蓋卷，雙手還舉著一個“張霖之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大牌子。張霖之實在忍受不了，祇說了聲“累”，又遭毒打，然後又強迫他站在凳子上大彎腰，舉牌子。前後一個月的時間裡，張霖之幾乎天天遭受摧殘，於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被迫害含冤而死。據屍體檢驗，張霖之遍體鱗傷，渾身紫腫，僅條狀傷口和傷痕就達三十多處。顯然，張霖之之死，是戚本禹誣陷和煽動迫害造成的後果。戚本禹還對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萬里、陳克寒、趙凡進行了誣陷。顯然已經構成了誣告陷害罪。因此，我提議法庭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條的規定，追究戚本禹的刑事責任，並按照本條關於國家工作人員犯誣陷罪的，從嚴處罰的規定，給戚本禹以應得的懲處。

還有，法庭出示的證據，已經證明，譚厚蘭等帶人到曲阜聚眾打、砸、搶，完全是戚本禹指使進行的，後果是十分嚴重的。據統計，譚厚蘭等人共毀壞文物六千餘件，燒毀古書二千七百餘冊，各

種字畫九百多軸，歷代石碑一千餘座，被毀壞的文物中，有國家一級保護文物七十餘件，珍版書籍一千多冊。

我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嚴禁聚眾“打砸搶”。因聚眾“打、砸、搶”毀壞或者搶走公私財物的，首要分子以搶劫罪論處。戚本禹是譚厚蘭這次聚眾“打、砸、搶”的策動者。因此，我提請法庭就戚本禹的這一罪行。按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條關於聚眾“打、砸、搶”罪的規定，和第一百五十條關於搶劫罪的規定，決定對戚本禹的處罰。

庭審調查結果表明，本院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戚本禹的犯罪事實是清楚的，證據是確實、充分的，請法庭依法作出判決。

為被告人戚本禹辯護的辯護詞

律師 傅志人

審判長、人民陪審員：

我接受被告人戚本禹的委託，擔任他的辯護人。現在根據本案事實和證據情況以及有關法律規定，提出以下辯護意見。

一、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戚本禹參與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犯罪活動。從法律責任上講，“參與了犯罪活動”就必然有主從之分和責任大小的區別。因而有必要進行具體分析，正確判斷他們各自應負的責任。

江青反革命集團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是早有預謀的。這一點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江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的判決書中有清楚的認定。江青直接控制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逮捕無辜刑訊逼供製造偽證，誣陷劉少奇是“叛徒”、“特務”。張春橋指使學生蒯大富在社會上煽動“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諸如“痛打落水狗”之類的惡毒語言，就是張春橋首先面授蒯大富的。對劉、鄧、陶夫婦批鬥抄家是江青、康生、陳伯達決定的。誣陷賀龍是“壞人”、“大劊子手”，也首先出自江青之口。江青直接插手羅瑞卿專案組，誣陷羅瑞卿是“大反革命。”江青還誣陷陸定一是特務，誣陷彭德懷是“漢奸”。起訴書所指控被告人戚本禹

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十八日、十九日三次講話中，誣陷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是在上述江青、張春橋、康生、陳伯達等人一系列誣陷迫害活動的背景下進行的。其誣陷內容與江青、張春橋、康生、陳伯達等主犯的誣陷內容，基本相同，有的還是同一誣陷內容的重復。由此可見，戚本禹的誣陷行為具有從屬性，主從關係是分明的。戚本禹的活動處於次要地位，起著次要作用，是可以肯定的。

二、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戚本禹煽動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此，根據卷內證據材料，以下幾個情節應當報請法庭予以考慮。

第一、戚本禹布置一些人“搞幾個戰鬥組，有的搞劉少奇，有的搞鄧小平，有的搞陶鑄……”這是事實。但是戚本禹這一行動是在江青、康生、陳伯達明確批示：批鬥劉、鄧、陶夫婦並抄家以後進行的。

第二、戚本禹指使學生把彭德懷從四川挾持回到北京，是江青首先提出來，要“把彭德懷弄回來”，在這之後戚本禹才指派學生行動的。至於學生韓愛晶等人對彭德懷實行人身迫害，造成彭德懷重傷，對此嚴重後果，戚本禹有責任，直接動手行凶毆打彭德懷的韓愛晶等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三、對於朱德，戚本禹曾制止了一些人搞萬人大會批鬥朱德的企圖。這一點卷內有關證據材料是可以證明的。被告人戚本禹這一行為表明他的思想認識上有了一定的變化，客觀上避免了更為嚴重的後果的發生，是一種停止繼續進行犯罪的表現。

我認為：正確判斷被告人戚本禹的責任，必須對其參與實施犯罪的具體情況進行全面的分析。以上情節表明，戚本禹是在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的具體指使下實施犯罪的，基本上是一個執行者。在對朱德實施犯罪的過程中，戚本禹的主觀認識上有所變化，客觀行動上有所表現，應當予以肯定。

三、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戚本禹“誣陷並煽動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按照刑法第一三八條和第一〇二條的規定，誣陷和煽動都是獨立的罪名。因此，把“誣陷”和“煽動”兩個罪名同時並列，是

需要認真研究的。從本案事實及證據材料看，戚本禹對黨和國家領導人實施的犯罪活動，其主觀目的是一個，行為也是一個。誣陷的言詞是作為煽動的手段或者內容存在的。這樣，雖然可以說侵犯了兩個客體，但實際上屬於牽連罪，應按重罪吸收輕罪的原則辦事，確定一個罪名。

四、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江青誣陷“張霖之是彭真死黨”，以致張霖之被北京礦業學院一些人非法扣押，並且已經發生了對張進行人身迫害的非法行為。二十四日，戚本禹在北京礦業學院群眾大會上也說“煤炭部部長張霖之是彭真死黨”。起訴書指控“在戚本禹的煽動下，北京礦業學院和煤炭部一些人連續多次對張霖之進行批鬥、刑訊、毒打。張霖之被迫害致死”。對於這個指控，應當說明以下兩點：

第一、張霖之被迫害的主要原因，來自江青的誣陷和煽動。江青誣陷“張霖之是彭真死黨”，是在接見北京礦業學院紅衛兵負責人時講的，是當眾公開進行的。戚本禹的講話是在江青煽動之後，其誣陷內容沒有超出江青誣陷的範圍。

第二、在戚本禹講話之前，張霖之已經被非法扣押，受到批鬥，打罵。在戚本禹講話後，人身迫害活動更加嚴重了，這是事實。但是對張霖之進行殘酷的刑訊、毒打，是北京礦業學院和煤炭部的一些人直接進行的。主要凶手有王業春、剛守堂等人。六十多斤的鐵帽子是山西一個煤礦的一些人蓄意製造弄來北京的。這就是說，那些內心殘忍手段毒狠的凶手，對於造成張霖之被迫害致死的嚴重後果，也負有直接的法律責任。

以上兩個情節說明，戚本禹的講話加強了江青對張霖之的誣陷效果，對於北京礦業學院和煤炭部一些人，有相當的影響，對於後果的發生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就主要責任而言，首先應由江青承擔，其次那些直接行凶的凶手，也負有嚴重罪責。

五、起訴書指種“被告人戚本禹於一九六六年六月伙同關鋒寫信給江青、康生、陳伯達，誣陷萬里、陳克寒、趙凡是壞人”，“讓他們還坐在北京市委書記處他們會搞陰謀，搞破壞”。這裡應

當指出，在這件事情上，戚本禹和關鋒的責任，不是等同的。關鋒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供認，他和戚本禹所寫聯名信件中，誣陷彭德懷的內容是戚本禹所寫，而誣陷萬里、陳克寒、趙凡的內容則出自關鋒，由關鋒執筆。戚本禹與關鋒聯名寫信誣告，應當共同負責，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從誣告信形成的實際過程看，兩相比較，關鋒應負主要責任，戚本禹應負次要責任。

六、公訴人今天在公訴意見中提出，“譚厚蘭到曲阜聚眾打砸搶，完全是戚本禹指使進行的。後果十分嚴重，共毀壞文物六千餘件，燒毀古書二千七百餘冊，各種字畫九百多軸，歷代石碑一千餘座”等等。對於這一罪行，戚本禹要負主要責任。但是，卷內材料證明，譚厚蘭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帶人到曲阜的，十二日陳伯達就曾插手此事，他曾指示：“孔墳可以挖掉。”這就是說，陳伯達也有一定責任。卷內曲阜縣文物管理委員會的材料證明，造成上述嚴重後果，不完全是譚厚蘭所為。譚厚蘭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返回北京的，而一年半以後的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曲阜縣的王正聽“又把孔府所存的東西全部搬出”，使這些東西遭到又一次的破壞和丟失。對後果來說，王正聽的破壞行為所造成的部分，應罪責自負。

以上辯護意見，請法庭考慮，依法對被告人戚本禹予以從輕處理。

關於批駁被告人戚本禹的發言

公訴人 孫成霞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日)

審判長、人民陪審員：

我對被告人戚本禹的辯護人提出的，應該把戚本禹同江青、康生、陳伯達在責任上加以區別，以及戚本禹不能承擔誣陷、迫害彭德懷、張霖之的全部責任，表示同意。

被告人戚本禹在法庭辯論中提出的種種辯解理由，中心內容是否認他犯有反革命罪，他一再講什麼“我沒有一件活動是自己發明

創造的”，“我都是按康生、江青，陳伯達的指示、講話、布置辦的事”。這種辯解不僅不能為他開脫罪責，反而恰好證明了本院起訴書指控他參與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犯罪活動是屬實的。

他還說：“有些事是他們下邊幹的，我不知道。”這純系推卸罪責，也必須予以揭露。

第一，江青反革命集團在圖謀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犯罪活動中，最主要的是通過有預謀地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來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戚本禹秉承江青、康生、陳伯達的意旨，親自煽動並組織指揮了對劉少奇主席、鄧小平副總理、陶鑄副總理的人身迫害，親自在社會上煽起了誣陷朱德委員長的活動；親自煽動唆使韓愛晶等人迫害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德懷。十分明顯，戚本禹這些犯罪行為完全是為江青反革命集團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的。戚本禹在煽動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時候說：“首先批判劉少奇，不僅劉少奇，什麼鄧小平、陶鑄、彭德懷、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統統都要批判，”“你不把他在群眾中搞臭，就是個禍根、隱患，”“將來這樣的人一旦上臺”，“什麼聶元梓一派，什麼師大派，什麼地質王大賓，什麼譚厚蘭，統統殺頭。”可見戚本禹對他們從事的犯罪活動具有什麼樣的性質當時就是很清楚的，更何況他在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時曾經用明確無誤的語言說過“要有殺勁”，“天王老子也不要怕”，“就是要搞他個天翻地覆”。在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裡，“要搞他個天翻地覆”這和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張春橋提出的“改朝換代”不是完全一致的嗎！事實、證據俱在，戚本禹企圖否認他的犯罪行為的反革命性質，當然是辦不到的。

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國家政治生活陷於極不正常的狀態。江青反革命集團得以憑借他們取得的權力和地位，採取反革命兩面派手法，利用合法的、非法的，公開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種手段，有預謀地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妄圖達到他們篡黨篡國，推翻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目的。戚本禹在參與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犯罪活動中，正是這麼幹的。他在辯解中，故意避開

本院指控他的具體的犯罪事實和從事犯罪活動所采取的陰謀手段，竭力用他在手段、方法、活動形式上的某些合法外衣，來掩蓋他的非法活動。但是事實是勝於雄辯的。中央辦公廳一些人，寫信提出要“批鬥劉少奇”，這信明明是寫給汪東興轉呈周總理的。當時戚本禹身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在任何情況下，他有責任把這封信及時呈送給周總理，而且是完全有條件這樣做的。而戚本禹不把信送給周總理，卻故意把信送給江青、康生、陳伯達並請他們來決定。江青一伙擅自決定“批鬥劉、鄧、陶夫婦”以後，在戚本禹煽動面對面批鬥劉少奇主席、鄧小平副總理、陶鑄副總理的時候，有人提出：“我們不敢隨便鬥。”戚本禹卻說：“你們都是政策觀念派，有些話中央不好說，你們現在幹了，框框就打破了。”恰恰在毛主席到南方視察期間，戚本禹在中南海煽動了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人身迫害。戚本禹指使“中南海批鬥劉、鄧、陶指揮部”制定的戰鬥計劃中，還明文規定：“保密工作一定要作好，對中南海外嚴格注意保密，如有人問及此事，祇說是在背靠背的大批判。”這個計劃戚本禹親自圈閱後說：“這個任務要保密，不要向外說，不要打電話，這是紀律，有什麼問題我負責。”戚本禹在煽動誣陷朱德委員長時，對人民大學的一些人明確地說過：“你們不要說是我叫搞的，你們一講我叫搞的，就搞不成了。”戚本禹的這些“發明創造”，是不是陰謀，是不是非法的，不是很清楚的嗎！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由於我們黨在“文化大革命”這一歷史時期犯了錯誤，就不可避免地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歷史事實無情地揭露了戚本禹正是這樣一個分子。

第三，戚本禹在辯解中，還妄圖以“我當時祇是說了句話”，“是下邊幹的”，“我不知道”，來推卸自己的罪責。人所共知，當年戚本禹竊取要職，不可一世，他的幾句話有多大份量，戚本禹自己心中是有數的。戚本禹策動譚厚蘭去曲阜“打、砸、搶”，確實祇說了幾句話，但是就是這麼幾句話，卻毀壞了曲阜的大量的文物古迹。何況在許多事情上戚本禹絕非是“祇是說了幾句話”。在

迫害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時候，戚本禹就接二連三的進行了煽動。更何況罪責大小，並不在於話多少，關鍵在於話的實質和內容，這是常識範圍內的問題。戚本禹作出這樣的辯解，實在是太勉強了。

我國刑法第十一條規定，“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並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在江青一伙和戚本禹橫行於世的年代，草菅人命，刑訊逼供，比比皆是。當年作為“文革小組”成員的戚本禹，對這些法西斯暴行是十分清楚的。當他煽動、迫害彭德懷、張霖之的時候，對他的行為將會發生的危害結果，他是非常清楚的。戚本禹企圖以“下邊幹的，我不知道”來推卸他應負的刑事責任，當然，也是辦不到的。

我的發言完了。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

刑事判決書

(1983)中刑字第629號

公訴人：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檢察員趙雲閣、孫成霞。

被告人：戚本禹，男，現年五十二歲，山東省威海市人。原任《紅旗》雜誌社歷史組組長，“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現在押。

辯護人：北京市法律顧問處律師傅志人。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以被告人戚本禹積極參與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犯罪活動一案，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公開審理，聽取了公訴人支持公訴的發言，審問了被告人，聽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辯護和最後陳述，聽取了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核實了與本案直接有關的證據，查明被告人戚本禹犯罪事實如下：

一、煽動迫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朱德、副委員長彭真，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陶鑄、賀龍、陸定一、羅瑞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德懷，中共中央書記

處候補書記楊尚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被告人戚本禹在釣魚臺召集中共中央辦公廳某些人開會，指使他們去圍門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當晚，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七、八十人就闖進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住處，圍門了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同年七月十六日、十八日、十九日，戚本禹在三次會議上，對先後參加會議的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和在京報社、電臺以及中共中央辦公廳等單位的某些人，誣陷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賀龍、彭真、彭德懷、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賣國求榮”，等等，並煽動說：“切不要對他們發善心”。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秘書局的某些人寫信給汪東興並周恩來總理，要求開會當面批判劉少奇，戚本禹卻把信送給了江青、康生、陳伯達。江青、康生、陳伯達擅自決定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夫婦進行批鬥，戚本禹立即部署，親自組織指揮中南海某些人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及他們的夫人多次批鬥並抄家，進行人身迫害。

一九六七年一月，被告人戚本禹誣陷朱德委員長是“黑司令”。在戚本禹的煽動下，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某些人和中國人民大學的某些學生在北京街頭貼出了“打倒朱德”的大標語，大字報。

一九六七年七月，被告人戚本禹指使北京航空學院學生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學生王大賓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德懷進行批鬥迫害，致使彭德懷被打斷肋骨，造成重傷。

二、誣陷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和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萬里、陳克寒、趙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告人戚本禹按照江青的旨意，在北京礦業學院群眾大會上誣陷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是彭真死黨”，並煽動他們“要集中炮轟，狠狠地打擊”。在戚本禹的煽動下，北京礦業學院和煤炭工業部某些人連續對張霖之進行毒打、折磨。張霖之被迫害致死。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被告人戚本禹伙同關鋒寫信給江青、康生、陳伯達，誣陷“萬里、陳克寒、趙凡是壞人”。

三、策動聚眾“打砸搶”。一九六六年十月，被告人戚本禹通過《紅旗》雜誌社林傑指使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譚厚蘭等帶人去山

東省曲阜縣“造孔家店的反”。十一月九日譚厚蘭帶二百餘人到曲阜，串聯當地的一些人，砸毀孔廟、孔府、孔林的大量文物，使國家財產遭到嚴重毀壞。

本庭經過法庭調查和辯論，對各種證據七十四件進行了調查。大量的書證和證人證言充分證明，被告人戚本禹的上述罪行，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被告人戚本禹供認了大部分犯罪事實，但不承認犯反革命罪。

本庭認為，被告人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中積極參與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犯罪活動，煽動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誣陷煤炭工業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的領導人，策動聚眾“打砸搶”，已構成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和聚眾“打砸搶”罪。為維護社會主義法制，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根據被告人戚本禹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條適用法律的規定和第九十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百五十條及第六十四條、第五十二條，判決如下：

判處被告人戚本禹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

刑期自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之前羈押的日期，以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本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上訴於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

審判長 唐根法

人民審判員 高德安

人民審判員 馬衛鵬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日

本件與原本核對無異

書記員 李 晶

第五部分

繼續革命

第一章 上海圖書館管理員

1986年1月，我在秦城監獄坐了整整一十八年的牢後，刑滿出獄了。監獄方面對我說，按照中央的規定，我不能居住在大城市裡。他們準備安排我回老家山東威海去。我不同意，因為我早已離開了老家，現在老家已經沒有親人了。而我的妻子在上海居住和工作，我要去上海。自我在1983年被特別法庭以反革命罪，判了十八年的徒刑之後，我的妻子因此也成了反革命的家屬而不能在中南海繼續工作了，她被安排到了上海果品公司當會計。由於我的理由充分，所以我就安排到了上海。關鋒儘管沒有被判刑，但他出獄的時候，也想把他安排到他的老家山東德州去。關鋒表示拒絕，因為他的夫人一直是在《紅旗》雜誌社工作的。後來關鋒就一直在北京居住，直到2005年去世。

由於我出獄的時候還沒有到退休年齡，所以就把我安排到上海圖書館工作，擔任圖書管理員。我在上海圖書館一共工作了五年多。

在前面的四年裡，我被安排在上海圖書館的古籍部，主要的工作是整理唐紹儀的歷史檔案。

唐紹儀是中華民國的第一任總理。毛主席在一次講話中曾經提到過他。說他能上能下，他不當總理後，又去了廣東中山縣當縣長，還把中山縣搞成了一個模範縣。毛主席說，難道我們共產黨的幹部還不如唐紹儀，祇能上不能下？！

唐紹儀最後是在與日本人談判的時候，被戴笠派出的軍統特務殺死的，他一直被說成是投降了日本人，當了漢奸。但其實這是個冤案，我在檔案中查到，他去和日本人的接觸，是蔣介石叫他去的。在檔案裡，有蔣介石給他的親筆信為據。後來，臺灣的國民黨

也給他平了反。

到第五年，我主要是從事對現代的報刊摘要進行分類的工作。由於工作不是很緊張，環境也比較寬鬆了。我和上海圖書館一位叫高宏興的同事合作撰寫了一本書，書名叫《歷史上大人物的變態心理》。按照規定，我不能用自己“戚本禹”的真名出版書。出獄在上海落戶時，不知依據什麼法律規定，我竟被剝奪了叫“戚本禹”的姓名權利，我祇得用我在上海地下黨時用過的化名“戚文”辦了身份證。這樣這本書就祇好署名“戚文”，才被允許出版了。第一版發行後很快就賣完了，可是第二版就不讓出版了。

1991年，我年滿60歲，就從上海圖書館退休了。我被告知，由於我被判處十八年徒刑外，還被判了剝奪政治權利四年的附加刑，因此我的全部工齡祇有一年零三個月。而我在入獄之前的工作時間，和出獄後的四年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工作時間，都“依法”不得被計算為我的工齡，我祇能按照這個標準享受一年半工齡的退休後的生活待遇。

第二章 在文化戰綫繼續革命

1、我和關鋒的共識：在文化戰綫繼續革命

1981年，關鋒被判處免予刑事處分，即從秦城監獄出來，和他的夫人周英團聚，定居北京。關鋒出獄後，我還在秦城服刑時他和周英就到處打聽我的消息，想和我取得聯繫。我出獄後，很快就聯繫上了關鋒，不久我就去了北京，在他家與他見了面。已是近20年的分隔，能再次相見，我們都百感交集。

我和關鋒商量，我們還能在這個世界上做點什麼？

毛主席說過：“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我和關鋒很快取得共識，我們要在文化戰綫繼續革命。我們本來都是搞文化的，關鋒專長研究哲學，我專長研究歷史。現在否定文革的人，都攻擊我們中央文革小組是毀滅、破壞一切文化的，是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現在我們兩個應該攜手合作，按毛主席的教導，研究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批判繼承我們祖先的一切珍貴的遺產。我們要用我們研究的成果，用事實來證明，我們不但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的批判者、破壞者；同時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的保護者和發揚者。

2、編撰《中華易學大詞典》

經過商量，我和關鋒一致的意見，從《易經》開始我們的研究

工作。

關鋒很早就研究《易經》了。我在監獄裡也用“心讀”的方法對《易經》作了反反覆復的思考和研究。

由於《易經》的內容博大精深，裡面包含著非常豐富而且深刻的思想。千百年來，有許多學者對它作了深入的發掘和研究，取得了相當的研究成果。但在另一方面，它卻更多是被許多人用來算命。因此，我們商量編纂一部“易學大詞典”，以匯集歷史上的研究成果，為今後進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礎。

這件事情的工作量很大，不是幾個人可以完成的。我們就商議成立一個編輯委員會，並且邀集了蔡尚思、胡道靜、蘇淵雷等著名學者一起來參加。

蔡尚思當時是復旦大學的副校長。一開始我去找他的時候，他還有些思想顧慮，可能是因為我和關鋒都是“刑餘之人”的緣故。但蔡先生的女婿卻對我們很信任和支持，他對蔡先生說，戚本禹、關鋒被判刑、坐牢，那都是因為政治鬥爭的緣故，他們又不是什麼殺人、放火的罪犯。這樣，蔡先生才同意出任這個編輯委員會的主任。

胡道靜先生是國內最大的研究“道家”的權威，而《易經》則是道家的基礎理論。

蘇淵雷先生在上世紀30年代就已經是很出名的學者了。蘇先生好酒，他不管跟誰交往，都先要喝酒。我不會喝酒，但還是跟他喝了三杯。

經過多年的努力，終於在200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了《中華易學大辭典》。關鋒生前還為這部詞典寫了獻辭，祇是他和我一樣不能用他真名關鋒，祇能用化名——古棣。

在“中國文化熱”的大潮中，在編寫《中華易學大辭典》時，我們看到，也有一些落後的東西，由糟粕變成了時髦，而曲解《易經》占卜算命的江湖迷信，竟也成了所謂傳播傳統文化的熱點之一。我們有責任宣講我們對《易經》的解讀。90年代初，中國書店的彭衛國編輯與我們一道策劃，先行出版了《周易十日談》一書，

就是為了編著一本既讓人們充分了解《周易》一書的思想精華，又能讓人們擯棄其占卜迷信內容的小冊子，以期為中國優秀文化的傳播作出一點貢獻。著名學者胡道靜先生為本書的出版寫了序言。

《周易十日談》出版已近二十年，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和鼓勵。一版、再版、三版、四版，發行量數以萬計。臺灣、香港也以《周易十講》書名出版發行，並收入其“現代人文庫”、“人文史叢書”。國家有關部門還授予此書“全國優秀古籍圖書獎”。2003年由世紀出版集團出版增補本時，我們將書名統一採用為《周易十講》。

3、編著《論語譯說與孔子批判》

孔子與《論語》無疑是中國兩千多年來，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與著作。我們要承繼中國歷史、中國文化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不可不認真研究孔夫子與《論語》。而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對孔子的研究，中國哲學史界形成有深遠影響的兩大學派：一派以馮友蘭為代表，被稱為“抽象繼承派”；而另一派是以關鋒為代表的，被稱為“批判繼承派”。對於孔子的評說，是這兩派爭論的焦點之一。馮友蘭認為，孔子是革新派，是順乎時代潮流的。關鋒等認為，對教育家的孔子與作為政治思想家的孔子應加以區別：孔子前半生對教育事業等作了重要貢獻，應予以肯定和繼承；從政以來的孔子是沒落奴隸主的代表，是逆乎時代潮流的，應予以否定和批判。1962年在曲阜召開的孔子學術討論會上，兩派的爭論還是平和的。

這種學術爭鳴，我們認為是完全正常的，必要的，是促進文化繁榮進步的。不幸在文革運動中，這種正常的學術之爭演變成了政治衝突。在當時那種背景下，我們支持了譚厚蘭帶頭在曲阜進行的討孔造反，亦批鬥了持不同意見的學者、專家，這完全是錯誤的。我們有我們應承擔的責任，也借此向他們表示我們的歉意。

而在文革運動的後期“批林批孔”時，馮友蘭著文放弃了原來的觀點。而關鋒和我當時都被關押在秦城監獄，被剝奪了任何發言權。而文革運動後，社會上現代新儒學鼓吹和掀起了一股尊孔的新熱潮。對孔子，對《論語》，我們現在仍持什麼態度呢？我們認為應該有我們的聲音，我們要表明我們的態度，我們應該回到學術爭鳴。為此我們合作編著了《論語譯說與孔子批判》，在國內我們祇能以古棣、周英、戚文署名出版。2012年9月，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以我們的真名：關鋒、周英、戚本禹出版發行了這本書。

我們認為，要科學研究孔子與《論語》，首先要正確把握理解《論語》的本義。兩千多年來，歷代學者對《論語》的注釋的書籍應有兩千多本。而目前國內最有影響的是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發行高達60餘萬冊，被譽為最佳注釋，並被選用為學校教材。我們經過認真的考證研究，認為楊伯峻的《論語譯注》中有譯注不妥和謬誤之處多達317處，而為其糾正，提出了我們認為正確的注釋。正確解讀《論語》，一定要首先區別《論語》的本義與後人加予的有違本義的注釋。在古籍校勘訓詁上的學術爭鳴，現在已經少有了。而《論語》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對其本義的學術爭鳴應是有其意義的。

在《論語》譯說力圖準確把握《論語》本義的基礎上，我們力求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為指南，對孔子生平和思想作出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評價。我們在本書中，再次堅持和表明了我們的態度：我們堅持對孔子批判繼承的主張，不贊成目前有些人要再把孔子捧成神的作法。

4、編著中國歷史人物論集

我的專長是研究歷史。而我對歷史的興趣與研究，得益於追隨毛主席身邊時，跟著主席讀書和聆聽他的教誨。毛主席對歷史的研究與重視，對古今中外歷史的知識，我認為黨內無人可比。毛

主席把歷史的研究與對馬克思主義和當前情況的研究，看作是取得革命勝利的三大保證。毛主席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實際運動的深刻了解，要取得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而毛澤東的傳家作家R·特里爾評價毛主席時說過一句話：“兵權之劍，倚在史書之旁”。

跟著毛主席讀歷史，讀毛主席的書，看到毛主席直接、間接評論過中國兩千多年歷史中的大部分有影響的歷史人物。我就有了編寫中國歷史人物論集的想法。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我就寫了一部分。1968年進了秦城監獄，雖然沒有多少參考資料，我亦憑著過往的記憶追敘撰寫。出獄後，找來參考資料補正與繼續補寫，共寫了近二百個歷史人物。我的計劃起自黃帝，大禹，終到洪秀全、孫中山，其中有帝王將相、草莽英雄，還有聖哲豪傑，文人學士，約兩百餘萬言，六個分冊。其中《先秦人物論》、《秦代人物論》、《兩漢人物論》、《三國人物論》已經結集出版。還有《晉唐宋元人物論》、《明清人物論》希望能在我有生之年也能與讀者見面。而這些書在國內也祇能以戚文署名出版發行。

5、關鋒的著述與我的其它著作

關鋒是哲學專家，尤其對《老子》、《莊子》有深入精到的研究。關鋒出版的《老子通》上下冊，140萬字，獲吉林長白山學術一等獎和比利時世界太極學會1996年度社會科學一等獎。關鋒與周英還出版了《惠施思想及先秦名學》、《法和法學發生學》等書。

這些年，我自己，以及與他人合作，還出版了以下著作：

《孫承宗》，中華書局出版。

《評李秀成》，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

《大人物的變態心理》，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

《孫子兵法大辭典》，上海科普出版社出版。

《墨子十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孫子兵法十講》，安徽文學出版社出版。
 《十家論叢》第一輯（共八冊）。
 《十家論易》，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論管》，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論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論孫》，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論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論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論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今古奇觀正續編》，江西百花出版社出版。
 《三國圖說》，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出版。
 還有已完稿的《屈原與〈離騷〉》，正在聯繫出版中。

6、關鋒與我的部份書信來往

我出獄後，與關鋒恢復了聯繫。在我們共同堅持繼續革命中，我們常有書信來往。現照錄一部份來往書信如下：

老戚：

一位朋友借給我穆欣的回憶錄。我立即讀了一遍。立即向“中央黨史出版社”函購兩本，近幾天可到，當即給您寄去一本。望您將其有關你的、我的與文化革命的仔細讀讀、想想，來京時認真共同研究一下（聽說不久來京）。

還有一個有趣的信息：王某在京郊買了兩座住宅，高級轎車一輛，雇用汽車司機、廚師、打字員、保姆等八名。這是一位朋友在電話上告訴我們的，可靠。

聽周英說，您是從醫院打來的電話，什麼病？甚念。

關鋒

95年4月24日晚

我身體在復原中。

老戚：

三月十一日收到來信，當晚復信如下：

（一）究竟您收到的是幾封信，還有沒有沒找到的。（1）掛號退回稿件，據來信是收到了，但其中有代擬的《十家論叢總序》與《出版說明》，也應是收到了，但來信未說。（2）同時（你一月二十七日）寄出三封平信，是三次陸續寫的，信末所署日期不一。第一封是我給您和陳寧寧的信，我給您的信和周英寫的“莊子兩篇譯解和批判簡介”，從來信看，這封信您收到了；第二封，講政治情景與看法的多，其中說我們的那位糊塗朋友雲年（您一想就知道是誰），也說劉笑敢其人，其中說不要告陳寧寧，免得傳到北京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從政治談到《總序》和《出版說明》——我對“總序”並不滿意，可修改，但不要往右處修改；又說考慮到政治氣候，似用“總序”不宜，故又擬了《出版說明》，請二者擇一，或者是幹脆不宣而戰（即不要《總序》或《說明》），將來看時機再論。“總序”或《出版說明》說到的原則，能夠貫徹就行了，不必先掛招牌。這封信，收到沒有？請查找一下（其中不宜於外人言的內容不少）。但《總序》與《出版說明》二稿，您總是收到了吧。第三封信，即未寫地址您終於找到了，我又給您寄去復印件的一封。

（二）《十家論莊》，您說照我的意見辦，那麼我的意見再說明白一點：

①入選名單——（按時代順序）胡適、馮友蘭、呂振羽、郭沫若、侯外廬、楊榮國、李泰榮、任繼愈、關鋒、張恒壽。

②不選章太炎。他的《莊子故》、《齊物論釋》不僅是王四前的人，而且重要的是訓了古體，如選入論叢，自亂其例。

③不要陳鼓應當主編，也不選他的東西（他的莊子今注今譯，去掉注、譯也沒有什麼東西）而主要是此人不能信，與我等非一道也。他與陳寧寧聯手捉弄我們，差一點（如不是我最後從陳寧寧寄來書稿中找出那封信，就被馬虎過去，上當了）。這種人，豈可與之共事。為人家作了宣傳，還被人利用，還搗我們的鬼，為什麼不

把摺在一邊呢？尤其是在當前政治情況下，尤應如此。我以為，再讓陳鼓應當主編，引為十家論莊之內，是萬萬不可的。近半年內也對陳某有所了解。

④關於陳寧寧由您斟酌。由您作主編，再找一個副主編，陳寧寧也作一個副主編未嘗不可，但大權不能交給她。我還是原來的想法，搶一段時間，處理些事，有轉選餘地。您要小心陳寧寧。

假洋鬼子們，實在可惡。老華僑、華裔大都有愛國心，發起反擊李志綏污辱毛主席的，就是美國華僑。而建國後主要這幾年，從大陸跑到美國去的成了美籍華人的，臺灣跑到美國成了美籍華人的，他們又來到大陸，或經商賺錢（往往是昧心錢），或充學者，撈取政治，名譽資本，此輩沒有愛國心，大都是假洋鬼子。同這種人打交道要十分小心，最好是不打交道。不知是否說清楚？如原則一致，具體的事情不清楚，也可意會而知。

（三）《十家論叢》，臺灣的有則有，無則無。可能有若干種，從臺灣選不出一個來（如是，也沒有什麼不好）。關於十家論孔（或論儒），絕不選一個臺灣的新儒家。可考慮選熊十力的《原儒》，他在政治上對共產黨是友好的。臺灣新儒家有捧他的，說的學術觀點沒有變，不像馮友蘭在文革批儒中投降了共產黨，有些人罵他，未逃臺灣，留在大陸，投降了共產黨——人家的階級性、黨性極強！

（四）《周易大辭典》，您關照下——最好親自看一下，對我的言辭不要亂改，絕不能刪去要用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來研究。

周英說，他要寫幾句。

戚文同志：我想說幾句，就是我們的這種處境，常受人騙，咱們想辦點事是非常非常困難。在社會上我和老關都沒有能耐了，祇有您還能辦成幾件事，但困難也不少。我們做事的目的首先要宣傳馬列毛基礎原理，在原理指導下的學術研究，另外留下的東西在歷史上站得住，對人民有利。因為我們處境困難，有些事也得留點靈活，譬如十家論選人首先有學術水平，有社會影響，起碼還有

要愛國心、民族自尊心。如有學術水平差些，人品一般的人，能在經濟上幫助的（出書），也可交朋友，也可選到我們編的書中。如經商的願資助出書的人，也可給他個顧問到主編等等的名義。那些無學問，又沒名、沒影響，對我們又不友好的人，選他的東西幹什麼。我們也得學得乖巧點，不被假洋鬼子利用。陳鼓應這人不好，他來中國，是企圖借大陸人像章冠潔之流給的名、利，以這做資本再去外國或港臺騙人。現在辛冠潔借他沒法利用了。孔子基金會也不會給陳鼓應），一無名義，辛什麼也不是了，誰還給他出書，誰還請他開會。在這情況下陳鼓應要找可利用的新人了，他要參選臺灣的，也是為了到臺灣讓這些人報答他。臺灣的學者（社科方面）沒什麼名人，他們想在大陸出名，不那麼容易。辛從去年下半年就遇到危機了，今年已經不再算基金會的人了。寫到這裡行了，告您一件新聞：辛冠潔為基金會告文化部、告民政部，在港反動報刊發匿名文章大罵谷牧（辛某不久之前的後臺），為臺灣《中央日報》利用。有好戲看了。辛某結局，恐怕很悲慘的。這封信，請看後燒掉。此信掛號寄出，接到後望速告。

有什麼需要討論，再來信。

關鋒 周英

1996年3月11日

老戚：

前信及簡介諒已收到。本擬等二天接著寫，不期出去買了兩本書，就放不下，翻閱起來了。一本是陳際寧著《牟其中真騙、假騙》，十六開本，208頁，對牟其中《南德公司》揭露得淋漓盡致（是一本雜誌，安徽出版的《作家天地》1988年第一期）。可以說是私營企業的聚集點，不獨是一個牟其中問題。看來牟氏一定反撲，因為並沒有得到處理，至今逍遙法外。我希望您也買一本認真看看。我也是粗閱，細看的章節不多。另一本是《蘇聯興亡的沉思》，李振誠著，改革出版社出版。粗翻了一下，重點看了一些章

節。此書提供若幹少有人知的資料，基本立場是好的，唯作者患了時代性通病——恐“左”癥。但仍給予人很大很有益的啟發。這兩本書，我還準備仔細看。我建議您也認真看看這兩本書。您在焦思的那個問題，也許可在這兩本書中找到根本性的答案或有益的啟發。

現在說說師東兵。1986年及稍後，我同辛某打版權官司時（此事不知您了解否？另有機會詳告），此人找上門來，要寫報導，他寫了，經我修改。後來說在山西《青年法制文摘》發表了，臨來忘記帶了。過了很久，才知道山西根本沒有這樣一個雜誌。我受了他許多騙。我有一篇長文《論技術革命的戰略問題》（就發展中國家而言），他說幫我發表，還從我這裡借了好幾本書去，還抄去我擬的《智力的勝利——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提綱），他統統不還了，再也不見面了。我還帶他去見過劉格平同志……。這是個壞人。看來土裡土氣，像個農民出身的，沒有想很會裝，很能騙人。後來有人把他見我之前寫的所謂報告文學（“文革”初期），對我惡毒的造謠咒罵。這些年，他在香港陳玉書的出版社出了好幾本“文革”的書，陳玉書送給關成華一套，我翻了翻，卻是無根據的瞎說（講了我不少，卻是編的，不過這回沒有咒罵）。他跟陳玉書不認識，大概是從我這裡聽到陳玉書的名字，知道有個繁榮出版社，而自己硬闖的，正投了這個出版社的機（陳玉書也是投機分子，坑害我國的壞資本家）。最近北京市上出了一本書《短暫春秋》，寫華國鋒“時代”，署北京紅旗出版社出版，師東兵著。上邊查這本書，出版社是冒名，和紅旗出版社無關。據說查書號，師東兵不承認是他寫的。（我估計是這個人寫的）。這個人沒有上層政治背景，他是山西省侯馬市（縣級市）文聯主席，“六四”時發表過一篇，很引起高層領導的反感。師東兵不可能看到密件，說看了“密件”稿，那是吹牛，不可信。您看他什麼書，聽什麼人說“他能看那麼多密件”？這個人在高層政界名聲很臭（以我們觀點看來也是壞人），很能鑽，恐怕是看了道聽途說而加想象——以上是我所知道的大概。

再說“智力開發”。

我覺得那三本書的提綱，都不對頭。例如《人類思維創造來右腦》，“大腦的生命線在於希望”，都極為片面，誇大。我們可合作寫一本《智力開發》，但不必列到這社出版的叢書中。我看了三個提綱，認為提綱作者，所知了了，而且有很大片面性，用此提綱框作者，是很難合作的。西方對腦科研究有重大的進展，但有其局限性，把智力開發看作純粹的生理問題（因而熱中（衷）於發明開發智力的儀器——當然儀器也不是完全無用），忽視了社會性，據介紹《情緒智商》（被認為一本很重要的書，是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寫的，哈佛大學極力吹他們的腦科學，說他們培養了六位總統——還有若幹名科學家），似乎也有這種片面性，不過我還沒看到這本書，報載上海×出版社最近已出版，您最好找這本書看看。另外，也有忽視或輕視“左腦”的傾向。我們寫一本的話，要吸收腦科學知識，避免其缺點，發揮我們的優勢：與認識論（不僅是創造新知識的認識論，還有學習前人收獲知識的認識論），結合起來，係中國古典名著的理性思維與形象思維相結合的典型材料。英國人寫的《大腦的功能與潛力》（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較好，美國人寫的《超級大腦——智力開發的最新科技的成果》，雖有很大片面性，也很有用。中文版海南公司出版。另一本也是海南的，《戰勝左腦》，題名“安生編著”。我看是一本“抄書大雜燴”，不可靠。弄不清哪是腦科學研究家的，哪是現在的——恐怕一點也沒有，介紹走了樣恐怕不少，又不注出處，也無法查對是否介紹錯了。我看錯的不少，也有若幹過時的知識。以上是我近期看的三本書。“智力開發”，確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哲學不重視“智力開發”，不行；“智力開發”，拋開哲學也不行。您的看法如何？我們如果搞，自由自在的搞，不能拴在出版社要求的格子裡。

《簡介》如何處理的，望告。《論語》二書在湖南（哪個出版社）如何碰釘子的，亦望告知詳情。還有些事要談，過一、半天再寫。

關鋒

98年2月20日

十家論孔

請周英、關桐任編委（分擔孔、老），勿忘！

老戚：

上月28日信收到。北京，依然很熱，在35°C-33°C左右，高於上海；今日稍減，給您寫這封信。

關於《十家論孔》。

我的意見：（一）新儒家一個不選。理由是書名是《十家論孔》，新儒家們並非論孔，而是接著宋明理學講或接著陸王新學講；有的還雜有佛學（熊十力），而梁漱溟，則是伯格森加陽明學（以上卻不是我的發明）。毛主席對梁漱溟的批判（五卷，本質上正確、深刻），至於當代新儒學家，他們已都聲稱是新儒學第三代，都是為當前的一應政治服務的。一句話擋回去，他們不是研究的歷史上的孔子，而是創立其自己的思想體系（而今日之名流，炒冷飯者尤多）。

（二）正面的準標準提出三條：（1）在海內外學術界的影響；（2）創新，有自己的獨立見解（炒冷飯者一概不取）；（二）科學性——不是指爭論中的問題之結論是否科學，而是指（1）論證的邏輯性（2）所用知識資料（包括歷史資料）的準確性（3）對於失去學術研究的價值（包括將來證明錯誤但有其重要的反面教材價值——正面言之，即提出確有價值的問題，研究上開拓了新界域等等）。

我想有（一）（二）兩條，可以順理成章地拔除那批所謂新儒家，可以保證從總體上是馬列主義占優勢（此語似目前不宜公開說）。我想這兩條可以寫在《十家論孔》緒言中去——這一本建議由你作主編（名義上如是副主編適宜，實際上也是你主編工作，我可以幫助您寫一篇緒言（我證）的受您的託代寫《十家論叢》緒言，不知還有否？我想以上（一）（二）的若幹想法可寫到《十家論……》緒言中去）。

《十家論孔》名單已確六家，我沒有意見。——關於馮友蘭祇選其《中國哲學史》與《中國哲學史新編》中論孔子的章節及五十

年代、六十年代關於論孔子的爭鳴文章，完全排除他的所謂貞元五節。蔡老，選其《孔子寫李體系》一書及其關於論孔的文章，不選其《傳統思想總批判》（正續），可在蔡老部分的敘述中提到《正續》，予以較高的評價。

另外四人，我意選胡適、趙紀彬、楊榮國、匡亞明（正好作為蔡書之的）。趙紀彬選其《論語新探》（用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人民出版社本），其他論孔文章（從其《國學錄》《國學二錄》選其論孔文章）及《關於孔子誅少正卯問題》（197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單行本）——這兩天我又重讀了這本小冊子，認為這本書是嚴肅的考證文字，沒有當時批林批孔的極端傾向，趙氏漢學家功底很厚（中共黨員中的學者恐祇此一人，此書發揮了他的特長）。楊榮國在批林批孔時的文章就不必選了（我看他把荀況也說成儒家，把一部中國思想史說成儒法的鬥爭史——過了極端了。我這是在秦城讀文所得的印象，不知準確否？）

關於關鋒文選文章，初步意見是：

（一）論孔子

再論孔子

三論孔子——在《春秋哲學史論集》中——關鋒、林聿時

（二）《老子通》下之二十二章（略作刪節）——關鋒、周英

（三）《代表奴隸主階級的孔子的政治思想為何成了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在未發表《論語十日談》中。——關鋒、戚本禹

（四）《〈論語〉釋義方法論》——關鋒、戚本禹。此之有四萬餘字。如此時已太多，此文不要。

陳伯達的論孔不選為宜。從政治上考慮，不捅這個漏子。據葉永烈雲，他看過檔案，陳伯達確自首過。其論孔、論老——價值也不大。

魯迅談到孔子的，確是犀利、深刻、發人深思。但都是雜文、結合當時政治而就一定言之。不是哲學史家論孔子（關於老子的亦然）。所以《十家論孔》中不選為宜。至於毛主席著作中論到孔子的，那是我們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指導思想，自然不能選入《十家論

孔》中。

《十家論管》——王德敏同志仍休養，前年來過一次，有好轉。他的女婿于孔寶在《管子學刊》任副主編，你給王德敏雲信寄《管子學刊》，肯定能收到。看他能否做這個工作。如身體條件許可，由他做，比較好，（也可考慮由孔寶作副主編，做具體工作）。

《十家論老》不必打可曦作副主編了。她的女兒在美混得“很好”，他去了一趟，住了將近半年，回來後不久擬再去。他可能要作“周景芳”了。他對此事已不會有興趣。如找一個人，為主編《十家論老》在北京做點事，關桐倒是可以做點助手性的工作。

《十家論老》，關於我的選什麼？《春秋哲學史論集》的，《老子通》的，我沒有想好，想聽聽您的意見。《十家論老》選哪十家，考慮後再告。現在醞釀著有些什麼意見，望告。

太熱，就寫到這裡。

曾經有一信，您談論章太炎與“移花接木”的，不知收到否？

關鋒

2000年8月4日

老戚：

9月1日來信及時收到。因為我遇到了一件亟須處理又很費勁的事（後面再述），所以隔了數日才給您寫這封回信。現在先談來信要討論的事。

“關於陳、李並收”，您提議加上“易白沙”，很好。前幾年我還讀過一遍易文，很有水平。至於魯迅，我的印象裡沒有論孔子的論文（我讀了《魯迅全集》）。前幾年看到批林批孔時所出小冊子——好像名字叫作《魯迅批孔》，那是一本語錄，大抵是從雜文中抄錄，見大都是批“所謂現代孔夫子”的。為不亂其例（《十家論孔》的體例），還是不選為宜。

至於論孔選關的，我上次開出了一個單子，倒是要聽聽您的意見（其中還有一篇您我合作的《孔子的代表奴隸主的政治思想為什

麼成了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在原定《論語十日談》中）。另外，入選者最高定額是多少字，請告知，以便斟酌。我的意見盡量不用節選。像匡直的《孔子評論》，沒有辦法，只好節選了。

關於《十家論老》

我看郭志還是入選。在當時以及後來還是很有代表性的。胡適的也應有，同此道理。高崇不必選——筆證等只好不選，因為此類文章在古史辯甚多，只好全部放棄。來信中的一批人名中，我看呂振羽應選——是最早用馬列批毒的，蔡尚思——文章可否與其他相近者合併選立（可與蔡志商合）。任繼愈的論點，質量是很低的，但有代表性，（一）不懂古字古義，不懂古漢語語法，頗有代表性；（二）實際是受蘇聯物興（性）論影響而大講老子唯物論的代表。從其有代表性、反映時代的某些特點這個角度來說，應該選。再加李泰芬和陳鼓應（臺）就夠了。其他，就不必考慮了。陳伯達，不必考慮。一不必捅這個馬蜂窩，（二）他的老子唯物論，沒有代表性。三十年代講老子辯證唯物論的是葉青（是一本書，其中考證老子時代倒是頗有價值）。我這裡有一本（不知來源）1951年四川成都大學印制《陳伯達文選》，我看是陳伯達自己選的（因忙了，以不要打亂原來的企業機構），而未及正式出版，其中也沒有關於老子的文章。

我看應把蘇聯楊興順的《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及其學說》，應選入附錄（太長，可節選），它影響中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中國學術界，一些人一哄而起。大講而特講老子唯物論，蓋由於此（不是陳伯達，也不是葉青）——這是歷史，故應選入之。《十家論老》序中也需提到。（每一“十家論”），是否附一個可以來論之的書之目錄。

還有一個大問題——關於老子其人、老子其書的爭論，要不要選。按理應選，但篇幅太大，祇要割愛了。或在序言中，每個選入去的介紹中略作介紹。我也拿不定主意，請您再考慮一下，聽聽有關方面的意見。

《論老》選定的，您也替我考慮一下，選那些好。太多了，反

而不好選。

最近碰到的費勁未處理的是：吉林人民出版社瞞著作者將《老子通》之幾部從整體中印出來，以《老子校詁》名義（作為一本獨立的書）出版（1998一版2800冊第二次印刷3000冊），嚴重侵犯版權並刪去作者的周英名字，又嚴重侵犯人權，錯亂嚴重——全書52萬字，錯字2914，超過新聞出版署規定（不及超過萬分之一，即一萬字祇能有一個錯字）的56倍，這又嚴重地敗壞了作者的學術名譽。我們細讀這本書，請律師協商，化了不少時間。大約下周可以發出律師致吉林人民出版社函——我們已授權律師進行交涉以至起訴。——昨天律師來，簽起委託書（此事千萬保密——當是暫時的）。

另外，吉林還交由臺灣復文書局出版了《老子通》，他們不承認已經出版。我看是打混。所以，請您設法從臺灣買到《老子通》，這是最硬的，無二話可說的證據。希抓緊。謝謝。

此事亦需保密。

關鋒 周英
2000年9月12日

請看反面

第一任總理

反對袁世凱和北洋軍閥

唐紹儀與孫中山的合作

第二次南北會談

唐紹儀與西南新軍閥

唐紹儀與蔣介石

中山縣長

唐之晚年

死亡之謎

歷史評價及教訓

請看背面

戚文同志：

您信上說小華黨校裡有可給關亦洲介紹的對象，希望小華幫這個忙，如能促成，等關亦洲結婚時當重謝。祝您和小華互敬互愛，幸福健康！

周英
8月6日

老戚：

（一）先說您的來信——祇有一封，是6月4日您寫的信。其中裝有①給“周英‘關老’”，末署6月4日；②給關桐的信，末亦署6月4日；③《關鋒論孔》的單子開了六篇文章，大概擬選這一些，徵求我的意見。——此外，至今未收到您的信件（到6月15日）。你6月4日的信，我是6月11日（星期一）看到的，該日一上班老幹部處就打電話說“有您的一封信”，我們就立即去取了。所以等到今天回信，因為不僅我沒法想，也沒與關桐商量，看他能不能擔任您的委託的工作。

（二）關於論孔十家，我的意見，我①堅決不同意選上錢穆——此人學問了了，是一貫反共，並逃亡臺灣，從學術考慮不必選，從政治上考慮絕對不能選——不能為反動資產階級作義務宣傳；②堅決不同意選梁漱冥（溟），近20年有些人抬梁、罵毛主席，選他幹什麼？他的東西——特別是論孔，哪有什學術價值？③可考慮吳虞與胡適合併，如這樣可選周宇（予）同（一定要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而不選金景芳（他的書我仔細讀過的）④胡、吳均編為陳獨秀一起，不可；吳虞入陳，胡另列亦不可。我意，入選名單要有兩個考慮：（一）學術水平；（二）政治上的考慮，是有差還是有利？

（三）《十家論孔》選我的，同意您的意見，唯要添上《孔子欲應公山弗擾召、佛肸召“考辯”》。

——彌崔述《洙泗錄的一個考證》（見《春秋哲學史論集》）

您開的單子，隨信寄回。

(四) 十家論老——選關的什麼文章，過十幾天即告。

(五) 可由周英寫一介紹關鋒論孔的文章。我意不能用評述。您大概還記的“十家論莊”編選時與陳寧寧的矛盾，我反對序，或介紹對被選入各家作評價、批評，編委會沒有這種權威，而且一般亦不宜，當年（1964）我就反對人民日報仲裁學術的做法，曾引起軒然大波，結果我勝利了，這由於毛主席裁斷、保護——你大概知道吧。《十家論莊》關於介紹關鋒及莊子研究（署名康北海），我忘記題目了，請查一查告我，以便周英寫介紹我的“孔子研究”。

(六) 可由關桐寫一介紹關鋒的老子研究。其他，他不能擔任，任務壓得焦頭爛額，沒有時間去翻論老之書。

(七) 我没有答應寫“十家論孔”的緒言，您記錯了（我最近沒有精神搞些事），我是應您的要求寫了《十家論叢》結論，大約將近三萬字，已按時寄給了您。不會丟了吧。我希望能用，不能用即請擲還。

(八) 選馮友蘭，一是建國前，其在中國哲學史有孔子或“儒家”一章（對五四的反動），建國後爭鳴文章及其中國哲學史新編中的章節。批林批孔馮的《孔子其人》入選不入選——可考慮。如不入選，在介紹中要重點介紹。

關鋒

2001年6月16日

周英並關老：

您好！

上海人民出版社希望現在編的十家論叢三部印好一起推出，因而編輯工作要加緊。

十家論孔，關著篇目已擬好，請審示。十家已初定：一、陳獨秀；二、李大釗；三、胡適，吳虞附；四、馮友蘭；五、蔡尚思；六、趙紀彬；七、楊榮國；八、郭沫若；九、關鋒；十、匡亞明。

十家論老關著篇目，已擬好，關桐先看：（已遵示聘他任編

委），由他請示您，十家論孔，擬請編委周英寫個五六千字評述，是否可以？專此

敬禮！

戚文

二〇〇二、六、四

老戚：

6月12日來信最近才收到。

來信所說零碎家務事等等，沒有什麼意見，您照您的想法與可能辦就是了。

王力的兩本厚書《王力反思錄》，香港友人（此人曾寫過訪問我的報導——沒有添油加醋，是個言而有信的人）給我寄來了一套。粗看一下，問題之八十五以上是造謠，歪曲事實，美化自己，簡直是無耻之尤。周英正在細看。大出我的意料，大概也出乎您的意料。怎麼對付？您什麼時候來京，看過細商。

寫字，不會爽約，您來京即可拿走。

請速回信。周英囑代問華錚好。

（我怕收不到）

關鋒

2002年6月23日晨

周英、老闆：

26日信收到。

王力的書，我一直未收到。但我相信你的判斷，等我拿到書再詳加研究。

初步意見，我們應有個批駁，否則後人無法弄清問題真象。

您能否先寫駁王力的書，就像馬克思寫福格特先生那樣，現在能駁斥王力的已沒幾個人了，所以從來的革命，其最危險的敵人常常是來自內部。這些從革命內部破壞革命的蛀蟲最可怕。王力究竟是背叛文革還是他當年的革命就是假的？想想他當年在文化大革

命中慷慨激昂的革命呼喊，他不像假的呀！怎樣這樣180度的大轉變？這樣攻擊文化大革命。您怎樣看他這種大轉變？

修派理論家，又出來個李君如（黨校校長呀！）吳敬璉（學部原來的造反派呀）他們陸續有修著出版、華怡芳告我，七月吳要出一本大書《轉軌中國》，駁李君如的有魏巍（我過去的好友，一直很好，堅持革命氣節），駁吳的有吳易風（人大的左派教授）。

李職同志情況如何？他一定要移居美國嗎？能否告訴我他在美國的電話和地址。原來在人大您有一位姓肖的好友，現在表現如何？疾風知勁草呀！十家論莊快出書了，論墨明年出，論孔論老大概也一起推到2003年。這一套論叢出來後，我不想再編其他書了。

您的人生感悟對我啓示很大。

希望周英快快恢復健康！

戚文

2002.7.3

老戚：

來信及時收到。北京天氣極度悶熱，難熬，又不敢開空調。昨睡下了狠心才開空調，故遲至今早才復信。

穆、王之書粗粗翻過，周英正在細看。二者壞極了。一、無耻；二、喪盡“天良”（赤子之心），在我讀過的同類書中是最壞、最壞的。叛徒，也是敵人，但人們最恨叛徒——實為至情至理。穆書送老閻一本，我也沒有買到。王書，據雲很香，尤其大量進口，當即大量重印，還是託你那位朋友即時買一本。

這兩位，回想起來，我認為不是從好變壞，不是從紅可粉紅變黑的，從其人生觀說是一貫如此，“投機分子”可當首位，我在想，我們（尤其是我）當年為什麼一點也沒有覺察呢？！

我好久沒有去書店了，你說的正、文這本書我都不知道。太熱，不願動。等涼快天，去找找。魏巍的處境究竟怎樣？有若幹傳說未必屬實。既然華鋒與王為忘年交，可寫信問問。中國還有魏巍等一些好同志，可慰毛澤東在天之靈。

李職夫婦因病已回北京住院，通過一次電話，還未見面，介紹老、莊的短文，當天氣涼快一些即著手寫。

天熱，又煩悶，開了空調也極不舒，大概到陰歷八月才能好一些。今年奇怪，不知為什麼氣溫經常比上海要高，僅低於海南，周英代問小華好。

關鋒

2002年7月8日

周英並老關：

7月8日信收到。

上海天氣炎熱，昨前尤甚。北京當比上海更悶。因為它是大陸性的熱。特別是近年北京周圍（西北、東北）風沙化厲害，森林破壞，水庫沒水，溫更是居高難下。你們沒事千萬別出門，家裡一定要開空調，祇要不對著人體吹，不要緊。老關一定要保護好頭腦（避免頭腦患擴張性病），為的是多給人民留下點好著作。我最近因為寫兩漢人物（張良韓等等）重讀孫子兵法文獻，老關對太公兵法和（三略）所作的分析，實在是高水平的。這部概要大部都是關寫的，它是近年古代兵學研究的大作品。僅從（三略）來信，從古到今沒有能說清它的來歷，老關卻一語道破它是張良的作品，往往有理有據，發人未發。被捧到天上的陳賞修有這樣的水平嗎？再看老關的理論分析，他在論述（廣武君）中說的，“歷史規律是有彈性的，而不是機械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規律觀，它包含或融合概率論，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與不以人們的意志力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高度統一起來，這樣才能既防止機械又防止非決定論，歷史唯心的侵蝕。”這裡說的是何等好啊。這樣的理論論述在他的文獻概要中比比皆是，編輯出來就是一本很好的《歷史規律論》。

王力的詩，你們看看，那可以叫詩嗎，他怎麼不懂“藏拙”呀！寫好了，至少推敲一番再發表不是更好嗎？詩要給人以美的享受呀！

再請注意保健！

戚文

2002.7.26

老戚：

在天氣悶熱、頭腦發昏、筆下艱澀之際，接到你的來信勸“要保護好頭腦”，立即停筆休息，立秋之後再幹。得知在寫《兩漢人物》，甚好，當比《三國人物》更上一層樓。不過，我慮兩漢人物範圍太廣，不易集中探討傑出人物的作用與歷史規律的問題，而易於一般化。我意不如探討項、劉之爭這個較短時期（關係到後若干年的歷史發展——給中國封建社會上半朝打下了特有的印記）的十六、七名表現各不相同的歷史人物——從陳勝起，到呂后止。擺脫成見，大膽地客觀地探討。如項、劉，不一定肯定他們是農民起義領袖（如仍認定是農民起義領袖亦須獨立地研究其根據）。這段歷史是豐富多彩的，作為一個歷史的轉折點，又是集中的。總之，是大有可為。當然決心寫兩漢人物也可，我意亦經分若干歷史關鍵時期。不過就是漢初人物或劉、項之爭時期的歷史人物，深入寫下去也是够二、三十萬字的小冊子了。不知以為然否？你贊揚的我的那個觀點，一星閃光而已，未能從探討歷史發展規律的角度去研究一個系列的歷史事件或一個系列的歷史人物，而從歷史唯物論進行總結。我們的哲學之貧困實在嚴重，我看病象就是教條主義，不研究中外歷史，空口講歷史唯物論，可寫到的有血有肉的原理也被我們弄成了教條。我之有慮於研究中國哲學史，動機便是想擺脫這種困境，而投入之後又逐漸地“明察秋毫而不見與薪”，結果至今也未搞出什麼像樣的東西。——此來些零碎新見，也未能系統的整理。

太熱。過幾天再寫。

關鋒

7月27日下午

周英、老關：

八月四日關於十家論孔的信收悉。此前關於章太炎信沒收到，請查一下是什麼時發的。

十家論孔不收新儒家，您的理由充足。我亦不主張收，但說不出充足的理由。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有論孔五章是否都收。

趙紀彬的書，您主張用六十年代，但他七六年二月版修訂之處頗多，而且修訂合理，故可否採用七六年版？又《論語新探》篇幅很大，三十二萬字，再加上其他論文，字數太多，可否擇其重要編選（祇選上部、中中）望提示。

楊榮國擬收他《中國古代思想史》中孔子思想第四節及文革前兩篇論孔的文章，文革後寫的《奴隸主義思想家孔子》小冊子和兩篇論文擬不收。

匡亞明的《孔子評傳》全收，篇幅太大，可否祇收代序、導論、生平仁學及教育部分？

禮！

2002.8

老戚：

來信悉。收到您的信數日之前數日，就收到了沈善增先生來信及他的《還吾莊子》。我先讀了《還吾莊子》將及一半，認定這不是一個認真做學問的人，因此不願同他作朋友，於是一封應酬信，沒有將拙作贈他——《老子通》，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版，我也祇餘一部了（這是實情），故無法賠之，歉甚。

來信所問之事，我不知就裡，提不出什麼意見。一般而論，暫時不發新文（可以寫出來珍藏）也未嘗不可，保護自己，也及重視。

近來我倒不是“忙於寫書”。是這麼回事，若干年前所寫一本書稿《假借字典》，一百多萬字，前年北京一家出版社要出，今年元月前送來清樣，我校閱這本書稿費了二十餘天時間，早已將校閱稿歸還了。此書，不知今年能否出版。

《非典》，北京鬧得厲害，看來不能很快過去。我們平日就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不會出什麼問題。

再談。

關鋒

5月8日午後（2003年）

老戚：

9月2日來信及寄來復印件，都收到了。

我認爲那份“復印件”不可信，是壞人的惡意造謠。你不是不久來京嗎，可把當時你我知悉情況互通，研究一下這個問題。信上不好談。

敬禮

關鋒

9月15日

老戚：

很久未接來信，甚悶。李毅強來京，怎麼不讓他帶封信來。希來信詳告近況。

廣州的潘國璠先生要去上海拜訪您，並給您帶去一本書《晚年周恩來》（香港出版），我初看了。其中引王力若幹說。對了解王有用。

您不是秋末來京麼？怎麼沒有來信。

請速來信告知近況。我同周英身體均好，忽（勿）念。希速來信。

敬禮

關鋒

2003年11月16日

老戚：

怎麼很長時間沒有接到您的來信了。不知何故？您不說秋後到

北京一趟嗎？

大約數日前廣州的一位朋友叫潘國璠記者，是現住廣州的獄友解耀宗介紹（這是可以依賴的一位老同志），打過幾次交道。他向港報寫過我的介紹，經我看過（審閱過）發表出來，一字不差）……所以我覺得這個人是可以依賴的。所以替他寫了介紹信，他持信去上海見您……。不知此人您見過否？我想，此事不至於引起您的反感吧。怎麼您一直不來信呢？盼您來信，有什麼意見說說。不說，會叫壞人鑽空子，造成大誤會……。

急盼來信。

關鋒

2003年12月28日上午

老戚：

12月23日的來信，今日上午讀悉。備悉一切。昨天午間給您發了一信，怪您不來信，晚間關洲來告訴我，您給她幾次電話，告訴她轉告——她自己搬住新居，離我這裡不近，不能常來。所以她昨晚來了，我才看悉一切。我怪您的話，錯了，請諒。

春節您能來京，太好了。多少年沒見面了，極想一見。

我身體尚好（屆85歲），每日讀寫，思想尚能集中、活躍。大概還可再活十餘年。您勸我鍛煉身體，甚是。我的活動太少了——從今日起決心每日在房內步行2000步。穆某人，與王力一樣壞，造了很多謠。“穆欣說：江青在67年曾指著周恩來的鼻子罵周……”雲雲，那是絕對沒有的事。我的記憶力還相當強，如有這種事，我不會忘記……近是穆欣雲的一句話也沒有。這是穆某的惡意造謠，明白事理的人，一看穆某所雲就知是編造。“疾風知勁草”，誠哉斯言。

望春節協夫人來京，就住在我家——雖然，比起賓館來，條件太差，但談話方便。周英同樣歡迎您們。

爲了您收到昨日信後即刻接到此信，就寫到這裡，也許明日再寫一信。

敬禮

關鋒

2003年12月29日

老戚：

二月十五日來信及時收到。因為周英病重住院，三個兒女輪流守護，我心中忐忑不安，焦急煩燥，所以未及時回認，請諒。周英病已在痊愈中，據醫生分析，估計一周之後可以出院，屆時我當去信告知。希望慕春協夫人來京，那時春暖花開（不會有“倒春寒”），周英當已恢復健康。潘兄並沒有一個名字叫餘汝信，我看那是另外一人。讓李毅強在網上找，說已被封了，打不開。港、澳對這類東西不會封，你那邊如有朋友，請查從網上查找餘汝信發表的《訪問》，不難。

寄來的材料，很有意思，我認真看了。並在思索。

關鋒

三月一日

老戚：

來信說到的第一件事：楊成武的回憶錄說：“林彪寫信找我（“我”——戚本禹……關鋒注）商量520事件，我又找您。”怎麼我記不得？我記得當時情況緊急，我們是直接到林彪處開會，不可能林彪再找、找您等等情節。是我記憶力壞了，還是楊氏胡說？希望您看後告我。——我記得比較清楚：純粹楊成武胡說。這個人，沒想這麼壞，大出我的預料，當年我是認為這個人是比較好。

我有一個想法：關於這段歷史，我仍各樣各種說法（互相通報），專門下功夫研究（包括回憶）。就一些重要問題，您想我也想，您分析我也分析，並且找機會見面商談——回憶歷史事實，也需要互相啓發。分頭思索，當面討論，找一段時間交流，而且整理成文字（當然包括我們的分析），留給後人。這也是我們無可推諉的責任。不然，祇是我們通信說說，起不了作用。您看，我這個想

法如何？——當然第一步是：各自將所見各種胡說，告知對方。

來信談到的《十家論……》事，李毅強回京後好可著手辦。也是很費時間的事，不能太急了。

我同周英身體均好，勿念。

關鋒

7月14日

第三章 公開駁斥對毛主席的造謠和污蔑

我在《回憶錄》中寫了，我曾當面請教毛主席，關於毛澤東思想能否一分為二的問題。毛主席自己也常說他也會犯錯誤。關於文革運動，毛主席自己就評價為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並不是肯定一切。但文革運動後，許多批評毛主席的人，不是善意地批評，科學地反思總結黨的歷史教訓，而是惡意地攻擊，否定一切。更有李志綏這樣的人，利用他過往的地位、關係，蒙騙不知情的人們，不惜對毛主席造謠、污蔑，出賣自己的靈魂，投其國外反毛反共勢力所好，以換取其施捨的美元。我鄙視這些賣主求榮，背叛自己過往誓言與信仰的小人。祇要有機會，對李志綏之流對毛主席的造謠和污蔑，我都會旗幟鮮明表明自己的態度，公開予以駁斥。現僅舉一例，照錄香港《明報月刊》雜誌，以《御筆痛批御醫》為題，刊登的我駁斥李志綏的文章如下：

附錄：

御筆痛批御醫

——戚本禹批判李志綏的回憶錄

訪問：美國《達拉斯時報》編輯：陸源，整理：鍾志林

一度擔任毛澤東“御筆”、前中央文革風雲人物戚本禹近年深居簡出。他不接見記者，不談政事，不寫往事回憶。美國《達拉斯時報》編輯陸源的父執輩，是戚本禹的好友。前不久，陸源因公務去中國大陸，兩人會見，談及往事。談話中陸源曾就李志綏寫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徵詢戚本禹的意見。戚本禹堅決駁斥了李志綏，並透露了許多文革和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歷史秘聞。

陸：前不久，臺灣、美國出版了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寫的回憶錄，這本書轟動海外，不知您看過沒有？

戚：看過，是友人從日本帶回來的，談這個問題之前，先要學孔夫子來個“正名”。毛澤東沒有私人醫生。毛澤東的醫生、護士、秘書都姓“公”。李志綏原是北京中南海門診部的醫生。我一九五〇年進中南海時，他負責給中南海的幹部、工人看病。他是從國外留學回來的“洋醫生”，醫術要比當時從解放軍訓練出來的土醫生高，加上他看病認真負責，而且能講出個道理來，所以大家都願意找他看病，由此有了名聲，並被選為工作模範。他給當時中南海的警衛局長汪東興看病看得也不錯，汪東興喜歡他，遂被介紹到毛澤東那裡參加保健工作。開始沒有名義，大概是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前才正式出任毛澤東的保健大夫。記得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傍晚我到毛澤東住的菊香書屋開會時，看到他同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徐業夫和衛士長李銀橋一起在毛澤東臥室旁的值班室值勤。

毛澤東並不是“封建帝王”

陸：李志綏說毛澤東不是什麼無產階級的領袖，而是個專制獨裁的封建帝王，他的統治，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他說回憶錄“是在毛澤東極權統治下平民百姓生靈塗炭的歷史記錄”。對此，您怎麼看？

戚：李志綏雖然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但專職是保健大夫，政治常識比較貧乏，以致在為了某種目的要攻擊毛澤東的時候，祇能拾人牙慧，東施效顰式地學著時髦去攻擊毛澤東是封建帝王，這並不奇怪。什麼叫封建帝王？封建帝王是壓迫農民、維護地主統治的世襲君主。毛澤東何許人？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成功地領導億萬農民最終推翻地主統治的偉大人物。他青年時即號“農民王”，終其一生都造地主階級的反，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剋星，是二千多年封建社會最大的造反派。說毛澤東是封建帝王實在比指鹿為馬、指黑為白還要荒謬。說毛澤東“專制獨裁”，也是信口雌黃！李志綏大概沒有看過北洋軍閥、日本漢奸、國民黨政府是怎樣用槍炮來鎮壓農民、工人和學生的。毛澤東正是為了同這些專制的獨夫民賊作鬥爭，才拿來武器鬧革命的。毛澤東在革命過程中建立過蘇維埃紅色政府、抗日民主政府、解放區民主政府，就連美國記者斯諾、

斯特朗等人都承認這些政府是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民主政府，中國革命勝利後，毛澤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盡管在民主建設上仍有諸多的缺陷，但它仍是中國歷史上最民主的政府。除了文化大革命這個非常時期，這個政府的所有重大決定，都是經過法定的會議討論通過的；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各級政權癱瘓了，黨和國家的重大事務，仍然由黨中央和國務院法定的會議討論決定。既然是通過了合法的形式，你並不能說它是專制獨裁！雖然，那個時期，由於毛澤東的威望，許多決定是按照他意旨通過的，但既然通過了一定的法定程序，就不能說是個人的專制獨裁。你可以對民主的不完善、不健全，甚至違反規則提出責難，但你不能簡單地把它與封建時代的皇帝獨斷獨行等同起來。毛澤東在黨和國家的民主制度的理論和實踐方面，不是沒有可指責之處的，但是他仍然是黨和國家民主制度理論和實踐的探求者和力行者。他可以有一千條缺點、錯誤，但是終其一生，他是始終熱愛著、牽挂著他的人民。毛澤東生前對英、法、美等國所奉行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比較欣賞，他曾對我們說過，我們寧可走英美式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走法西斯、貝利亞式的道路。法西斯指希特勒所實行的國家社會黨的專政，貝利亞指的是前蘇聯內務部所實行的亂抓人、亂殺人的特務統治。封建帝王是世襲的君主，但我們卻沒有看到毛澤東把自己的主席地位傳給自己的夫人或兒女。盡管江青多麼熱中於權力，毛澤東還是提議並經黨中央政治局討論，確定華國鋒為他的接班人。他的子女也沒有特權，在他去世之前，他唯一尚存的兒子毛岸青是一個普通的翻譯工作者，他的兩個女兒大的是普通的科技幹部，小的是黨委機關的一個領導成員。毛澤東掌握著全中國的財富，但他的子女除了分得一點稿費外沒有分得任何財產。難道世界上有這樣的封建帝王？

“曹營”的事不易辦

戚：我五十年代接觸毛澤東，六十年代離開毛澤東。就與他的交往看，我不感到他比我所見到的任何領導人更缺少民主。就以李志綏講到的“八司馬”案件說，當時許多中央領導人都認為青年

人（即“八司馬”）批評中央辦公廳領導是反黨，唯有毛澤東說，青年人可以批評中央辦公廳的領導，如果這就叫反黨，那麼我也反黨，我願意同他們一起挨板子。當時被批判鬥爭了幾個月的“八司馬”聽了毛澤東這句話，全部嚎啕大哭！就李志綏也不得不承認毛澤東尊重他，對他講平等（盡管他攻擊這是表面的、虛偽的），有幾次錯怪了他，還向他道歉。他說毛澤東向他道歉時的一句話：“曹營的事難辦吧！”情節上絕對真實。毛澤東向自己的部下道歉時常說這句話，意思是他像曹操一樣，出爾反爾，錯怪了人。李志綏攻擊毛澤東倡導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災難，這個問題，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當時稱之為“三面紅旗”的產生、發展及其成績、錯誤，對它的歷史批判，需要一部專著才能說清楚。憤慨和攻擊，無助於歷史的認知，也無補於歷史的前進。當然，要求李志綏講清楚這個問題，就他的水平和經歷，也是不可能的。我祇希望世人不要忘記，在糾正“三面紅旗”的錯誤方面，毛澤東所花的力量不比他倡導“三面紅旗”來得少，第一個提出壓縮空氣的，第一個提出要全黨冷靜的，第一個要底下講真話的，第一個反對過早進入共產主義的等等，都不是別人，而是毛澤東。對人民的苦難心酸垂淚，用不吃肉來懲處自己的也是毛澤東。衆所周知，毛澤東的日常生活遠遠比不上今天的一個小老板，他沒有吃過多少好東西，一碗紅燒肉是他最大的享受，他還能怎樣處罰自己呢！在毛澤東和他的黨的領導下，六十年代中期，農村的經濟終於得到了全面的恢復，（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毛澤東至少是一個“善補過”者吧！在李志綏的筆下，中國在大躍進、人民公社時是哀鴻遍野，餓殍滿地，死人無數。這也太誇張了，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缺點、錯誤，當時的天災人禍，的確給中國人民造成了苦難，但也不像李志綏描寫的那樣一片漆黑，當時我、田家英，一組的林克、葉子龍以及李志綏等人都按毛澤東的指示，在下面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難，苦難到什麼程度，我們大家都清楚，為什麼要誇張其辭呢！從五十年代后期開始，中國每年都有人口統計，這統計基本上是準確的，到文革時中國的人口

已近八億，如果大躍進、人民公社時的中國真是到了“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程度，那麼當時中國的八億人口是從哪裡鑽出來的？也許他們都是果戈里筆下的死魂靈吧，那中國今日豈不早解決了人口問題，還提倡什麼計劃生育呢？

文革機密抄錯了

陸：李志綏回憶錄的第三篇寫文化大革命，外國人認為這是文革的信史，您怎麼看？

戚：李志綏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單純的權力之爭，以這種庸俗的見解，寫不出文革的信史，歷時十年、牽涉到億萬人民命運的一場運動，不可能根源於一、兩個人的權力之爭，雖然在一切重大歷史事件中，兩種思想、兩種觀念的鬥爭，又往往具體體現為它們的代表人物之間的“權力之爭”。可以說關於文化大革命深遠的歷史根源，關於它的歷史必然性與偶然性以及與此有關的種種歷史奧秘的探索，李志綏連門檻還沒有跨過。我一九六八年一月即被審查，沒有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全部過程，但我親自參加了文革初期的歷史活動，對這一段歷史我比較清楚。據我的了解，李志綏在文革初期，他的工作任務祇是給毛澤東、江青和一組的人看看病，他既不是文革小組的成員，也沒有在文革小組辦公室擔任過任何職務，他離文革風暴中心比較遠，不可能了解很多文革的機密，由他來向我們提供文革的第一手史料，這是很滑稽的，依我看，他寫的文革回憶錄除了他親身參與過的支左活動外，其他大部分是根據現有報刊資料和別人寫的東西拼湊起來的。在拼湊時，為了嘩眾取寵，使人相信自己參與了核心機密，便假造現場，因此把個回憶錄弄得錯誤百出。拿他寫的文革第一件事《二月提綱》來說，他說他列席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在武漢召開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組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講了話，但是我們從他寫的書中看到，這個講話卻是從關鋒、艾思奇整理的毛澤東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講話原封不動地抄過來的，你既然參加了二月八日的高級會議，毛澤東在此次會議的講話，卻要從幾個月以前的會議紀錄中抄襲，這豈不可笑！接著，李志綏寫道：“彭真說，是不

是寫個中央批語，請主席看過，發全黨。毛說，你們去寫，我不看了。我馬上就知道大難（彭真、陸定一的大難）要臨頭了，毛澤東設下圈套。”事實上，當時毛澤東、江青、康生都還不清楚彭真的意圖，也沒有仔細研究過《二月提綱》，毛澤東、江青還想依靠彭真打開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江青在彭真回北京前還向彭真交代她所聯繫的北京左派力量，要他回北京后找戚本禹、關鋒、李希凡，所以彭真回北京開會時，一定要關鋒、戚本禹到場。祇是在北京發生壓制左派的文章的事件以後，毛澤東回過頭來研究《二月提綱》，才發現這是一個壓制學術批判的文件。

李志綏太不自量

戚：李志綏的“推背圖”不寧唯此，他還是個“三年早知道”，就是說他早在叁年前即知道毛澤東在設圈套反對劉少奇、鄧小平。其他細節上的隨意編造，更是不勝枚舉，如所謂中央文革的名單是林彪提出來的，又如所謂中央文革在一九六六年底布置打倒汪東興等等，全是瞎扯！還有武漢事件，連前后過程都弄不清楚，就在那裡亂加評論，讀者祇要把他的回憶同當事人寫的回憶一比較，就可以看出破綻。中共中央機關，特別是中南海機關有嚴格的工作紀律。保健醫生的職責是保護首長的健康，他不能參與黨和國家的機密。不僅共產黨如此，就是號稱民主的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大概也不會允許一位保健醫生參與他們的核心機密吧！而且，毛澤東對醫生，以及對大部分喝“洋墨水”的知識分子，總的態度可以說是“敬而遠之”。這是毛的一個弱點，世上知之者頗衆，這也可以幫助人們推斷李志綏在中南海的地位。李志綏在回憶錄裡卻大言不慚地說，他不僅經常參與關係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中央會議，甚至祇有少數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會議，他也可以參加，而且與毛澤東、彭真等人同席而坐，真够嚇人的！事實上毛澤東的保健大夫也不祇你李志綏一個人，在李志綏以前，起碼也有過五、六個人，他們包括毛澤東最信任的紅軍老幹部、衛生部長傅連璋，沒有一個人參與過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不要說是醫生，就是毛澤東的秘書、警衛，包括他最信任的機要室主任葉子

龍，警衛局長汪東興這樣的老黨員也不能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而他們都是長征幹部呢！中央政治局開會時，葉子龍、汪東興偶爾過來關照一下，也祇能站在邊上看一看。直到文化大革命時，中央要汪東興列席中央文革小組會議，這時中央政治局開會，汪才能在后邊有一個座位。一個醫生、一個新黨員竟可以列席中央少數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會議，與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席，“充穀子”充到這般地步，李志綏也太不謙遜了。李志綏不僅不能參加討論黨和國家機密的中央會議，就是中央的一般會議，他也沒有資格參加。李志綏說他曾參加毛澤東召集的調查“八司馬”案件會議，還作了記錄。其實這次會議參加者都是中央直屬機關的領導人，其中職務最低的是我。除了林克、彭達彰（中辦領導之一）有個簡單會議紀要以外，沒有其他紀錄。李志綏根本沒有參加過這個會議。李志綏的“紀錄”，大部分是根據一些傳聞編制的，他說“毛說，唐順宗時王叔文、柳宗元八個人變法圖強”等等，就不對頭。毛澤東當時說的二王八司馬，二王是王叔文、王丕，八司馬是柳宗元、劉禹錫等。熟讀史書的毛澤東當然不會把二王、八司馬混在一起，自稱讀過《二十四史》的李志綏連這些常識都沒弄清楚就敢於代“聖人立言”，這等說起來，“小僧”真是可以“伸伸腳了”。

毛澤東是有過婚外戀

陸：李志綏說毛澤東“縱情聲色犬馬”，“過的是糜爛透頂的生活”，“一貫以女人為玩物”，“熱中於以道家房中術御女”，他征召大批美麗、年輕的女孩入宮，“女人像上菜般輪番貢入”，幾個人共一床大被，雨露均沾。這些都是事實嗎？如果您不好回答就保持沉默，我要弄清事實，千萬不要“為尊者諱”，言不由衷！

戚：毛澤東是我的導師，也是我的難星。我十八年革命，是在毛澤東的引導下進行的；我十八年的監獄，盡管是江青、汪東興送的誣陷材料，但最後作決定的也是毛澤東。“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我們之間的恩怨，已經分明，不存在“為尊者諱”的問題，事實上對於這些問題，我也有責任澄清事實，保持沉默不符合我的性格。其實，早在你問這些問題以前，我已向許多人解釋過，李志

綏對毛澤東玩弄女人的指控是謊言和捏造。但是看過李志綏回憶錄的人，大多相信李志綏的謊言和捏造，而不相信我的解釋。祇有一位美國醫師胡定儀小姐相信我的解釋。她說，戚本禹被毛澤東關押了十八年，如果有事實，他不必為毛澤東隱瞞。胡小姐唯一的保留是，也許戚本禹沒有風聞過這些事，但又不大可能，因為他在毛澤東身邊生活過許多年，假如真有這些事實，他卻一點風聞也沒有，那是難以想象的。可惜像胡小姐這樣保持理性思維的人太少，許多人都是先入為主，偏聽偏信李志綏，反而認為我在替毛澤東文過飾非。這真是令人嘆息！善良的人是容易上當受騙的，文學家編個故事，就能賺他們的眼淚，騙他們的錢，他們怎麼對付得了一個處心積慮地在那裡偽造歷史的人呢！我在北京解放后不久，即上調中共中央辦公廳政治秘書室，開始任見習秘書，後來任秘書、科長、支部書記等職。順便說一下，李志綏說政治秘書室的主任是陳伯達，他弄錯了，陳伯達從來沒做過政治秘書室的主任，政治秘書室的第一任主任是師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師哲以后，田家英任主任，副主任有彭達彰、何載、陳秉忱等。田家英出問題后，我接任主任，一九六六年四月政治秘書室歸並中央秘書局，童小鹏任局長，我任副局長。中央政治秘書室也是毛澤東的秘書室，所以我在職期間，同毛澤東一組的人聯繫甚多。葉子龍、蔣英、徐業夫、林克、汪東興、王漱先、李銀橋、沈同、王宇清、高智、吳旭君等等，我都熟識，而且同他們的關係滿不錯，我從來沒有見過，也沒聽任何人說過毛澤東有玩弄女人的事實。毛澤東生活樸素，根本沒有什麼“縱情聲色犬馬”、“糜爛透頂”的事實。偉大人物也有普通人的欲望，據我所知，許多偉大人物也同小民百姓一樣犯過婚外戀的錯誤，盡管我主張每個人都應當把自己的私生活限制在合乎社會要求的範圍裡，但我不認為這類問題是什麼“糜爛透頂”的事情。所以，要是我看見或聽說毛澤東有這類事情，我就說有，可是我在職期間確實沒有看見或聽說毛澤東有這類事情，所以我祇能說無，我不需要在這個問題上為毛澤東作偽證，因為在歷史法庭面前做偽證，受損害的不僅是歷史，而且是他本人。歷史的偽證者同歷

史的偽造者一樣，不僅喪失了現實的人格，而且有歷史的遺臭。事實上，在私生活的問題上，可以指責毛澤東的不是李志綏所編造的那一大堆謊言，而是他在井岡山上同賀子珍的婚姻，因為毛賀聯姻時，毛澤東與楊開慧婚約仍然存在。說實話，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來詢問過這一段歷史，周恩來的答復是，當時井岡山的人聽說楊開慧已經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朱德將軍也有過類似的情況，當時中央對這些問題已有過解釋。

一個人睡也不寬敞的床

戚：五十年代毛澤東住在菊香書屋背北面南三間大房，東西兩屋各三十多平方米，由毛澤東、江青分住，中間屋二十平方米不到，是警衛、秘書、護士、服務員的值班室。毛澤東的屋，中間放個大床，半床多書，後來毛澤東常住游泳池，屋內也是一個床，半床書。這些床一個人睡覺都不寬敞，怎麼能幾個人大被同眠、雨露均沾！李志綏的造謠也太離譜了！毛澤東是全國人民的領袖，威望極高，他很注意維護自己的形象，這一點李志綏也是承認的。就是一個平民百姓吧，他也要為自己的婚外戀保守秘密，很注意維護自己形象的毛澤東卻肆無忌憚地向李志綏公開自己的秘密，甚至同他討論自己非法的性愛問題，這能是事實嗎？毛澤東那麼多部下、秘書，怎麼他不去向別人公開自己的秘密，卻偏偏要向你李志綏坦白交代呢！毛澤東的居室沒有鎖，也從來不上鎖。門外就是警衛、秘書、護士、服務員的值班室，這個值班室是全天候的，二十四小時都有人，一切活動都有記錄，祇要毛澤東沒睡覺，每隔一會，就要由警衛、護士、服務員進去送文件、熱毛巾、茶水、藥品，毛澤東無論做什麼，外邊的人都知道。試問，在這樣的環境裡，毛澤東是如何“以房中術御女”？而女人又怎麼能“像上菜般輪番貢入”呢？

毛江之間無密議

戚：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我即被指定為毛澤東的秘書，毛澤東外出時，我是留守中南海的總管（中央辦公廳代主任）。這個期間我常到毛澤東那裡去，有時深夜也去，我怎麼從來沒有在毛澤東

那裏看到李志綏為我們描繪的那種房中秘戲圖呢！相反的，我倒是看見毛澤東對女同志格外尊重。包括日夜與他接觸的護士吳旭君，毛澤東對之都很尊重。因為我在中南海呆的時間久，同中南海的服務員很熟悉，她們中確實有漂亮非凡的年輕姑娘，她們最願意為毛澤東送水、送熱毛巾，她們經常對我說“主席真偉大，不僅政治上偉大，生活上也很樸素”。毛澤東對她們也很尊重，有時問她們的姓名、家庭，講幾句鼓勵的話。有幾個姑娘也替我打掃辦公廳，同我無話不談。她們受委屈，找我申訴，有時有人對她們有非禮的言行，她們也找我申訴。她們向我反映過好幾個人的非禮行為，最嚴重的一次是李志綏好朋友做的，但她們從來沒向我講過毛澤東有任何非禮行為。李志綏好朋友做的事，李志綏後來也知道了，但他筆頭一轉竟把它硬按到毛澤東的頭上了。黨同伐異，尚可理解；歪曲事實，是何道理？李志綏最骯髒的造謠是說毛澤東同江青達成秘密妥協，江青允許毛亂搞女人，毛允許江青參與文革，這真是一石雙鳥，既攻擊了毛澤東，又攻擊了江青，但毛江妥協既是秘密的，你李志綏從何得知，難道你真是蛔蟲族。再者，毛澤東和江青都不是簡單的個人，他們的一切都在黨、群眾，特別是為數眾多的中外政敵的監視之下，他們不可能作這樣的妥協。在幾十年的革命歷史上，誰也沒發現毛澤東有過以黨的原則來換取個人私利的行為。江青雖有種種錯誤，但她潑辣的性格很難改變，它是娜拉、晴雯式的人物，連死去的楊開慧她都要死命妒嫉，怎麼能想像她能在這種問題上與毛澤東達成什麼秘密妥協！我以為，指毛澤東為“專制獨裁的封建帝王”，認文革為“毛劉之爭”，僅表明李志綏在政治觀念上的無知與庸俗。作為一個留洋的醫生，長期生活在一個大國的政治權力中心，縱然有千萬自以為是的“灼見”，卻難啓齒，一旦找到宣泄之機，長期被壓抑的政治表現欲驟然爆發，便飄飄然以為自己在一夜之間成了政治評論家。得意之餘，容易忘形，誇大扭曲，在所難免。對此，我覺得尚可理解。但不能容忍的，是李志綏利用自己擔任過毛澤東保健醫生的身分，編造毛澤東的“假隱私”，蒙騙世人。這不再是一種正常人的心理需要，而是一個道德敗壞者的

宣泄了。李志綏寫的那些黃色的、下流的東西，其實是從地攤上的黃色小報上改頭換面抄襲來的，不同的是除了幾個衆所周知的人物如江青、張玉鳳以及電影明星等，黃色小報再造不出多少女人的名字，李志綏畢竟在一組呆過多年，知道不少女機要室人員、女服務員的名字，他造謠的本錢比黃色小報大得多，他還會吹噓自己，把自己說成是毛澤東身邊的重要人物，裝腔作勢、藉以嚇人，企圖使人相信他捏造的各種謊言都是事實。曾參殺人，毛澤東玩女人，這古今兩大流言，都發人深省。

陸：李志綏回憶錄裡有七、八處提到您，他說您是一九六六年三月到上海幫助陳伯達、江青起草“五……（為亂碼）”？

戚：我不需要李志綏的辯護。我是懷著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理想國的熱忱，主動、積極，自覺而且是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雖然時間祇有一年半，但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責任，談不上什麼“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個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是必然的，誰也逃脫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陽仍要升起，這是沒辦法的事情。我們這個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祇有通過苦難的歷程，才能臻於成熟，歷史祇能對此發一聲深深的嘆息！但李志綏關於我的回憶也是根據不負責任的所謂“紀實文學”抄寫的。一九六六年三月我是《紅旗》雜誌歷史組組長，不曾任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任局長是後來的事。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仍在中央文革工作，沒有被逮捕。別人可以現抄現賣，你李志綏在中南海生活過，“八司馬”事件中曾支持過我和林克，並經常同我們打交道，可以說也是我的朋友，怎麼可以亂抄亂寫呢！

早謀劉少奇太離奇

陸：李志綏在回憶錄裡說，毛澤東當時對他不錯，他為什麼要寫這樣的回憶錄呢？

戚：我聽一位從外面探親回來的友人說，李志綏的回憶錄原來不是這個樣子，後來出版社以重金提出了要求，才改成這個樣子的。如果這個傳聞屬實，那麼這本書同其他根據政治需要而編制

的反對共產主義的小冊子一樣，不過是某種政治目的的產物，李志綏不過是個爲了三十塊銀幣而出賣自己導師的猶大。但是我不滿足於簡單地把李志綏刻劃爲一個卑鄙的猶大。他從來就不是耶穌真正的門徒。他是封建帝王御醫的后裔，後來是一個在西方自由主義傳統意識培育下成長起來的自由職業者。共產主義意識對他是格格不入的，他的回國決定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個迷誤。這個決定同他的人生理念、價值取向以及世界觀體系完全相反。當然，這些分析是我根據他的所作所爲而作出的判斷，李志綏本人不可能對自己有如此清晰的認識。在哲學思想上，他很淺薄、極其淺薄，正如我的醫學知識比起他也很淺薄一樣。把這樣一個角色裝扮成“內幕知情人”，讓他故作神秘地湊在人們耳邊大聲嚷嚷“隱私秘聞”，實在很可笑。不能說李志綏的回憶錄沒寫一點事實，不，他寫了些事實，特別是一些他直接經歷的又與他的創作意圖不衝突的事情，這些事情他寫得蠻好，蠻真實。例如毛澤東對自己疾病的態度，在毛澤東身邊秘密安置竊聽器的事件，毛澤東對擊水長江與奮搏海浪的執拗，還有他對江青、汪東興等人品格、作風的某些描寫等等，它們不僅整體就連情節也是真實的。但是祇要涉及政治性的報導或分析，他就轉向了，歷史真實與他的政治取向竟成了互不相容的冤家對頭。即使是生活性的事情，祇要與政治結了緣，他的筆也會產生扭曲。例如他說毛澤東早在六十年代初即企圖取消劉少奇的保健，讓劉少奇死於疾病，這個謠言就造得太離奇了！李志綏說他的回憶錄是中國“平民百姓生靈塗炭”的“歷史記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李志綏的回憶錄在海外甚囂塵上的時候，中國普通的平民百姓卻自發地掀起了空前的“紅太陽熱”。成千上萬的老工人、老農民和昨天上山下鄉的年輕人，虔誠地懷念他們逝世多年的領袖，一遍一遍地唱著毛澤東的頌歌。

抄襲別人見品格

戚：被李志綏認爲遭受毛澤東“塗炭”的千百萬“生靈”，在沒有任何輿論導向、沒有任何組織指令的情況下，掀起了遍及神州大地的“紅太陽熱”。李志綏對這個現象作何解釋呢？李志綏在

序言中很得意他創制的種種謊言，但這些謊言對中國人民已無新鮮感！在此以前，各種攻擊毛澤東的出版物早已風靡過一陣子了。李志綏的書就同林青山寫的《江青的機要秘書》一書非常雷同，不僅雷同，而且有前書抄襲後者的痕迹，不同的是林青山沒有做過毛澤東的保健大夫，他無法編造自己的“親身經歷”，只好假冒戚本禹、閻長貴的口吻來攻擊毛澤東是封建帝王。戚本禹本人看了此書非常憤怒，鄭重地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出控訴，但北京市人民法院對我的控訴置之不理。林青山的謊言被戚本禹、閻長貴揭穿後沒人相信了，可李志綏不同，他做過毛澤東的保健大夫，誰能想象他與謊言製造者林青山竟是一流的人呢！李志綏不僅攻擊毛澤東，除了彭德懷等個別人，他是大觀園裡沒好人。就連受中國人民尊敬的周恩來也是毛澤東的“奴隸”、“忠犬”，他深感“憎惡”，而且他還親眼看到周恩來跪在毛澤東面前報告工作。哎呀呀！我幾十次地看到毛澤東同周恩來在一起商談國家大事，怎麼一次也沒能看到此情此景，為什麼好事情全部給李志綏一個人看去了！又，鄧穎超是“泥鰍樣的人物”，“極端自私自利”，他深感“厭惡”，其他人更不必說了，上上下下都腐敗透頂……李志綏攻擊的僅僅是毛澤東嗎？

【注：本紀錄發表前未經戚本禹看過，責任由整理者自負——鍾志林】

原載《明報月刊》

後記

2016年5月16日，是毛主席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標誌性的日子。2016年5月8日，是我年屆85周歲的生日。而在2016年2月24日，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確診我為腺癌晚期，且已轉移擴散。但我能高興地看到，“歲月留痕”，我的《回憶錄》前後經五年時間的努力寫作與反復修改，在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的幫助下，能趕在5月16日前這個好日子裡在香港出版了。

1986年1月，我從秦城監獄18年刑滿釋放，定居上海不久，就有一家美國的出版社找來，並先將40萬美元的版費先行打到銀行我私人的賬號上，要買下我《回憶錄》的版權。我知道他們想要我寫什麼，我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並立即退回了他們已匯到我賬上的40萬美元。

這以後，這麼多年，有許多人，有著各種各樣動機的人，都來找過我，勸我，要求我寫我的《回憶錄》。我都婉拒了。我當然會寫的，但不會受他人的觀點思想左右。我也在思考，等待，加之回憶錄中所述的，沉重的著述工作，幾乎占有了我全部時間。這件我生前必須完成的任務，就這樣一直拖到了現在，才有了這個結果。

《回憶錄》是留給歷史的我的最後作品。《回憶錄》中表明我的立場、我的觀點、我的價值取向是鮮明的，讀者看後都會了然。但我更看重我在《回憶錄》中描述的歷史事實的真實性。史料的真偽應是研究歷史的人最為看重的。我對《回憶錄》中我描述的歷史事實的真實性負責。但大家知道的原因，我已沒有查證檔案材料的條件，和訪談其他相關當事人的能力，僅憑記憶，難免有不

準確、不完整，或是遺漏的地方。如有不妥、錯誤之處，請知情人指正。但我更希望將來文革檔案的解凍與公開，能有相關的檔案材料，佐證我《回憶錄》中描述的全部事件與事實的客觀性與真實性。我相信有一天，即使不同意我的立場、觀點的朋友，也會承認我說的那些事都是真的。

最後，我要在這裡感謝一切幫助我完成這本《回憶錄》的朋友們。特別向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向都江堰的朋友彭偉致謝，五年來一直對我的關心與幫助！向先後參與和幫助我整理文稿的孟繁華、郭亞馥、高海清、馮國治、汪暉等同志一並表示衷心的謝意！

戚本禹

2016年3月21日於上海病房